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之二十四

先秦卜法研究

朴载福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之二十四

先秦卜法研究

朴载福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卜法研究 / 朴载福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12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之二十四)
ISBN 978 - 7 - 5325 - 6077 - 6

I. ①先… II. ①朴… III. ①甲骨学—研究 IV.
①K877. 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6064 号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之二十四

先秦卜法研究

朴载福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启东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24 插页 1 字数 516,000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800

ISBN 978 - 7 - 5325 - 6077 - 6

H·68 定价: 108.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李伯谦

副主任：王天有 王邦维 程郁缀 郭之虞
徐天进 赵化成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世长	王天有	王邦维	李伯谦
严文明	宋豫秦	赵化成	赵 辉
拱玉书	夏正楷	徐天进	（常务）
高崇文	郭之虞	程郁缀	

Aurora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Peking University

Publication Series , No.24

Research on Methods of Divination in the Pre-Qin Period

Piao Zaifu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序 一

葛英会

相关资料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华先民尝试凿破鸿蒙的骨卜蓍筮之术,在人类文明曙光最初照临华夏大地之际就已经萌生,并在此后数千年间经历了由发生、发展到繁荣、消亡的全过程,成为华夏文明开创时期颇具神秘色彩的珍贵思想文化遗产。

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巫祝卜筮为渊藪。古老的卜筮文化不仅开掘了易学先河,它如星占、式法、历算、医理、医方等数术方技,亦无一不溯源于巫祝卜筮之中。即便是代表儒家思想精髓的顺吉逆凶的天命观、天人合德的宇宙观(《论语·季氏》),均可在盛行于上古时期的卜筮文化中找到源头。文献所载的古代卜筮,并非是一种纯粹鬼神崇拜的巫术,其时遵行的先谏于人,后谋于神的卜筮程式就是证明(《虞夏书·大禹谟》)。如云“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周书·洪范》)，“询谋佥同，鬼神其依，龟筮协从”(《虞夏书·大禹谟》)。其中积淀的敬畏天命、天人合德的人文理念，是一份千古永存的精神财富。

文献称“龟曰卜，蓍曰筮”，然据考古所获古代中国的卜筮遗存，约在龟卜行用之前二千年前后，卜用兽骨就已经出现。占卜采用的兽骨龟甲，由其质地坚实而留存至今；筮占取用的蓍草或竹木枝条，则因易于朽蚀已不复得见。据文献所载，古代中国的骨卜与蓍筮是并用的。《诗》曰“尔卜尔筮”(《卫风》)，《书》称“谋及卜筮”(《洪范》)，都清晰地记述了这样的史实。商周两代卜用甲骨的刻辞，一般笼统地视为记录龟骨占卜“卜辞”，其中也不乏蓍草筮占所得的卦爻，更加有力地证明了文献所述真确可信。有关两者的形成年代，考古所获的卜用兽骨，已见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记录筮占经卦或别卦的卦爻，时代较早者见于殷墟晚期或先周遗址出土的金、石、陶文与甲骨刻辞，两者的起始年代存在两个千纪以上的间隔。然而，如《易·系辞》等早期文献所述，蓍筮之术早在伏牺氏王天下的时代已经形成。我们相信，骨卜与蓍筮产生的年代应是大致相同的。

据目前已知的考古资料，以甲骨刻辞形式记录占卜事项与占卜结果，是商代后期（前1300年以后）才开始流行的。在此之前的二千多年间，卜用甲骨上记卜、记筮的刻辞十分罕见。其时人们的占卜事项与占卜结果，应是由参与其事的巫祝卜史口头表述的。其贞辞、卜辞或占断、祝祷之辞，只能是脱口即逝的。今天我们要了解此一时期的骨卜卜法，除为数不多的早期文献可资参考之外，就必须直面大量无字或有字的卜用甲骨，对其残存的

与占卜有关的种种遗痕,认真细致地进行观察与研究。

这里,笔者向大家推荐的朴载福博士撰写的《先秦卜法研究》一书,就是海内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集结。当然其中也包涵了朴氏个人就此所作的颇具创意的新探索。该书全面系统地撷取中国田野考古的成果,以含有卜用甲骨的考古学文化为时代与文化背景,以行用甲骨占卜的考古学文化时空分布为线索,考察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卜用甲骨诸如攻治、烧灼、钻、凿、卜兆等占卜遗痕,再由遗痕类别的异同、形态的变化、所在部位及布列关系,把握先秦卜法阶段性与区域性特征,进而对其总体的发展轨迹做出客观概括。

朴载福博士针对中国先秦卜法所做的研究工作,研究对象是考古所获的卜用甲骨,研究方法也严格遵守了现代考古的科学规范,其宏观的学术视野以及精细入微的观察分析,使这个旧有的研究领域面貌一新。若干卜用甲骨因地层扰动或发掘不当造成层位失据、年代判断有误者,该书均认真予以甄别。鉴于该书对先秦时期几千年间骨卜卜法的科学梳理与精确描述,使我们对中华先民的这项珍贵遗产获得了更为全面、更加系统的了解。因此,该书以卜法研究为目的的甲骨形态考察,为此后卜用甲骨的年代判断、残断甲骨的定位复原、卜辞行款走向与诵读顺序的裁定,提供了可资参证的对比资料。

如上所述,出土所见卜用甲骨的占卜遗痕是先秦卜法研究的可靠途径,但是,骨卜卜法的终极目的是灼龟取兆,即通过灼烧龟骨的方式获取指示吉凶的卜兆,可知此前的龟骨攻治、加施钻凿以至取位、取形等,都是为求取如意兆象而预设的举措。由此可见,有关卜法研究的相关环节,应以卜用甲骨的残存卜兆为中心。

据《周礼·春官》,周代有专司卜事的官员太卜,其职掌是辨识称作“玉兆、瓦兆、原兆”的“三兆之法”,并说此三兆的兆体均可分为一百二十种,每种兆体又可区分为十种互有差异的兆象,可见古之卜法是何等复杂。惟其如此,甲骨占卜之术就不可能在民间广为流传。至西汉初年,骨卜卜法已是“精微深妙,多所遗失”(《龟策列传》)。其时由褚先生遍访太卜之官、掌故文学长老所得的龟卜兆象不过几十种,所示卜事吉凶仅有一百多条。

于出土所见的卜用甲骨,因经历数千年水土侵蚀、自然风化以及挖掘与流传过程的人为破坏,原有卜兆多有剥蚀而不易明辨。包括本书在内的既往的卜法研究,有关兆象的观察与描述均用力较少,其中的缘由应与以上两项有关。

伴随田野考古发掘技术与文物影像资料获取手段的进步,保存完好的卜用甲骨与清晰传真的影像资料不断富积,使卜法研究直接由卜兆形象入手成为可能。特别是大量加刻如永、正、从、若、吉、咎、眚、晦、尤、灾等繇辞的卜兆,无疑是考察占断结果与卜兆形态相互关联的可靠依据。期待朴载福博士或有志于此者在这项研究中取得突破,将先秦卜法研究推向一个新里程。

序 二

刘 绪

朴载福博士于2001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指导教师是葛英会先生,研究方向侧重于古文字和历史文献。2004年,因葛先生将近退休年龄,按照学校规定不再招收博士研究生,而同方向当时又暂缺博士生指导教师。有鉴于此,朴载福在报考博士生之前,征求了我的意见,希望我能担任他博士生学习阶段的指导教师。在此之前,我对他已有一定了解,印象比较好,一是他选修过我讲的研究生课,由其作业知其中文水平、专业知识和学术灵感都不错,在留学生中不多见。二是也听到部分同学和其他老师对他的相关评价,都说他学习刻苦勤奋,购买了大量中文书籍,还在韩国留学生中组织了“读书会”,研读《仪礼》、《周礼》、《史记》、《竹书纪年》等历史文献。对于这样一位优秀学生,对其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意愿应该予以支持。但是,考虑到他原来的研究方向,考虑到我本人对古文字缺少专门研习,没有能力指导他博士生期间的学习。因此,在我答应他可以报考我的博士研究生的同时,我还专门与葛英会先生交换了意见,即请葛先生帮忙,共同担任他博士生阶段的指导教师。

对博士生来说,论文的选题非常重要,既要符合学生的志趣与知识结构,又要有所发明与创新,还要能够发挥指导教师的作用。在我本人长期从事田野考古的过程中,有不少问题意欲究明而无暇顾及,其中从考古学角度对卜用甲骨作系统梳理和研究便是问题之一。最初对这一问题产生兴趣是20世纪90年代初对天马一曲村遗址西周时期发掘资料的整理,居址中出土的几块卜骨需要绘图和描述,这必须仔细观察,在这个过程中,依当时自己对各时期卜骨的大致了解,觉得变化很大,认为有必要就其发生、发展梳理一下。1996年,在北京琉璃河遗址指导研究生发掘实习时,又发掘到一些卜甲,其中数块卜甲上还有刻字,包括“成周”二字。为了对这些西周卜甲有深入的认识,通过查阅资料,发现有些问题已被他人揭破,而更多的问题学界还没有涉及,觉得也很有必要对所有卜甲从考古学角度进行全面的梳理和研究。由于对卜用甲骨问题关注已久,所以当朴载福决定报考博士生的时候,我觉得由他来做这个题目比较合适,因为他在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学习多年,还参加过田野考古发掘实习,专业基础较好,而且他的硕士论文与先秦占卜有关。葛先生也同意我的想法,当征求朴载福的意见时,他也比较满意,论文的选题范围就这样定了下来,内容涉及先秦时期所有卜用甲骨的考古学研究。

2003年末至2004年上半年,正当朴载福硕士毕业,应考博士生之时,陕西周公庙遗址取得一系列考古重大发现,其中在“好善坑”出土大量破碎卜用甲骨(主要是卜甲),不少甲骨上还刻有文字。显然,能够对这些甲骨进行整理,对朴载福来说是很难得的机会。2004年下半年,朴载福办理完博士生入学手续后就赶到周公庙工地,先参加了铸铜作坊遗址的发掘,然后即对“好善坑”出土甲骨进行整理。他对每片甲骨都进行了仔细观察,并缀合很多。在观察过程中,尤其注意甲骨的加工方式与特征、钻凿灼形态与布局、刻辞类别与所在部位以及行款走向等。为了便于观察和定位,他绘制并复印了很多比例不等的腹甲与背甲图,给不少字甲确定了位置。这为他后来搜集资料、分析研究和撰写论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说实在,要把所有见于发表的先秦时期卜用甲骨的资料搜集起来,工作量非常大。首先是时代跨度很长,上自新石器时代,下迄东周,属于不同时期多种考古学文化。其次是卜用甲骨资料过于分散,它散见于各发掘简报、发掘报告与相关论著中,需要逐一翻阅查找。即使由一位中国学生来完成,也非易事,对一位留学生来说,难度更大。我最初担心他承受不起,建议先搜集黄河流域的资料,若时间实在不够用,就缩小地域范围。经过他的努力,基本把2007年以前各地发表的这类资料都搜集到了,当然,遗漏是难免的,但为数一定很少。除搜集和分析研究发表的资料外,他还到中原和北方诸省,到湖北、四川等地参观调研,观摩了不同时期、不同文化的大量卜用甲骨。考古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研究者对实物的认识程度与是否直接参与、是否亲自动手、是否目验有密切关系。正如朴载福博士在后记中所言:这些实地调研工作,对其后期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大有裨益,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仅靠书面资料而脱离甲骨实物的不足。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完成的。2009年初,朴载福毕业回国,工作之余,抓紧对论文修改,并补充了一部分内容,遂形成本书。

本书共分七章,除序言和结语外,正文分五章,即第二至六章。第二章在系统梳理各时期、各类遗迹所见卜用甲骨的基础上,重点阐述了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分别对卜骨与卜甲的发生、发展与消亡过程进行了总结。卜骨最早出现于仰韶文化时期,仅见于相距较远的三处遗址,此后逐渐增加,商代为鼎盛时期,西周开始衰落,东周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卜甲的出现晚于卜骨,最早见于先商文化晚期(或早商)之“南关外型”,此后与卜骨并存,迅速发展,晚商为鼎盛时期,其衰落与消亡基本与卜骨同步,约在西周晚期被筮法取代。二是分别对卜骨与卜甲的类别及其分布地域、数量变化进行了总结。所见卜骨主要是牛、羊、猪的肩胛骨,其他动物骨骼较少。其中用羊的肩胛骨占卜出现最早,仰韶文化时期的三件都是羊肩胛骨。在龙山文化时期,牛、羊、猪肩胛骨都用,但因地而异,西方多羊,东方多牛,北方多猪,中原地区兼而有之,这应与龙山时期各地家畜饲养状况有关。二里头文化时期,牛、羊、猪肩胛骨的使用情况与龙山时期大体相当而稍有变化。到商代,即二里岗

文化至殷墟时期,各地基本都以牛肩胛骨为主,羊与猪肩胛骨很少使用了。西周与商代近同。至于卜甲,流行地区远没有卜骨范围大,北方地区几乎不见。卜甲主要属乌龟和花龟,以腹甲为主,背甲为辅。乌龟个体小,花龟个体大,后者主要见于殷墟遗址,其他遗址少见;而前者发现普遍。由第一个问题可以看出,卜用甲骨由发生、发展到消亡的过程,基本与中国早期文明的发生、发展和形成同步,二者应有内在联系。占卜作为决疑裁断的手段,应该始终为社会的上层人物所掌控,这样才可以按照上层人物的愿望使其在精神领域发挥作用,晚商甲骨文就是明证。由第二个问题可以看出,卜用甲骨流行和兴盛的地区,是中国早期文明最发达的地区,它不仅见于等级高的大型遗址,也见于普通遗址,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占卜之术在早期文明过程中所应占有的地位。

第三章专论卜用甲骨的整治方式与钻凿灼形态。在整治方面,卜骨的演进特征比较明显。新石器时代时,肩胛骨基本保持原状,不加整治;二里头文化时期大体与龙山时期相似,除牛肩胛骨多略加整治外,其他肩胛骨均不整治;商代二里岗文化时期,骨脊和外侧较厚处经不同程度的简略修整,修整处表面不太平整。此时不切骨白。稍后的中商时期(白家庄期至殷墟一期),出现部分骨白被切的现象。到晚商时期,商文化系统的卜骨,骨脊和外侧较厚处刮削平整,骨白切去二分之一左右,并切去白角。西周时期与晚商近同,刮削面更光平,但不切白角,先周文化者也如此。这是商系与周系卜骨不同特征之一。卜甲的整治,无论腹甲还是背甲,不仅早晚有别,商系与周系也有区分。

钻凿灼形态的变化也很明显,新石器时代卜骨无钻无凿,仅有灼。因此时卜骨不加整治,故灼点只能在骨扇较薄处,灼点分布无规律。到二里头文化晚期时,部分卜骨出现钻与灼兼施者,其他特征与新石器时代类似。早商时期钻坑较规整,广泛流行。中商时期开始出现钻凿灼兼施,有的钻坑出现底上刻出猫眼状凿槽。晚商时,钻凿灼齐备,大部分为弧形(枣核形)凿,有的凿旁有圆钻,位于凿的斜上方,钻内施灼。西周时期,卜骨、卜甲有别,卜骨的钻坑为圆形,平底,坑底一侧有猫眼状槽,槽旁施灼;卜甲则方钻方凿。在钻凿形态上,商系和周系也有明显区别。

无论卜骨还是卜甲,商代以来钻凿灼的分布与排列有规律可循,其另一面的卜兆兆痕亦与之对应。明确钻凿灼在甲骨上的分布规律,对复原残破甲骨碎片在甲骨上的位置非常重要。

本章对卜用甲骨整治方式与钻凿灼形态的研究,既注意了长时段的观察,又注意了各阶段不同地域或不同文化之间异同的分析。所得结论可作为考古学分期与判断考古学文化属性的重要依据。

第四章是有关甲骨文位置与行款走向问题。以往的研究表明,甲骨文的位置与行款布局一般又与卜兆的排列相关。如上所述,卜兆的排列与甲骨反面钻凿灼的位置对应,而钻凿灼在甲骨不同位置上的分布又具有一定的规律,所以明确钻凿灼在甲骨上的分布规

则,对确定细小碎片在整版甲骨上所处的位置及分析判断兆枝的走向并推定刻辞的行款布列,有决定性的意义。以往发表的甲骨图像资料,尤其是含有刻辞的资料,多注重刻辞一面,而对钻凿灼一面往往不予提供,这方面信息的缺失,对残片甲骨的定位、缀合极为不利,进而也影响了行款走向的判定。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逐步认识到了对甲骨资料全面发表的重要意义,如近年来发表的《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周原甲骨文》(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等,都注意了对甲骨正面和背面图像资料的全面发表。朴载福就根据《周原甲骨文》新发表的资料,对其中部分甲骨碎片进行了定位和行款走向研究,这是此前难以做到的。

第五章是谈卜用甲骨的起源与衰落,也是对第二章内容的进一步阐释和论证。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卜骨均相当于仰韶文化时期,见于三个地点,分属三种考古学文化,即甘肃武山傅家门遗址(马家窑文化)、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仰韶文化)和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富河文化)。三个地点相距较远,若三者发生时间有早晚之别(相对而言,富河沟门的最早),如此长距离由此传到彼,中间地带不见,很难理解。而且三者之后都有一段时期缺环未见卜骨。在甘肃,卜骨到齐家文化时才再度出现;在河南,到龙山文化晚期才再度出现;在内蒙古,富河文化一般被认为相当于红山文化偏早阶段,卜骨的再度出现是龙山文化早期(准格尔旗寨子塔遗址,这里距巴林左旗富河沟门也有相当距离),中间缺红山文化偏晚阶段卜骨。三地卜骨发现都有中断,基于这种原因,本书作者对这三地发现的所谓相当于仰韶文化时期卜骨的结论多少有所保留。为何中断?期间是有而未发现?还是其他原因?有待今后考古工作证实。不过,就现有资料来看,即使搁置三处仰韶时期卜骨不论,则次早的卜骨属龙山文化早期,仍然见于内蒙,即河套地区准格尔旗寨子塔遗址第一阶段卜骨,时代与晋陕豫地区庙底沟二期相当。到龙山文化晚期,卜骨在各地普遍发现。因此,卜骨最早发生于北方地区是可能的。

考古发现的最早卜甲,见于郑州南关外下层(T85第4层),或称南关外期,邹衡先生论定该单位为先商文化。由于仅发现一片,而且在二里岗下层一期的所有单位中均未发现,即使二里岗下层二期发现也不多。所以,本书作者对南关外这片卜甲能否早到先商时期,持谨慎态度。若此件卜甲存疑,则现知最早的卜甲属二里岗下层二期时,此后与卜骨并列盛行。

至于卜用甲骨的衰落,根据考古发现,约从西周中晚期之际开始,卜用甲骨突然减少,故作者认为卜用甲骨的衰落始于西周中晚期,同时还认为卜用甲骨的衰落很可能与西周时期筮法的普遍使用有关,这种看法符合实际。

第六章是对先秦时期与卜筮相关的其他若干问题的探讨,重点分析了历史文献与出土文字材料中有关卜筮程序的规律与特征,对商人、周人与楚人卜筮之法进行比较,总结了彼此之异同。

以上是对本书主要内容的粗略概括,有很多细微之处未予提及。仅由粗略概括就可看出,书中对卜用甲骨的考古学研究涉及诸多方面,可以说是迄今为止这方面最全面和最系统的研究。其中有的方面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所作的进一步探讨,有的方面则属首次论及。所得结论有的可成定论,有的还需新的考古材料去验证。此外,书中还提出一些问题,有待今后继续关注。如先周文化有无卜甲?龟与骨如何相配使用?两骨是否对应?如何对应?等等。

由于时间跨度长,文化类型多,所以在阶段划分与文化归属上,书中采用较通常的说法,不可能兼顾各家之说,也没必要自立标准。这方面也许有不当之处,但对问题的探讨没有太大影响,因为不论归何时、何种文化,书中对具体例证都交待了出土地点和出土单位(书后还有出土卜用甲骨附录),读者可以据之去自行判断。

任何考古学的研究课题都具有阶段性,都会受到已有资料和研究者学术状况的制约,都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本书也不例外。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引起更多学者关注先秦卜用甲骨的研究,能有更多新成果问世。

2011年8月8日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目 录

序一	葛英会(i)
序二	刘 绪(iii)
第一章 绪言	(1)
第一节 选题及学术意义	(1)
第二节 有关卜法研究的学术史	(2)
第三节 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	(12)
第二章 考古所见先秦时期的卜用甲骨	(15)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	(15)
第二节 夏代	(23)
第三节 商代	(30)
第四节 周代	(52)
第五节 卜用甲骨的出土背景考察	(61)
第六节 卜用甲骨的类别与时地考察	(64)
第三章 甲骨的整治方式与钻凿灼形态	(79)
第一节 卜用甲骨各部位名称与整治	(79)
第二节 钻凿灼的形态与排列	(110)
第四章 甲骨文的行款走向及相关问题	(143)
第一节 殷墟甲骨文以前的文字	(143)
第二节 殷商西周卜骨刻辞的行款	(145)
第三节 殷商西周卜甲刻辞的行款	(159)
第四节 甲骨刻辞相关问题讨论	(173)
第五章 先秦时期卜法的起源与衰落	(178)
第一节 卜用甲骨的起源	(178)
第二节 卜法的衰落与筮法的兴盛	(187)
第六章 甲骨占卜程式的探索	(198)
第一节 《仪礼》中所见的占卜程式	(199)
第二节 《龟策列传》与先秦龟卜卜法	(201)

第七章 结语	(218)
参考文献	(226)
附录一 考古所见先秦时期的卜骨	(252)
附录二 考古所见先秦时期的卜甲	(321)
附录三 《史记·龟策列传》	(345)
附录四 《尚书·金縢》	(350)
附录五	(351)
后 记	(366)

第一章 绪 言

第一节 选题及学术意义

董作宾先生在1929年撰写《商代龟卜之推测》一文时即指出,当时的研究者仅致力于文字的识读,不在于实物的观察,故自述其研究旨趣说:“吾人之从事整理研究,首注意于实物,虽所获有限,而视同怀宝,必欲尽其力以利用之。”^①迄至今日,学界的研究仍然集中在甲骨文字的考释、甲骨刻辞的分类与断代、刻辞内容的排谱和商史研究等方面。对于大多数专门研究文字的学者而言,他们几乎只能通过拓本或摹本材料(最多有照片)进行研究,无法或根本没有可能利用实物材料研究文字背后的内容。对于专业考古工作者来说,大都由于卜用甲骨的刻辞不属于自己的研究范围,因此在报告中往往忽视对甲骨实物的观察与描述。甲骨占卜是甲骨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以往的甲骨学研究中,有关甲骨卜法的研究所占的比重甚轻,很多学者只是在论著中作简单描述而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科学考古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不仅在殷墟继续发掘出土了大量商代卜用甲骨,在各地的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遗址中也发现了很多卜用过的甲骨。相关报告中大都简单介绍了甲骨出土的情况,有的还附有照片和线图。特别是近几年新出版的甲骨著录都收有甲骨的照片、拓本、摹本以及出土情况的描述,使研究者有了深入探讨先秦时期甲骨卜法的基本条件。另外,随着考古学的发展,相关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和主要遗址的文化性质也日渐清晰,为卜用甲骨的考古学观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前辈学者对先秦时期的卜法,尤其是对商周时期带字甲骨占卜程式的研究成果,为进一步研究中国先秦时期的卜法奠定了基础。但是,到目前为止,就出土卜用甲骨所作的先秦时期卜法研究,大多是随机零星地进行的,少数学者所作的综合研究,在资料搜集、分析归纳与规律探索诸方面仍然是初步的,多限于某一时段或某一地区,而对整个先秦时期卜用甲骨从发生、发展,到衰退、消亡作长时段、大范围的综合研究还很欠缺。本文拟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已经发表的甲骨材料,按时空顺序进行系统地搜集、整理,并结合历史文献和地下出土的文字材料,对先秦时期的卜法进行一次比较全面的综

^① 董作宾:《商代龟卜之推测》,《安阳发掘报告》第一册,1929年12月;又收入《甲骨文献集成》(第十七册),19—20页。

合性研究。

针对前人研究的不足之处,本文试图探讨的重点如下:

其一,系统全面搜集、整理各个时期的卜用甲骨,考察卜用甲骨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分布状况,分析其在各方面的发展演变规律,使大家对先秦时期卜用甲骨有更加全面、系统的认识。

其二,在此基础上,开展对中国先秦时期卜法的专项研究。涉及的内容有卜用甲骨类别的实地考察、甲骨的整治方式与钻凿形态、甲骨刻辞的行款走向、先秦时期卜法的起源与衰落、商周甲骨占卜程式探索等问题。

甲骨钻凿灼的形式、分布排列与卜兆形态、卜辞行款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正确认识甲骨钻凿的特征有助于对残碎甲骨的定位与甲骨刻辞行款走向的判断,正确判断刻辞行款的走向又有助于准确通读刻辞内容,而钻凿的形态与刻辞的行款走向又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判断甲骨与刻辞的年代和性质。这样的综合性研究,对系统、全面了解先秦时期的卜法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结果表明,占卜之术发生、发展的过程,与中国早期文明社会发生、发展的过程密切相关。占卜属意识形态领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就此而言,对先秦时期占卜之法的研究,也是探讨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节 有关卜法研究的学术史

中国先秦时期的卜法研究,可从与占卜相关的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卜用甲骨两方面作简要的回顾和评述,其中考古发现的卜用甲骨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分为前后两段。为行文方便,对诸位前辈、师长均直呼其名,敬祈谅解。

一、文献所见中国古代卜法的记载

1. 先秦以及秦汉时期

占卜在先秦社会中是非常普遍的活动,相关的文献记载也比较丰富。但后世占卜之术衰落,相关著作大多亡佚,留存至今的很少。秦始皇焚毁儒家经典,占卜之书虽能幸免,但其他书籍中有关占卜的记载却难逃厄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典籍以外的有关占卜的文献亦不免进一步亡佚。因此,目前所见先秦及秦汉文献留存的卜法记载,多属儒家典籍。如:

《周礼·春官》的《大卜》、《卜师》、《龟人》、《菴氏》、《占人》五篇,是对藏龟、攻龟、爇龟、整治、灼龟等卜前仪节,以及三兆、三易之法的概要。

《尚书》的《洪范》、《金縢》、《洛诰》、《大诰》诸篇,对龟卜与蓍筮均有涉及。其中《金縢》的记述最为详细,包括卜问的前辞、命辞、兆辞、验辞、卜用三龟以及占卜仪式等,是研究甲骨卜辞和先秦占卜的重要材料。

《仪礼》各篇多有“前期十日”的占卜选择吉日的活动,《士丧礼》有关于占卜地点、卜筮者(族长蒞卜)、占卜材料(龟、楚焯、焦)等的详细描述和记载。此外还对占卜过程进行了介绍,如陈龟—奠龟—贞龟—视高—命龟—作龟—占—告—旅占—告等,为我们今天研究先秦时代龟卜仪节提供了系统详实的信息^①。

《礼记·曲礼》有记载和讨论占卜问题的文字。

《诗经》、《周易》、《左传》和《国语》等文献,记载了大量龟卜筮占的实例。如《诗经·卫风·氓》云:“尔卜尔筮,体无咎言。”《诗经·大雅·绵》云:“爰契我龟,曰时曰止,筑室于兹。”《左传》所载实例最多,也最详细,有学者统计共达五十六条之多^②。

西汉司马迁撰、褚少孙所补《史记·龟策列传》是目前最早的关于卜法的专著。前人以司马迁原文缺佚,褚少孙所补无史料价值,因而多病其无据,遂不加注意。今人研究认为,褚氏所补内容与甲骨卜辞颇多合节,其所述占卜与数术等,应师承有序,据后世占卜方法可以推论前代。褚补《龟策列传》根据当时所见材料撰写,如详加辨析可以作为研究先秦占卜情况的重要参考材料^③。

东汉班固集结的《白虎通·蓍龟》卷下,分总论蓍龟、蓍龟尺寸、决疑之义、龟蓍卜筮名义、筮必于庙、卜筮方向、卜筮之服、占卜人数、先筮后卜、灼龟、埋蓍龟、周礼卜筮及取龟义,对先秦文献中关于龟卜和筮占的方法、程式以及埋藏过程,进行了总结,是今天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材料。

王充的《论衡·卜筮》一篇,论述了用龟占卜是“盖取其名也”,对占卜提出了疑问。认为“卜筮不问天地,兆数非天地之报”,并对吉兆和凶兆产生的原因做了论述,还认为占卜不灵,“夫卜筮非不可用,卜筮之人,占之误也”^④。

2. 魏晋南北朝至清代

两汉之后,目录学的发展,使得占卜一类书籍归入方技类,基本排除在儒家文献之外,但也导致了占卜类书籍的专门化。如《隋志》著录史苏《龟经》的佚文(《五行大义》卷二引用);唐代的《开元占经》,李筌《太白阴经》卷十《龟卜篇》,柳世隆《龟经》佚文(《初学记》卷三〇、《太平御览》卷九三一引用),疑即两《唐志》著录的柳世隆《龟经》;宋邵平轩《玉灵照胆经》(北京图书馆藏旧钞本),王洙《玉灵聚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元天历刻本),清胡煦《卜法详考》(有《四库全书》本)等,种类繁多,历代不绝。

① [清]胡培塈:《仪礼正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1814—1822页。

② 刘玉建:《中国古代龟卜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

③ 参看拙作:《“龟策列传”与先秦龟卜卜法》,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4年5月。

④ 黄晖撰:《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998—1007页。

此外,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还可见到古代周边民族的卜法。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对此列举甚详,可以参考^①。

传世文献的记载中关于先秦卜法的内容较少,加上这些文献本身往往真伪难辨、矛盾百出,给我们的研究造成了很大障碍。但是,上述汉代及其以前文献毕竟去古未远,相关内容应接近先秦时代的实际,对于本文探讨的问题具有直接的价值和意义。而魏晋以来文献中有些关于卜法的内容虽然涉及先秦,但其成书时代距先秦已远,且方技一门学问常常与时俱进,前后变化很大,因而对于研究先秦卜法意义不大。

二、考古发现的卜用甲骨及卜法研究

(一) 1899 年至 1949 年

1. 主要发现

在 1899 年商代甲骨文由王懿荣鉴定之前,甲骨被当作龙骨用为中药药材。甲骨被辨识之后,受经济利益驱使,大量刻辞甲骨被盗掘。1908 年,罗振玉经过实地调查,得知了甲骨确切出土地在河南安阳西北的小屯村。

1928 年 10 月至 1937 年 6 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殷墟先后进行了 15 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除获得大量商代甲骨文之外,还发现了宫室、王陵及其他重要遗迹、遗物。

1930—1931 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山东龙山镇城子崖史前遗址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出土了 16 片龙山文化的卜用牛、鹿肩胛骨。

该阶段甲骨的发现以殷墟为主。

2. 研究状况

(1) 有关商周甲骨的著录与研究

1903 年,刘鹗出版了《铁云藏龟》一书,这是第一部甲骨文的著作;1904 年,孙诒让出版了第一部甲骨文研究专著《契文举例》。此后,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胡厚宣等学者在甲骨学领域均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如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菁华》等是著录、研究甲骨卜辞的力作;王国维首创二重证据法,利用卜辞印证《史记》所记殷王世系;董作宾在甲骨著录、分期断代研究及商代历法研究方面均有突出的成就,尤其是卜辞断代研究,有筌路蓝缕之功。

^①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 年,5—6 页。

这一时期的学者们虽然受到时代局限,但他们已经认识到殷墟甲骨文主要是商代晚期商王室及其他贵族在龟甲和兽骨上记录的有关占卜的文字,其中保存着三千多年前商代社会多方面的宝贵资料。它记载了关于占卜、祭祀、战争、农牧、渔猎、手工业、天文、历法等内容,从而开创了甲骨学这一门新的学问。但是对其中某些内容的研究还相当薄弱,关于商代卜法研究,尚在初创时期。

(2) 有关卜法研究

地下出土的甲骨实物,是研究先秦卜法的最好材料。董作宾在《商代龟卜之推测》一文中^①,曾结合文献和甲骨实物对早期卜法进行探索,这是以地下出土甲骨实物探讨卜法问题的开始。此文将龟卜程式分为十个环节:取用第一、辨相第二、爇燎第三、攻治第四、类例第五、钻凿第六、焦灼第七、兆莹第八、书契第九、皮藏第十。每一个环节都有仔细分析,对龟甲兽骨的攻治工具、钻凿形态、文字行款、龟甲种类和尺寸、皮藏方式等一系列问题,大都结合实物实测进行说明。该文真正开创了以实物材料研究龟甲兽骨占卜的先例,而其规模框架的完善,确实对后人的研究有发凡起例的贡献。

李济在《城子崖》的考古报告中^②,据遗址出土的16片卜用牛、鹿肩胛骨材料,就骨卜习俗的起源及其传播作了全方位、多视角的精彩论证,他认为中国的龟卜是从骨卜演化出来的,并指出殷商骨卜文化与东部地区的黑陶文化有最密切的联系,中心地点在山东一带,还阐释了占卜作为文化核心因素与考古学文化之间的联系。

胡厚宣在《关于殷代卜龟之来源》的论文中^③,依据8条汉代以前的文献及8条甲骨卜辞材料,指出有关龟的产地或来源,得出“殷代之卜龟,盖由南方西方之长江流域而来”,并认为殷代与南方之长江流域(或更南),必已有繁盛之交通。此论弥补了李济于龟卜来源方面研究的不足。

此外,沈启无、朱耘巷^④、容肇祖^⑤、贝塚茂树^⑥、秉志^⑦等学者也曾结合文献和甲骨实物进行了与卜法相关的研究。

这是卜法研究的初步阶段,只有少数学者专文论述甲骨卜法的问题,而多数甲骨学者仅在其文章中简单谈到有关问题而已,并未作深入分析。有的学者在认识了龙山文化的甲骨后开始讨论甲骨占卜习俗、来源、源流等方面的问题,但由于全国范围内的考古工作

① 董作宾:《商代龟卜之推测》,《安阳发掘报告》第一册,1929年12月;又收入《甲骨文献集成》第十七册,1—19页。

② 李济总编:《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真之黑陶文化遗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XV—XVI;又1992年影印一版。

③ 胡厚宣:《关于殷代卜龟之来源》,《史学丛刊》1944年第1期;又增订收入《甲骨学商史论丛》初编第四册,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1944年。

④ 沈启无、朱耘巷:《卜法通考》,《国立华北编译馆丛刊》卷1:1—3,金华印书馆,1942年。

⑤ 容肇祖:《占卜的源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一分册),1928年;又收入《古史辨》第三册,中华书局,1982年。

⑥ [日]贝塚茂树:《龟卜和筮》,《东方学报》(京都),第14册,1947年;又收入《贝塚茂树著作集》第2卷,日本中央公论社,1977年。

⑦ 秉志:《河南安阳之龟壳》,《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1931年;又收入《甲骨文献集成》第十七册,19—20页。

太少,商周以前的考古学文化的发现也不多,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时人对甲骨占卜习俗本身源流的探讨。但是这种研究思路 and 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在之后材料不断丰富,的情况下,逐渐显现出来。

(二) 1950 年至今

1. 主要发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开始科学考古工作。上自旧石器时代,下至各个历史时期的考古材料大量涌现。卜用甲骨的发现,有 20 世纪 70 年代在殷墟小屯南地以及 90 年代在殷墟花园庄东地出土的殷人甲骨,另有在周原、山西、河北、北京等地出土的周人甲骨。在新石器时代至夏代遗址中,也发现了大量的无字卜骨。我们在研究卜用甲骨的起源和发展脉络的时候,有了更新、更多、更完整的材料。

2. 研究状况

(1) 有关商周甲骨的著录与研究

随着各地考古的大量发现,卜用甲骨及相关资料逐渐丰富。在甲骨文资料的搜集整理、文字考释、辞例研究、分期断代、史实钩沉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绩。

迄今经考古发掘而著录的殷商时期甲骨主要有三部分:(1)前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 次殷墟发掘的有字甲骨共收入《殷墟文字甲编》3 942 片,扣除正反片和缀合片的叠号,实收 3 866 片;13—15 次发掘的有字甲骨共收入《殷墟文字乙编》9 105 片,加之 1994 年台湾史语所新编《殷墟文字乙编补遗》的 7 441 片,殷墟 15 次发掘所得共计 20 412 片。(2)1980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小屯南地甲骨》共著录在小屯南地发掘的带字甲骨 4 589 片,并附录 1971 年在小屯西地发掘的刻辞卜骨 10 片。(3)2003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即 H3 所出),共有甲骨 1 583 片,其中有刻辞的 689 片(绝大部分是卜甲,卜骨只有 5 片)。《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的著录体例与以往有所不同,本书对甲骨资料的介绍采取考古发掘报告的形式,对甲骨的颜色、质地、整缺、刮削、长短、钻、凿、灼、兆纹等各方面的情况详细说明,而且采用拓本、摹本、影本与释文互补互校的手段,为研究卜法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张秉权 1957 年至 1972 年期间,出版了《殷墟文字丙编》,将《乙编》所刊甲骨拼对复原,并附有详细的考证。

较重要的甲骨文著录还有董作宾和严一萍合编的《殷墟文字外编》(1956 年),饶宗颐的《日本所见甲骨录》(1956 年)、《巴黎所见甲骨录》(1956 年)、《海外甲骨录遗》(1957—1958 年),贝塚茂树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1959 年),许进雄的《明义士收藏甲骨文集》、《殷墟卜辞后编》(1972 年)、《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1979 年),周鸿翔的《美国所藏甲骨录》(1976 年),渡道兼庸的《东洋文库所藏甲骨文字》(1979 年),

松丸道雄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1983年),雷焕章的《法国所藏甲骨录》(1985年),李学勤、齐文心、艾兰合编的《英国所藏甲骨集》(1986年)、《德瑞荷比所藏一些甲骨录》(1997年),刘敬亭的《山东省博物馆珍藏甲骨墨拓集》(1998年)。以上资料大部分又被收入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编著的大型甲骨著录《甲骨文合集》和《甲骨文合集补编》中。

周代甲骨的著录有曹玮的《周原甲骨文》(2002年),该书重新对周原甲骨正面刻辞进行了照相,并附有主要甲骨反面的钻凿照片。这对说明周原甲骨的特点,研究甲骨的定位与行款走向都有重要意义。

此外,无字卜用甲骨资料多数发布于考古发掘报告。由于早期的卜用甲骨无字,因而多以出土甲骨的图版和线图以及文字描述来记录。随着考古发掘技术水平和研究水平日益提高,报告对于出土甲骨的记录也愈加重视,著录甲骨的方式一再改进,极大方便了研究者的使用。

由于甲骨材料的日益丰富,尤其是商代以前无字甲骨的大量出土,使我们对卜用甲骨的源头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带字甲骨的著录大量涌现,特别是一些新的注重科学、全面著录甲骨资料书籍的刊布,使我们对带字甲骨的认识也比以前更加清晰。甲骨学研究在分期断代、文字考释、商史研究等领域都有了长足发展。这一时期还认识到了周人甲骨及其与商人甲骨的异同和时空差异。这些新的成果,都使全面系统地研究先秦时期的卜法问题,成为可能。

(2) 有关卜法研究

这一时期对先秦卜法的研究,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层面。

首先,很多学者的甲骨或古文字著作涉及相关卜法的内容。代表性的学者有陈梦家^①、严一萍^②、高明^③、沈之瑜^④、王宇信、杨升南^⑤、刘玉建^⑥、马如森^⑦、李零^⑧、宋镇豪^⑨等,其论著均对甲骨占卜有所涉及。

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是总结前人与当代学者关于殷墟卜辞研究成果的一部大型著作。对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过程、占卜方法、卜辞和其他甲骨刻辞的体例、商代文字的性质、卜辞的语法、甲骨断代问题以及卜辞中关于历法天象、方国地理、政治制度、祭祀制度、亲属关系、农业田渔、建筑交通、宗教思想、社会性质等方面的内容和有关问题,此书几乎都有相当详尽的论述。

①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中华书局,1988年。

② 严一萍:《甲骨学》,艺文印书馆,1977年。

③ 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④ 沈之瑜:《甲骨文讲疏》,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⑤ 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⑥ 刘玉建:《中国古代龟卜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⑦ 马如森:《殷墟甲骨文引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⑧ 李零:《中国方术考》(修整本)与《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2000年。

⑨ 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台湾学者严一萍在1977年出版了《甲骨学》一书,对甲骨的源流、分布、甲骨钻凿占卜、殷墟甲骨文断代以及甲骨文书法艺术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总结。尤其对殷墟之外,自新石器时代至周代甲骨的分布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并有初步的对比研究。严氏的这项研究,在当时可以说是开拓性的。当然,此书的重点在于介绍殷墟甲骨卜辞内容的研究,对于卜用甲骨源流的研究仍是初步的。

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的《甲骨学一百年》对百年来的甲骨学研究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其中第六、七章为甲骨占卜和卜辞文例文法;第八章是甲骨学研究的新发展——西周甲骨支学科的形成。该书对一百年来学者研究的重要成果,进行了全面总结,在廓清道路、指明方向上贡献很大。

李零的《中国方术考》和《续考》两书有专门章节对甲骨占卜和古代数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尤其以新发现为基础,对占卜体系、早期卜筮、南龟北骨说和卜赌同源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对古代占卜和甲骨占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认识。

其次,卜用甲骨整治方式与钻凿形态方面的研究,代表的学者有郭若愚^①、张秉权^②、许进雄^③、刘渊临^④、耿德兴^⑤、徐基^⑥、吴俊德^⑦、崔波^⑧、王华^⑨;发掘报告有《小屯南地甲骨》、《花园庄东地甲骨》等。

郭若愚的《殷契拾掇初编》(1951年)是第一部对甲骨反面的钻凿进行记录的著作,虽然只有几版,但是表明学者开始认识到甲骨著录资料的完整性以及甲骨反面钻凿形态对于卜法研究的重要性。

张秉权的《甲骨文的发现与骨卜习惯的考证》一文发表于1967年。文章重点排比了各个时期卜用甲骨的发现,将甲骨分为三个时期:龙山文化及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殷商时期和周代。对每个时期卜用甲骨在全国的分布做了系统的排列,并总结当时所见甲骨的出土地点“已有七十四处,分布在鲁、冀、热(热河)、辽、吉、豫、晋、陕、甘、川、鄂、苏等十二个省份”。指出“凡是遗址的时代愈早,卜骨的攻治愈简陋,并且只有卜骨,没有卜龟”,并对这一习俗的传播路线作了介绍。文章还对占卜用龟甲兽骨的攻治方式、贞卜内容、灼兆吉凶的判定、文字行款、记验和归档等一系列占卜程式,进行了研究,使我们对此有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① 郭若愚:《殷契拾掇》(初编、二编、三编合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951年,作者出版《殷契拾掇初编》;1953年,出版《二编》;1963年前后出版《三编》。

② 张秉权:《甲骨文的发现与骨卜习惯的考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七本下册,1967年6月。

③ 许进雄:《卜骨上的钻凿形态》,艺文印书馆,1973年;《钻凿研究略述》,《屈万里先生七秩荣庆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甲骨上钻凿形态的研究》,艺文印书馆,1979年。

④ 刘渊临:《卜骨的攻治技术演进过程之探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6本1分,1974年;《卜用甲骨上攻治技术的痕迹之研究》,台湾“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印行,1984年。

⑤ 耿德兴:《浅谈“甲骨”钻凿磨灼的主要用意和用途》,《殷都学刊》1999年增刊。

⑥ 徐基:《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的初步研究》,《文物》1995年第6期。

⑦ 吴俊德:《殷墟第三、四期甲骨断代研究》,艺文印书馆,1999年。

⑧ 崔波:《甲骨占卜源流探索》,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

⑨ 王华:《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攻治技术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许进雄认识到卜骨上的钻凿对断代研究的重要性,先后写出《卜骨上的钻凿形态》(1973年)和《甲骨上钻凿形态的研究》(1979年),是对此前钻凿形态初步研究的总结性专著。

刘渊临的《卜骨的攻治技术演进过程之探讨》和《卜用甲骨上的攻治技术的痕迹之研究》,综合中国自史前至商周不少卜骨的出土资料,考察了有关攻治技术的演进形态,是专门研究甲骨攻治技术的专著。

崔波的博士论文《甲骨占卜源流探索》,搜集了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甲骨材料,专门探讨了中国甲骨占卜的源流。论文大量搜集出土甲骨材料,结合甲骨的出土背景,对甲骨占卜的起源、商周占卜甲骨的分布以及甲骨占卜习俗的变化和卜筮关系等,都作了有益探讨。但是此文没有充分运用考古学方法,资料搜集有余而比较研究不足,使我们对于卜用甲骨形态的演变仍然不够清楚。

1980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将1973年殷墟小屯村南地发掘出土的甲骨,编为《小屯南地甲骨》一书出版。此书分为上下册,上册分为一、二分册,第一分册为图版部分,共著录甲骨4612片。书前部分有前言、凡例、目录表、龟甲统计表、背文统计表。图版顺序编通号,又按出土单位,即灰坑(H)、房基(F)、墓葬(M),以及探方(T)等编排。第二分册为索引和摹本。下册为甲骨钻凿图版,书前有《小屯南地甲骨钻凿形态》一文,有钻凿统计表、骨面钻凿统计表、钻凿摹本拓本目录表和钻凿图版。《钻凿形态》一文被甲骨学家评为:“此文是目前国内学者关于钻凿形态与分期断代研究关系的较全面、系统的论述。”^①

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文是于1991年10月发现的一批重要的商代史料。这批甲骨出土于殷墟花园庄东地H3,共有甲骨1583片,其中有刻辞的689片(绝大部分是卜甲,卜骨只有5片),是继1936年YH127坑(17096片)、1973年小屯南地(7150片)之后的第三次重大发现。

经过十余年的揭取、拓、摹、照相、考释等整理研究工作,这批资料集结刊布于《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以下简称《花东》)一书。该书第一至第三册是甲骨拓本、摹本图版,第四、第五册是照片图版。甲骨及刻辞的图像,包括甲骨正面(少量有刻字的甲骨反面)的影本、拓本与摹本。第六册是甲骨释文,《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钻凿形态研究》,其后附有四项索引(部首、字形检字表、字词索引表、笔画检字表)和两则附录(龟甲标本种属的考察)。该书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善的甲骨著录,使甲骨的各方面利用率都大大提高。

其三,甲骨文的行款走向与排列顺序的研究,有张秉权^②、李达良^③、常玉芝^④、王

① 王宇信:《甲骨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275页。

② 张秉权:《甲骨文与甲骨学》,“国立编译馆”,1988年。

③ 李达良:《龟板文例研究》,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中文系,1972年。

④ 常玉芝:《晚期龟腹甲卜辞的契刻规律及意义》,《考古》1987年第10期。

字信^①、刘源^②等。

其中王字信关于西周甲骨卜辞行款的分析,对于解读西周甲骨卜辞内容、了解商周甲骨异同方面有重要贡献。刘源对于殷墟花东卜辞行款走向的探讨,使我们对殷墟早期甲骨卜辞的内容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也对我们今天讨论甲骨行款启发良多。

其四,关于卜法与筮法关系的讨论是研究商周甲骨卜辞的重要领域,对此有所建树的学者有屈万里^③、管燮初^④、饶宗颐^⑤、徐中舒^⑥、张政烺^⑦、李学勤^⑧、李殿魁^⑨、曹定云^⑩、李桢^⑪、徐葆^⑫、晁福林^⑬、连劭名^⑭、朴载福^⑮等。

1978年11月,中国古文字研究第一届年会上,徐锡台介绍了周原甲骨中的数字,张政烺提出应是《周易》的重卦,破解了易卦之谜。此后,对于商周易卦的研究迅速兴起。

李学勤在《周易溯源》中探讨了先秦文献与考古资料中的筮法,第三章专门讨论了考古出土的商周时期甲骨、青铜器、陶器上的筮数。

其五,有些学者从考古出土材料来探讨卜用甲骨的各方面,如石璋如^⑯、刘一曼^⑰、李亨求^⑱、荒木日吕字^⑲、冈村秀典^⑳等。他们多是考古学家,或是对考古有较深了解的学者,他们抛开文字直接研究甲骨本身,利用考古学方法解决一些单靠文字不能解决的问题。

例如石璋如结合李济和胡厚宣等人诸说,认为在甲骨上刻划卜辞,可能是殷人的创

① 王字信:《周原甲骨刻辞行款的初步分析》,《人文杂志》1988年第3期;《周原甲骨卜辞行款的再认识和邢台西周卜辞的行款走向》,《华夏考古》1995年第2期。

② 刘源:《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的行款》,《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1期。

③ 屈万里:《易卦源于龟卜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四种《庆祝董作宾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1961年6月。

④ 管燮初:《商周甲骨与青铜器上的卦爻辨识》,《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中华书局,1981年。

⑤ 饶宗颐:《殷代易卦及有关占卜诸问题》,《文史》第二十辑,1983年。

⑥ 徐中舒:《数占法与“周易”的八卦》,《古文字研究》第十辑,中华书局,1983年。

⑦ 张政烺:《殷墟甲骨文中所见的一种筮卦》,《文史》第二十四辑,1985年。

⑧ 李学勤:《周易溯源》,巴蜀书社,2006年。

⑨ 李殿魁:《从出土考古资料及书面资料试探易之起源及真象》(一),《中国文字》第十七期,1993年。

⑩ 曹定云:《论安阳殷墟发现的“易卦”卜甲》,《殷都学刊》1993年第4期。

⑪ 李桢:《早周骨甲所刻易卦筮符综说》,《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续编》,1995年。

⑫ 徐葆:《殷墟卜辞中的商代筮法制度——兼释甲骨文爻、学、教诸字》,《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

⑬ 晁福林:《商代易卦筮法初探》,《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5期。

⑭ 连劭名:《出入占考》,《周易研究》1998年第1期。

⑮ 参看拙作:《商周时期出土文物中所见的易卦》,《江原人文论丛》第17辑,2007年6月(韩文)。

⑯ 石璋如:《骨卜与龟卜的探源——黑陶与白陶的关系》,《大陆杂志》第8卷,1954年第9期;又收入《先秦史研究论集》(上),《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一辑第二册,台北大陆杂志社,1960年,161—165页。

⑰ 刘一曼:《安阳殷墟甲骨出土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97年第5期;《论殷墟甲骨的埋葬状况及相关问题》,《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⑱ [韩]李亨求:《渤海沿岸早期无字卜骨之研究——兼论古代东北亚诸民族之卜骨研究》(上、中、下),《故宫季刊》第十六卷第一至三期,1981—1982年。

⑲ [日]荒木日吕字:《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卜骨及其社会意义》,《夏商文明研究——97山东桓台中国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

⑳ [日]冈村秀典:《商代的动物牺牲》,《考古学集刊——纪念殷墟发掘七十周年论文集》(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造,但龟卜与骨卜的习惯可能学自他方^①。他利用所知考古资料,对骨卜、龟卜的分布及两者关系作了再探讨,指出骨卜之地均与黑陶有关,而出龟卜之地,均与拍纹陶有关。由此推论“骨卜是东方的习惯,很可能是东夷的祖先黑陶文化的传统;龟卜是南方的习惯,很可能是淮夷的祖先拍陶文化的传统”。

刘一曼的《安阳殷墟甲骨出土地及其相关问题》一文,对于殷墟范围内甲骨出土地点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在全面掌握殷墟甲骨分布的基础上,对甲骨的选材、攻治、钻凿分布和占卜后甲骨的处理进行了深入研究,对凿的形态也进行了区分,可以说这是利用考古类型学对占卜甲骨进行研究的力作。

其六,以少数民族的材料、利用民族学方法讨论卜法的学者有林生^②、汪宁生^③等。他们在云南的彝、羌、纳西族等少数民族中所进行的羊骨卜的调查和研究,对于研究甲骨占卜的起源和古代占卜程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外,发表与卜法相关论著的学者还有饶宗颐^④、张秉权^⑤、彭裕商^⑥、宋镇豪^⑦、柳曾符^⑧、郭振录^⑨、于成龙^⑩、赵容俊^⑪、刘焕明^⑫、谢端琚^⑬等。

有些考古报告正文后附有对出土龟甲、兽骨种属鉴定的研究报告,其中不少涉及卜用甲骨,如泰安大汶口^⑭、伊克昭盟朱开沟^⑮、藁城台西^⑯、殷墟小屯等地^⑰、殷墟花园庄东地^⑱、长安张家坡^⑲等遗址的动物骨骼鉴定,这些古生物学研究和鉴定,对研究甲骨选材和占卜制度的意义越来越重要,是我们今天研究这一问题不能不重视的研究成果。

① 石璋如所说的“骨卜”即本文所说的“卜骨”,他所说的“龟卜”实为龟壳,与本文所说的卜甲有别。

② 林生:《记彝、羌、纳西族的羊骨卜》,《考古》1963年第3期;《云南永胜县彝族〈他鲁人〉“羊骨卜”的调查和研究》,《考古》1964年第4期。

③ 汪宁生:《彝族和纳西族的羊骨卜——再论古代甲骨占卜习俗》,《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④ 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香港大学出版社,1959年。

⑤ 张秉权:《殷墟卜龟之卜兆及其有关问题》,《中央研究院院刊》第一辑,1954年;《卜龟腹甲的序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上册,1956年。

⑥ 彭裕商:《殷代卜法初探》,《夏商文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

⑦ 宋镇豪:《论古代甲骨占卜的“三卜”制》,《殷墟博物院院刊》创刊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再论殷商王朝甲骨占卜制度》,《中国历史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1期。

⑧ 柳曾符:《释“习卜”》,《考古》1981年第2期。

⑨ 郭振录:《试论甲骨刻辞中的“卜”及其相关问题》,《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3年。

⑩ 于成龙:《楚礼新证——楚简中的纪时、卜筮与祭祷》,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4年。

⑪ 赵容俊:《殷商甲骨卜辞所见之巫术》,天津出版社,2003年。

⑫ 刘焕明:《商代甲骨占卜探讨》,《文物春秋》1992年第3期。

⑬ 谢端琚:《论中国史前卜骨》,《史前研究 1958—1998》,三秦出版社,115—126页;《中国原始卜骨》,《文物天地》1993年第6期。

⑭ 山东省文物管理所、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邹县野店》,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⑮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博物馆:《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

⑯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181—192页。

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⑱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1765—1769页。

⑲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沔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叶祥奎:《陕西长安沔西西周墓地出土的龟甲》,《考古》1990年第6期。

第三节 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范围界定

(一) 材料范围

本文研究的材料包括考古出土的卜用甲骨、地下出土的文字材料以及历史文献等,其中以考古出土的卜用甲骨材料为主要研究对象,地下出土的文字材料及有关历史文献作为辅证。

卜用甲骨,主要是指占卜活动中所使用的甲骨,没有经过整治施灼的甲骨,一律不涉及。对商周时期一些甲骨上只有钻或凿,没有施灼的,将其作为卜用甲骨的材料处理,而不归为狭义的卜用甲骨。先秦时期的卜用甲骨材料很杂,可分为卜骨、卜甲两大类。卜骨有牛、猪、羊、鹿的肩胛骨及其他骨骼;卜甲有乌龟、花龟等。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使用的卜用材料不尽一致,这些占卜材料应与生态环境和人们的占卜习惯有密切关系。

地下出土文字材料,主要包括商周时期与占卜有关的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牍、陶文等。

历史文献主要有先秦及秦汉时期与占卜有关的文献。

(二) 时空范围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卜用甲骨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已经开始出现,商代时达到鼎盛,商周之际随着筮法的盛行,用龟甲和兽骨占卜的习俗开始衰落,在西周中期以后甚为少见。因此本文所研究的卜用甲骨的时间范围为新石器时代至周代,所使用的地下出土文字材料主要属于商周时期。

卜用甲骨的空间范围涉及内蒙古、辽宁、吉林、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湖南、山西、陕西、甘肃、青海、四川、重庆等地区,不同时期的空间分布有所不同。

二、研究方法

(一) 研究思路

在中国古代的占卜体系中,甲骨占、筮占和星占对人们的影响都很大。受资料保存和发掘情况的限制,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占卜实物材料主要为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甲

骨材料。鉴此,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如下:

1. 利用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对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卜用甲骨进行全面系统整理,归纳总结不同考古学文化与不同时段卜用甲骨的特征,考察卜用甲骨的出土背景、类别等内容。

2. 在考察各考古学文化类型卜用甲骨的种属、尺寸、各部位特征、钻凿灼、卜兆、刻辞、刻画线等特征的基础上,对卜用甲骨本身的整治方式和钻凿形态、甲骨刻辞的行款走向等内容进行研究。因刻辞甲骨主要集中发现于商代晚期的殷墟地区和西周时期的周原地区,其他地区少见,故上述研究以这两个地区为主。

3. 利用年代最早的卜用甲骨以及与卜法相关的其他考古材料,研究先秦时期卜法的起源与衰落。其中起源问题主要利用商代以前的卜骨、龟甲及仿制物等进行探讨,衰落问题主要结合商周时期遗物上(甲骨、青铜器、陶器、骨器等)所见的易卦材料进行探讨。

4. 对利用卜用甲骨等实物材料无法探讨的占卜程式等卜法内容,可借助历史文献中有关卜法的记载以及出土文字材料作出复原研究。

(二) 卜用甲骨所属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与分区

本文卜用甲骨所属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与分区,主要参考已有的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与分区成果,并在此基础上略作调整。

新石器时代分为早期、中期、晚期和末期(即铜石并用时代)四个阶段。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卜用甲骨大致在铜石并用时代偏早阶段(即仰韶文化的晚期)开始出现。到龙山文化时期,卜用甲骨发现的地域和范围则更加广泛。

含卜用甲骨的夏商周三代文化遗址中,二里头文化(至少大部分)属于夏文化,分四期。与二里头文化同时代的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有岳石文化、先商文化、斗鸡台文化、游邀类型、新华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四坝文化等。

商文化的分期学术界颇有争论,有早晚两期说和早中晚三期说^①。唐际根等主张把白家庄期至殷墟大司空一期之前的商文化称为“中商文化”^②,近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即将商代文化分为早、中、晚三大期^③。本文依据卜用甲骨特征进行的分期与三期分法大致相同。早期以郑、洛地区为中心,以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为代表的二里岗文化为主;中期以藁城台西、洹北商城为代表;晚期以殷墟为主。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有先周文化、李家崖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周梁玉桥文化、路家河文化、巴蜀文化、寺洼文化等。

周代分西周、东周两个大的时期。西周时期又细分为早、中、晚三期。东周时期则分

① 郅向平:《商系墓葬研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7年5月,18—20页。

② 唐际根:《中商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9年第4期。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249—283页。

为春秋、战国两期。由于西周中晚期以后卜用甲骨十分稀少,从文献上看这一习俗也有逐渐被筮占所取代的趋势^①。因此对于西周以后的分期仅仅作为一个框架。

由于目前出土的考古材料尚不充分,先秦文献中有关卜法的记载也不够丰富,这都为先秦卜法的研究带来了很多困难。此外,本人资质鲁钝,阅读面有限,一些资料可能尚有遗漏,文章中错误难免,敬请诸方家指正。

^① 如《左传》中对于筮占的记录较多,战国楚简中也显示出卜筮并重的特点。

第二章 考古所见先秦时期的 卜用甲骨

目前所知,先秦时期的卜用甲骨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开始出现。仰韶时期^①是初创阶段,龙山时期^②是兴起阶段,夏代是持续发展阶段,商代是高峰时期,西周早期是转折阶段,西周中期以后慢慢衰落。本章按时代顺序分为新石器时代、夏、商、周代,分别描述卜用甲骨的出土情况,并对相关问题做出说明。

本文的写作,尽管力图把已公布的先秦卜用甲骨资料做全面搜集,但鉴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我们的此项研究,仍不免存在若干局限:第一,各地区、各时期古文化遗址的发掘工作并不均衡,对各地区、各时期考古文化的了解也不一致,有的比较充分,有的知之不多,有的甚至一无所知。因而对本文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影响。第二,受原始资料,即报告写作体例以及图版制作水平的制约,如有的只有文字描述,没有卜用甲骨图版;有的虽有甲骨图版,但图像模糊,看不清其特征等,这些都给研究先秦卜法带来很多困难。因此,受上述因素之影响,本文的有些研究,只能窥见先秦时期甲骨占卜的一般特征,要全面显示先秦时期甲骨占卜的全貌,尚存在相当距离。

卜用甲骨是新石器时代末期至商周时期各考古学文化中的一种重要文化遗物,在各考古学文化背景下,对出土卜用甲骨的特征进行考察,将有助于甲骨卜法的深入研究。故本文在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参照目前学术界普遍的说法,先将出土卜用甲骨的遗址归属于某一考古学文化类型,在此基础上介绍该类型所出土的甲骨的基本特征。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

中国新石器时代距今约 1.2 万年—4000 年,依据生产力水平 and 经济生活的发展变

① 本文所说的仰韶时期包括仰韶文化的早、中、晚三期,以及同时期的周边其他考古学文化,如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与屈家岭文化,长江下游的马家浜与良渚文化,辽河流域的赵宝沟遗存、红山文化、富河文化、小河沿文化和小珠山中层遗存等,其年代距今约 7000—5000 年左右。

② 本文所说的龙山时期即严文明先生所说的“龙山时代”(严文明:《龙山时代和龙山文化》,《文物》1981 年第 6 期),其年代距今约 5000—4000 年左右。

化,可分为早期、中期、晚期和末期(即铜石并用时代)四个阶段^①。

从本文所收集的材料来看,尚未发现属于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卜用甲骨。目前所见的卜用甲骨大致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即在仰韶时期的晚期开始出现。属于此阶段的河南仰韶文化、甘肃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内蒙古富河文化中都发现了卜骨。到龙山文化时期,卜用甲骨发现的地域和范围则更加广泛。

下面对目前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卜用甲骨的出土情况,按考古学文化(类型)做简单概述如下。

一、仰韶时期

从目前的材料看,中国最早的卜用甲骨发现于河南仰韶文化、甘肃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内蒙古富河文化中,均为卜骨。

甘肃武山傅家门遗址^②:该遗址发现2件卜骨,均为羊肩胛骨^③。卜骨未加整治,无钻无凿,但有灼痕和阴刻符号。标本 T132F11:12,为羊左肩胛骨,骨白和下端残,卜骨正面留有圆形灼痕1个,长10.5厘米,宽6.5厘米。标本 T125H6:32^④,为羊左肩胛骨,下端稍残,卜骨正面留有圆灼痕,并且刻划1个“一”字形符号。其余各件报告所介绍的卜骨没有灼痕,只留有“一、二、S”形等阴刻符号痕迹,是否为卜骨,存疑。这些卜骨所属遗存属石岭下类型。

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⑤:发现了一些卜骨,系鹿或羊的肩胛骨。报告仅公布1件卜骨照片(H3:24),经笔者观察可能是羊右肩胛骨,比较完整,未经修整,仅有灼痕。其所在遗存属富河文化。

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⑥:发现1件羊右肩胛骨(T14^⑤:102),骨白和骨脊没有修整,残片的卜骨正面留4—5个灼痕。其所在遗存属仰韶文化晚期。

① 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内容主要参考张江凯、魏峻著:《新石器时代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年。部分参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新石器考古课程讲义略作调整。大致年代如下:早期距今约1.2万年—9000年左右;中期距今约9000—7000年左右;晚期距今约7000—5500年左右;末期(铜石并用时代)距今约5500—4000年左右。根据铜器的冶炼和制造技术的发展,可以将铜石并用时代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包括了仰韶时期晚段和龙山时期的早段,距今约5500—4500年左右;晚期即龙山时期晚段,距今约4500—4000年左右。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甘肃武山傅家门史前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4期;《武山傅家门遗址的发掘与研究》,《考古学集刊》第16集,文物出版社,2006年,412页,图27,彩版3、4。本文相关甲骨特征的描述均根据各遗址报告的文字部分,间有笔者据报告提供的线图或图版所补充的描述,不一一说明。

③ 原报告认为共有阴刻符号的卜骨6件,其中有猪和牛肩胛骨。但笔者仔细观察报告照片,认为只有羊肩胛骨上有灼痕,因此只有羊肩胛骨才算卜骨,余者暂不划为卜骨行列。

④ 文中此片卜骨的编号是按照《考古学集刊》第16集(文物出版社,2006年)报告中编号直录。但发表在《考古》1995年第4期上的《甘肃武山傅家门史前文化遗址发掘简报》,编号为92KWf25H1:25的卜骨从线图看应当与上述卜骨为同一片。我们以后出的报告为准。

⑤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1期。

⑥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200页,图版五三~八。

上述考古所见的仰韶时期卜骨,数量较少,且绝大多数取材于羊肩胛骨(可能会有鹿肩胛骨)。卜骨未加修整,无钻无凿。由于羊(或鹿)肩胛骨骨面天然很薄,所以古人可以直接在卜骨正面较薄处烧灼,留有圆形灼痕,并在反面产生裂纹。灼痕数量不多,最多的也只有4—5个。牛、猪肩胛骨由于骨面较厚,如果火力不大则烧灼时不易产生裂纹,所以在卜骨的整治技术尚未发达的阶段,古人习惯用骨面较薄的羊(鹿)肩胛骨。

目前,出土卜骨的三个地点之间距离相隔较远,其年代和性质方面也有不同的说法^①。出土卜骨资料稀少,似乎也说明仰韶文化晚期正处于甲骨占卜之术萌生的阶段。

二、龙山时期

龙山时期又可以分为早、晚两期。早期距今约5000—4500年,晚期距今约4500—4000年。

目前所知,龙山时期仍然只见卜骨,不见卜甲。出有卜骨的龙山早期遗址仅内蒙古准格尔旗寨子塔一处,到龙山晚期,占卜习俗流行,在中国的河南、山西、河北、山东、内蒙古、辽宁、陕西、甘肃、宁夏等地的很多遗址中都有发现。其中以西北地区的客省庄二期文化和齐家文化出土的数量最多,占总数的一半以上,而且集中出土于几处考古遗存;其他地区出土卜骨的遗址也较多,但每个遗址中出土的卜骨很零散。以下对龙山时期各文化中卜骨的出土情况分别进行介绍。

(一) 龙山早期

龙山文化早期卜骨目前仅有一处遗址出土过,即内蒙古准格尔旗寨子塔遗址,在该遗址第一阶段文化遗存中发现几件卜骨^②,多残破,提供线图的卜骨均为猪右肩胛骨^③。其中标本H47:9,基本完整,骨中间和前后角稍有缺失,长24厘米,宽13厘米。从骨脊可分辨有灼痕6个。标本T8②:11,比较完整,前后角已残缺,残长12厘米,宽6.6厘米,反面骨脊两侧有灼痕4个,均透过。标本T8③:4,骨下部已残,残长17厘米,宽7.4厘米,反面骨脊两侧有灼痕5个。由于报告提供的线图均不太清晰,无法进行详细观察,这时期卜骨的正面一般有灼痕,线图画出的灼痕可能是卜骨反面烧灼时透过的痕迹。

寨子塔遗址第一阶段文化遗存属阿善文化,或称为“阿善三期文化”,主要分布于

① 绝对年代方面,三者都主张自己的卜骨年代最早。虽然从目前公布的数据来看,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卜骨最早,但近年来的工作表明,淅川地区各遗址所出卜骨最早的都属于龙山晚期,几乎没有再发现仰韶时期的卜骨。因此我们认为下王岗遗址所出土的卜骨可能没有报告所言那么早,而甘肃武山傅家门遗址的年代应该最早。

②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准格尔旗寨子塔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304页,图二六。

③ 报告说,该遗址第一阶段文化遗存发现的卜骨多残破,使用牛或其他食草类动物肩胛骨,但标本提供线图的3件卜骨,均为猪肩胛骨,报告者可能不曾仔细辨别种属。

内蒙古中南部的大青山南麓和黄河两岸,早期的中心似在河套东北部,晚期则退居到河套北部的大青山南麓^①。其年代约在距今 5000—4500 年之间,相当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早期。

(二) 龙山晚期

1. 老虎山文化

该文化是以 1982—1983 年发掘的凉城县老虎山遗址命名的,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中南部、晋中北、陕北和冀西北等地。年代距今约 4500—3900 年,大致以距今 4200 年为界,还可分为前后两期^②。出土卜骨的遗址有内蒙古凉城老虎山遗址^③、准格尔旗永兴店遗址^④、准格尔旗二里半遗址^⑤、伊克昭盟朱开沟遗址^⑥、陕西神木新华遗址^⑦。

老虎山文化出土的卜骨中能辨识者以猪肩胛骨为主,牛、羊肩胛骨极少。卜骨绝大多数未经修整,只经烧灼,无钻无凿。施灼有的在正面,有的在反面。猪肩胛骨上的灼痕一般较少,最多者有 9 个。因猪的肩胛骨较厚,烧灼时火焰炽烈,致使骨面形成浅坑,类似钻坑,而非人为先钻后灼。

从目前所知的卜骨材料看,老虎山文化早期均用猪肩胛骨,反面骨脊两侧施灼,可能为内蒙古阿善文化占卜传统的延续。到晚期,牛、猪、羊肩胛骨兼用,可见该地区在龙山文化晚期已使用牛肩胛骨。

2. 游邀类型

游邀类型是指以山西忻州游邀遗址龙山遗存为代表的文化。游邀遗址位于山西忻州盆地,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其年代相当于龙山时期至夏代^⑧。出土卜骨的遗址有山西

① 魏坚、崔璇:《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的发展与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年,125—143 页。

② 韩建业:《老虎山文化的扩张与对外影响》,《中原文物》2007 年第 1 期。

③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岱海考古(一)——老虎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00 年,258、265 页,图二二五、二三一,图版伍玖。

④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准格尔旗永兴店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年。

⑤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准格尔旗二里半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 11 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年。

⑥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朱开沟遗址》,《考古学报》1988 年第 3 期;黄蕴平:《内蒙古朱开沟遗址兽骨的鉴定和研究》,《考古学报》1996 年第 4 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博物馆:《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 年,123、124、279、418、419 页,图版三六、九〇。

⑦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神木新华》,科学出版社,2005 年,233—237 页。

⑧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忻州地区文物管理处忻州考古队编著:《忻州游邀考古》,科学出版社,2004 年,142—148 页。有些文化延续时间较长,含有不同时期的遗物,如游邀类型、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等。本文为行文方便,在分时段叙述时,有些考古学文化被分在两个时段中。此外,有些考古学文化的时代归属学术界存在分歧,本文根据甲骨特征暂归其一。下文不一一说明。

五台阳白遗址^①、忻州游邀遗址^②、太原光社遗址^③、娄烦何家庄遗址^④、离石乔家沟遗址^⑤、河北张家口贾家营遗址^⑥、蔚县筛子绦罗遗址^⑦。

该类型出土的卜骨中能辨识者以猪肩胛骨最多,牛、羊肩胛骨极少。卜骨一般未加整治,有些略加修整,只施灼,无钻无凿。与老虎山文化占卜习俗基本相同。有的猪肩胛骨上也见到从反面骨脊两侧施灼的现象。该类型牛肩胛骨的灼痕较少,3—10个左右不等。

3. 陶寺类型

陶寺类型主要分布于晋南汾河下游盆地,又有人称之为陶寺文化,可能是南下的北方系统与中原传统文化相碰撞的产物。该文化出土卜骨的遗址仅山西襄汾陶寺遗址^⑧一处。

该遗址出土的5件卜骨,均为猪肩胛骨。未加整治,只施灼,无钻凿。猪肩胛骨灼痕较少,只有2—3个。其北部的游邀类型与老虎山文化,亦以猪肩胛骨为主。从采用卜骨材料来看,应与老虎山文化和游邀类型有密切关系。

4. 齐家文化

齐家文化分布范围以黄河上游地区为中心,东起陇东,东北到宁夏南部和内蒙古西部,西到河西走廊,南抵白龙江上游地区。据碳十四测定,其年代大致在距今4200—1600年之间。该文化出土卜用甲骨的遗址有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⑨、永靖大何庄遗址^⑩、永靖秦魏家墓地^⑪、灵台桥村遗址^⑫、宁夏隆德页河子遗址^⑬。

在新石器时代出土的卜骨中以该文化出土的数量最多。除了两处遗址只有1—2件

① 山西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忻州地区文物管理处、五台县博物馆:《山西五台县阳白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4期。

② 忻州考古队:《山西忻州市游邀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4期;《忻州游邀考古》,科学出版社,2004年,138页,图一一二,图版四〇。

③ 寿田:《太原光社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与遭遇》,《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期;解希恭:《光社遗址调查试掘简报》,《文物》1962年第4.5期。

④ 晋中考古队:《山西娄烦、离石、柳林三县考古调查》,《文物》1989年第4期。

⑤ 晋中考古队:《山西娄烦、离石、柳林三县考古调查》,《文物》1989年第4期。

⑥ 陶宗治:《河北张家口市考古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6期。

⑦ 张家口考古队:《1979年蔚县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主要收获》,《考古》1981年第2期。

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1期;《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Ⅱ区居住址1999—2000年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第3期。

⑨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⑩ 黄河水库考古队甘肃分队:《临夏大何庄、秦魏家两处齐家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3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⑪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⑫ 甘肃省博物馆考古队:《甘肃灵台桥村齐家文化遗址试掘报告》,《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

⑬ 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固原博物馆:《隆德页河子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社,1997年,189、190页。

外,其余三处出土的卜骨数量都较多,其中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出土多达40件以上。卜骨以羊肩胛骨最多,猪肩胛骨其次,牛肩胛骨极少。卜骨几乎都未加整治,仅个别有轻微的刮削痕,只有灼,无钻无凿。圆形灼痕较小,且甚轻微,多在骨正面中部较凹处。灼痕较深重者,则透过反面。灼痕一般不超过10个,个别的有20—25个,此类卜骨时代可能较晚。牛、猪肩胛骨,灼痕比较大,不甚规则,多在卜骨中部较凹处。猪肩胛骨的灼痕,少者有7个,多者有25个,此类卜骨时代可能也较晚。牛肩胛骨上的灼痕较少,少者有6个,多者有12个。

出土卜骨的遗址大多数是20世纪60—70年代发掘的,受当时考古水平所限,没有详细分期。上述描述的卜骨中,许多卜骨年代可能已经进入夏代。如武威皇娘娘台、隆德页河子遗址的一些卜骨,在反面骨脊上还有灼痕。这样的占卜特点应是夏代开始出现的,类似的情况在夏代各遗址中常见。许多卜骨灼痕较多,个别的有20—25个,此类卜骨也应属于夏代。

5. 客省庄二期文化

以往又被称为“陕西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关中地区。年代大致距今4400—4000年左右。该文化出土卜用甲骨的遗址有陕西长安客省庄遗址^①、临潼康家遗址^②、商县紫荆遗址^③和岐山双庵遗址^④。

该文化出土的卜骨绝大部分为羊肩胛骨,也有少数为鹿肩胛骨。卜骨未经修整,只经烧灼,无钻无凿。其中灼痕大多位于骨正面。灼痕的数目及排列没有一定规律,一般灼痕有2至10多个不等,最多的有17个灼痕,灼径0.6—0.7厘米左右。羊的肩胛骨很薄,灼痕都透过另一面。在长安客省庄遗址出土的卜骨中,均为羊肩胛骨,骨正反面均有灼痕,灼痕较多而深,有的正面留有灼痕20个以上。据其特征而言,其时代应稍晚些。

6. 三里桥类型

三里桥类型主要分布在晋、豫、陕三省交界地区,年代属龙山文化晚期。三里桥类型西邻客省庄二期文化,东有王湾三期类型,北面为陶寺类型,受周邻文化影响,其文化内涵较为复杂。

该文化类型出土的卜骨较少,只发现2件,分别见于河南浍池仰韶村遗址^⑤和山西夏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沔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68页。

②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康家考古队:《陕西临潼康家遗址发掘报告》,《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陕西临潼康家遗址1987年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4期;刘莉、阎毓民、秦小丽:《陕西临潼康家龙山文化遗址1990年发掘动物遗存》,《华夏考古》2001年第1期。

③ 商县图书馆、西安半坡博物馆、商洛地区图书馆:《陕西商县紫荆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

④ 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岐山双庵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集刊》第3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63页。

⑤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浍池县文化馆:《浍池仰韶遗址1980—1981年发掘报告》,《史前研究》1985年第3期。

县东下冯遗址^①。材料均为羊肩胛骨,只施灼,无钻凿,一件卜骨上灼痕有8个。

7. 王湾三期类型

王湾三期类型主要分布在以伊、洛流域为中心的河南西部地区,年代距今约4500—3900年。该文化出土卜骨的遗址有孟津小潘沟遗址^②、济源苗店遗址^③、登封王城岗遗址^④、登封程窑遗址^⑤、汝州煤山遗址^⑥、郑州大河村遗址^⑦、郑州牛砦遗址^⑧、郑州马庄遗址^⑨、郑州阎庄遗址^⑩、新密古城寨城址^⑪、新密新砦遗址^⑫、禹州瓦店遗址^⑬、郾城郝家台遗址^⑭、西平上坡遗址^⑮、淅川下王岗遗址^⑯。

该文化类型虽出土卜骨的总量较多,但因分布于多个出土地点,故每个遗址出土的卜骨并不多。卜骨以羊肩胛骨为主,牛、猪肩胛骨数量较少。卜骨一般未加整治,有的仅略加修整,只施灼,无钻凿。牛肩胛骨的灼痕较多,有的达40个以上。因牛、猪肩胛骨比较厚,推测占卜过程中由于火焰炽烈,致使骨正面形成浅坑,反面也出现烧焦的黑痕,而非人为先钻后灼。

8. 后岗二期类型

后岗二期类型主要分布于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年代属龙山文化晚期。该文化出土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

② 洛阳博物馆:《孟津小潘沟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78年第4期;余扶危、叶万松:《河南孟津小潘沟遗址河南龙山文化陶器的分期》,《考古》1982年第2期。

③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河南省新乡地区文管会、河南省济源县文物保管所:《河南济源苗店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6期。

④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第3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大象出版社,2007年,139页,图版六四。

⑤ 赵会军、曾晓敏:《河南登封程窑遗址试掘简报》,《中原文物》1982年第2期。

⑥ 洛阳博物馆:《河南临汝煤山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75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

⑦ 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上、下),科学出版社,2001年,504页。

⑧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牛砦龙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

⑨ 郑州市博物馆:《郑州马庄龙山文化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2年第4期。

⑩ 郑州市博物馆:《郑州阎庄龙山文化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3年第4期。

⑪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密市炎黄历史文化研究会:《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

⑫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郑州市考古研究所:《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1999年试掘简报》,《华夏考古》2000年第4期。

⑬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禹县瓦店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禹州市瓦店龙山文化遗址1997年的发掘》,《考古》2000年第2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禹州瓦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4年,111、112页。

⑭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郾城县许慎纪念馆:《郾城郝家台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

⑮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驻马店市文物工作队、西平县文物管理所:《河南西平县上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4期。

⑯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263页。

卜骨的遗址有河南安阳后冈遗址^①、安阳南岗遗址^②、汤阴白营遗址^③、濬县大赉店遗址^④、辉县孟庄遗址^⑤、河北磁县下潘汪遗址^⑥、邯郸涧沟遗址^⑦、永年台口村遗址^⑧、任邱哑叭庄遗址^⑨。

后岗二期类型中出土的卜骨,除了任邱哑叭庄遗址之外,其他报告一律没有公布线图和图版,只有文字描述,无法深入探讨其特征。上述卜骨中以牛肩胛骨最多,猪肩胛骨次之,羊(或鹿)肩胛骨极少。卜骨均未经修整,只经烧灼,无钻无凿,有的一面施灼,有的两面施灼,排列无一定次序。一般牛肩胛骨的灼痕较多而密集,最多者有54个以上;猪、羊肩胛骨较少,只有1—5个。在安阳南岗遗址发现卜骨正反两面施灼的现象,说明卜骨两面施灼至少在龙山文化晚期已开始出现。

9. 造律台类型

造律台类型主要分布于河南东部、山东西南部、安徽西北部,年代属龙山文化晚期。该类型出土卜骨的遗址有河南杞县鹿台岗遗址^⑩、夏邑清凉山遗址^⑪,山东曹县莘冢集遗址^⑫。

该类型出土的卜骨不多,目前只见于上述三个遗址中,都属于龙山文化晚期。能辨识者均为牛肩胛骨。未加整治,只经烧灼,无钻无凿。灼痕较大而深,分内外两层,其内层颜色略深。

10. 山东龙山文化

山东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今山东省境内,南界大致在淮河以北的苏北和皖北一带,北界大致在辽东半岛南部的大连地区。年代距今约4500—4000年。该文化出土卜骨的遗址有章丘城子崖遗址^⑬、茌平尚庄遗址^⑭。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2年春安阳后冈发掘简报》,《考古》1972年第5期;《安阳后冈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1982年第6期;《1979年安阳后冈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安阳大寒村南岗遗址》,《考古学报》1990年第1期。

③ 河南省安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汤阴白营龙山文化遗址》,《考古》1980年第3期;《汤阴白营河南龙山文化村落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22页。

④ 刘耀(尹达):《河南濬县大赉店史前遗址》,《田野考古报告》第一册,1936年,69—89页。

⑤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辉县孟庄》,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123页,图八五。

⑥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下潘汪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⑦ 北京大学、河北省文化局邯郸考古发掘队:《1957年邯郸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10期;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邯郸涧沟村古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4期。

⑧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永年县台口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2年第12期。

⑨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沧州地区文物管理所:《河北省任邱市哑叭庄遗址发掘报告》,《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⑩ 郑州大学文博学院、开封市文物工作队:《豫东杞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75页,图四五。

⑪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丘地区文管会:《河南夏邑清凉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研究》(四),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⑫ 菏泽地区文物工作队:《山东曹县莘冢集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80年第5期。

⑬ 李济总编:《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85—89页,图版伍拾叁。

⑭ 山东省博物馆、聊城地区文化局、茌平县文化馆:《山东茌平县尚庄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文物》1978年第4期。

目前所知,在山东境内出土的龙山时期卜骨数量不多,尤其堆积较为单纯的典型山东龙山文化遗址,几乎不见卜骨。上述两处遗址中,最早的卜骨均属于龙山文化晚期晚段。卜骨材料均为牛肩胛骨,未经整治,只在卜骨正面施灼,灼痕大而深,分布较密集。尚庄遗址有河南龙山文化的因素,如陶器纹饰较多篮纹、方格纹和绳纹等,据此可推测山东地区卜骨,很可能受到了河南龙山文化的影响。

此外,章丘城子崖遗址^①因发掘时间较早,对其卜骨的认识尚有可讨论之处。该遗址前后发掘两次共得卜骨 16 片,以牛肩胛骨为主,下层还有鹿(或种属不明)的肩胛骨,皆破碎残缺。其中除去地面拾得之 1 片,其余卜骨中 6 片属于上层,3 片属于上下两层间之混合层,6 片属于下层。本文就报告所出示的资料再做详细分析,上层的 1、2、4(原报告图版 12、11、15)均经刮治,皆为一面有大的圆钻,施灼,这类卜骨应该属于早、中商时期;上层的 3、5(原报告图版 9、5)、6 均经刮治,皆为三联钻,施灼,这类卜骨应该属于西周中期;上下混合层的 7(原报告图版 14)未经刮治,有小的圆钻,施灼,应该属于早商;上下混合层的 9(原报告图版 10)经刮治,反面的骨脊由根以上刮去,无钻施灼,应该属于早商;上下混合层的 8(原报告图版 4a、b)和下层的 13(原报告图版 3)均为牛肩胛骨,未经刮治,只施灼,这类卜骨应该属于龙山时期,下层的 11、12(原报告图版 13、8)、10 均经刮治磨光,有大的圆钻,施灼,这类卜骨应该属于早、中商时期;下层的 14(原报告图版 2a、2b)为种属不明(2a 应为猪右肩胛骨)的肩胛骨,未经刮治,只施灼,应该属于岳石文化或商代,下层的 15(原报告图版 1)为鹿的肩胛骨,未经刮治,反面的骨脊由根以上刮去,只施灼,应该属于商代。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城子崖所出卜骨,只上下混合层 8 和下层 13 的卜骨可能属于龙山时期。

本文对城子崖卜骨的分类断代,以各时期中心遗址卜骨特征的分期为依据(例如早商卜骨是以郑州商城卜骨为标准),城子崖遗址的卜骨使用时间可能与中心地区同步或稍晚,具体的论证请看下面各时期的卜骨特征。

第二节 夏 代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主要分布在豫西、晋南地区,绝对年代大致为公元前 1900—前 1500 年。不过,根据普遍看法,夏王朝的纪年范围约在公元前 21 世纪—前 16 世纪。“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代的年代估定在公元前 2070—前 1600 年间。有学者据此认为二里头文化的延续时间和文献记载的夏代积年尚有差距,二里头文化可

^① 李济总编:《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 年,85—89 页,图版伍拾叁。

能只是夏代中晚期的夏文化,而早期夏文化则要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中寻找。关于夏商文化的分界,有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之间,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间,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间,二里头文化四期与二里岗文化下层之间等说法^①,本文采用最后一种说法。与二里头文化同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有岳石文化、先商文化、斗鸡台文化、游邀类型、新华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四坝文化等。

1. 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文化以豫西、晋南地区为中心,分布于河南省大部 and 陕西东部、鄂西北等地,绝对年代大致在公元前 1900—前 1500 年之间^②。该文化所出卜骨主要见于二里头类型、东下冯类型、牛角岗类型和下王岗类型。出土卜骨的遗址中,二里头类型的有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③、偃师灰嘴遗址^④、洛阳东干沟遗址^⑤、洛阳中州路遗址^⑥、巩县稍柴遗址^⑦、登封王城岗遗址^⑧、伊川白元遗址^⑨、郑州上街遗址^⑩、郑州洛达庙遗址^⑪、郑州大师姑遗址^⑫、陕县七里铺遗址^⑬、陕县西崖村遗址^⑭、荥阳西史村遗址^⑮、荥阳竖河遗址^⑯、密县新砦遗址^⑰、密县黄寨遗址^⑱、新密曲梁遗址^⑲、渑池县郑窑遗址^⑳、渑池县鹿寺

①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2000 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 年,73、77 页。

② 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的主要内容参考陈旭著《夏商考古》(文物出版社,2001 年),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在上述两书基础上略有调整。

③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1959 年河南偃师二里头试掘简报》,《考古》1961 年第 2 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 年第 4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1978 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年,68、69、121、238、239、332 页,图版 21、51、114、165。

④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偃师灰嘴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59 年第 12 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偃师灰嘴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0 年第 1 期。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报告——1955~1960 年洛阳涧滨考古发掘资料》,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 年,80、81 页,图版四四~10、11。

⑥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中州路》(西工段),科学出版社,1959 年,22 页。

⑦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巩县稍柴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3 年第 2 期。

⑧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 年,125、143、149 页,图版四一、四六、五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大象出版社,2007 年,252 页,图版七一。

⑨ 洛阳地区文物处:《伊川白元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2 年第 3 期。

⑩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郑州上街商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66 年第 1 期。

⑪ 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洛达庙商代遗址试掘报告》,《文物参考资料》1957 年第 10 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洛达庙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9 年第 4 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 年考古发掘报告》(全三册),文物出版社,2001 年,109 页。

⑫ 郑州市文物研究所:《郑州大师姑(2002—2003)》,科学出版社,2004 年,96 页,图六二。

⑬ 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河南分队:《河南陕县七里铺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60 年第 1 期。

⑭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陕县西崖村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89 年第 1 期。

⑮ 郑州市博物馆:《河南荥阳西史村遗址试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5),文物出版社,1981 年 12 月。

⑯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荥阳竖河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 10 集,地质出版社,1996 年,33 页,图三十二。

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密县新砦遗址的试掘》,《考古》1981 年第 5 期。

⑱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密县黄寨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3 年第 3 期。

⑲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新密曲梁遗址 1988 年春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3 年第 1 期。

⑳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渑池县文化馆:《渑池县郑窑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 年第 2 期。

遗址^①和郾城郝家台遗址^②,东下冯类型的有山西的夏县东下冯遗址^③、永济县东马铺头遗址^④、垣曲商城遗址^⑤、垣曲古城南关遗址^⑥、垣曲丰村遗址^⑦、翼城感军遗址^⑧、翼城苇沟—北寿城遗址^⑨、襄汾县大柴遗址^⑩,牛角岗类型的有杞县段岗遗址^⑪,下王岗类型的有浙川下王岗遗址^⑫。

二里头类型发现卜骨的遗址和数量都比较多,大多数遗址均有牛、猪、羊的肩胛骨。尽管许多遗址所发表材料未区分种属及其数量,但仍能看出牛和猪肩胛骨的数量比当地龙山文化时期明显增多。整治方面,一般猪、羊肩胛骨多数未经整治,少数猪、羊肩胛骨和牛肩胛骨,略加修整。个别牛肩胛骨,经过整治,表面磨光。其中郑州洛达庙遗址出土的1件牛肩胛骨,反面的骨脊刮去上部,留有根部,露出松质骨;荥阳西史村遗址出土的1件牛肩胛骨,骨反面上部刻出凹槽,槽中施钻和灼,骨臼、骨脊保留原状,报告将其时代定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间。这2件牛肩胛骨整治的特征,在郑州二里岗上层常见,此类整治特征可能夏代晚期开始出现,商代早期普遍流行。

该类型卜骨在骨正、反面和骨脊上施灼。一般羊、猪的肩胛骨施灼于骨正面中间较薄处,少数在反面;大部分牛肩胛骨也施灼于骨正面,少数施灼于骨正反两面,个别骨正面和骨脊上施灼,如陕县西崖村和渑池郑窑遗址出土的牛肩胛骨均在正面和反面骨脊上有灼痕。绝大多数卜骨只有灼,无钻无凿,极少数卜骨开始出现先钻后灼的现象。目前只有5件,即洛阳东干沟、巩县稍柴、陕县七里铺和荥阳西史村遗址出土的卜骨,均为牛肩胛骨。钻坑圆形,灼痕也较多。此类圆钻应是夏代晚期开始出现,商代普遍使用。

东下冯类型可分为六期,其中Ⅰ至Ⅳ期为夏代文化遗存。该类型发现有牛、猪、羊和鹿的肩胛骨,以猪肩胛骨为主,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其次为羊肩胛骨。该地区牛、羊肩胛骨的出现较晚,夏县东下冯遗址第Ⅲ期才开始出现。靠近陕西的永济东马铺头遗址中发现12件卜骨,均为羊肩胛骨。该地区羊肩胛骨的出现,有可能与陕西地区有关。整治方式比较简单,猪、羊肩胛骨均未经整治,只有灼痕,无钻无凿;牛肩胛骨多经过整治,正反两面

①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渑池县鹿寺商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9期。

②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郾城县许慎纪念馆:《郾城郝家台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

③ 东下冯考古队:《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东区、中区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28、49、99、146页,图版四、十五、三八、六三。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晋南二里头文化遗址的调查与试掘》,《考古》1980年第3期。

⑤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县博物馆:《垣曲商城:1985—1986年度勘察报告》(一),科学出版社,1996年,153页,图九八,图版五三。

⑥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88—1989年山西垣曲古城南关商代城址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10期。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垣曲丰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集刊》第5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56页,图三〇。

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晋南二里头文化遗址的调查与试掘》,《考古》1980年第3期。

⑨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西实习组、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翼城曲沃考古勘察记》,《考古学研究》(一),1992年,206页,图五七。

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襄汾县大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7期。

⑪ 郑州大学文博学院、开封市文物工作队:《豫东杞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230页。

⑫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浙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

均有灼有钻,无凿,灼痕较多。垣曲丰村遗址出土的猪肩胛骨正反两面也均有灼痕,骨正面中间下端较薄之处有7个,反面靠近颈部处有3个,未见钻痕。此外,在翼城苇沟—北寿城遗址中出土的1件羊肩胛骨,骨正面和反面骨脊上均有灼痕,正面有1个,骨脊上有3个。

牛角岗类型仅杞县段岗遗址发现1件卜骨,为羊肩胛骨,已残,有灼痕,残存圆形钻坑2个。

下王岗类型仅浙川下王岗遗址发现5件卜骨。一期发现4件卜骨,均残,系羊和鹿的肩胛骨,骨正面有灼痕。三期发现1件卜骨,为猪左肩胛骨,骨面上有烧灼的痕迹。

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出土的卜骨数量与该地区龙山时期相比明显增加,出卜骨的遗址也较多。虽然均有牛、猪、羊肩胛骨,但不同的文化类型或部分遗址之间比例有所不同。二里头类型牛肩胛骨比例比前期增加较明显;东下冯类型猪肩胛骨最多。总的来说,靠近西部地区羊肩胛骨较多,靠近北部猪肩胛骨较多,这显然有地域之别,与各自此前的文化传统有关。

整治方面,一般猪、羊肩胛骨未经整治或略加修整;牛肩胛骨,经过整治,部分表面磨光。二里头晚期开始出现两种特殊现象:第一,反面的骨脊由根以上刮去;第二,骨反面上部刻出凹槽,槽中施钻和灼,骨臼、骨脊保留原状。此类整治方式,可能夏代晚期开始出现,商代早期普遍流行。

钻凿灼方面,大部分仍然只有灼,无钻无凿,灼痕大小不同,形状不一,有圆形和长圆形两种。常见于骨正面、反面,也有极少数的卜骨在反面骨脊上施灼。另外,极少数的牛肩胛骨上开始出现先钻后灼。钻坑圆形,灼痕也较多。此类圆钻应是夏代晚期开始出现,商代普遍使用。

二里头文化这几种特殊的整治方式与钻凿形态,可能受北方地区的影响。

2. 游邀类型

游邀类型出土卜骨的遗址有山西的忻州游邀遗址^①、娄烦河家庄遗址^②。

该类型牛、猪、羊的肩胛骨均有发现,以猪肩胛骨为主,占总数的一半以上,牛、羊肩胛骨其次。整治方式比较简单,猪、羊肩胛骨几乎未经整治,有的周缘稍经消磨;牛肩胛骨则骨脊被削平,并刻出凹槽,槽中施钻。大部分卜骨只有灼,无钻无凿,施灼均在肩胛骨的骨面较薄部位,反面兆痕清晰;少数卜骨有圆形钻坑,钻坑呈圆窝形,钻坑径约1.2—2厘米。

该类型猪肩胛骨柄部反面常有一两个大而深的圆形钻坑,该特征在先商文化和岳石文化中也可见到。

^① 忻州考古队:《山西忻州市游邀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4期;《忻州游邀考古》,科学出版社,2004年,138页,图一一二。

^② 国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晋中考古》,文物出版社,1999年,51页,图三六。

3. 新华文化

新华文化分布于内蒙古中南部、陕北以及晋北地区。出土卜骨的遗址仅陕西的神木新华遗址^①一处。

神木新华遗址的年代,大致约龙山晚期到夏代早期。从卜骨的特征来看,该遗址的大部分卜骨已经进入夏代。发现有牛、羊、猪、鹿的肩胛骨,以牛肩胛骨为最多,羊肩胛骨其次,猪、鹿的肩胛骨较少。大部分的卜骨未经整治,保留肩胛骨原状;个别肩胛骨经过粗略加工,将骨脊削平或扇面前缘略加磨光。所有卜骨只有灼,无钻无凿,正反面都有灼痕。另外,在骨脊上也有施灼的现象。报告认为施灼有三种,该遗址出土的卜骨中,以反面施灼较多,次为正反两面同时施灼,再次为正面施灼。实际上,夏代该遗址的施灼方式已经形成定制,即完整的卜骨,骨正面只在中间下端施灼,灼点不多;骨反面则施灼在柄部和扇部的上段,灼点很多,扇部下段几乎不见灼点。一般出土的卜骨大多数已残缺,残留柄部的卜骨,只在反面可见灼痕;残留扇部下段的,只在正面可见灼痕;较完整的或残留骨中间的,在正反两面都见到灼痕。灼痕呈焦黑色或黄褐色,灼痕一般较浅,个别较深,灼痕直径在1—1.5厘米之间。

4. 朱开沟文化

朱开沟文化是以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命名的。发掘者将朱开沟遗址出土遗存分为五段,一般认为,朱开沟文化是以朱开沟遗址二至五段为代表的遗存^②。其主要分布于黄河河套及其以东地区,年代大致从夏代延至商代中期。该文化出土卜骨的遗址有内蒙古朱开沟遗址^③。

朱开沟文化牛、猪、羊、鹿和熊的肩胛骨均有,以牛和鹿的肩胛骨最多,猪、羊的肩胛骨其次。该文化出土的鹿、熊肩胛骨,可能与狩猎活动有关。简报中说:“在夏代中期遗存中发现卜骨,开始经加工整治,亦只灼不钻。夏代晚期遗址中也发现卜骨,多采用经整治过的动物肩胛骨,有灼有钻。”报告提供的标本大多数属于后者。此外,有的牛肩胛骨,未经修整,在正、反面及骨脊上均有灼痕,无钻。应属于夏代早期。

5. 岳石文化

岳石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豫东、苏北和河北东部的部分地区,是在山东龙山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延续到二里岗上层时被商文化取代。该文化出土卜骨的遗址有山东的章

①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神木新华》,科学出版社,2005年,233—237页,图一四一、一四八、一四九、二四〇、二四一,图版四九~五三。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576页。

③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朱开沟遗址》,《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黄蕴平:《内蒙古朱开沟遗址兽骨的鉴定和研究》,《考古学报》1996年第4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博物馆:《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123、124、280、281、418、419页,图版三六、九〇。

丘城子崖遗址^①、泗水尹家城遗址^②、桓台史家遗址^③、牟平照格庄遗址^④、烟台芝水遗址^⑤，河南的夏邑清凉山遗址^⑥、民权李岗遗址^⑦。

岳石文化发现有牛、猪、羊和鹿的肩胛骨。以猪、鹿肩胛骨为主，牛、羊肩胛骨其次。该文化出土的卜骨数量较少而零散，与其他文化类型相比，卜用鹿肩胛骨数量和比例最多。多数卜骨略加修整，只有灼，无钻无凿。一些较晚的卜骨，有灼有钻，无凿。钻多为圆形，反面有兆纹。有的为两面钻，钻直径为1—1.6厘米左右，钻坑排列较密。

6. 先商文化

先商文化是指成汤灭夏以前商先公时期以商族为主体的考古学文化。邹衡先生经过详细分析，认为成汤以前，商人活动的地区在今河北省西南部和河南北部的平原上，中心地区在滹沱河与漳河之间，可分为三个类型^⑧。李伯谦先生建议称为“下七垣文化”^⑨。目前主要发现于冀南、豫北地区，郑州地区亦有发现。其时代都晚于龙山文化而早于二里岗期商代文化。该文化出土卜骨的遗址有河北的邢台粮库遗址^⑩、永年何庄遗址^⑪、邯郸北羊台遗址^⑫、磁县下七垣遗址^⑬，河南的新乡潞王坟遗址^⑭、新乡李大召遗址^⑮、杞县鹿台岗遗址^⑯。

先商文化发现有牛、猪、羊的肩胛骨。虽然许多报告没有细分其种属，但也能看出该文化以牛肩胛骨为主，猪、羊肩胛骨其次。该文化出土的卜骨数量较少而零散。多数卜用猪、羊肩胛骨和少数牛肩胛骨略经修整，只在骨正面有灼，无钻无凿，灼痕较大，灼痕为圆形或椭圆形；多数牛肩胛骨在正反面有灼有钻，无凿。灼（或钻）痕较多，圆钻坑直径多在

① 李济总编：《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85—89页，图版伍拾叁。

②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研室：《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197页，图版七八。

③ 淄博市文物局、淄博市博物馆、桓台县文物管理所：《山东桓台县史家遗址岳石文化木构架祭祀器物坑的发掘》，《考古》1997年第11期。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牟平照格庄遗址》，《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

⑤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烟台市博物馆：《胶东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122页，图二〇。

⑥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丘地区文管会：《河南夏邑清凉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研究》（四），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⑦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豫东商丘地区考古调查简报》，《华夏考古》2005年第2期。

⑧ 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⑨ 李伯谦：《先商文化探索》，《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⑩ 河北省邢台市文物管理处：《邢台粮库遗址》，科学出版社，2005年，64页，图六四，图版二。

⑪ 邯郸地区文物保管所、永年县文物保管所：《河北省永年县何庄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2年第4期。

⑫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邯郸市文物管理处、峰峰矿区文物管理所：《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北羊台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2期。

⑬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下七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⑭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新乡潞王坟商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

⑮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 韩国河、赵海洲：《新乡李大召——仰韶文化至汉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6年，224页，图一五三。

⑯ 郑州大学文博学院、开封市文物工作队：《豫东杞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99、106、112页，图五四、五九，图版四。

1—2 厘米之间。

7. 斗鸡台文化

斗鸡台文化是安徽江淮地区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一种考古学文化,得名于安徽寿县斗鸡台遗址。该文化仅在寿县斗鸡台遗址^① T1⑤层中发现 30 多件卜骨,有牛、羊、鹿的肩胛骨,以羊肩胛骨最多,皆未经整治,有灼痕而无钻无凿。

8. 夏家店下层文化

夏家店下层文化主要分布在西辽河和大小凌河流域,年代大致相当于夏至商代前期。可分为三期,一期相当于夏代早期,二期相当于夏代晚期,三期相当于商代前期。该文化出土卜骨的遗址有内蒙古的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②,赤峰蜘蛛山遗址^③,赤峰东山咀遗址^④,敖汉旗范仗子墓地^⑤;辽宁的建平水泉遗址^⑥;河北的唐山大城山遗址^⑦、蔚县庄窠遗址^⑧。

从目前所出土的材料来看,除唐山大城山遗址所出土的极少数卜骨以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绝大多数卜骨,先钻后灼,无凿。其时间范围应是夏代晚期至商代^⑨。本文为描述方便,把具有较明显商代卜骨特征的,在商代卜骨中描述,其余在夏代描述。

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的卜骨较少,发现有牛、猪、羊和鹿的肩胛骨。整治方式和钻凿灼方法较为简单。一般猪肩胛骨,未经修整,先钻后灼,无凿。骨反面有钻坑,钻为圆形,数量不多,骨正面可见兆纹。羊肩胛骨,先钻后灼,钻坑小而不透,直径 0.4—0.9 厘米,较多而密集,最多者存有 36 个。在百草沟遗址和唐山大城山遗址出土的有些卜骨,将骨脊削去一半,骨面稍加修整。仅有灼无钻,灼痕多在肩胛骨的反面,较密集而不规则。另外,该文化中常见长条形卜骨,可能用动物肋骨制作而成,为该地区的特色。

9. 齐家文化

夏代齐家文化中的卜骨在前文新石器时代部分论证已较清楚,此不赘述。

本文将反面骨脊上烧灼的卜骨和灼痕较多(有 20—25 个)的卜骨均归属于夏代。此

①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周组、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省霍邱、六安、寿县考古调查试掘报告》,《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社,1997 年,288、289 页。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 年第 1 期;《内蒙古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1 年第 2 期。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蜘蛛山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9 年第 2 期。

④ 辽宁省博物馆、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赤峰县文化馆:《内蒙古赤峰县四分地东山咀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 年第 5 期。

⑤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敖汉旗范仗子古墓群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 年第 3 期。

⑥ 辽宁省博物馆、朝阳市博物馆:《建平水泉遗址发掘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86 年第 2 期。

⑦ 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北唐山市大城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 年第 3 期。

⑧ 张家口考古队:《蔚县夏商时期考古的主要收获》,《考古与文物》1984 年第 1 期。

⑨ 有些学者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最早的遗址,属于龙山晚期,因此夏家店下层文化最早的卜骨,也有可能属于龙山晚期。

外,齐家文化的卜骨以羊肩胛骨最多,猪肩胛骨其次,牛肩胛骨极少。该地区的牛、猪肩胛骨可能出现较晚,也与内蒙古南部和陕北地区诸文化有着密切联系。

10. 四坝文化

四坝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省河西走廊地区,南抵祁连山北麓,北近巴丹吉林沙漠,西北达安西一带的疏勒河流域,东南或可至武威一带。年代距今约 3900—3500 年,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夏代中晚期,下限已进入商代早期。

该文化仅在民乐东灰山遗址^①发现 4 件卜骨,为猪、羊的肩胛骨。整治方法较简略,骨脊和扇部稍经削磨,骨正面留有圆形灼痕 1—2 个。

第三节 商 代

中国历史上的商代从成汤灭夏开始,至殷纣亡国结束,年代约为公元前 1600—前 1046 年^②。商代的商文化包括商代早期的二里岗文化和商代晚期的殷墟文化,但两者之间有一个缺环。近几年,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有学者将商代文化综合分为早、中、晚三期,分别为早商文化、中商文化、晚商文化^③。因为商代早、中、晚期在卜用甲骨的种类、数量以及占卜方式上,都有一定的差别,故本文采用此三分法。商文化之外,周边地区同时期的文化有先周文化、李家崖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周梁玉桥文化、路家河文化、十二桥文化、寺洼文化等。

从目前出土材料来看,卜甲最早发现于郑州南关外期,故将对商周时期每个文化出土的卜骨和卜甲均作描述。

一、商 文 化

(一) 商 代 早 期

早商文化自二里岗下层一期始,至二里岗上层一期止,可分三期。包括二里岗类型、琉璃阁类型、台西类型、东下冯类型、北村类型、盘龙城类型、大城墩类型和大辛庄类型等八个地方类型。

^①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甘肃民乐县东灰山遗址发掘纪要》,《考古》1995 年第 12 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北方考古研究室:《民乐东灰山考古——四坝文化墓地的提示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 年,25、171 页,图版五、五六。

^②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2000 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 年,87、88 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

1. 二里岗类型

卜用甲骨在二里岗类型中发现较多,见于河南郑州南关外遗址^①、郑州商城遗址^②、郑州旭畚王村遗址^③、郑州大河村遗址^④、郑州大师姑遗址^⑤、郑州铭功路东遗址^⑥、偃师商城遗址^⑦、荥阳西史村遗址^⑧、荥阳薛村遗址^⑨、巩县稍柴遗址^⑩、洛阳涧西孙旗屯遗址^⑪、登封王城岗遗址^⑫、内乡黄龙庙岗遗址^⑬和柘城孟庄遗址^⑭。

该类型发现有牛、猪、羊和鹿的肩胛骨和龟甲等5种。二里岗下层文化以牛肩胛骨最多,羊、猪肩胛骨其次,开始出现卜用龟甲,但数量不多;二里岗上层文化已经开始出现以牛肩胛骨和龟甲为主要占卜材料的趋向,猪、羊肩胛骨减少,龟甲大大增加。下面以郑州商城为例,简单说明该文化的甲骨特征。

(1) 卜骨

郑州南关外期发现的卜骨,牛肩胛骨占绝大部分。卜骨一般略加整治,也有未经整治的,多直接施灼于骨面。

商代二里岗下层一期发现有卜骨,但没有公布数量。牛、猪、羊肩胛骨均有,以羊肩胛骨多见。一般经过修整,骨脊削去,残留骨脊的根部,骨正面或反面直接施灼。灼痕较少,最多者15个。

商代二里岗下层二期发现卜用甲骨很多(106件),其中牛肩胛骨数量大幅增加(56件),占总数的一半以上;羊肩胛骨的数量也多(31件),但其比例减少;还有猪肩胛骨(9件)。此时牛肩胛骨受到重视,一般都是骨脊被削去,残留骨脊的根部,略加修整。在骨正面中间下部直接施灼,灼痕密集,最多者有50多个,似乎排列有序;骨反面也施灼,但灼痕

① 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南关外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136页。

② 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174、175、367、681、834、835、836页,图一一〇、一一一、二二四、四六七、四六八、五六〇,图版三七、一四八、二三七、二三八。

③ 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旭畚王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

④ 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上、下),科学出版社,2001年,573页。

⑤ 郑州市文物研究所:《郑州大师姑》(2002—2003),科学出版社,2004年,312、332页。

⑥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铭功路东商代遗址》,《考古》2002年第9期。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偃师商城的初步勘探和发掘》,《考古》1984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偃师商城第Ⅱ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11期;河南偃师商城Ⅳ区1996年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2期。

⑧ 郑州市博物馆:《河南荥阳西史村遗址试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5),文物出版社,1981年12月。

⑨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荥阳市薛村遗址2005年度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7年第3期。

⑩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巩县稍柴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3年第2期。

⑪ 河南文物工作队第二队孙旗屯清理小组:《洛阳涧西孙旗屯古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9期。

⑫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169页,图版五九;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大象出版社,2007年,304、305页。

⑬ 内乡县综合博物馆:《河南内乡县部分新石器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1期。

⑭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商丘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柘城孟庄商代遗址》,《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

不多。

猪、羊肩胛骨,有的削去骨脊,仅留脊根;有的保留骨脊。有的骨正面中间下部灼痕较多,反面亦有灼痕,但数量较少,灼痕排列不甚规整;有的只在骨反面直接施灼,灼痕较少。

商代二里岗上层一期遗址发现卜用甲骨更多(111件),其中卜骨(74件)以牛肩胛骨为主,还有猪、羊、鹿的肩胛骨。多数牛肩胛骨,一般骨反面上部挖出凹槽,刮削平整,磨制光滑,槽中先钻出圆坑,然后在圆坑内施灼,但其中也有个别是未钻而直接在骨反面上施灼的。圆钻坑密集,有的残留46个,似排列有一定规律,骨正面也有许多清晰的兆纹。少数的牛肩胛骨有的削去骨脊,仅留脊根;有的仍沿用骨正面中间下部较薄处直接施灼。猪、羊、鹿的肩胛骨,削去骨脊,仅留脊根,除极少数先钻后灼外,仍多是在骨正面或反面较薄处直接施灼,灼痕较少,最多者有9个。郑州地区二里岗下层时不见先钻后灼的方式^①,到二里岗上层时才使用,可能受夏代晚期许多地区已经出现的先钻后灼的影响,但其整治方式更为进步,即在骨反面上部先刻出凹槽,再在槽中钻出圆坑,然后在圆坑内进行火灼。该整治方式在二里岗上层时对周围地区影响甚大。

(2) 卜甲

从目前出土的材料来看,卜甲最早发现于郑州南关外期。郑州二里岗文化中的卜甲绝大多数在郑州南关外遗址中发现,均为腹甲。郑州南关外期仅有1件,腹甲反面直接施灼,灼痕较少。郑州二里岗下层一期未发现卜甲。二里岗下层二期发现10件卜甲,个体均较小,稍加修整,在腹甲的正面或反面直接施灼。灼痕数量不同,少者仅3个灼点,多者留有34个。灼点似纵横排列有序。

商代二里岗上层一期发现37件卜甲,其数量大幅度增加,占甲骨总数的三分之一。龟甲个体比二里岗下层明显变大。有的残长21.5厘米,中宽14.5厘米;有的长20厘米,中宽10厘米。稍加修整,在腹甲的反面先钻出圆坑,然后在圆坑内施灼。钻坑较多,最多者留有39个。钻坑排列多是分布成组,坑径一般为0.5—0.8厘米之间。有些钻坑以千里路为界,左右数量相同,可能已经出现正反对贞^②。有的虽然钻坑排列不对称,但占卜者把腹甲的各部位有意分成几部分,加施钻灼。

郑州以外在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和柘城孟庄遗址也发现卜甲,腹甲的反面均先钻后

① 郑州大师姑遗址和铭功路东遗址出土的卜骨中有灼有钻,两报告均将其定为二里岗下层。但除此二遗址外,二里岗下层其他遗址卜骨中均不见钻,直接施灼。因此笔者认为该两处遗址所出卜骨可能为晚期混入到早期地层中,应属于二里岗上层时期。

② 笔者赴郑州市考古所看到郑州耀包城工程工地出土的卜甲(2006H6),为腹甲,基本完整,个体较大,长28厘米,中宽17厘米,稍加修整,在腹甲的反面先钻出圆坑,然后在圆坑内火灼,其钻灼的排列多是分布成组。钻灼共有32个,其中腹甲反面的右下甲腹下段(B4),有钻灼1个;左下甲腹下段(B8),有钻灼2个;左甲尾(C3、C4),有钻灼3个;右甲尾(C1、C2),有钻灼4个。钻灼又以千里路为界,左右各5个,应为对贞。腹甲反面的右上甲腹(B1、B2)和右下甲腹上段(B3),各有钻灼4个,应为对贞;腹甲反面的左上甲腹(B5、B6)和左下甲腹上段(B7),各有钻灼7个,应为对贞。

灼,皆属于二里岗上层。

2. 琉璃阁类型

琉璃阁类型出土卜骨的遗址有河南辉县琉璃阁遗址^①、辉县褚邱区遗址^②、辉县孟庄遗址^③。

该类型牛、猪、羊和鹿的肩胛骨均有发现,绝大多数为牛肩胛骨,猪肩胛骨较少,羊、鹿肩胛各仅见1件,未见卜甲。其整治方式较为简单,稍加刮磨,骨脊削去一部分仍保留脊根^④。辉县琉璃阁、褚邱区遗址发掘较早,受当时考古水平所限,分期不够细致;辉县孟庄遗址虽然为近年发掘的,但报告的分期存在疑问,因而对深入探讨该文化类型卜骨的特征造成障碍。从这批材料来看,应该与郑州商城同时,大多数卜骨具有二里岗上层的特征,也有少数相当于二里岗下层和中商时期的卜骨。

3. 台西类型

台西类型出土卜骨的遗址有河北藁城台西遗址^⑤、磁县下潘汪遗址^⑥。

该类型发现卜骨极少,在大体相当于二里岗上层的文化层中开始出现,中商时期普遍使用。报告提供的标本中能分别出的有牛、猪的肩胛骨,均为先钻后灼。

4. 大辛庄类型

大辛庄类型出土卜用甲骨的遗址有山东济南大辛庄遗址^⑦、泗水尹家城遗址^⑧、梁山青堍堆遗址^⑨。

该类型出土卜用甲骨多为中商时期的,早商时期较少。卜用甲骨均为先钻后灼。目前所知,与该文化类型特征相似的卜用甲骨在二里岗上层已经存在。特别要注意的是该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13—15页。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125页,图版玖玖。

③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辉县孟庄》,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278页,图一九五。

④ 琉璃阁遗址所出卜骨大部分属于商代早期,但从其形制看,仍存在时间的早晚差异。如保持自然形状的骨臼时代较早,骨臼切去一半的较晚,此类应属于中商;骨脊保持天然形状的最早,刮削一部分仍留脊根的其次,全部削去的最晚(二里岗上层);直接施灼的较早,钻而后灼的较晚。由上所述可知,该遗址的17件牛肩胛骨中H1:4、H:42、H:100较早;H1:1最晚;其余两者居中。3件猪肩胛骨中H1:13、H:101较早;H1:80较晚。

⑤ 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藁城台西村的商代遗址》,《考古》1973年第5期;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台西考古队:《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6期;李学勤、唐云明:《河北藁城台西甲骨的初步考察》,《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3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⑥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下潘汪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⑦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23页;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勘查纪要》,《文物》1959年第11期;《济南大辛庄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4期;蔡凤书:《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的调查》,《考古》1973年第5期;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博物馆:《1984年秋济南大辛庄遗址试掘述要》,《文物》1995年第6期;徐基:《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的初步研究》,《文物》1995年第6期;王华:《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政治技术研究》,山东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6年。主要参看后两篇文章提供的资料,原文对该遗址的甲骨已详细论证,本文对其资料整理后,略作调整。

⑧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研室:《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252页,图版九九。

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发掘队:《山东梁山青堍堆发掘简报》,《考古》1962年第1期。

文化早商时期已经使用卜甲,可能受到郑州二里岗上层文化的影响。

(1) 卜骨

该类型发现商代早期卜骨较少,报告提供的资料中能分别出的有牛、羊和鹿的肩胛骨,其中羊、鹿肩胛骨各有1件,其余均为牛肩胛骨^①。骨面有小圆钻,圜底,分布密集,排列无规律,大小不一,直径多在0.5厘米左右。

(2) 卜甲

该类型卜甲出土比例较高,能分辨出属于早商的有4件,均为腹甲。个体较小,大多数长13—14厘米,宽8—9厘米左右,应属于乌龟类。甲桥与腹甲之间呈锐角,腹甲反面经过刮削和粗磨,有灼有钻,无凿。钻坑小而圆,圜底,直径0.4—0.6厘米,成组分布。可以看出占卜者有意以千里路和齿缝为界,将各部位分成几部分,加施钻灼,进行占卜。该文化类型的卜甲具有郑州二里岗上层卜甲的特点,该地区应在二里岗上层时期开始出现卜甲,商代中、晚期广泛使用。

5. 东下冯类型

东下冯类型V、VI期为商代二里岗期遗存,出土卜用甲骨的遗址有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②、垣曲商城遗址^③、太原光社遗址^④。

该类型除垣曲商城遗址出土的一件卜甲外,均为卜骨,卜骨以猪肩胛骨为主^⑤。

(1) 卜骨

该地区新石器时代至夏代早期只见猪肩胛骨,到夏代东下冯类型Ⅲ期开始出现牛肩胛骨;Ⅳ、V期仍然以猪肩胛骨为主,牛肩胛骨比例不高;到Ⅵ期(相当于二里岗上层时)牛肩胛骨占据主要地位,猪肩胛骨极少见。V期凡猪、羊肩胛骨皆未经整治,有灼,无钻无凿。牛肩胛骨均经过整治,有钻有灼,无凿。Ⅵ期牛肩胛骨也都经过整治,骨脊削平,正反两面均有钻有灼,无凿。钻坑多数为圆底坑,少数为平底坑,坑内多数有灼痕,钻坑较多,有的残存30个。猪肩胛骨有的经过整治,即将骨脊削去,有的未经整治,正反两面均有钻有灼,无凿。钻坑较少,有的残存10个。

① 目前所知,大辛庄遗址诸报告与文章皆没有提出早商时期的卜甲,卜骨则仅在该遗址商文化第一期遗存中发现1件。笔者仔细分析他们提供的材料认为:其中几件与郑州二里岗上层所出卜甲的特征相同,其年代也应大致相当于商代早期后段。王华文章中所说的中圆钻(AⅡ式)中一部分应该属于商代早期。当然,这种推测要等待正式报告发布之后作进一步论证。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185、207页,图版八三、九五。

③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县博物馆:《垣曲商城:1985—1986年度勘察报告》(一),科学出版社,1996年,204、205、241—243页,图一三三、一五七,图版七三、八八、八九;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88—1989年山西垣曲古城南关商代城址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10期;《1991—1992年山西垣曲商城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12期。

④ 寿田:《太原光社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与遭遇》,《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期;解希恭:《光社遗址调查试掘简报》,《文物》1962年第4、5期。

⑤ 东下冯类型以北,山西太谷白燕遗址出土的卜用甲骨,主要出土于该遗址四、五期。其中一件卜甲(背甲)钻凿形态具有中商特征,可能该地区商代中期时出现卜甲。除此卜甲外,余均为卜骨,以猪肩胛骨为主。

(2) 卜甲

仅在垣曲商城遗址二里岗上层中发现1件腹甲^①,反面钻坑11个,坑较大且深,坑径1厘米,深0.5厘米,底略平,仅有1坑钻透,钻后均灼。

6. 北村类型

北村类型出土卜骨的遗址有陕西西安老牛坡遗址^②、蓝田怀珍坊遗址^③、耀县北村遗址^④、华县南沙村遗址^⑤。

该类型牛、羊、鹿的肩胛骨均有发现,以牛、羊肩胛骨为主。该地区羊肩胛骨的数量虽然仍较多,但牛肩胛骨已经占主导地位。该文化类型未见卜甲。卜骨经过加工修整,直接施灼的少见,绝大多数先钻后灼,无凿。钻坑圆窝形,坑径1厘米,深0.5厘米左右。钻坑一般比较密集,排列无序。该文化类型可能受到郑州二里岗上层的影响,二者卜骨特征大同小异。

7. 盘龙城类型

盘龙城类型出土卜骨的遗址有王家嘴、杨家湾^⑥遗址。

该遗址第五期文化遗存中发现2件卜骨,均为牛肩胛骨,经过整治,表面光滑,削去骨脊,骨反面均有钻灼痕,钻坑大小不一,最大径1厘米,最小径0.4厘米。其年代应相当于郑州二里岗上层。

商代早期与夏代相比占卜习俗流行更广泛,在商代中心地区使用更为普遍,出土的数量较集中。此时,卜用甲骨的特征以郑州二里岗上、下层为代表。各文化类型之间的交流更频繁,特别是到二里岗上层时,中心地区的占卜习俗对周围地区影响很大,许多考古文化遗存中,可见与郑州二里岗上层相同的特点。

商人的老家冀南一带龙山晚期至先商文化时期牛、猪、羊肩胛骨均有发现,以牛肩胛骨为主。到商代早期牛肩胛骨的比重进一步增加,猪、羊和鹿肩胛骨的数量下降,甚至不见。很可能与商人拥有的传统观念有密切关系。

目前所知,占卜过的龟甲,最早发现于郑州南关外下层遗址。其时代应为商代早期或先商阶段(南关外期)。商代早期的占卜以卜骨为主,卜甲为辅。卜甲仅见腹甲,还没发现占卜过的背甲。腹甲一般稍加修整,甲桥只保留中间竖行齿缝内侧部分。二里岗下层

①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县博物馆:《垣曲商城:1985—1986年度勘察报告》(一),科学出版社,1996年,243页,图一五七、图版八九。

② 刘士莪:《老牛坡》,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44、65页,图二三、四四。

③ 西安半坡博物馆、蓝田县文化馆:《陕西蓝田怀珍坊商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

④ 卢建国、巩启明、尚友德:《陕西耀县北村商代遗址调查记》,《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1期。

⑤ 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华县报告编写组:《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

⑥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135、296页,图83、216。

在腹甲正面或反面直接灼制,到商代二里岗上层开始出现只在腹甲反面先钻后灼,灼点似以千里路或齿纹为界,把腹甲的各部位分成几部分进行占卜,有的左右对称。

商代早期的卜用龟甲,主要分布范围是二里岗文化、大辛庄类型和东下冯类型。二里岗下层的卜甲仅见于郑州南关外遗址,其余均属于二里岗上层。

(二) 商代中期

商代中期的考古学文化从二里岗上层二期(白家庄期)开始,至殷墟第一期止,可分三期,通常称为中商文化。中商文化是在早商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分布地域较早商时期略有扩展。可分为白家庄类型、曹演庄类型、台西类型、大辛庄类型、潘庙类型、盘龙城类型、大城墩类型、北村类型和小神类型等九个地方类型。

1. 白家庄类型

白家庄类型出土卜骨的遗址有河南郑州小双桥遗址^①、郑州南顺城街青铜器窖藏坑^②、焦作府城遗址^③。

该类型发现卜骨较少,未见卜甲。卜骨牛、猪、羊肩胛骨均有发现,以牛肩胛骨为主。经过修整,有的整治较粗糙,制法均为先钻后灼,钻坑呈圆形,圆坑较小,分布密集。坑内均有明显的灼痕。卜法大致与二里岗上层一期相同,但在焦作府城遗址出土的牛、羊肩胛骨(各1件)上,钻坑较大,已经开始有变化。

2. 曹演庄类型

卜用甲骨的发现以曹演庄类型遗址居多,见于河南安阳洹北商城遗址^④、新乡李大召遗址^⑤、河北邢台曹演庄遗址^⑥、邢台东先贤遗址^⑦、邢台葛家庄遗址^⑧、邢台粮库遗址^⑨、

①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小双桥遗址的调查与试掘》,《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1985—199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248页,图九;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学文博学院考古系、南开大学历史系博物馆学专业:《1995年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南顺城街青铜器窖藏坑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8年第3期。

③ 袁广阔、秦小丽:《河南焦作府城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0年第4期。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花园庄遗址1997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10期;《1998~1999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的勘察与试掘》,《考古》2003年第5期。

⑤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 韩国河、赵海洲:《新乡李大召——仰韶文化至汉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6年,303页,图二〇七、二〇八。

⑥ 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邢台曹演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

⑦ 邢台东先贤考古队:《邢台东先贤商代遗址发掘报告》,《古代文明》(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393、414页;《河北邢台市东先贤遗址1998年的发掘》,《考古》2003年第11期。

⑧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邢台市葛家庄遗址北区1998年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11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邢台市文物管理处:《河北邢台市葛家庄遗址1999年发掘简报》,《考古》2005年第2期。

⑨ 河北省邢台市文物管理处:《邢台粮库遗址》,科学出版社,2005年,133、216、219页,图一二〇、一八七,图版一五。

磁县下七垣遗址^①、武安赵窑遗址^②、临城补要村遗址^③。

曹演庄类型发现有牛、猪、羊、鹿的肩胛骨和龟甲等,卜骨绝大多数为牛肩胛骨,极少见猪、羊和鹿肩胛骨。龟甲占比例较高,与卜骨的比例为1比3。另外,在邢台曹演庄遗址(T179)还发现1块卜用过的牛的头盖骨。

(1) 卜骨

一般卜骨不锯臼角,大都保留整个骨臼,少数则将骨臼锯掉一半,然后挖成台级状,骨脊削平。大多整治不规整,比较厚重,特别是卜骨两边较厚,从而造成钻坑深浅和钻、凿大小不一。钻坑底或圆或平,排列也无规律。多数在骨正反两面有钻灼而无凿,亦有少数钻凿灼兼施的。最早的卜骨与二里岗上层大同小异,到洹北商城早期开始发生大变化,出现许多不同类型的钻、凿、灼的组合。

依据钻、凿、灼的不同,可分为四型,A型卜骨占绝大多数,其他类型较少。下边以洹北商城为主,其他遗址不同类型为辅,简单说明该类型卜骨的钻凿灼特征及演变过程。

A型:均有圆形钻坑,无凿。钻坑直径早晚不同,因骨板的厚度不同产生了大小不一、深浅不一的现象。早期钻坑一般较小,与二里岗上层相似,但已经有钻坑较大的;晚期多数钻坑较大,坑径最大有1.4厘米。其底部有平底和圆底两种。施灼方式分两种,第一,在钻坑内施灼;第二,在钻坑旁边施灼,排列上似乎左右对贞;有的同一板上两种均有。有些遗址中出现在圆钻坑内的一侧施“猫眼状”凿槽。此外,有的圆钻坑形状变成长圆形(凿的原始形态),此类后来变成弧形(枣核形)凿槽,在右侧施灼。A型较早的卜骨特征与二里岗上层大致相同,可能代表了最早的形态。但A型也有分化,形成不同形制,中商晚期仍有不同形制的A型,其间也有早晚关系,即钻坑内施灼→圆形钻坑一侧施灼→弧形钻坑一侧施灼→钻坑内有“猫眼状”凿槽。

B型:形制较为特殊,同一片卜骨上,大部分只施钻、灼,少数则钻、凿、灼兼施。这是在A型圆钻的基础上,开始出现凿槽的结果,是过渡形态。钻凿的形状较原始,钻较扁,比凿缝略短,有的凿槽为枣核形。有钻凿的施灼于钻坑内,只有钻坑的施灼于圆钻一侧。大多数灼痕一致,靠近左边的灼在钻坑的右侧,靠近右边的灼在钻坑的左侧,几乎左右对贞。也有的无规律。

C型:多数钻、凿、灼兼施,少数于圆钻坑一侧施灼,和B型大致相同,但比B型有所进步,即多数凿钻的排列方向左右相对,左右对贞比B型更加明显。凿槽为枣核形,扁圆钻近方形。此类有些卜骨(标本WWT1JA:11)臼角开始被切去。

D型:钻、凿、灼兼施,少数在枣核形凿槽一侧施灼。枣核形凿较宽,钻凿基本上纵向排列,扁圆形钻均在一侧,即均向无肩胛骨结节(或胸侧缘)方向。虽然钻凿的排列均为

①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下七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②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文化学院:《武安赵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2年第3期。

③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河北临城县补要村遗址南区发掘简报》,待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北临城县补要村遗址北区发掘简报》,待刊。

同一个方向,但与殷墟典型卜骨的均向肩胛骨结节(或切去臼角)方向相反。洹北商城之外,未见D型。报告仅公布1件(标本T14③:8),仅残留颈侧缘一段,均朝向同一方向。若为完整的骨板,残缺的另一侧应该和这块卜骨钻凿排列相反,与B、C型卜骨一样,左右对贞。

探讨洹北商城卜骨时,已经找出各类的早晚关系,这里再加补充说明。中商时期卜骨从早到晚的演变序列应为A型→B型→C型→D型。A型较早的卜骨特征,代表了最早的形态。A型不同形制和B、C、D型之间具有早晚演变关系,即A型:圆钻坑内施灼→圆钻坑一侧施灼→钻坑内有“猫眼状”凿槽,坑内凿槽一侧施灼。A至D型:圆钻坑一侧施灼→弧形钻坑一侧施灼→弧形凿槽一侧施灼→圆钻弧形凿,钻坑内施灼,同板卜骨上均为左右对称。到殷墟时期,为同板卜骨上,钻凿排列均朝向切去臼角(颈侧缘)方向,而在左右两块肩胛骨上,左右对称。

此外,整治方式也能观察到早晚演变过程,即骨反面上部刻出凹槽的卜骨较早,骨反面上部挖成台级状的较晚;保留整个骨臼的较早,骨臼被切去一半或三分之一的较晚。一般牛肩胛骨经过整治,其特征早晚变化较明显。猪、羊(鹿)的肩胛骨多数未经整治,骨臼和骨脊保留原状。只有钻灼,其早晚特征变化不明显。

(2) 卜甲

该类型出土卜甲很多,分布范围也比较广泛。以腹甲为主,背甲极少。卜甲的整治方式和钻凿灼的组合与同时期的卜骨相比,比较精致而规律。下边以洹北商城为例,简单描述该类型卜甲的特征。

甲桥经过修整,甲桥与甲腹之间多呈锐角,呈直角或钝角极少,甲桥上多有钻坑。由于刮磨较少,卜甲较厚,故钻凿较深,有的甚至未加修整而直接钻凿。大多数卜甲反面均有钻凿灼,少数只有钻灼。凿为长方形,钻为圆(或半圆)形。根据钻凿灼的形式,将卜甲分为A、B两型,其中B型又可分为二式。绝大多数属于BⅡ式,少数为A型和BⅠ式。

A型:均有钻灼,且圆钻内有一道凿槽。卜甲反面刮磨平整,钻呈圆形圜底,坑径0.8—1.4厘米。圆钻中部有“猫眼状”凿槽,个别圆钻上施灼。

BⅠ式:均有钻凿灼,以千里路为界两侧各有三竖列。其中最外一列钻多在凿的内侧,另两列钻多在凿的外侧。钻凿的这种排列形式使得卜甲正面最外一列兆枝多朝向千里路,而另两列兆枝多背向千里路。一般个体较大,有的残长15.4厘米,宽15.8厘米。

BⅡ式:均有钻凿灼,钻凿较深,排列有序,千里路两侧各有二竖列。其中外侧一列钻多在凿的内侧,而内侧一列钻多在凿的外侧。钻凿的这种排列形式使得卜甲正面二竖列间兆枝基本相对,只有个别例外。大部分个体较小,有的长17.3厘米,宽9.8厘米。

洹北商城A型卜甲可能早于B型。BⅠ式与BⅡ式的整治方式与钻凿形态大致相同,只是龟的大小不同,而非早晚关系之差别。

特别要说明的是,该类型诸遗址中出土龟甲很多,所占比例也较高,很可能为中商时期商人中心地区。即与商王居住的地域有关。《史记·殷本纪》有“祖乙迁于邢”的记载,

邹衡先生结合曹演庄遗址等邢台一带的商代考古发现,论证了文献中的祖乙迁于邢的地望^①。从甲骨形制的特点来看,该地区的中商文化遗存,上限接近二里岗上层二期(即白家庄期)而略晚,下限早于殷墟二期。由于地域关系,带有中商卜法特征的甲骨一直延续到殷墟二、三期之间。此外,对于洹北商城的性质,有的学者认为是“河亶甲所居之相”^②,有的学者认为与“盘庚迁殷”有关^③。

3. 台西类型

台西类型出土卜用甲骨的遗址有河北藁城台西遗址^④、藁城北龙宫遗址^⑤,其中绝大多数出土于台西遗址。卜骨和卜甲的比例约为4比1。

(1) 卜骨

除1块牛的下颚骨和2块猪的肩胛骨外,绝大多数为牛肩胛骨。经过修整,未切白角,于骨白下垂直下切,骨脊刮平。钻凿灼的形态与洹北商城大同小异,也均见洹北商城的A、B、C型,中商阶段也出现了新的各种形态。

(2) 卜甲

该类型发现近100件卜甲,以背甲为主,腹甲仅背甲的一半。藁城台西遗址的卜甲均在晚期遗存中发现,早期遗存中未见。就其卜甲的整治方式和钻凿形态而言,藁城台西晚期遗存与洹北商城大同小异,均见洹北商城的BⅠ式、BⅡ式,然洹北商城A型则未见,这也正反映台西类型的卜甲出现时间较晚。经整治的腹甲较厚,甲桥与甲腹之间多呈锐角,均有钻凿灼。背甲的整治方式较独特,几乎保持整体的形状,未见锯成两半的,均钻凿灼兼施,其排列基本上采用对称方式。

4. 大辛庄类型

大辛庄类型出土卜用甲骨的遗址有山东济南大辛庄遗址^⑥、桓台唐山遗址^⑦等。从甲骨的特征来看,具有中商至晚商的特点。除桓台唐山遗址大多数的甲骨具有中商甲骨特点之外,其他遗址的甲骨大多数具有晚商甲骨的特点。本文将其他遗址的甲骨暂归于殷墟一、二期。大辛庄类型出土卜用甲骨数量较多,大多数集中于济南大辛庄遗址,少数在

① 邹衡:《论汤都郑亳及其前后的迁徙》,《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191—193页。

② 刘绪、雷兴山:《洹北花园庄遗址与河亶甲居相》,《文物世界》1999年第4期。

③ 唐际根:《中商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9年第4期。

④ 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藁城台西村的商代遗址》,《考古》1973年第5期;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台西考古队:《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6期;李学勤、唐云明:《河北藁城台西甲骨的初步考察》,《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3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87、88、143、144、145页,图版五五~五八、一〇〇~一〇一。

⑤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北龙宫商代遗址的调查》,《文物》1985年第10期。

⑥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博物馆:《1984年秋济南大辛庄遗址试掘述要》,《文物》1995年第6期;徐基:《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的初步研究》,《文物》1995年第6期;王华:《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整治技术研究》,山东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6年。

⑦ 宋艳波、燕生东:《鲁北地区商代晚期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三十五期,2007年12月。此外,该类型属商代中晚期,桓台的前埠遗址、阳信的李屋遗址、潍坊的姚官庄遗址都有发现。

桓台唐山遗址及周边遗址中发现。卜骨以牛肩胛骨为主,卜甲所占比例较高。

(1) 卜骨

卜骨骨白有的保留完整,侧面稍加锯切;有的切去一半,切割十分整齐。骨反面上部挖成台级状,骨脊削平,骨较厚的部位被削去一层。少数骨正反面钻凿灼均有,多数只有钻灼。反面钻坑多位于骨面上部,密集而规律,大小相差不大。靠近边缘较厚的位置稍大而深,中间较薄的稍小而浅,钻坑直径 0.9—1.3 厘米。骨正面钻坑位于中间下部较薄之处,钻坑较少而浅。

从钻凿灼的形制来看,大辛庄遗址中商阶段的卜骨从早到晚的演变序列应为中国圆钻(AⅡ)→大圆钻(AⅢ式)→圆钻包撮长凿(B型)→长凿(C型),与洹北商城的 A、B、C 型大致相同。桓台唐山遗址也均见洹北商城 A、B、C 型。

(2) 卜甲

该类型多为腹甲,极少见背甲。大多数个体较小,长 13 厘米,宽 8 厘米左右,属于乌龟类。大辛庄遗址中均有洹北商城 A、B 型。有些卜甲与洹北商城 A 型大同小异,具有较早的形态特征,即为“中国圆钻型”和“圆钻包撮长凿型”。多数卜甲与洹北商城 B 型相似,具有中商卜甲的典型特征,即为“长凿旁附圆钻型”和“单独的长凿型”。长凿长度相差较大,在 1.12—1.62 厘米之间;圆钻内的凿槽长度为 0.97—1.27 厘米,成组对称分布。一般中商时期卜甲以千里路为界两边各有二、三竖列,其中最外一列钻多在凿的内侧,而内侧两列钻多在凿的外侧。

此外,大辛庄遗址许多卜甲的形制,带有较原始或落后的形态特点,钻凿形态各式各样,但钻凿的排列一律和洹北商城 B 型大致相同,带有中商卜甲的特点。这可能与地方性类型有关。其年代上限为中商时期问题不大,但下限需要重新调整,此类卜骨多数相当于殷墟一、二期,极少数可能延续到殷墟三、四期。

5. 小神类型

小神类型出土卜骨的遗址有山西长治小神遗址^①、汾阳杏花村遗址^②。

该类型的卜骨均为牛肩胛骨,多为残片。经过整治,骨反面有钻灼,无凿。有的切去骨白三分之一,剩下部分保持原状,再将两边及骨脊削平、修整。钻坑深浅不一,有大有小,坑径 1—1.4 厘米。有些钻坑烧成黑色,正面可见兆纹。

6. 大城墩类型

大城墩类型出土卜骨的遗址有安徽含山大城墩遗址^③、孙家岗遗址^④。

①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晋东南工作站:《长治小常乡小神遗址》,《考古学报》1996 年第 1 期。

② 国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晋中考古》,文物出版社,1999 年,168、170 页,图 132—134。

③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含山县文物管理所:《安徽含山大城墩遗址第四次发掘报告》,《考古》1989 年第 2 期。

④ 安徽省展览、博物馆:《安徽含山县孙家岗商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77 年第 3 期。

大城墩遗址中第四期发现 2 件卜骨,系用牛大腿骨劈成两半,把内壁修治平整,先钻后灼,反面没有裂纹。含山孙家岗遗址发现 1 件卜骨,为牛肩胛骨,已残,经过整治,有明显的细小的刮削痕迹。钻凿灼兼施,骨反面残留钻坑 7 个,坑底为钝圆形,都保留有明显的灼痕。7 个钻坑有 4 个残缺不全。在两个完整钻坑的一侧留有凿槽,钻坑的背面有很细的兆纹。其形制和洹北商城 B 型相似。

7. 潘庙类型

潘庙类型甲骨仅在江苏铜山丘湾遗址^①中发现 2 件,其中卜骨 1 件,卜甲 1 件。卜骨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一段。经过整治,骨白削去一半,骨脊削平。均有钻凿灼痕,个别的只有钻、灼痕。卜甲为腹甲,个体较小,甲尾已残。甲桥经过修整,甲桥与甲腹之间呈锐角。均有钻凿灼痕,千里路两侧各有二竖列。钻凿排列有序,内板和左舌板各有 1 个;左上甲腹和右上甲腹各有 4 个,上面两行均向外,下面两行均向千里路;下甲腹稍有残缺,左下甲腹应有 5 个,右下甲腹有 6 个;甲尾则已残缺,不明,应左右对贞。其形制与洹北商城 B II 式相同。

8. 北村类型

北村类型出土卜骨的遗址有陕西西安老牛坡遗址^②、耀县北村遗址^③、礼泉朱马嘴遗址^④。

该类型仅见卜骨,未见卜甲。卜骨取材于牛、猪、羊肩胛骨,以牛肩胛骨为主,羊肩胛骨逐渐减少。少数未加整治,直接施灼;多数经过整治,有的骨白保留原状,有的骨白切去一半,骨白和两侧较厚处亦经削平。直接进行施灼的少,多数先钻后灼。钻坑呈圆形,坑径大小不等,大者约 1.3 厘米,小者约 0.4 厘米,排列无序,疏密不一。该类型的形制和洹北商城 A 型类似,但均带有较早的特征。未见洹北商城 B、C、D 型。中商时期与中原地区的占卜习俗有很大不同。仍沿用早商时期二里岗上层的因素,也稍有自己的变化。其上限年代应该为郑州二里岗上层一、二期之间,延续时间较长,下限相当于殷墟文化二、三期。

上述诸文化类型所出的卜用甲骨,代表了中商阶段甲骨的整治方式与钻凿形态,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同时期其他地区甲骨形态特征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中商时期卜用甲骨发现有牛、猪、羊、鹿的肩胛骨和龟甲等,卜骨绝大多数为牛肩胛

① 南京博物院:《江苏铜山丘湾古遗址的发掘》,《考古》1973 年第 2 期。

② 刘士莪:《老牛坡》,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100—103、158—161 页,图七四~七七、一二四~一二六,彩版一二,图版六一、八七~八九。

③ 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耀县北村遗址 1984 年发掘报告》,《考古学研究》(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年,330 页,图三九、四〇。

④ 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礼泉朱马嘴商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0 年第 5 期。

骨,少见猪、羊和鹿肩胛骨。曹演庄、台西、大辛庄类型龟甲数量较多。文化类型和聚落规模、时间早晚不同,卜用甲骨在数量、种属比例等方面存有差异。最早的卜用甲骨与二里岗上层大同小异,到洹北商城时期开始有很大的变化,出现许多不同类型的钻、凿、灼的组合。

郑州地区早商时期常见卜甲,到中商时期的白家庄类型卜骨数量不多,未见卜甲,到商代晚期前段(人民公园期)又可见卜甲。这很可能与商王迁都有关。

曹演庄类型的邢台、殷墟地区,发现卜骨和卜甲最为集中,或与其为王都所在的中心聚落有关;新乡李大召遗址、武安赵窑遗址、临城补要村遗址应为中小型聚落,但均发现卜骨和卜甲,或与其位于王畿地区有关;此外,台西类型、大辛庄类型出土甲骨很多,而且卜甲的比例很高,应是中商时期较大的中心聚落,当与商人有密切关系。具有中商典型特征的甲骨,殷墟地区沿用到殷墟一期;而邢台、济南为代表的遗址其沿用时间更长,大多数到殷墟二期或三期。此后便被典型的殷墟甲骨的整治、钻凿形态所代替。

北村类型、小神类型出土卜骨较多,但未见卜甲。这些类型很可能在二里岗上层阶段接受商人中心地区的影响很深,但从中商时期某阶段开始跟商人的交流变少。尤其是关中地区的北村类型,虽然以牛肩胛骨为主,但羊和猪的肩胛骨比例仍然较高。中原地区商代中、晚期有很大的变革,比如出现凿槽,关中地区却几乎没受到影响,但自身也有所变化。

典型的中商时期卜用甲骨,主要在豫北、冀南和山东地区的诸文化遗存中发现。周边地区则存在一些地方性占卜习俗,但多数仍沿用二里岗上层系统的占卜传统。曹演庄、台西、大辛庄类型卜甲出土很多,均有腹甲和背甲。从目前的材料来看,中商阶段开始使用背甲,各类型之间腹甲和背甲的比例不同。曹演庄、大辛庄类型以腹甲为主,背甲占极少数,且背甲均锯成两块;台西类型以背甲为主,腹甲和背甲的比例约1比2,背甲几乎保持整体的形状。

在商代中期,卜甲上钻凿灼均有。钻坑在凿槽一旁的,以千里路为界,两侧各有二、三竖列,其中最外一列兆枝多朝向千里路,而另两列兆枝多背向千里路,中、外二竖列间兆枝基本相对,当然也存在个别例外;圆钻内有“猫眼状”凿槽的,灼在凿一侧,排列也有规律。与同时期的卜骨相比,形态、排列更为典型而规范。到中商时期,卜甲的地位很可能已经超过卜骨。资料表明,龟甲占卜可能为商王与高级贵族所专用,其间或因占卜者身份、地位的不同,又造成卜用龟甲在规格上的大小差别。

(三) 商代晚期

晚商文化以殷墟遗址为代表,即殷墟第二至四期,共分三期。考虑到殷墟遗址的特殊性和完整性,本节把殷墟文化第一与二至四期放在一起统一讨论。与早、中商文化相比,晚商文化的分布大幅收缩。依据其地域差别,可分为殷墟类型、曹演庄类型、大辛庄类型、苏埠屯类型、安邱类型、前掌大类型、天湖类型和老牛坡类型。

1. 殷墟类型

卜用甲骨以殷墟类型中发现最多,且主要集中于殷墟遗址,见于大司空村^①、后冈^②、苗圃^③、小屯^④、花园庄^⑤、薛家庄^⑥、刘家庄^⑦、王裕口^⑧、四盘磨^⑨、孝民屯、北辛庄、张家坟、梅园庄、白家坟^⑩等地。殷墟以外,见于郑州人民公园遗址^⑪、郑州陈庄遗址^⑫、郑州铭功路东遗址^⑬、郑州旭畚王村遗址^⑭、孟县涧溪遗址^⑮和登封王城岗遗址^⑯。此外,在商丘坞墙遗址^⑰、杞县段岗遗址^⑱、夏邑清凉山遗址^⑲和浍池鹿寺遗址^⑳也有发现。

殷墟时期卜用材料绝大多数为牛肩胛骨和龟甲,猪、羊、鹿肩胛骨较少见,另外,还有极少数的象、马肩胛骨和人髌骨、牛肋骨等。

(1) 卜骨

殷墟第一期至二期前段,多数未切白角,保留骨白原状,将骨反面的骨白切去一半,把骨脊和两边全部削平,只有少数卜骨的骨白切去一半。钻凿灼的特点和排列与中商洹北商城者大同小异,均见洹北商城A、B、C型。正面开始出现刻字,字数不多,字体纤细。

① 马得志、周永珍、张运鹏:《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9册,1955年,7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199—202页,附表十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4~1988年安阳大司空村北地殷代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4年第4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71年安阳后冈发掘简报》,《考古》1972年第3期;《1991年安阳后冈殷墓的发掘》,《考古》1993年第10期。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199—202页,附表九;《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152、160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0~1982年安阳苗圃北地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6年第2期;《1982~1984年安阳苗圃北地殷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91年第1期。

④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一九五五年秋安阳小屯殷墟的发掘》,《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郭沫若:《安阳新出土的牛肩胛骨及其刻辞》,《考古》1972年第2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3年安阳小屯南地发掘报告》,《考古》1975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考古所安阳队资料。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队:《1986~1987年安阳花园庄南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2年第1期;《1991年安阳花园庄东地、南地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6期。

⑥ 赵霞光:《安阳市西郊的殷代文化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2期;周到、刘东亚:《1957年秋安阳高楼庄殷代遗址发掘》,《考古》1963年第4期。

⑦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1995~1996年安阳刘家庄殷代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7年第2期。

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王裕口南地殷代遗址的发掘》,《考古》2004年第5期。

⑨ 郭宝钧:《一九五〇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五册,55、56页。

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附表。

⑪ 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926、948页。

⑫ 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市陈庄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6年第2期。

⑬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铭功路东商代遗址》,《考古》2002年第9期。

⑭ 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旭畚王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

⑮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孟县涧溪遗址》,《考古》1961年第1期。

⑯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176页,图版六三。

⑰ 商丘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商丘县坞墙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2期。

⑱ 郑州大学文博学院、开封市文物工作队:《豫东杞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240页,图一五六。

⑲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丘地区文管会:《河南夏邑清凉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研究》(四),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⑳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浍池县鹿寺商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9期。

殷墟第二期(相当于殷墟甲骨文一期)及以后各期,即从武丁时期开始,典型的殷墟卜骨特征形成:削平牛肩胛骨骨脊和两侧缘较厚处,骨版削刮得很薄,多数骨臼切去一半成半月形,切去臼角,只有极少数保留骨臼原状。多数钻凿灼兼施,少数只有凿灼而无钻,或只有钻灼而无凿。卜骨正面刻字的很多,非常严密。多数凿槽为弧形或长方形,钻为圆形;少数圆钻内有“猫眼状”凿槽,凿旁有灼痕。其排列非常规律,同板卜骨的钻凿一律朝向同一方向,即朝向切去臼角(颈侧缘)的方向。由此可知左右两块肩胛骨是成组的,其排列左右对称。

(2) 卜甲

商代晚期诸文化中,殷墟类型出土的卜甲最多且集中,大多数为腹甲,少数为背甲。殷墟地区的龟甲个体明显较大,龟的种属大多数应属于花龟,少数属于乌龟。

殷墟第一期至二期前段,常见具有中商特征的卜甲,但仅见洹北商城B型,A型则未见。花园庄东地甲骨中甲桥保留较多(甲桥较宽),甲桥肩部与甲腹夹角尖锐,这些都是较早的特点。尤其是卜甲上的钻凿灼排列更为明显,在较早发表的著录中也容易找到此类甲骨,如《补编》287反(《乙编》866)。此类大多数钻凿的形态已经具有殷墟较为典型的特征,但还保留中商卜甲的钻凿排列的某些特征。

殷墟第二期及以后各期,占卜方式开始更为规范而严密,与前期或周边地区相比,整治方式有了很大的进步,钻凿排列也更加规律。边缘均经整治磨平,甲桥与甲腹之间呈直角,龟甲反面削平较多,从而使龟板较薄较平,钻凿的大小、深浅也较相同。钻凿灼兼施,凿槽多为弧形,少数为长方形;钻坑多为圆形平底。反面钻凿排列以千里路为界,两侧各有二、三竖列,钻坑在凿槽的内侧;正面的兆枝也均朝千里路,左右对称。

殷墟以外的郑州人民公园、陈庄、孟县涧溪、登封王城岗、夏邑清凉山等诸遗址,均发现卜骨和卜甲,但其数量较少。卜骨绝大多数为牛肩胛骨,极少数为猪、羊肩胛骨。整治方式、钻凿形态与殷墟甲骨大致相同,有些带有落后的特点。

殷墟类型的有些较早的卜用甲骨仍延续中商特征。如河南安阳大司空、后冈、苗圃北地、小屯南地、花园庄遗址和郑州人民公园、陈庄等遗址,均发现具有中商特征的甲骨。因此,我们可以推测中商卜骨的特征延续到殷墟早期前段,形成过渡形态。到殷墟文化第一期或二期某一个阶段开始出现殷墟典型甲骨的特征,如小屯南地卜骨和花园庄东地卜甲,虽然保留一些中商甲骨的痕迹,但位数较少,而大部分具有殷墟典型甲骨的特征,钻凿灼规整,排列尤为明显。

2. 曹演庄类型

曹演庄类型出土卜用甲骨的遗址有河北邢台东先贤遗址^①、邢台粮库遗址^②、磁县下

① 邢台东先贤考古队:《邢台东先贤商代遗址发掘报告》,《古代文明》(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393、414页;《河北邢台市东先贤遗址1998年的发掘》,《考古》2003年第11期。

② 河北省邢台市文物管理处:《邢台粮库遗址》,科学出版社,2005年。

七垣遗址^①、临城补要村遗址^②。

殷墟前期,冀南地区出土的曹演庄类型甲骨虽与安阳殷墟遗址年代相同,地域亦邻近,但该地区的甲骨仍然继续保留中商的特征,有的可能沿用到殷墟二、三期。不过,其年代具体为中商时期还是晚商时期,目前很难分开,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在中商时期描述的甲骨,其年代亦有可能晚至商代晚期。同时该类型较晚的甲骨亦受到殷墟典型甲骨的影响,如邢台粮库遗址的卜骨(ⅡH35:5),切去臼角,钻凿灼兼施,长方形凿;邢台东先贤遗址的甲骨中,有的施梭形凿(H60:1);一些腹甲反面钻凿灼兼施,凿呈弧形,钻圆形,钻凿排列大部分以千里路为界,左右各两列,钻均在凿的内侧;正面的兆枝也均向千里路,左右对称,但个体较小。

3. 大辛庄类型

大辛庄类型出土卜用甲骨的遗址有山东济南大辛庄遗址^③、禹城邢寨汪遗址^④、济阳刘台子遗址^⑤、章丘宁家埠遗址^⑥、桓台前埠遗址^⑦、阳信李屋遗址^⑧、潍坊姚官庄遗址^⑨。

殷墟前期,该类型与曹演庄类型类似,卜用甲骨继续沿用中商甲骨的特征,而且带有落后或不规则的特点,有的沿用至殷墟二期。该类型甲骨特征的变化在卜骨中不太明显,但在相当于殷墟二、三期的卜甲中较为明显,出现与殷墟典型卜甲相同的特征,即钻凿排列,以千里路为界,左右对称。

(1) 卜骨

卜骨除桓台前埠、阳信李屋遗址多采用鹿肩胛骨之外,其余遗址则以牛肩胛骨为主。潍坊姚官庄遗址出土的卜骨(0178)已经开始出现锯切臼角的现象。此外,阳信李屋遗址中卜骨常见长方形凿槽,凿旁直接施灼,排列左右对称。特征近似的卜骨也见于桓台前埠、章丘宁家埠遗址。

(2) 卜甲

商代晚期大辛庄类型出土卜甲较多,可见卜甲在该类型分布地域内普遍使用,但因公布材料不多而无法详细描述。大多数卜甲延续使用中商时期的占卜方式,然其整治方式

①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下七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②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河北临城县补要村遗址南区发掘简报》,待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北临城县补要村遗址北区发掘简报》,待刊。

③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博物馆:《1984年秋济南大辛庄遗址试掘述要》,《文物》1995年第6期;徐基:《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的初步研究》,《文物》1995年第6期;王华:《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整治技术研究》,山东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6年。

④ 德州地区文物工作队:《山东禹城县邢寨汪遗址的调查与试掘》,《考古》1983年第11期。

⑤ 德州地区文化局文物组、济阳县图书馆:《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85年第12期;王尔俊:《山东济阳刘台子出土的陶文等商代铭刻》,《考古》1989年第6期。

⑥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青高级公路章丘工段考古发掘报告集》,齐鲁书社,1993年,44页,图版捌。

⑦ 宋艳波、燕生东:《鲁北地区商代晚期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三十五期,2007年12月。

⑧ 宋艳波、燕生东:《鲁北地区商代晚期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三十五期,2007年12月。

⑨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博物馆:《山东姚官庄遗址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5),文物出版社,1981年12月,39页,图二〇九。

与钻凿形态不如中心地区典型、严格,出现许多不规则的形态。从钻凿排列的角度来看,该遗址多数卜甲和洹北商城非常类似,即以千里路为界,两侧钻凿排列,左右两侧两两对称。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的1件卜甲(03DXZT2302⑤B:1),具有殷墟最早阶段的特征,即钻凿灼均有,凿呈枣核形,钻为圆平底,钻凿排列大部分以千里路为界,两侧钻均朝千里路,左右对称,只有个别的钻朝外。个体较大,带有刻辞,有一小穿孔。桓台前埠、阳信李屋遗址出土的卜甲中常见长方形凿,尤其是桓台前埠遗址出土卜甲(J2④:1),凿长达2.0厘米,凿宽仅有0.2—0.3厘米,其排列与中商卜甲相似。这是该地区很流行的占卜特征。此外,阳信李屋遗址出土的有一些卜甲(H7:1),也出现殷墟典型卜甲的特征,即其排列以千里路为界,均朝向千里路,左右对称。

4. 前掌大类型

本类型仅在滕州前掌大遗址发现7件甲骨^①,其中卜骨6件,卜甲1件。卜骨系动物肩胛骨加工而成,报告发表的图版均显示出牛肩胛骨的特征。骨反面钻凿灼兼施,凿为弧形,钻为圆形。多数钻在凿槽的右侧,少数钻在凿槽的左侧。从卜骨的特征,尤其是钻凿灼的排列来看,此类卜骨应属于殷墟第一期或稍晚,即中商向晚商时期过渡形态的卜骨。其中一件骨反面钻凿灼兼施,仅留5个,凿为弧形,钻为圆形,朝向同一个方向。卜甲为腹甲,已残,仅留一块,反面钻凿灼兼施,凿为弧形,钻为圆形,以千里路为界,钻凿均向千里路,左右对称。

5. 老牛坡类型

老牛坡类型出土卜骨的遗址有陕西西安老牛坡遗址^②、长安羊元坊遗址^③、扶风壹(益)家堡遗址^④。

该类型发现卜骨很多,未见卜甲。卜骨中牛肩胛骨最多,但羊、猪的肩胛骨仍占一定的比例。猪、羊肩胛骨,保留骨臼原状,有的未经整治,有的在骨臼根部垂直下切,再将骨面削平;有的直接施灼,有的先钻后灼,钻呈圆形圜底,坑内有灼痕。牛肩胛骨多数将骨臼切去一半,保留臼角,削平骨脊和部分较厚边沿,将骨面整平,然后骨正反两面施钻灼。钻坑大部分为圆形圜底,坑径大小不同,深浅不等,排列无规律,在坑内施灼。

该类型中所出土的卜骨,除极少数受到殷墟文化的影响外,即骨面施凿槽,在凿旁施灼,其余均延续前期卜骨的特征而发展,具有该类型自己独特的特征。

从卜骨特征来看,老牛坡商代早期文化与郑州二里岗下层文化开始来往,到二里岗上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上、下册),文物出版社,2005年,29、462页,图二一、三二八,图版八、二〇四。

② 刘士莪:《老牛坡》,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44、65页,图二三、四四。

③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长安羊元坊商代遗址残灰坑的清理》,《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2期。

④ 扶风县博物馆、高西省:《陕西扶风县益家堡商代遗址的调查》,《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5期。

层交流频繁,故卜骨均为这个阶段的特征。洹北商城和殷墟时期相互间几乎没交流影响,各自独立性很强,具有自己方格的占卜特征。商代晚期该类型仍然使用商代早期的占卜方式,偶尔受到商代晚期中原占卜方式的影响。

殷墟时期占卜很流行,甲骨规格已经显示出等级分化,不同等级的占卜者使用甲骨的种类或大小不同。商王以及高层贵族专用个体大的龟甲,等级不高的贵族只能用个体小的龟甲。周边的济南大辛庄遗址和冀南地区诸遗址所见卜用甲骨,占卜方式主要还是以中商特征为主,少数受到殷墟的影响,但使用的龟甲个体一律不大,也反映出等级的差别。

另外,殷墟时期不同地区遗址出土的卜骨和卜甲比例各不相同,亦可能代表不同人群或不同等级。殷墟王都为中心的小屯一带出土甲骨(商王及王族的卜用甲骨)最多,分布非常集中,绝大多数为牛肩胛骨和龟甲,一般卜甲占比例很高。王都周围的诸遗址(商贵族的卜用甲骨),出土甲骨也较多,以牛肩胛骨和龟甲为主,龟甲与商王龟甲相比,所占比例不高,个体也较小,主要是卜骨。周边商系诸文化卜用甲骨均有发现,卜甲虽多见,但其个体均较小。

二、其他文化

1. 先周文化

先周文化是指周王朝建立以前以姬姓周人为主体的考古学文化。先周文化存在的时间大约相当于商代晚期,主要分布在陕西的关中西部地区和甘肃东部的泾水上游地区。由于这一地区相当于晚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比较复杂,因此有关先周文化也有众多不同意见,但总体而言至少可分为两大类,即以郑家坡遗址为代表,以联裆鬲、方格纹盆和圆肩罐为主要特征的郑家坡文化和以刘家、碾子坡遗址为代表,以高领袋足鬲、折肩罐为主要特征的刘家文化和碾子坡文化。这两类遗址中均有卜用甲骨出土,这里暂按同一类文化对待。

该文化出卜用甲骨的有陕西武功郑家坡遗址^①,武功南庙、文家台遗址^②,武功岸底遗址^③,彬县断泾遗址^④,长武碾子坡遗址^⑤,麟游蔡家河遗址^⑥、史家塬遗址^⑦,淳化赵家庄

①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武功郑家坡先周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7期。

②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关中漆木下游先周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6期。

③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武功岸底先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3期。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陕西彬县断泾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9年第1期。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陕西长武碾子坡先周文化遗址发掘记略》,《考古学集刊》第6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郊州·碾子坡》,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7年,194—197页,图一三六,彩版六,图版一二〇~一二三。

⑥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麟游县蔡家河遗址商代遗存发掘报告》,《华夏考古》2000年第1期。

⑦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麟游县史家塬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2004年第4期。

遗址^①，周原王家嘴、贺家遗址^②，长安沣西遗址^③。该地区最早的卜骨可能追溯至二里岗上层，其分布的主要空间范围，随时间早晚而有明显的变化，大致是从泾河流域逐渐转向了漆水河流域及周原地区。只见卜骨，未见卜甲^④。

除长武碾子坡遗址出土卜骨将近 300 件外，其余遗址出土数量很少，卜骨绝大多数为牛肩胛骨，仅个别为羊、马肩胛骨。从卜骨特征上看，偏早阶段仅粗略修整，骨臼保留天然状，只有钻灼，无凿，钻坑多为圆形，大小不一；偏晚阶段一般将骨臼切去一半左右，并将骨脊和两侧缘较厚处削去，柄部挖成凹槽，只有钻灼，无凿。某些遗址开始出现新的形式，如武功文家台、麟游蔡家河遗址已经有“猫眼状”凿槽；周原王家嘴、贺家遗址所出土的卜骨（H7：1、16）切去臼角，骨反面有长方形或不规则长方形凿槽。切去臼角的现象，可能是受到了殷墟卜骨的影响。

2. 李家崖文化

李家崖文化分布在朱开沟文化以南的陕晋间黄河两岸地区，年代晚于朱开沟文化，大致相当于商代晚期偏晚至西周时期。有人认为它是文献所载鬼方或玁狁的文化。该文化出土卜用甲骨有李家崖古城址^⑤、绥德薛家渠遗址^⑥。

清涧李家崖古城址发现 2 件卜骨，皆残，用动物肩胛骨制成。一件将骨臼的一半连同骨脊去掉，略加修整，有圆形钻坑。另一件也略加修整，有圆钻和椭圆形凿。该遗址的时代上限约相当于殷墟二期。绥德薛家渠遗址发现几件卜骨，多用羊肩胛骨制成。其中一件羊肩胛骨，骨脊削去，并锯掉臼角，施长方形凿，有灼无钻，凿的剖面呈 V 形。另一件羊肩胛骨，骨脊已削去，未施凿、灼。可知该文化卜骨的整治方式与钻凿形态受殷墟卜骨的影响较深。

3. 朱开沟文化

文化面貌参见夏代朱开沟文化的描述。

该文化仅在伊克昭盟朱开沟遗址第五段遗存发现卜骨^⑦，均经过整治，有灼有钻。钻坑圆而深，底平，周壁规整，兆纹清晰。

①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彬县、淳化等县商时期遗址调查》，《考古》2001 年第 9 期。

② 周原考古队：《2001 年度周原遗址（王家嘴、贺家地点）发掘简报》，《古代文明》（第 2 卷），文物出版社，2003 年。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工作队：《1997 年沣西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0 年第 2 期。

④ 凤雏出土卜甲有的可到先周，除外。详见下文甲骨文行款走向部分。

⑤ 吕智荣：《朱开沟古文化遗存与李家崖文化》，《考古与文物》1991 年第 6 期。

⑥ 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考古实习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商周研究室：《陕西绥德薛家渠遗址的试掘》，《文物》1988 年第 6 期。

⑦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朱开沟遗址》，《考古学报》1988 年第 3 期；黄蕴平：《内蒙古朱开沟遗址兽骨的鉴定和研究》，《考古学报》1996 年第 4 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博物馆：《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 年，123、124、281、418、419 页，图版三六、九〇。

4. 夏家店下层文化

文化面貌参见夏代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描述^①。

该文化出土卜骨的遗址有内蒙古赤峰大甸子遗址^②、宁城南山根遗址^③、喀喇沁旗大山前遗址^④、辽宁锦州山河营子遗址^⑤、北京昌平张营遗址^⑥。

该文化的卜骨,一般经过修整,只有钻灼,无凿。钻坑呈圆形平底,排列较密集,最多者达41个。目前已知的资料,多数卜骨的年代应属商代,但其特征与商代早期相同,而与商代中、晚期不同。

此外,还有较特殊的两种占卜方式,即宁城南山根遗址中发现用长条形骨片占卜,骨一面先钻而后灼;锦州山河营子遗址中发现用动物胫骨占卜的卜骨,在胫骨的骨腔内部进行钻坑,坑的平面近椭圆形,坑壁直竖,坑底较平,坑上存有灼痕。

5. 毛家咀类型

仅在汉阳东城垸纱帽山遗址发现数件卜甲^⑦。均为腹甲,经过整治,壳面光滑,在腹甲反面分两行圆钻,规律而整齐。钻凿灼兼施,钻为圆形圈底,坑径约2.5厘米,圆钻坑内有“猫眼状”凿槽。

6. 周梁玉桥文化

周梁玉桥文化得名于湖北沙市周梁玉桥遗址,是长江中游江陵地区的一支地方文化^⑧,年代约当商代晚期,下限或可到西周。该文化出土卜用甲骨的遗址有沙市周梁玉桥遗址^⑨、江陵荆南寺遗址^⑩。

(1) 卜骨

仅沙市周梁玉桥遗址发现1残块(T2^③:52),为牛肩胛骨,骨脊经削平,骨的正反两面均已刮削磨光。反面残存椭圆形钻坑3个,钻坑横径1.2厘米,纵径1厘米。旁施枣核

① 此处夏家店下层文化仅限商代部分。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8年,33页,图版三。

③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内蒙古喀喇沁旗大山前遗址1996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9期。

⑤ 刘谦:《锦州山河营子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6年第10期。

⑥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昌平区文化委员会:《昌平张营——燕山南麓地区早期青铜器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101页,图95,彩版15。张营遗址的文化属性学术界存在分歧,有学者认为属“围坊三期文化”,为行文方便,这里放在夏家店下层文化部分叙述。

⑦ 湖北省博物馆:《汉阳东城垸纱帽山遗址调查》,《江汉考古》1987年第3期。

⑧ 王宏:《论周梁玉桥文化》,《江汉考古》1996年第3期。

⑨ 沙市市博物馆:《湖北沙市周梁玉桥遗址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10),文物出版社,1987年;彭锦华:《沙市周梁玉桥甲骨的初步研究》,《考古》1986年第4期。

⑩ 荆州地区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江陵荆南寺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8期。该遗址文化面貌与周梁玉桥遗址文化面貌仍存在差异,因地区较近,资料较少,为行文方便,暂归于一处描述。

形凿。凿长大于钻宽,形状为尖头,小弧肩,长1.5厘米,宽0.3厘米。灼痕宽大清楚。其形制同于洹北商城D型卜骨,即洹北商城最晚一阶段的卜骨类型,但周梁玉桥的钻凿形状比较规整,特征介于洹北商城和殷墟卜骨之间,可能为过渡形态。其年代可能相当于商代晚期早段。

(2) 卜甲

该类型腹甲和背甲均有发现,以腹甲为主,个体较小。腹甲保留甲桥,背甲对剖两半,钻凿灼兼施。沙市周梁玉桥遗址的卜甲为圆形钻坑,坑径0.9—1.6厘米,圆钻坑内有“猫眼状”凿槽。荆南寺遗址的卜甲为椭圆形钻坑,坑径1—1.4厘米,钻宽0.9—1厘米。大小不一,坑底有“猫眼状”凿槽,灼痕可见。其形制与洹北商城A型卜甲大同小异。

7. 路家河文化

路家河文化分布于湖北西部以西陵峡为中心的地区,年代约相当于商代。遗址中出土有大量动物骨骼,其居民或兼营农业、渔猎和畜牧业,其中渔猎业所占比重较大^①。该文化出卜用甲骨的有湖北的宜昌路家河遗址^②、秭归何家大沟遗址^③、秭归大梁尾遗址^④、清江香炉石遗址^⑤、巴东杨家棚遗址^⑥、重庆的忠县瓦渣地遗址^⑦。

该文化以卜甲为主,卜骨极少。清江香炉石遗址的1件牛肩胛骨和秭归何家大沟遗址的卜骨,特征与郑州二里岗上层的卜骨大致相同,其年代在本地区应为最早,与商文化有密切关系。另外,在清江香炉石遗址第5层中出土的1件卜骨,为鱼的鳃盖骨,钻坑呈椭圆形,在钻内有凿槽。西周时期,该地区常见卜骨系鱼的鳃盖骨,这件时间较早,可能商代晚期已经开始使用。

宜昌路家河、巴东杨家棚、忠县瓦渣地遗址的卜甲,均有圆形钻坑。从卜甲的特征来看,这类圆形钻坑的卜甲,中原地区郑州二里岗开始出现,到洹北商城时已经消失,即这类卜甲具有郑州二里岗上层一期至洹北商城A型之间过渡形态的特征,本文暂时将之归属于中商早期的白家庄期。但由于地域关系,其使用时间可能稍晚。秭归大梁尾、清江香炉石遗址的卜甲,钻坑为椭圆形或圆形,坑内有“猫眼状”凿槽。从甲骨的钻凿形态来看,和洹北商城A型卜甲类似。其年代也大致属商代中期或稍晚。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513—516页。

② 长江水利委员会:《宜昌路家河——长江三峡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年,85页,图六三,图版二六。

③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秭归何家大沟遗址的发掘》,《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三卷),科学出版社,2006年,124页,图二一。

④ 宜昌博物馆:《秭归大梁尾遗址发掘简报》,《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一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575页,图一三,图版一四。

⑤ 湖北省清江隔河岩考古队:《湖北清江香炉石遗址的报告》,《文物》1995年第9期。

⑥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巴东杨家棚汉代遗址发掘简报》,《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二卷),科学出版社,2005年,291页,图一一。

⑦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三峡考古队、忠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忠县瓦渣地遗址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669页,图版二三。

周梁玉桥文化和路家河文化是商人退却后分别在江汉平原西部(甚至可能还包括湖南的澧水流域)和鄂西、重庆地区形成的两支地方性文化,时代下限可晚到周初。两种文化出土的甲骨与商文化有联系,但有所变化。

8. 十二桥文化

以成都十二桥遗址的发现而命名,其分布几乎遍及整个川西平原,年代大致相当于商末周初至春秋时期^①。该文化出土卜用甲骨的遗址有成都抚琴小区遗址^②、将军衙门成都军区第三招待所工地、成都指挥街遗址^③、成都方池街遗址^④、成都十二桥遗址^⑤。

商代成都地区,只见卜甲,均为腹甲,个体较小。保留甲桥,并留有龟甲弧形的整齐边缘。有的正反两面均经过修整;有的仅反面略经整治,正面则未修整,保留鳞片。只有钻灼,无凿,钻坑直径0.6—1厘米,坑底有环底形和平底形两种,钻坑分布较密集,最多者有43个。排列多密集而不规整^⑥。值得注意的是,在将军衙门成都军区第三招待所工地出土的卜甲,排列以千里路或齿缝为界,占卜者把腹甲各部位有意分成几部分,施钻灼,特征与郑州二里岗上层大致相同。

十二桥文化的年代上限被学者定为商末周初,卜甲的特征与郑州二里岗上层和洹北商城者相似,也许该文化的上限年代较商末周初更早。四个遗址的年代系列为成都抚琴小区遗址→将军衙门成都军区第三招待所工地→成都十二桥、方池街遗址。

此外,成都指挥街、横小南街遗址和金沙遗址也发现该时期的卜甲,还均未公布^⑦。

9. 寺洼文化

寺洼文化主要分布在兰州以东的甘肃省境内,并及于陕西省千水、泾水流域,年代约从晚商至西周时期。

寺洼文化的卜骨目前仅见于卓尼茈儿遗址^⑧,共8件,其中牛肩胛骨1件,羊肩胛骨7件。骨面无修治痕迹,骨脊均保持原貌,一般骨正面施灼,有的骨脊、反面也施灼。灼痕少者1个,多者达85个。其中一件羊左肩胛骨,比较完整,骨中间和前后角稍有缺失,正面施灼呈左右排列,左侧50个,右侧26个;反面施灼9个;骨脊上施灼5个,其中一侧1个,另一侧4个。正面左部灼呈小圆形,右部及反面灼呈长圆形。该遗址属于寺洼文化早期。

①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博物馆:《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2期。这里叙述相当于商末周初部分。

② 罗二虎:《成都地区卜甲的初步研究》,《考古》1988年第12期。

③ 罗二虎:《成都地区卜甲的初步研究》,《考古》1988年第12期。

④ 周尔泰:《成都市方池街古文化遗址初探》,《四川文物》2003年第1期。

⑤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十二桥遗址新一村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2)》,科学出版社,2004年,181、189页,图一〇、一八。

⑥ 罗二虎:《成都地区卜甲的初步研究》,《考古》1988年第12期。

⑦ 罗二虎:《成都地区卜甲的初步研究》,《考古》1988年第12期。

⑧ 甘南藏族自治州博物馆:《甘肃卓尼茈儿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1期。

第四节 周 代

中国历史上的周王朝始于武王灭商,止于秦灭六国,绝对年代自公元前 1046 年至前 221 年。习惯上以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东迁为界,将周代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西周王朝建立以后,以陕西关中地区和洛阳地区为统治中心,并大举分封,建立了一批同姓和异姓诸侯国。从考古发现看,西周时期王畿地区和各诸侯国文化虽有一定程度的差异,但又保持着较大共性。到了东周时期,伴随着平王东迁,王室衰微,以各地大诸侯国为代表的地方文化兴起,文化的地域差异逐渐增大。

在周王朝周边地区,还存在着一些同时期的文化。这些文化中也发现有少量卜用甲骨。

一、周 文 化

(一) 西 周

西周时期从公元前 1046—前 770 年,根据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将西周大致分为早、中、晚三期,各期包含的王世约为:早期包括武、成、康、昭,中期包括穆、共、懿、孝、夷,晚期包括厉、共和、宣、幽。

1. 西周早期

西周时期卜用甲骨在作为统治中心的关中地区和洛阳地区发现较多,一些诸侯国文化分布范围内也有少量发现。关中地区出土卜用甲骨的遗址有陕西岐山凤雏遗址^①、岐山贺家墓地^②、岐山周公庙遗址^③、长安张家坡遗址^④、武功赵家来遗址^⑤、郿县下孟遗址^⑥。河南洛阳地区出土卜用甲骨的遗址有洛阳泰山庙遗址^⑦、洛阳北窑

① 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 年第 10 期;陕西周原考古队、周原岐山文管所:《岐山凤雏村两次发现周初甲骨文》,《考古与文物》1982 年第 3 期;曹玮:《周原甲骨文》,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 年。

② 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贺家村西周墓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8),文物出版社,1983 年 12 月。

③ 徐天进:《周公庙遗址考古调查的缘起及其学术意义》,《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二十一期,2004 年 6 月。

④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张家坡西周遗址的重要发现》,《文物参考资料》1956 年第 3 期;《陕西长安沣西张家坡西周遗址的发掘》,《考古》1964 年第 9 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 年,111 页,图七〇;叶祥奎:《陕西长安沣西西周墓地出土的龟甲》,《考古》1990 年第 6 期。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武功发掘报告——泔西庄与赵家来遗址》,文物出版社,1988 年,147 页,图版七二。

⑥ 陕西省考古所泾水队:《陕西郿县下孟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0 年第 1 期。

⑦ 郭宝钧、林寿晋:《一九五二年秋季洛阳东郊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 9 册,1955 年。

遗址①、洛阳西干沟遗址②。其他地区还有河南安阳殷墟遗址③和登封王城岗遗址④、山西洪赵(今洪洞县)坊堆村遗址⑤、北京房山琉璃河燕都遗址⑥、河北邢台南小汪遗址⑦、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⑧等。有些与西周时期的诸侯国文化有关。

(1) 卜骨

西周早期卜用甲骨以牛肩胛骨与龟腹甲为主,周原地区甲骨数量较多、分布集中,卜甲比例高于卜骨,以岐山凤雏遗址(H11)为例,卜甲和卜骨的比例为98.2比1.8。诸封国遗址出土的甲骨零散,卜甲比例不高。西周早期典型的卜骨,经过修整,往往将骨脊一面连同骨臼部分削平磨光,臼角多不锯切而削平,骨臼削去近半或不切削。卜骨上的钻呈圆形,直壁平底,坑底均有“猫眼状”凿槽。卜骨上部近骨臼处一般有圆钻二至四列,每列4—6个钻,近边缘的一列可达十余个,向下延伸至卜骨中下部。有的卜骨在中下部近边缘处有五六个钻,纵向排列,与上部的钻不相联。骨扇中部基本不见钻凿,个别有一两个。钻坑内的凿槽均不在坑底正中,而是靠近卜骨边缘一侧,灼痕则在内侧,如此,可使正面的兆枝相向⑨。

西周早期,从周人中心地区的周原和洛阳地区,以至山西洪洞、河北邢台、北京房山等地出土的甲骨来看,其整治方式与钻凿形态基本相同。这似可说明周原甲骨的占卜方式,并非是当时局部地区的特殊作风,而是周代典型与普遍的占卜方式,并且,这种特征也向外扩展到其他地区。

此类现象文献记载和考古学文化也能够证明。据文献记载,周人在灭商以后,于武、成王时期大举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室;从考古学文化角度来看,具体反映就是以联裆鬲为代表的典型周文化因素在西周早期突然出现于东方诸封国⑩。

此外,西周典型的甲骨特征在西周早期前段已开始出现,但一些遗址发现的卜骨仍然保留晚商或先周甲骨的特点。如长安张家坡遗址的卜骨(H422:17),为圆钻方凿;滕州前掌大遗址的卜骨(T306③:4),骨反面只有凿灼,两地臼角均被切去。可能与殷遗民密切相关。

①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1975~1979年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的发掘》,《考古》1983年第5期;赵振华:《洛阳两周卜用甲骨的初步考察》,《考古》1985年第4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报告——1955~1960年洛阳涧滨考古发掘资料》,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99页,图版四八。

③ 肖楠:《安阳殷墟发现“易卦”卜甲》,《考古》1989年第1期。

④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183页,图版六六。

⑤ 畅文斋、顾铁符:《山西洪赵县坊堆村出土的卜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7期。

⑥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北京市文物研究所:《1995年琉璃河周代居址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6期;琉璃河考古队:《琉璃河遗址1996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6期;《北京琉璃河遗址发掘又获重大收获》,《中国文物报》1997年1月12日;雷兴山、郑文兰、王鑫:《北京琉璃河遗址新出卜骨浅识》,《中国文物报》1997年3月30日。

⑦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邢台市文物管理处:《邢台南小汪周代遗址西周遗存的发掘》,《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王宇信:《邢台南小汪西周甲骨出土的意义》,《史学月刊》1999年第1期。

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上、下册),文物出版社,2005年,45页,图三五,图版一二。

⑨ 罗西章、王均显:《周原扶风地区出土西周甲骨的初步认识》,《文物》1987年第2期。

⑩ 刘绪:《西周早期考古学文化与周初分封》,《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考古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218—221页。

(2) 卜甲

西周早期卜甲绝大多数为腹甲,背甲很少见。腹甲反面经过削平,甲首掏挖后留下半圆形的前边,所留边棱宽约0.5厘米,其内削磨平整,留下的腹甲较商代稍厚,有的甲首前边中间有一方形或圆形的浅穴。甲桥基本保留,前后尖突部分被切锯,甲桥与甲腹相连部分呈锐角,只是稍作修整,边缘削平。有的甲桥上下两端边缘钻有一小圆形透孔,孔径2毫米左右。反面兼施方钻方凿,凿呈长方形,横断面呈“V”形,较深;方钻平底而浅,方钻转角多略呈圆折,方钻大的长1.2—1.8厘米,小的长0.8—0.9厘米。凿槽长于钻坑。方钻内均有灼痕,呈圆形或椭圆形,径0.5厘米左右。钻凿排列较密集而规律,一般以千里路为界,两侧各三排,钻均在凿的内侧,左右对称,兆枝向内。

西周早期甲桥中的钻凿排列方向,较为特殊,如岐山凤雏遗址的卜甲(H11:22)、岐山周公庙遗址的卜甲[04H1(16):424]、洛阳北窑遗址的卜甲(T3H83:14+T3H90:3+T3H83:8)、安阳殷墟遗址的易卦卜甲等。左右甲桥一般仅在内侧有一列钻凿,钻在凿的外侧,背对千里路,与临近的甲腹上的凿槽两两相背。有的甲桥外侧也有一列钻凿,钻在凿的内侧,朝向千里路。甲桥内外侧兆枝相对,类似于左右对贞。虽然此类特征是西周典型的排列方式,但不是西周早期开始出现。此类特征在殷墟所出土的卜甲中也能找到,如在安阳苗圃北地遗址早期遗存出土的卜甲(84H16:4)和《殷墟文字甲编》3917片,其甲桥上的钻凿排列,与西周早期卜甲大致相同,但这类极为罕见。

西周早期卜甲上的钻凿,均为方钻方凿,与殷墟常见的弧形凿和圆形钻,截然不同。甲骨上长方形凿的例子在商代晚期殷墟类型及曹演庄类型、大辛庄类型中可见。此类可能是西周早期在卜甲上常见的方钻方凿的源头,可以溯源到殷墟一、二期。根据对这类甲骨出土单位的排比,长方形凿的卜骨首见于殷墟一、二期,而长方形凿的卜甲多稍晚。在商周之际,方钻出现,圆钻流行。到西周早期,方钻和方凿流行,成为定制。

2. 西周中晚期

本阶段出土卜用甲骨的遗址有陕西扶风齐家村遗址^①、扶风李家遗址^②、岐山贺家墓地^③、长安张家坡墓地^④、河南洛阳郑铁一段宿舍楼工地^⑤、北京房山镇江营遗址^⑥、昌平白

① 陕西西周原考古队:《扶风县齐家村西周甲骨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9期;罗西章、王均显:《周原扶风地区出土西周甲骨的初步认识》,《文物》1987年第2期;曹玮:《周原新出西周甲骨文研究》,《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4期。

② 周原考古队:《2003年秋周原遗址(IV B2区与IV B3区)的发掘》,《古代文明》(第3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

③ 陕西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贺家村西周墓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8),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12月。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叶祥奎:《陕西长安沣西西周墓地出土的龟甲》,《考古》1990年第6期。

⑤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1975~1979年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的发掘》,《考古》1983年第5期;赵振华:《1984年洛阳出土卜骨的特征与时代》,《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4期。

⑥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镇江营与塔照》,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388页;《北京文博》1997年第4期(只见图)。

浮木椁墓^①、山东济南王府遗址^②、章丘城子崖遗址^③、泗水尹家城遗址^④。

此外,在长江中下游一些遗址中也发现有卜用甲骨,主要有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⑤、固始平寨古城遗址^⑥、江苏徐州高皇庙遗址^⑦、新沂三里墩遗址^⑧。

(1) 卜骨

卜骨除几处偏僻的遗址外,均为牛肩胛骨。经过削磨整治,臼角多不切除,少数切除臼角,骨臼削去近半或不切削。骨臼下部向扇部方向掏挖呈凹形,骨脊削平,使骨的柄部和扇部的厚度相当。卜骨反面钻凿灼兼施,主要分布在反面柄部和左右边缘。钻坑呈圆形,直壁平底,坑径1.2—1.4厘米,钻坑最深0.7厘米(柄部),最浅0.2厘米(扇部),坑底壁厚0.1厘米。坑底外侧有“猫眼状”凿槽,宽0.2厘米左右,深约0.1厘米,横截面呈“V”形。凿槽旁有正圆的灼痕,均在内侧,黄褐色,径0.4—0.6厘米,正面的兆枝相向。有的正面有卜辞几处,均守兆。西周中期的卜骨几乎延续使用西周早期的占卜方式,但同时也开始出现新的形式,即以3个一组横行组成的“三联钻”为代表,西周中晚期比较流行。

周人卜骨上的钻凿形态演变过程应为如下:圆钻圜底(或平底),无凿(先周)→圆钻平底,坑内有“猫眼状”凿槽(西周早、中期)→三联钻、双联钻(西周中、晚期)。

此外,在较偏僻的地方仍然用猪、羊、鹿的肩胛骨。如房山镇江营、济南王府遗址均有牛、羊的肩胛骨;固始平寨古城遗址利用羊肩胛骨、鹿角根部、动物头盖骨为骨料;淅川下王岗遗址有猪的肩胛骨等。除房山镇江营、济南王府遗址外,皆和西周典型的卜骨形态特征差别较大。

(2) 卜甲

西周中期整治方式与西周早期大致相同。甲首反面除少数未经掏挖外,多略经掏挖,形成半圆形的前边,有的甲首前边内中间也有一小方形或圆形浅穴。左右甲桥保留较多,经过削割,有的甲桥前后两端各有一小圆穿孔。钻凿形态发生变化,基本呈方钻方凿,方凿的长度,比方钻稍长或等长。钻凿排列与西周早期大同小异,方钻在方凿的内侧,以千里路为界,左右对称,排列比较整齐。钻坑内均有灼痕,正面的兆枝均向千里路。左右甲桥内侧的钻凿,其方向与甲腹的钻凿相反,正面的兆枝也背向千里路。到西周中晚期某一

① 北京市文管处:《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考古》1976年第4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燕山出版社,1990年,49页。

②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高速公路考古报告集》(1997),科学出版社,2000年,182、183页,图五二,图版三五。

③ 李济总编:《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85—89页,图版伍拾叁。

④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研室:《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252、278页,图版九九、一〇七。

⑤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331页。

⑥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信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固始平寨古城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0年第3期。

⑦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徐州高皇庙遗址清理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

⑧ 南京博物院:《江苏新沂县三里墩古文化遗址第二次发掘简介》,《考古》1960年第7期。

阶段在卜甲上新出现方形钻坑内有“猫眼状”凿槽的形式。当从方凿的长度比方钻略长或等长的形式沿用而来。年代较早的,凿槽在钻的一侧。以千里路为界,左边的凿槽在左侧,右边的凿槽在右侧,左右对称。到西周晚期某一阶段凿槽位置发生变化,即凿槽由方形钻的一侧移至方形钻的中间,方形钻也变成长方形。此类钻凿形态沿用时间较长。

在中原地区,卜用甲骨西周中期开始逐渐减少,晚期几乎不见。但在湖北、重庆、四川等地到东周时期仍然存在。

周系卜甲上的钻凿形态演变过程大体如下:圆钻方凿,凿长于钻(先周)→方钻方凿,凿长于钻(西周早期)→方钻方凿,凿均比钻稍微长或相当(西周中期)→方钻方凿,方钻内有“猫眼状”凿槽(西周中、晚期)。

(二) 东 周

东周时期的绝对年代从公元前 770 年至公元前 221 年,其中以公元前 453 年为界^①,又可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阶段,春秋和战国又各分为早、中、晚三期。

东周时期的卜用甲骨发现较少,尤其是中心地区,仅见于洛阳东周王城遗址^②,发现 5 件卜甲,皆残,其中腹甲 2 件,背甲 3 件。其整治方式、钻凿形态与西周时期基本相同,但不甚规整,方钻内的“猫眼状”凿槽由钻的一侧逐渐移到中间位置。

二、其他文化

1. 魏营子文化

魏营子文化主要分布于大、小凌河流域,其年代大体相当于晚商至西周早期^③。该文化仅在义县向阳岭遗址第三期遗存中发现 2 件卜骨,均为牛肩胛骨^④。一件骨脊被削平,只有钻灼,无凿,正面有兆纹。另一件只有钻,无灼无凿,圆钻坑较密集。其年代约属于西周早期。

2. 夏家店上层文化

以内蒙古赤峰市夏家店遗址的发掘而得名。分布于西拉木伦河南北,向东不逾努鲁

① 史书和近世学者对春秋战国之交年代的划分主要有以下四种意见。1. 公元前 481 年,是年为鲁哀公十四年。根据是《春秋》一书绝笔于此年。2. 公元前 476(或 475)年,是年为周元王元年。根据是《史记·六国年表》,该表名为“六国年表”,实际上列有周和战国七雄的时事,表中以周元王元年为起始之年。3. 公元前 453 年,是年韩、赵、魏共灭智氏,三分其地。《左传》记事止于此年,并以智氏之丧为终。4. 公元前 403 年,是年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三家名正言顺跻于七雄之列。《资治通鉴》记事就从这一年开始。其中刘绪先生比较主张以公元前 453 年分界,本文暂采用其观点(《晋与晋文化的年代问题》,《文物世界》1993 年第 4 期)。

② 赵振华:《洛阳两周卜用甲骨的初步考察》,《考古》1985 年第 4 期。

③ 乌恩岳斯图:《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科学出版社,2007 年,94—116 页。

④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义县向阳岭青铜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十三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年,66 页,图 24;乌恩岳斯图:《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科学出版社,2007 年,101 页,图四六。

儿虎山。年代约从西周早期至春秋中期。关于其族属,有东胡和山戎两说^①。该文化出土卜用甲骨的遗址有内蒙古赤峰夏家店遗址^②、林西大井古铜矿遗址^③;辽宁宁城南山根石椁墓^④。

夏家店上层文化发现卜用甲骨很少,只有上述三处,不见卜甲。卜骨有牛、猪、羊的肩胛骨。除赤峰夏家店遗址出土的卜骨外,其余两地出土的卜骨均有钻坑,分布密集,最多者有46个。

3. 十二台营子文化

又称“凌河类型”或“十二台营子类型”。主要分布在努鲁儿虎山和医巫闾山之间的大、小凌河流域。年代相当于西周中期至战国中期^⑤。该文化仅在凌源安杖子古城址发现2件卜骨^⑥。其中一件为猪左肩胛骨,比较完整,扇部稍有缺失,残长15厘米。经过修整,骨臼切去一半,骨脊被削去,骨反面有清晰的圆钻13个。

4. 毛家咀类型

毛家咀遗址地属鄂东南地区,有学者认为毛家咀遗址的性质是殷之遗旧的遗存,是武王克商或商亡后,逃窜于此的殷王室成员的居住遗存,年代从西周时期延续至汉代^⑦。该类型出土卜用甲骨的遗址有圻春毛家咀遗址^⑧、汉阳东城垓纱帽山遗址^⑨。

圻春毛家咀遗址的卜骨和卜甲比较集中地出在探方Ⅱ9/3及其附近的几个探方中。卜骨和卜甲上都有钻凿灼,凿为枣核形,钻为不规则的半圆形。报告认为该遗址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时期,但报告提供的卜骨(牛肩胛骨)特征与晚商卜骨相似,与商人有密切关系。汉阳东城垓纱帽山遗址发现数件卜用甲骨,多数为卜甲,少数为卜骨。报告无详细描述。

从目前发现的诸考古遗址来看,鄂东地区在商代商文化势力比较强,西周早期周文化势力进入,但商文化因素可能有所保留^⑩,故甲骨具有晚商的特征。

① 乌恩岳斯图:《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科学出版社,2007年,174—223页。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内蒙古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61年第2期。

③ 王刚:《林西县大井古铜矿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年第1期。

④ 辽宁省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工作队:《宁城县南山根的石椁墓》,《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⑤ 乌恩岳斯图:《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科学出版社,2007年,224—251页。

⑥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凌源安杖子古城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6年第2期。

⑦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发掘队:《湖北圻春毛家咀西周木构建筑》,《考古》1962年第1期。

⑧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发掘队:《湖北圻春毛家咀西周木构建筑》,《考古》1962年第1期。

⑨ 湖北省博物馆:《汉阳东城垓纱帽山遗址调查》,《江汉考古》1987年第3期。

⑩ 毛家咀西周初期的居民使用殷墟文化遗风的铜器、陶器和占卜习俗,居室和食用方面又多从当地习俗。即毛家咀遗址居民的思想是殷人思想之延续,而在生活方面又一定程度地土著化了。这些居民非同一般,他们使用的是殷王室的重器。因此,毛家咀遗址的性质是殷之遗旧的遗存,是武王克商或商亡后,逃窜于此的殷王室成员的居住遗存(参考程平山:《圻春毛家咀和新屋湾西周遗存性质略析》,《江汉考古》2004年第4期)。

5. 早期楚文化

早期楚文化是指西周和春秋早期的楚文化。楚始封于熊绎,至武王之时楚大举扩张。该文化出土卜用甲骨的遗址有河南信阳孙砦遗址^①;湖北枣阳毛狗洞遗址^②、襄樊真武山遗址^③、枝江赫家洼遗址^④、宜城肖家岭遗址^⑤。

(1) 卜骨

该文化的卜骨均为牛右肩胛骨,经过修整,骨臼切去一半左右。卜骨除枣阳毛狗洞遗址的卜骨,为方凸字形的钻外,其余遗址的卜骨均为双联钻。方钻的卜骨应与西周有关,但其形状比较特别。在周文化中心地区,西周时期卜骨中未见方钻,西周中期的卜甲上有类似的钻凿形态。楚地很可能受到西周中、晚期周文化卜甲的影响。

(2) 卜甲

早期楚文化以双联钻为特征的卜甲为代表,腹甲和背甲均有。腹甲保留甲桥,背甲未锯开,用整个背甲。反面多经修整,周边挫磨平整,正面则未经加工。反面施双联钻,有的钻坑中部有小竖刻槽。排列以千里路为界,两侧各有几排钻坑,排列有一定规律。

双联钻是该文化独有的特征。一般较早的双联钻(西周晚期),钻坑直径较小,无凿槽;较晚的双联钻(春秋时期),钻坑圆形平底,钻坑较大,坑中部均有竖槽。该特征的甲骨在该文化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较流行,可能由该地区商周时期常见的圆钻或椭圆形钻内有猫眼状凿槽的形制演变而来。张昌平认为以双联钻为特征的甲骨属于早期楚文化,枣阳毛狗洞遗址的卜骨(方钻)属于曾国^⑥。

此外,襄樊真武山遗址的卜骨(H81:12)中有切去臼角的现象,是否与商移民有关,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6. 麻柳沱文化

以麻柳沱遗址的发现命名,是以花边口沿罐为主要特征的东周时期的遗存,代表的是渝东地区的一种土著文化。重庆、鄂西地区文化面貌较复杂,使得巴文化、楚文化以及诸地方文化在此交替,该地区诸文化遗址中多见用鱼鳃盖骨占卜的现象,本文为行文方便,据此特征将该地区的诸文化遗址暂归属于麻柳沱文化的范畴。该文化出土卜用甲骨的有

①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孙砦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9年第2期。

② 襄樊市博物馆:《湖北枣阳毛狗洞遗址调查》,《江汉考古》1988年第3期。

③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博物馆:《湖北襄樊真武山周代遗址》,《考古学集刊》第九集,1995年,158页,图十七。

④ 黄道华:《枝江赫家洼遗址出土西周卜骨》,《江汉考古》1992年第3期。

⑤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宜城县博物馆:《湖北宜城县肖家岭遗址的发掘》,《文物》1999年第1期。

⑥ 张昌平:《论湖北襄樊地区两周甲骨》,《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5期。

湖北沙市周梁玉桥遗址^①、江陵梅槐桥遗址^②、清江香炉石遗址^③、宜昌朱家台遗址^④、秭归鲢鱼山遗址^⑤、秭归石门嘴遗址^⑥、湖南永顺不二门遗址^⑦、重庆巫山双堰塘遗址^⑧、万州麻柳沱遗址^⑨。

(1) 卜骨

麻柳沱文化的卜骨以鱼鳃盖骨为代表,其上均有钻凿灼。钻坑多数为长方形,少数为方钻或圆形,皆有凿槽。用鱼鳃盖骨占卜的习俗只在鄂西和三峡地区流行,其他地区文化中未见类似的现象。其年代范围应当在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

该地区卜骨上的钻凿演变系列为小圆形圜底钻,无凿(商代早期)→圆形或椭圆形钻,钻坑内有“猫眼状”凿槽(商代中晚期至西周早期)→方钻(西周中、晚期)→长方形钻(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除商代早期的小圆钻在牛肩胛骨施钻外,其余均属于鱼鳃盖骨。

(2) 卜甲

该文化腹甲和背甲均有,以腹甲为主。均有钻凿灼,钻坑多为方形或长方形,坑内皆有一条形凿槽,钻的排列较整齐。

周代巴文化的占卜习俗,虽然受到西周的影响,但其甲骨特征地方色彩较浓。

该地区卜甲上的钻凿演变系列为圆形或椭圆形钻(商代中晚期至西周早期)→方钻(西周中)→长方形钻(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坑内均有“猫眼状”凿槽。

7. 十二桥文化

文化面貌请看商代十二桥文化的描述。

该文化出土卜用甲骨的遗址有四川成都青羊宫遗址^⑩、成都指挥街遗址^⑪、成都岷山饭店遗址^⑫、成都十二桥遗址^⑬、成都方池街遗址^⑭。

① 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湖北沙市周梁玉桥遗址1987年的发掘》,《考古》2004年第9期。

② 湖北荆州地区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江陵梅槐桥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9期。

③ 湖北省清江隔河岩考古队:《湖北清江香炉石遗址的报告》,《文物》1995年第9期。

④ 鄂博三峡考古队第三组:《宜昌县朱家台遗址试掘》,《江汉考古》1989年第2期。

⑤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组:《长江西陵峡考古调查与试掘》,《考古》1961年第5期。

⑥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秭归石门嘴遗址发掘》,《考古学报》2004年第4期。

⑦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自治州文物管理处:《湘西永顺不二门发掘报告》,《湖南考古(2002)》,117页,图24。

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巫山双堰塘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卷)》,科学出版社,2006年,119页,图二九。

⑨ 福建省考古队、重庆万州区文保所:《万州涪溪口遗址第三期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卷)》,科学出版社,2006年,514页,图十五。

⑩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青羊宫遗址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6年第2期。

⑪ 罗二虎:《成都地区卜甲的初步研究》,《考古》1988年第12期。

⑫ 罗二虎:《成都地区卜甲的初步研究》,《考古》1988年第12期。

⑬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十二桥遗址新一村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2)》,科学出版社,2004年,181、189页,图一〇、一八。

⑭ 周尔泰:《成都市方池街古文化遗址初探》,《四川文物》2003年第1期。

(1) 卜骨

仅在成都方池街遗址发现卜骨 1 件,系用动物肩胛骨制成,已残,残长 5 厘米,残宽 3.5 厘米,一边边缘已被磨平,是否确为卜骨,有待进一步观察^①。

(2) 卜甲

周代该地区卜甲一般正反两面都经刮削整治,修整较为精致,反面钻凿灼兼施。成都指挥街遗址的卜甲较为特殊,即先钻一个较大的、呈窝状的圆钻坑,然后再在圆钻坑中部凿一长方形槽,其年代可能为商周之际。其余诸遗址的卜甲均为长方形钻坑,钻为长方形,坑大小不一,大的长 1.6—2 厘米,宽 0.6—0.8 厘米,小的仅长 0.9 厘米,宽 0.6 厘米。坑底中部都有一条凿槽,均有灼痕,大而清晰,正面可见兆纹。

长方形钻很可能受到西周中期中原地区常见的方钻的影响,但以长方形钻底中部有一条凿槽为代表的特征,主要流行于巴蜀文化范围的诸遗址。其时间范围应为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期。

资料表明,商周时期巴蜀文化与中原有来往,其卜用甲骨的占卜习俗便受到中原地区的影响,但自己的特征也较强。该地区最早受到郑州二里岗上层的影响,开始出现卜用甲骨,龟甲个体较小,只施钻灼,无凿。而洹北商城和殷墟甲骨则对其影响甚少,到西周中、晚期,又受到中原的影响,出现了以长方形钻为代表,坑内有一条小槽的钻凿形态,但其自己的特点较强。该地区卜甲上的钻凿演变系列为圆形钻,坑底呈锅底形(商代早、中期)→圆形钻,平底形(商代中、晚期)→圆钻中部凿一长方形槽(商周之际)→长方形钻(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期)。此外,成都金沙(出土 19 件卜甲,其中最大的一件卜甲长 46.4 厘米)、横小南街遗址等地也发现了卜甲,但尚未发表。

8. 沙井文化

沙井文化以甘肃民勤县沙井遗址命名,分布于河西走廊东部,年代约当西周晚期至战国初年。该文化仅在永昌三角城与哈马墩遗址发现 4 件卜骨,均系羊肩胛骨^②。肩胛骨经过修治,占卜方式有三种:即只灼,有钻有灼,钻凿灼兼施。

另外,周代以后有些遗址中也发现有卜用甲骨,如新疆的新源七十一团一连渔塘遗址^③(唐代)、内蒙古的阿拉善左旗黑城遗址^④(元代)。本文不一一介绍。

① 报告认为该件为卜骨,但目前四川成都地区除该件外,还没有发现卜骨,该件只经过修整,均无钻凿灼,可能不是卜骨。

②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三角城与哈马墩沙井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90 年第 2 期。

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文物队:《新疆新源县七十一团一连渔塘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1 年第 3 期。

④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黑城考古发掘纪要》,《文物》1987 年第 7 期。

第五节 卜用甲骨的出土背景考察

考古遗物所在遗迹的属性不同,性质也有所不同。因此,本文将对不同遗迹所出土的卜用甲骨分别进行考察,以探讨埋藏于不同遗迹中的不同内涵。

从本文收集的材料来看(参看附录各时代卜用甲骨的统计表),新石器时代的卜用甲骨出土于灰坑^①中 54 处,房子中 2 处,墓葬中 3 处;夏代的卜用甲骨出土于灰坑中 64 处,房子中 2 处,墓葬中 1 处;商代的卜用甲骨出土于灰坑中 134 处,房子中 1 处,墓葬中 13 处;周代的卜用甲骨出土于灰坑中 55 处,房子中 1 处,墓葬中 6 处。可见从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卜用甲骨,绝大部分出土于灰坑中,在房子或墓葬中出土者极少。

一、灰 坑

新石器时代至夏代,卜骨大多零星出土于各遗址,同一灰坑中出土更为零散。商周时期各遗址出土卜用甲骨数量激增,远远超过以前各期的数量,尤其中心地区,如殷墟小屯、周原遗址等,同一灰坑中出土的数量非常多。

关于灰坑中出土的卜用甲骨情况,以往学者多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殷墟时期,以刘一曼为代表,其论述已较为充分,本文不再详述,仅择其观点如下。

刘一曼^②在董作宾、陈梦家、张国硕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殷墟甲骨埋藏情况进行了再分析。她认为殷墟甲骨,在殷代的文化层、房基、沟、墓葬填土、灰坑等各类遗迹中均有发现,以灰坑出土为主。大多数遗迹出土的甲骨属零散的小片甲骨,数量不多,还常常与生活垃圾(如陶片、木炭、兽骨、蚌壳等)共出。部分遗迹所出的甲骨属“埋藏”或“有意识的埋藏”,这种遗迹一般都是窖穴(沟仅一见),出土的甲骨以大版的为主,通常是成堆甲骨集中出土。从遗迹总体而言,这类埋藏甲骨的窖穴不多,但坑内所出的甲骨数量大,是殷墟甲骨主要的埋藏方式。如小屯北地(YH127)、小屯南地(H24、H17、H57)、花园庄东地(H3)等。殷墟迄今尚未发现有意“存储”甲骨的档案库。

关于卜用后甲骨的处置,董作宾在论述甲骨的“存储”时,提及王在外地田猎、征伐、巡守时所贞卜的卜辞,都要从外地带回殷都。另外,一些甲骨坑中包含了几个王的卜辞,这说明占卜之后甲骨应非立即丢弃^③。张国硕亦对此有专门论述,他认为商代对甲骨卜用后的处置既非“已则弃去之”,也非永久保留之。由于甲骨要多次使用、等待验证占卜

① 这里所谓灰坑,包括灰层在内,附录表亦然。

② 刘一曼:《安阳殷墟甲骨出土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97年第5期;《论殷墟甲骨的埋葬状况及相关问题》,《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③ 董作宾:《甲骨学六十年》,艺文印书馆,1965年,43、44页。

结果、在殷都之外卜用甲骨要带回殷都在宗庙附近处置等原因,卜用后的甲骨要保留一段时间,有的还要保留相当长一段时间。待一切悬念解除之后,甲骨即可零散或集中处置,其处置方式无论是刻辞卜骨或是无刻辞卜骨皆是挖坑掩埋,而并非把刻辞甲骨留作档案供后人查考利用。把甲骨瘞埋于地,有尊神和以地通神的目的^①。刘一曼在二人研究的基础上,又从甲骨的形制特征(有孔卜甲、被锯截的卜骨等)、不同阶层的人对甲骨的用后处理、无字甲骨的处理等方面进一步论证了“卜用后的甲骨要保留一段时间,有的还要保留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一观点^②。

西周时期,卜用甲骨集中出土于陕西凤雏基址和周公庙遗址。凤雏基址的卜用甲骨又集中出土于灰坑 H11、H31,年代从先周时期一直延续至西周中期,从钻凿形态来看,西周中期占绝大多数。而在刻辞甲骨中,则西周早期占绝大多数,先周时期和西周中期数量较少,这种现象或与刻辞甲骨比较重要而被长时间保留有关,亦有可能与西周早期后刻辞甲骨减少有关。周公庙遗址的卜骨集中出土于几个地点,虽数量较多,但出土于多个灰坑或地层之中,年代均不晚于西周中期。西周时期卜用甲骨的集中埋藏情况,应与殷墟时期大致相同。

此外,文献中有占卜之前把龟整治后保存在专门保管龟的库房中的记载,如《周礼·太卜》曰:“龟人主管六龟,秋天取龟,春天攻龟,各以其物入于龟室。”这种“龟室”在考古遗迹中尚未见到。

二、房 子

新石器时代至周代,房子中均有卜用甲骨出土,但数量极为零散,且报告中描述多简略不详,本文仅对齐家文化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房子中的卜骨出土状况作简单介绍。

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③在 F12“石圆圈”旁边,发现3块未经灼过的羊肩胛骨。该遗址共发现六处“石圆圈”遗迹,这些遗迹都是利用天然砾石排列而成,直径约4米左右,有的石块上面还遗有赭石粉的痕迹,可能为原始宗教的一种建筑遗存。“石圆圈”附近分布着许多墓葬,旁边有卜骨或牛羊的骨架。卜骨与“石圆圈”之间可能有一定的关系^④。

三、墓 葬

新石器时代至夏代,人们有意识地在墓葬中随葬卜骨,但数量较少。商周时期墓葬中

① 张国硕:《论商代甲骨卜用后的处置》,《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357页。

② 刘一曼:《论殷墟甲骨的埋葬状况及相关问题》,《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③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④ 王吉怀:《宗教遗存的发现和意义》,《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6期。

出土卜用甲骨的数量增多,商代中期以前,只见卜骨,商代中期以后,卜骨、卜甲均有。因新石器时代至周代出土卜用甲骨的墓葬数量总体较少,每个墓葬中卜用甲骨的出土位置、特征等又各不相同,规律性不强,故以下仅对墓葬中较为特殊的卜用甲骨的出土状况作简单介绍。

新石器时代出土卜用甲骨的墓葬仅见于齐家文化的遗址中,但该文化的绝大多数卜骨仍然在灰坑中出土,在墓葬中出土的卜骨极少,其年代可能较晚。武威县皇娘娘台遗址^①在 T7M8 内出卜骨一片,为羊肩胛骨,位于墓主人左侧股骨附近,骨臼朝向脚。甘肃永靖秦魏家遗址^②发现一件卜骨(M23:2),为羊左肩胛骨,位于高领双耳罐内。

夏代在神木新华遗址^③的一座灰坑葬(99H51)中也发现了卜骨。该灰坑所葬死者足下放置着一个完整的卜骨,卜骨上骨脊一侧有一纵列 5 个灼痕,正面一侧亦有一纵列 4 个灼痕。从其出土位置来看,当为随葬品。

商代藁城台西遗址第一、二期墓葬中出土卜骨 11 片,均用牛肩胛骨制成,除 M12、M61 各有一片残骨外,其他 9 件分别出自 M14、56、103 三座墓中,每一墓 3 件。置放位置都在二层台上,而且骨臼朝一个方向,疑当时可能是用绳捆扎在一起的。郭沫若根据《尚书·金縢》“乃卜三龟,一习吉”、《论衡》的《知实篇》及《死伪篇》“乃卜三龟,三龟皆吉”的记载,疑古人以三龟为一习,每卜用三龟(《洪范》“三人占”亦一证据),一卜不吉,则再用三龟。其用骨者当亦同然^④。后来他又根据 1971 年安阳殷墟发掘的第一号探沟内 21 件卜骨(均为牛肩胛骨)的出土状况,进一步肯定了上述论点,他认为卜骨和卜甲是以三枚为一组,一次卜用三龟或三骨,卜毕后储存^⑤。

此外,郜向平对商系墓葬中卜用甲骨的出土情况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出有卜用甲骨的墓葬等级较高,在经过鉴定的墓葬中,墓主多是壮年男性^⑥。

周代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⑦共发现 7 件卜甲,大部分被染成绿色。另外,该墓地还发现 8 件龟背甲,经过整治,但没有钻凿灼,反面多涂朱红色。M170 所出的三件背甲,两件出于椁前的头厢内,另一件出于盗洞内。M129 所出的两件背甲中,一件出自墓室东壁二层台上,保存背甲的大部,边缘经锯磨整治,反面涂朱红色。这种背甲在其他地方的一些商周墓葬中也有发现,如安阳殷墟西区的 M93、M217、M617、M700、M701 诸墓,宝鸡竹园沟 M13 等,其形制相同,背甲反面也多涂朱红色,但尚不能确定其用途,也许来源于殷商文化传统的代表某种信念的遗物^⑧。另外,扶风齐镇采集的一件卜甲(腹甲)上,在正面三角形的甲首及骨缝线处均有朱红色的涂物,反面前边中部也有相似的涂物。

①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 年第 2 期。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75 年第 2 期。

③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神木新华》,科学出版社,2005 年,234 页。

④ 郭沫若:《卜辞通纂》(别录一,何十一片),《郭沫若全集·考古编》(2),科学出版社,1983 年,586 页。

⑤ 郭沫若:《安阳新出土的牛肩胛骨及其刻辞》,《出土文物二三事》,人民出版社,1972 年,20 页。

⑥ 郜向平:《商系墓葬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年,193 页。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年,317 页,图版 189—191。

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年,317、318 页。

昌平白浮西周墓地^①在 M2、M3 中发现 100 多件卜甲,皆残,部分有刻辞。其中 M2 在人骨的左上方发现数十片残碎卜甲,既有腹甲,也有背甲。M3 在椁室内右侧中部出龟背、腹甲残块,约在百片以上。关于这三座墓的年代,有专家认为它们属于同一时代,应定在西周中期^②。

这种墓葬中随葬卜用甲骨的现象,很有可能与埋葬之前进行的占卜活动有关。根据《周礼·小宗伯》记载,埋葬之前,要先占卜以择穴,即所谓“卜葬兆”。《仪礼·士丧礼》记载,士在埋葬之前要占卜来选择幽宅、兆域和葬日,其中占卜幽宅、兆域用筮法,葬日用卜法。这样在墓葬出土的甲骨可能与《仪礼·士丧礼》所说的占卜有关,即埋葬之前占卜用过的甲骨,下葬时与明器一起放在墓葬里面。

第六节 卜用甲骨的类别与时地考察

以上主要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对中国先秦时期出土的卜用甲骨和相关考古学背景进行了梳理和描述。先秦时期各考古学文化类型极其复杂,在同一类型的文化遗存中,往往又有一定程度的差异。这是因为除了区域性的不同特征外,在时间上还会有早晚的差别。

需要指出的是,许多考古发掘报告或简报中对遗址出土的甲骨未予报道,或者仅报道其中部分甲骨;已报道的甲骨,多缺少对甲骨出土情况应有的记录和客观描述,有的对出土甲骨的时代、层位、性质说法也不一,凡此种种,都给我们的研究造成了极大困难。受此局限,目前条件下,本文无法准确地统计卜用甲骨的类别,统计数据的可靠性也会受到影响。本节要探讨的内容和数据,虽只是冰山一角,但将目前所知的材料尽量搜集整理的,以往也不多见。这样的研究结论,虽然不能与当时卜用甲骨的实际情况完全吻合,但对先秦时期卜用甲骨全面、客观的认识,还是有所裨益的。

一、各时期卜用甲骨类别的分布与变化

(一) 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只见卜骨,无卜甲。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的卜骨数量极少;到龙山文化晚期用兽类肩胛骨占卜的习俗比较流行,地域分布也较为广泛,目前所知的新石器时代卜骨绝大多数属于这个时期。

^① 北京市文管处:《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考古》1976年第4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燕山出版社,1990年,49页。

^②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燕山出版社,1990年,49页。

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受地理环境、气候等自然因素及聚落规模、结构等因素的制约,虽有交流,但不同区域诸考古学文化各自的特征仍比较明显。到龙山晚期,多数遗物虽较多地表现各文化本身的特点,但也表现出与其他文化互相交流、融合的痕迹,同样卜骨也都具有每个文化自己的特征,以及与邻近考古学文化相似或者相同的因素。此时黄河、长江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发展态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原地区以外的诸考古学文化先后衰落。这也是此时卜用甲骨习俗流行的大时代背景。

表一 新石器时代发现卜骨材料统计表^①

分 期	考古学文化(类型)	卜 骨 类 别					小计
		牛	猪	羊	鹿	种属不明	
仰韶时期	马家窑文化			2			2
	富河文化			1		1	2
	仰韶文化			1			1
龙山时期	阿善文化		3			1	4
	山东龙山文化	3					3
	后岗二期类型	12	6	1	1	5	25
	造律台类型	4				1	5
	王湾三期类型	4	3	18	2	4	31
	三里桥类型			1		1	2
	陶寺类型		5				5
	老虎山文化	2	6	3		1	12
	游邀类型	3	5	1		3	12
	客省庄二期文化			28	6	1	35
	齐家文化	2	18	52			72
小 计		30	46	108	9	18	211

据上表可知,新石器时代卜骨材料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仰韶时期(晚期)的卜骨,只在3处考古遗址中发现,均为羊肩胛骨(或有鹿肩胛骨)。龙山早期的卜骨,仅在1处考古遗址中出土,用猪的肩胛骨制成。因资料所限,我们对龙山文化早期阶段的占卜之术认识得不多。占卜习俗若是从仰韶文化晚期延续下来的,龙山早期阶段的卜骨应该也有羊肩胛骨,但已开始用猪肩胛骨进行占卜。到龙山晚期,出土卜骨的地点和数量大为增加。尤其是在龙山文化晚期晚段,占卜习俗迅速普及,

^① 报告中以“较多”、“不少”、“几件”、“一些”、“有的”等文字表示数据,凡此暂算为1件。“为主”的表示数据,按不少于50%计算。商周时期卜甲的腹甲与背甲不明的,暂归按腹甲计算。

中原和西北地区尤为流行。龙山时期晚期的卜骨,在 10 个文化类型共 51 处考古遗址中发现。开始出现牛肩胛骨,许多遗址牛、猪、羊肩胛骨兼用。卜骨的出现顺序应为羊(或鹿)肩胛骨→猪肩胛骨→牛肩胛骨。

(2) 新石器时代的卜骨中羊肩胛骨占比例最高(占 52.2%)^①,猪肩胛骨其次(占 21.8%),牛肩胛骨再次(占 14.2%),鹿肩胛骨最低(占 4.3%)。

(3) 龙山时期的卜骨除阿善文化的准格尔旗寨子塔遗址出土的卜骨外,均发现于龙山文化晚期的诸文化遗存中。卜骨材料,阿善文化和陶寺类型只见猪肩胛骨;三里桥类型只见羊肩胛骨;客省庄二期文化见羊、鹿肩胛骨;老虎山文化和游邀类型(以猪肩胛骨为主)、王湾三期类型和齐家文化(以羊肩胛骨为主)、后岗二期类型(以牛肩胛骨为主)均兼用牛、猪、羊的肩胛骨;山东龙山文化和造律台类型只见牛肩胛骨。

(4) 从出土卜骨材料的地理空间分布来看,北部内蒙古和山西地区主要以猪肩胛骨为主;西部陕西和甘肃地区以羊肩胛骨为主;东部山东地区以牛肩胛骨为主,而且出现时间最晚;中部河南和冀南地区则兼用牛、猪、羊的肩胛骨,其中靠近西部的王湾三期类型羊肩胛骨多见,靠近北部的后岗二期类型猪肩胛骨多见,靠近东部的造律台类型牛肩胛骨为主。

(5) 从出土数量来看,齐家文化最多(占 34%),客省庄二期文化其次(占 16.6%),王湾三期类型再其次(占 14.7%),后岗二期类型又其次(占 11.8%)。典型(山东)龙山文化则只占 1.4%,均为牛肩胛骨,与该地区接受占卜习俗较晚有关。

(二) 夏 代

夏代各个文化遗址只见卜骨,未见卜甲。夏代与龙山时期相比,卜骨数量大大增加,尤其晚期占卜习俗更为流行,地域分布较广泛。各文化之间互相交流更频繁,诸文化都常见牛、猪、羊肩胛骨。但每个地区各文化之间,仍然保留自己的特征。

表二 夏代发现卜骨材料统计表

考古学文化(类型)		卜 骨 类 别						小计
		牛	猪	羊	鹿	其他	种属不明	
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类型	31	31	37	2		55	156
	东下冯类型	11	80	26	1		14	132
	牛角岗类型			1				1
	下王岗类型		1	1	1		2	5
游邀类型		6	22	5				33

^① 齐家文化出土的卜骨(共有 72 件)中,部分卜骨应属于夏代,因此新石器时代羊肩胛骨的比例可能要低于该数据,但仍然占主导地位。

续表

考古学文化(类型)	卜 骨 类 别						小计
	牛	猪	羊	鹿	其他	种属不明	
新华文化	18	3	10	1		13	45
朱开沟文化	3	1	1	4	熊 1		10
岳石文化	4	7	4	7		2	24
先商文化	16	4	3		龟 1	11	35
斗鸡台文化	1		10	1		18	30
夏家店下层文化	4	3	3	1	肋骨 2	5	18
齐家文化	2	1	1				4
四坝文化		2	1			1	4
小 计	96	155	103	18	4	121	497

由上表所知,夏代的卜骨材料具有以下特点:

- (1) 与新石器时代相比夏代卜骨的总数增加了 286 件(1.36 倍),牛肩胛骨增加 66 件(2.2 倍),猪肩胛骨增加 109 件(2.37 倍),羊肩胛骨减少 5 件(-0.05),鹿肩胛骨增加 9 件(1 倍)。
- (2) 夏代的卜骨中猪肩胛骨的比例最高(占 31.2%),羊肩胛骨其次(占 20.7%),牛肩胛骨再次(占 19.3%),鹿肩胛骨最低(占 3.6%)。夏代猪肩胛骨代替了羊肩胛骨居于首位。但齐家文化中部分羊肩胛骨应属于夏代,这样羊肩胛骨可能与猪肩胛骨数量差不多,形成猪、羊肩胛骨均占优势的情况。
- (3) 除个别文化类型外,大部分文化类型均出现牛肩胛骨,且牛、猪、羊肩胛骨兼用。
- (4) 从出土卜骨材料的地理空间分布来看,内蒙古、陕北地区的新华文化和朱开沟文化主要以牛肩胛骨为主;山西地区的东下冯类型和游邀类型以猪肩胛骨为主,应是对本地区前一阶段卜骨传统的延续;东北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牛、猪、羊肩胛骨的比例大致相当;安徽的斗鸡台文化以羊肩胛骨为主;中原地区兼用牛、猪、羊肩胛骨,二里头类型牛、猪、羊肩胛骨的比例相当;岳石文化猪、鹿肩胛骨比例高;先商文化牛肩胛骨比例最高。各地区文化类型仍然保持较强的地方性特征。
- (5) 从出土数量来看,二里头文化最多(占 59.2%:二里头类型占 31.4%,东下冯类型占 26.6%),新华文化其次(占 9.1%),先商文化、游邀类型、斗鸡台文化再次(占 6%—7%),其余较少。可见夏代已经开始出现卜用甲骨集中出于中原中心地区的现象。
- (6) 朱开沟文化和岳石文化出土鹿肩胛骨较多。朱开沟文化还发现熊的肩胛骨。这些文化出土的鹿、熊的肩胛骨,可能与狩猎活动有关。
- (7) 先商文化中已经开始出现卜甲,其年代属先商至商代早期之间。

(8) 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发现 2 件肋骨,其现象较为特殊^①。

(三) 商 代

目前所知,新石器时代至夏代各个文化遗址中只见卜骨,未见卜甲。目前最早的卜用龟甲发现于南关外遗址中,属先商与早商之际。在商周时期,牛肩胛骨和龟腹甲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表三 商代发现甲骨材料统计表

考古学文化 (类型)		甲 骨 类 别								小计 甲/骨
		卜 甲		卜 骨					其他 骨骼	
早 商	二里岗文化	54	2	90	22	41	2	137	长骨 2	56/292
	琉璃阁类型			21	5	1	1	15		0/43
	台西类型			1	1					0/2
	大辛庄类型	4		16		1	2	1		4/20
	东下冯类型	1		47	29	10		6		1/92
	北村类型			14		4	1	24		0/43
	盘龙城类型			2						0/2
中 商	白家庄类型	1		5	2	1		3		1/11
	曹演庄类型	50	9	191	2	6	2	8	头盖骨 1	59/209
	台西类型	32	60	412	2				下颞骨 1	92/414
	大辛庄类型	681	13	310	1	1	1		头盖骨 4	694/313
	小神类型			15						0/15
	大城墩类型			1					大腿骨 2	0/1
	潘庙类型	1		1						1/1
晚 商	北村类型			69	5	7		5		0/86
	殷墟类型②	146 786	5 067	151 001	3	3	3		马 1,髌骨 7	151 853/ 151 010
	曹演庄类型	31		57		1		2		31/60
	大辛庄类型	12	1	13			12	12		13/37
	前掌大类型	1		2				4		1/6
	老牛坡类型			28	1	4		84		0/117

① 这种现象在商代较为常见,很可能属于商代。

② 殷墟小屯遗址没有具体的数据,推测出土甲骨约 30 多万,以腹甲和牛肩胛骨为主。本文将卜甲和卜骨对半平分,供参考,人为因素较强,对了解商代卜用甲骨的情况有一定的影响。

续表

考古学文化 (类型)		甲 骨 类 别							小计 甲/骨	
		卜 甲		卜 骨				其他 骨骼		
		腹甲	背甲	牛	猪	羊	鹿			种属不明
其 他	先周文化			239		1		84	马 1,肢骨 1	0/324
	李家崖文化					2		2		0/4
	朱开沟文化			1			1			0/2
	夏家店下层文化			1			1	11		0/13
	毛家咀类型	1								1/0
	周梁玉桥类型	8	3	1						11/1
	路家河文化	28	1	1	1			2	鱼鳃盖骨 1	29/4
	十二桥文化	20								20/0
寺洼文化			1		7				0/8	
小计		147 711	5 156	152 540	74	90	26	400	胛 2/ 骨 18/鱼 1	152 867/ 153 130

据上表可知,商代的卜用甲骨材料具有以下特点:

- (1) 与夏代相比商代卜骨的总数增加 152 633 件(307. 11 倍),牛肩胛骨增加 152 444 件(1 587. 96 倍),猪肩胛骨减少 81 件(-0. 52 倍),羊肩胛骨减少 13 件(-0. 13 倍),鹿肩胛骨增加 9 件(0. 44 倍)。新出现卜甲 152 867 件,其中腹甲 147 711 件,背甲 5 156 件。
- (2) 商代的卜骨中牛肩胛骨的比例最高(占 99. 62%),羊肩胛骨其次(占 0. 06%),猪肩胛骨再次(占 0. 05%),鹿肩胛骨最低(占 0. 02%)。商代牛肩胛骨远多于猪、羊肩胛骨而居于首位。
- (3) 卜甲和卜骨的比例大致相同,即 1 比 1. 002。卜甲中腹甲和背甲的比例为 28. 65 比 1,腹甲占主导地位。
- (4) 商代早期延续夏代的作风,牛、猪、羊肩胛骨兼用,牛肩胛骨比例大大增加;龟甲比重还较低。商代中期龟甲和牛肩胛骨比重占绝大部分,其余明显减少。商代晚期以殷墟类型为主,龟甲和牛肩胛骨的数量大量增加,占主导地位。
- (5) 商代卜用甲骨集中出土于中心地区。即商代早期的郑州二里岗、东下冯类型,中期的曹演庄、台西、大辛庄类型,晚期的殷墟类型、先周文化,都占绝大部分。
- (6) 除商文化中心地区外,出土卜甲的文化类型较少,且数量不多,主要在与商文化有关的类型及湖北、重庆、四川地区中常见。其他地区,如西北和北方地区的北村类型、先周文化、李家崖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等一律不见卜甲。这种地区分布差异,或与自然环境有关。
- (7) 从目前所出土的卜用甲骨特征来看,商文化的甲骨,在商代早期分布范围最广

泛;中期范围变小;晚期基本以殷墟为主,其他地区,仍然延用早期或中期甲骨的特征。这可能与商人的势力范围在逐渐收缩有关。在晚商时期,也可能与等级制更严密有关,即只有最高身份的人才能使用,使用的类别、数量、大小也有规定。

(8) 殷墟类型和先周文化出土马肩胛骨。许多文化类型出现用其他骨骼占卜的现象,相关的内容,下文有较详细的论证。

(四) 周 代

周代以牛肩胛骨和龟腹甲为主,与商代晚期大同小异。周代出土的卜用甲骨集中于西周早期,中期以后开始逐渐衰落。

表四 周代发现甲骨的材料统计表

考古学文化 (类型)		甲 骨 类 别								小计 甲/骨
		卜 甲		卜 骨					其他 骨骼	
				腹甲	背甲	牛	猪	羊		
西周	早 期	17 229	10	368				3	鳖 5/ 肢骨 1	17 239/ 371
	中晚期	133	10	44	1	4		47		143/96
东 周		2	3							5/0
其他	魏营子文化			2						0/2
	夏家店上层文化			1	1	1		4		0/7
	十二台营子文化				1			1		0/2
	毛家咀类型	6		1				2		6/3
	早期楚文化	10	3	5						13/5
	麻柳沱文化	26	3						鱼鳃 盖骨 37	29/0
	早期蜀文化	28						1		28/1
	沙井文化					4				0/4
小 计		17 434	29	421	3	9	0	58	鳖 5/ 骨 1/鱼 37	17 463/ 491

由上表所知,周代的甲骨材料具有以下特点:

(1) 与商代相比周代卜骨的总数减少 152 639 件(99.68%),其中牛肩胛骨减少 151 382 件(99.24%),猪、羊肩胛骨很少见,鹿肩胛骨未见。卜甲减少 135 404 件(88.6%),其中腹甲减少 130 277 件(88.2%),背甲减少 5 127 件(99.4%)。这表明周代占卜习俗逐渐衰落,西周中期后,为数甚少。

(2) 周代卜骨以牛肩胛骨比例占绝大多数(占 85.75%),其余很少见。

(3) 卜甲和卜骨的比例相差较大,即 35.57 比 1,此现象与周原遗址出土龟甲较多有关,其他地区则没有那么大的差距。腹甲和背甲的比例,为 601.17 比 1,腹甲占主导地位。

(4) 周代中心地区的凤雏遗址、周公庙遗址出土甲骨最多,较为集中(占 97.5%)。

(5) 北方和东北地区的诸文化,仍未见卜甲。湖北、重庆和四川地区多见卜甲,四川地区未见卜骨。

(6) 长安张家坡遗址中用鳖占卜的 5 件,麻柳沱文化中用鱼鳃盖骨占卜较多见。相关的讨论见下文。

二、卜用甲骨类别的时、地考察

有些考古报告正文后附有对出土龟甲、兽骨种属鉴定的研究报告,其中不少涉及卜用甲骨,如泰安大汶口^①、伊克昭盟朱开沟^②、藁城台西^③、殷墟花园庄东地^④、长安张家坡^⑤等遗址的动物骨骼鉴定。卜用甲骨的用料以兽类肩胛骨和龟甲为主,个别使用其他动物骨骼、鳖等。诸报告指出牛肩胛骨主要为黄牛、圣水牛两类;龟甲则主要为乌龟(个体较小)、花龟(个体明显较大)两类。以下分兽类肩胛骨和龟甲简单描述如下:

(一) 卜骨类别及其时、地考察

1. 肩胛骨

先秦时期卜骨常用牛、猪、羊及鹿等兽类的肩胛骨。一般诸文化类型牛、猪、羊肩胛骨兼用,但不同时期、不同文化常用的材料大不相同(图一)。目前材料表明,常见的有以下 4 种。

(1) 牛肩胛骨

牛肩胛骨最早出现于龙山晚期,新石器时代共发现 30 件,但在卜骨中比例并不高(占 14.2%)。诸文化类型中后岗二期类型最多见(12 件,占新石器时代牛肩胛骨的 40%),山东龙山文化、造律台类型、王湾三期类型、老虎山文化、游邀类型、齐家文化中也各有 2—4 件。夏代共发现 96 件,比新石器时代增加较多,但在卜骨中比例仍然位于第三位(占 19.3%)。除个别文化类型外,许多文化都有发现,夏代晚期数量更多。新华文化、朱

① 山东省文物管理所、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 年;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邹县野店》,文物出版社,1985 年。

②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博物馆:《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 年。

③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南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 年,181—192 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年,1765—1769 页。

⑤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沔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 年;叶祥奎:《陕西长安沔西周墓地出土的龟甲》,《考古》1990 年第 6 期。

开沟文化、先商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居于首位;二里头文化、游邀类型占第二。商代共发现 152 540 件,比夏代增加非常多,在卜骨中占主导地位(占 99.62%),已经代替猪、羊肩胛骨占据首位。周代共发现 421 件,虽然与商代相比减少很多,但其比例仍然占绝大多数(占 85.58%),其余兽类肩胛骨很少见。

(2) 猪肩胛骨

猪肩胛骨最早出现于龙山早期,新石器时代共发现 46 件,在新石器时代卜骨比例中占第二(占 21.8%)。阿善文化、老虎山文化、游邀类型、陶寺类型中居于首位;后岗二期类型、王湾三期类型和齐家文化也较多见。夏代共发现 155 件,与新石器时代相比增加较多,在夏代卜骨中占比例最高(占 31.2%)。东下冯类型、游邀类型、岳石文化居于首位,二里头类型、先商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占第二。商代共发现 74 件,与夏代相比减少较多,所占比例不高(占 0.05%)。商代早期的二里岗文化、东下冯类型中较多见,其余很少见。周代仅有 3 件,周代中心地区已经消失,个别边远地区中偶然发现。

(3) 羊肩胛骨

羊肩胛骨在所有的卜骨中出现最早,始见于仰韶文化晚期,马家窑文化、富河文化、仰韶文化中,共发现 4 件。

整个新石器时代共发现 108 件,在卜骨中所占比例最高(占 52.2%),客省庄二期文化、齐家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居于首位,其余较少见。夏代共发现 103 件,与新石器时代差不多,在卜骨中占第二(占 20.7%)。二里头类型、斗鸡台文化居于首位;东下冯类型、新华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占第二,齐家文化也应该以羊肩胛骨为主。商代共发现 90 件(占 0.06%),其主导地位已经被牛肩胛骨代替。二里岗文化、东下冯类型、曹演庄类型、北村类型、老牛坡类型、李家崖文化、寺洼文化中常见,其余文化类型很少见。周代共发现 9 件,见于山东济南王府遗址^①、甘肃永昌角城与哈马墩遗址^②中,其余遗址中已经基本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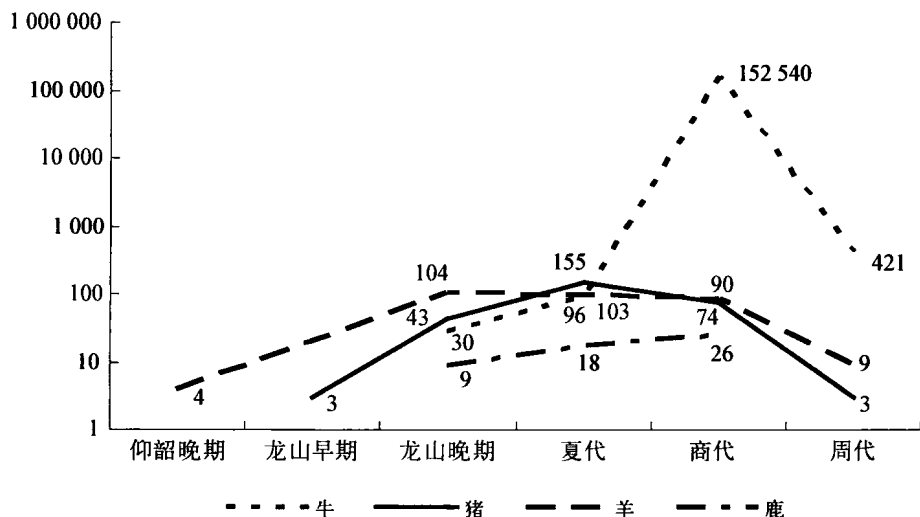
(4) 鹿肩胛骨

龙山晚期 3 处文化遗址中共发现 9 件,其中客省庄二期文化比例最高(6 件),王湾三期类型其次(2 件),后岗二期类型最低(1 件)。最早出现可能在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③,其年代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报告说“发现了一些卜骨,系利用鹿或羊的肩胛骨”,但报告公布的 1 件卜骨(H3:24),应为羊右肩胛骨。关于鹿肩胛骨的问题,目前无法详细探讨。其在新石器时代卜骨中占比例最低(占 4.3%)。夏代共发现 18 件,比新石器时代增加 1 倍,但在卜骨中所占比例仍然最低(占 3.6%)。岳石文化、朱开沟文化中居于首位,其余文化类型中零星发现。商代共发现 26 件(占 0.02%),比夏代稍微增加,主要出土于大辛庄类型(占 57.7%)。周代未发现。

①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高速公路考古报告集(1997)》,科学出版社,2000 年。

②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三角城与哈马墩沙井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90 年第 2 期。

③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4 年第 1 期。



图一 先秦时期常用肩胛骨的演变过程

(5) 其他肩胛骨

除常见的牛、猪、羊和鹿肩胛骨外,还有以下几种兽类的肩胛骨,但仅个别见到。如伊克昭盟朱开沟遗址出土熊肩胛骨1件(标本H2024:1)^①,殷墟小屯东南遗址^②的卜骨(有字)和长武碾子坡遗址^③出土的卜骨为马肩胛骨等。此外,有人说在殷墟地区出土象肩胛骨,但存在争议。

2. 其他骨骼

先秦时期卜用甲骨绝大多数用动物的肩胛骨。但商周时期一些遗址中还有以动物的其他骨骼用作卜骨的,如兽类头盖骨、下颚骨、长骨、肋骨、肢骨、鹿角跟部、髌骨(系骨盆部)和鱼的鳃盖骨等。这类卜骨的数量极少,不是主要占卜材料。值得关注的有以下三点:

(1) 占卜使用动物头盖骨的,有济南大辛庄遗址^④、邢台曹演庄遗址^⑤、固始平寨古城遗址^⑥等3处;使用兽类肢骨的,有长武碾子坡遗址^⑦、蔚县庄窠遗址^⑧、长安张家坡

① 黄蕴平:《内蒙古朱开沟遗址兽骨的鉴定和研究》,《考古学报》1996年第4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博物馆:《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123页。

②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一九五五年秋安阳小屯殷墟的发掘》,《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陕西长武碾子坡先周文化遗址发掘记略》,《考古学集刊》第6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134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邠州·碾子坡》,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7年,195页。

④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博物馆:《1984年秋济南大辛庄遗址试掘述要》,《文物》1995年第6期;王华:《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攻治技术研究》,山东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6年。

⑤ 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邢台曹演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

⑥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信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固始平寨古城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0年第3期。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陕西长武碾子坡先周文化遗址发掘记略》,《考古学集刊》第6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134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邠州·碾子坡》,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7年,195页。

⑧ 张家口考古队:《蔚县夏商时期考古的主要收获》,《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1期。

遗址^①等3处。除动物肩胛骨外,这是使用频率较高、数量也较多的骨骼。

(2) 发现以哺乳动物其他骨骼占卜的遗址有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锦州山河营子遗址^②(胫骨,3件)、宁城南山根遗址^③(长条形骨片,6件)、赤峰蜘蛛山遗址^④(肋骨,1件)、蔚县庄窠遗址(用动物肢骨制成的骨片)等4处,数量较多,其中2处的卜骨为长条形骨片。此类似流行于北方地区。

(3) 发现以鱼鳃盖骨占卜的遗址有清江香炉石遗址^⑤(20件)、宜昌朱家台遗址^⑥(2件)、秭归石门嘴遗址^⑦(15件)、万州麻柳沱遗址^⑧(1件)。数量较多。可知用鱼鳃盖骨占卜的习俗只在鄂西和三峡地区流行,其他地区未见类似现象。其年代范围应当在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应与巴文化渔猎相关。

表五 其他卜用骨骼统计表

动物类别	卜骨类别	文化类型	遗 址	数量	备 注
兽 类	头盖骨	大辛庄类型	济南大辛庄遗址	4	
		曹演庄类型	邢台曹演庄遗址	1	牛的头盖骨
		西 周	固始平寨古城遗址	2	西周中晚期
	下颞骨	台西类型	藁城台西遗址	1	
	长 骨	二里岗文化	柘城孟庄遗址	2	
	髌 骨	殷墟类型	安阳苗圃北地遗址	1	
	胫 骨	夏家店下层	锦州山河营子遗址	3	
	骨 片		宁城南山根遗址	6	长条形
	肋 骨		赤峰蜘蛛山遗址	1	
			蔚县庄窠遗址	有	成为骨片
	肢 骨	先周文化	长武碾子坡遗址	有	
		西 周	长安张家坡遗址	1	西周中晚期
	大腿骨	大城墩类型	大城墩遗址	1	骨劈成两半
	鹿 角	西 周	固始平寨古城遗址	1	西周中晚期,跟部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工作队:《1997年沣西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0年第2期。

② 刘谦:《锦州山河营子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6年第10期。

③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蜘蛛山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⑤ 湖北省清江隔河岩考古队:《湖北清江香炉石遗址的报告》,《文物》1995年第9期。

⑥ 鄂博三峡考古队第三组:《宜昌县朱家台遗址试掘》,《江汉考古》1989年第2期。

⑦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秭归石门嘴遗址发掘》,《考古学报》2004年第4期。

⑧ 福建省考古队、重庆万州区文保所:《万州涪溪口遗址第三期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卷)》,科学出版社,2006年,514页,图十五。

续表

动物类别	卜骨类别	文化类型	遗 址	数量	备 注
人	髌 骨	殷墟类型	安阳苗圃北地遗址	6	
鱼	鳃盖骨	麻柳沱文化	清江香炉石遗址	20	
			宜昌朱家台遗址	2	
			秭归石门嘴遗址	15	
			万州麻柳沱遗址	1	属中华鲟类
小 计				70	

此外,较早的有字甲骨著录中也有用肩胛骨以外的骨料,如牛头刻辞(《甲编》3939)、鹿头刻辞(《甲编》3940、3941,《合》36534、37743)、虎骨刻辞(《合》37848)、肋骨刻辞(《补》11299、11300、11301)、骨栖刻辞(《佚》427、518)、骨简刻辞(《双》212)。

(二) 卜甲类别及其时、地考察

1. 商代

目前卜甲材料表明,最早的卜用龟甲是在郑州南关外遗址的下层遗存(南关外期)中发现^①,年代应早于郑州商代二里岗下层,属于商代早期或先商文化。郑州二里岗文化中的卜甲绝大多数也在郑州南关外遗址中发现,但二里岗下层一期时未发现,二里岗下层二期发现 10 件卜甲,个体均较小。二里岗上层一期发现 37 件卜甲,龟甲个体比二里岗下层明显变大。有的残长 21.5 厘米,中宽 14.5 厘米。

商代早期共发现 61 件卜甲,其中腹甲 59 件,背甲 2 件,但 2 件背甲未发现占卜痕迹,尚不能确认是否为卜甲^②。主要见于二里岗文化(56 件)、大辛庄类型(4 件)和东下冯类型(1 件)中,分布范围较小。二里岗下层的卜甲仅见于郑州南关外遗址,且属下层二期。其余均属于二里岗上层。

商代中期共发现 847 件,其中腹甲 765 件,背甲 82 件。其中大辛庄类型数量最多(694 件,占 81.9%)^③,台西类型其次(92 件,占 10.7%),曹演庄类型再次(59 件,占 6.96%),其余文化类型几乎不见。曹演庄类型和大辛庄类型以腹甲为主,台西类型以背甲为主。

① 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 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 年,136 页,图八五,图版二七;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南关外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3 年第 1 期。
② 目前,商代早期仅发现 2 件背甲,如郑州南关外遗址的背甲(标本 C5H51:1)无灼痕;柘城孟庄遗址也发现 1 件背甲,但报告没有提供详细信息。此外,济南大辛庄遗址也有背甲,但该遗址的甲骨还没有分期,是否属于商代早期,无法考证。商代早期的背甲暂无法确定,等待更多资料的发现。
③ 该类型的卜甲中,部分卜甲应属于商代早期或晚期。

商代晚期共发现 151 898 件,其中腹甲 146 830 件,背甲 5 068 件,以腹甲为主。绝大多数集中于殷墟类型(151 853 件,占 99.97%),曹演庄类型和大辛庄类型也有发现。殷墟地区的龟甲个体明显较大,龟的种属大多数应属于花龟,少数属于乌龟。其余文化类型几乎个体较小,应属于乌龟。

其他地区主要在湖北、重庆和四川地区的周梁玉桥类型(8 件)、毛家咀类型(1 件)、路家河文化(28 件)、十二桥文化(20 件)中发现。从卜甲的钻凿形态等方面来看,这些卜甲最早在商代二里岗上层时期出现,晚商时期较为流行,与中原的商文化有密切关系。西北、北方地区均未发现卜甲。

2. 周代

西周早期共发现 17 239 件,其中腹甲 17 229 件,背甲 10 件,腹甲占主导地位。西周早期卜甲中绝大多数在陕西岐山凤雏遗址和周公庙遗址中发现。在陕西长安张家坡遗址、河南洛阳北窑遗址、北京房山琉璃河燕都遗址中也较多见。

西周中晚期共发现 143 件,其中腹甲 133 件,背甲 10 件。北京昌平白浮木椁墓最多(110 件),陕西扶风齐家村遗址其次(16 件),陕西长安张家坡墓地最少(9 件)。

东周时期仅在河南洛阳东周王城遗址中发现 5 件卜甲,其中腹甲 2 件,背甲 3 件。表明西周中期后占卜习俗逐渐衰落。

其他地区与商代类似,主要在湖北、重庆和四川地区的毛家咀类型(6 件)、早期楚文化(13 件)、麻柳沱文化(23 件)、十二桥文化(28 件)中发现。北方和东北地区的诸文化类型,仍未见卜甲。

此外,成都方池街遗址^①(1 件)、长安张家坡遗址^②(5 片是鳖的腹甲)两处遗址中出土鳖甲。

商周时期各文化类型出土卜甲数量统计可见下图(图二)。

三、小 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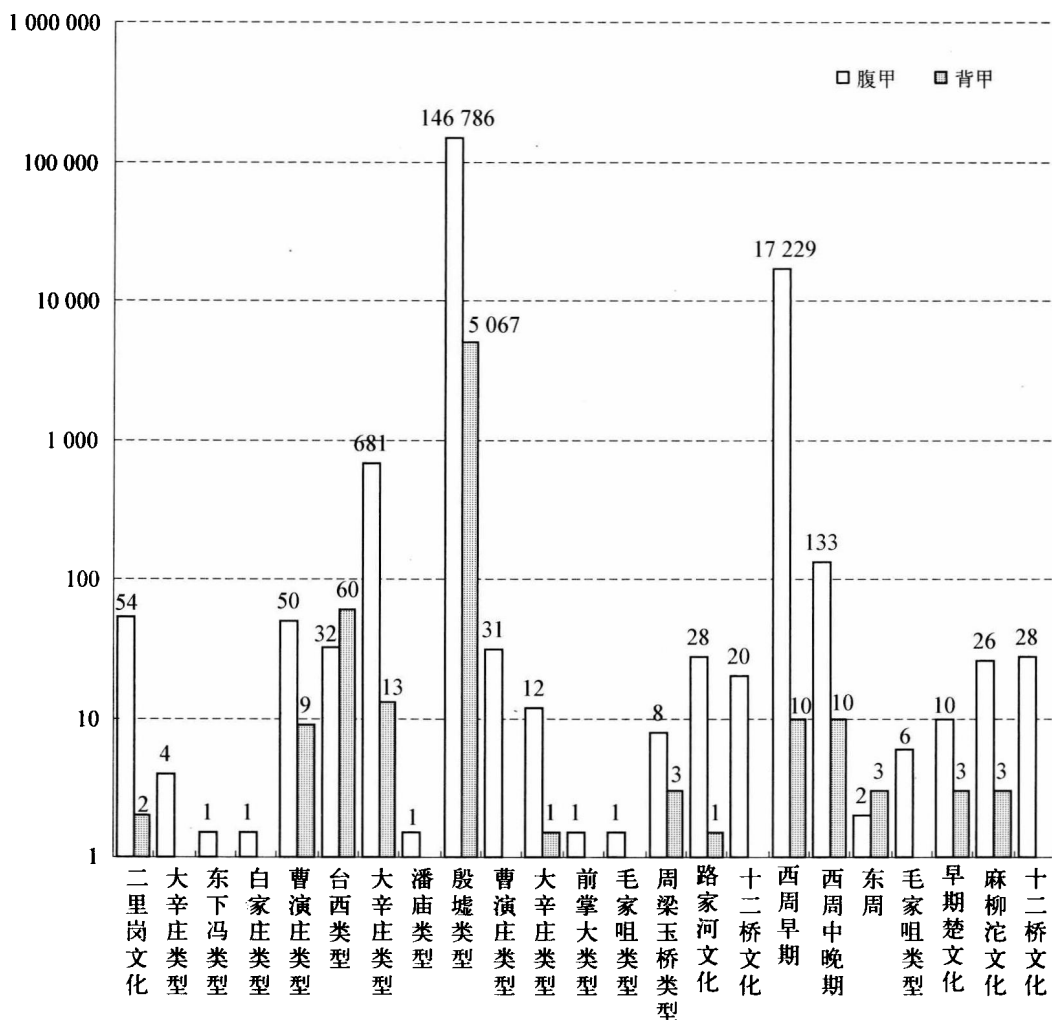
本章将各遗址出土的卜用甲骨,按时代先后和地域进行整理后,将其归入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并以此为框架,对各遗址出土的卜用甲骨的考古学背景做了简单描述。在此背景下,对卜用甲骨的类别进行了时、地考察,大致结论如下:

目前所知的材料表明,新石器时代至夏代只见卜骨,未见卜甲。

仰韶文化晚期已经用兽类肩胛骨进行占卜,但出土数量极少,仅见羊肩胛骨。

^① 周尔泰:《成都市方池街古文化遗址初探》,《四川文物》2003 年第 1 期。

^②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张家坡西周遗址的重要发现》,《文物参考资料》1956 年第 3 期;《陕西长安沣西张家坡西周遗址的发掘》,《考古》1964 年第 9 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 年,111 页,图七〇,图版陆叁。



图二 商周时期出土卜甲数量的统计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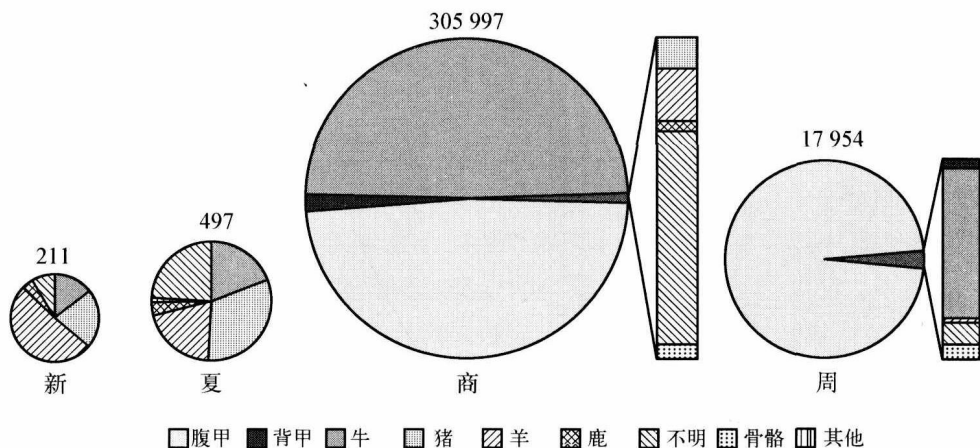
龙山文化早期所出土的卜骨数量亦极少,到龙山文化晚期占卜习俗比较流行,出土的卜骨数量有所增加。龙山时期牛、猪、羊肩胛骨兼用,从出土卜骨材料的地理空间分布来看,北部内蒙古和山西地区以猪肩胛骨为主;西部陕西和甘肃地区以羊肩胛骨为主;东部山东地区以牛肩胛骨为主,而且出现时间最晚;中部河南和冀南地区则兼用牛、猪、羊的肩胛骨,其中靠近西部的王湾三期类型羊肩胛骨多见,靠近北部的后岗二期类型猪肩胛骨多见,靠近东部的造律台类型牛肩胛骨为主。

到夏代地域分布更广泛,数量也大为增加。夏代与龙山时期相比,各文化之间互相交流更频繁,诸文化都常见牛、猪、羊肩胛骨,数量明显增加,出土遗址也较多。每个地区各文化之间,仍然保留自己的特征,如内蒙古、陕北地区的新华文化和朱开沟文化主要以牛肩胛骨为主;山西地区的东下冯类型和游邀类型以猪肩胛骨为主流;陕西、甘肃地区的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以羊肩胛骨为代表;中原地区兼用牛、猪、羊肩胛骨,二里头类型牛、猪、

羊肩胛骨的比例大同小异,岳石文化猪、鹿肩胛骨比例高,先商文化牛肩胛骨比例最高。

商代早期与夏代相比占卜习俗更为流行,除卜骨外,已经出现卜甲。目前所知,卜甲最早在郑州南关外遗址中发现。商周时期卜骨和卜甲兼用,中心地区使用更为普遍,出土甲骨的数量较集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牛肩胛骨和龟甲渐占据主导地位。西周中期卜用甲骨逐渐减少,西周晚期以后很少见。

先秦时期各阶段卜用甲骨种属及数量统计见下图(图三)。



图三 先秦时期卜用甲骨的统计示意图

此外,在历史文献中也有与龟甲种属、大小(尺寸)相关的内容。如《周礼·龟人》对龟甲种属的记载如下:“龟人掌六龟之属,各有名物。天龟曰灵属,地龟曰绎属,东龟曰果属,西龟曰雷属,南龟曰猎属,北龟曰若属。各以其方之色与其体辨之。”《白虎通·蓍龟》对龟甲大小的记载如下:《礼三正记》曰:“天子龟长一尺二寸,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龟阴,故数偶也。天子蓍长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蓍阳,故数奇也。”

第三章 甲骨的整治方式与钻凿灼形态

从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甲骨占卜的习俗与传统大致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在甲骨卜法上,则因时间、地域的不同,存在变化和区别。

中国境内的考古发掘工作将近一百年,目前对于甲骨整治方式与钻凿形态的研究,还没有完善的条件。其原因是至今除了殷墟甲骨以外,其他时期和地区发现的卜用甲骨数量有限。加之以往发表的著录和发掘报告中,很多材料没公布,公布的图版大部分又不够清晰,相关描述也不够详尽。本文只能采用有图版、拓本、文字描述的材料,尽量把目前所知的先秦时期的卜用甲骨资料作归纳整理,某些环节还有待更多的材料,才能使相关问题的研究逐步深入。

使用甲骨的占卜者一般是社会最高层人物,因此甲骨形态的变化几乎先发生在中央政权或中心地区,此后影响到周围方国与邻国。如制度发生变化,就很快影响到甲骨形态的变化,就特征而言,也是中心地区变化得最快也最典型,周围方国与邻国变化相对滞后,甚至保留前期的形态特征与本地的特征。甲骨断代的许多项目中,诸如书体的变化与贞人、刻手的变化有关。甲骨整治与钻凿方式虽然也有人为因素,可主要还是与制度改革有关。因而,利用甲骨整治与钻凿的特征,更有助于正确判断甲骨所属年代。

第一节 卜用甲骨各部位名称与整治

一、肩 胛 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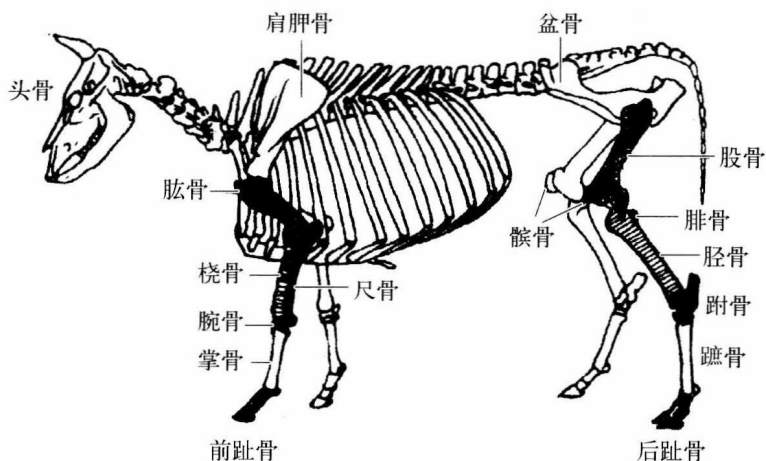
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均有卜骨,而在一些边远地区卜骨使用的延续时间较漫长。卜骨的取材绝大多数是兽类肩胛骨,主要为牛、猪、羊、鹿的肩胛骨。本文以牛肩胛骨为例(图四、五),讨论肩胛骨各部位的名称,并对几种常见动物肩胛骨的特征进行描述。此后,专门分析卜用肩胛骨的整治方式,对肩胛骨各部位和整体的整治进行类型学分析。

(一) 肩胛骨的各部位名称与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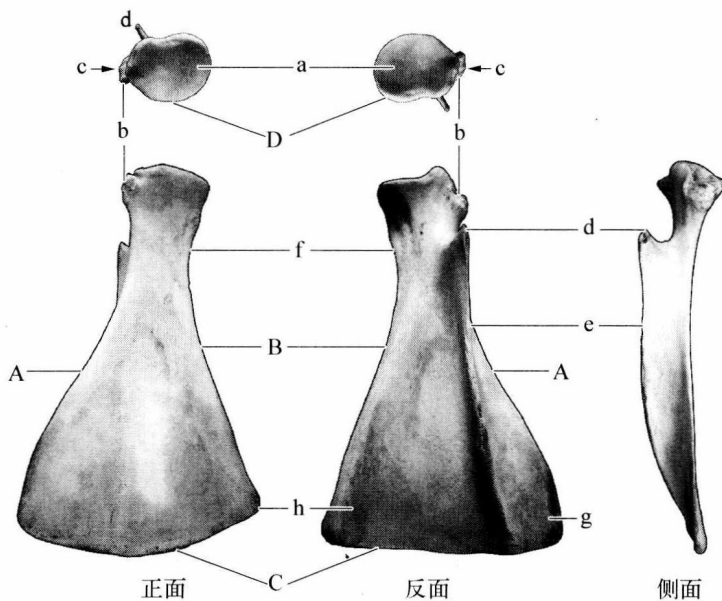
1. 各部位的名称

文中对肩胛骨各部位的称述,采用动物解剖学中的命名以及甲骨学研究中惯用的称

谓,如骨面(柄部和扇部)、骨臼、骨脊、臼角等(图五,表六)。



图四 牛骨骼各部位的位置与其名称^①



图五 牛(左)肩胛骨各部位的名称

- A: 颈侧缘 B: 胸侧缘 C: 脊侧缘 D: 关节侧缘
a: 骨臼(关节窝) b: 臼角(肩胛骨结节) c: 喙突 d: 肩峰
e: 骨脊(肩胛岗) f: 肩胛骨颈 g: 前角 h: 后角

① 伊丽莎白·施密德著、李天元译:《动物骨骼图谱》,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92年,38页,图版一。

表六 肩胛骨各部位名称诸家对比表^①

	严一萍	沈之瑜	伊丽莎白·施密德	本 文
A			颈侧缘	颈侧缘
B			胸侧缘	胸侧缘
C			脊侧缘	脊侧缘
D			关节侧缘	关节侧缘
	骨版 (正反面)	骨面		骨正(反)面 (柄部、扇部)
a	骨臼	骨臼	关节窝	骨臼(关节窝)
b	茎块	茎块	肩胛骨结节	臼角 (肩胛骨结节)
c			喙突	喙突
d			肩峰	肩峰
e	脊柱 ^②	骨脊	肩胛岗	骨脊(肩胛岗)
f			肩胛骨颈	肩胛骨颈
g	前角		颈侧缘与脊侧缘夹角	前角
h	后角		胸侧缘与脊侧缘夹角	后角

2. 几种常见动物肩胛骨的特征

先秦时期占卜所用动物骨骼主要来源于牛、猪、羊、鹿的肩胛骨。为方便以后更好地认识卜骨,本文先对以上几种动物肩胛骨的特征做简单介绍(图六)。以下描述肩胛骨放置方向均为骨臼(关节窝)向上,反面向外。

(1) 牛肩胛骨:整体形状为近等腰三角形;颈侧缘左肩胛骨整体曲线呈“J”形,右肩胛骨反之;胸侧缘左肩胛骨整体曲线呈反“C”形,“C”形上部较曲,下部较直,右肩胛骨反之;胸侧缘面呈弧形;胸侧缘厚于颈侧缘;脊侧缘呈弧形,前角(颈侧缘与脊侧缘夹角)较圆钝,后角(胸侧缘与脊侧缘夹角)较尖锐。骨脊(肩胛岗)整体形状呈刀形,左肩胛骨整体曲线略呈“J”形,右肩胛骨反之,两者均上部向颈侧缘倾斜,下部向胸侧缘倾斜。肩峰发育,与肩胛骨面夹角为锐角;冈结节不发育。骨臼(关节窝)无切迹,近椭圆形,关节头侧缘呈圆形,关节侧缘略向内凹;臼角(肩胛骨结节)较大,形状不规则,位于骨臼的下方。一般肩胛骨长30—40厘米,宽(扇径)20—30厘米;骨脊长约23厘米,肩峰高约4厘米;骨臼径6—8厘米。

^① 肩胛骨各部位名称取自:严一萍《甲骨学》;沈之瑜《甲骨文讲疏》;伊丽莎白·施密德《动物骨骼图谱》。

^② 严一萍撰写《甲骨学》56页图三(柱脊),57页说明文字中都是脊柱,怀疑图三说明文字有误。

	马	牛	猪	羊	鹿	备注
骨白						
俯视图						
剖面图						
骨脊形状						

图六 几种常见动物肩胛骨的比较

(2) 猪肩胛骨：整体形状为近等边三角形；颈侧缘左肩胛骨整体曲线呈“S”形，右肩胛骨反之；胸侧缘左肩胛骨整体曲线呈反“C”形，右肩胛骨反之；胸侧缘面较平；胸侧缘厚于颈侧缘；脊侧缘呈弧形；前角呈圆形，后角较尖锐。骨脊（肩胛岗）整体形状呈三角形，左、右肩胛骨均整体曲线较直，向胸侧缘倾斜。肩峰不发育；冈结节发育。骨臼（关节窝）近椭圆形，关节头侧缘较直，关节侧缘较圆；臼角（肩胛骨结节）独立，粗壮，与关节头侧缘相接，稍凸于关节窝面。肩胛骨长 15—18 厘米，宽（扇径）10—13 厘米；骨脊长约 10 厘米，无肩峰；骨臼径约 3—4 厘米。

(3) 羊肩胛骨：整体形状为近三角形；颈侧缘左肩胛骨整体曲线呈“C”形，“C”形上部较曲，下部较直，右肩胛骨反之；胸侧缘左肩胛骨整体曲线呈反“C”形，“C”形整体较直，右肩胛骨反之；胸侧缘面较平；胸侧缘厚于颈侧缘；脊侧缘呈弧形；前角近 90 度，后角约 70 度。骨脊（肩胛岗）整体形状呈刀形，左、右肩胛骨整体曲线均较直，向胸侧缘倾斜。肩峰发育，与肩胛骨面夹角为直角；冈结节不发育。骨臼（关节窝）近椭圆形，关节头侧缘呈圆形，关节侧缘略较直；臼角（肩胛骨结节）与关节窝面平行，超出侧缘，与骨臼之间形成一道凹槽。肩胛骨长 14—17 厘米，宽（扇径）8—12 厘米；骨脊长约 12 厘米，肩峰高约 2 厘米；骨臼径约 2—3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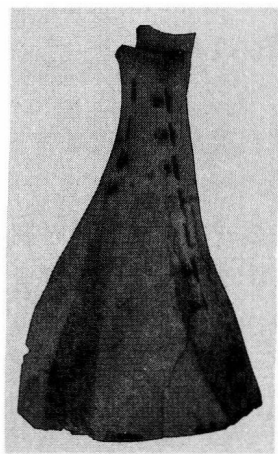
(4) 鹿肩胛骨：整体形状近三角形；颈侧缘左肩胛骨整体曲线呈“S”形，近前角处略呈弧形，右肩胛骨反之；胸侧缘左肩胛骨整体呈反“C”形，“C”形整体较直，右肩胛骨反之；胸侧缘面较平，胸侧缘厚于颈侧缘；脊侧缘呈弧形。骨脊（肩胛岗）整体形状呈刀形，肩峰发育，与肩胛骨面夹角为直角，冈结节不发育。骨臼（关节窝）圆形，臼角（肩胛骨结节）低于关节窝面。不同种类鹿的肩胛骨形状相似而大小不同，大者接近牛的肩胛骨，小者如羊的肩胛骨。

总体来说，牛的肩胛骨个体最大，猪、羊个体相当，鹿的个体变化较大；牛的骨骼最厚，猪的较厚，羊、鹿较薄，面较平；牛、羊、鹿的骨脊（肩胛岗）形状相似，呈刀形，肩峰发育，肩胛骨结节不发达，而猪的骨脊不同，肩峰不发育，肩胛骨结节发达；牛、羊、猪的骨臼（关节窝）近椭圆形，鹿则呈圆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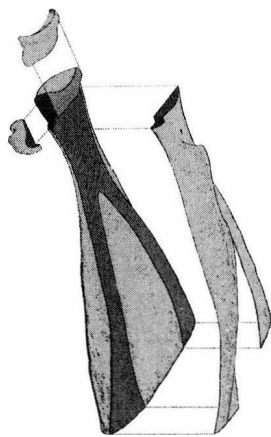
（二）肩胛骨的整治

1. 肩胛骨整治的模式

新石器时代到夏代卜骨整治方式较简单，仅有部分切去骨脊，不见切去骨臼、臼角者。到商代普遍对卜骨进行整治与钻凿。整治的目的是把不同部位厚度不一样的肩胛骨面刮平整，以便于施钻凿，以及烧灼时容易控制正面卜兆的走向。下面是商代晚期整治肩胛骨的虚拟图（图七）。



《屯南》2542



整治牛右肩胛骨

图七 整治牛肩胛骨的虚拟图^①

商代晚期肩胛骨的主要整治步骤如下：第一，宰牛后获取肩胛骨，将肩胛骨上的肉和软骨组织清理干净，放置一段时间，备用。第二，去掉肩胛岗及胸侧缘凸起的部分，骨臼切

^① 刘渊林：《卜用甲骨上攻治技术的痕迹之研究》，“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印行，1984年，图1。本文对刘渊林之图略作修改。

去一半或三分之一,最后去掉臼角。第三,对整个肩胛骨削平磨光。第四,施钻凿,放置一段时间,准备占卜时用。第五,烧灼,进行占卜。第六,根据卜兆判断占卜的结果,部分卜骨上会记录占卜相关的内容。

2. 肩胛骨各部位的整治类型

肩胛骨的整治方式受时代、地域影响而发生变化,这在一些部位如骨臼、骨脊、臼角、边缘、前后角等表现得尤为明显,比较容易观察,故本文按照上述几个部位进行分类说明。

(1) 骨臼

A 型: 保留原状。

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均有该类型。新石器时代和夏代诸文化均保留原状。商周时期切去骨臼的现象,较为普遍,主要施于牛肩胛骨,但少数牛肩胛骨和多数猪、羊肩胛骨仍然保留原状。如新石器时代长安客省庄遗址^①的卜骨(标本 T13:2A:15,为羊肩胛骨)(图版十三,2)、夏代神木新华遗址^②的卜骨(标本 99H51:1,为猪肩胛骨)、商代晚期安阳苗圃北地遗址^③的卜骨(标本 KH6:8,为牛肩胛骨)、西安老牛坡遗址^④的卜骨(标本 88XL I 2H15:21,为牛肩胛骨)(图版五,2)。

B 型: 切骨臼。

中商文化曹演庄类型的一些牛肩胛骨开始出现切治骨臼的现象。中、晚商时期中心地区很流行;周边地区则受到商文化的影响,开始出现切治骨臼的现象。西周时期许多卜骨仍然沿用。该类型切去骨臼的程度,又分为 2 式(图八)。

I 式: 直线切去一半或三分之一。

中商时期曹演庄类型、大辛庄类型、小神类型、北村类型的诸遗址常见该型式。晚商时期更为规范,殷墟类型多切去一半成半圆形;其他类型和周边地区也常见。西周时期诸文化类型也多见,许多遗址该型式与不切保留原状的型式并存。商周时期的卜骨,大部分属于该式。如安阳洹北商城遗址^⑤的卜骨(标本 T1④:21,为牛右肩胛骨)(图版五,3)、《甲编》的 3591(图版五,6)、《周原》的 FQ1(原号 79FQNH1:1)(图版五,9)。

II 式: 弧线削去骨臼,成月牙形。

该式极少见,目前在济南王府遗址^⑥的卜骨(标本 H152:15)(图版一,2)、襄樊真武山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沚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 年,68 页。

②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神木新华》,科学出版社,2005 年,234 页,图二四一~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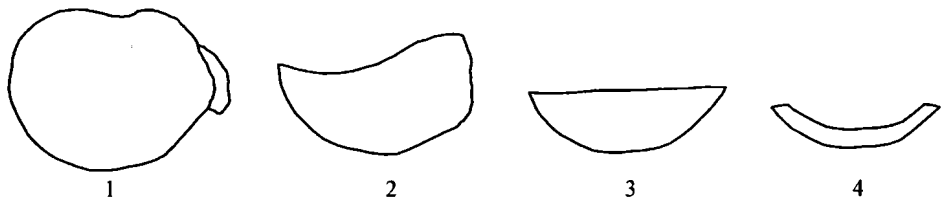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 年,图四三~3。

④ 刘士莪:《老牛坡》,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232 页,图版一三三~2。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8 年~1999 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 15 集,文物出版社,2004 年,333、334 页,图二五~3,图版十。

⑥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高速公路考古报集(1997)》,科学出版社,2000 年,182、183 页,图五二,图版三五。

遗址^①的卜骨(标本 H81:12、13)、徐州高皇庙遗址^②的卜骨(图版十五,2)中发现,年代应为西周中晚期。



图八 骨白整治图

1. A型 2、3. B型Ⅰ式 4. B型Ⅱ式

(2) 骨脊

A型:保留原状。

新石器时代和夏代诸文化均为该类型。如禹州瓦店遗址^③的卜骨(标本 VT1H17:3,为牛左肩胛骨)(图版十三,3)。商周时期一些周边地区及中原地区个别猪、羊肩胛骨仍然保留原状。

B型:刮削一部,仍保留脊根。

商代郑州二里岗下层一期出现,在牛(标本 C7H15:45)、猪(标本 C1H9:26)、羊(标本 C1H9:24)肩胛骨中都有发现。猪、羊肩胛骨在二里岗上层仍然沿用,如猪肩胛骨(标本 C5.1H12:16)(图版一,1)。此外柘城孟庄遗址^④(猪和羊的肩胛骨)和辉县琉璃阁遗址^⑤的卜骨(标本 H1:100,为牛左肩胛骨)、大辛庄类型章丘城子崖遗址^⑥的卜骨(上下混合层的9)也如此^⑦。

C型:全部削去。

商代郑州二里岗上层一期出现,主要为牛肩胛骨(标本 C15T14②:15、C5H20:36),此后的商周时期卜骨几乎均属于该类型,仅个别的猪、羊肩胛骨或商文化周邻地区的卜骨为A型或B型。如藁城台西遗址^⑧的卜骨(标本 T8:19 为牛左肩胛骨)(图版六,1)。

(3) 白角

A型:保留白角。

新石器时代至商代早期的卜骨均保留白角;商代中期和周代大部分的卜骨也保留白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博物馆:《湖北襄樊真武山周代遗址》,《考古学集刊》第九集,1995年,158页,图十七。

②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徐州高皇庙遗址清理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

③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禹州瓦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4年,111、112页,彩版七~1、2。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商丘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柘城孟庄商代遗址》,《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

⑤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13—15页,图版捌。

⑥ 李济总编:《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87页,图版伍拾叁。

⑦ 商代以前仅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唐山大城山遗址中发现该类整治方式。但从目前发现的材料来看,大城山遗址的此类卜骨,应已经进入商代。

⑧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88页,图版五六~3、4。

角。锯切臼角的现象是商代晚期殷墟卜骨的典型特征,在大部分殷墟类型和西周时期殷遗民有关的卜骨中常见。商周时期其他文化基本保留臼角。

B 型: 锯切臼角。

洹北商城晚期开始出现锯切臼角的现象。在曹演庄类型的安阳洹北商城遗址^①的卜骨(标本 WWT1JA:11)(图九,2)和邢台葛家庄遗址^②的卜骨(标本 H11:1)中可见(图九,1)。到殷墟时期普遍使用。这种整治方式为商人特有,西周早期与商遗民有关的遗址中也常见,到西周中、晚期的一些卜骨仍然沿用。锯切的程度分为 2 式:

I 式: 臼角切去得较多,切口约呈直角。

绝大多数在殷墟地区发现。殷墟第一期,多数未切臼角;殷墟第二期至殷末,多切去臼角,只有少数保留骨臼原状。此外,殷墟类型郑州人民公园遗址^③的卜骨(标本 C7T105②:2),曹演庄类型邢台粮库遗址^④的卜骨(标本 II H35:5),大辛庄类型潍坊姚官庄遗址^⑤的卜骨(标本 0178),先周文化周原王家嘴、贺家遗址^⑥的卜骨(标本 H7:1、16),李家崖文化绥德薛家渠遗址^⑦的卜骨(标本 H1:47),伊克昭盟朱开沟遗址的卜骨^⑧等也可见到。切去臼角的现象,应是受到殷墟影响的结果。

周人灭商后,尤其是平定武庚之乱后,对商人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曾迁徙商人到周人的根据地^⑨。西周早期前段在西周中心地区的周原和丰镐地区以及分封的诸侯国中开始出现较多具有殷墟文化因素的卜骨,如切去臼角。这些卜骨应是周人灭商后,大量吸收商文化因素的反映。如陕西长安张家坡遗址^⑩的卜骨(标本 T109④:6)、河南洛阳北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的勘察与试掘》,《考古》2003 年第 5 期。

②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邢台市葛家庄遗址北区 1998 年发掘简报》,《考古》2000 年第 11 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邢台市文物管理处:《河北邢台市葛家庄遗址 1999 年发掘简报》,《考古》2005 年第 2 期。

③ 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 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 年,926 页,图版二七一。报告认为,商代人民公园一期与二期出土的主要陶器鬲、豆、簋的形制特征与河南安阳殷墟商代后期各小期中的同类陶器相比较,则商代人民公园一期的陶器,大体和安阳殷墟苗圃北地和大司空村的第 I 期文化相当;而商代人民公园二期的陶器,大体和安阳殷墟苗圃北地与大司空村等地的第 II 期文化相当,都是属于安阳殷墟商代后期中排列较早的陶器(《郑州商城》,951 页)。从卜用甲骨的特征来看,也大致相同。

④ 河北省邢台市文物管理处:《邢台粮库遗址》,科学出版社,2005 年,216 页,图一八七。

⑤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博物馆:《山东姚官庄遗址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5),文物出版社,1981 年 12 月,39 页,图二〇九。

⑥ 周原考古队:《2001 年度周原遗址(王家嘴、贺家地点)发掘简报》,《古代文明》(第 2 卷),文物出版社,2003 年,473 页,图 12.13。

⑦ 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考古实习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商周研究室:《陕西绥德薛家渠遗址的试掘》,《文物》1988 年第 6 期。

⑧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朱开沟遗址》,《考古学报》1988 年第 3 期;黄蕴平:《内蒙古朱开沟遗址兽骨的鉴定和研究》,《考古学报》1996 年第 4 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博物馆:《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2000 年,123 页。

⑨ 从考古学文化看,也如此。在周人的根据地丰镐一带,沔西遗址第一期(先周文化晚期阶段),极少有商文化因素;第二期(西周初年武王至成王前期)以后商文化因素(如分档鬲、殷式簋、豆等)急增,应是周人灭商历史事件在考古学文化上的反映(《1997 年沔西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0 年第 2 期)。

⑩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沔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 年,111 页,图七〇,图版陆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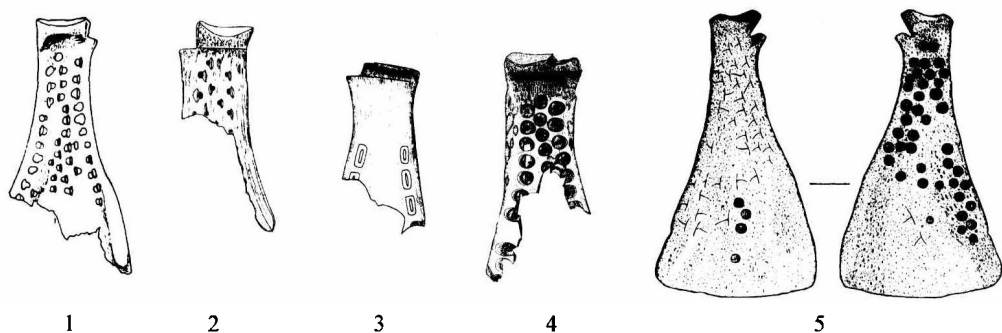
窑遗址^①的卜骨(标本 T33H11:1、T32H5:1)、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②的卜骨(标本 G11H33:1)、滕州前掌大遗址^③的卜骨(标本 T306③:4)(图九,3)等。

这种整治方式到西周中、晚期的一些卜骨仍然沿用,如扶风齐家遗址的卜骨(标本 T4H2:2)、洛阳郑铁一段宿舍楼工地^④的卜骨(标本 H1:5、标本 H1:10)、襄樊真武山遗址^⑤的卜骨(标本 H81:12)。

Ⅱ式:白角切去得较少,切口呈直角。

该类型较少见,如洛阳北窑遗址^⑥的卜骨(标本 T3H90:2、T33H11:1)(图九,4)、洛阳郑铁一段宿舍楼工地^⑦的卜骨(标本 H1:1)、扶风齐家遗址^⑧的卜骨(标本 T4H2:2)等。其年代应属于西周中晚期。

此外,属于先周文化的武功郑家坡遗址^⑨中发现1件(标本 H9:10)(图九,5)特征较为特殊,即白角削成三角形缺口。



图九 锯切白角图

1. 邢台葛家庄遗址(标本 H11:1) 2. 涇北商城遗址(标本 WWT1JA:11)
3. 滕州前掌大遗址(标本 T306③:4) 4. 洛阳北窑遗址(标本 T3H90:2)
5. 武功郑家坡遗址(标本 H9:10)

(4) 边缘

A 型:保留原状。

新石器时代和夏代几乎没有削平反面和边缘;商周时期除殷墟时期削平外,其余刮削得少,留有较厚的骨面。

① 赵振华:《洛阳两周卜用甲骨的初步考察》,《考古》1985年第4期。
 ②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北京市文物研究所:《1995年琉璃河周代居址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6期。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上、下册),文物出版社,2005年,45页,图三五,图版一二。
 ④ 赵振华:《1984年洛阳出土卜骨的特征与时代》,《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4期。
 ⑤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博物馆:《湖北襄樊真武山周代遗址》,《考古学集刊》第九集,1995年,158页,图十七。

⑥ 赵振华:《洛阳两周卜用甲骨的初步考察》,《考古》1985年第4期。
 ⑦ 赵振华:《1984年洛阳出土卜骨的特征与时代》,《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4期。
 ⑧ 罗西章、王均显:《周原扶风地区出土西周甲骨的初步认识》,《文物》1987年第2期。
 ⑨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武功郑家坡先周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7期。

B 型：削平反面和边缘。

殷墟时期大多数的卜骨削平反面和边缘（颈侧缘和胸侧缘），变成一片骨板。《小屯南地甲骨》（以下简称《屯南》）一书中把卜骨反面中段、卜骨外缘横剖面（骨沿）分为四式^①。本文按该书的分类，简单描述如下：

I 式：边缘作, 边缘内壁与凿壁相连接，一般无明显的界线。如 2359(H57:135)、2295(H57:54)等。

II 式：边缘作, 边缘内壁略弯曲，与凿壁相接有一定的界线。如 1126(H24:425)、2372(H57:148)等。

III 式：边缘作, 边缘内壁有明显的折角，与凿壁相接亦界线分明，似阶梯状。如 675(H17:152)、2400(H57:205+210)等。

IV 式：边缘作, 与 III 式近似，但边缘甚短，或成一道突起的脊棱。如 664(H17:138+178+M13:25+355+543)、339(H2:632)等。

《屯南》一书将小屯卜骨中各期存在的型式统计如下：康丁时期以 I 式为主（约占 93%），少量 II 式（占 7%）。武乙时期 I 式减少（占 23%），II 式增多（占 55%），出现了 III 式（占 20%）、IV 式（占 2%）。文丁时期不见 I 式，II 式亦少（占 8%），III 式增加（占 58%），次为 IV 式（占 34%）。

（5）前后角

A 型：保留原状。

先秦时期绝大部分卜骨没有锯切前、后角。

B 型：锯切前、后角。

该类极少见，仅有以下 3 件。

I 式：前角被削成缺口。

将卜骨的前角削去一角，仅见 2 件。即安阳后冈遗址^②的卜骨（标本 91M7:02，为牛肩胛骨）（图十，1）、济阳刘台子遗址^③的卜骨（M3 扰土，为牛肩胛骨）^④。

II 式：前、后角分别被削成缺口。

济南王府遗址^⑤的卜骨（标本 H152:15，为羊右肩胛骨）（图十，2；图版一，2），年代当为西周中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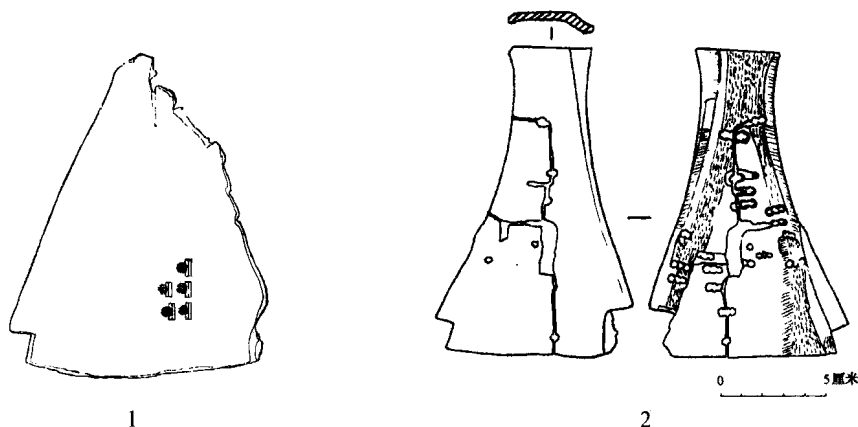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的钻凿形态》，《小屯南地甲骨》下册第三分册，中华书局，1980 年，1511、1512 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71 年安阳后冈发掘简报》，《考古》1972 年第 3 期；《1991 年安阳后冈殷墓的发掘》，《考古》1993 年第 10 期。

③ 德州地区文化局文物组、济阳县图书馆：《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85 年第 12 期；王尔俊：《山东济阳刘台子出土的陶文等商代铭刻》，《考古》1989 年第 6 期。

④ 报告认为该遗址 M3 的年代应为西周穆王之时，属西周早期偏晚。M3 葬式较特殊，有腰坑。这样的特点为商系统特有，商代晚期或西周时期商遗民有关的墓葬中常见。卜骨的整治方式与钻凿形制，具有典型的殷墟卜骨特点，该卜骨的年代，应该属于商代晚期。又因该卜骨出土于 M3 扰土中，可能非墓葬随葬品，其年代可能早于该墓的年代。

⑤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高速公路考古报集（1997）》，科学出版社，2000 年，182、183 页，图五二，图版三五。



图十 锯切前、后角图

1. 安阳后冈遗址(标本 91M7:02) 2. 济南王府遗址(标本 H152:15)

3. 整体肩胛骨的整治类型

主要以骨臼、骨脊、臼角、反面和边缘组合,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A 型: 均保留骨臼、骨脊、臼角、反面和边缘,或稍微修整。

I 式: 未经修整。

新石器时代仰韶时期和龙山时期的卜骨大部分未经修整,即使用自然的肩胛骨。夏至商周时期边远地区的极少数卜骨仍然沿用。如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①的卜骨(标本 H3:24)(图版一,3)、张家口贾家营遗址^②的卜骨(标本 H2:10)(图版一,4)。

II 式: 稍微修整。

龙山晚期少数卜骨(尤其是牛肩胛骨)开始略加修整,但仍然保留肩胛骨的原貌,如禹州瓦店遗址^③的卜骨(标本 VT1H17:3,为牛左肩胛骨)(图版十三,3)。夏代大多数卜骨一般略加修整,少数卜骨(尤其是牛肩胛骨)整治较多,骨面削平,打磨光滑,如偃师二里头遗址^④的卜骨(标本 IVT31③:16,为牛右肩胛骨;IVT15④B:3、IVH57:19,均为猪肩胛骨)(图版二,1、2)。商周时期个别猪、羊肩胛骨和边远地区的少数卜骨仍然沿用,如商代郑州二里岗文化下层二期遗址的猪肩胛骨(标本 C9.1H105:15)、卓尼茺儿遗址^⑤的卜骨(标本 H1:64,为羊左肩胛骨)(图版二,3)。

B 型: 保留骨臼、臼角、反面和边缘,骨脊切去一部分。

I 式: 骨脊切去少部分。

夏代的一些遗址开始出现削去骨脊的一部分,有的骨脊稍经削磨,有的留有砍刮痕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1期。

② 陶宗治:《河北张家口市考古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6期。

③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禹州瓦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4年,111、112页,彩版七~1、2。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238、239页,图版114。

⑤ 甘南藏族自治州博物馆:《甘肃卓尼茺儿遗址》,《考古》1994年第1期。

迹。但该类卜骨,都是零散发现,无法成为一个固定或典型的整治方式,本文只简单介绍而已。如伊克昭盟朱开沟遗址^①的卜骨(标本 H2022:1,为牛右肩胛骨)(图版三,1)、神木新华遗址^②的卜骨(标本 99H51:1,猪右肩胛骨)(图版三,2)和四坝文化民乐东灰山遗址^③的卜骨(标本 022,为猪肩胛骨;标本 0125,为羊肩胛骨)。

Ⅱ式:骨脊切去一半以上。

与骨脊的 B 型大致相同,刮削一半或三分之二,仍保留脊根。商代郑州二里岗下层一期遗址^④的牛(标本 C7H15:45)、猪(标本 C1H9:26、C1H14:50)、羊(标本 C1H9:24)的肩胛骨中都有发现。在商代郑州二里岗文化中广泛流行,如二里岗下层二期遗址的牛(标本 C5H40:20)、猪(标本 C7H11:14、C9.1H106:13)的肩胛骨(图版三,3)。此外,二里岗下层二期遗址的一些卜骨,只描述“反面骨脊被削去”,该类卜骨也应属于此类型,如标本 C9.1H105:21、C5H13:20、C9.1H106:10,皆为牛肩胛骨。商代二里岗上层一期该类型的卜骨均属于猪肩胛骨,如标本 C9.1T108^⑤:84、C5.1H112:16 等。

此外,柘城孟庄遗址^⑥的卜骨(猪和羊的肩胛骨)、辉县琉璃阁遗址^⑦的卜骨(标本 H1:100,为牛左肩胛骨)和济南大辛庄遗址^⑧的卜骨(标本 03DXZT2402^⑨A:2)也可见^⑩。

C 型:保留骨臼、臼角和边缘;将骨臼下部骨脊一侧较厚部分掏挖,掏挖部分形状不规则。

I 式:保留完整的骨脊。

该式可见于商代二里岗上层,如郑州二里岗遗址^⑪的卜骨(标本 H10:422)(图版四,2)、郑州木材公司遗址^⑫的卜骨(标本 T1^⑬:45,为牛肩胛骨)。

此外,夏代属于二里头类型的荥阳西史村遗址^⑭中发现 1 件卜骨(标本 T9:12,为牛右肩胛骨)(图版四,1),具有该类型的特征,按报告出土卜骨的该遗址第二期,其年代应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间。这种整治方式除此遗址外,均未见于夏代其他遗址,而常见于

①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博物馆:《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2000 年,123 页,图版三六。

②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神木新华》,科学出版社,2005 年,234 页,图版四九~3。

③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甘肃民乐县东灰山遗址发掘纪要》,《考古》1995 年第 12 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北方考古研究室:《民乐东灰山考古——四坝文化墓地的提示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 年,25 页,图版五。

④ 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 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 年,174、175 页,图一〇、一一,图版三七。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商丘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柘城孟庄商代遗址》,《考古学报》1982 年第 1 期。

⑥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 年,13—15 页,图版捌。

⑦ 王华:《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整治技术研究》,山东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6 年,37、38 页,图十三。

⑧ 商代以前仅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唐山大城山遗址中发现该类整治方式。但从目前发现的材料来看,大城山遗址的此类卜骨,应已经进入商代。

⑨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郑州二里岗》,科学出版社,1959 年,37 页,图版拾陆~1a、1b。

⑩ 郑州市大河村遗址保管所:《郑州市木材公司商代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0 年第 4 期。

⑪ 郑州市博物馆:《河南荥阳西史村遗址试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5),文物出版社,1981 年 12 月。

郑州二里岗上层。所以,将该卜骨年代定为商代早期更为合理^①,但不排除此整治方式在夏代晚期已经出现的可能性。

Ⅱ式:保留骨脊一部分。

先将骨脊上半部分去掉,保留根部,再将骨臼下部较厚部分掏挖,掏挖部分形状呈不规则形。该型式仅有垣曲商城遗址二里岗上层时期^②的卜骨(标本 H105:1)1件(图版四,3)。

D型:保留骨臼、臼角和边缘;将骨脊及骨臼下部与胸侧缘较厚部分去掉,但加工较为简单粗糙,骨面未取平。

该类型整治方式最早可追溯到北方地区夏代,并在二里岗上层一期较常见,中商时期一些类型仍然沿用。

I式:骨臼下边为不规则的圆形。

夏代游邀类型忻州游邀遗址^③的卜骨(标本 H591:2,为牛肩胛骨)(图版四,4),骨脊被削平,并刻出凹槽;夏家店下层文化延吉百草沟遗址^④的卜骨(为羊肩胛骨),骨脊被削去,骨臼保留原状。此2件卜骨特征,应属于此类型。这种整治方式除此2处遗址外,均未见于夏代其他遗址,而常见于郑州二里岗上层。所以,此整治方式在夏代北方地区(尤其游邀类型)已经出现。

商代所见有垣曲商城遗址^⑤二里岗下层的卜骨(标本 H121:9,为牛左肩胛骨)(图版四,5);郑州二里岗上层一期遗址的卜骨(标本 C15T14②:15、C5H20:36、C5.1H112:17,皆为牛肩胛骨)(图版四,6)、偃师商城遗址^⑥的卜骨(标本 96H179:1,为牛肩胛骨)、琉璃阁类型辉县琉璃阁遗址^⑦的卜骨(标本 H1:4,为牛肩胛骨)、大辛庄类型济南大辛庄遗址^⑧的卜骨(标本 84DXZ2J2:1,为羊肩胛骨)、垣曲商城遗址^⑨的卜骨(标本 H131:8、H105:37、T2757:4D:1、H105:42,均为牛肩胛骨)、北村类型西安老牛坡遗址^⑩的卜骨(标本 85XLⅡ2T10③:9)等。

① 笔者怀疑此件卜骨不排除被混入夏代晚期的可能。

②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县博物馆:《垣曲商城:1985~1986年度勘察报告》(一),科学出版社,1996年,241页,图一五七~6,图版八八~1。

③ 忻州考古队:《山西忻州市游邀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4期;《忻州游邀考古》,科学出版社,2004年,138页,图一—二。

④ 李连:《百草沟发现无文卜骨》,《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7期。

⑤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县博物馆:《垣曲商城:1985~1986年度勘察报告》(一),科学出版社,1996年,204页,图一三三~4,图版七三~4。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偃师商城的初步勘探和发掘》,《考古》1984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偃师商城第Ⅱ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11期;《河南偃师商城Ⅳ区1996年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2期。

⑦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13—15页,图版捌。

⑧ 徐基:《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的初步研究》,《文物》1995年第6期;王华:《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攻冶技术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⑨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县博物馆:《垣曲商城:1985~1986年度勘察报告》(一),科学出版社,1996年,241页,图一五七,图版八八、八九。

⑩ 刘士莪:《老牛坡》,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100—103页,图七四。

Ⅱ式：骨臼下边直线垂直下切。

在骨臼下边直线垂直下切,使骨面与骨臼处下切面垂直。骨面近骨臼切面处两侧高,中间低,呈凹槽状。商代二里岗上层一期遗址^①的卜骨(标本 C5.3H311:6,为牛肩胛骨)(图版五,1),近凹槽的侧棱上还有数道锯痕。该卜骨应为此类型的源头,中、晚商时期部分卜骨中也可见。如中商时期藁城台西遗址^②的卜骨(标本 H32:1、T8:19、M14:9、10 和 M56:5、6,皆为牛肩胛骨)(图版六,1)、济南大辛庄遗址^③的卜骨(标本 03DXZT2001 夯土三:9,为牛左肩胛骨)、桓台唐山遗址^④的卜骨(标本 H122③:2,为牛肩胛骨)、西安老牛坡遗址^⑤的卜骨(标本 86XLⅢ1H14:1,为牛肩胛骨);商代晚期安阳苗圃北地遗址^⑥的卜骨(标本 KH6:8)、《甲编》2342(3.2.135)、2344(3.2.137)、2875(3.2.824,皆为牛肩胛骨)^⑦、西安老牛坡遗址^⑧的卜骨(标本 88XL I 2H15:21,为牛肩胛骨)(图版五,2)。

E 型:保留臼角,骨臼切去一半(或三分之一),切去骨脊、削平反面。

I 式:在骨臼下边直线垂直下切,形成台阶式。

中商时期曹演庄类型最为典型,其数量也最多。牛肩胛骨将骨臼切去一部分,再将骨脊及骨臼下部与胸侧缘较厚部分去掉,柄部掏挖较深,上部边缘较直,有的略呈弧形,胸侧缘和颈侧缘均留有窄边,扇部仅胸侧缘留有窄边。骨脊及骨臼下部与胸侧缘较厚部分去掉后,露出松质骨。如安阳洹北商城遗址^⑨的卜骨(标本 T1④:21,为牛右肩胛骨)(图版五,3)、邢台曹演庄遗址^⑩的卜骨(牛肩胛骨)、邢台东先贤遗址^⑪的卜骨(标本 H9:1,为牛肩胛骨)、邢台葛家庄遗址^⑫的卜骨(标本 H10:1,牛肩胛骨)、武安赵窑遗址^⑬的卜骨(标本 T11②:19,为牛肩胛骨)等。此外,还在白家庄类型焦作府城遗址^⑭的卜骨(标本 I T2416H23:2,为牛肩胛骨)、台西类型藁城台西遗址^⑮的卜骨(标本 T8:14、F2:34,皆为牛肩胛骨)(图版五,4)、藁城北龙宫遗址^⑯的卜骨(标本藁北 C:16,为牛肩胛骨)、大辛庄

① 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834页,图五六〇~3,图版二三七~3。

②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87、88页,图版五六、一〇〇、一〇一。

③ 王华:《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攻治技术研究》,山东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6年,36页,图十二~1。

④ 宋艳波、燕生东:《鲁北地区商代晚期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三十五期,2007年12月。这一批材料尚未正式公布,笔者曾与燕生东、同志赴山东济南、淄博和桓台地区,亲自参与整理。

⑤ 刘士莪:《老牛坡》,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158—161页,图一二四。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图四三~3。

⑦ 刘澍林:《卜用甲骨上攻治技术的痕迹之研究》,台湾“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印行,1984年,图十二。

⑧ 刘士莪:《老牛坡》,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232页,图一三三~2。

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8年~1999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333页,图25,图版10。

⑩ 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邢台曹演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

⑪ 邢台东先贤考古队:《河北邢台市东先贤遗址1998年的发掘》,《考古》2003年第11期。

⑫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邢台市葛家庄遗址北区1998年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11期。

⑬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文化学院:《武安赵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2年第3期。

⑭ 袁广阔、秦小丽、杨贵金:《河南焦作市府城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0年第2期;袁广阔、秦小丽:《河南焦作府城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0年第4期。

⑮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87、88页,图版五五。

⑯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北龙宫商代遗址的调查》,《文物》1985年第10期。

类型济南大辛庄遗址^①的卜骨(标本 DXZT2102H548:1、2、3,为牛肩胛骨)、小神类型长治小神遗址^②的卜骨(标本 H2:45、46,均为牛肩胛骨)(图版十五,6)、东下冯类型夏县东下冯遗址Ⅵ期^③的卜骨(标本 H35:5、78,均为牛肩胛骨,)、北村类型西安老牛坡遗址^④的卜骨(标本 85XLⅡ1G1H2:96、86XLⅡ:08,皆为牛肩胛骨)也可见。

该型式主要在中商二、三期普遍使用,商代晚期殷墟类型的卜骨被 F 型代替。但曹演庄类型、北村类型、先周文化等的一些遗址使用时间更晚。如长武碾子坡遗址^⑤的卜骨(标本 H151:85)(图版六,2)。

Ⅱ式:反面自骨白以下削平,无台阶,近骨白处较厚。

商代中、晚期一些类型中可见不挖出骨白下边,直接削平骨反面,形成为平坦的骨面,骨面较厚^⑥。如阳信李屋遗址^⑦的卜骨(标本 T1407T1507H2:2,为牛肩胛骨)(图版五,5)。

Ⅲ式:削平反面,骨面较薄,台阶甚矮。

殷墟时期骨面削平较薄,骨白略高,形成甚矮的台阶。如安阳小屯南地遗址^⑧的卜骨(标本 H30^③:1、H46:4,皆为牛肩胛骨)、《屯南》^⑨1104(H24:403)、2400(H57:205+210反)、2667(H95:13)、《甲编》3591^⑩(图版五,6)。

F 型:切去臼角、骨脊,骨白切去一半(或三分之二);削平反面和边缘,骨面平薄。

晚商时期殷墟类型为代表、最典型,绝大多数集中在殷墟地区。牛肩胛骨切去臼角,并将骨白切去一半或三分之二,再将骨脊及骨白下部与胸侧缘较厚部分去掉,柄部掏挖较深,与上部形成台阶,台阶边缘平直,整个骨面取平。有的柄部两侧及胸侧缘保留边缘,形状亦较为规则。

臼角呈 90 度,切去较多。与臼角的 B 型 I 式大同小异。锯切臼角的现象,在中商晚段曹演庄类型的一些遗址中已经开始出现。到殷墟第二期整治方式有了新的变化,即首先去掉肩胛岗及胸侧缘凸起的部分,变成一片骨板;此后,骨白切去一半(或三分之二),

① 徐基:《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的初步研究》,《文物》1995 年第 6 期;王华:《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整治技术研究》,山东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6 年。

②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晋东南工作站:《长治小常乡小神遗址》,《考古学报》1996 年第 1 期。

③ 东下冯考古队:《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东区、中区发掘简报》,《考古》1980 年第 2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 年,185、207 页,图版八三、九五。

④ 刘士莪:《老牛坡》,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102、160 页,图七四、一二六。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郊州·碾子坡》,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7 年,197 页,图一三六,图版一二〇。

⑥ 笔者 2005 年赴洛阳偃师商城博物馆看到偃师商城出土的 1 件卜骨(1992 年 4 区 T33),为牛右肩胛骨,仅有柄部,反面削平,施圆钻,较密集,孔内施灼。该卜骨整治方式特征属于 E 型Ⅱ式,为目前最早的例子。但没有正式发表,不知具体的年代和信息。

⑦ 宋艳波、燕生东:《鲁北地区商代晚期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三十五期,2007 年 12 月。

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3 年小屯南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 9 集,科学出版社,1995 年,86、88 页。

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中华书局,1980 年。

⑩ 许进雄:《甲骨上钻凿形态的研究》,艺文印书馆,1979 年,图版二七。

呈台阶式;再次,去掉臼角;最后,对整个肩胛骨削平磨光。该类型在晚商时期普遍使用,绝大多数在殷墟地区发现,其他地区较少见。如安阳后冈遗址^①的卜骨(标本 91M12:05,为牛肩胛骨)、安阳小屯南地遗址^②的卜骨(标本 H62:9,为牛肩胛骨)、《甲编》2813、2812^③(图版五,7、8)。

西周早期商遗民有关的遗址中也常见,到西周中、晚期的一些卜骨仍然沿用^④。切去臼角,应该是左右肩胛骨成一对,这也是左右对贞的例证。同时还可能便于用绳子捆起来保管。

G 型:将喙突部分刮平,切去骨臼一半(或三分之一),均未去臼角;在骨臼下边垂直下切,使骨面与骨臼下切面垂直;反面和边缘刮平磨光,两侧缘保留稍厚。

该类型是西周时期较典型的整治方式。应该从中商时期曹演庄类型典型整治方式(E 型)发展而来的。晚商时期一些文化类型亦使用,到西周时期更为完善。如《周原》^⑤ FQ1(原号 79FQNH1:1)(图版五,9)、FQ4(原号 80FQN 采:112)、FQ5(原号 79 采集 94)、周公庙遗址的卜骨(T9^⑥:4)、邠县下孟遗址^⑥的卜骨、洪洞坊堆村遗址^⑦的卜骨。

另外,西周时期有极少数卜骨仍然保留骨臼原状。

二、龟 甲

新石器时代和夏代只有卜骨,未见卜甲。商代早期与夏代相比占卜习俗流行更广泛,除卜骨外,开始出现卜甲。目前所知,卜甲最早在郑州南关外遗址中发现,年代应属于商代早期或先商文化。商周时期卜骨和卜甲兼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卜甲渐占据主导地位。中心地区使用更为普遍,出土甲骨的数量较集中。卜用龟甲种类繁多,大小不同,来源不一。卜甲的整治方式与卜骨大致同步,各时期出现一些新的变化,逐渐走向规范、制度化。这里先简单描述龟甲的各部位名称,再综述龟甲(腹甲、背甲)各部位和整体的整治类型。

(一) 龟甲的各部位名称与特征

商周时期的卜用龟甲,一般分腹甲和背甲两类。本文依据腹甲的千里路、盾纹、齿缝、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71 年安阳后冈发掘简报》,《考古》1972 年第 3 期;《1991 年安阳后冈殷墓的发掘》,《考古》1993 年第 10 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3 年小屯南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 9 集,科学出版社,1995 年,86、88 页。

③ 刘渊临:《卜用甲骨上攻治技术的痕迹之研究》,“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印行,1984 年,284 页,图 51、52。

④ 该类型卜骨的出土情况,在臼角的 B 型中已有详细的论证,在此省略。

⑤ 曹玮:《周原甲骨文》,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 年,142、150、15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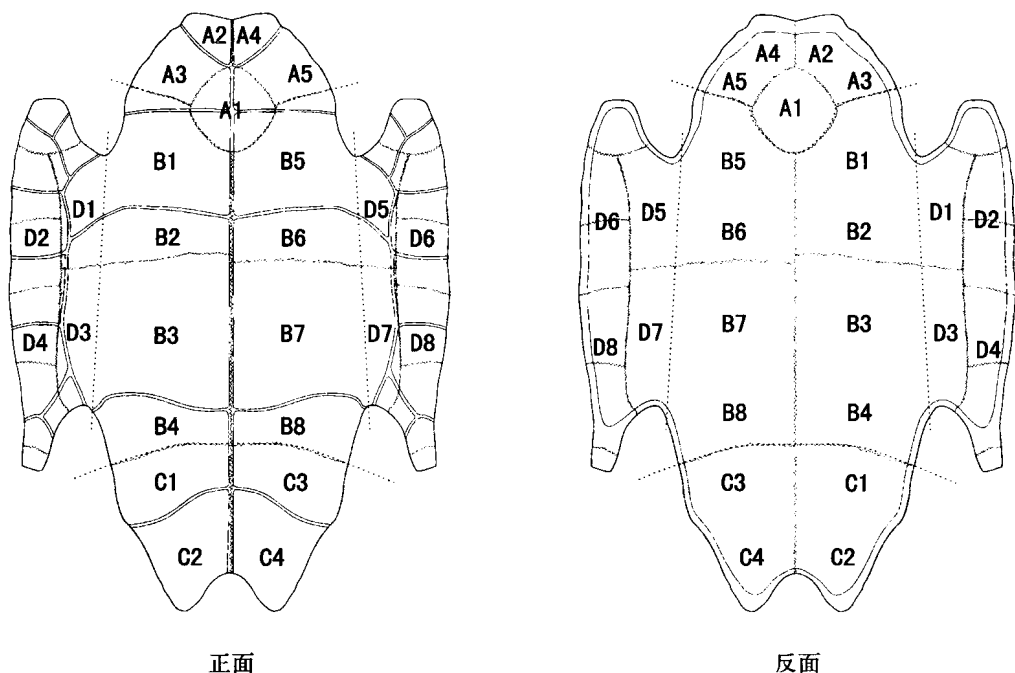
⑥ 陕西省考古所泾水队:《陕西邠县下孟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0 年第 1 期。

⑦ 畅文斋、顾铁符:《山西洪赵县坊堆村出土的卜骨》,《文物参考资料》1956 年第 7 期。

边缘等自然纹路,将腹甲分为甲首、甲腹、甲尾、甲桥。背甲以盾纹为界,分为颈版、脊版、肋版、边版;以齿缝为界,分为颈甲、脊甲、尻甲、肋甲、边甲等几个部位。同时参考以往学者的说法来命名各部位名称,以便后文更好地考察各部分的自然状况、整治方式、钻凿形态及分布等。以下对龟甲各部位的特征作简单介绍。

1. 腹甲

占卜时,腹甲通常用整体。本文参考以往学者的描述以及观察实物本身,以正面的千里路为界区分左右,以齿缝或盾纹为界区分上下,以下分别详细描述各部位的特征,反面的左面相当于正面的右面(图十一,表七)。



图十一 腹甲各部位的名称

(==: 盾纹、~~~~: 齿缝、▨: 千里路、—: 边缘)

甲首(A): A1. 内板(内腹甲), A2. 左上舌板(左上舌腹甲), A3. 左下舌板(左下舌腹甲), A4. 右上舌板(右上舌腹甲), A5. 右下舌板(右下舌腹甲), 甲腹(B): B1. 左上甲腹上段, B2. 左上甲腹下段, B3. 左下甲腹上段, B4. 左下甲腹下段, B5. 右上甲腹上段, B6. 右上甲腹下段, B7. 右下甲腹上段, B8. 右下甲腹下段, 甲尾(C): C1. 左上甲尾, C2. 左下甲尾, C3. 右上甲尾, C4. 右下甲尾, 甲桥(D): D1. 左上甲桥内侧, D2. 左上甲桥外侧, D3. 左下甲桥内侧, D4. 左下甲桥外侧, D5. 右上甲桥内侧, D6. 右上甲桥外侧, D7. 右下甲桥内侧, D8. 右下甲桥外侧。

(1) 甲首(A): 腹甲上部“V”形齿缝以上的部分,包括内板(或内腹甲)和舌板(或舌腹甲)。内板四面以齿缝为界,菱形,中间被十字形盾纹分为四个部分。舌板以千里路为界分为左右两部分,左右舌板又以盾纹为界可分为上下两部分。甲首整体比较厚,左右上舌板最厚。

(2) 甲腹(B): 介于甲首和甲尾之间,是卜用腹甲的主要部分。以千里路和中部齿缝为界可以将甲腹分为四个部分,各部分又可以盾纹为界分为上下两段。一般甲腹反面经刮平,修整后的甲腹中间薄、周缘厚,中部的钻凿也因之较浅。

(3) 甲尾(C): 甲腹(腹甲下部横向齿缝)以下的部分,以千里路为界可分为左右甲尾,左右甲尾各自又可以盾纹为界分为上下两部分。甲尾整体较厚,但中间略薄于边缘。

(4) 甲桥(D): 甲腹左右两侧向外突出并向背侧弧曲的部分。左右甲桥又各自以中间十字形齿缝为界分上下、内外四个部分,上边略宽于下边。晚商整治龟甲,一定要将甲桥上下两端突出部分削去;而早、中商与西周的甲桥宽大,保留甲桥的两端。

表七 腹甲各部位名称诸家对比表①

		董作宾		严一萍	高 明		沈之瑜		本 文			
		齿缝	盾纹		齿缝	盾纹	齿缝	盾 纹				
A	1	中甲		内腹甲 (中甲)	中甲		内板 (内腹甲)		甲 首	内板 (内腹甲)		
	2	首左甲	左一鳞	左舌腹甲 (左首甲)	首左甲	左一鳞	左舌板 (左舌腹甲)	左喉板(左喉盾)		左舌板 (左舌腹甲)	上	
	3		左二鳞			左二鳞		左腕板(左腕盾)			下	
	4	首右甲	右一鳞	右舌腹甲 (右首甲)	首右甲	右一鳞	右舌板 (右舌腹甲)	右喉板(右喉盾)		右舌板 (右舌腹甲)	上	
	5		右二鳞			右二鳞		右腕板(右腕盾)			下	
B	1	前左甲	左三鳞	左上腹甲 (左前甲)	前左甲	左三鳞	左上板 (左上腹甲)	左胸板(左胸盾)	甲	左	上(前)	上
	2		左四鳞			左四鳞		左腹板(左腹盾)			下	
	3	后左甲	左下腹甲 (左后甲)			后左甲	左下板 (左下腹甲)	左胫板(左股板)			上(后)	上
	4		左五鳞								左五鳞	下
	5	前右甲	右三鳞	右上腹甲 (右前甲)	前右甲	右三鳞	右上板 (右上腹甲)	右胸板(右胸盾)		右	上(前)	上
	6		右四鳞			右四鳞		右腹板(右腹盾)			下	
	7	后右甲	右下腹甲 (右后甲)			后右甲	右下板 (右下腹甲)	右胫板(右股板)			上(后)	上
	8		右五鳞								右五鳞	下
C	1	尾左甲	左五鳞	左剑腹甲 (左尾甲)	尾左甲	左五鳞	左剑板 (左剑腹甲)	左胫板(左股板)	甲	左	上	
	2		左六鳞			左六鳞		左臀板(左肛盾)			下	
	3	尾右甲	右五鳞	右剑腹甲 (右尾甲)	尾右甲	右五鳞	右剑板 (右剑腹甲)	右胫板(右股板)		右	上	
	4		右六鳞			右六鳞		右臀板(右肛盾)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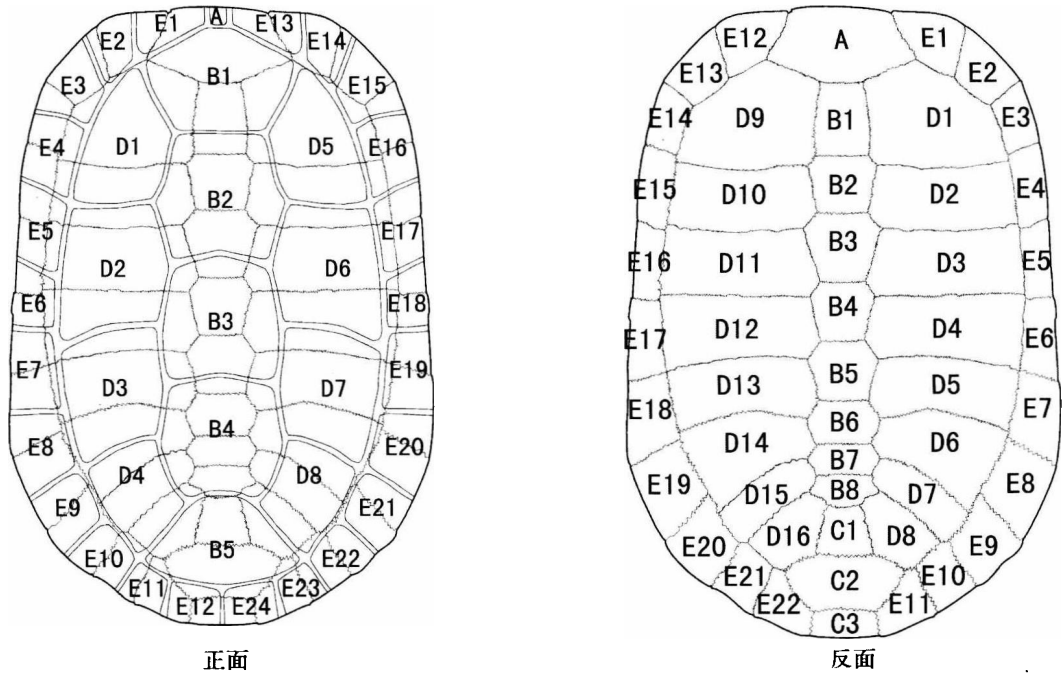
① 腹甲各部位名称取自: 董作宾《商代龟卜之推测》;严一萍《甲骨学》;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沈之瑜《甲骨文讲疏》。

续表

		董作宾		严一萍	高 明		沈之瑜		本 文			
		齿缝	盾纹		齿缝	盾纹	齿缝	盾 纹				
D	1			左甲桥	左甲桥		左甲桥		甲	左	上	内
	2											外
	3										下	内
	4											外
	5			右甲桥	右甲桥		右甲桥		桥	右	上	内
	6											外
	7										下	内
	8											外

2. 背甲

背甲为弧形而厚,整治背甲一般从中间一分为二,不分开占卜的很少。生物学家秉志对安阳田龟的特征进行了详细的叙述^①,本文参考此文以及观察实物本身,以反面的齿缝来分别详细描述各部位的特征(图十二,表八)。



图十二 背甲各部位的名称

以盾纹为界(正面): A. 颈版, B1—5. 脊版, D1—4. 左肋版, D5—8. 右肋版, E1—12. 左边版, E13—24. 右边版。
以齿缝为界(反面): A. 颈甲, B1—8. 脊甲, C1—3. 尻甲, D1—8. 左肋甲, D9—16. 右肋甲, E1—11. 左边甲, E12—22. 右边甲。

① 秉志:《河南安阳之龟壳》,《安阳发掘报告》第3期,1931年。

(1) 颈甲：最上中间的 1 块(A)，较大，不规则六边形，前缘最长。

(2) 脊甲：背甲中间的部分，一共 8 块。第一脊甲(B1)长方形；第二至第八脊甲(B2—8)，皆六边形。第五至第七都有小隆起。

(3) 尻甲：最下中间的 3 块，上尻甲(C1)四边形，长大于宽；中尻甲(C2)六边形，宽大于长；下尻甲(C3)四边形，后缘有凹，宽大于长。

(4) 肋甲：左右肋甲各有 8 块，一共 16 块；正面的肋盾各有 4 块，一共 8 块。正面的肋甲与肋盾之边缘，大部相合。第一肋甲(D1)七边形；第二至第八(D2—8)，皆五边形，第八最短。

(5) 边甲：左右边甲各有 11 块，一共 22 块。第一边甲(E1)之前缘较薄，厚度向后渐增；第二边甲(E2)大致亦如此；第三(E3)之反面与腹甲骨桥前端对应；第四、五、六(E4—6)等反面皆四边形，正面隆起，与腹甲甲桥之本部对应；第七(E7)之反面，四边形的，正面向外渐薄，其前部为甲桥之后端；第八、九、十(E8—10)皆为四边形；第十一(E11)系五边形。最后之四甲，其边缘皆较薄于中部。

表八 背甲各部位名称诸家对比表〔()是数量〕

		严一萍	沈之瑜		本 文	
		齿 缝	齿 缝	盾 纹	齿 缝	盾 纹
A		脊甲(12)	颈甲(1)	颈甲(1)	颈甲(1)	颈版(1)
B			脊甲(8)	脊甲(5)	脊甲(8)	脊版(5)
C			尻甲(3)		尻甲(3)	
D	左	左肋(8)	肋甲(16)	肋甲(8)	左肋甲(8)	左肋版(4)
	右	右肋(8)			右肋甲(8)	右肋版(4)
E	左	左髀(11)	边甲(22)	边甲(24)	左边甲(11)	左边版(12)
	右	右髀(11)			右边甲(11)	右边版(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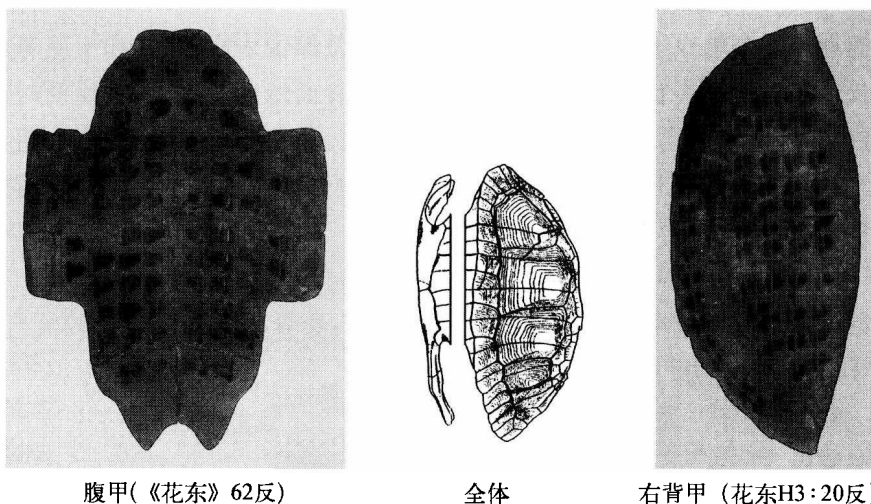
(二) 龟甲的整治

1. 龟甲整治的模式

按照《周礼·春官·龟人》之说，龟人掌管六龟之属，各有名物。各以其方之色与其体来判断。一般秋天取龟，春天攻龟。整治并施钻凿后，其物归纳于龟室保存，待占卜时取用^①。在殷墟曾出土已经整治并加施钻凿，但没有灼烧取兆的一批甲骨材料。

^① 《周礼·春官·龟人》：“龟人掌六龟之属，各有名物。天龟曰灵属，地龟曰绎属，东龟曰果属，西龟曰雷属，南龟曰猎属，北龟曰若属。各以其方之色与其体辨之。凡取龟用秋时，攻龟用春时，各以其物入于龟室。上春衅龟，祭祀先卜。若有祭事，则奉龟以往；旅亦如之，丧亦如之。”

整治龟甲时,先把腹甲和背甲用刀锯分开。腹甲通常用整体;背甲为弧形圆鼓,一般从中间一分为二,不分开占卜的很少(图十三)。



图十三 攻治龟的虚拟图

整体腹甲比背甲要平。腹甲的甲首、甲腹、甲尾部分较平,甲桥为弧形;甲腹较薄,甲首、甲尾较厚。各时期龟甲的整治方式不同,造成各期甲骨不同的形状。早、中商和西周几乎没有刮平,因此腹甲较厚,保留甲桥较多;晚商几乎刮平,整体腹甲较平,保留的甲桥较窄小。

背甲分为两块,各时期整治方式也有不同,出现几种形状。如整个背甲分为两块后,有的只把边缘部分稍微修整;有的去掉脊甲只用肋甲与边甲;有的脊甲和肋甲联结部分修整刮平,成为小型椭圆鞋底式;也有的不修整,保留原形状;还有的不分开即行占卜。

2. 龟甲各部位的整治类型

卜甲以腹甲占绝大多数。腹甲的几个部位特征较为明显,也容易找出不同类型的特点。腹甲各部位的整治方式,分述如下:

(1) 甲首

A 型:基本保留原状。

I 式:稍微修治,保留表皮。

商代早期二里岗文化一般稍加修整,保留原貌,表皮没有刮削,有的稍微磨光。如郑州二里岗上层一期^①的腹甲(标本 C5.3H310:3,南关外)(图版八,1)、济南大辛庄遗址^②的腹甲(标本 03DXZT0102H603:5)。

① 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836页,图版二九九~2。

② 王华:《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攻治技术研究》,山东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6年,22、23页,图七~1。

此外,边远地区商周时期仍然沿用,如忠县瓦渣地遗址^①的腹甲(标本 T311⑩:2)(图版八,2)。

Ⅱ式:稍微削平,局部保留表皮。

中商时期开始刮削腹甲的反面。一般较薄的部位保留表皮;甲首和甲尾等较厚部位稍微刮掉反面。左右舌板和甲首边缘均保留表皮。骨面留得较厚,没有晚商时期那么平整。中、晚商时期曹演庄类型、台西类型、大辛庄类型、殷墟类型(主要殷墟一期)、周梁王桥类型等常见。如安阳洹北商城遗址^②的腹甲(标本 T2③:1)(图版九,3)、藁城台西遗址^③的腹甲(标本 F2:39)。

B型:削平龟反面,成一片骨板。

殷墟第一期开始将龟甲反面削平,成为较薄的一片骨板。晚商时期较流行。如《花东》的94(H3:306)(图版十,3)、231(H3:668)。

C型:掏挖后留下半圆形的前边。

西周时期甲首经掏挖后留下“半圆形”或“Λ形”的前边,留有宽约0.5厘米的边棱,其内削磨平整,留下的腹甲较宽厚。有的甲首前边中间有一“(长)方形”或“圆形”的浅穴。

I式:没有浅穴。

绝大多数的腹甲没有甲首中间的浅穴。如《周原》FQ2(原号 FQT1H3:1)、周公庙遗址的卜甲(标本 H1⑪:440、H1⑫:36 + H1⑬:144)。

Ⅱ式:甲首中间有浅穴。

西周时期开始出现较为特殊的整治方式,即将甲首中间挖出1个浅穴。有的学者认为这一特点是“西周腹甲的定制”^④。其形状的特点分为以下3种:

Ⅱa式:方形。

如扶风周原齐家遗址^⑤的腹甲(标本 M47:1、扶齐镇采:5)(图二十九,2)、房山琉璃河燕都遗址^⑥的腹甲(标本 G11H108①:4)(图版八,4)。

Ⅱb式:长方形。

如扶风周原齐家遗址^⑦的腹甲(标本 M47:2、H3:4)(图版八,5)、洛阳北窑遗址^⑧的腹甲(标本 T25H238:1)。

①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三峡考古队、忠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忠县瓦渣地遗址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669页,图版二三。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8年~1999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5),文物出版社,2004年,335页,图26~1,图版12。

③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图版五八~5。

④ 李学勤:《西周甲骨的几点研究》,《文物》1981年第9期。

⑤ 罗西章、王均显:《周原扶风地区出土西周甲骨的初步认识》,《文物》1987年第2期。

⑥ 琉璃河考古队:《琉璃河遗址1996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6期。

⑦ 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县齐家村西周甲骨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9期;罗西章、王均显:《周原扶风地区出土西周甲骨的初步认识》,《文物》1987年第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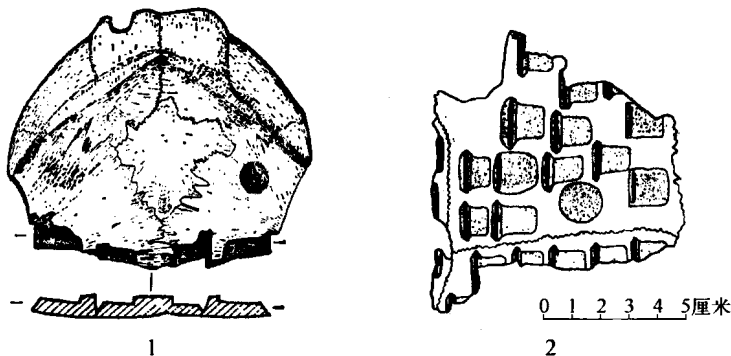
⑧ 赵振华:《洛阳两周卜用甲骨的初步考察》,《考古》1985年第4期。

Ⅱc 式：圆形。

如洛阳泰山庙遗址^①的腹甲(图版八,6)。

此外,在背甲的颈甲也发现圆形浅穴,如岐山周公庙遗址的背甲(标本 C10④:2,为背甲)(图版十一,5),直径 1 厘米、深 0.6 厘米。

另外,类似的圆浅穴也见于腹甲其他部位,如洛阳北窑遗址^②的腹甲(标本 T28⑤:1)(图十四,1)在甲腹(左上甲腹上段,B1)上有 1 个圆形浅穴;扶风周原齐家遗址^③的腹甲(标本 T1H3:2)(图十四,2)在甲腹(右上甲腹下段,B6)中间有 1 个圆形浅穴。



图十四 腹甲上的圆浅穴

1. 洛阳北窑遗址(标本 T28⑤:1) 2. 扶风齐家遗址(标本 T1H3:2)

(2) 甲腹和甲尾

甲腹和甲尾的整治方式与甲首大同小异。

A 型：稍微修治,保留表皮。

与甲首 A 型 I 式相同,一般稍加修整,保留原貌,表皮也没有刮削,有的磨光。如郑州二里岗上层一期^④的腹甲(标本 C5H39:7,南关外)(图版八,7)、济南大辛庄遗址^⑤的腹甲(标本 03DXZT0102H603:5)。

B 型：稍微削平,局部保留表皮。

I 式：刮磨较少,表皮保留较多。

与甲首 A 型 II 式相同,中商时期开始刮削腹甲的反面。一般较薄的部位保留表皮,较厚的部位稍微刮掉,骨面留得较厚。与甲首 A 型 II 式的例子相同。

II 式：刮磨较多,表皮保留较少。

比中商时期腹甲削平刮磨多,但没有晚商时期刮削那么多。如《周原》的 FQ2(原号

① 郭宝钧、林寿晋：《一九五二年秋季洛阳东郊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 9 册，1955 年，92 页，图版贰。

② 赵振华：《洛阳两周卜用甲骨的初步考察》，《考古》1985 年第 4 期。

③ 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县齐家村西周甲骨发掘简报》，《文物》1981 年第 9 期；罗西章、王均显：《周原扶风地区出土西周甲骨的初步认识》，《文物》1987 年第 2 期。

④ 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 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 年，836 页，图版二三九～1。

⑤ 王华：《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整治技术研究》，山东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6 年，22、23 页，图七～1。

FQT1H3:1)、周公庙遗址的卜甲(标本 H2①c:40)(图版八,8)。

C 型:削平龟反面,成一片骨板。

与甲首 B 型相同,腹甲反面经过削平,成为较薄的一片骨板。与甲首 B 型的例子相同。

(3) 甲桥

A 型:只保留甲桥的内侧。

I 式:甲桥与甲腹之间呈锐角。

I a 式:露出竖行齿缝,未加整治。

甲桥只保留中间竖行齿缝内侧部分。甲桥与甲腹之间呈锐角,未加整治。商代早期二里岗文化中常见。与甲首 A 型 I 式的例子相同。

I b 式:削去竖行齿缝。

商代中期以曹演庄类型、台西类型为代表。龟甲个体较小,甲桥与甲腹之间呈锐角,经过修整。如安阳洹北商城遗址①的腹甲(标本 T2③:1、T4⑥:46)(图版九,3)、藁城台西遗址②的腹甲(标本 T13:97)。

II 式:甲桥与甲腹之间呈直角或钝角。

商代晚期以殷墟类型个体较小的龟甲为代表。甲桥与甲腹之间呈直角或钝角,经过修整。如《花东》20(H3:63)(图版十,1)、405(H3:1284)、500(H3:1506)。

B 型:保留甲桥内、外侧。

将甲桥外侧的宽度和甲桥、甲腹之间的形状分以下几式:

I 式:甲桥与甲腹之间呈锐角。

I a 式:甲桥外侧保留较少,甲桥与甲腹之间呈锐角,经过修整。

主要在中、晚商时期常见,龟甲个体较大。属于商代中期的曹演庄类型、台西类型、大辛庄类型和属于商代晚期的殷墟类型③(第二期)、曹演庄类型、大辛庄类型、周梁玉桥类型等均有。如安阳洹北商城遗址④的腹甲(标本 T2③:29)(图版九,4)、藁城台西遗址⑤的腹甲(标本 T13:131)、安阳苗圃北地遗址⑥的腹甲(标本 84H16:4)。

I b 式:甲桥外侧保留较多,甲桥宽大;甲桥与甲腹之间呈锐角。

主要在西周时期常见。如洛阳北窑遗址⑦的腹甲(标本 T3H83:14 + T3H90:3 +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8 年~1999 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5),文物出版社,2004 年,335 页,图 26-2,图版 14。

②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 年,图版五八~6。

③ 本文将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的甲桥类型中,“A1 式”和“C1 式”均归属于该类型,其余“A 型”、“B 型”、“C 型”分别归属于本文 B 型 II a 式、B 型 II b 式、A 型 II 式(见《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钻凿形态研究》,《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六),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年,1765—1769 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8 年~1999 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5),文物出版社,2004 年,335 页,图 26-2,图版 16。

⑤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 年,图版五八~4。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2~1984 年安阳苗圃北地殷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91 年第 1 期。

⑦ 赵振华:《洛阳两周卜用甲骨的初步考察》,《考古》1985 年第 4 期,图五~2。

T3H83:8)、安阳殷墟遗址^①的腹甲(图二十九,1)。

Ⅱ式:保留甲桥外侧部分,经过削割,甲桥与甲腹之间呈直角或钝角。

该类式主要流行于商代晚期殷墟类型。甲桥的宽度又分2种:

Ⅱa式:甲桥较宽,外侧留得较多。

殷墟二期常见,如《花东》138(H3:443)(图版十,2)、267(H3:789)、476(H3:1468)。

Ⅱb式:甲桥较窄,外侧留得较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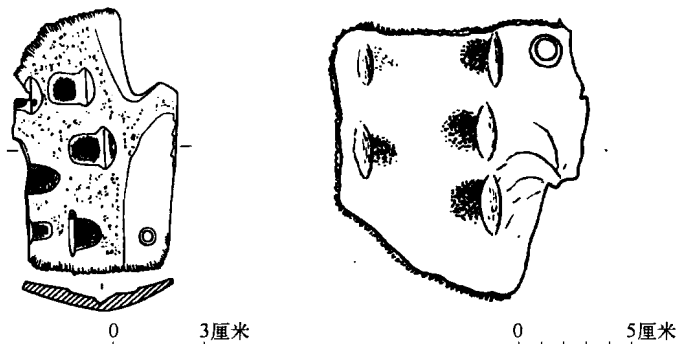
殷墟二期至殷末普遍使用,如《花东》94(H3:306)(图版十,3)、294(H3:880)、356(H3:1131)。

(4) 小钻孔

商周时期卜甲上出现小钻孔^②。虽数量不太多,但作用较特殊,这里将详细地加以探讨。根据小钻孔所在位置的不同,可分为以下几种:

A型:甲桥的中间。

在甲桥的中间钻有一穿透的小孔,有的仅在一侧甲桥上,有的左右两侧甲桥上均有。这类现象在中商时期曹演庄类型开始出现,商代晚期殷墟类型中常见。此类钻孔的作用,可能是用绳子将两版卜甲穿系在一起。如安阳洹北商城遗址^③的腹甲(标本T4^④:39)(图十五,1)、济南大辛庄遗址^④的腹甲(标本03DXZT2302^⑤B:1)(图版七,4)、郑州人民



图十五 甲桥中间的小钻孔

1. 安阳洹北商城遗址(标本T4^④:39) 2. 郑州人民公园遗址(标本C7H111:46)

① 肖楠:《安阳殷墟发现“易卦”卜甲》,《考古》1989年第7期。

② 此外,一些卜骨上也有钻孔,数量极少。以其所在位置的不同,可分为以下2种:A型:骨面中间。济南王府遗址的2件卜骨(标本H152:15、H130:17)中有小钻孔,位于中部,且均已钻透,似乎不属于占卜行为。另外,齐家村文化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的2件卜骨(标本T7H6、T11^③),在骨面中间有圆形钻孔,但这2件应不是这里所说的小钻孔。B型:扇部下端中间(靠近颈侧缘)。郑州二里岗下层二期的卜骨(标本C9.1H106:13)、安阳洹北商城遗址的卜骨(标本T1H4:1),均有一个小钻孔。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8年~1999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5),文物出版社,2004年,335页,图26-5。

④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考古所:《济南市大辛庄遗址出土商代甲骨文》,《考古》2003年第6期。

公园期文化遗址^①的腹甲(标本 C7H111:46)(图十五,2)、《花东》34(H3:115+241+246)、182(H3:557,左右甲桥各有1个)(图版七,1)、421(H3:1325)、499(H3:1505,右甲桥有1个)(图版七,2)^②。

B型:甲桥的前后两端。

西周时期甲桥较宽大,甲桥的前后两端也较突出。一些卜甲在甲桥上下两端边缘钻有一小圆形透孔,孔径约2毫米。可能是为了将两版甲骨系在一起。

如《周原》H11部分钻孔甲桥和 H11:219^③、洛阳北窑遗址^④的腹甲(标本 T3H83:14+T3H90:3+T3H83:8)、扶风齐家遗址^⑤的腹甲(标本 M47:1)(图二十九,2)。

C型:腹甲中的钻孔。

I式:一孔。

济南大辛庄遗址^⑥的腹甲(标本 03DXZT0102H603:5)(图二十六,2),在甲腹中间靠近千里路处有一个小孔,似为穿系所用。

II式:两个以上。

小钻孔的位置不固定,一般一版卜甲有数孔,两两对称,孔径较小。可以看出,该类钻孔是将同版断折的卜甲用细绳相缀连。

如《花东》205(H3:615)(图版七,3)、215(H3:632),洛阳西干沟遗址^⑦的腹甲(H815)。

这样的钻孔在陶器上也常见,如神木新华遗址^⑧的三足瓮,该器系瓮棺葬具,出土时残为数片,在陶片的外缘共有圆形钻孔21个,基本两两对称,可见此器系缀合起来作为葬具使用的。

D型:背甲上的钻孔。

商代晚期部分背甲的形状近似鞋底形,其中间还有小圆孔。与下文背甲C型(鞋底形)例子相同。

已有许多报告指出此类圆孔的用处,一般用于穿系绳子,或为保存方便,或为连接断裂的甲骨。

3. 整体龟甲整治的类型

(1) 腹甲

A型:腹甲保留表皮,稍加修整;甲桥只保留中间竖行齿缝内侧部分。

① 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926页,图六一九,图版二七一。

② 安阳花园庄东地卜甲中,上百版上发现小圆孔。左、右甲桥各有一个,孔径0.6—0.8厘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队:《1991年安阳花园庄东地、南地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6期)。

③ 《周原甲骨文》一书中也有这样的钻孔,报告认为是甲尾上的钻孔,但笔者认为钻孔应在甲桥前后两端(曹玮:《周原甲骨文》,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157页)。

④ 赵振华:《洛阳两周卜用甲骨的初步考察》,《考古》1985年第4期。

⑤ 罗西章、王均显:《周原扶风地区出土西周甲骨的初步认识》,《文物》1987年第2期。

⑥ 王华:《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整治技术研究》,山东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6年,22、23页,图七~1。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报告——1955~1960年洛阳涧滨考古发掘资料》,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99页,图版四八。

⑧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神木新华》,科学出版社,2005年,156页,图一八八。

最早发现于郑州南关外遗址,商代早期郑州二里岗文化上下层常见^①。到二里岗上层时,范围扩大。如登封王城岗遗址^②的腹甲(标本 WT10^③:20)、柘城孟庄遗址^③的腹甲和大辛庄类型的济南大辛庄遗址^④的腹甲(标本 03DXZT0102H603:5、03DXZT1503M63:016、03DXZT1503H592:4)(图二十六,2)、泗水尹家城遗址^⑤的腹甲(标本 T222^⑥:36),都有发现。

B 型: 腹甲反面刮磨较少,局部保留表皮,龟板较厚较粗糙;甲桥经过修整,甲桥与甲腹之间呈锐角。

商代中期以曹演庄类型为代表。商代中、晚期曹演庄、台西、大辛庄、殷墟(主要殷墟一期)、周梁玉桥类型等常见。一般龟甲个体较小的仅用甲桥内侧;个体较大的甲桥内外侧均用。

I 式: 只保留甲桥的内侧。

如安阳洹北商城遗址^⑥的腹甲(标本 T2^③:1、T4^⑥:46)(图版九,3)、藁城台西遗址^⑦的腹甲(标本 T13:97)、磁县下七垣遗址^⑧的腹甲(标本 T21^③:1087)(图版九,2)。甲桥部分同于甲桥 A 型 I b 式。

II 式: 保留甲桥内、外侧。

如安阳洹北商城遗址^⑨的腹甲(标本 T2^③:29)(图版九,4)、藁城台西遗址^⑩的腹甲(标本 T13:131)。甲桥部分与甲桥 B 型 I a 式相同。

C 型: 腹甲反面削平较多,龟板较薄较平;甲桥经过修整,甲桥与甲腹之间呈直角或钝角。

商代晚期以殷墟类型为代表,其他类型中未见。一般龟甲个体较小的仅用甲桥内侧;个体较大的甲桥内外侧均用。

I 式: 只保留甲桥的内侧。

如《花东》20(H3:63)(图版十,1)、405(H3:1284)、500(H3:1506)。甲桥部分同于甲桥 A 型 II 式。

II 式: 保留甲桥内、外侧。

有的甲桥较宽,外侧留得较多,殷墟一期至二期前段常见,如《花东》138(H3:443)

① 笔者赴郑州市考古所看到郑州耀包城工程工地出土的腹甲(2006H6),较完整,属于该型(图版九,1)。

②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169页,图版五九。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商丘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柘城孟庄商代遗址》,《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

④ 徐基:《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的初步研究》,《文物》1995年第6期;王华:《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整治技术研究》,山东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6年。

⑤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研室:《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253页,图版九九。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8年~1999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5),文物出版社,2004年,335页,图26-2,图版14。

⑦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图版五八~6。

⑧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下七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8年~1999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5),文物出版社,2004年,335页,图26-2,图版16。

⑩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图版五八~4。

(图版十,2)、267(H3:789)、476(H3:1468);有的甲桥较窄,外侧留得较少,殷墟二期至殷末普遍使用,如《花东》94(H3:306)(图版十,3)、294(H3:880)、356(H3:1131)。

甲首部分与甲首B型Ⅱ式相同。

D型:腹甲反面经过削平,甲首掏挖后留下半圆形的前边;甲桥基本保留,甲桥与甲腹之间呈锐角。

周代以周原甲骨为代表,使用范围较广泛,许多诸侯国也可见。腹甲反面经过削平,甲首掏挖后留下半圆形的前边,留有宽约0.5厘米的边棱,其内削磨平整,留下的腹甲较厚,有的甲首前边中间有一方形或圆形的浅穴。甲桥基本保留,仅前后尖突部分被切锯,甲桥与甲腹相连部分呈锐角,只是稍作修整,边缘削平。有的甲桥上下两端边缘钻有一小圆形透孔,孔径2毫米左右。甲首、甲桥部分与甲首C型和甲桥B型Ⅰb式相同。如洛阳北窑遗址^①的腹甲(标本T3H83:14+T3H90:3+T3H83:8)、安阳殷墟遗址^②的腹甲、扶风齐家村遗址^③的腹甲(标本M47:2)(图版八,5)。

此外,西周中晚期,甲桥只保留中间竖行齿缝内侧部分,整治方式较粗略。如长安张家坡墓地^④的腹甲(标本M2:35:1、2、3、4、5)(图版十,4)、信阳孙砦遗址^⑤的腹甲(标本H3:92、H3:14)。

(2) 背甲

商周时期发现的卜甲中绝大多数为腹甲,背甲较少。商代早期,仅见腹甲,还没发现占卜过的背甲。中商至西周时期腹甲、背甲均用。背甲商代中、晚期较多见,西周时期较少见。

A型:用整个背甲。

Ⅰ式:稍微修整。

商代中期以台西类型为代表,背甲的整治方式较原始,几乎保持整体的形状。如藁城台西遗址^⑥的背甲(标本T4:13、F6:59、F6:44)(图版十一,1)、藁城北龙宫遗址^⑦的背甲。

商代晚期殷墟类型的背甲也有少数未锯开的。如《释》零肆捌+《乙编》5379^⑧。

Ⅱ式:反面多经修整,周边挫磨平整。

周代在豫南鄂北地区常见,背甲反面掏挖修整,周边挫磨平整,正面则未经加工。如襄樊真武山遗址^⑨的背甲(标本H81:6、H45:2)(图十六)、信阳孙砦遗址^⑩的背甲(标本H4:6)。

① 赵振华:《洛阳两周卜用甲骨的初步考察》,《考古》1985年第4期,图五~2。

② 肖楠:《安阳殷墟发现“易卦”卜甲》,《考古》1989年第7期。

③ 罗西章、王均显:《周原扶风地区出土西周甲骨的初步认识》,《文物》1987年第2期。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317页,图版189—19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沔西队:《1987、1991年陕西长安张家坡的发掘》,《考古》1994年第10期。

⑤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孙砦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9年第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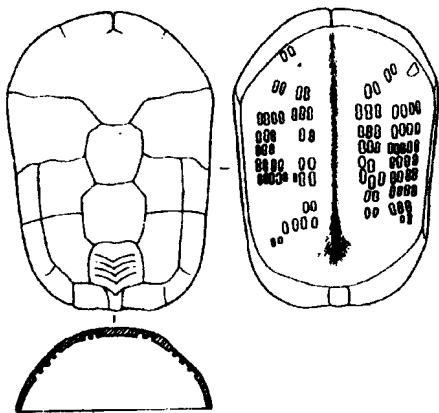
⑥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图版五七、六二。

⑦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北龙宫商代遗址的调查》,《文物》1985年第10期。

⑧ 刘渊林:《卜用甲骨上政治技术的痕迹之研究》,台湾“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印行,1984年,308页,图112。

⑨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博物馆:《湖北襄樊真武山周代遗址》,《考古学集刊》第九集,1995年,158页,图十七。

⑩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孙砦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9年第2期。



图十六 周边挫磨平整图(襄樊真武山遗址的标本 H81:6)

B 型: 切成两半。

I 式: 只用肋甲和边甲, 留有自然齿缝。

背甲以齿缝作为边缘, 不用中间颈甲、脊甲、尻甲, 只用左肋甲和左边甲、右肋甲和右边甲, 未经加工。商代中、晚期以曹演庄、大辛庄类型为代表。目前, 邢台曹演庄遗址^①、安阳洹北商城遗址^②(标本 H18:54)、新乡李大召遗址^③(标本 II T2405H298:37)发现的背甲, 多数背甲碎片过于破碎, 还无法确认是否属于该类, 但较晚的临城补要村遗址^④的背甲(标本 ST10H70:02)(图版十一, 2)、桓台唐山遗址^⑤的背甲(标本 H122④)(图版十一, 3), 较为完整, 具有该类典型特征。

II 式: 以脊甲(或脊版)的中间为界, 切成两半, 经过修整。

商代晚期殷墟类型的背甲, 将背甲切成左右两块, 背甲中间颈甲、脊甲、尻甲亦用, 将边缘修整。如《甲编》3404、3398, 《乙编》5281、5388、6093、6666, 《丙编》66、3919, 《花东》50(H3:189+217+284+1529+1542)、87(H3:287+394+1511)、H3:20(图版十一, 4), 安阳苗圃北地遗址^⑥的背甲(标本 PNT234④:6、PNT130⑥:5)、郑州铭功路东遗址^⑦的背甲(标本 H2:14)、夏邑清凉山遗址^⑧的背甲(标本 F5:7)。此外, 还有沙市周梁玉桥

① 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邢台曹演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8年~1999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5),文物出版社,2004年,335页,图26-4。

③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 韩国河、赵海洲:《新乡李大召——仰韶文化至汉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6年,303页,图二〇八~5。

④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河北临城县补要村遗址南区发掘简报》,待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北临城县补要村遗址北区发掘简报》,待刊。

⑤ 宋艳波、燕生东:《鲁北地区商代晚期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三十五期,2007年12月。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202页,图版四四。

⑦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铭功路东商代遗址》,《考古》2002年第9期。

⑧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丘地区文管会:《河南夏邑清凉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研究》(四),科学出版社,2000年。

遗址^①的背甲(标本 H1 下:19)。

Ⅲ式:用肋甲和边甲,切去颈甲一半,留有自然齿缝,经过修整。

西周时期的背甲切成两半,以齿缝作为边缘,不用中间脊甲、尻甲,切去颈甲一半,用左肋甲和左边甲、右肋甲和右边甲。与商代中晚期曹演庄类型的背甲大同小异。如岐山周公庙遗址^②的背甲(标本 03C10^④:1、2)(图三十,2,图版十一,5)。

C 型:鞋底形。

在第十三次殷墟发掘时,发现有将龟背甲改制为椭圆形鞋底式的,因背甲凸凹不平,不利于钻凿,故将其从中间锯开,又取其近边甲较平坦部分,锯为椭圆形,不用脊甲,仅用肋甲一至七,边甲一至十,多数中间有一孔,可能为了方便穿绳子保存^③。《殷墟文字乙编》中收录有 12 块,均属于武丁时期。如《乙编》4679、4681、4682、4683、4747、4750、5014 + 5267、5241、5271、5302、6382、6684^④(图版十一,6)。此外,亦可见少数中间无孔者,如《合》8492、8591、14135。

三、小 结

本文先将兽类肩胛骨与龟甲(腹甲、背甲)分为几个部分,并分析了各部分的名称和特征,据此为已发现的残碎卜用甲骨定位,即确定它在完整个体上的位置。这样为我们探讨卜用甲骨的整治方式与钻凿形态以及行款走向等卜法问题,打下良好的基础。

以下关于卜用甲骨的整治方式,主要以牛肩胛和龟甲为例,对各时期中心地区甲骨整治的演变规律予以总结。

1. 卜骨

新石器时代卜骨大多未加修整,即使用自然的肩胛骨。龙山时期比较晚的卜骨中开始出现略加修整的现象,但仍然保留肩胛骨的原貌。

夏代早期,大多数猪、羊肩胛骨未经修整,牛肩胛骨略加修整;夏代晚期,猪、羊肩胛骨除极少数整治方式同于同时期的牛肩胛骨外,多未经整治,牛肩胛骨多经过整治,骨面削平,打磨光滑。

商代早期牛肩胛骨开始出现多种多样的整治方式。第一种,将骨脊上半部分去掉,保留根部,商代二里岗下层一期开始出现,商代早期二里岗下层一二期较常见。第二种,先

① 沙市市博物馆:《湖北沙市周梁玉桥遗址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10),文物出版社,1987年;彭锦华:《沙市周梁玉桥甲骨的初步研究》,《考古》1986年第4期。

② 周原考古队:《2003年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调查报告》,《古代文明》(第5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151—186页,彩版四、五、十、十一。

③ 沈之瑜:《甲骨文讲疏》,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32、33页。

④ 刘渊林:《卜用甲骨上攻治技术的痕迹之研究》,台湾“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印行,1984年,328页,图146。

将骨脊上半部分去掉,保留根部。再将骨白下部较厚部分掏挖,掏挖部分形状不规则。第三种,保留骨脊,将骨白下部较厚部分掏挖,掏挖部分形状不规则。第四种,将骨脊及骨白下部与胸侧缘较厚部分去掉,但加工较为简单粗糙,骨面未取平。第二、三、四种均在商代二里岗上层开始出现,较广泛流行,对周围地区影响甚大。但猪、羊、鹿的肩胛骨,多见骨脊削去,残留骨脊的根部,上部刻出凹槽者少见。

商代中期,牛肩胛骨将骨白切去一部分,再将骨脊及骨白下部与胸侧缘较厚部分去掉,柄部掏挖较深,上部边缘较直,有的略呈弧形,胸侧缘和颈侧缘均留有窄边,扇部仅胸侧缘留有窄边。骨脊及骨白下部与胸侧缘较厚部分去掉后,露出松质骨。有的骨白保留完整呈圆形。

商代晚期,牛肩胛骨将骨白切去一半或三分之二,再将骨脊及骨白下部与胸侧缘较厚部分去掉,柄部掏挖较深,与上部形成台阶,台阶边缘平直,整个骨面取平。白角切去较多,呈 90 度交角。有的柄部两侧及胸侧缘保留边缘,形状亦较为规则。

西周时期,均未去白角,但将突起部分刮平。骨面磨光,整体厚于殷墟晚期。

先秦时期卜骨的整治方式大致可分为 7 型(A~G 型)。新石器时代至夏代整治方式较简略,夏代晚期开始初步修治,商周时期各文化均有较为典型而明显的特点。先秦时期中心地区主要以牛肩胛骨为例,整治方式的演变过程总结描述如下:

A 型 I 式(新石器时代)→A 型 II 式(夏代早期)→C 型、B 型 I 式(夏代晚期)→B 型 II 式(商代二里岗下层)→D 型(商代二里岗上层)→E 型(商代中期)→F 型(商代晚期)→G 型(西周时期)。

2. 卜甲

商代早期,均为腹甲,未见背甲。甲桥只保留中间竖行齿缝内侧部分。腹甲均稍加修整。

商代中期,腹甲、背甲均用。腹甲与背甲分开。腹甲保留甲桥外侧部分,甲桥经过修整,甲桥与甲腹之间多呈锐角,极少数呈直角或钝角。由于刮磨较少,卜甲较厚,因此钻凿较深。背甲有的是完整的;有的切成两半,以齿缝作为边缘,不用中间颈甲、脊甲、尻甲,只用左肋甲和左边甲、右肋甲和右边甲。

商代晚期,腹甲、背甲均用。腹甲与背甲分开。腹甲保留甲桥外侧部分,边缘均经整治磨平,甲桥与甲腹之间呈直角,龟甲反面削平较多,从而使龟板较薄较平。背甲切成两半,中间颈甲、脊甲、尻甲亦用,将边缘修整。有的修整较多,形成近似鞋底形,有的中部还有小圆孔。

西周早期,腹甲、背甲均用。腹甲反面经过削平,甲首掏挖后留下半圆形的前边,留有宽约 0.5 厘米的边棱,其内削磨平整,留下的腹甲较厚,有的甲首前边中间有一方形或圆形的浅穴。甲桥基本保留,前后尖突部分被切锯,甲桥与甲腹相连部分呈锐角,只是稍作修整,边缘削平。有的甲桥上下两端边缘钻有一小圆形透孔,孔径 2 毫米左右。背甲切成两半(周公庙遗址的背甲 03C10④:1、2),以齿缝作为边缘,不用中间颈甲、脊甲、尻甲,只用左肋甲和左边甲、右肋甲和右边甲。与中商时期背甲类似。

兹以先秦时期中心地区的龟甲为例,将整治方式的演变过程总结如下:

腹甲:A型(商代早期)→B型(商代中、晚期)→C型(商代晚期)→D型(西周时期)。

背甲:A型I式(商代中期)→B型I式(商代中、晚期)→B型II式、C型(商代晚期)→B型III式(西周早期)→A型II式(西周中晚期)。

第二节 钻凿灼的形态与排列

甲骨反面的钻凿灼是古代占卜过程中的重要步骤之一,与甲骨文字有密切关系^①。因此,在甲骨学中对钻凿灼形态的特点、发展变化规律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以往研究多侧重于甲骨钻凿形态的研究,而忽略了施灼这一环节。钻凿的最终目的应是为了施灼,因此,本文在对钻凿形态进行研究外,亦对施灼这一环节进行探讨。

先秦时期,因时段和地域的不同,钻凿灼形态亦各种各样。资料表明,新石器时代至夏代早期的卜骨只施灼,后来,因为在卜骨较厚部位灼烧取兆过于费时费力,于是,开始出现了原始的圆钻。夏代晚期至商代早期的卜用甲骨只施灼或先施钻后烧灼。商代中期卜用甲骨出现了多样的占卜方式,如在同一片卜骨上有的圆钻有灼而无凿,大部分灼痕在钻内;有的灼在钻的一侧,其排列为左右相对。有的钻、凿、灼兼施,也有的只有钻灼或凿灼。弧形(枣核形)凿开始出现,钻凿基本上纵向排列,正反两面均施钻凿灼。钻坑底或圆或平,钻、凿大小不一,排列也无规律。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卜骨的钻、凿、灼一般正、反面兼施,极少数则只施于反面;卜甲则均施于反面。

本文在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许进雄的《卜骨上的钻凿形态》^②、《甲骨上钻凿形态的研究》^③和考古研究所的《小屯南地甲骨》^④、《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⑤为主要参照,对甲骨钻凿灼的称谓与形态特征作以下分析与说明。

一、钻凿灼的称谓与类型

(一) 钻、凿、灼的称谓与类型

卜用甲骨上的钻与凿以挖刻工具命名,同时也反映了形态的差别,学界一向称纵长的

① 于秀卿、贾双喜、徐自强:《甲骨的钻凿形态与分期断代研究》,《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中华书局,1981年。

② 许进雄:《卜骨上的钻凿形态》,艺文印书馆,1973年。

③ 许进雄:《甲骨上的钻凿形态的研究》,艺文印书馆,1979年。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的钻凿形态》,《小屯南地甲骨》下册第三分册,中华书局,1980年,1489—1525页。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钻凿形态研究》,《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六),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1765—1769页。

窝槽为凿,旁边的圆形或半圆形的窝坑为钻^①,但早有学者指出这种叫法不甚科学,如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中指出“卜甲上长凿旁的圆洞并非钻成,而是挖成的,或者是烧灼火力过大而使骨质剥裂而成,只有极少数是钻成的”^②,许进雄在《卜骨上的钻凿形态》中说“一向以洼洞之纵长者为凿,凿旁之半圆形者为钻。但是凿旁的圆洞也有些是凿成而不是钻成的。为与纯粹是钻成而不伴以长凿的小圆钻分别起见,概称凿旁的半圆洼洞为圆凿,通长的尖长形为长凿”^③。

商周时期,甲骨上的钻坑不都是用钻子钻成的,而凿槽也不是用凿子凿成的。所以钻凿之称名不符实。有学者把钻凿分别称为“圆凿、长凿”,但是,因钻凿之称已经成为甲骨学界惯用的名词^④,本文仍继续沿用^⑤。从新石器时代至周代,钻凿的目的却是为了控制烧灼与兆纹。有学者说“圆凿”也是从圆钻借用而来的,虽然商周时期不是全部用钻,但称之为“钻”也是合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屯南》也找出用各种工具作出的各种钻凿形状。钻凿本身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卜兆走向与形状,以凿槽控制兆身,钻坑控制兆枝。虽然作钻坑的工具和方式有多种,但主要目的仍然是为了施灼时容易在反面形成卜兆。

1. 钻

“钻”字,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鑽,所以穿也。从金,贊声。”段玉裁注:“本是器名。因之谓穿,亦曰鑽。”^⑥

最早的占卜是在骨面直接施灼的。烧灼时如果火力不大则不易产生兆纹。最初的钻,可能由占卜过程中烧灼的火力大形成浅坑而产生。后来占卜技术逐渐发展,烧灼时,为了容易发生兆纹,先在骨面较厚的部位施钻并加烧灼,这样就出现了初步的圆钻。到商周时期,钻的工具不同,钻坑也出现了不同的形状,其平面可分大、中、小圆形钻和方形钻,也有少数椭圆形和不规则形状;剖面有圜底、平底之别。其制作方式《屯南》一书中提出有以下几种^⑦:(1)用钻子钻成;(2)先用轮开槽,然后再用刀加工;(3)用刀子挖刻。一般甲骨上的钻坑可分为以下几种(图十七):

A型:不规则圆或椭圆形,但形态和大小不一,未成定制。

不规则圆形钻是圆形钻中较为原始的形态。目前所知,二里头类型的洛阳东干沟遗址^⑧

① 王华:《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整治技术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14页。

②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11、12页。

③ 许进雄:《卜骨上的钻凿形态》,艺文印书馆,1973年,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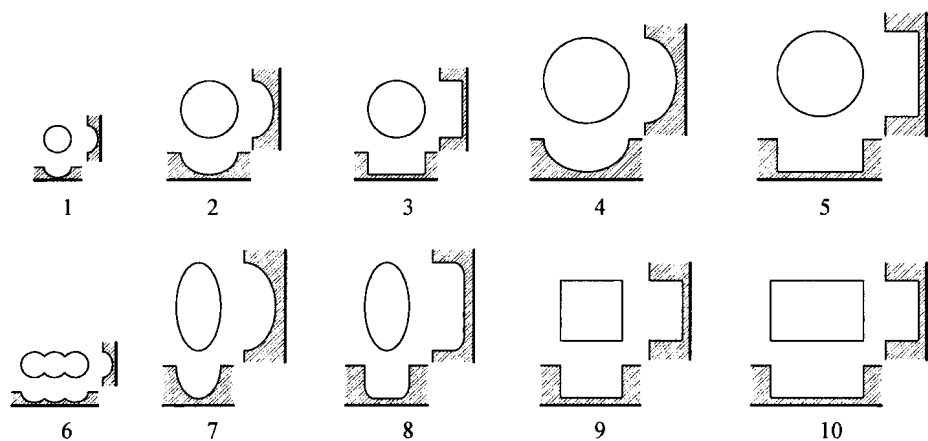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下册第三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1495页。

⑤ 在学界钻的叫法有“钻孔”、“钻坑”、“钻窝”、“钻洞”等,不一致,本文均改为“钻坑”;凿为“凿槽”为妥。

⑥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707页。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的钻凿形态》,《小屯南地甲骨》下册第三分册,中华书局,1980年,1489—1525页。

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报告——1955~1960年洛阳涧滨考古发掘资料》,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80、81页,图版四四。



图十七 钻型式图

1. B型Ⅰ式 2. B型Ⅱa式 3. B型Ⅱb式 4. B型Ⅲa式 5. B型Ⅲb式
6. B型Ⅳ式 7、8. C型 9. D型Ⅰ式 10. D型Ⅱ式

(标本 T514④:5)、巩县稍柴遗址①(标本 T4②:14)、陕县七里铺遗址②和荥阳西史村遗址③(标本 T9:12),共有 5 件,均为牛肩胛骨,此类卜骨最早应出现在二里头文化三期;东下冯类型的夏县东下冯遗址④(标本 J501:1、M523:1之1、2)(图版十二,1)、垣曲商城遗址⑤(标本 H250:20)、襄汾大柴遗址⑥,共有 10 多件,均为牛肩胛骨,其中时代最早的卜骨应属于东下冯文化Ⅲ期;牛角岗类型的杞县段岗遗址⑦(标本 90ⅡT19②:2),仅有 1 件羊肩胛骨;游邀类型的忻州游邀遗址⑧(标本 H591:2、H2:41)(图版四,4),出土卜骨 2 件,牛和羊肩胛骨各一;岳石文化的泗水尹家城遗址⑨(标本 T232⑦:39)、牟平照格庄遗址⑩(标本 H37:14、T5⑤:15)、夏邑清凉山遗址⑪(标本 H33:2、T5⑧:32)、民权李岗遗址⑫(标本 TG1⑤:19),出土地点和数量较多,有牛、猪、羊、鹿肩胛骨;先商文化的邢台粮库遗

①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巩县稍柴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3年第2期。

② 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河南分队:《河南陕县七里铺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

③ 郑州市博物馆:《河南荥阳西史村遗址试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5),文物出版社,1981年12月。

④ 东下冯考古队:《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东区、中区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146页,图版六三。

⑤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县博物馆:《垣曲商城:1985—1986年度勘察报告》(一),科学出版社,1996年,153页,图九八,图版五三。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襄汾县大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7期。

⑦ 郑州大学文博学院、开封市文物工作队:《豫东杞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230页,图一五三。

⑧ 忻州考古队:《山西忻州市游邀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4期;《忻州游邀考古》,科学出版社,2004年,138页,图一一二。游邀类型的年代,一般认为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但该遗址出土的卜骨特征与二里头文化晚期相同,在此暂归二里头文化晚期。究竟是早是晚,有待更多的材料证实。

⑨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研室:《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197页,图版七八。

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牟平照格庄遗址》,《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

⑪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丘地区文管会:《河南夏邑清凉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研究》(四),科学出版社,2000年,496页,图三二。

⑫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豫东商丘地区考古调查简报》,《华夏考古》2005年第2期。

址^①(标本ⅢH21:3、4)、新乡李大召遗址^②(标本ⅡT2506H299:149)、杞县鹿台岗遗址^③(标本H39:83、H35:33、H9:33),出土卜骨6件,其中牛肩胛骨5件,猪肩胛骨1件;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赤峰药王庙遗址^④(标本F2:10)、赤峰夏家店遗址^⑤(标本H2:1)、赤峰东山咀遗址^⑥(标本H1:9),出土卜骨5件,猪、羊肩胛骨各1件,其余种属不明。

由目前所出土的材料来看,夏王朝中心地区的偃师二里头遗址中未发现钻坑的卜骨。夏县东下冯遗址(东下冯类型Ⅲ期)和巩县稍柴遗址(二里头文化三期)出土的牛肩胛骨中可见钻坑,其所属年代可能最早,为寻找钻坑的起源提供了线索。岳石文化许多遗址常见此类卜骨,数量也较多,有牛、猪、羊、鹿肩胛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绝大多数卜骨,先钻后灼,无凿,然其年代较晚,应属夏代晚期至商代早期。

此外,商周时期个别地区,钻坑无固定规律,形状不规则,发现也不多,没有形成较统一的形态。如济南大辛庄遗址^⑦的卜甲(标本03DXZT2401F55:11,为腹甲)。

B型:圆形。

夏代晚期部分卜骨已经开始出现较为原始形态的圆钻。商周时期普遍使用,主要在卜骨上常见。因时间、考古学文化或同一个骨板上部位^⑧的差异,出现以下几型:

I式:小圆形钻,圜底。一般直径为0.3—0.6厘米。

商代二里岗上层一期开始出现,商代中、晚期较为常见。如郑州商城遗址^⑨的甲骨(标本C5H39:7、C5.3H310:3,均为腹甲;标本C15T14^⑩:15、C5H20:36、C5.1H112:17,均为牛肩胛骨)(图版十二,2)、济南大辛庄遗址^⑩的卜骨(标本84DXZ2J2:1)、西安老牛坡遗址的卜骨^⑪(标本88XL I 2H6:7)。

Ⅱ式:中圆形钻,一般直径为0.6—1.0厘米。

Ⅱa式:剖面为圜底。

最早见于商代二里岗上层一期,商代中期普遍使用,晚期也可见。如郑州商城遗

① 河北省邢台市文物管理处:《邢台粮库遗址》,科学出版社,2005年,64页,图六四,图版二。

②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 韩国河、赵海洲:《新乡李大召——仰韶文化至汉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6年,224页,图一五三。

③ 郑州大学文博学院、开封市文物工作队:《豫东杞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99、106、112页,图五四、五九,图版四。

④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内蒙古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61年第2期。

⑤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内蒙古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61年第2期。

⑥ 辽宁省博物馆、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赤峰县文化馆:《内蒙古赤峰县四分地东山咀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5期。

⑦ 王华:《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整治技术研究》,山东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6年,24页。

⑧ 因卜用甲骨大小、厚度的不同,使得在同一个骨板上,大、中、小型钻坑兼出现,如柄部和两侧缘较厚的部位,钻坑较大而深,肩部较薄的部位,钻坑较小而浅。这种大小、深浅的钻坑的差异主要为了控制反面的卜兆。

⑨ 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834—836页,图五六〇,图版二三七。

⑩ 王华:《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整治技术研究》,山东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6年,15页。

⑪ 刘士莪:《老牛坡》,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103页,图七七。

址^①的甲骨(标本 C5H39:7,为腹甲;标本 C9.1H142:39,为牛肩胛骨)(图版八,7)、济南大辛庄遗址^②的卜骨(标本 03DXZT2303H709:5,为牛肩胛骨)。

Ⅱb 式:剖面为平底。

商代中期开始出现,晚期普遍使用。如《屯南》751(H23:104)、忠县瓦渣地遗址^③的腹甲(标本 T311⑩:2)(图版八,2)。

Ⅲ式:大圆形钻,一般直径为 1.0—1.5 厘米。

Ⅲa 式:剖面为圜底。

商代中期出现而普遍使用,晚期也常见。如安阳洹北商城遗址^④的腹甲(标本 F1 垫土:3)、西安老牛坡遗址^⑤的卜骨(标本 88XL I 2H15:21,为牛肩胛骨)(图版五,2)。

Ⅲb 式:剖面为平底。

商代中期开始出现,商代晚期和西周时期普遍使用。晚商和西周时期卜甲基本钻在凿槽一侧,许多钻一侧被凿槽打破,成为半圆形;卜骨许多钻坑内有凿槽,相关内容下文钻凿型式中有专门描述。如济南大辛庄遗址^⑥的卜骨(标本 03DXZT0101H627:1,为牛肩胛骨)、《周原》FQ1(原号 79FQNH1:1)(图版五,9)。

Ⅳ式:三联钻。

三联钻即三个钻坑横向联为一体,其发现有岐山贺家墓地^⑦的卜骨、长安沣西张家坡遗址^⑧的卜骨(标本 T1AH2:13)、洛阳郑铁一段宿舍楼工地^⑨的卜骨(标本 H1:10、11)、济南王府遗址^⑩的卜骨(标本 H172:18、H152:15、H130:17)(图十八,1;图版一,2)、章丘城子崖遗址^⑪的卜骨(上层的 3、5、6)、泗水尹家城遗址^⑫的卜骨(标本 T192⑥:17、H171:5)(图十八,2;图版十五,1)、徐州高皇庙遗址^⑬的卜骨(图版十五,2)等。比较而言,在山东、江苏地区较多见。这一带除“三联钻”外,还有个别为“二联钻”。“三联钻”之钻坑多较小,坑径 0.3—0.5 厘米。坑位排列紧密、整齐。均有灼痕,兆纹较清晰。其中在洛阳郑铁一段宿舍楼工地所出土的卜骨(标本 H1:10、11)可能是较早用三联钻的例子。卜骨上兼

① 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 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 年,834、836 页,图五六〇、五六一,图版二三七、二三九。

② 王华:《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整治技术研究》,山东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6 年,16 页。

③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三峡考古队、忠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忠县瓦渣地遗址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 卷),科学出版社,2003 年,669 页,图版二三。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8 年~1999 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5),文物出版社,2004 年,335 页,图 26-2,图版 16。

⑤ 刘士莪:《老牛坡》,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233 页,图一九四~1。

⑥ 王华:《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整治技术研究》,山东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6 年,18 页。

⑦ 陕西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贺家村西周墓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8),文物出版社,1983 年第 12 月。

⑧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长安沣西张家坡西周遗址的发掘》,《考古》1964 年第 9 期。

⑨ 赵振华:《1984 年洛阳出土卜骨的特征与时代》,《考古与文物》1989 年第 4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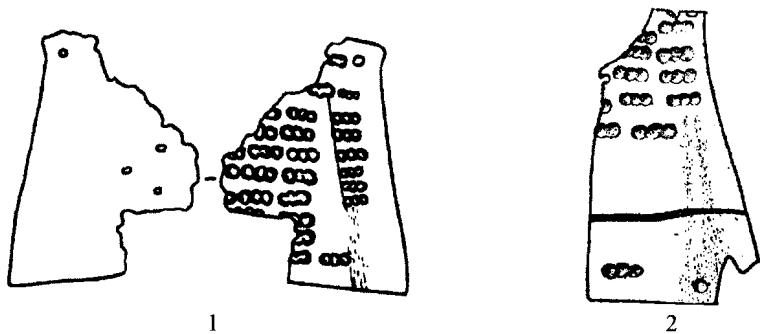
⑩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高速公路考古报集》(1997),科学出版社,2000 年。

⑪ 李济总编:《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 年,87、88 页,图版伍拾叁。

⑫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研室:《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 年,252 页,图版九九。

⑬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徐州高皇庙遗址清理报告》,《考古学报》1958 年第 4 期。

用圆钻和三联钻,年代应属于西周中期,相当于穆王或稍晚于穆王时期。



图十八 三联钻

1. 济南王府遗址(标本 H130:17) 2. 泗水尹家城遗址(标本 H171:5)

至于“二联钻”,基本与“三联钻”见于同板,且以三联钻为主。这些可能是三联钻的简化现象,不能构成一独立类型。如泗水尹家城遗址^①(标本 T192⑥:17,为牛肩胛骨)。

C 型:椭圆形钻,剖面为圆底或平底。

商代中、晚期一些卜用甲骨中可见,但此类不是典型形态。如新乡李大召遗址^②的卜骨(标本ⅢT2601H310:4,为牛肩胛骨)、安阳刘家庄遗址^③的卜骨(标本 96T1⑨:5,为牛肩胛骨)。也见于边远地区的甲骨中,如清江香炉石遗址^④的卜甲(标本 T26⑥:8,为腹甲)(图版十五,8)、江陵荆南寺遗址^⑤的卜甲(标本 H3:6,为腹甲)。

D 型:方形(剖面为平底)。

I 式:正方形。

西周时期卜甲上基本钻凿灼兼用,多数凿槽旁有正方形钻坑,到中、晚期方凿长度逐渐变小与方钻一样大,有的变成方钻内施凿槽的现象。主要特点在下文钻凿型式专门描述。如周公庙遗址的卜甲(标本 H2①c:40,为腹甲)(图版八,8)、《周原》FQ2(原号 79FQT1H3:1)、洛阳东周王城遗址^⑥的卜甲(标本 LCT1H9:3,为腹甲)。

Ⅱ式:长方形。

西周中晚期一些卜甲中可见,多数钻内有凿槽。主要特点在下文钻凿型式专门描述。如成都岷山饭店遗址^⑦的卜甲(标本 86CMFT1⑥:62,为腹甲)、清江香炉石遗址^⑧的卜甲(标本 T8④:52,为背甲)。

①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研室:《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252页,图版九九。

②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系 韩国河、赵海洲:《新乡李大召——仰韶文化至汉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6年,303页,图二〇八。

③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1995~1996年安阳刘家庄殷代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7年第2期。

④ 湖北省清江隔河岩考古队:《湖北清江香炉石遗址的报告》,《文物》1995年第9期。

⑤ 荆州地区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江陵荆南寺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8期。

⑥ 赵振华:《洛阳两周卜用甲骨的初步考察》,《考古》1985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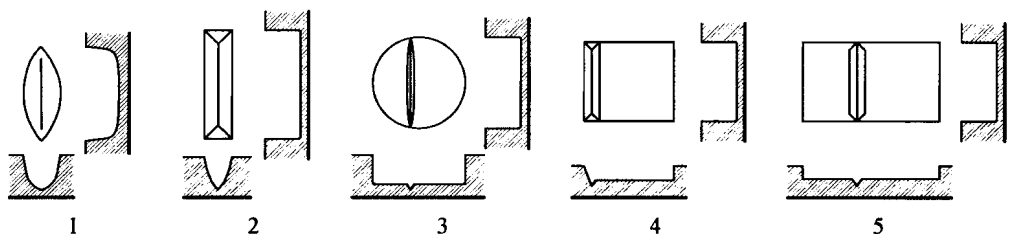
⑦ 罗二虎:《成都地区卜甲的初步研究》,《考古》1988年第12期。

⑧ 湖北省清江隔河岩考古队:《湖北清江香炉石遗址的报告》,《文物》1995年第9期。

2. 凿

“凿”字,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鑿,所以穿木也。从金,鑿省声。”段玉裁注:“穿木之器曰鑿。因之既穿之孔,亦曰鑿矣。”^①

商代中期,为了容易控制卜兆,圆钻坑内或钻坑旁边开始出现了凿槽。凿槽应是从圆形钻坑旁施灼开始演变的,圆形钻坑变成椭圆形钻,椭圆形钻变成椭圆形凿槽,其旁均施灼,此后形成弧形凿旁有圆钻的形式。商代晚期已经形成先施钻凿,后烧灼的步骤。凿的平面一般有弧形(枣核形)、长方形;横剖面一般为尖底,纵剖面有半圆形、方形。大多数凿槽在钻坑的一侧,和钻坑组合,少数凿槽在圆形或方形钻内,在钻坑底有“猫眼状”凿槽。一般甲骨上的凿槽可分弧形、长方形和“猫眼状”三大类,根据形状的细微不同又分为以下几种(图十九):



图十九 凿型式图

1. A型 2. B型 3. C型Ⅰ式 4、5. C型Ⅱ式

A型:弧形(枣核形)。

商代中期和晚期前段,形态较为原始。如安阳洹北商城遗址^②的卜骨(标本 T1H4:1、T14^③:8,均为牛肩胛骨)、济南大辛庄遗址^③的卜甲(标本 03DXZT2402M61:01,为腹甲)。

殷墟时期甲骨的钻凿形态特征在许进雄的论著^④和《小屯南地甲骨》一书中,已经介绍比较充分,本文仅对其主要内容作简单评述并加以补充。

许进雄《甲骨上钻凿形态的研究》^⑤一书中依其形状及挖刻位置,甲骨上的凿钻约可分为以下五类:第一类单独的长凿型(正常型);第二类圆凿包括长凿型(异常型第一式);第三类小圆钻型(异常型第二式);第四类长凿旁有圆钻型(异常型第三式);第五类于骨面中下部位施凿型(异常型第四式)。其中第一类最常见且通行于所有五期,第二类

①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706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8年~1999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334页,图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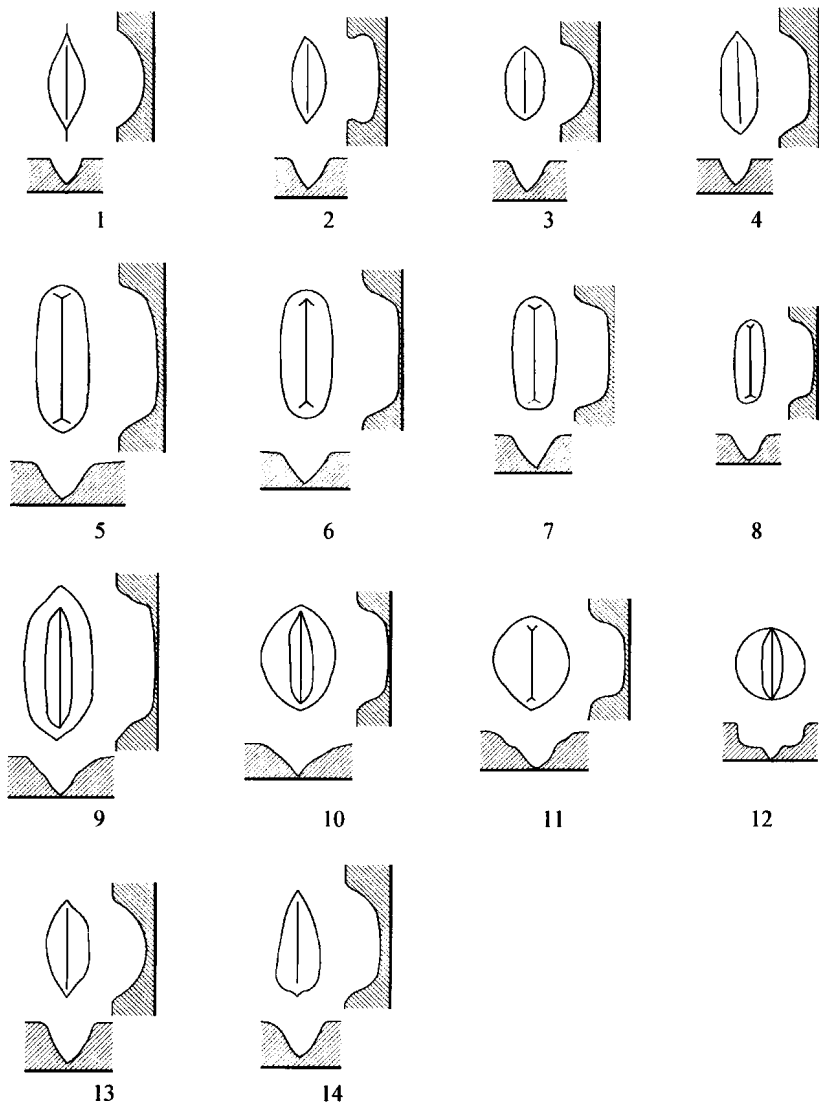
③ 王华:《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攻治技术研究》,山东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6年,24页。

④ 许进雄:《卜骨上的钻凿形态》,艺文印书馆,1973年;《钻凿研究略述》,《屈万里先生七秩荣庆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甲骨上钻凿形态的研究》,艺文印书馆,1979年。

⑤ 许进雄:《甲骨上钻凿形态的研究》,艺文印书馆,1979年。

为二期独有的特征,第三类见于第一期、第四期,第四类除第二期未见外,见于第一、三、四、五期,第五类只见于第三、四期^①。

《小屯南地甲骨》^②一书公布了1973年出土的甲骨材料,并推断这批甲骨的时代从武丁至帝乙、帝辛时期,多数属于武丁、康丁、武乙时期。该书专门研究了钻凿形态,将甲骨上的凿分为六型(图二十),各时期流行的类型不同。I型(弧形凿)流行于武丁时期,其



图二十 小屯南地甲骨凿之型式^③

1. I 1 2. I 2 3. I 3 4. II 5. IV 1 6. IV 2 7. IV 3 8. IV 4 9. V 1 10. V 2 11. V 3 12. III 13. VI 1 14. VI 2

① 许进雄分期采用的是董作宾的五期,并且认为王族卜辞时代应该是第四期的文武丁。这里所说第一期至五期是殷墟甲骨文的分期,与考古学文化的殷墟分期(第一期至第四期)有别。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下册第三分册,中华书局,1980年,1489—1525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下册第三分册,中华书局,1980年,1497页,图六。

他期未见;Ⅱ型(尖头直腹凿)也流行于武丁时期;Ⅲ型(圆钻包含长凿)只发现1片,也属于武丁时期;Ⅳ型(长方形凿)盛行康丁、武乙时期,文丁时期甚少;Ⅴ型(鼓腹凿)主要流行于康丁(或康丁、武乙之际)时期,帝乙、帝辛时期也有;Ⅵ型(不规则弧形凿)在武乙时期已开始出现,流行于文丁时期,其他时期未见。

通过上述二者对殷墟时期甲骨的钻凿形态特征的研究可知,弧形(枣核形)凿在商代晚期最为普遍使用,且型式多样,不同时期流行不同的型式。

B型:长方形。

西周时期卜甲上的钻凿,均为方钻方凿。长方形凿在殷墟时期许多遗址中的卜用甲骨上可见。此类可能是西周时期在卜甲上常见的方钻方凿的源头,可以溯源到殷墟一、二期。长方形凿于殷墟某一阶段首先在卜骨上开始出现,到商周之际在卜甲上也出现方凿,同时,圆钻流行。西周早期,方钻出现。此后,方钻、方凿成为定制。

如商代晚期有安阳苗圃北地遗址^①的人髌骨(标本84H19:10)、《屯南》2306(H57:64)、安阳王裕口南地遗址^②的卜甲(标本H1:2),均为长方形凿。此外,在邢台粮库遗址^③的卜骨(标本ⅡH35:5)、桓台前埠遗址^④的卜骨(标本H129:1,为鹿肩胛骨)、阳信李屋遗址^⑤的卜骨(标本T1407T1507H2:2、T1405M44:01,为牛和鹿肩胛骨)(图版十五,3),也有发现。西周时期有《周原》H11:6、22、48、周公庙遗址的卜甲(标本H2①c:40)(图版八,8)等。

C型:猫眼状。

I式:圆钻内有弧形小刻槽。

商代中、晚期有些甲骨,圆钻内有一道凿槽。如安阳洹北商城遗址^⑥的卜甲(标本T12F1垫土:3)、济南大辛庄遗址^⑦的卜甲(标本Ⅲ6T86③:4)、沙市周梁玉桥遗址^⑧的卜甲(标本H1下:16、H1下:17、H1下:19)、秭归大梁尾遗址^⑨的卜甲(标本H3:1,为腹甲)。西周时期卜骨上非常普遍。

Ⅱ式:方钻内有长方形小刻槽。

西周中晚期的有些甲骨,方形或长方形钻内有一道凿槽,常见于湖北、重庆和四川地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2~1984年安阳苗圃北地殷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91年第1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王裕口南地殷代遗址的发掘》,《考古》2004年第5期。

③ 河北省邢台市文物管理处:《邢台粮库遗址》,科学出版社,2005年,216页,图一八七。

④ 宋艳波、燕生东:《鲁北地区商代晚期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三十五期,2007年12月。

⑤ 宋艳波、燕生东:《鲁北地区商代晚期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三十五期,2007年12月。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8年~1999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5),文物出版社,2004年,335页,图26-6。

⑦ 徐基:《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的初步研究》,《文物》1995年第6期。

⑧ 沙市市博物馆:《湖北沙市周梁玉桥遗址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10),文物出版社,1987年;彭锦华:《沙市周梁玉桥甲骨的初步研究》,《考古》1986年第4期。

⑨ 宜昌博物馆:《秭归大梁尾遗址发掘简报》,《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一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575页,图一三,图版一四。

区。如清江香炉石遗址^①的卜甲(标本 T10④:224,为腹甲;标本 T8④:52,为背甲)、成都岷山饭店遗址^②的卜甲(标本 86CMFT1⑥:62,为腹甲)。

3. 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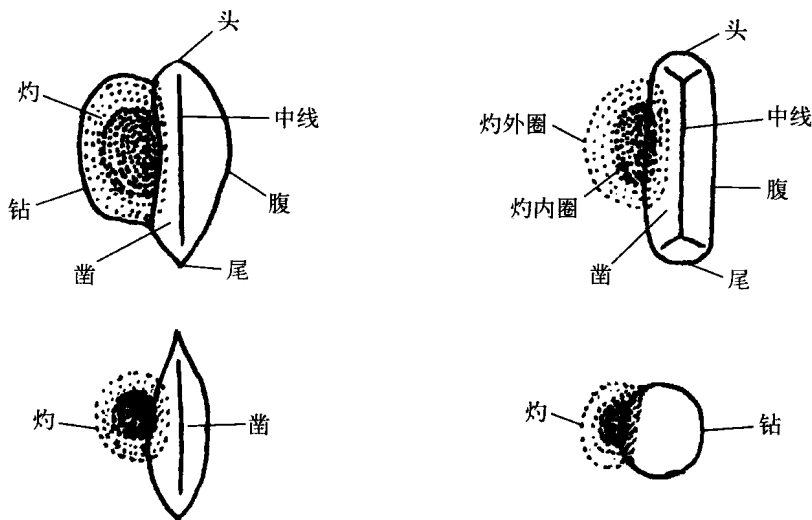
“灼”字,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灼,灸也。从火勺声。”段玉裁注:“如以楚焯柱龟曰灼龟。”^③

灼指占卜时施于骨面的烧灼痕迹。新石器时代最早在骨面直接烧灼,后来逐渐施于钻内、钻旁或凿旁。本文以灼点或灼痕来进行描述。骨面的灼痕(或灼点),大小不同,大致可以分为圆形和长圆形两种,中间为黑色,外有一周烧灼痕迹。背面有相应的烧灼痕迹,有的显示出兆纹。占人观察卜兆的形状,判断其结果吉或不吉。本文所说的卜用甲骨均有灼痕,没有灼痕的不归属于卜用甲骨的范畴。

占卜程序中施灼的环节是占卜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商周时期设置钻凿的缘故,主要为了施灼。因骨面较厚,将其钻或凿薄,从而使兆枝容易显示出来。凿比钻掏得更深,一般只剩下表皮一部分,更利于控制兆身及其显现,从而得到预期的结果。

4. 钻凿灼的名称

本文为了叙述方便,钻凿的各部分名称采用《屯南》一书中的命名,而且以几种典型的钻凿灼组合为列(图二十一),简单描述如下:凿的两端分别称为头部和尾部;中段称为



图二十一 钻凿各部位的名称^④

① 湖北省清江隔河岩考古队:《湖北清江香炉石遗址的报告》,《文物》1995年第9期。

② 罗二虎:《成都地区卜甲的初步研究》,《考古》1988年第12期。

③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483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的钻凿形态》,《小屯南地甲骨》下册第三分册,中华书局,1980年,1490页,图一。

腹部;凿的底部往往处于凿的中央,故又称之为中线^①。由于火力的直接烧灼及热力的波及,多数灼痕都呈现出内外两层。内层焦黑,是烧灼时的接触面;外层黄褐色,是受热的波及区。

(二) 钻凿灼的组合称谓与类型

商周时期,一般在占卜之前施钻凿。占卜(施灼)时,有的钻灼组合,有的凿灼组合,有的钻凿灼兼施。

每个时期流行的钻凿灼形态有所不同,不同地区的钻凿灼形态也不尽一致。殷墟时期甲骨的整治非常严密,甲骨经刮削既平又薄,钻凿灼形态也非常规律。此外各时期甲骨的整治均不如殷墟甲骨精细,特别商代早、中期的甲骨,整治简单粗糙,各部位的厚度不同,同一骨版上的钻凿大小、深浅不一,较厚的部位钻凿大而深,较薄的部位钻凿小而浅。对甲骨上的钻凿灼综合考虑,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1. 灼: 只有灼, 无钻无凿

新石器时代的卜骨均直接施灼,夏代的大部分卜骨也直接施灼,商周时期极少数的甲骨直接施灼。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使用的占卜习俗不尽一致,总体来说,新石器时代绝大多数卜骨在骨正面较薄之处施灼;反面和正反两面施灼的极少。夏代至商周时期正反两面施灼的方式,逐渐广泛使用,而且成为定制。卜甲则商代二里岗下层正面或反面施灼,到二里岗上层以后,只在反面施灼,亦成为定制。施灼的位置,可分为以下类型:

A 型: 正面施灼。

(1) 卜骨: 仰韶时期的卜骨仅有 3 处发现,皆骨正面直接烧灼,留有圆形灼痕,灼痕数量不多,最多的也只有 4—5 个。如武山傅家门遗址^②的卜骨(标本 T132F11:12,为羊肩胛骨)(图版十三,1)、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③的卜骨(标本 H3:24,羊肩胛骨)、浙川下王岗遗址^④的卜骨(标本 T14⑤:102,羊右肩胛骨)。

龙山晚期除老虎山文化、游邀类型的猪肩胛骨,大部分在反面施灼外,中原龙山文化诸类型和齐家文化的卜骨大部分正面施灼。以大部分牛、羊肩胛骨为常见,猪肩胛骨则反面或正面兼有。一般牛、猪肩胛骨比较厚,灼痕较大而深,分内外两层,其内部者颜色略深;羊的肩胛骨很薄,圆形灼痕较小,且甚轻微,多位于骨正面中部略凹处较薄的部位,灼痕都透过另一面。猪、羊肩胛骨灼痕较少;牛肩胛骨灼痕分布较多而密集,一般有 10—20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的钻凿形态》,《小屯南地甲骨》下册第三分册,中华书局,1980年,1490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甘肃武山傅家门史前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4期;《武山傅家门遗址的发掘与研究》,《考古学集刊》第16集,文物出版社,2006年,412页,图27,彩版3、4。

^③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1期。

^④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浙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200页,图版五三~8。

个,最多者 54 个以上。灼痕的数目及排列没有规律。如禹州瓦店遗址^①的卜骨(标本 VT1H17:3,为牛左肩胛骨)(图版十三,3)、永靖大何庄遗址^②的卜骨(标本 T35:4、T45:2,均为羊左肩胛骨)。

(2) 卜甲:仅见于商代二里岗下层二期。

如郑州商城遗址^③的卜甲(标本 C5H13:1、C9.1H150:6,均为腹甲)。

B 型:反面施灼。

(1) 卜骨:反面骨脊两侧施灼,均用猪肩胛骨。此类卜骨龙山时期和夏代在晋中北部和内蒙古南部地区的诸文化中常见。可能人们将骨脊两侧对称施灼,灼痕一般较少,最多者有 9 个。此类占卜传统可能有继承关系,其系列为阿善文化→老虎山文化→游邀类型。如准格尔旗寨子塔遗址^④的卜骨(标本 H47:9、T8②:11、T8③:4)、凉城老虎山遗址^⑤的卜骨(标本 T509③:11、T510④:4)、忻州游邀遗址^⑥的卜骨(标本 H194:6)(图二十三)。

(2) 卜甲:商代南关外期和二里岗下层二期可见。

如郑州南关外遗址^⑦的卜甲(标本 C5T85④:123,为腹甲)、郑州商城遗址^⑧的卜甲(标本 C9.1H167:7,为腹甲)。

C 型:正反两面兼施。

正反两面兼施灼的方式,目前最早在安阳南岗遗址(标本 H16:16,为牛肩胛骨)和长安客省庄遗址(标本 T13:2A:15、T11:2A:5,均为羊肩胛骨)(图版十三,2)中发现,属龙山晚期。夏代逐渐广泛使用,商周时期偶见。

龙山晚期的卜骨,施灼多数在正面,少数在反面,正反兼施的极少。到夏代早期正反两面兼施的卜骨有所增加。夏代灼点多在肩胛骨的正面和反面,有固定的位置,正面位于骨中间较薄处偏下;反面位于骨中间较薄处偏上。大部分卜骨出土时成为残块,因肩胛骨的柄部较厚,比较容易保存,仅见施灼于反面;残存骨正面中间偏下的小片卜骨,仅见施灼于正面;保留较完整或残留卜骨中间部分的,可见施灼于正反两面。如偃师二里头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禹州瓦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4 年,111、112 页,彩版七~1、2。

② 黄河水库考古队甘肃分队:《临夏大何庄、秦魏家两处齐家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0 年第 3 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 年第 2 期。

③ 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 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 年,681、682 页,图四六八,图版一四八、一四九。

④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准格尔旗寨子塔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年,304 页,图二六。

⑤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岱海考古(一)——老虎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00 年,258、265 页,图二二五、二三一,图版伍玖。

⑥ 忻州考古队:《山西忻州市游邀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 年第 4 期;《忻州游邀考古》,科学出版社,2004 年,138 页。

⑦ 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南关外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3 年第 1 期;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 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 年,136 页,图八五。

⑧ 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 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 年,681、682 页,图四六八,图版一四八。

遗址^①的卜骨(标本 IVT31③:16,为牛右肩胛骨)(图版二,1)。

D 型:骨脊上施灼,同时正面或反面兼施。

龙山晚期晚段或夏代早期早段在骨脊上开始出现施灼现象,夏代新华文化、朱开沟文化、齐家文化、二里头类型、东下冯类型、夏家店下层文化等考古文化普遍使用,可能有些地区沿用时间较晚。从目前出土的卜骨资料来看,该型较早的卜骨在陕北和内蒙古南部地区的诸文化中常见,尤其是新华文化中普遍使用,后来传播到周围考古学文化中。在骨脊上施灼的卜骨,一般骨正面和骨脊上有灼痕;少数骨正面、反面及骨脊上均有灼痕。骨反面和骨脊有灼痕的,还没有发现。但骨脊上施灼仍然不是主流,多数卜骨仅在正反两面有灼痕。

I 式:正面和骨脊。

如神木新华遗址^②的卜骨(标本 96H15②:1、2、96H18③:4,皆为牛肩胛骨;标本 96H18③:7,为猪肩胛骨;标本 96H18②:1,为羊肩胛骨)(图版十四,1)、武威皇娘娘台遗址^③的卜骨(标本 T10:12,为羊肩胛骨)、隆德页河子遗址^④的卜骨(标本 T102④:13,为牛肩胛骨)、陕县西崖村遗址^⑤的卜骨(标本 T2H4:78,为牛肩胛骨)、澠池郑窑遗址^⑥的卜骨(标本 H20:26,为牛肩胛骨)、翼城苇沟—北寿城遗址^⑦的卜骨(标本 苇 DⅢ:47,为羊肩胛骨)。

Ⅱ 式:正、反面和骨脊。

如伊克昭盟朱开沟遗址^⑧的卜骨(标本 T229④:2,为牛右肩胛骨)(图版十四,2)、卓尼茈儿遗址^⑨的卜骨(标本 H1:64,为羊肩胛骨)(图版二,3)。

先秦时期施灼位置的演变过程如下:

(1) 卜骨:骨正面中间较薄之处(仰韶文化)→骨反面中间较薄之处(龙山早期)→骨正面或反面(龙山晚期)→骨正、反面兼施(夏代—商周时期)。

 ↘骨正、反面以及骨脊(夏代)。

(2) 卜甲:龟甲正面或反面(二里岗下层)→龟甲反面(二里岗上层)。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238页,图版114-8。

②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神木新华》,科学出版社,2005年,236页,图二四〇、二四一,图版四九。

③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④ 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固原博物馆:《隆德页河子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社,1997年,189、190页。

⑤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陕县西崖村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89年第1期。

⑥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澠池县文化馆:《澠池县郑窑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年第2期。

⑦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西实习组、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翼城曲沃考古勘察记》,《考古学研究》(一),文物出版社,1992年,206页,图五七。

⑧ 黄蕴平:《内蒙古朱开沟遗址兽骨的鉴定和研究》,《考古学报》1996年第4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博物馆:《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2000年,123、124页,图版三六。

⑨ 甘南藏族自治州博物馆:《甘肃卓尼茈儿遗址》,《考古》1994年第1期。

2. 钻灼：有灼有钻，无凿

A 型：圆钻内施灼。

龙山晚期牛和猪肩胛骨上的灼痕较深而大，尤其一些牛肩胛骨上的灼痕，开始出现类似钻的形状。骨面遗留的一些浅坑，可能是占卜过程中因烧灼的火力大而形成的，并非有意钻制。到夏代晚期出现有意钻坑。

I 式：原始钻内施灼。

与上述钻的 A 型（不规则圆或椭圆）大致相同。夏代绝大多数卜骨只有灼，无钻无凿。夏代晚期部分卜骨出现先钻后灼的现象。钻坑为不规则圆形，形态较为原始，钻坑内施灼，背面留有明显的兆纹。见于二里头类型（5 件）、东下冯类型（10 多件）、牛角岗类型（有 1 件）、游邀类型（2 件）、岳石文化（较多）、先商文化（5 件）、夏家店下层文化（5 件）中，此类卜骨最早出现应在二里头文化三期（或东下冯文化Ⅲ期），最早可能在牛肩胛骨上使用，此后猪、羊肩胛骨也使用。

Ⅱ 式：小圆钻内施灼。

商代二里岗上层一期开始出现，商代早、中期普遍使用。如郑州商城遗址^①的甲骨（标本 C15T14^②：15、C5H20：36，均为牛肩胛骨；标本 C5H39：7，为腹甲）、济南大辛庄遗址^②的甲骨（标本 84DXZ2J2：1，应为羊肩胛骨；标本 03DXZT0102H603：5，为腹甲）。

Ⅲ 式：中圆钻内施灼。

商代中期最常见，可能商代二里岗上层一期开始出现，商代晚期边远地区也可见到。如安阳洹北商城遗址^③的卜骨（标本 T12^③：16，为牛肩胛骨）、济南大辛庄遗址^④的卜骨（标本 03DXZT2303H709：5，为牛肩胛骨）。

Ⅳ 式：大圆钻内施灼。

商代中期开始出现，且普遍使用，晚期多数钻坑内有一道凿槽。如安阳洹北商城遗址^⑤的卜骨（标本 T1^④：21，为牛右肩胛骨）（图版五，3）、西安老牛坡遗址^⑥的卜骨（标本 88XL I 2H15：21，为牛肩胛骨）（图版五，2）、长武碾子坡遗址^⑦的卜骨（标本 H151：85）（图版六，2）。

① 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 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 年，834—836 页，图五六〇、五六一，图版二三七～二三九。

② 王华：《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整治技术研究》，山东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6 年，15、21 页，图三～七。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8 年～1999 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 15 集，文物出版社，2004 年，334 页，图 25-4。

④ 王华：《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整治技术研究》，山东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6 年，16 页，图三～5。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8 年～1999 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 15 集，文物出版社，2004 年，334 页，图 25-4。

⑥ 刘士莪：《老牛坡》，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232 页，图版一三三～2。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郊·碾子坡》，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7 年，197 页，图一三六 C，彩版六，图版一二〇～1。

V式：三联钻内施灼。

与钻的B型Ⅳ式大致相同。

B型：钻旁有灼。

商代中期部分卜骨中开始出现。该型应是从钻内施灼转向钻凿灼兼用的过渡形态。商代中期普遍使用，晚期殷墟较早的卜骨和曹演庄类型、大辛庄类型等也可见到。许多在同板骨面上BⅠ、BⅡ式共存，但只见于卜骨。

Ⅰ式：中圆钻旁施灼。

如邢台葛家庄遗址^①的卜骨（标本H4：4，为牛左肩胛骨）、临城补要村遗址^②的卜骨（标本T09G1：02，为牛右肩胛骨）（图版十五，5）。

Ⅱ式：大圆钻旁施灼。

如《屯南》2601（H85：42 + 43 + 46 + 102）、临城补要村遗址^③的卜骨（标本NT0603H168：01，为牛左肩胛骨）、小神类型长治小神遗址的卜骨^④（标本H2：45、46，均为牛肩胛骨）（图版十五，6）。

3. 凿灼^⑤：有灼有凿，无钻

A型：弧形凿旁施灼。

商代中期从圆形钻旁施灼方式演变而来，晚期普遍使用。商代中期基本在凿一侧中央施灼；晚期多在凿槽一侧上部施灼。

Ⅰ式：凿侧中央施灼。

如济南大辛庄遗址^⑥的卜甲（标本84DXZ6T77H148：3，为腹甲）、邢台东先贤遗址^⑦的卜骨（标本H60：1，应为牛左肩胛骨）。

Ⅱ式：凿侧上部施灼。

如《屯南》1124（H24：423）、2161（H50：2 + 45）、2604（H85：53）。

B型：长方形凿旁施灼。

商代晚期一些遗址中出现长方形凿槽，在凿旁施灼。如桓台前埠遗址^⑧的卜骨（标本

①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邢台市葛家庄遗址北区1998年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11期。

②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河北临城县补要村遗址南区发掘简报》，待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北临城县补要村遗址北区发掘简报》，待刊。

③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河北临城县补要村遗址南区发掘简报》，待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北临城县补要村遗址北区发掘简报》，待刊。

④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晋东南工作站：《长治小常乡小神遗址》，《考古学报》1996年第1期。

⑤ 商代中期钻凿发展到新的阶段，开始出现许多形态，为商代晚期钻凿形态打下了良好基础。本文将该时期仍保留圆形的一律叫钻坑，变成椭圆形才开始叫凿槽，凿的形状有许多种类，中商时期还没有形成典型方式的凿，到晚期形成几种类型，相关的讨论请看许进雄的论著和《屯南》，分类分期等描述较为详细。

⑥ 王华：《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骨攻治技术研究》，山东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6年，27页，图十~2。

⑦ 邢台东先贤考古队：《邢台东先贤商代遗址发掘报告》，《古代文明》（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437页，图五三，图版一〇。

⑧ 宋艳波、燕生东：《鲁北地区商代晚期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三十五期，2007年12月。

H129:1,为鹿肩胛骨)、阳信李屋遗址^①的卜骨(标本 T1407T1507H2:2、T1405M44:01,为牛和鹿肩胛骨)(图版十五,3)。此外,郑州人民公园遗址出土的卜甲(标本 C7H5:4)^②,为左甲腹。反面留有6个凿灼,无钻。其中5个凿为长方形,1个为枣核形,凿的左侧均有灼痕,灼痕均朝向千里路,比例与殷墟类型相同。与郑州人民公园遗址^③一期的卜甲(标本 C7H111:46、C7H109:2,均为腹甲)相比,其年代应较晚。又赴荥阳关帝庙遗址看到3件卜骨,均有长方形凿槽,无钻,有灼痕。其年代应属于殷墟二期。

4. 钻凿灼

钻凿灼兼施在商代中期开始出现,并逐渐被广泛使用。晚商和西周时期则成为定制,其钻凿灼的形制非常严密,尤其是卜甲以及王室的卜骨,更加严格。此外,还有少数不规则形或过渡性的钻凿灼形态。在此只分析比较典型的,其他的在附录中详细描述。大体有凿槽旁附钻坑有灼和钻内包一道凿槽有灼两大类。依其形状的不同,可分为以下几种:

A型:弧形凿旁有圆钻,圆钻内施灼。

商代中期开始出现,中、晚期在卜用甲骨上普遍使用。依钻灼的位置不同,可分为2式。

I式:凿侧中央施钻灼。

商代中期以曹演庄类型为代表,晚期在殷墟一期以及更晚的曹演庄类型、大辛庄类型中沿用,多数为卜甲,少数为卜骨。如安阳洹北商城遗址^④的卜骨(标本 H:1,为牛肩胛骨;T2^⑤:1,腹甲)(图版九,3)、郑州人民公园遗址的卜甲(标本 C7H111:35,为腹甲)。

II式:凿侧上部施钻灼。

主要在商代晚期殷墟地区中普遍使用,其他地区很少见。西周早期与殷遗民有关的遗址中也可见到,卜骨卜甲兼用。如《花东》156(H3:485)、231(H3:668)。

B型:长方凿旁有圆钻,圆钻内施灼。依钻灼的位置不同,可分为2式。

I式:在凿侧上部施钻灼,见于卜骨。

商代晚期一些卜骨上开始出现长方形凿旁设置圆钻的方式,但数量并不多。很可能是先周时期(B型II式)以及西周时期方凿旁有方钻的源头。其方式与凿灼的B型(方形凿旁有灼)大同小异。如安阳苗圃北地遗址^⑤的人髌骨(标本 84H19:10)、安阳王裕口南地遗址^⑥

① 宋艳波、燕生东:《鲁北地区商代晚期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三十五期,2007年12月。

② 笔者赴郑州商城遗址工作站所见,但材料尚未公布。

③ 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926页,图六一九,图版二七一。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8年~1999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334、335页,图25-6、26-1。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2~1984年安阳苗圃北地殷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91年第1期。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王裕口南地殷代遗址的发掘》,《考古》2004年第5期。

的卜甲(标本 H1:2)、邢台粮库遗址^①的卜骨(标本 II H35:5),均为长方形凿和圆形钻。

II 式:在凿侧中央施钻灼,见于卜甲。

目前,该型式仅出土于岐山凤雏遗址^②,数量不多见。均为卜甲,学术界通常认为属先周甲骨。其应为西周典型钻凿灼形态的前身,是过渡形态。如《周原》H11:1、84、112、134、114、168+268、237。

C 型:圆钻内有“猫眼状”凿槽,钻内凿槽一侧施灼。

目前,最早见于洹北商城甲骨中,晚商和西周时期普遍使用。凿槽一般在钻坑内一侧。

I 式:弧形的小刻槽。

I a 式:凿槽中央施灼。

中商时期卜骨和卜甲均有发现。商代晚期前段已经开始出现殷墟典型的甲骨特征,但一些甲骨上仍然保留中商甲骨的特点。商代晚期沿用中商文化的曹演庄类型、大辛庄类型中也可见。如安阳洹北商城遗址^③的卜甲(标本 T12F1 垫土:3)、麟游蔡家河遗址^④的卜骨(标本 H18:10,为牛右肩胛骨);济南大辛庄遗址^⑤的卜甲(标本 III 6T86③:4)。此外,商代晚期受到商文化影响的湖北、重庆地区的卜甲中也有发现。

I b 式:凿槽靠上施灼。

主要流行于殷墟类型,仅见于卜骨,而且只见于殷墟二期(殷墟甲骨文第一期)卜骨中。如《合》12909、《屯南》4314(T44②:5)。

I c 式:凿槽两侧施灼。

仅见于周梁玉桥类型。如沙市周梁玉桥遗址^⑥的卜甲(标本 H1 下:16、H1 下:17、H1 下:19)。

II 式:长方形的小刻槽,在凿侧中间施灼。

该型式成为西周时期卜骨钻凿灼的典型形态,非常严谨,且有规律。西周时期卜骨上的钻呈圆形,直壁平底,坑底均有长方形小刻槽。钻坑内的小刻槽均不在坑底正中,而是靠近卜骨边缘一侧,灼痕则在内侧,使正面的兆枝相向^⑦。如《周原》FQ1(原号 79FQNH1:1)(图版五,9)、FQ4(原号 80FQN 采:112)。

① 河北省邢台市文物管理处:《邢台粮库遗址》,科学出版社,2005 年,216 页,图一八七。

② 陕西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发掘简报》与《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 年第 10 期;陕西西周原考古队、周原岐山文管所:《岐山凤雏村两次发现周初甲骨文》,《考古与文物》1982 年第 3 期;曹玮:《周原甲骨文》,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 年。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8 年~1999 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5),文物出版社,2004 年,335 页,图 26-6。

④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麟游县蔡家河遗址商代遗存发掘报告》,《华夏考古》2000 年月 1 期。

⑤ 徐基:《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的初步研究》,《文物》1995 年第 6 期。

⑥ 沙市市博物馆:《湖北沙市周梁玉桥遗址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10),文物出版社,1987 年;彭锦华:《沙市周梁玉桥甲骨的初步研究》,《考古》1986 年第 4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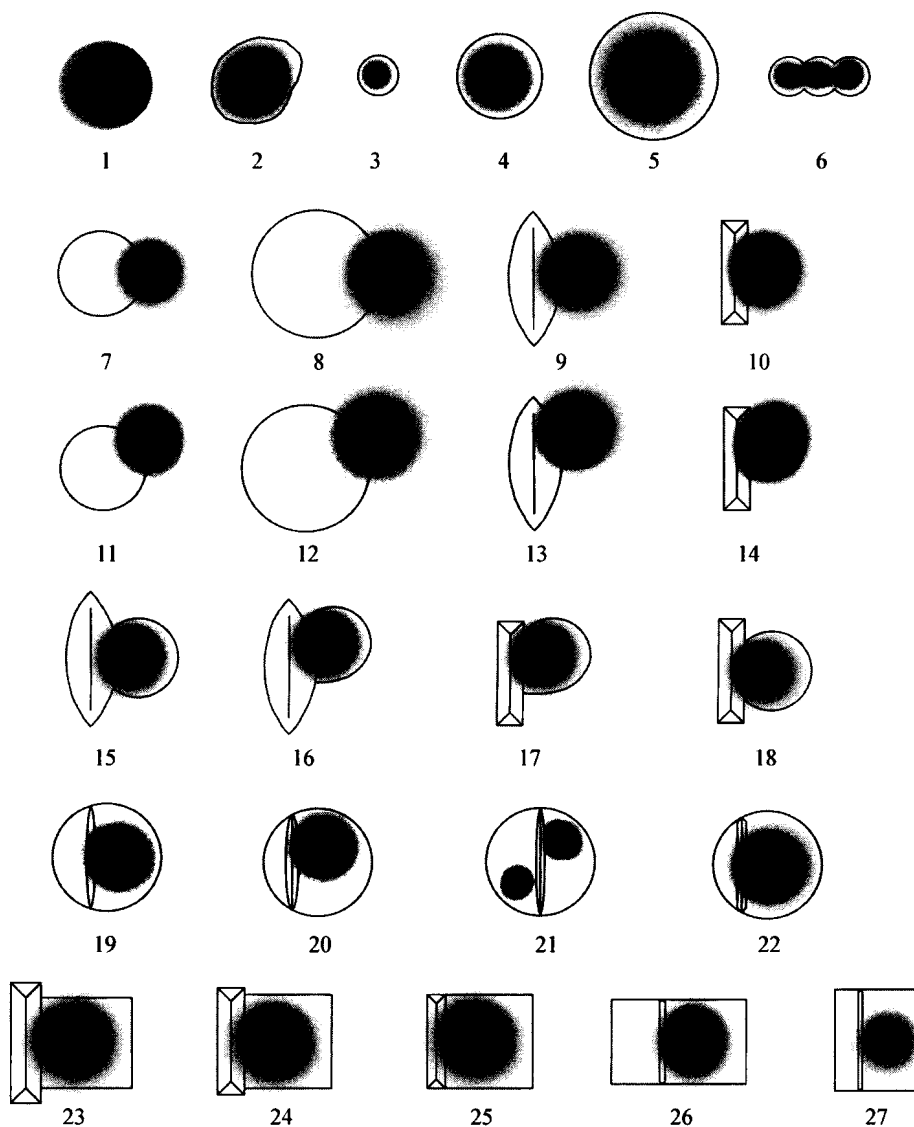
⑦ 罗西章、王均显:《周原扶风地区出土西周甲骨的初步认识》,《文物》1987 年第 2 期。

D 型：长方凿旁方钻，方钻内施灼。

该型是西周时期在卜甲中普遍使用的典型钻凿灼形态。分二式，西周早期流行 I 式；西周中晚期流行 II 式。

I 式：方凿比方钻长。

如《周原》H11:6、32、48、周公庙遗址的卜甲(标本 H2①c:40,为腹甲)(图版八,8)。



图二十二 钻凿灼的组合类型

1. 灼;2—8、11—12. 钻灼;2. A 型 I 式 3. A 型 II 式 4. A 型 III 式 5. A 型 IV 式 6. A 型 V 式 7. B 型 I a 式 8. B 型 II a 式 11. B 型 I b 式 12. B 型 II b 式;9—10、13—14. 凿灼;9. A 型 I 式 10. B 型 I 式 13. A 型 II 式 14. B 型 II 式;15—27. 钻凿灼;15. A 型 I 式 16. A 型 II 式 17. B 型 I 式 18. B 型 II 式 19. C 型 I a 式 20. C 型 I b 式 21. C 型 I c 式 22. C 型 I d 式 23. D 型 I 式 24、25. D 型 II 式 26、27. E 型。

Ⅱ式：方凿与方钻一样长或稍微长一些。

如《周原》FQ2(齐家 H3:1)、扶风齐家遗址^①的卜甲(标本 M47:2,为腹甲)。

E型：方钻内有“猫眼状”凿槽,钻内凿槽一侧施灼。

该型由D型Ⅱ式(方凿与方钻一样大)发展而来。西周中晚期开始出现且常见,有的延续时间较长。如洛阳东周王城遗址^②的卜甲(标本 LCT1H9:1、2、3)、沙市周梁玉桥遗址^③的卜甲(标本 T2③:6、T2③:7)、成都指挥街遗址^④的卜甲(标本 86CZT2⑥:48)。

各种形态的钻凿使用时间不同,有的连续时间很长。这里只采用最早开始的钻凿形态,后期沿用前期的则都省略。

兹将以上所述钻凿灼的组合类型及其名称列为下表(表九)。

表九 钻凿灼的组合类型及其名称

	类 型			名 称	种类	图	备注
灼	A			正面施灼	甲/骨	二十二,1	
	B			反面施灼	甲/骨	二十二,1	
	C			正反两面兼施	卜骨	二十二,1	
	D			骨脊上施灼	卜骨	二十二,1	
钻灼	A	I		原始钻内施灼	卜骨	二十二,2	
		Ⅱ		小圆钻内施灼	甲/骨	二十二,3	
		Ⅲ		中圆钻内施灼	甲/骨	二十二,4	
		Ⅳ		大圆钻内施灼	甲/骨	二十二,5	
		V		三联钻内施灼	甲/骨	二十二,6	
	B	I		中圆钻旁施灼	卜骨	二十二,7、11	
		Ⅱ		大圆钻旁施灼	卜骨	二十二,8、12	
凿灼	A	I		弧形凿旁施灼	甲/骨	二十二,9	
		Ⅱ			甲/骨	二十二,13	
	B			长方形凿旁施灼	甲/骨	二十二,10、14	

① 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县齐家村西周甲骨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9期；罗西章、王均显：《周原扶风地区出土西周甲骨的初步认识》，《文物》1987年第2期。

② 赵振华：《洛阳两周卜用甲骨的初步考察》，《考古》1985年第4期。

③ 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湖北沙市周梁玉桥遗址1987年的发掘》，《考古》2004年第9期。

④ 罗二虎：《成都地区卜甲的初步研究》，《考古》1988年第12期。

续表

	类 型			名 称	种类	图	备注
钻凿灼	A	I		弧形凿旁有圆钻， 圆钻内施灼	甲/骨	二十二,15	
		II			甲/骨	二十二,16	
	B	I		长方凿旁有圆钻， 圆钻内施灼	卜骨	二十二,17	
		II			卜甲	二十二,18	
	C	I	a	圆钻内猫眼状凿槽， 圆钻内凿槽一侧施灼	甲/骨	二十二,19	
			b		卜骨	二十二,20	
			c		卜甲	二十二,21	
		II			卜骨	二十二,22	
	D	I		长方凿旁方钻， 方钻内施灼	卜甲	二十二,23	
		II			卜甲	二十二,24,25	
	E			方钻内猫眼状凿槽， 方钻内凿槽一侧施灼	甲/骨	二十二,26,27	

二、钻凿灼的位置、排列与卜兆形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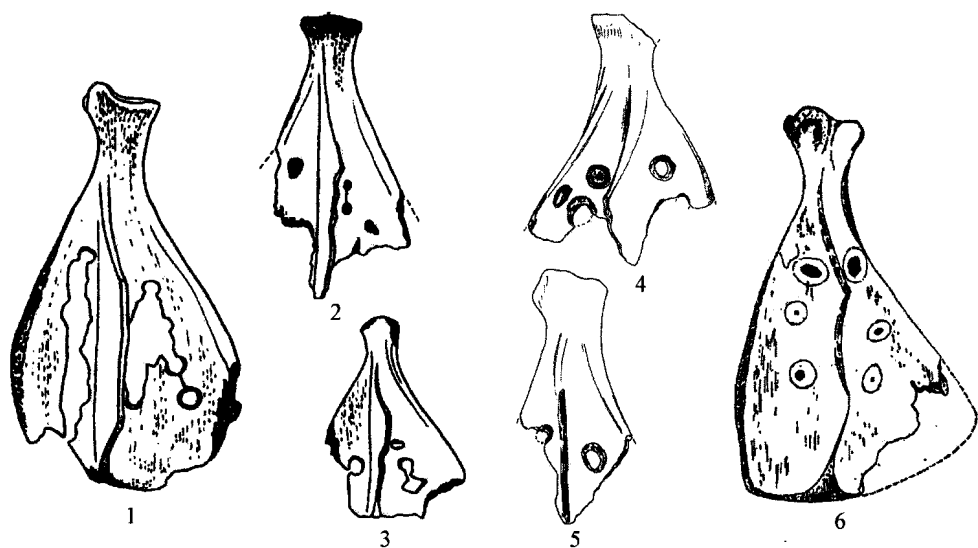
新石器时代至夏代,这方面很难看出规律。到商代早期,卜甲上开始出现有意识的钻凿灼排列。商周时期卜用甲骨,钻凿灼的排列一般左右对称。下边分别探讨不同时期、不同类型钻凿灼的排列、卜兆形状以及施钻凿的顺序等。

(一) 钻凿灼的位置与排列

1. 卜骨

A 型: 无规律。

新石器时代和夏代,灼痕排列似无规律。仰韶时期和龙山早期只在骨面上有若干火灼的痕迹,灼痕的数目及排列没有一定规律,灼痕 2—10 多个不等。龙山晚期和夏代虽然灼点较多,出现正反两面施灼的方式,但仍然很难看出规律。特别要注意的是,在晋中北部、内蒙古南部的阿善文化、老虎山文化和游邀类型中发现的较为特殊的占卜方式,即灼痕多分布于以骨脊为中轴线的扇面两侧,排列较有规律(图二十三)。此外新华遗址发掘报告中也介绍过类似的占卜方式,但标本中未见类似的卜骨。商代早期已经出现钻坑,坑内施灼。钻灼主要在骨反面上部和骨正面扇部中间。骨反面布满钻灼,很难看出规律;正面有零星而集中、浅而不规则的钻坑,也不容易看出规律。但从商代早期的卜甲中已经看出人们有意布置钻灼的现象。



图二十三 骨反面施灼排列图

1, 2, 3. 准格尔旗寨子塔遗址(标本 H47:9、T8③:4、T8②:11)

4, 5. 凉城老虎山遗址(标本 T510④:4、T509③:11) 6. 忻州游邀遗址(标本 H194:6)

B 型: 同板骨面左右对称。

到商代中期,以骨面中轴线为界,灼痕位于钻或凿的内侧,两侧缘钻凿排列较为规整,各有一列钻凿,胸侧缘较长,颈侧缘较短,骨中间钻凿较少。如安阳洹北商城遗址^①的卜骨(标本 T1H4:1,为牛肩胛骨)、邢台东先贤遗址^②的卜骨(标本 H33:4,应为牛右肩胛骨)(图二十四,1)。藁城台西遗址的卜骨(标本 M56:5,牛右肩胛骨),反面两侧缘圆钻排列较为规整,各有一列钻坑,其中胸侧缘约 14 个,颈侧缘约 7 个。柄部两侧缘之间有一或二列钻坑,约 7 个,扇部靠近胸侧缘钻坑较多,约 14 个,仅有 2 个靠近颈侧缘。正面扇部中间偏下部位大致有四列钻凿,排列不甚规整,共 14 个,钻大致位于凿右侧(朝向臼角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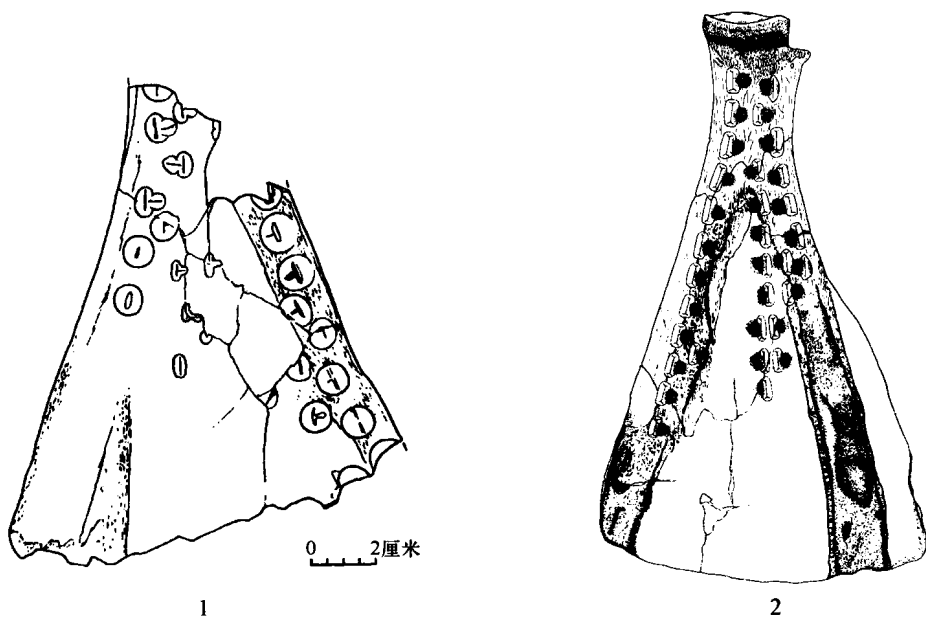
在商代晚期同板骨面左右对称的方式仍然常见,且比中期更为完善、规律。如安阳苗圃北地遗址^③的卜骨(标本 PN I H24:2,为牛右肩胛骨),《屯南》2307(H57:64)、附 2(71ASTT1⑦:6)、附 5(71ASTT17:12)(图二十四,2)。《屯南》卜骨(标本 71ASTT1⑦:6,为牛左肩胛骨),反面两侧缘凿槽排列较为规整,各有一列凿槽,其中胸侧缘 12 个,颈侧缘 7 个,柄部两侧缘之间有一列 3 个凿槽,扇部两侧缘之间有两列凿槽,其中靠近胸侧缘一列 7 个,靠近颈侧缘一列 3 个。两侧缘均在凿槽内侧施灼,两侧缘之间施灼于凿槽的左或右侧,其中柄部 3 个施灼于凿槽右侧(朝向颈侧缘),应该与颈侧缘一列对贞,扇部靠近胸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8 年~1999 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 15 集,文物出版社,2004 年,334 页,图 25-6。

② 邢台东先贤考古队:《河北邢台市东先贤遗址 1998 年的发掘》,《考古》2003 年第 11 期。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 年,201 页,图版四三~6。

侧缘—列6个,施灼于凿槽左侧(朝向胸侧缘),与胸侧缘—列对贞,靠近颈侧缘—列3个,施灼于凿槽右侧(朝向颈侧缘),与颈侧缘—列对贞。最下部1个凿槽左右均有灼痕。正面扇部中间偏下部位,凿槽大致 5×5 排列,共25个,其中第一列6个,第五列仅4个。均在凿槽左侧(朝向颈侧缘)施灼。



图二十四 同板骨面钻凿左右对称排列图

1. 邢台东先贤遗址①(标本 H33:4) 2. 《屯南》附5(71ASTT17:12)

到西周时期卜骨上部近骨白处一般有圆钻二至四列,每列4—6个钻,近边缘的一列可达十余个,向下延伸至卜骨中下部。有的卜骨在中下部近边缘处有5、6个钻,纵向排列,与上部的钻不相联。骨扇中部基本不见钻凿,个别有1—2个。但此时的钻凿形态与商代不同,呈猫眼状。如洛阳郑铁一段宿舍楼工地②的卜骨(标本 H1:1,为牛右肩胛骨)、《周原》FQ1(原号 79FQNH1:1)(图版五,9)。

C型:左右两件肩胛骨对称,同板肩胛骨钻凿之钻朝向白角。

I式:过渡形态。

同板肩胛骨上钻凿之钻大部分朝向白角,个别与白角相反。主要流行于中商晚期至殷墟二期前段。如滕州前掌大遗址③的卜骨(标本 BT1516③:6,应为牛左肩胛骨)(图二十五,1)、《屯南》的 2712(H103:28+52)。

II式:典型形态。

殷墟二期已经出现殷墟甲骨典型特征,即同板卜骨的钻凿一律朝向切去白角(颈侧

① 邢台东先贤考古队:《河北邢台市东先贤遗址1998年的发掘》,《考古》2003年第1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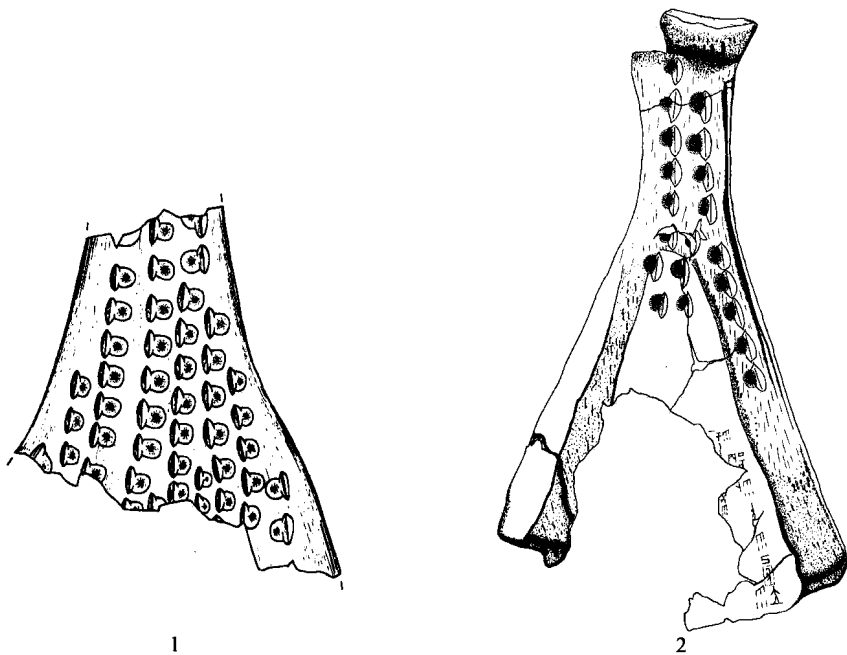
② 赵振华:《1984年洛阳出土卜骨的特征与时代》,《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4期。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上、下册),文物出版社,2005年,29页,图二一,图版八。

缘)的方向。殷墟类型的卜骨,多数切去骨白,排列非常规律,这样能推测左右两块肩胛骨成组,其排列左右对称。

右肩胛骨:如《屯南》2163(H50:5)、2172(H50:20+30)、2264(H57:12)、2283(H57:40)(图二十五,2)、2299(H57:58)、2316(H57:72)、4559(T54③:102)。

左肩胛骨:如《屯南》1124(H24:423)、2714(H103:30)、2719(H103:36)、2740(H103:77+78)。



图二十五 左右肩胛骨钻凿对称排列图

1. 滕州前掌大遗址(标本 BT1516③:6) 2. 《屯南》2283(H57:40)

《补》1804 卜骨反面有凿灼,无钻。两侧缘的凿槽排列较为规整,各有一列,其中胸侧缘 15 个,颈侧缘 8 个,柄部两侧缘之间有一列 4 个,扇部两侧缘之间有两列各 3 个,胸侧缘最下 2 个凿槽外侧还有 2 个。卜骨上部凿槽横向排列亦比较规整,第一行 2 个,第二至五行各 3 个,第六至八行各 4 个。灼痕均位于凿槽左侧(朝向颈侧缘)。正面无钻凿灼。

2. 卜甲

(1) 腹甲

A 型:无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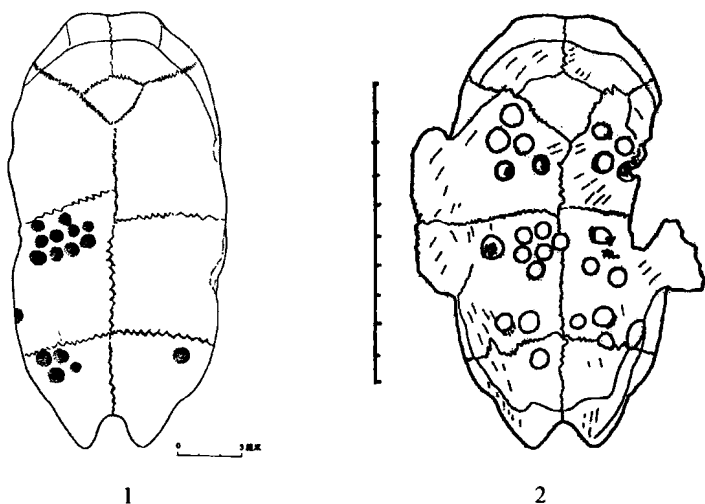
郑州南关外期出土的卜甲(标本 C5T85④:123,为腹甲),直接施灼,灼痕较少,排列似无规律。郑州二里岗下层二期发现 10 件卜甲,灼痕较多,灼痕似纵横排列有序^①。如标

^① 郑州二里岗下层二期可能已经出现“将卜甲的各部位有意分成几部分施灼”的现象,但因目前材料太少,无法确认,本文暂归属于该型式。

本 C9.1H167:7(南关外)、C9.1H150:6(南关外)。

B 型：以千里路和齿缝为界，分成几部分。

到商代二里岗上层时期，已经出现占卜者有意以千里路和齿缝为界，将各部位分成几部分施钻灼，进行占卜的现象。这些钻灼左右、上下对称。如郑州商城遗址^①的卜甲（标本 C5H20:49，南关外）（图二十六，1），钻灼分三处共有 15 个。其中腹甲反面的右上甲尾（C1），有钻灼 1 个；左上甲尾（C3），有钻灼 4 个；左下甲腹上段（B7），有钻灼 10 个。济南大辛庄遗址^②的卜甲（标本 03DXZT0102H603:5，为腹甲）（图二十六，2），腹甲反面共有小圆钻 25 个，成组分布。其中腹甲反面的左上甲尾（C3），有钻灼 1 个，左下甲腹下段（B8），有钻灼 2 个，右下甲腹下段（B4），有钻灼 3 个，可能以千里路左右对称；右下甲腹（B3、B4），有钻灼 3 个，右上甲腹（B1、B2），有钻灼 4 个；左上甲腹（B5、B6）有钻灼 5 个，左下甲腹（B7、B8），有钻灼 6 个^③。



图二十六 同板龟甲分部位排列图

1. 郑州商城遗址(标本 C5H20:49)
2. 济南大辛庄遗址(标本 03DXZT0102H603:5)

C 型：以千里路分为两部分，各有二、三竖列。

商代中期的曹演庄类型、台西类型、大辛庄类型等，都出现钻凿灼兼施，其钻凿灼的排列一般以千里路为界，两侧各有两或三竖列。其中最外一列钻多在凿的内侧，另一列或两列钻多在凿的外侧。商代晚期的殷墟类型（殷墟一期至二期前段）、曹演庄类型、大辛庄类型都可见到。

① 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 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 年，836 页，图五六一～2。

② 王华：《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整治技术研究》，山东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6 年，22 页，图七～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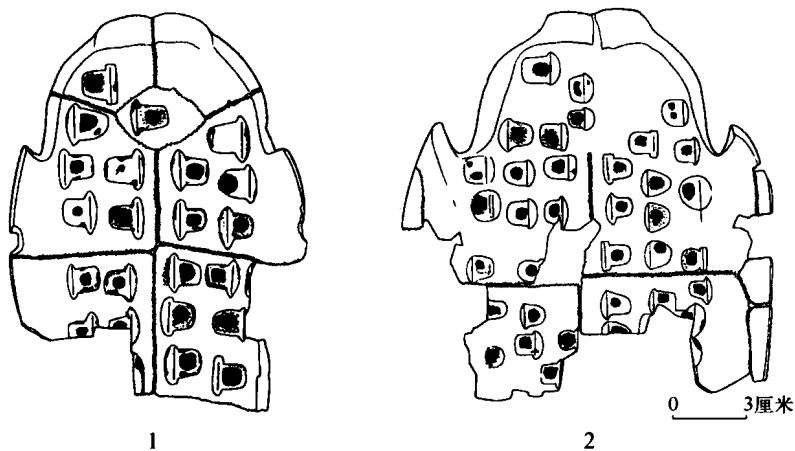
③ 图上有 7 个圆圈，其中千里路上的一个是小圆钻孔，不是钻坑。

I 式：千里路两侧各有二竖列。

个体较小，千里路两侧各有二竖列。二竖列间，钻在凿内侧，左右相对，个别例外，但也有相对固定的排列。如安阳洹北商城遗址^①的卜甲（标本 T4⑥：46，为腹甲）（图二十七，1），钻凿排列有序，左舌板和内板各有 1 个；左上甲腹和右上甲腹各有 5 个；左下甲腹和右下甲腹各有 6 个，互相对贞。藁城台西遗址^②的卜甲（标本 T13：97，为腹甲），排列有序，左上甲腹有 4 个，右上甲腹有 3 个，内板应有 1 个；左下甲腹和右下甲腹各有 4 个；左右甲尾各有 2 个，互相对贞。

II 式：千里路两侧各有三竖列。

个体较大，千里路两侧各有三竖列。其中最外一列钻在凿内侧，而内两列钻在凿外侧。如安阳洹北商城遗址^③的卜甲（标本 T2③：29，为腹甲）（图二十七，2）、安阳苗圃北地遗址^④的卜甲（标本 PNIVH5：2，为腹甲）。



图二十七 以千里路为界左右各自排列图

1. 安阳洹北商城遗址（标本 T4⑥：46） 2. 安阳洹北商城遗址（标本 T2③：29）

D 型：以千里路为界，钻凿均左右对称。

该型式只见于殷墟类型。殷墟二期开始出现，殷墟时期普遍使用。一般以千里路为界，腹甲左右两侧各有一至四竖列。左侧凿在左边，钻在右边；右侧凿在右边，钻在左边，左右对称。有的甲桥各有钻凿一两竖列，排列与腹甲相同，均朝向千里路。

I 式：千里路两侧各有一竖列。

龟甲较少，一般留的甲桥几乎很窄，甲桥上几乎无钻凿。如《合》14 反、203 反、1086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8 年～1999 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5），文物出版社，2004 年，335 页，图二六～三，图版 14～15。

②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 年，88 页，图版五八～六。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8 年～1999 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5），文物出版社，2004 年，335 页，图二六～二七，图版 16～17。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 年，202 页，图版四四～七。

反、1100 反、1114 反。

Ⅱ式：千里路两侧各有二竖列。

Ⅱa 式：甲桥上无钻凿。如《花东》20(H3:63)、158(H3:489)、384(H3:1218)。

Ⅱb 式：甲桥上各有一竖列。如《花东》172(H3:535)、242(H3:714)、294(H3:880)。

Ⅱc 式：甲桥上各有二竖列。如《花东》138(H3:443)。

Ⅲ式：千里路两侧各有三竖列。

Ⅲa 式：甲桥上无钻凿。如《花东》91(H3:299)、94(H3:306)、483(H3:14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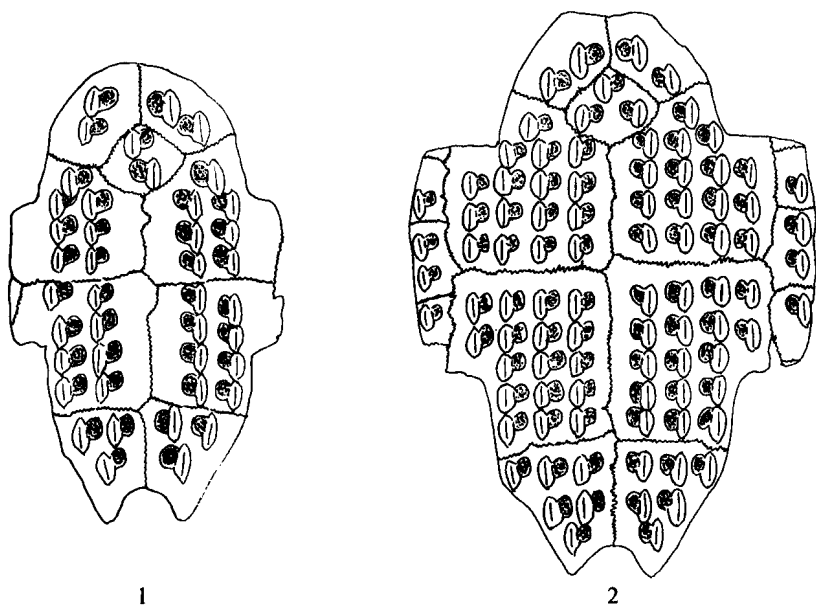
Ⅲb 式：甲桥上各有一竖列。如《花东》62(H3:212)、133(H3:437)、188(H3:565)。

Ⅲc 式：甲桥上各有二竖列。如《花东》121(H3:397)、192(H3:573)、472(H3:1455)。

Ⅲd 式：甲桥上各有三竖列。如《合》140、201、376、419、734、914。

Ⅳ式：千里路两侧各有四竖列。

甲桥上无钻凿或各有一竖列的均不见，仅见甲桥上各有二竖列。如《合》795。



图二十八 以千里路为界左右对称排列图

1. 《花东》384(H3:1218) 2. 《花东》472(H3:14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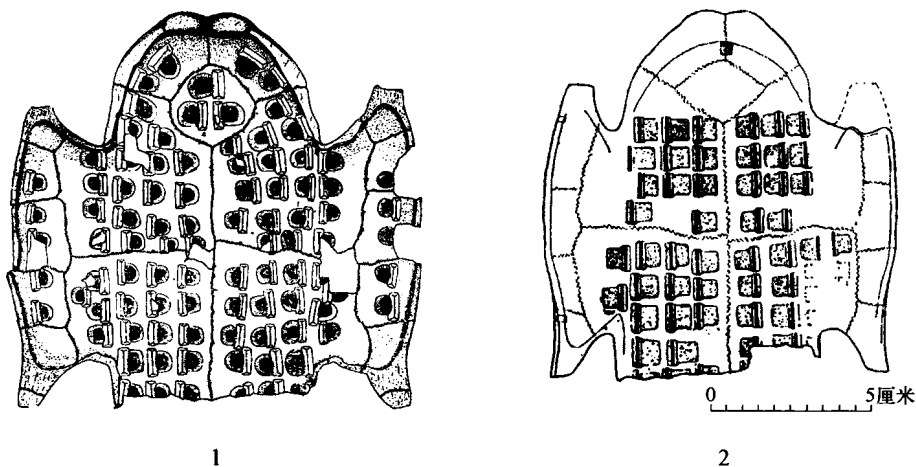
此外，殷墟二期(殷墟甲骨文一期)有一些腹甲钻凿灼的数量不多，布置较零散，排列不严密，但以千里路为界，腹甲左右的钻凿数量大致相同，左右对称。此类一般个体较小。如《合》32 反、116 反、150 反、275 反、418 反、438 反、721 反、768 反、772 反、904 反、919 反、924 反、946 反。

以下以《花东》462(H3:1433)典型的腹甲为例，简单描述腹甲各部位钻凿位置及排

列状况。该腹甲整体刮平,反面钻凿,均以千里路为界,左右对称,钻均位于凿内侧。甲首内板的反面分布有三个钻凿,一上二下。左、右舌板反面各有2个钻凿,其中上、下舌板各1个。甲腹是卜用龟甲的主要部分。钻凿以千里路为中轴,一般左右各三列,相互对称。左、右上甲腹反面钻凿数各3(横向)×5(纵向),其中最上一行只有2个。左、右下甲腹反面钻凿数各3(横向)×6(纵向),由上下数第四行右下甲腹只有2个,左下甲腹只有1个,均靠近千里路,可能与正面盾纹有关。甲尾左右各有三行钻凿,其中最上一行3个(上甲尾),中间2个(上甲尾),最下一行1个(下甲尾)。左右甲桥内侧均有单列6个钻凿,其中上、下甲桥各3个,左、右甲桥外侧均有单列5个钻凿,其中上甲桥3个,下甲桥2个。

E型:腹甲以千里路为界,钻凿左右对称,甲桥内侧的钻凿则均背向千里路。

西周时期钻凿的排列,与殷墟大同小异,但甲桥的排列与殷墟典型卜甲不同,即左右甲桥内侧钻凿的钻在凿槽的外侧^①,钻凿背向千里路,与甲腹钻凿排列相反。有的甲桥内外侧均有钻凿,内外对称。如洛阳北窑遗址^②的卜甲(标本 T3H83:14 + T3H90:3 + T3H83:8,为腹甲)、安阳殷墟遗址^③的卜甲(图二十九,1)、扶风齐家遗址^④的卜甲(标本 M47:1,为腹甲)(图二十九,2)。



图二十九 钻凿甲腹左右对称甲桥内侧背向千里路排列图

1. 安阳殷墟遗址的腹甲 2. 扶风齐家遗址(标本 M47:1)

下面以西周早期典型的腹甲为例,简单概括腹甲各部位钻凿位置及排列状况。

甲首内板的反面通常做出左右对称的两个钻凿,个别为三或四个,钻在内侧,凿在外侧。有的内板没有钻凿。舌板反面一般没有钻凿,个别有一组或两组,左右对称,钻在凿

① 目前所出土的卜用甲骨材料表明,“甲桥的钻凿背向千里路”的特征,很可能殷墟一期已经出现,但未流行于商代晚期。如安阳苗圃北地遗址的卜甲(标本 PNIVH5:2,为腹甲)。

② 赵振华:《洛阳两周卜用甲骨的初步考察》,《考古》1985年第4期,图五~2。

③ 肖楠:《安阳殷墟发现“易卦”卜甲》,《考古》1989年第7期。

④ 罗西章、王均显:《周原扶风地区出土西周甲骨的初步认识》,《文物》1987年第2期。

的内侧。修整后的甲腹中间薄、周缘厚,中部的钻凿也因之较浅。钻凿以千里路为中轴,一般左右各三列,相互对称。甲腹四个部分的钻凿数一般为3(横向)×3(纵向)或3×4组。最多的上甲腹3×4组,下甲腹3×5组(安阳殷墟“易卦”),数目多少可能与龟甲大小有关。因甲腹上部狭窄,最上一行的钻凿有的左右仅各有两个。甲尾反面的钻凿也以千里路为中轴,左右对称,上部一般有两组或三组钻凿,下部多无钻凿,个别有一组。从完整的龟版看,商人卜甲的钻几乎都在凿内侧,朝向千里路的一侧(包括甲桥外侧部分),即龟甲左半钻在凿的右侧,龟甲右半钻在凿的左侧,烧灼钻凿后在龟版正面出现的卜兆兆枝一律朝向千里路;而周人卜甲左右甲桥一般仅在内侧有一列钻凿,钻在凿的外侧,背对千里路,与临近甲腹上的凿槽两两相背(H11:22),这是和殷墟卜甲的一个大的区别。有的甲桥外侧也有一列钻凿,钻在凿的内侧,则朝向千里路。甲桥内外侧兆枝相对,类似于左右对贞。

(2) 背甲

A型:不规则。

商代中、晚期少数背甲反面的钻凿灼较少,有的甚至只有2—3个。因钻凿数目太少,不易观察其排列规律,一般具有各时期自己的特征。如临城补要村遗址^①的背甲(标本 H70:02)(图版十一,2)、桓台唐山遗址^②的背甲(标本 H122④)(图版十一,3)。

B型:以骨脊中轴线为界,左右两侧有三至四竖列。

商代中期台西类型的一些背甲未锯成两半,反面均有钻凿灼,其排列两侧基本对称。如藁城台西遗址^③的背甲(标本 T4:13)(图版十一,1)。

C型:将背甲分成两半,每半有二至四竖列,钻或朝向脊甲一边,或相反。

商代中期至殷墟二期前段较常见。反面均有二至四竖列的钻凿灼。其中一些列或行的钻在凿内侧,即向骨脊中轴线;一些列或行钻在凿外侧。如藁城北龙宫遗址^④的背甲(标本藁北 C:17)、安阳苗圃北地遗址^⑤的背甲(标本 PNT234④:6)(图版十五,9)。

D型:将背甲分成两半,每半有四至七竖列,钻均朝向脊甲一边。

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非常典型的钻凿排列方式。反面均有四至七竖列的钻凿灼,钻均在凿内侧(向脊甲方向)。如商代晚期《花东》332(H3:1030)、《合》8648、14129(图三十,1)。西周早期岐山周公庙遗址^⑥的背甲(标本 03C10④:1、2)(图三十,2,图版十一,5)。

①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河北临城县补要村遗址南区发掘简报》,待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北临城县补要村遗址北区发掘简报》,待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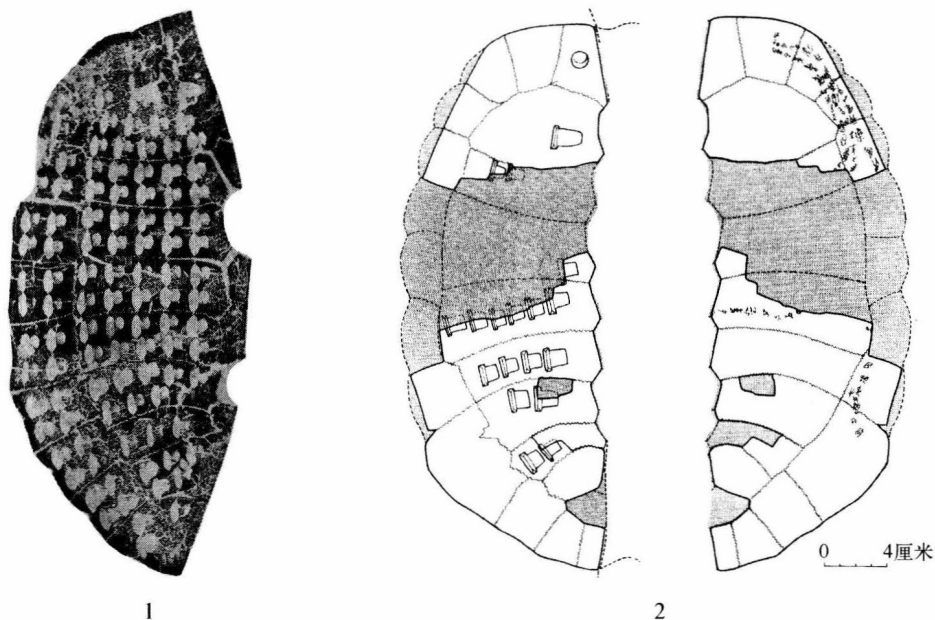
② 宋艳波、燕生东:《鲁北地区商代晚期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三十五期,2007年12月。

③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88页,图版五七~2。

④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北龙宫商代遗址的调查》,《文物》1985年第10期。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202页,图版四四~5。

⑥ 周原考古队:《2003年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调查报告》,《古代文明》(第5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172页,图二一、二二、二四,彩版四、五、一〇、一一。



图三十 背甲钻均在凿内侧排列图

1. 《合》14129 2. 岐山周公庙遗址(标本 03C10④:1,2)

以《花东》H3:20(右)龟背甲为例,简单介绍龟背甲钻凿排列情况。以颈甲向上为正,殷墟背甲一般锯成两半,左右两半对称。钻凿排列均向脊甲,钻位于凿的内侧。右肋甲上有四列钻凿,上下左右均对齐,因肋甲形状每行数目不一,第一右肋甲(D9)上有两行钻凿,第一行3个,第二行4个;第二、五、六右肋甲各一行4个钻凿;第三、四右肋甲各两行钻凿,每行均4个;第七右肋甲一行3个钻凿;第八右肋甲一行2个钻凿。第三至十右肋甲上有单列15个钻凿,除第三右肋甲仅1个钻凿外,余皆2个。

(二) 卜兆形状

卜兆是在反面施灼后,于正面产生的裂纹。《周礼·春官》郑玄注:“兆者,灼龟发于火,其形可占。”《大戴礼》:“龟非火不兆。”较早的卜骨,一般在骨面上直接施灼,卜兆无规律。到商周时期为了控制卜兆的走向,开始先施钻凿,后施灼。正面的卜兆有一定规律。卜兆分为兆身和兆枝,兆身是因凿和灼而裂出的纵向纹,兆枝是因钻和灼而裂出的横向纹。卜兆的排列与钻凿灼的排列相同。下边简单介绍因各时期钻凿灼的位置不同出现几种卜兆的形状(图三十一)。

A 型: 无规律

新石器至商代早期卜骨和商代早期卜甲上,基本为只灼及圆钻内施灼的方式,兆纹皆无固定的形状。

B 型: 兆身与兆枝夹角近 90 度,分左右两部分,兆枝多向内,各自对称。

商代中期开始出现多种形状的钻凿形态和排列。中商时一般施灼在钻或凿的中间,

反面的兆纹显示出兆身与兆枝夹角近 90 度,兆纹的分布与钻凿灼的排列相同。卜骨中虽出现多种形式的钻凿形态,但多数卜骨基本施灼在凿侧中间,兆枝多向内,同一板卜骨上,左右对称;腹甲以千里路为界,腹甲正面最外一列兆枝多朝向千里路,而另一列或两列兆枝多背向千里路,分左右两部分,几乎两两对称。商代晚期沿用中商文化特征的曹演庄类型、大辛庄类型也如此。

C 型:兆枝位于兆身斜上方,兆枝均向内,左右对称。

商代晚期以殷墟类型为代表,施灼基本在凿的中间偏上部位,故兆枝位于兆身斜上方,夹角为锐角。同一板卜骨上,兆枝均朝向臼角方向,左右两块肩胛骨成组,其排列左右对称。腹甲则以千里路为界,兆枝均朝向千里路方向,其排列左右对贞。

D 型:兆身与兆枝夹角 90 度,兆枝基本向内,左右对称。

西周时期兆纹的形状,也是兆身与兆枝夹角 90 度^①。与商代中期相比更为严密而典型。卜骨兆纹的排列,在同一骨板上,骨中轴线为界,基本左右对称。腹甲兆纹的排列,与殷墟腹甲大同小异,以千里路为界,兆枝均向内,其排列左右对称,但左右甲桥内侧的兆枝均背向千里路方向,与甲腹的兆枝方向相反。

	二 列	三 列
B 型		
C 型		
D 型		

图三十一 卜兆形状与排列

(三) 钻凿的制作顺序

商代中期开始钻凿灼兼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钻凿灼兼具,使用普遍,钻凿制作比较规范,但在一些甲骨上可以找到只有凿槽的例子,却未见只有施钻的。这为我们考察钻凿的制作顺序提供了依据。商代晚期卜骨、卜甲上有很多只施凿槽,无钻坑,直接施灼的例子。

1. 卜骨:如《屯南》339(H2:632)、751(H23:104)、1002(H24:265)、2601(H85:42 +

^① 目前所发现的周人卜甲多为近方形的小碎块,这是与周人龟板的钻凿位置和兆枝走向密切相关的。周人龟版的钻都在凿的中部,所以兆枝与兆身呈直角;这与商人甲骨的钻靠近凿的上部,兆枝向上斜行的特点不同。

43+46+102)。

2. 卜甲: 如《合》110、946、《花东》225(H3:657)。

周代部分龟甲上也有刻挖而成的纵凿槽,有人推测,大概是在龟甲上先作纵凿槽,再作方钻^①。如洛阳北窑遗址^②的腹甲(标本 T3H83:16)、周公庙遗址的腹甲(标本 H21①c:40)(图版八,8)。两个标本上都有一道已凿好的凿槽与一组钻凿并排的情况,大概在龟甲上先做好该凿槽,但因某种原因弃用,重新在旁边做一组钻凿。

由上述例子可推测商周时期施钻、凿的顺序,应是先凿后钻。

三、钻凿灼的工具及实施

(一) 灼的工具及实施

关于灼的工具,《仪礼》和《周礼》均有记载。《仪礼·士丧礼》:“卜日,既朝哭,皆复外位。卜人先奠龟于西塾上,南首,有席。楚燎置于爇,在龟东。……卜人抱龟爇,先奠龟,西首,爇在北。”《周礼·春官·菑氏》:“菑氏掌共爇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爇,遂吹其煖契,以授卜师,遂役之。”

凤雏宫殿基址 H11 出土角质料若干,发表于《周原甲骨文》一书^③,有人认为可能是灼的工具。

(二) 钻凿的工具与实施

早期的钻坑应是钻制而成的,而商周时期的钻凿除少数圆钻外,多用刀凿刻成。制作钻凿的工具,在一些考古遗址中均有发现,如郑州二里岗遗址^④和蓝田怀珍坊遗址^⑤等。郑州二里岗遗址中,铜钻(H13:10)与卜骨共出,安志敏认为该铜钻应是制作钻坑的工具^⑥。蓝田怀珍坊遗址发现的一件铜钻为长条形,横断面作菱形,中有脊不甚突出,刃部锋利。通长3.7厘米,刀宽0.5厘米。钻身的宽径与该遗址所出土卜骨的部分坑径相合。这个钻头可能就是当时用作钻制卜骨的工具。张秉权在《殷墟卜龟之卜兆及其有关问题》一文中,绘制了甲骨钻凿制作的虚拟图,认为凿旁的钻是用刀凿刻成的,而非钻制。

《屯南》一书中对钻凿的制作进行了详细描述:凿主要有用刀挖刻、用轮开槽两种;钻主要有用钻子钻成或先用轮开槽,再用刀加工,使钻内侧与凿相连,以及用刀子挖刻三种。

① 赵振华:《洛阳西周卜用甲骨的初步考察》,《考古》1985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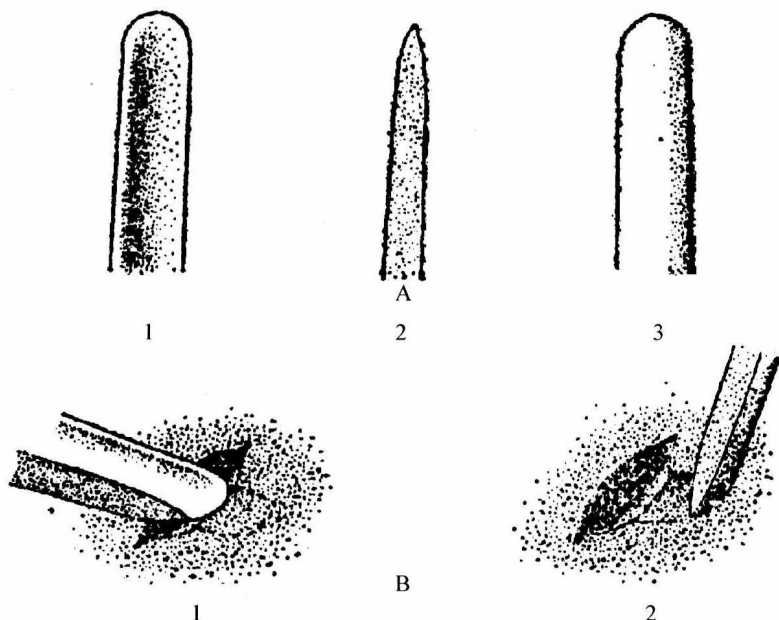
② 赵振华:《洛阳两周卜用甲骨的初步考察》,《考古》1985年第4期。

③ 曹玮:《周原甲骨文》,世界图书出版社,2002年,165页。

④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郑州二里岗》,科学出版社,1959年,37页,图贰伍~8,图版拾柒~1。

⑤ 西安半坡博物馆、蓝田县文化馆:《陕西蓝田怀珍坊商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

⑥ 安志敏:《一九五二年秋季郑州二里岗发掘记》,《考古学报》第8册,1954年,91页。

图三十二 指甲状凹穴实施的情形及其工具^①

A. 工具: 1. 正面, 2. 侧面, 3. 反面; B. 工作情形: 1. 横铲, 2. 竖切

四、小 结

先秦时期卜用甲骨的钻凿灼形态,主要以牛肩胛和龟甲为主,以下对各时期中心地区甲骨钻凿灼的主要特征及演变规律作简单总结。

1. 卜骨

新石器时代直接施灼,无钻无凿,灼痕数量不多。羊的肩胛骨很薄,灼痕都较小,且甚轻微;牛、猪肩胛骨比较厚,灼痕较大而深,不甚规则,较深重的灼痕则透过反面,不甚明显,灼痕的数目及排列没有一定规律。龙山时期比较晚的卜骨灼痕分布较多而密集,一般有10—20个,最多者达54个。新石器时代卜骨的圆形灼痕,多位于骨正面中部略凹处较薄的部位,少数位于骨反面。龙山晚期晚段开始出现卜骨正反两面施灼的方式,夏代逐渐广泛使用。

夏代大部分直接施灼,无钻无凿。灼痕多在肩胛骨的正面和反面,有固定的位置,正面位于骨中间较薄处偏下;反面位于骨中间较薄处偏上。有的猪、羊和鹿的肩胛骨,或只在正面较薄的部位施灼,或只在反面较薄的部位施灼。此外,龙山晚期晚段或夏代早期早

^① 张秉权:《殷墟卜龟之卜兆及其有关问题》,《中央研究院院刊》第一辑,1954年,插图一。

段在反面骨脊上开始出现施灼的现象,夏代早期诸考古文化普遍使用,可能有些地区沿用至夏代晚期。但骨脊上施灼仍然不是主流,多数卜骨还仅在正反两面施灼。

夏代晚期部分卜骨开始出现先钻后灼的现象。钻坑为圆形圜底,形态较为原始,钻坑内施灼,反面留有明显的兆纹。在二里头类型、东下冯类型、牛角岗类型、游邀类型、岳石文化、先商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等诸文化均有发现。夏县东下冯遗址和巩县稍柴遗址出土的牛肩胛骨中的钻坑,可能年代最早,均属于二里头文化三期。

郑州商城遗址在二里岗下层时期不见钻坑,二里岗上层时开始出现圆钻,圜形底,坑内施灼,钻坑分布密集,可能受夏代晚期许多地区已经出现先钻后灼的影响,但整治方式更为进步,即在骨反面上部先刻出凹槽,再在槽中钻出圆坑。

到商代中期,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钻凿灼形态,商代早期至中期前段的圆形圜底钻,分为两支,各自演变如下:(1)圆形圜底,坑内施灼(商代早期至中期前段)→圆形圜底,坑内或旁施灼(商代中期)→长圆形钻(凿的原始形态),圜底,旁施灼→弧角长方凿,圆或半圆钻,钻内施灼(商代中期);(2)圆形圜底,坑内施灼(商代早期至中期前段)→圆形平底,坑内施灼(商代中期)→圆形平底,坑内有猫眼状槽,槽旁施灼(商代中期)。

商代晚期,卜骨大部分为弧形(枣核形)凿,凿旁施灼,有的凿旁有圆钻,位于凿的斜上方,钻内施灼;少数沿用中商的圆形平底,坑内有猫眼状槽,槽旁施灼,此种只见于殷墟一期至二期前段。

西周早期,钻坑为圆形,平底,坑内一侧有猫眼状槽,槽旁施灼。

西周中晚期,钻坑为圆形,平底,坑内一侧有猫眼状槽,槽旁施灼,开始出现三联钻。

2. 卜甲

商代早期开始出现卜甲,二里岗下层时直接施灼;二里岗上层时,钻坑为圆形,圜底,坑内施灼;到商代中期,大部分为弧角长方形凿,圆形或半圆形钻,钻坑内施灼,少数圆钻,圆形,平底,坑内一侧有猫眼状槽,槽旁施灼;殷墟时,弧形(枣核形)凿,圆形或半圆形钻位于凿的斜上方,钻坑内施灼;先周时,方凿圆钻,凿长于钻;西周时期,均方钻方凿,早期时,凿长于钻,中晚期时,凿略长或等长于钻,先周西周时均在钻内施灼。

第四章 甲骨文的行款走向及相关问题

已知年代最早有刻划符号(或文字)的甲骨发现于新石器时代武山傅家门遗址和河南舞阳贾湖遗址。郑州商代早期遗址中发现刻有文字的牛肋骨,但该肋骨不是卜骨。带有刻辞的卜用甲骨在商代晚期的殷墟遗址开始出现。

石璋如^①结合李济和胡厚宣等人的说法,认为甲骨上刻写卜辞,可能是殷人的创造。

有学者认为甲骨刻辞的文例“在甲骨学上的约定意义为占卜文辞与占卜载体的结合关系之表象,专指卜辞在卜用甲骨上所刻写的辞例形式、地位、行款走向的习惯格式和分布规律等等”^②,不同于一般语言学界的定义。以往学者对于文例的研究,主要针对占卜状态下的一事多卜、正反对贞、同事习卜、异事同版、同事异版等,对行款走向的研究则尚有欠缺。但甲骨文例的研究和甲骨文字的释读,都需要首先对刻辞的行款走向有清晰的认识。基于此,本章主要对刻辞的行款走向进行探讨。

甲骨学研究成果已经证明,甲骨文字的行款布局一般都与卜兆的走向相关。兆枝的走向则取决于甲骨反面钻凿灼的相对位置,而钻凿灼在甲骨不同位置上的分布又具有一定的规则,所以明确钻凿灼在甲骨上的分布规则,对确定细小碎片在整版甲骨上所处的位置及分析判断兆枝的走向并推定刻辞的行款布列,有决定性意义。

第一节 殷墟甲骨文以前的文字

在晚商殷墟甲骨文以前,新石器时代至商代中期的卜用甲骨上就已出现了刻划符号。从这些刻划符号来看,很可能在殷墟甲骨文以前就已经存在了文字。但由于保存状况或考古发掘等原因,目前尚无发现。

据目前所知,晚商殷墟甲骨文以前卜用甲骨上所见的刻划符号,主要在以下遗址中出土:新石器时代武山傅家门遗址^③发现2件羊肩胛骨^④,有灼痕和“一、二、S”形等阴刻符

① 石璋如:《骨卜与龟卜的探源——黑陶与白陶的关系》,《大陆杂志》第8卷,1954年第9期。

② 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258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甘肃武山傅家门史前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4期;《武山傅家门遗址的发掘与研究》,《考古学集刊》第16集,文物出版社,2006年,412页,图27,彩版3、4。

④ 原报告认为共有阴刻符号的卜骨6件,其中有猪和牛肩胛骨。但笔者仔细观察报告照片,认为只有羊肩胛骨上有灼痕,因此只有羊骨才算卜骨,余者暂时不能划为卜骨行列。

号痕迹。夏代二里头类型的澠池郑窑遗址^①第三期出土的卜骨(标本 J4:19)有“口”、“冂”、“丨”刻符各一个。桓台县史家遗址^②发现2件猪肩胛骨^③,有人工刻划的文字或符号。一件一面有“Λ”、“λ”2字,另一面有“フ”、“𠂔”、“X”等三字。另一件一面有明显的人工刻划痕迹,但笔画比较杂乱,中间1字为“𠂔”。商代早期二里岗文化的巩县稍柴遗址^④的卜骨(标本 H26:7),为牛肩胛骨,刻有“\”符号。

新石器时代在中国境内出现的陶器、甲骨材质上的刻划符号,为我们研究中国文字起源提供了新的材料。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龟腹甲刻符^⑤,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刻划符号^⑥,时代属于新石器中期。甘肃秦安大地湾出土的陶符,其年代仅次于贾湖龟甲刻符^⑦。新石器时代晚期有多处考古遗址中发现陶器刻划符号,如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临潼姜寨遗址^⑧,大汶口文化的莒县凌阳河遗址,大溪文化的宜昌杨家湾遗址^⑨,安徽蚌埠双墩遗址^⑩,崧泽文化的崧泽遗址^⑪,石家河文化的石家河遗址^⑫、肖家屋脊^⑬、邓家湾遗址^⑭,马家窑文化的半山、马厂遗址^⑮等,都发现有刻划或彩绘的陶符。铜石并用时代的龙山文化时期也有不少陶符出土,如山东章丘龙山城子崖遗址^⑯、永城王油坊遗址^⑰、登封王城岗遗址^⑱等。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马桥文化,也有相当数量的陶器刻划符号^⑲。

夏代澠池郑窑遗址^②和桓台史家遗址^②出土的卜骨上的刻字或刻划符号,可能与夏代其他器物中常见的刻划符号类似,不同于后来真正的甲骨文。这与殷墟甲骨的刻辞之间,

①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澠池县文化馆:《澠池县郑窑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年第2期。

② 淄博市文物局、淄博市博物馆、桓台县文物管理所:《山东桓台县史家遗址岳石文化木构架祭祀器物坑的发掘》,《考古》1997年第11期。

③ 报告认为该遗址的卜骨“均为羊肩胛骨”。虽然卜骨已残,只留柄部一段,但笔者仔细观察,发现骨脊和骨白的形状表现出猪肩胛骨的特点,而且卜骨比较厚,应该为猪肩胛骨。

④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巩县稍柴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3年第2期。

⑤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第六次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1期;《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458页,彩图四十七、四十八。

⑥ 张光裕:《中国文字起源的省思》,《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278—288页。

⑦ 甘肃省博物馆:《一九八〇年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存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

⑧ 西安半坡博物馆编:《姜寨——新石器时代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

⑨ 宜昌博物馆:《宜昌杨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

⑩ 徐大立:《蚌埠双墩新石器遗址陶器刻划初论》,《文物研究》总第五辑,1989年9月。

⑪ 上海市文管会:《上海市青浦区崧泽遗址的试掘》,《考古学报》1962年第2期。

⑫ 石家河考古队:《湖北省石家河遗址群1987年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8期。

⑬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等:《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⑭ 郑中华:《论石家河文化的刻划符号》,《江汉考古》2000年第4期。

⑮ 巴尔姆格伦:《半山及马厂随葬陶器》,中国古生物志丁种第3号1册,178—179页。

⑯ 李济总编:《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70—75页,图版拾陆。

⑰ 商丘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1977年河南永城王油坊遗址发掘概况》,《考古》1978年第1期。

⑱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大象出版社,2007年。

⑲ 余杭县文管会:《余杭县出土的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的陶器刻划符号》,《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李学勤:《试论余杭南湖良渚文化黑陶的刻划符号》,《浙江学刊》1992年第4期;饶宗颐:《哈佛大学所藏良渚黑陶上的符号试释》,《浙江学刊》1990年第6期。

②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澠池县文化馆:《澠池县郑窑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年第2期。

② 淄博市文物局、淄博市博物馆、桓台县文物管理所:《山东桓台县史家遗址岳石文化木构架祭祀器物坑的发掘》,《考古》1997年第11期。

在时间和特点上似无关联。

郑州商城遗址发现两件字骨,一件为肋骨刻字,一件为肱骨刻字^①。另在郑州电力学校遗址商代文化遗存中发现有刻符骨料一件^②。藁城台西遗址^③、郑州小双桥遗址^④、安阳洹北花园庄遗址^⑤、成都方池街遗址^⑥等,都发现有契刻符号的骨制品。商代早、中期这些刻有文字的材料出现,至少证明商代早、中期应有文字的存在。《尚书》谓“殷先人有典有册”,但简牍材料,容易腐烂,未保存下来,目前无法看到。

第二节 殷商西周卜骨刻辞的行款

一、殷 商

在殷墟出土刻辞甲骨的地点主要有小屯(村东北、村中、村南、村西)、花园庄(东地、南地)、侯家庄南地、四盘磨、后冈、大司空、苗圃北地等处。其中大司空村遗址^⑦发现2件卜骨,一件(标本SH314③:3)为牛左肩胛骨,残存柄部,整治较粗糙,未切臼角。正面靠骨臼左下侧有“辛贞在衣”四字,另一件刻有“文贞”二字,字体纤细,显系习刻。花园庄南地遗址^⑧发现57件甲骨,其中刻辞甲骨有5片,均为卜骨。刻辞字数不多,均属于习刻。标本M99上③:2的行款较乱,“见”字横书,“无”字倒书。标本M99上③:1的字体类似“午组卜辞”的卜骨。该两处遗址所见的这几件刻辞卜骨均具有殷墟甲骨文最早的特征,应属于殷墟甲骨文一期偏早^⑨。

关于商代卜骨行款走向,以往学者多有研究。胡光炜的《甲骨文例》^⑩是第一部专门讨论甲骨文例的著作。此后,董作宾的《骨文例》^⑪和《殷代文例分“常例”“特例”二

①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岗》,科学出版社,1959年,38页,图叁拾~24、25。

②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电力学校考古发掘报告》,《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1985—199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177页,图一四。

③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90—99、176—178页。

④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学文博学院考古系、南开大学历史系博物馆学专业:《1995年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8年~1999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5),文物出版社,2004年,357页,图版18—3。

⑥ 周尔泰:《成都市方池街古文化遗址初探》,《四川文物》2003年第1期。

⑦ 马得志、周永珍、张运鹏:《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9册,1955年,7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199—202页、附表十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4~1988年安阳大司空村北地殷代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4年第4期。

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队:《1991年安阳花园庄东地、南地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6期。

⑨ 殷墟甲骨文分期与殷墟考古学文化分期是两个不同概念,各自期别所对应的王世有所不同。本章凡涉及甲骨文的期别,都是指甲骨文分期。

⑩ 胡光炜:《甲骨文例》,余永梁手书石印本二卷一册,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考古学丛书之一,1928年;又收入《胡小石论文集》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⑪ 董作宾:《骨文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本1分,1936年12月;又收入《董作宾先生全集》甲编第3册,艺文印书馆,197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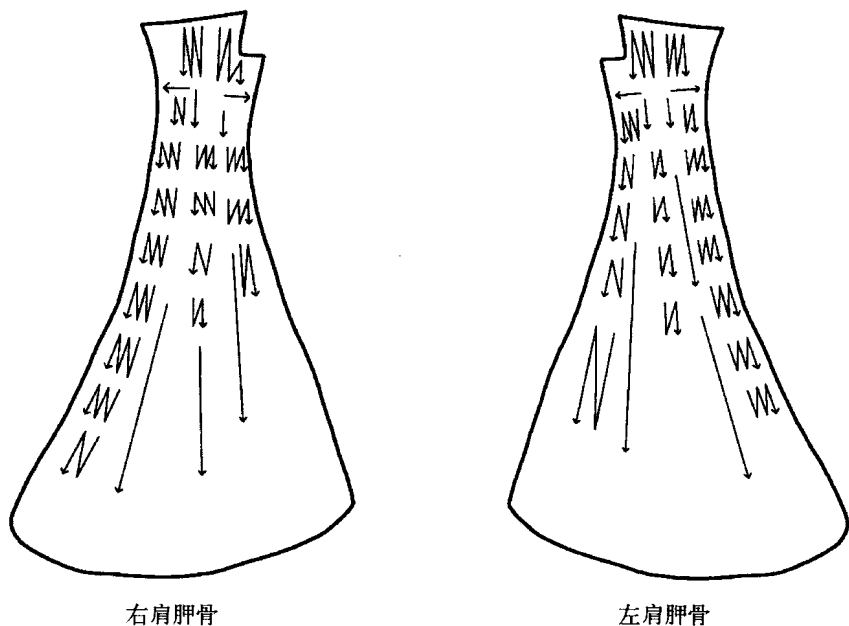
种说》^①二文也有探讨。严一萍的《甲骨学》^②一书,在董作宾《骨文例》一文的基础上,将甲骨的文例分为90式,其中卜骨56式,腹甲31式,背甲3式,在书中仅以图示人。

前人研究或受卜骨材料的限制,或据仅见的碎片进行研究,或对整片卜骨进行研究,却忽略了对不同部位刻辞行款规律的归纳。本文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将卜骨按柄部、两侧缘、扇部等几个部位分别考察,发现每个部位的行款走向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可弥补前人研究的不足。

商代的有字卜骨,绝大多数以骨白向上为正,刻辞行款走向分为以下几类。

(一) 正面的刻辞

董作宾的《骨文例》一文认为:依据肩胛骨“刻辞之部位,定其行文之通例。凡完全之胛骨,无论左右,缘近边(两侧缘)两行之刻辞,在左方,皆为下行而左,间有下行及左行者。在右方,皆为下行而右,亦间有下行及右行者。左肩胛骨中部如有刻辞,则下行而右;右肩胛骨中部反是,但亦有下行而右者”,文中的卜骨标本(图21、22)为商代晚期卜骨中较为典型的行款走向模式。下面按董作宾的虚拟图,以骨白向上为正,肩胛骨分几部分,详细描述其行款走向的特点(图三十三):



图三十三 商代晚期卜骨正面刻辞行款走向的虚拟图^③

① 董作宾:《殷代文例分“常例”“特例”二种说》,《中国文字》第6册,1962年1月;又收入《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编第五册,艺文印书馆,1977年,77—87页。

② 严一萍:《甲骨学》,艺文印书馆,1977年,960—1085页。

③ 董作宾:《骨文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本1分,1936年12月;又收入《董作宾先生全集》甲编第3册,艺文印书馆,1977年,913—952页,图21(左肩胛骨正面刻辞例)和22(右肩胛骨正面刻辞例)。

- (1) 柄部：一般反面多无钻凿，左右肩胛骨均下行而向外（两侧缘）。
- (2) 靠近胸侧缘的部位：反面有一列最靠近胸侧缘的竖行钻凿，占卜以后正面形成一列竖行卜兆，该列卜兆兆身与胸侧缘之间的竖形长条部位，下行而向外（胸侧缘）。
- (3) 骨中间和扇部：多数向胸侧缘，少数向颈侧缘。
- (4) 靠近颈侧缘的部位：下行而向外（颈侧缘）。

本文分类定名以此图作为参考，来探讨殷商时期典型特征卜骨的行款走向。因卜骨刻辞绝大部分位于正面，故文中对正面刻辞的行款走向研究较为详细，而反面刻辞较为少见，本文仅对所见到的作简单描述。目前有刻辞的卜骨多属于殷墟甲骨一期，其他各期较为少见，故各期所见刻辞行款走向的有无或与此有关，即因标本太少而不见于刻辞较少的二至五期，而并非当时没有。

1. 柄部：骨白以下，一般反面多无钻凿

A 型：下行而向外（两侧缘）。

以卜骨中间为界^①，两侧刻辞由中间下行而外，即左右肩胛骨行款均下行而走向两侧边缘。根据刻辞内容的多少分为两式：

I 式：只有一侧。

右肩胛骨：如《合》390、458（一期）、22594、22778（二期）、32014、32113（四期）。

左肩胛骨：如《合》495、5537（一期）、22548、23002（二期）、32103、34080（四期）。

II 式：两侧均有。

右肩胛骨：如《合》177、5512（一期）、24132、24429（二期）、32053、34165（四期）。

左肩胛骨：如《合》369、5111（一期）、26611（二期）。

A 型是殷墟时期最为典型的刻辞行款走向，见于一期、二期、四期，其中一期最为常见，二期、四期较少见，三期、五期因材料过少情况不明。另外，五期柄部很少见到刻辞，该型式或许在五期时已经消失。

B 型：下行而向臼角（或相反）。

I 式：下行而向臼角。刻辞均向同一方向，右肩胛骨为“下行而右”；左肩胛骨为“下行而左”。

右肩胛骨：如《合》106（一期）、31301（三期）。

左肩胛骨：如《合》6409、9544、13869、17393（一期）。

II 式：与 I 式相反。

右肩胛骨：如《合》595、6402、13307（一期）、31976、32994（四期）。

左肩胛骨：如《合》8884、9968（一期）、32055、32099（四期）。

^① 该线大致为最靠近胸侧缘的一列卜身所形成的线及其延长线。

B 型在殷墟时期卜骨中较为少见,B I 式主要见于一期,在三期仅见一例,卜骨个体较小;B II 式主要见于一、四期。其他各期均不见。

除 A、B 型外,柄部还见有其他几种刻辞行款走向,但因数量太少,不再分型,描述如下。

与 A 型相反,即柄部两侧刻辞由两侧向中间下行而向内者,目前仅在一、二期偶见一侧下行而向内者,如《合》1026、12335(一期)、24457、26208、26314(二期)。该型式可能与柄部以下骨中间(或两侧缘)的行款方式相关。

柄部少数并列的两段刻辞均下行而向同一方向,如《合》7411、7412、12341,属于殷墟一期,均为下行而向左。

此外,柄部有些刻辞的行款走向与其下两侧缘或骨中间的行款相同,联系可能较为紧密。

2. 靠近胸侧缘的部位

反面最靠近胸侧缘有一列竖行钻凿,大致 6—14 个左右,占卜以后正面形成一列竖行卜兆,该列卜兆的卜身与胸侧缘之间的竖形长条,即此部位。一般每一个卜兆外侧有相对的刻辞。常见的有 6—10 段刻辞。

殷墟卜骨基本上卜兆兆枝均朝向切去的臼角,以臼角作为内侧,左右肩胛骨对称。表面看来,左右肩胛骨的刻辞行款走向相反,但实际上均与卜兆相关,属于同一种型式的行款走向。

A 型:下行而向外(胸侧缘)。

基本围绕一个卜兆,行款走向一律下行而向外(胸侧缘),即左肩胛骨卜身外侧的刻辞,下行而右;右肩胛骨卜身外侧的,下行而左。

I 式:复列下行。基本围绕一个卜兆,该特征为殷墟时期典型的特征,殷墟一期至五期均有。

右肩胛骨(下行而左):如《合》177、10043(一期)、22598、26308(二期)、26879、27164(三期)、32014、34165(四期)、35589、35641(五期)。

左肩胛骨(下行而右):如《合》67、6209(一期)、22605、22721(二期)、27620、27042(三期)、32252、33273(四期)、35588、35706(五期)。

II 式:单列下行。与 I 式相同,基本围绕一个卜兆,但刻辞较短,仅有一列。殷墟二、三期多见,四期多见横行排列。

右肩胛骨:如《合》9639、10249(一期)、23347、23807(二期)、29843、30883(三期)、32616、34213(四期)。

左肩胛骨:如《合》19238(一期)、23878、23931(二期)、28965、29245(三期)、32488、34217(四期)。

A 型为殷墟时期最为典型的刻辞行款走向,多数为 I 式(复列下行),少数为 II 式(单

列下行),也有一些两者混用,如《合》26975(三期)、33787(四期)。

B型:下行而向内

与A型相反,较为特殊,一至四期偶见。如《合》13443(一期)、22884、26208(二期)、27145(三期)、31993(四期)。

C型:长条刻辞,单列下行。

胸侧缘下部围绕多个卜兆者。一般胸侧缘上部多见A型,下部多见长条刻辞,单列下行。殷墟三期多见,二期、五期不见。

右肩胛骨:如《合》27041、27925(三期)。

左肩胛骨:如《合》30858、30961(三期)、31993、32729(四期)。

此外,殷墟三、四期单列下行,因刻辞较长,到脊侧缘转向内,即右肩胛骨转向右,左肩胛骨转向左。

右肩胛骨:如《合》28009(三期)、32614(四期)。

左肩胛骨:如《合》28272(三期)、32020(四期)。

3. 骨中间和扇部

除去靠近两侧缘之外的剩余部位。该部位反面靠近柄部处钻凿较多,刻辞基本围绕一个卜兆排列,扇部反面多数不见钻凿,正面刻辞多为长条刻辞。

A型:下行而向胸侧缘。

行款走向右肩胛骨下行而左,左肩胛骨下行而右。该部位刻辞行款走向虽与靠近胸侧缘部位的刻辞行款走向(A型)相同,但两者性质完全不同,前者刻辞与兆枝位于卜身同侧,行款走向迎向兆身,后者刻辞位于卜身的外侧,与兆枝异侧,行款走向背离兆身。

右肩胛骨:如《合》13536、16568(一期)、23197、23241(二期)、30183、31304(三期)、32185、34158(四期)、37434(五期)。

左肩胛骨:如《合》12463(一期)、23002、24361(二期)、27042、《补》9622^①(三期)、33273、32192(四期)、37793(五期)。

B型:下行而向颈侧缘。

行款走向右肩胛骨下行而右,左肩胛骨下行而左。

右肩胛骨:如《合》13536(一期)、23726、《补》7028(二期)、26907、26995(三期)、32028、33986(四期)。

左肩胛骨:如《合》12347、12436(一期)、2308、23732(二期)、27042、27456(三期)、34120、34240(四期)。

B型行款走向虽与A型相反,但两者正面刻辞均与兆枝位于卜身同侧,行款走向迎向

^① 文中标本编号除《补》编号(如《补》7028)外,均为《合》的编号。《补》编号文中均一一注出,未加说明的均为《合》编号,文中不一一说明。

兆身,应属于同一类型。这点可从殷墟时期龟甲上得到佐证,该时期龟甲上钻凿排列非常严格,以千里路为界左右对称。其刻辞的行款走向均受钻凿形态的制约,即正面刻辞均与兆枝位于卜身同侧,行款走向迎向兆身。殷墟时期大部分卜骨左右肩胛骨对称,每一骨板上兆枝均朝向骨臼方向。但部分留有中商特征的卜骨上,同一骨板上左右对称,推测其应该与龟甲刻辞行款走向相似。即正面刻辞均与兆枝位于卜身同侧,行款走向迎向兆身。

除 A、B 型外,或许存在正面刻辞均与兆枝位于卜身同侧,但行款走向背离兆身的类型。目前发表的刻辞材料中,多注重正面刻辞,而反面钻凿排列多不见,因此无法证明该类型是否存在。

C 型:单列下行^①。

骨中间反面多数不见钻凿,正面刻辞多为长条刻辞。每条刻辞仅有一列,单列下行。有的卜骨上该部位仅有一条刻辞,最多者有 7 条(如《合》10111)。殷墟一至四期常见,五期未见,但不排除存在的可能。

右肩胛骨:如《合》6087、6498(一期)、24358、24412(二期)、27209、28089(三期)、32028、32453(四期)。

左肩胛骨:如《合》4284、5044(一期)、23689、23717(二期)、27041、30173(三期)、31992、32020(四期)。

此外,有两件肩胛骨,因刻辞较长,单列下行转向右。如《合》31993(四期),为左肩胛骨,到肩部正面所施钻凿的上部转向右。《合》32329(四期),为右肩胛骨,到肩部正面所施钻凿的下部(靠近脊侧缘)转向右。

D 型:复列下行。

与 C 型类似,但刻辞较多,骨正、反两面均布满刻辞,复列下行,有的与 C 型共存。多见于殷墟一期。

I 式:多条刻辞。以骨中间大致为界,分两部分。靠近胸侧缘部分,一般有一段刻辞,行款走向均下行而向外(胸侧缘);靠近颈侧缘部分一般有两、三段刻辞,其行款走向可分为两亚式。

I a 式:靠近颈侧缘部分的一至三段刻辞,行款走向均下行而向外(颈侧缘)。如《合》137、6057、10405,均为殷墟一期。

I b 式:靠近颈侧缘部分的一至三段刻辞,有的下行而向内,有的下行而向外。如《合》10405、10406,均为殷墟一期。

II 式:单条刻辞。该类刻辞较为特殊,主要记载干支。一期、二期偶见,五期较为常见。

II a 式:下行而向臼角。如《合》11730(一期)、24440(二期)。

^① 因卜骨较残缺,无法辨别左右,对卜骨拓本中能看出骨中间单列下行的刻辞,其行款走向受肩胛骨左右的影响不大,故暂归属于右肩胛骨。

Ⅱb式：与Ⅱa式相反。如《合》37986、37995、38012、38058（五期）。

4. 靠近颈侧缘的部位

反面最靠近颈侧缘有一列竖行钻凿，该列钻凿与颈侧缘之间的竖行长条，即此部位。该部位较少见刻辞，上部钻凿较多，下部钻凿较少见，其行款走向受反面钻凿排列的影响，大致情况与骨中间情况类似。

A型：下行而向外（颈侧缘）。

I式：复列下行。基本围绕一个卜兆，复列下行。殷墟一至四期均有，四期该型式较多见，五期因靠近颈侧缘较少见刻辞而不见该型式。

右肩胛骨：如《合》9790、13536（一期）、23163（二期）、32001、32185（四期）。

左肩胛骨：如《合》22404（一期）、31636（三期）、32050、32301（四期）。

Ⅱ式：单列下行。与I式相同，基本围绕一个卜兆，但刻辞较短，仅有一列，有的与I式并存。殷墟二至四期均有。

右肩胛骨：如《合》23964、24665（二期）、26907（三期）、33359（四期）。

左肩胛骨：如《补》8714 甲（二期）、《补》9622（三期）。

B型：下行而向内。

因殷墟四期A型较为流行不见该型式外，殷商其他时期均见，殷墟二期较多见。

右肩胛骨：如《合》6665、13536（一期）、22925、23188（二期）、31493、《补》9986（三期）、37434（五期）。

左肩胛骨：如《合》390、12907（一期）、23002、23300（二期）、27148、31636（三期）。

C型：长条刻辞。

颈侧缘下部反面少见钻凿，故长条刻辞多见，单列下行。多见于殷墟三、四期。

右肩胛骨：如《合》6778、15888（一期）、26899、28564（三期）、32001、32028（四期）。

左肩胛骨：如《合》9933（一期）、33417、33508（四期）。

5. 较特殊之例

A型：以骨白向下为正。

殷墟时期的卜骨以骨白向上为正为常例，但在个别卜骨上还出现以骨白向下为正的现象，这在一期多见，四期也偶尔发现。因材料较少，其行款走向规律不甚清楚，以《合》20576为例作简单描述。

《合》20576：为牛右肩胛骨，正反两面均有钻凿灼和刻辞，其中反面刻辞，以骨白向下为正，单列下行，为常例；正面刻辞，以骨白向上为正，较为特殊。正面刻辞行款走向如下：柄部无刻辞；靠近胸侧缘部分，中段残缺不明，近柄部无刻辞，近扇部单列下行；靠近颈侧缘部分，下行而向右（胸侧缘），刻辞的排列与以骨白向上为正的胸侧缘部位相类似，有十段刻辞；骨中间和扇部，有下行而向右（胸侧缘）和单列下行两种。

右肩胛骨：如《合》21473、21475、20576（一期）、35261（四期）。

左肩胛骨：如《合》9933、21474（一期）。

B型：以两侧缘分别向上为正。

如《补》13267为左肩胛骨，以颈侧缘向上为正，靠近颈侧缘中部有六列干支刻辞，下行而左。该板卜骨上的其他刻辞，均以骨白向上为正，行款走向遵循正面刻辞行款走向的规律。

右肩胛骨：如《补》13267（一期）、《补》9670（三期）。

左肩胛骨：又如《补》10222反（三期）。

此外，该类还有殷墟四盘磨村SP11“易卦”卜骨^①。

（二）反面的刻辞

卜骨反面有刻辞的材料很少，刻辞的字数也较少。本文仅对所见到的资料作简单描述。

1. 柄部

仅见下行而向胸侧缘。如《合》20576（一期）。

2. 靠近胸侧缘的部位

仅见单列下行。如《合》367反、7081反（一期）。

3. 骨中间和扇部

其行款走向与正面刻辞大致相同。

A型：下行而向颈侧缘。

如《合》458反（一期）、23241反（二期）、26907反、27042反（三期）、33025反、33374反（四期）。

B型：下行而向胸侧缘。

如《合》6057反（一期）、33025反（四期）。

C型：单列下行。

左肩胛骨：如《合》559反（一期）、27826反（三期）、《补》10584反（四期）。

右肩胛骨：如《合》367反、6087反（一期）、28099反（三期）、32001反、32077反

^① 曹定云：《殷墟四盘磨易卦卜骨研究》，《考古》1989年第7期。关于该卜骨的年代，学者们或认为是商代之物，或认为是西周之物，例如唐兰认为是西周之物，张亚初、刘雨两位认为属于殷墟甲骨第五期，李学勤则将它定在晚殷时期。而曹定云主要对文字特征、钻凿形态以及灼向进行了考察，主张为康丁时期的卜骨。笔者认为，虽然整治方式和钻凿形态具有商代晚期典型的特点，但甲骨刻辞的行款走向却不同于商代晚期典型刻辞的行款走向，而与张家坡出土的数字易卦甲骨（西周时期）大致相同。此外，《合集》29074的易卦刻辞（殷墟三期）为倒刻，可能易卦刻辞的行款走向与一般刻辞的行款走向有别。

(四期)。

D 型：复列下行。

与正面该部位的 D 型相同，扇部反面钻凿较少，正、反两面均布满刻辞，主要见于殷墟一期。

I 式：下行而向颈侧缘。如《合》137 反、583 反、6057 反、10405 反、10406 反(一期)。

II 式：下行而向胸侧缘。如《合》36528 反(五期)。

4. 靠近颈侧缘的部位

A 型：下行而向胸侧缘。

如《合》390 反、10229 反、12241 反、15960 反(一期)。

B 型：单列下行。

如《合》6151 反、7814 反、12241 反(一期)。

5. 较特殊之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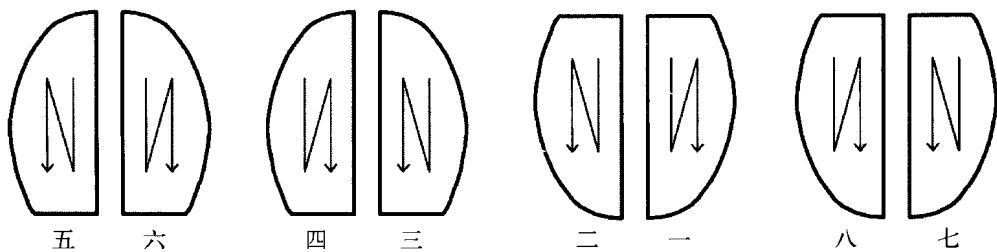
A 型：以骨白向下为正。

如《补》10222 反(三期)，正反两面均有刻辞，正面刻辞以骨白向上为正，单列下行，为常例；反面刻辞以骨白向下为正，单列下行。

(三) 骨白刻辞

骨白刻辞“是记事刻辞，为武丁时代的一种特殊制度，也不见于祖庚以下所发现的甲骨”^①。

董作宾在《骨白刻辞再考》^②中，对胡厚宣的六种骨白文例进行了补充和修正，将其更正为八种，并绘制四包骨白成对排列法一图，文中所示如下(图三十四)：



图三十四 商代晚期骨白刻辞的行款走向^③

① 严一萍：《甲骨学》，艺文印书馆，1977 年，977 页。

② 董作宾：《骨白刻辞再考》，《中央研究院院刊》(一)，1954 年，455—467 页；又收入《董作宾先生全集》甲编，艺文印书馆，1977 年，661—674 页。

③ 董作宾：《骨白刻辞再考》，《中央研究院院刊》(一)，1954 年，附图八。

- (1) 右肩胛骨以右为上,右行(胡一)。
 - (2) 左肩胛骨以左为上,左行(胡四)。
 - (3) 右肩胛骨以左为上,右行(胡三)。
 - (4) 左肩胛骨以右为上,左行(胡六)。
 - (5) 右肩胛骨以左为上,左行(胡二)。
 - (6) 左肩胛骨以右为上,右行(胡五)。
 - (7) 右肩胛骨以右为上,左行。
 - (8) 左肩胛骨以左为上,右行。
- (1)与(2),(3)与(4),(5)与(6),(7)与(8)分别左右对贞。

本文考虑到骨白刻辞的行款走向与左右对贞有关,故在董氏基础上分为两型6式,将单行骨白刻辞补充在内。

A型:切去的骨白为下。

I式:下行而向外。刻辞两列为主。

右肩胛骨:如《合》849白、935白、5708白、6040白、6108白、6385白、6402白、6417白、6552白、7081白、7382白、7565白、9172白、9410白、9412白、9790白、10045白、12764白、13634白、13854白、17497白、17507白、17508白、17510白、17511白、17517白、17523白、17525白、17532白、17538白、17553白、17562白、17565白、17586白、17596白、17607白、17611白、17622白、17624白、17625白、17629白。

左肩胛骨:如《合》390白、495白、51177白、5551白、5628白、6233白、7941白、9544白、13523白、15614白、15700白、17393白、17512白、17513白、17524白、17533白、17542白、17561白、17566白、17571白、17602白、17627白、17630白、17649白。

II式:下行而向内。仅见于左肩胛骨上。

如《合》6451白、6527白、6532白、8852白、10228白、12290白、13443白、17527白、17528白、17573白。

III式:单列下行。签名刻辞为主,多为一两个字。

右肩胛骨:如《合》1121、6227白、6505白、13311白。

左肩胛骨:如《合》9530白、13521白、14585白、18654白。

B型:切去的骨白为上。

I式:下行而向外。

右肩胛骨:如《合》5512白、6740白、6855白、7161白、7629白、8991白、9408白、9411白、9416白、13545白、14471白、14474白、14526白、15528白、15734白、17424白、17490白、17491白、17492白、17506白、17515白、17534白、17539白、17552白、17555白、17558白、17563白、17568白、17569白、17572白、17580白、17663白。

左肩胛骨:如《合》130白、5545白、5717白、6769白、7147白、7322白、7380白、7381

白、7383 白、7384 白、8398 白、8810 白、9669 白、10199 白、10643 白、17509 白、17514 白、17525 白、17535 白、17540 白、17541 白、17560 白、17564 白、17574 白、17579 白、17585 白、17603 白、17604 白、17605 白、17612 白、17615 白、17616 白、17621 白、17623 白、17638 白。

Ⅱ式：下行而向内。仅见于右肩胛骨上。

如《合》7287 白、8797 白、8995 白、9976 白、17518 白、17526 白、17531 白、17570 白、17581 白、17584 白、17610 白、17633 白、17634 白。

Ⅲ式：单列下行。仅见于右肩胛骨上。

如《合》5647 白、6665 白、7497 白、13522 白、14587 白、17665 白。

本文所收集的材料,均为殷墟一期。主要见下行而向外(AⅠ、BⅠ式),这种现象应与左右肩胛骨为一组,左右对称有关。下行而向内(AⅡ、BⅡ式)较少见,其中AⅡ式只见于左肩胛骨,BⅡ式只见于右肩胛骨,单行下行(AⅢ、BⅢ式)更为少见,其中BⅢ式仅见于右肩胛骨。胡厚宣在《武丁时五种记事刻辞考》^①一文中总结了177例骨白刻辞,得出骨白刻辞的六种行款走向,董作宾在其基础上绘制了四包骨白图。但本文收集的材料未发现胡厚宣的图六和董作宾的八式,可能材料有所遗漏,否则董作宾所绘四包骨白图应是骨白刻辞较为理想的行款走向型式。

二、西 周

目前从先周时期在先周文化范围内出土的考古遗物来看,商代晚期周文化已经受到以殷墟为代表的商文化的影响^②。尤其在长武碾子坡遗址中,文字和符号发现共166例,除9例见于卜骨或骨筭上以外,其余都见于陶器、陶纺轮和陶珠上。陶文和符号皆属阴文,都刻在陶坯子上。它们多以单字存在且重复较多,两个或多个连书的较少见,复合字更少见。按内容大致可分为数字、干支、方位符号、人名、地名、族名、方国名、族徽、图形文字及其他等。由此可见,周人在居邠时期(与殷墟二期文化的年代相当)已经存在文字^③。周原甲骨有些受到殷墟甲骨的影响,而且新出现了卜甲。西周有自己独有的占卜制度,在行款走向方面也有所反映。

自1954年山西洪赵(今洪洞县)坊堆村周代遗址发现有字卜骨以来,到2003年陕西岐山周公庙刻辞卜甲的发现,中国各地陆续已有11处遗址出土带字的周人甲骨。目前发现的西周带字卜骨,主要见于山西洪赵坊堆村、西安张家坡、扶风齐家村、扶风强家村、北

^① 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343—453页。

^② 古代文献也有相关记载，如，《竹书纪年》云：“（商王武乙）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朝，武乙赐地三十里，玉十珌，马八匹。”（《太平御览》卷八十三引《竹书纪年》）。又云：“（商王）文丁杀季历。”（《晋书·束皙传》引《竹书纪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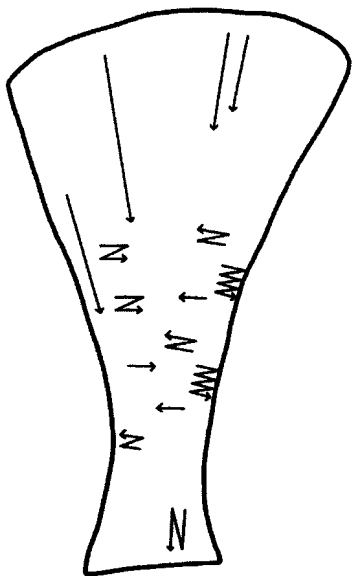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邠州·碾子坡》，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7年，351页。

京房山镇江营、邢台市南小汪诸遗址。

迄今为止,西周的卜骨发现得不太多,从目前的材料看,西周卜骨的行款走向有以下特点:

(一) 正面的刻辞

西周时期卜骨刻辞的行款走向,除商周之际少数仍受殷墟卜骨影响,表现出从殷商向西周过渡的形态外,基本上均按照卜骨的放置,由右向左竖行。以卜骨的放置,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图三十五):



图三十五 西周时期卜骨正面刻辞
行款走向的虚拟图

1. 以骨白向上为正

目前,以骨白向上为正的卜骨,仅见于山西洪洞坊堆村遗址^①出土的卜骨中。刻辞只在卜兆外侧,为长条刻辞,单列下行。此类与殷墟时期“靠近胸侧缘的部位C型”大同小异,应受到殷墟文化的影响。表现出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过渡形态。

2. 以骨白向下为正

周代卜骨的行款走向与殷墟卜骨有巨大不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即骨白向下为正。

(1) 柄部: 下行而向左

骨白以下,反面一般多无钻凿。其刻辞行款自右至左,纵行排列。

如《周原》FQ1(原号79FQNH1:1)、FQ4(原号80FQN采:112),长安张家坡遗址^②的卜骨(标本T4.⑤,五一—六八一)。

(2) 骨中间和扇部

卜骨扇部没有钻凿的地方,骨白朝下为正,自上而下,一般均为单行刻写。两件均为6个数字组成的易卦。

如《周原》FQ3(原号79FQNH1:1)、房山镇江营遗址^③的卜骨(FZT0226⑥:1,右列“六六六七七”,为临卦;左列“七六八六五八”,为蒙卦)。

(3) 靠近两侧缘的部位

自上而下竖行刻写单行刻辞。

① 畅文斋、顾铁符:《山西洪赵县坊堆村出土的卜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7期。

②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张家坡西周遗址的重要发现》,《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3期。

③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镇江营与塔照》,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388页;《北京文博》1997年第4期(只见图)。

臼部朝下为正,自上而下竖行刻写单行刻辞。如《周原》FQ7(原号 81FQ 采:17)。

3. 以骨臼左(或右)向横置为正

(1) 骨中间

卜辞刻于相关卜兆的兆枝一侧,顺着兆枝的走向自右往左横向纵行,且都向内。为了控制兆纹,钻坑底部一般都有凿槽。相对凿槽,灼痕均在里侧,使正面的兆枝朝内。其刻辞行款与典型的西周龟甲行款走向一致,即卜辞刻于相关兆的枝部一侧,顺着兆枝的走向自右往左横向纵行,且都向内。如《周原》FQ5(原号 79 采集 94)、长安张家坡遗址^①的卜骨(标本 T4. ⑤,六八一—五一)、扶风齐家村遗址^②的卜骨(标本 02ZQ II A3H90:79)。

(2) 均靠近两侧缘的部位

反面靠近两侧缘,各有一列竖行圆钻,圆钻内有一道凿槽,均靠近外侧,内侧施灼,故正面的兆枝均向内,两侧兆身与两侧缘之间的竖行长条,即此部位。其刻辞行款亦自右往左横向纵行,但与骨中间兆枝两侧刻辞的朝向刚刚相反,即以卜骨中线为上,两侧缘均自右往左纵行。以右肩胛骨为例,胸侧缘刻辞,骨臼为左,扇部为右;颈侧缘刻辞,骨臼为右,扇部为左。如《周原》FQ5(原号 79 采集 94)^④、邢台南小汪遗址^③的卜骨(H75)。

(二) 反面的刻辞

西周时期卜骨反面的刻辞极少见,仅见于《周原》FQ6(原号 80FQH 采:108),为牛右肩胛骨,仅留扇部一半。刻辞在扇部反面没有钻凿的地方,均为 6 个数字组成的易卦,一列在骨中间,一列靠近颈侧缘。以骨臼朝下为正,单列下行。

(三) 骨 臼 刻 辞

目前为止,殷墟一期时期多见,西周时期尚未见到。

三、小 结

殷商时期完整的卜骨材料较为少见,著录中多为残块。受卜骨的厚度、钻凿灼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卜骨的柄部和靠近胸侧缘部位更容易保留下来。除此以外,柄部和胸侧缘也因刻辞较多而常见于著录中。这为我们研究柄部和胸侧缘部位刻辞的行款走向,提供了大量材料。颈侧缘因刻辞较少,少见于著录中。骨中间及扇部难以保存,即使保存下来也多为小片,无法对其定位。故颈侧缘、骨中间和扇部的材料多用完整的卜骨,及少数可以

①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张家坡西周遗址的重要发现》,《文物参考资料》1956 年第 3 期。

② 曹玮:《周原新出西周甲骨文研究》,《考古与文物》2003 年第 4 期。

③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邢台市文物管理处:《邢台南小汪周代遗址西周遗存的发掘》,《文物春秋》1992 年增刊;王宇信:《邢台南小汪西周甲骨出土的意义》,《史学月刊》1999 年第 1 期。

定位的材料。

另外,殷墟时期的卜骨材料主要见于一期,约占一半以上,二至五期较为少见,或许会对研究卜骨刻辞行款走向的演变规律造成缺环。

通过对卜骨材料的系统梳理,兹分部位对殷墟一至五期卜骨刻辞行款走向的演变规律总结如下:

殷墟一至五期,较为典型的刻辞行款走向主要有:柄部一段或两段刻辞以骨中间为界下行而向外,靠近胸侧缘的多段刻辞均下行而向外,骨中间和扇部多见长条刻辞,单列或复列下行。

殷墟一期:卜骨数量最多。刻辞始见于该期,其行款走向在最初时出现了多种型式,主要行款走向方式已经出现,且普遍使用。其中较为流行的有:柄部多见“下行而向外”;靠近胸侧缘多见“下行而向外”;骨中间主要为两种,“下行而向胸侧缘”,“下行而向颈侧缘”,但其行款走向的方式相同,即迎卜兆;靠近颈侧缘与骨中间刻辞的行款大致相同。

殷墟二期:卜骨刻辞主要见于靠近两侧缘部位。柄部可见下行而向外者,多数只有一侧,但总体来说柄部刻辞较少见;靠近胸侧缘基本下行而向外;靠近颈侧缘下行而向内;骨中间多为下行而向颈侧缘,少为下行而向胸侧缘;扇部多见单列下行。

殷墟三期:柄部刻辞极少见;靠近胸侧缘基本下行而向外,上部多为单列和复列共存,下部多见长条刻辞;骨中间和扇部为下行而向胸侧缘和下行而向颈侧缘两种;靠近颈侧缘多为下行而向内。

殷墟四期:卜骨刻辞主要见于靠近胸侧缘部位。柄部多为下行而背向臼角;靠近胸侧缘和靠近颈侧缘基本为下行而向外;骨中间和扇部多为向胸侧缘,扇部常见字体较大、单列或数列下行的刻辞。

殷墟五期:卜骨极为少见。卜骨刻辞主要分布于靠近胸侧缘的位置,大部分遵守一卜兆,下边刻辞较长,均为“下行而向外”。其余部位刻辞较少。

此外,殷商时期刻辞主要有王卜辞和非王卜辞两大类。非王卜辞是指王以外贵族占卜的卜辞(即学术界所谓“子组卜辞”)。非王卜辞多见于《屯南》和《花东》。从钻凿排列上看,两者的区别主要位于颈侧缘部位,因受钻凿排列的影响,其刻辞行款走向的差别也应表现在颈侧缘部位。但因卜骨颈侧缘部分刻辞较为少见,从刻辞的行款走向上很难找出两者之间的差别。

西周时期的卜骨刻辞,远少于殷商时期。与殷商卜骨相比,其最大的变化在于卜骨放置位置的变化。殷商时期,以骨臼向上为正,而西周时期除了较早阶段以骨臼向上为正作为过渡形态外,最为典型的是以骨臼向下为正和以骨臼左(或右)横置为正。其行款走向,根据卜骨的放置位置,均下行而左,与殷商时期左右对称不同,仅有坊堆村出土的卜骨行款特征与殷墟相似,可能为商周之际的过渡形态。

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西周时期的卜骨刻辞,多数属于西周中期。我们以此推测,西周早期的卜骨应与同时期的卜甲一样,每个部位的行款走向应更加严格、规范、整齐。

第三节 殷商西周卜甲刻辞的行款

商周时期卜甲的行款走向,与卜兆的位置、方向以及反面钻凿排列的规律有密切关系。有的刻辞只围绕一个卜兆布列,有的刻辞围绕几个卜兆布列,有的刻辞甚至围绕龟甲一半布列,左右对贞。也有个别刻辞布列于无卜兆之处,主要在甲桥和甲尾部位,虽无卜兆,但刻辞的位置、方向,一定也有较严格的规律。

一、殷 商

对商代卜甲刻辞行款走向进行专门研究的主要有严一萍、《花东》一书和刘源,有关甲骨著录的书中亦有简单提及者。

严一萍《甲骨学》一书将甲骨的文例分为 90 式,腹甲 31 式,背甲 3 式,在书中仅以图示人。

《花东》^①一书,将 H3 卜甲刻辞的行款走向分为 17 种形式,每个形式下指出常见的龟甲部位,并制成《花园庄东地 H3 龟甲行款形式表》。形式主要包括单列左行(或右行)而下,单列横行,左行(或右行)而下再右行(左行),单列转复列左行或右行,单列直行,左行(或右行)而下再复列右行(或左行),复列左行或右行,单列左行(或右行)而下再左行(右行),下行而左或下行而右,左行(或右行)而下再右行(左行)而下,复列右行再单列右行,单列转复列再单列右行,右行而下再右行而下转左行,右行而下再右行转复列而下,单列转复列右行再单列右行而下,下行而右再下行而右,右行而下再右行而下等。此外还有个别行款比较特殊的。

刘源《试论殷墟花园庄东地卜辞的行款》^②一文,通过联系刻辞与卜兆进行考察,将刻辞行款走向分为基本形、横线形、匚形与反匚形、阶梯形、卜兆内侧纵列形与卜兆外侧纵列形、纵列形等六种主要形式,认为花东刻辞的行款虽较特殊,且富于变化,但实际上却遵循着固定的格式,与刻辞所守卜兆有直接联系,即按照固定的方向围绕相关的某一个或几个卜兆契刻,绝不脱离卜兆单独契刻。

但《花东》刻辞为非王卜辞(子组卜辞),年代较早,大概为殷墟甲骨文一期^③,其行款走向并不能代表殷墟一期至五期的全部内容。故本文以《甲骨文合集》为主,对殷墟一期至五期的刻辞行款走向分型定式,进行重新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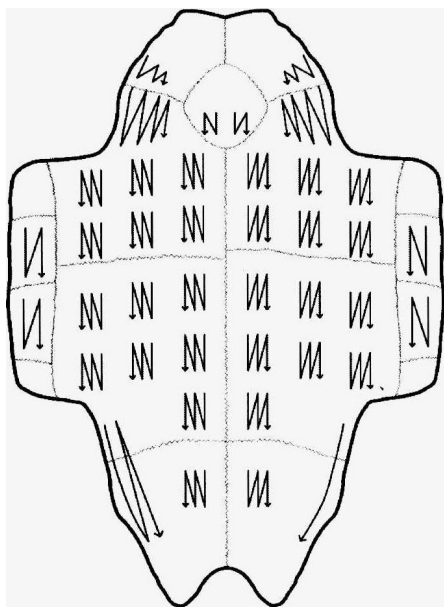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第一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年,22—25 页。

② 刘源:《试论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的行款》,《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 年第 1 期。

③ 报告推断花东甲骨的时代为武丁早期,但目前学者还有不同的看法,如曹定云认为属武丁以前,朱凤瀚认为属武丁早期至中期偏早,陈剑认为属武丁晚期。

商代晚期的刻辞,基本以甲首为上,以千里路为界,左右对贞。时代的变化、龟甲的大小、部位的不同、钻凿的排列等因素,都对龟甲上的刻辞行款走向有所影响。下边分别对甲首、甲腹、甲尾、甲桥等主要部分的刻辞行款走向规律进行归纳。

(一) 腹 甲



图三十六 商代晚期卜甲正面刻辞
行款走向的虚拟图

1. 正面

(1) 甲首

A 型：下行而向外（两侧边缘）。

甲首刻辞的行款走向,以千里路为界,右边为“下行而右”;左边为“下行而左”。刻辞所占面积较小,只施在甲首,基本围绕一个卜兆。该式除殷墟四期外均有,但整体数量较少。四期因卜甲材料较少,不排除存在该式的可能性。多数见于内板,与甲腹 A 型大致相同;少数见于左右舌板,施在舌板的刻辞多见于殷墟五期。

右甲首：如《合》248、478、557（一期）、22691、22818（二期）、29814、30826（三期）、35437、36328（五期）。

左甲首：如《合》248、478、557（一期）、22691、22818（二期）、29814（三期）、《补》12248

（五期）。

此外,殷墟一期有的刻辞字体较大,所占面积较大,施在甲首和上甲腹,如《合》628、6033。

B 型：下行而向内（千里路）。

与 A 型相反,即以千里路为界,右边为“下行而左”;左边为“下行而右”。主要见于左右舌板。

I 式：施在内板。该式较为少见。《补》一书中收录的标本《补》12463 的正反面拓本,反面有 1 个钻凿,凿在钻的内侧（靠近千里路）,与常见的凿在钻的外侧相反,故行款走向也与常见的下行而向外（A 型）相反。从而推测该类行款走向与 A 型同样,即刻辞与兆枝位于卜身同侧,均迎向卜身。

右甲首：如《合》35376、《补》12463（五期）。

左甲首：如《补》10203（三期）、《合》35376（五期）。

II 式：施在左右舌板。多见于殷墟一、三、四期,二期、五期不见。五期因甲首刻辞较少见,可能无该型式。二期因材料太少,不排除存在该形式的可能。

右甲首：如《合》5189、7227（一期）、27376、30475（三期）。

左甲首：如《合》4980、7227（一期）、28948、29786（三期）、34185、34568（四期）。

此外，殷墟一期有的刻辞字体较大，所占面积较大，有三种情况：施在左右舌板和甲腹上段，如《合》32、376、926、14002；施在舌板和内板，如《合》9572；施在右舌板，左行超过千里路，如《合》11484、11497、11498。

C 型：单列下行。

甲首靠近边缘两侧刻辞，单列下行。

I 式：施在左右舌板。仅见于殷墟一、三期，部分刻辞较长，下行至上甲腹。

如《合》816、10655、10656（一期）、29573、31186（三期）。

II 式：施在左右舌板、上甲腹，刻辞下端沿甲首齿缝内转。

如《合》6959、9472、9658（一期）。

III 式：施在左右舌板、上甲腹和上甲桥。上甲桥下行而向外（两侧边缘）。与甲桥 A 型 II 式型式相同。

（2）甲腹

A 型：下行而向外（甲桥）。

左右甲腹最外卜身内侧和千里路之间的刻辞行款走向，基本围绕一个卜兆，以千里路为界，右边为“下行而右”；左边为“下行而左”。刻辞行款走向均迎向卜身，为非常典型的型式。除殷墟四期因卜甲材料较少不见外，其他各期均有，商代晚期刻辞绝大多数属于该型式。

右甲腹：如《合》151、339（一期）、22723、23499（二期）、27146、27459（三期）、35818、35931（五期）。

左甲腹：如《合》151、339（一期）、24501、26593（二期）、27146、27459（三期）、35818、35931（五期）。

此外，殷墟一期有的刻辞字体较大，围绕多个卜兆，所占面积较大，一般位于左右上（或下）甲腹，有的从甲首内扳开始位于上下甲腹和甲桥。如《合》6572、6834、9934、13751。

B 型：下行而向内（千里路）。

I 式：甲腹上段。在左右上甲腹上段，该型式较为典型常见，与甲首 B 型基本相同。按甲首齿缝，下行而向内。刻辞较多时，施在左右甲首和甲腹上段。殷墟一至五期均有，一期最为流行。

右甲腹：如《合》6、5440（一期）、22657、25121（二期）、27146（三期）、33069、33311（四期）、《补》11737（五期）。

左甲腹：如《合》6、5440（一期）、25894（二期）。

II 式：左右甲腹。除在左右上甲腹上段外，甲腹刻辞与 A 型相反，即以千里路为界，右边为“下行而左”；左边为“下行而右”。甲腹部位以 A 型占绝大多数，该型式极为少见。

如《合》21586、21626、21635、21727^①、21804、21805(一期)。

此外,殷墟一期有的刻辞字体较大,围绕多个卜兆,所占面积较大,一般位于左右上(或下)甲腹。该型式极为少见,如《合》14128。

C型:单列下行。

殷墟一期,在个体较小的卜甲上,多见单列下行的长条刻辞,根据刻辞的长短,有的从甲首书写到甲尾,有的只到甲腹。一般以千里路为界,左右对贞。

I式:靠近千里路两侧。如《合》9735、9738、9742、9743、9745、9788。

II式:靠近甲桥两侧。如《合》555、1107、5445、8310、8985、8987、9234、11177、12628、13282、13716、13750、18353。

此外,有单列下行者最后一或两个字,另起一列。靠近千里路两侧的刻辞,位于该列外侧,如《合》6654;靠近甲桥两侧的刻辞,位于该列内侧,如《合》1100、9671。

III式:靠近千里路(I式)和甲桥(II式)均有刻辞。该式极少见,如《合》14138。

IV式:施在上甲腹和上甲桥。左右上甲腹靠近甲桥两侧的刻辞,自上而下竖行刻写单行,与甲桥内侧连接,甲桥部分的刻辞下行而向外(甲桥)。与甲桥A型II式大致相同。

D型:左右下甲腹,长条刻辞。

靠近甲桥两侧最外卜兆的兆身和边缘之间的刻辞,因刻辞长短不同,有的只施在左右下甲腹,有的施至甲尾。一般一列或两列。

I式:单列下行。该型式仅见于殷墟一期。因刻辞长短不同,有的只施在左右下甲腹,有的延伸至甲尾,有的甚至沿甲尾弧行至千里路,个别的施在左右甲桥和下甲腹。

Ia式:只施在左右下甲腹。如《合》585、13757。

Ib式:施在左右下甲腹下段和甲尾。如《合》13646、13696。

Ic式:沿甲尾弧行至千里路。如《合》9741、10514。

Id式:施在左右甲桥和甲腹下段。如《合》12311。

Ie式:单列下行而向内。施在左右下甲腹下段,自上而下竖行,因刻辞较长,或在甲腹与甲尾交界处的齿缝下行而向内,如《合》9520、9524;或在甲尾下行而向内(千里路),如《合》32、116、6032。

II式:两列下行而向内。最外卜兆的兆身和边缘之间的刻辞,两列下行。见于一、二、四期。如《合》201、9507、13688(一期)、22539、22723、25296(二期)、33309(四期)。

(3) 甲尾

A型:下行而向外(两侧边缘)。

只施在甲尾,一般围绕一个卜兆。刻辞的行款走向,以千里路为界,右边为“下行而右”;左边为“下行而左”,均迎向卜身,与甲腹大致相同。除殷墟四期因卜甲材料较少不

^① 《合》21727(《丙》612)卜甲刻辞的行款走向较为特殊,左腹甲与殷墟时期典型的行款相同,均为下行而向外,但右甲腹的均为下行而向内(千里路),尤其靠近千里路的3条刻辞,与殷墟时期典型的行款相反。

见外,其他各期均有,商代晚期刻辞中普遍使用。

右甲尾:如《合》136、557(一期)、22556、22723(二期)、27146、28011(三期)、35409、35661(五期)。

左甲尾:如《合》136、557(一期)、22561、24138(二期)、27146、28011(三期)、35416、37487(五期)。

此外,殷墟一期有的刻辞字体较大,围绕多个卜兆,所占面积较大,施在甲尾或左右下甲腹下段和甲尾。如《合》7075、8947、11499(一期)。

B型:下行而向内(千里路)。

与A型相反,即以千里路为界,右边为“下行而左”;左边为“下行而右”。殷墟一期常见。

右甲尾:如《合》776、6834(一期)、28550、28551(三期)。

左甲尾:如《合》776、1044(一期)、22644(二期)。

此外,殷墟一期有的刻辞字体较大,围绕多个卜兆,所占面积较大,施在左右甲腹下段和甲尾,如《合》9177。

C型:单列下行。

I式:靠近千里路两侧。因刻辞长短不同,或只施在左右甲尾,或施在左右下甲腹下段和甲尾。殷墟一、三、四期可见,但数量较少。

右甲尾:如《合》117(一期)、28702(三期)、33309(四期)。

左甲尾:如《合》117(一期)、28702、29683(三期)。

II式:靠近边缘两侧。因刻辞长短不同,或只施在左右甲尾,或施在左右下甲腹下段和甲尾(与甲腹D型II式大致相同)。

右甲尾:如《合》151、249(一期)、29821(三期)。

左甲尾:如《合》151、249(一期)、27958、29683(三期)。

(4) 甲桥

A型:下行而向外(两侧边缘)。

在甲腹最外侧卜身外侧的刻辞,因受反面钻凿排列的影响,有的只在甲腹最外侧(最外兆身和甲桥内侧之间)刻辞,有的与甲桥连接刻辞,本文为行文方便,该类刻辞的行款走向,归入甲桥内侧部分描述。该部位刻辞行款走向,虽与位于千里路同侧的甲腹内的刻辞行款走向相同,但两者性质完全不同,前者刻辞与兆枝位于卜身同侧,行款走向迎向兆身,后者刻辞位于卜身外侧,与兆枝异侧,行款走向背离兆身。其行款走向为下行而向外,即右甲桥为“下行而右”;左甲桥为“下行而左”。

I式:只施在甲桥。

Ia式:甲桥内侧。殷墟一至五期均有,为该部位比较典型的行款走向。

右甲桥:如《合》32、5637(一期)、22723、《补》6963(二期)、27146、27459(三期)、33069(四期)。

左甲桥：如《合》32、5637（一期）、《补》6963（二期）、27146、27459（三期）、33069（四期）、《补》12781（五期）。

I b 式：甲桥外侧。仅在殷墟一期和三期偶见，数量极少。

右甲桥：如《合》27705（三期）。左甲桥：如《合》376（一期）。

此外，殷墟一期个别刻辞，因字体较大，字数较多，从内侧向外侧刻于整个甲桥之上。如《合》5439（一期）。

II 式：施在左右舌板上甲腹和上甲桥，上甲桥下行而向外（两侧边缘）。仅见于殷墟一期。如《合》267、2940、7942、9950、10137、12396、12898（一期）。

此外，殷墟一期有的刻辞从内板开始，下行而向外，与甲桥连接。如《合》12324。

B 型：下行而向内（千里路）。

与 A 型相反，右甲桥为“下行而左”；左甲桥为“下行而右”。多见于甲桥外侧。有的甲桥内、外侧均无钻凿，其行款走向亦常见该型。

如《合》6、6946、6946、7773、11423（一期）、28011（三期）。

此外，殷墟一期个别刻辞，因字体较大，字数较多，从外侧向内侧刻于整个甲桥之上。如《合》6656、14200。

C 型：单列下行。

甲桥部分刻辞，多位于兆身外侧，以单列下行最为常见。

I 式：甲桥内侧。如《合》6648、9200（一期）。

II 式：甲桥外侧。如《合》376、1076（一期）。

2. 反面

腹甲反面的刻辞，以腹甲正面为准，反面左腹甲为正面右腹甲，反面右腹甲为正面左腹甲。因材料很少，刻辞的字数也较少，行款走向与正面刻辞大致相同，本文仅对所见到的材料做简单描述。

（1）甲首

仅见下行而向外（两侧边缘），施在甲首。如《合》767 反（一期）。

（2）甲腹

A 型：下行而向外（甲桥）。

如《合》775 反、10344 反、10133 反（一期）。

B 型：单列竖行。

I 式：靠近千里路。如《合》10133 反、10344 反（一期）。

II 式：靠近甲桥两侧。如《合》904 反、5440 反。

III 式：腹甲的钻凿排列之中。如《合》10133 反、10133 反（一期）。

（3）甲尾

仅见单列竖行。

I 式：靠近千里路。如《合》775 反、5611 反（一期）。

II 式：靠近甲桥。如《合》587（一期）。

（4）甲桥

A 型：下行而向外。

左腹甲：如《合》766 反、6771 反（一期）。

右腹甲：如《合》418 反、721 反（一期）。

B 型：下行而向内（千里路）。如《合》809 反（一期）。

C 型：单列竖行，多见于甲桥内侧。

如《合》6834 反、9013 反、10133 反（一期）。

（二）背 甲

殷商刻辞主要位于腹甲上，背甲材料较为少见，其行款走向应与同时期的腹甲刻辞大致相同，本文仅对所见到的材料做简单描述。

1. 正面

殷商西周时期背甲，一般以脊甲（或脊版）的中间为界，切成两半。两版背甲，左右对贞。左右背甲以颈甲（或颈版）朝上为正，刻辞行款走向有以下几种：

A 型：下行而向外（边甲）。

右背甲为“下行而右”；左背甲为“下行而左”。该型是殷墟时期较为典型的背甲行款走向，多围绕一个卜兆。除四期因材料较少不见外，其他各期均有。

右背甲：如《合》1106、10389（一期）、《补》9563（二期）、29084、31548（三期）、35767、《补》11711（五期）。

左背甲：如《合》8473、8780（一期）、35686、《补》11756（五期）。

此外，殷墟一期，有些刻辞因字体较大，字数较多，围绕多个卜兆排列，占面积较大。如《合》8492、8591。

B 型：下行而向内（脊甲）。

与 A 型相反，仅见于个别卜甲，或与钻凿排列有关。右背甲为“下行而左”；左背甲为“下行而右”。如《合》1823。

C 型：单列下行。

主要见于背甲的脊甲和边甲上，其他部位少见。脊甲上的刻辞，如《合》13625、14129（一期）、《补》9096（三期）；边甲上的刻辞，如《合》10948；肋甲上的刻辞，如《合》118（一期，鞋底形）。

D 型：逆时针排列的刻辞。

较为特殊，主要见于边甲上。逆时针弧形排列，或单列，或复列，复列逆行而向内。如《补》9563（《新缀》066）。

2. 反面

背甲反面刻辞材料极为少见,仅见单列下行者。

右背甲:如《合》12466 反(一期)。

左背甲:如《合》7959 反(一期)。

二、西 周

带字的周人卜甲,除极少数发现于北京昌平、琉璃河和殷墟等地外,绝大部分在陕西岐山(凤雏、周公庙遗址)和扶风地区出土。

周人甲骨的行款、断代等问题之所以歧见纷纭,关键原因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研究者未能对碎小的周人甲骨进行定位研究。正确的定位,对于区分商周甲骨以及周人甲骨刻辞的行款、断代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周原甲骨的刻辞行款,王宇信曾据临摹本进行过分析^①,认为基本可分为四种类型:(1)自左始下行再右转下行;(2)自右起下行再向左转下行;(3)自上而下的一竖行;(4)有的刻辞行款极不规整。在当时,由于照片模糊不清、公布的摹本又存在相互抵牾之处,这些都给学者的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2002年曹玮的《周原甲骨文》一书面世,该书重新对周原甲骨正面刻辞进行了照相,并附有主要甲骨反面的钻凿照片。这对说明周原甲骨的特点,研究甲骨的定位与行款走向都有重要意义。

本文拟依据《周原甲骨文》与已经公布的其他遗址的材料,先从卜甲正反两面的特征作定位研究,然后分析刻辞行款走向的规律,并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安阳殷墟发现的“易卦”卜甲^②、陕西扶风齐家^③和河南洛阳^④等地出土的较完整无字卜甲,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西周甲骨的特点。以下将依据龟甲的千里路、盾纹、齿缝等自然纹路,将卜甲分甲首、甲腹、甲尾、甲桥等几个部位,分别考察各部分刻辞的行款走向。

(一) 腹 甲

周代卜甲刻辞的行款走向与卜甲的放置方向密切相关。除甲尾、甲桥部位的刻辞行款走向多以甲首向上为正外,腹甲刻辞行款走向基本以甲首向左(或右)为正,以甲首向下为正的亦有,但较为少见(图三十七)。

^① 王宇信:《周原甲骨刻辞行款的初步分析》,《人文杂志》1988年第3期;王宇信:《周原甲骨卜辞行款的再认识和邢台西周卜辞的行款走向》,《华夏考古》1995年第2期。

^② 肖楠:《安阳殷墟发现“易卦”卜甲》,《考古》1989年第7期。

^③ 陕西西周原考古队:《扶风县齐家村西周甲骨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9期;罗西章、王均显:《周原扶风地区出土西周甲骨的初步认识》,《文物》1987年第2期。

^④ 赵振华:《洛阳西周卜用甲骨的初步考察》,《考古》1985年第4期。

1. 正面

(1) 以甲首向上为正

1) 甲首

靠近千里路,单列下行,仅见于内板。如《周原》H11:15的“今二月往口”。

2) 甲腹

甲腹刻辞行款走向以甲首向上为正者,仅见于先周时期的卜甲中(图三十八),西周时期不见。

A型:单列下行。

右甲腹:如《周原》H11:237。

左甲腹:如《周原》134、141、168+2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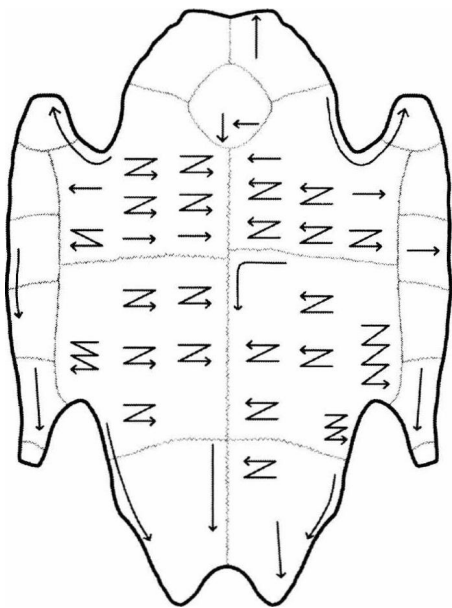
B型:复列下行。

以千里路为界,下行而向外,右甲腹下行而右,左甲腹下行而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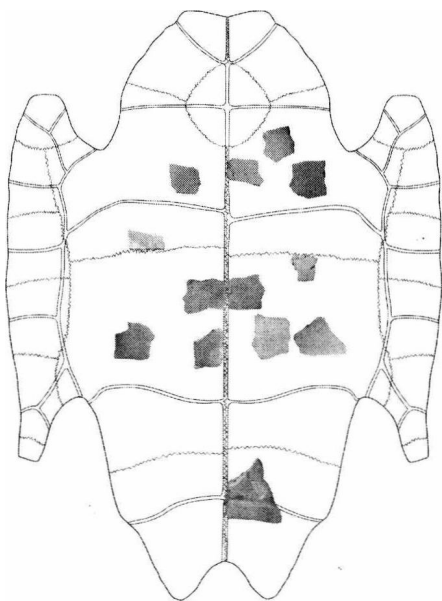
右甲腹:如《周原》H11:1、82、84、92、112、

130、1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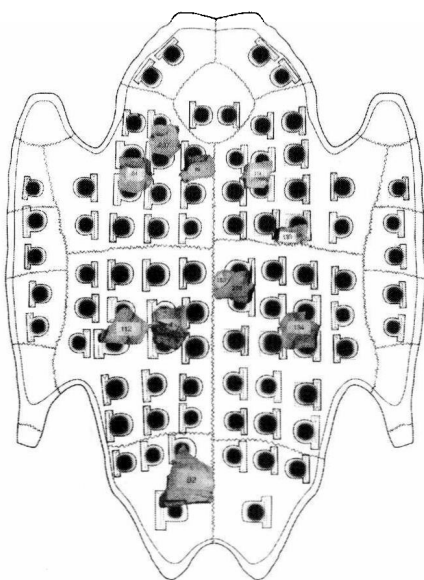
左甲腹:如《周原》114、189。



图三十七 西周时期卜甲正面刻辞行款走向的虚拟图



正面



反面

图三十八 先周时期腹甲刻辞定位图

这几片卜甲曾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原因是:(1)有在商王宗庙祭献的刻辞,

其行款自左而右,有别于一般周原甲骨行款之自右而左;(2)卜甲呈圆钻方凿形,与一般周原卜甲之方钻方凿形态接近,而有别于殷墟出土甲骨之呈枣核形凿槽;(3)刻辞字体为微雕米粒状,亦同于一般周原甲骨,与殷墟甲骨有别^①。对这几片周原刻辞的族属问题,亦众说纷纭^②。

《诗·大雅·绵》:“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周原膴膴,稇荼如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是描述古公亶父卜居岐,说明当时周人已有占卜。古公亶父以后,季历、文王时期周人与商朝的联系相当密切,周文化受商文化的强大影响是完全可能的^③。

上述刻辞行款跟殷墟商代刻辞类似,以甲首向上为正,以千里路为界,右甲腹下行而右(如《周原》H11:1、82、84、112、130、174),左甲腹下行而左(如《周原》H11:113、114、189)。先周的卜法显然受到商人卜法之影响,似乎也应该有正反对贞^④。另外,从辞例来看也能证明这一结论。例如《周原》H11:114有“弼已其𠄎,由正”,“弼”字为否定词,表明在残缺的同版刻辞中应当还有正问的内容。

总而言之,整治方法、钻凿形态、字体风格等方面都有别于殷代而近于西周。但又不完全等同于西周,呈现出从殷商卜甲到西周卜甲的过渡形态。

3) 甲尾

基本均单列下行,按刻辞所在部位分为三型。

A型:位于下甲腹下段与甲尾靠近千里路一侧。

如《周原》52、96、122、133。

B型:位于下甲腹下段和甲尾两侧最外卜兆的兆身外侧和边缘之间。

如《周原》H11:59、75+126、102。

C型:左右下甲尾正面,一般反面没有钻凿。如《周原》H11:42。

4) 甲桥

基本均单列下行,按刻辞所在部位分为三型。

A型:位于上甲桥与甲腹连接的夹角处刻辞。

刻写顺序是从上甲腹上段开始,沿甲桥与甲腹夹角的边缘,至甲桥上端,因此右甲桥的刻辞是下行而右转,而左甲桥刻辞是下行而左转。

右甲桥:如《周原》H11:36、65、232。

左甲桥:如《周原》H11:5、58。

① 田昌五:《周原出土甲骨中反映的商周关系》,《文物》1989年第10期。

② 对卜辞的族属形成了三种意见,即周人说、商人说、商人所卜周人所记说(参见杨莉:《凤雏H11之1、82、84、112四版卜辞通释与周原卜辞的族属问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4年5月)。

③ 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74页。

④ 李学勤等学者曾笼统地认为周人甲骨不存在正反对贞现象(参见李学勤:《西周甲骨的几点研究》,《文物》1981年第9期),但笔者依据材料分析认为,在殷墟文化影响下,先周时期的周人甲骨刻辞是存在正反对贞现象的。而西周时期多为记事刻辞,所以这种现象在典型的西周甲骨刻辞中则消失了。

B 型：甲桥下端。

目前发现这类刻辞仅有二种辞例，即“自某某”和“干支啄”。

右下甲桥：如《周原》H11：108、131、135、159、172、188。

左下甲桥：如《周原》H11：128、187。

C 型：甲桥外侧。

甲桥外侧反面一般多无钻凿，部分有钻凿者，刻辞位于正面兆身外侧，单列下行。如《周原》H11：51 + 107、68、71、97、125、232。

(2) 以甲首向下为正

若以甲首向上为正，则刻辞书写为倒刻，数量较少，见于甲首、甲尾和甲桥等部位，多为地名，与一般典型刻辞不同。

1) 甲首

如《周原》H11：101，刻“新邑”二字，位于右舌板。

2) 甲尾

如周公庙遗址的腹甲(04QZT-23, G-2:0242)刻“新邑”二字。

3) 甲桥

如《周原》H11：26，刻写“既吉”二字。此刻辞属于兆辞，与一般刻辞内容不同，可能在当时有固定刻写方式。

(3) 以甲首向左(或右)横置为正。

西周时期腹甲刻辞基本上均由甲桥方向下行至千里路方向，复列者均下行而左，刻辞均守兆。甲桥部位有个别刻辞与之相反。

1) 甲首

仅见两例，均位于内板，一为官名，一为地名。如《周原》H11：15 的“大保”、房山琉璃河燕都遗址^①的腹甲(标本 H108①：4)的“成周”两字。

2) 甲腹

以千里路为中轴，右甲腹的刻辞刻写顺序当以右甲缘为上，下行而左；左甲腹的刻辞刻写顺序当以左甲缘为上，依然下行而左。凡在甲腹的刻辞，一行以上者，均从此例。

A 型：单列下行。

如《周原》H11：6、10、12、16、22、23、24、25、38、40、45、50、64、72、76、94、99、100、115、116 + 175、123、132、167、177、278，H31：1，FQ2(齐家 H3：1)；昌平白浮木椁墓^②的腹甲(M2：贞、不止)，房山琉璃河燕都遗址的腹甲(标本 H108③：5)。

^① 琉璃河考古队：《琉璃河遗址 1996 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97 年第 6 期；《北京琉璃河遗址发掘又获重大收获》，《中国文物报》1997 年 1 月 12 日。

^② 北京市文管处：《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考古》1976 年第 4 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燕山出版社，1990 年，49 页。

B 型：复列下行。

如《周原》H11:2、4、14、20、21、28、30、32、48、60、69、80、83、85、113、117、136、170、210, H31:2、3、4、5; 房山琉璃河燕都遗址的腹甲(标本 H108①:5)。

C 型：下行朝向千里路再转而向右。

刻辞刻写靠近千里路,一行写不下,为不使刻辞干犯千里路,则顺着千里路向甲尾方向顺序向下。其识读顺序为:右甲腹,以右甲桥为上,自上下行,至千里路右转 90 度右行;左甲腹,以左甲桥为上,自上下行,至千里路左传 90 度左行,但目前未见该例。

右甲腹:如《周原》H11:8、11、55、129。

D 型:在左右下甲腹下段边缘跟下甲桥连接处,行款走向比较特殊,即甲腹两侧边缘兆身的外侧和边缘之间,其刻辞行款下行而左,恰与典型甲腹的刻辞相反,是背向千里路的。

如《周原》H11:29、35。

3) 甲尾

与甲腹相同,以千里路为中轴,右甲尾的刻辞刻写顺序当以右甲缘为上,下行而左;左甲尾的刻辞刻写顺序当以左甲缘为上,依然下行而左。

右甲尾:如《周原》H11:9、41,房山琉璃河燕都遗址的腹甲(标本 H108③:10)。

左甲尾:如《周原》H11:3、13、47。

4) 甲桥

A 型：朝向千里路。

甲桥外侧有的反面无钻凿,刻辞行款朝向千里路,即以甲桥边缘为上,下行而左。如《周原》H11:39。

B 型：背向千里路。

与甲腹刻辞相反,刻辞行款背向千里路,即以甲桥边缘为下,下行而左。

I 式：甲桥内侧。右甲桥内侧的刻辞,以该甲桥边缘为下,刻辞下行而左;左甲桥内侧的刻辞,亦以该甲桥边缘为下,刻辞下行而左。

如《周原》H11:5、37,安阳殷墟遗址发现的“易卦”腹甲①。

II 式：甲桥外侧。甲桥外侧有的反面没有钻凿,刻辞行款背向千里路,即以甲桥边缘为下,单列下行。

如《周原》H11:17、18、31、51 + 107(丰)、124。

2. 反面

西周时期反面的刻辞极少见,多数仅有一两个字。

A 型：以甲首向上为正,单列下行,在左右下甲尾反面没有钻凿部分,刻写“干支豚”三字,与甲桥尾端刻辞相似。如《周原》H11:73 背、127 背。

① 肖楠:《安阳殷墟发现“易卦”卜甲》,《考古》1989 年第 1 期。

B 型：以甲首向上为正，单列下行，位于甲桥内侧反面没有钻凿部分。如《周原》H11：37。

C 型：以甲首向左（或右）横置为正，背向千里路下行，与甲腹正面相反。刻辞或位于甲腹钻凿之间，如《周原》H11：74（庶）；或位于甲桥外侧反面没有钻凿部分，如《周原》H11：31（周）。

综合上述，可知周人刻辞中有这样一种现象，即作为单独的地名、人名、职官、兆辞等内容，在龟甲的各个部位有着相对固定的位置和刻写款式。例如在甲桥下端仅刻写“自某某”字样，甲尾仅刻写“新邑”或“周”等地名。在甲首往往刻写“大保”等职官名。这些刻辞的刻写部位、款式与一般刻辞性质都不同，但较为固定，似与殷墟甲骨的记事刻辞近似。

（二）背 甲

目前有字的背甲仅见于周公庙遗址^①出土的 2 件背甲，应为同一件。刻辞均位于背甲正面，刻辞较长，字体较粗。其年代应为商周之际（武王时期）。

刻辞行款走向依其位置有以下几种（图三十，2）：

A 型：以颈甲（或颈版）朝左，边甲向上为正，单列下行。

跟脊甲中轴线垂直，与腹甲行款走向大同小异。如标本 03C10④：1。

B 型：以尻甲朝下为正，单列下行。

上边已残，无法了解其上部的走向。如标本 03C10④：1。

C 型：以颈甲（或颈版）朝下为正，单列下行。

主要在边甲上。如标本 03C10④：2，其中一条刻辞位于右边甲盾纹外侧，单列下行至第一右边甲（E12）盾纹时，沿盾纹方向左转，刻辞不过盾纹。刻辞上部残缺不明。

D 型：以颈甲朝右为正，单列下行至边甲部分后，右转 90 度按边甲弧度走向颈甲。

如标本 03C10④：2，有两条刻辞位于第 1—4（E12—15）右边甲上，即右边版与肋甲齿缝之间的部位。刻辞上部残缺，推测其应是从第 2 右肋甲（D10）开始刻辞，单列下行至边甲部分，右转 90 度按边甲弧度走向颈甲。

三、小 结

卜甲刻辞的行款走向深受反面钻凿灼排列的影响和制约，本文在第三章将龟甲分为甲首、甲腹、甲尾、甲桥等部分，来分析各部分在整治和钻凿灼方面的特征，从而看出不同部位的钻凿灼形态有各自的特征，而这些特征使甲骨正面刻辞行款走向在不同部位也表现出各自的特征。因此本章也按照甲首、甲腹、甲尾、甲桥等部分来分析卜甲刻辞的行款

^① 周原考古队：《2003 年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调查报告》，《古代文明》（第 5 卷），文物出版社，2006 年，151—186 页，图 21—27，彩版 4—16。

走向。著录中的卜甲多为残缺小块,但卜甲的甲首、甲尾和甲桥特征较为明显,比较容易定位,而甲腹的碎片可根据千里路、齿缝、盾纹、边缘等特征定位。本文根据上述方法,先对卜甲定位,然后根据其部位研究刻辞的行款走向。

刻辞在卜甲上的布局,应该有较固定的位置,不同部位的行款走向也有各自的规律。商代晚期(殷墟一期至五期)刻辞多数在甲腹,基本为下行而外,刻辞与兆枝位于兆身的同侧,迎向兆身。甲腹最外的卜兆兆身外侧和甲桥内侧基本为下行而向外;左右上甲腹上段多为下行而内;左右下甲腹,多为长条刻辞。甲首的内板多数见于下行而向外,左右舌板多为下行而向内和单列下行。甲尾靠近千里路多为下行而向外,靠近边缘多为下行而向内和单列下行。甲桥内侧多为下行而向外,外侧多为下行而向内,也多见单列下行。

下面分别对各时期卜甲刻辞的行款走向规律进行总结。

殷墟一期:卜甲数量最多。行款走向变化较多,主要行款走向方式均已出现,且普遍使用。甲首主要为下行而向外、下行而向内、单列下行三种;甲腹除甲腹上段下行而向内,基本为下行而向外;甲尾主要有下行而向外、下行而向内、单列下行三种;甲腹最外的兆身外侧和甲桥内侧基本为下行而向外,甲桥外侧多见下行而向内。

殷墟二期:较常见的刻辞行款走向有:甲首下行而向外;甲腹除甲腹上段下行而向内,基本为下行而向外;甲尾主要有下行而向外、下行而向内、单列下行三种;甲腹最外的兆身外侧和甲桥内侧基本为下行而向外。

殷墟三期:卜甲较少。卜甲刻辞主要分布于靠近千里路两侧和最外卜兆兆身外侧,基本下行而向外。甲首除左右舌板下行而向内或单列下行外,主要为下行而向外;甲腹除甲腹上段下行而向内,基本为下行而向外;甲尾主要有下行而向外、下行而向内、单列下行三种;甲腹最外的兆身外侧和甲桥内侧基本为下行而向外,甲桥外侧也有下行而向内者。

殷墟四期:卜甲极少见。因数量太少,不见许多型式。甲首为下行而向内;甲腹除甲腹上段下行而向内,基本为下行而向外;甲尾为单列下行;甲腹最外的兆身外侧和甲桥内侧基本为下行而向外。

殷墟五期:卜甲较多,字体较小。多数较残碎,完整龟甲少见。从较完整的卜甲看,刻辞多数在甲腹,均下行而向外,其他行款方式极少见。甲首刻辞较少见,施在舌板的刻辞多见下行而向内,内板为下行而向外;甲腹除甲腹上段下行而向内,基本为下行而向外;甲尾下行而向外;甲腹最外的兆身外侧和甲桥内侧基本为下行而向外。

殷墟甲骨文一期偏早阶段,整治方式、钻凿灼形态仍可见到中商时期的特征,行款走向也多受此影响,种类较多,如《花东》一书中卜甲刻辞的行款走向较为特殊,报告分为17种。因报告和刘源等已有较详细的研究,本文对殷墟一期偏早阶段的刻辞行款走向不作讨论。现将殷墟一期较为常见,但不见于以后各期的几种刻辞现象总结如下。

1. 有的刻辞字体较大,所占面积较多。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 字数较多,多下行而向外,或布满甲首和甲腹上段,或布满上甲腹、下甲腹,或布满

甲腹下段和甲尾。如《合》628、6830、8947、11499。

2) 在个体较小龟甲上,常见从甲首至甲尾单列下行的长条刻辞,如《合》1107、4259;个体较大的龟甲上,常见者单行或多行横向排列的长条刻辞,如《合》734、5611、11506、14128。

3) 有些单列下行的长条刻辞,下端沿甲首或甲尾齿缝方向下行而向内,如《合》6959、9520、9521、9671、12324、14209、14210。

2. 同板刻辞,字体不同。在同板腹甲上出现部分刻辞字体较小,部分刻辞字体较大的现象。如《合》226、655、903、6834、10302、11497、13712。

西周时期的卜甲刻辞,远少于殷商时期。主要发现于凤雏建筑遗址,均为西周早期,且多为记事刻辞。刻辞卜甲多为残碎小块,完整卜甲极少,需先正确定位才能进行行款走向的研究。与殷商卜甲相比,其最大的变化在于卜甲放置位置的变化。先周时期的卜甲与殷商时期相同,以甲首向上为正,刻辞行款走向以千里路为界,下行而向外。西周早期时,已经出现西周时期较为典型的卜甲特征。西周时期卜甲的行款走向,甲腹刻辞以甲首向左(或右)横向放置为正,一律下行而左,均守兆;甲尾和甲桥多以甲首向上为正,单条刻辞多见,单列下行。

商代晚期,在动物头骨、肋骨等上的记事刻辞,以及青铜器玉器上的文字,其行款走向均下行而左。董作宾在《殷代文例分“常例”“特例”二种说》中有过相关论述,认为除甲骨刻辞外,其他文字材料“下行而左”的行款走向应是常例^①。《合》21727 卜甲刻辞的行款走向较为特殊,整板刻辞均为下行而向外,但仅见于殷墟一期,数量极少。西周时期的甲骨均下行而左,青铜器及其他器物上的文字的行款走向也基本上下行而左。可见西周时期“下行而左”的行款走向,应是文字书写的常例。

第四节 甲骨刻辞相关问题讨论

一、整版刻辞布局

(一) 殷 商

1. 殷墟时期典型特征

(1) 卜骨

卜骨上的刻辞左右对贞的现象较为少见^②,可能与卜骨的占卜方式有关。刻辞的布

^① 董作宾:《殷代文例分“常例”“特例”二种说》,《中国文字》第6册,1962年1月;又收入《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编第五册,艺文印书馆,1977年,77—87页。

^② 严一萍:《甲骨学》,艺文印书馆,1977年,977页。

局一般分在柄部、扇部、靠近两侧缘。靠近胸侧缘的刻辞较多,几段刻辞的布局一般自下而上,而每段刻辞的行款走向,左右肩胛骨上均下行而向外。

同时期的卜甲上,钻凿灼的排列以千里路为界,左右对称,正面刻辞基本也以千里路为界,左右对贞。商代晚期卜骨的整治方式,以“左右两件肩胛骨对称,同板肩胛骨钻凿灼的排列朝向臼角”最为典型。根据龟甲的现象推测其刻辞也应该是左右两件肩胛骨对贞排列^①。

(2) 卜甲

商代晚期刻辞的布局,以千里路为界,基本左右对贞,与钻凿灼的排列大致相同。学者们通常说商代晚期的甲骨“迎卜兆”,西周时期的甲骨“守卜兆”。单条刻辞布局因受龟甲大小和具体所要占卜事情内容的影响,占卜所用钻凿数目的多少不同。钻凿数目的多少,又会影响到单条刻辞所占骨板面积的大小以及其行款走向。

商代晚期刻辞很多,内容繁多,形式也复杂。刻辞的行款走向、布局较丰富。下边主要以甲腹的刻辞为主,简单描述单条刻辞的几种布局:

1) 一版腹甲,从刻辞行款走向看,以千里路为界,分为左右两块。每一块一般自而上而下单列竖行。有靠近千里路和靠近甲桥两大类,主要见于较小的龟甲。仅见于殷墟一期,与甲腹C型(单列下行)相同。靠近千里路两侧,如《合》9738、9743、9788;靠近甲桥两侧,如《合》5445、8985、11177、12628。

2) 一版腹甲,从刻辞行款走向看,以千里路和齿缝为界,分为上下左右四块。每一块一般下行而向外(两侧边缘),仅见于殷墟一期。如《合》628、12324。

3) 一段刻辞围绕一行或一列的几个卜兆。左右腹甲各有一段刻辞,刻辞围绕着一行卜兆,卜兆旁有序数(一、二、三、四)。如《合》734、808、816(一期)。

4) 一条刻辞围绕一个卜兆。如6016(一期)、2670(二期)、27146、27459(三期)、37487、38861(五期)。

2. 沿用中商时期特征

(1) 卜骨

殷墟甲骨文一期偏早或非王卜辞的卜骨,仍然沿用商代中期典型特征的钻凿灼排列。即“同板骨面以骨面中轴线为界,钻或灼点位于凿的内侧,左右对称”。正面刻辞应受到该钻凿灼排列的影响,靠近胸侧缘和靠近颈侧缘的刻辞可能是左右对贞。殷墟一期因靠近颈侧缘部位刻辞较少见,该现象不明显。在有些卜骨上,可以见到该现象,四期较为常见。如《合》32001、32050。

(2) 卜甲

殷墟甲骨文一期偏早,卜甲反面的钻凿灼形态,如安阳苗圃北地遗址^②的卜甲(标本

① 但目前著录中卜骨残片较多,即使完整的卜骨,也很少有人将刻辞相关的左右肩胛骨放置在一起研究。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202页,图版四四~7。

PNIVH5:2,为腹甲),仍然沿用商代中期典型特征的排列。李达良的《龟板文例研究》一书中^①,第十式、十一式^②刻辞排列忽上忽下,先后顺序极乱,如第十式图解(《丙》图38),第6、7、8刻辞在右甲腹,第9、10、11刻辞在左甲腹,余1—5、12—21刻辞均以千里路为界左右对称;第十一式图解(《丙》图90),第1、2、3刻辞在左尾甲,第4、5、6、7在右腹甲和尾甲。剩下的第8到19的刻辞,按千里路对贞。这说明最早的刻辞可能受中商卜甲的钻凿排列影响,以千里路为界两侧分别占卜。这两个卜甲应是过渡形态。

(二) 西 周

西周时期的刻辞较少见,主要是记事刻辞,一般守一个卜兆。

西周时期刻辞基本一条刻辞围绕一个卜兆,刻辞刻于相关卜兆的兆枝一侧,顺着兆枝的走向,即朝着腹甲的中线“千里路”横向纵行。字数较少,一般10个以下,个别较长的刻辞也不到20个。西周时期的刻辞排列与殷墟时期的刻辞有较大的区别:殷墟刻辞均以甲首向上为正,迎卜兆;西周刻辞则以甲首左(或右)向横置为正,以千里路为下,腹甲左右两侧的刻辞均自右往左纵行。以右腹甲为例,甲首为左,甲尾为右,刻辞自右往左纵行;以左腹甲为例,甲首为右,甲尾为左,刻辞自右往左纵行,均跟千里路垂直。

西周时期这种刻辞的横向布置方式,很可能与文献中的“示高”有关。《周礼》和《仪礼》中都有关于“示高”的记载。

《周礼·太卜》:“凡国大贞,卜立君,卜大封,则氏高作龟。”《仪礼·士丧礼》:“卜日既朝哭。……宗人受卜人龟示高。”郑玄注:“视高,以龟骨高者可灼处示宗伯也。”又“骨近足者其部高”,又“春灼后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后右”。

“视高,以龟骨高者可灼处示宗伯也”者,以郑言示宗伯,则“示”字不得为“视”,但古字通用,以目视物,以物示人,同为视也。

云“卜用龟之腹骨,骨近足者其部高”者,言龟近四足其下腹,骨部然而高,高处灼之也。

云“春灼后左”已下,并取义于《礼记·中庸》,故彼云“国家将兴亡,见于蓍龟,动于四体”。郑注:“四体,龟之四足。”亦云:“春占后左,夏占前左,秋占前右,冬占后右。”彼云占,此云灼,即灼而占之,亦一也。

二、西周时期的卜辞记录方式

《尚书·金縢》记载:“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周公为武王占卜,“史乃册祝曰:‘……今我即命于元龟……’”,占卜内容记录在“册”上,“乃卜三龟,一习吉,启籥见书,乃

^① 李达良:《龟板文例研究》,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中文系,1972年,27—30页(《甲骨文献集成》第十七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231页)。

^② 李达良一书中属于第十式的有《丙》图38、76、286,属于第十一式的有《丙》图1、88、90、288、312。

并是吉”，占卜结束后，“公归，乃纳册于金滕之匱中”。后成王即位，周公居东二年：“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与大夫尽弁以启金滕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由此可知，当时占卜的内容应记录于“册”，而非如商代晚期那样刻写于甲骨之上。这与目前考古发现的西周时期甲骨上刻辞较少，且多为记事刻辞一致。另外，战国时期楚简上可见卜筮的相关内容，如《包山》226、235、236，《天》15-01、02，《新》甲一12、甲三229、乙四122等。

三、关于刻辞有关问题的讨论

（一）刻字过程中明显错误的例子

商周时期的甲骨刻辞，刻写失误的情况时有发生。包括倒刻、补刻、重复刻、改刻、错刻、缺刻等^①。

1. 倒刻：殷墟时期倒刻者，可能是有意为之。如《花东》145（H3：463），《屯南》2309（H57：65反）、4352（T44④c：43反：易卦）、4559（T54③：102反），《合》27382、29074（易卦，六七七六）。

2. 补刻：将漏刻的字在其旁补刻。如《合》2361、7288、24940、27269。

3. 重复刻：如《合》12052正。

4. 改刻：将先刻的字迹刮去，在上面再刻字。如《合》1075反、26101。

西周时期的一些甲骨上也可见类似的现象。如周公庙遗址的腹甲（04QZH1：18），“克”字有修改痕迹，可能先用细线刻字，后再重刻，笔画较粗。

5. 错刻：《合》866、12617、35901。

6. 缺刻：有的是漏字未补刻，如《合》12963、26899；有的是字与字之间故意留白，如《合》10104。

（二）刻画线

商周时期甲骨反面钻凿排列、布局较严密、规律，目的是为了烧灼后骨正面显示出预期的卜兆。商周时期甲骨上，刻辞之间往往刻出界线以作区划，一些没有刻辞的甲骨上也有刻画线。这种刻画线应与灼后呈兆或刻辞有关。可能有两种含义：第一，同一骨板上分几个部位加施钻凿多次进行占卜。事大而重要，用钻凿多；事小而轻，用钻凿少。第二，区分同一版甲骨的多条刻辞。目前所知刻画线的时机多数在刻辞前刻画线，少数在刻辞后。徐锡台探讨周原甲骨时也认识到类似的现象，如“正面刻辞旁常见区分线，似与钻凿的组合相关，第一、二钻凿排列的区分线与钻凿等长，第三钻凿排列以上的区分线则拐弯，

^① 《甲骨文合集释文》对此类例子多有描述，本文在此基础上稍加补充。

此种情况与占卜的次数有关”^①。

第一类的例子：如《花东》150、241、265；周公庙遗址（04QZH③T1—20：504、04QZH2①cT3—12：40）。

第二类的例子：如《花东》162、170、236（一期），《合》22675、23241（二期），27087、27310（三期），34163、34890（四期），（五期）；《周原》H11：4、H11：50。

^① 徐锡台：《周原出土甲骨的字型与孔型》，《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

第五章 先秦时期卜法的起源与衰落

第一节 卜用甲骨的起源

学术界在有关甲骨占卜的起源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20世纪20—30年代,在山东省历城(今章丘)县城子崖遗址中出土了卜骨,李济据此认为甲骨占卜始于龙山时期^①;60年代,有学者认为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中发现的羊肩胛骨是年代最早的卜骨,该地应为卜骨的发源地^②;70—80年代,则有人根据河南省淅川县下王岗遗址中发现的羊肩胛骨,认定年代最早的卜骨在河南^③;90年代以后,有的学者认为年代最早的是甘肃省武山县傅家门遗址出土的卜骨^④。

城子崖遗址发现后,各地发现的龙山时期遗址中陆续有卜甲(或龟壳)等发现,但限于早期的考古工作水平,学者将晚期的遗存误认为是龙山文化时期是很正常的,即以往学者认为的龙山文化时期出土的卜甲,不属于龙山时期,应该属于商代。

新石器和夏代发现较多龟甲(或称龟壳),以往学者受龙山时期已出现卜甲这一结论的影响,多将其归为卜甲。但这些龟壳上一律无钻凿灼,应非占卜所用。或认为与新石器时代江淮地区流行的用龟甲的习俗有关,如郑州大河村遗址、登封王城岗遗址出土的龟甲特征应均受到江淮地区的影响。

本文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相关材料如兽类骨骼及其仿制物、龟壳及其仿制物等进行收集,构建卜用甲骨产生的背景,并在此背景下探讨卜用甲骨的起源问题。

① 李济:《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1期;李亨求:《渤海沿岸古代文化与韩国古代文化之关系》,《环渤海考古国际讨论会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90年。

③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200页,图版五三~8;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867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甘肃武山傅家门史前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4期;谢瑞琚:《论中国史前卜骨》,《史前研究——西安半坡博物馆成立四十周年纪念论集(1958—1998)》,三秦出版社,1998年。

一、卜骨的产生背景及起源

(一) 卜骨的产生背景

1. 兽类骨骼

在卜用甲骨出现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中国境内各文化遗址中已普遍发现有动物骨骼。到了铜石并用时代,家畜饲养业有了较大发展,种类有牛、猪、羊、狗、鸡等,其中牛、猪、羊是铜石并用时代饲养的主要家畜。从地域上看,西北地区以羊、猪最多,如甘肃永靖大何庄齐家文化^①中家猪数量占绝对多数,194个,其次为羊,56个,牛和狗的数量较少,分别为6和2。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②遗址中,也是以家猪和羊的数量为多,分别为430和50,其次为牛,38个。陕西临潼康家遗址^③中牛、猪、羊是主要家畜,从最小个体数来看,家畜中牛27、羊24、猪17、狗6。可见西北地区羊、猪最为常见,数量稳定。中原地区以猪、牛为多。如洛阳王湾第三期文化^④中,出土猪骨13个,牛骨11个。北部地区牛、猪、羊数量相当,而以牛最多。如内蒙古自治区的朱开沟遗址^⑤第一段(龙山晚期),牛、猪、羊、狗的最小个体数分别为46、32、33、3。此外,这时期各遗址中也发现了大量的野生动物骨骼,有鹿、狐、獐、貉、兔、鼠、雉、鸟、鱼、蚌等。东部地区猪是最为常见的家畜,野生动物中鹿的数量较多。如山东兖州西吴寺遗址^⑥中,家猪数量30,狗6,黄牛1;野生动物中鹿的数量较多,梅花鹿13,麋鹿7。山东泗水尹家城遗址^⑦中,家猪数量占绝对多数,57个,其余为狗、牛和羊,分别为5、1、1。野生动物中鹿的数量为绝对多数,有125个。

从上述各遗址家畜的饲养和野生动物的狩猎情况看,新石器时代或夏代比较早的卜骨取材,跟各地区家畜的饲养和野生动物的狩猎情况基本上是吻合的,更多的受自然环境的影响。

2. 动物仿制物

在北京平谷上宅遗址^⑧、河南汝州煤山遗址^⑨、伊川马迥营遗址^⑩、湖北天门肖家屋脊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③ 刘莉、阎毓民、秦小丽:《陕西临潼康家龙山文化遗址1990年发掘动物遗存》,《华夏考古》2001年第1期。

④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洛阳王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93页。

⑤ 黄蕴平:《内蒙古朱开沟遗址兽骨的鉴定与研究》,《考古学报》1996年4期。

⑥ 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兖州西吴寺》,文物出版社,1990年,248—249页。

⑦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研室:《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350—352页。该遗址中还有岳石文化的动物骨骼鉴定,其中猪65,狗24,羊没有,牛14,鹿68个。这与岳石文化的卜骨中猪、鹿肩胛骨较多有密切关系。

⑧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平谷县文物管理所上宅考古队:《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8期。

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

⑩ 洛阳地区文物保护管理处:《河南伊川马迥营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1期。

遗址^①、邓家湾遗址^②、宜都茶店子遗址^③等各地史前文化遗址中发现石或陶塑的小动物,种类有牛、猪、羊、狗、兔、鸡、象、猴、狐、鸟、蚕等,学者一般认为这种小件是装饰品。这些石、陶塑的动物形象应是当时人们生活关系密切的动物的写照。

(二) 卜骨的起源

目前,学术界探讨卜骨起源问题所涉及的遗址主要有仰韶时期的三处遗址,即甘肃武山傅家门遗址^④、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⑤和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⑥。但这三处遗址所出卜骨,尚存在争议。甘肃武山傅家门遗址在房址和窖穴中共出土6件肩胛骨,其中牛和猪的肩胛骨上,一律没有灼痕,两件羊的肩胛骨只有1个灼痕,可能并非人类有意识占卜活动所形成的产物,年代经碳十四测定为公元前3815年^⑦。除此以外,该地区的卜骨最早见于齐家文化,两者之间时间跨度较大。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出土一件卜骨,报告认为是仰韶晚期,但除此外,该遗址最早的卜骨见于龙山晚期。另该卜骨的特征与龙山晚期的卜骨类似,年代可能属于龙山晚期。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所出土的羊肩胛骨,报告认为是仰韶晚期,但除此外,该地区最早的卜骨见于夏家店下层,两者时间跨度也很大。另外,后两处遗址发掘时间较早,对卜骨年代的判断或存在争议。

龙山早期的卜骨,仅见于内蒙古阿善文化寨子塔遗址,中原地区和西北地区均不见。到龙山晚期,北方地区的老虎山文化、游邀类型等出土卜骨仍较多,且老虎山文化早期的遗存中显示出延续使用内蒙古阿善文化的占卜传统。可见,在北方地区,卜骨这一占卜习俗从龙山早期出现后,一直沿用到龙山晚期。

在龙山晚期,中原地区和西北地区的卜骨才开始广泛流行,这可能与中原龙山文化开始向外扩张有关。北起唐山,南至长江中游的洞庭湖和下游的太湖,东到沿海一带,都发现了龙山末期的遗存。这种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社会大变革,即中心地区与周围地区文化的交融,整个中原地区与邻近的文化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大发展,应是占卜习俗广为流行的文化背景。卜骨在这种背景下,出土数量大为增加,如中原地区的后岗二期类型、王湾三期类型等均出土大量卜骨。西北地区此时卜骨的出土数量约占新石器卜骨的一半,以齐家文化卜骨数量最多,其次为客省庄二期文化。

韩建业在《老虎山文化的扩张与对外影响》一文中^⑧,提到龙山时期,因气候的变化引

① 石家河考古队:《肖家屋脊——天门石家河考古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② 石家河考古队:《邓家湾——天门石家河考古报告之二》,文物出版社,2003年。

③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宜都城背溪》,文物出版社,2001年。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甘肃武山傅家门史前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4期;《武山傅家门遗址的发掘与研究》,《考古学集刊》第16集,文物出版社,2006年,412页,图27,彩版3、4。

⑤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1期。

⑥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200页,图版五三~8。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2年。

⑧ 韩建业:《老虎山文化的扩张与对外影响》,《中原文物》2007年第1期。

起北方民族的南移。这一结论或可解释中原和西北地区出土卜骨的数量多于北方地区这一现象,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中原地区的卜骨可能受到北方地区的影响。

二、卜甲的产生背景及起源

(一) 卜甲的产生背景

龟作为食物资源,旧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多见食剩的龟甲,这些遗址的分布大致以长江流域为中心,南到南海之滨,北及海岱的沿海地区。以龟壳或其他质料的龟形器作为随葬品的例子,始见于新石器时代中期。除了用真正的龟壳作为随葬品之外,新石器时代的墓葬中也出现一些随葬其他材质制作的龟类器物的现象,如玉龟、陶龟等等。

本文仅对人们有意识加工过的或随葬的龟壳,以及龟壳的仿制物如玉龟、陶龟等作简单介绍,那些为人们食用后所遗留的龟壳不作描述。按照类别分别介绍如下。

1. 龟壳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址中发现人类有意识行为活动遗留下来的龟壳,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墓葬中随葬:见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江苏刘林遗址、江苏大墩子遗址、邹县野店遗址、潍坊前埠下遗址。

(1)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 23 座墓葬中出土成组的龟甲,以闭壳龟为主,从 8 龟一组到 2 龟一组不等^①。成组龟甲内大多装有数量不等的石子,石子是随意从河滩上捡来的,形状和数量均无法看出规律,但一般而言,大龟壳内石子数量较多,反之亦然。

(2) 江苏刘林遗址第一次发掘的墓葬中出土龟甲 9 件^②,均是闭壳,但内无石子。第二次发掘又发现龟甲六付,背甲上均有穿孔^③。M182 中出土两付龟甲,内有小石子。其余有的龟甲内有数量不等的骨筹^④。

(3) 江苏大墩子遗址也出土穿孔龟甲 3 付^⑤。其中 M21 的一付龟甲、M61 的两付龟甲内均有小石子。

上述三处遗址,用一付龟甲作为器具,盛放石子或骨筹,有的龟甲上亦有刻划符号。虽非占卜所用龟甲,但用龟甲盛放的石子或骨筹也许与占卜术算等有关,可能该地区此时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 年,455—460 页,彩版四一~四三,图版一九三。

② 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2 年第 1 期。

③ 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65 年第 2 期。

④ 发掘者称其为“骨簪”。我们认为这里的骨簪与其他遗址龟甲中的石子有相似功能,故称之为骨筹。

⑤ 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 年第 2 期。

已有类似占卜的传统存在。

(4) 邹县野店遗址发现一付龟甲(M88:1)^①,包括背甲和腹甲。出土时两者合在一起,置于女性死者腰部附近。背甲一端穿有4个两两相对的小孔,腹甲尾端被截平,头端穿一圆孔。

(5) 潍坊前埠下遗址第二期遗存中发现一付龟甲(M10:2)^②,背甲略残,前端有略呈方形排列的4孔,边缘残存1孔,腹甲两端截掉,无孔。该遗址第二期文化为大汶口文化遗存。

灰坑中出土:见于汶上东贾柏遗址、郑州大河村遗址。

(1) 汶上东贾柏遗址的H13中发现一件较完整的地平龟遗骸^③,在别的灰坑中还见有多枚规整的地平龟放置在一起。

(2) 郑州大河村遗址龙山文化早期遗存中发现一件龟甲(H170:27)^④,似抹角长方形,一端稍残,上有四孔^⑤。

邹县野店遗址、潍坊前埠下遗址中墓葬中随葬的龟甲与汶上东贾柏遗址、郑州大河村遗址灰坑中出土的龟甲上,均有钻孔,尤其是墓葬中,以一付龟甲随葬,这或许与原始宗教有关。这几处遗址年代为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时期。

一些报告中将某些龟壳误认为卜甲,如新石器时代的浙川下王岗遗址^⑥、兖州王因遗址^⑦、泗水尹家城遗址^⑧、临潼康家遗址^⑨等,夏代的洛阳东干沟遗址^⑩、荥阳竖河遗址^⑪等,本文不做描述。

商周时期已经出现卜甲,但亦有虽经整治,却未见钻凿灼的龟甲出土,主要为背甲,背甲未切开,仍较为完整。如商代登封王城岗遗址^⑫的背甲(W5T0744H5:2)、安阳殷墟西

①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邹县野店》,文物出版社,1985年,97页,图版七六。

②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寒亭区文物管理所:《山东潍坊前埠下遗址发掘报告》,《山东省高速公路考古报告集(1997)》,科学出版社,2000年,73页,图版二三。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汶上县东贾柏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6期。

④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上、下),科学出版社,2001年,452页,图版一五三。

⑤ 原报告认为有灼四孔,但笔者仔细观察图版,认为不是卜用甲骨。

⑥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25页,图一五。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济宁地区文化局:《山东兖州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第1期。

⑧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研室:《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156页,图版六九。

⑨ 刘莉、阎毓民、秦小丽:《陕西临潼康家龙山文化遗址1990年发掘动物遗存》,《华夏考古》2001年第1期。

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报告——1955~1960年洛阳涧滨考古发掘资料》,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80页。

⑪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荥阳竖河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0集,地质出版社,1996年,34页,图三十二。

⑫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大象出版社,2007年,305页,图三〇三,彩版二八。

区墓葬^①的背甲(5件)、巴东黎家沱遗址^②的背甲(H1①:87)、周代的长安张家坡墓地^③的背甲(8件)。

2. 龟甲仿制物

中国新石器时代墓葬中发现的玉龟主要见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凌家滩遗址、上宅遗址等地。

(1) 辽宁凌源牛河梁遗址,出现了两例随葬玉龟的现象。一例是牛梁河第五地点一号冢中心大墓(M1),随葬玉龟2件^④。分别出于死者左、右手部位,皆呈黄绿色。首作三角形,微缩颈,屈肢。线雕出口、目、四肢和足,背稍凸起,平腹。龟为神灵之物,当显示墓主人为掌握神权的巫者。另一例是同遗址的第二地点M21,随葬玉龟1件^⑤。玉龟(M21:10)放置于左胸部,龟背向下,玉呈淡绿色,有黄色暇斑,平面近椭圆形,龟背隆起,上琢三道竖脊凸线,中脊高于两侧脊,阴线勾勒出龟背纹,纹路匀称规整,清晰形象。龟的头尾收缩于体内,俯视图不见,仅在龟背两端以刻线表现首尾。腹甲稍残,中心有圆凹窝,在凹窝上钻孔,可用于竖向穿插挂缀。腹周围切割数道凹槽,整体造型逼真生动,玲珑晶莹。

(2) 辽宁阜新胡头沟墓地M1出土玉龟2件^⑥,淡绿色。标本M1:6,颈前伸,龟背近椭圆,无其他细部表现,腹面正中一竖脊,脊正中横穿一孔,长4.8厘米。标本M1:7,头部微缩,雕出目、口、爪等细部,龟背略鼓起,近六角形,无纹,腹面有一对穿孔,长3.9厘米。

(3) 浙江反山墓地出土龟(M17:39)i件^⑦,长3.2厘米。浅黄色,有褐斑。头颈前伸,中部有一道短脊线,四爪短小,作爬行状,背上有纵向脊。腹底平整,有一对小隧空。

(4) 安徽凌家滩墓地出土玉龟1件^⑧。分背甲(M4:35)、腹甲(M4:29)两部分。均呈灰白色,通体精磨。标本M4:35,为龟背甲,圆弧形,背上有脊,背甲两边各对钻二圆孔,两圆孔之间琢刻凹槽,后部对钻四个圆孔。标本M4:29,为腹甲,略呈弧形,较平。腹甲两边与背甲钻孔相应处对钻二圆孔,腹甲后部对钻一圆孔,这些上下对应圆孔应为拴绳固定之用。长9.4、高4.6、宽7.5、厚0.3—0.6厘米。出土时长方形玉片(M4:30)夹在玉龟腹、背甲之间。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②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巴东县博物馆:《巴东黎家沱遗址2000年度发掘简报》,《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一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58页,图版二。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317页,图版19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沔西队:《1987、1991年陕西长安张家坡的发掘》,《考古》1994年第10期。

④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梁河第五地点一号冢中心大墓(M1)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8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文化局编:《牛河梁遗址》,学苑出版社,2004年,56—62页。

⑤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梁河第二地点一号冢21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8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文化局编:《牛河梁遗址》,学苑出版社,2004年,30—40页。

⑥ 方殿春、刘葆华:《辽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的发现》,《文物》1984年第6期。

⑦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南京博物院:《良渚文化玉器》,文物出版社,1990年,225页。

⑧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4期。

此外,北京平谷上宅遗址^①出土小石龟,发掘者认为是装饰品。

商周时期出土玉龟的遗址主要有河南安阳小屯村北出土的墨玉双联小龟(F11:4),发现于房基填土中,同时还出土玉鳖(F11:5)、石鳖(F11:18)各一^②。成都金沙遗址^③发现一件石鳖(C:642),身体呈卵形,体肥硕,三角形头部前伸,四肢短小后缩,腹部扁平,全身打磨。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墓^④(M202:4),为青玉小龟,长2.4厘米,中部有一穿孔。北赵晋侯墓地^⑤(111M63:90—10),为青玉小龟,长2.4厘米,两端穿孔贯穿首尾。

中国新石器时代墓葬中发现的陶龟,主要见于湖北天门肖家屋脊、邓家湾、宜都茶店子等石家河文化遗址。在此作简单介绍。

(1) 湖北天门肖家屋脊遗址^⑥共出土陶塑艺术品14件,有陶人、鸡、鸟、狗、猪和龟,均为泥质红陶,因为与早期同类物品相似,可能为早期混入物。其中陶龟1件,标本AT1104^③A:7,较抽象。长颈,四足。长3.7、高2.2厘米。

(2) 湖北天门邓家湾遗址在石家河文化地层中,发掘者发现大批陶塑品,由于这些陶塑品绝大多数为碎块,堆积在一起,难以统计精确的数量,发掘者估计总数不少于万件^⑦。这些陶塑品包括陶偶(近似人形)和陶鸡、鸟、羊、龟、猪、猴、狗、象等。其中龟鳖标本14件,形象逼真,有甲,抬头,弧背,四足和尾均外伸。它们可能是宗教仪式中使用的道具。看来邓家湾除墓地外还可能是一个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⑧。

(3) 宜都茶店子遗址出土有陶龟(H2:1)一件,陶鸟两件,均为泥质红陶,用手捏制^⑨。这些陶塑动物虽然数量不多,但与邓家湾陶动物非常相似。发掘者认为,茶店子遗址属于石家河文化季家湖类型。

江汉地区发现陶塑品的遗址还有很多,据不完全了解,湖北省还有石家河罗家柏岭遗址^⑩、西花园^⑪、乱石滩^⑫、季家湖^⑬、石板巷子^⑭、蔡台^⑮等。湖南省有车牯山^⑯、划城岗^⑰等。这些遗址出土的陶塑动物,与邓家湾出土的完全一样。在江汉平原以外的其他南方

① 宋大川:《近年来北京考古新成果》,《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五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2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玉器》,文物出版社,1982年,4—5页,图版67。

③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I区“梅苑”东北部地点发掘一期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2)》,科学出版社,2004年,162页,图版六。

④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95年,233页。

⑤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天马一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8期。

⑥ 石家河考古队:《肖家屋脊——天门石家河考古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1999年,264页。

⑦ 石家河考古队:《邓家湾——天门石家河考古报告之二》,文物出版社,2003年,174页。

⑧ 石家河考古队:《肖家屋脊——天门石家河考古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1999年,2页。

⑨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宜都城背溪》,文物出版社,2001年,224页。

⑩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

⑪ 方殷:《随州西花园与庙台子遗址》,《江汉考古》1980年第2期。

⑫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长江队:《湖北均县乱石滩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6年第7期。

⑬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当阳季家湖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资料丛刊》1987年第10期。

⑭ 宜都考古发掘队:《湖北宜都石板巷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5年第11期。

⑮ 荆州博物馆发掘资料。转引自张绪球:《石家河文化的陶塑品》,《江汉考古》1991年第3期。

⑯ 湖南省岳阳文物工作队:《画客车牯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第三集。

⑰ 湖南省博物馆:《安乡划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4期。

地区,例如长江下游的河姆渡遗址^①,也有陶塑品出土。

此外,中原地区也有多处遗址出土陶塑动物。如河南临汝煤山遗址^②、伊川马迥营遗址^③等。河南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塑动物,时代上基本属于河南龙山文化,与石家河文化相仿。河南地区出土的陶塑动物,从形态上看,明显是学习、模仿石家河陶塑动物的造型。其塑造技法也基本继承了石家河陶塑技术,均是手工捏制成形。所以我们推测,河南地区陶塑动物的功能也应当与石家河陶塑相同或相近。

另外,偃师商城遗址发现1件陶龟(H25井上:1)^④,龟体平面呈长圆形,背部隆起,划长方格纹,下部有圈足,圈足两端各一穿孔,头残。残长14.6厘米,宽10厘米,高7.4厘米。

红山文化的墓葬,具有“唯玉为葬”的特点。牛河梁河遗址第五地点M1随葬玉器的位置与摆放方式具有特殊含意。在死者的全身,以及小腿之下,都有摆放的玉器,这些现象都表明是一种很特殊的葬俗。另外,两件玉龟的形状可能也代表了雌雄的区别(阜新胡头沟M1的两件玉龟亦有此可能)。因此我们认为在红山文化的牛梁河期已经出现了原始的宗教——类似于萨满教的原始宗教^⑤。至于牛河梁第二地点、阜新胡头沟、北京上宅遗址均出土带穿孔的玉龟,也许可以作为装饰品的证据。有人以为反面没有纹饰的玉龟不应该称为龟,应该叫玉鳖。但是,与龟共出的其他动物模型,许多亦不见纹饰,可见据龟背上的纹饰的有无来分别龟和鳖并不一定准确。

凌家滩墓地M4出土的几件玉器,如长方形玉片、玉龟、三角形玉片等都很有特色。长方形玉片中的方心八角星纹和圭形纹饰可能与古天文有关,又与玉龟腹甲放置在一起,值得进一步探讨^⑥。

与玉龟皆出土于墓葬之中不同,陶龟在遗址和墓葬中都有发现。石家河文化的诸多遗址中,就出土了大量的包括龟在内的陶塑动物。以邓家湾遗址为例,在发掘区的西北部发现了两处大型祭祀遗址,而且陶塑品正好与祭址同出现在被考古发掘揭露的范围内。因此有学者认为,邓家湾的陶塑小动物具备祭祀功能,是祭祀遗址的附属物^⑦;或认为陶塑动物是当时人们为“祈求畜禽获得丰足”而制作的,与巫术有关^⑧。但是我们综合考察一下陶塑品的分布情况,可以发现虽然出土陶塑品的灰坑多达17个,但数量较大的不过9

①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姆渡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河姆渡遗址的陶塑品出土于第四文化层,被发掘者称为玩具。包括陶猪、陶羊和不明兽类,一共九件标本。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

③ 洛阳地区文物保护管理处:《河南伊川马迥营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1期。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尸乡沟商城第五号宫殿基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2期。

⑤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梁河第五地点一号冢中心大墓(M1)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8期。

⑥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4期。

⑦ 任式楠:《我国新石器时代聚落的形成与发展》,《考古》2000年第7期。

⑧ 张绪球:《石家河文化的陶塑品》,《江汉考古》1991年第3期。

个,且多分布在祭址的东部。除了少数如 H116、H106 等几个外,其余出土陶塑品的灰坑均距离祭址较远。而且陶偶基本上都出在 H106 和 H116,可以认为与祭祀活动有关;但陶动物则很难与祭祀联系上。这些陶塑品很有可能是一种计数工具^①。

(二) 卜甲的起源

新石器中晚期,在河南南部、江苏地区墓葬中多随葬内置有石子或骨筹的龟甲。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中常见有钻孔的龟甲。到龙山时期,除山东地区以外在郑州大河村遗址^②也出现有钻孔的龟甲,说明至少在龙山时期,郑州地区已经有用龟的习俗。

商代早期出土的卜甲材料主要见于《郑州商城》一书中,分析该报告所发表的卜甲可知:报告所发表卜甲均出土于南关外遗址,其中南关外期(大致相当于商代早期或先商阶段)仅发现一件,二里岗下层一期未发现卜甲,二里岗下层二期发现 10 件卜甲,二里岗上层一期发现 37 件卜甲。其中南关外期所出的这一件卜甲(标本 C5T85^④:123),为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占卜过的龟甲。其整治施灼特征与二里岗下层二期的卜甲大致相同,且该时期目前仅有一件。而在郑州二里岗下层一期时,该地区未发现卜甲,故笔者怀疑此卜甲年代或许早不至南关外期。

二里岗上层时期,卜甲分布范围扩大,除郑州商城遗址外,在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③和柘城孟庄遗址^④也发现卜甲,腹甲的反面均先钻后灼。大辛庄类型的济南大辛庄遗址^⑤、泗水尹家城遗址^⑥和东下冯类型的垣曲商城遗址^⑦,亦发现卜甲,均为腹甲。可见,商代早期的卜用龟甲,主要分布范围是二里岗文化和大辛庄类型。此时占卜仍以卜骨为主,卜甲为辅。卜甲仅见腹甲,还未发现占卜过的背甲。

商代中期时卜甲数量大大增加,开始使用背甲,商代晚期和西周时期广泛使用。

另外,商周时期在湖北、重庆和四川地区的周梁玉桥类型、毛家咀类型、路家河文化、早期楚文化、麻柳沱文化、十二桥文化中也有发现。从卜甲的钻凿形态等方面来看,该地区卜甲最早在商代二里岗上层时期出现,晚商时期较为流行。而北方地区的诸文化类型,未见卜甲,仍继续延用卜骨。卜甲的这种地域分布,很可能与地理环境和文化习俗有关。

总而言之,商代二里岗下层,在郑州地区开始出现卜甲,虽很难考证其背景,但这个时

① 闫志、朴载福:《出土所见上古时期的计数工具——从上宅文化谈起》,《北京平谷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

②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上、下),科学出版社,2001 年,452 页,图版一五三。

③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 年,169 页,图版五九。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商丘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柘城孟庄商代遗址》,《考古学报》1982 年第 1 期。

⑤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博物馆:《1984 年秋济南大辛庄遗址试掘述要》,《文物》1995 年第 6 期;徐基:《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的初步研究》,《文物》1995 年第 6 期;王华:《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整治技术研究》,山东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6 年。

⑥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研室:《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 年,253 页,图版九九。

⑦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县博物馆:《垣曲商城:1985—1986 年度勘察报告》(一),科学出版社,1996 年,243 页,图一五七,图版八九。

期商人在北方传统的用肩胛骨占卜的基础上,接受用龟神灵的观念,开始使用龟甲来进行占卜活动,应是无疑的。

第二节 卜法的衰落与筮法的兴盛

先秦时期的卜用甲骨,在西周中晚期时开始逐渐衰落。这个现象很可能与西周时期筮法的普遍使用有关。在文献记载中,筮法出现的时间较早,如《帝王世纪》:“庖羲氏作八卦,神农之为六十四卦,黄帝尧舜引而伸之,分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连山,殷人因黄帝曰归藏,文王广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谓之周易。”但从考古材料看,数字易卦最早出现于商代晚期,之前的情况则很难考证。

商周时期青铜器铭文中已有数字符号,可见于宋代的著录,但一直未被人们所认识。1930年代,郭沫若认为是“族徽”^①,唐兰对1956年长安张家坡出土的三片卜骨和青铜铭文中此类奇字的几件青铜器进行研究,认为“这种文字是用数目字当作字母来组成的”,是殷周以前的一个民族创造的^②。1977年在陕西岐山凤雏建筑遗址中发现了17000余片西周甲骨,次年,徐锡台在吉林长春开幕的第一届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研讨会上,介绍了周原甲骨,甲骨内容包含了六个数字组成的易卦。参加此会的张政烺提出应是“阴阳数字组成的周易重卦”^③。此后,一些学者对商周时期数字组成的易卦进行研究,但发现的数量不多,综合研究有限。这几年在中国境内继续进行的科学考古发掘,出土了许多遗物,其中在甲骨、青铜器、陶器、石器、骨器等遗物上发现相当数量的数字易卦。本节主要是在搜集整理目前出土遗物上的数字易卦的基础上,探讨商周时期卜法与筮法之间的关系、易卦形成过程等内容。

一、商周时期出土遗物中所见的易卦

(一) 商 代

目前,在商代考古出土的遗物中所见的数字易卦不多,均属于商代晚期,主要刻在甲骨、青铜器、陶器、石器等遗物上。

1. 甲骨

商代晚期殷墟地区发现刻字甲骨较多,其中也有数字组成的易卦,但其数量较少。

①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16页。

② 唐兰:《在甲骨金文所见的一种已经遗失的中国古代文字》,《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③ 大会秘书组:《吉林大学古文字学术讨论会纪要》,《古文字研究》第一辑,1979年,2—3页。

(1) 三个数字组成的易卦

有学者认为在殷墟一期的甲骨中已经出现单卦^①,但此类可能不属于数字易卦的范畴。目前三个数字组成的易卦(单卦)只有《外》488 一片,属于商代晚期。

上甲,六六六。

《外》488

(2) 四个数字组成的易卦

四个数字组成的易卦只有《合》29074 和《屯南》4352 两片,均属于殷墟三期。

于丧,亡戕? 吉。六七七六。

《合》29074

八七六五。

《屯南》4352

以上两片均为倒刻,与其他卜辞行款走向不同,可能是为了与卜辞区别而故意为之。尤其是《合》29074 的数字易卦比其他卜辞字体要大,此类数字易卦很可能与卜辞不同,有着特殊的用途。

(3) 六个数字组成的易卦

1) 殷墟四盘磨所出土的易卦卜骨

1950 在小屯以西的四盘磨村 SP11 小探坑内曾发现 1 片“易卦”卜骨^②。关于它的年代,学者们或认为是商代之物,或认为是西周之物^③。其中 1 片卜骨刻着 3 行横写的文字,其内容如下:

七五七六六六,曰:白御。

八六六五八七。

七八七六七六,曰:白御。

张政烺根据《周易》将 6 个数字组成的易卦分别释为“否”、“明夷”、“未济”^④。

2) 殷墟刘家庄遗址的卜骨

该遗址发现 1 件易卦卜骨(95T1J1:4),为牛肩胛骨^⑤。正面刻有六个数字组成的易卦,自上而下,分为两组,均竖刻;上组外侧刻有 3 个数字组成的易卦一组。

一一六六一五。

六八八八六六。

九七七。

① 朱歧祥认为《甲骨文合集》(9268)释为“五五六”是单卦,但应释为“爻人”,“爻”字在甲骨文中常见于地名、人名,也可能与“易”有密切关系。此外,“爻”字可见于爻鼎、爻爵、爻盘、爻解等铜器上,均属于商代晚期。

② 曹定云:《殷墟四盘磨易卦卜骨研究》,《考古》1989 年第 7 期。

③ 例如唐兰认为是西周之物,张亚初、刘雨认为属于殷墟甲骨第五期,李学勤则将它定在晚殷时期。而曹定云主要对其文字特征、钻凿形态以及灼向进行了考察,主张为康丁时期的卜骨。

④ 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 年第 4 期。

⑤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1995—1996 年安阳刘家庄殷代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7 年第 2 期。

根据《周易》，可分别释为重卦“中孚”、“坤”；单卦“乾”。

2. 青铜器

青铜器上的易卦，目前在已铸好的青铜器上仅见单卦，但在铸造青铜器的陶范上可见到重卦。

(1) 青铜器

〈五五五盃〉	五五五
〈六六六戊卣〉	八五一
〈八一六盘〉	八一六

上述三件单卦，相当于《周易》的“乾”、“兑”、“坎”。此外，“五五五”、“六六六”常见于一些青铜器铭文中，有学者认为应均为族徽，但也可能与数字易卦有关。

(2) 陶范

2000—2001 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孝民屯村青铜铸造遗址中出土的陶范中，有几件刻有数字易卦^①。此外，在《邶中片羽二集》一书中，有爵的陶范上也有数字易卦。

殷墟孝民屯村	五八七□□□
	八六一六六六
	□□六六六七
	□□七六七六
	六一一六□□
	一一六六一六
《邶中片羽二集》	五七六八七七，
	一七六七八六。

安阳殷墟孝民屯村完整的两条数字易卦，相当于《周易》的“豫”、“涣”；《邶中片羽二集》的两条数字易卦，相当于《周易》的“中孚”、“渐”。

3. 石器

1982 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河南安阳苗圃北地发掘清理殷代墓葬时，于 M80 随葬品中发现 1 件刻写着数字符号的石器遗物。报告将 M80 的年代定在殷墟三期之初^②。郑若葵通过对实物的观察认为该磨石为墓主生前使用过的，上面所刻的数字符号，明显不是随葬时的新刻，而是墓主生前用于磨砺器物前已有的旧刻。因此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2000—2001 年安阳孝民屯东南地殷代铸铜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6 年第 3 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0—1982 年安阳苗圃北地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6 年第 2 期。

其年代可上溯至殷墟二期^①。该砺石的三面刻有至少 6 组的数字易卦。

六六七六六八

七六七六六七

七六八七六七

六六五七六八

八一——六六

八一——一六

这些数字易卦与《周易》对照,可分别释为“豫”、“颐”、“贲”、“小过”、“咸”、“大过”。

4. 陶器

1958 年,在山东平阴县朱家桥殷代遗址中出土一件陶罐,在肩部刻有数字易卦,年代为殷墟四期^②。此外,在安阳殷墟 GT406^④:6 和 GT409^④:6 出土的 2 件陶罐上,也刻有 6 个数字组成的易卦^③,年代均为殷墟四期。

山东平阴朱家桥

安阳殷墟

一八八六一一

七七八六六七

六六七六六八

六六七六七五

山东平阴县朱家桥殷代遗址的数字易卦,与《周易》对照,释为“损”卦。安阳殷墟的数字易卦,张政烺考释为“益”、“豫”、“归妹”^④。

(二) 周 代

周代出土遗物中所见的数字易卦大部分属于西周时期,数量远胜于商代,主要见于甲骨、青铜器、陶器、骨器等遗物上。此外,在建筑遗物如水管等上也可见到^⑤。

1. 甲骨

周代出土甲骨中刻有数字易卦的大部分属于西周早期,少数属于西周中期。主要见

① 郑若葵:《安阳苗圃北地新发现的殷代刻数石器及相关问题》,《文物》1986 年第 2 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发掘队:《山东平阴县朱家桥殷代遗址》,《考古》1961 年第 2 期。

③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 年,130 页,图 98-7、9。

④ 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 年第 4 期。陕西省博物馆展出的陶管上可见,上面为六个数字组成的易卦。

⑤ 陕西省博物馆展出的陶管上可见,上面为六个数字组成的易卦。

于陕西岐山凤雏遗址^①、扶风齐家遗址^②、长安张家坡遗址^③、北京房山镇江营遗址^④等。

《周原》H11:7	八七八七八五。
《周原》H11:81	七六六七六六。
《周原》H11:85	七六六七一八,曰:其□既鱼。
《周原》H11:90	□□□六六七。
《周原》H11:91	六六七七五□。
《周原》H11:177	七六六六七六。
《周原》FQ6	□一六六六八, 六八一——八, 八八六六六六, 一八六八五五, 六八一——一, 六九八一八六, 九一一一六五。
扶风齐家:	八七五六八七, 八六七六八八, 八七六八六七。
长安张家坡:	六八一——六一, 五一——六八一, 一一六一——, 五一八一六六。 六六八一——六, 一六六六六一。
北京镇江营:	六六六六七七, 七六八六五八。

上述6个数字组成的易卦可根据《周易》分别释出,其中《周原》H11:7为“既济”,

① 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发掘简报》与《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第10期;陕西周原考古队、周原岐山文管所:《岐山凤雏村两次发现周初甲骨文》,《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3期;曹玮:《周原甲骨文》,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

② 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县齐家村西周甲骨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9期;罗西章、王均显:《周原扶风地区出土西周甲骨的初步认识》,《文物》1987年第2期;曹玮:《周原新出西周甲骨文研究》,《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4期。

③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张家坡西周遗址的重要发现》,《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3期;《陕西长安沣西张家坡西周遗址的发掘》,《考古》1964年第9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11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工作队:《1997年沣西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0年第2期。

④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镇江营与塔照》,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388页;《北京文博》1997年第4期(只见图)。

H11:81 为“艮”, H11:85 为“蛊”, H11:91 为“大壮”(或“恒”), H11:177 为“蒙”;《周原》FQ6 各为“观”(或“比”)、“恒”、“坤”、“损”、“大壮”、“蹇”、“同人”;扶风齐家村遗址的卜骨可释为“随”、“豫”、“屯”;长安张家坡遗址的卜骨可释为“丰”、“无妄”、“小畜”、“渐”、“升”、“颐”;北京镇江营遗址的卜骨可释为“临”、“蒙”。

此外,1980 年 10 月底,社科院考古所甲骨组的两位先生在安阳工作队复查 1973 年小屯南地陶片时,在考古队仓库中发现一片较完整的“易卦”卜甲。材料的发表者认为该卜甲“呈现出从殷代卜甲到西周卜甲的过渡形态”,并推断其时代“应在殷末周初,以周初的可能性大”^①。该卜甲上刻有文字 5 处,其内容如下:

□六□九。

七七六七六六,贞吉。

六七八九六八。

友(其下为五组平行的短线)

六七一六七九。

肖楠根据奇数为阳,偶数为阴的原则,将 6 个数字组成的易卦释成《周易》之卦^②,即为“渐(七七六七六六)”、“蹇(六七八九六八)”、“兑(六七一六七九)”。另外,甲首内板上有“九”、“六”二字,可能与《周易》中代表阴阳的数字有关。

2. 青铜器

周代青铜器上刻写的数字易卦,在宋代时已经为人们所注意,但均未将其考释为易卦。20 世纪 70 年代末,张政烺释读为易卦,才认识其真正面貌。铭文中的数字易卦,可分为 3 个数字组成的单卦和 6 个数字组成的重卦,大部分属于西周时期。

(1) 单卦

〈效父簋〉 五八六。

〈五五五父乙簋〉 五五五。

〈董伯簋〉 八五一。

〈史旂父鼎〉 七五八。

〈八八六鼎〉 八八六。

〈父戊卣〉 六六六。

〈一六一戈〉 一六一。

分别相当于《周易》的“艮”、“乾”、“兑”、“巽”、“坤”、“坤”、“离”。

① 肖楠:《安阳殷墟发现“易卦”卜甲》,《考古》1989 年第 1 期;曹定云:《殷墟发现的“易卦”卜甲与“文王演周易”》,《殷商考古论丛》,艺文印书馆印行,1996 年。曹定云从整治方法、钻凿形态、字体风格等方面出发,认为该卜甲的时代是殷代末期,但属周人之物,而非殷人之物。

② 肖楠:《安阳殷墟发现“易卦”卜甲》,《考古》1989 年第 1 期。

(2) 重卦

〈召卣〉	六一八六一一。
〈召卣仲卣〉	七五六六六七。
〈大保卣〉	五一七八一□。
〈六一七六一六鼎〉	六一七六一六。
〈中方鼎〉	七八六六六六,八七六六六六。
〈者卣鼎〉	七六八六七五。
〈六六一一六一盤〉	六六一一六一。
〈父乙盃〉	七六七六七六。
〈周琥〉	六七七一一一。
〈六六一六六一甗〉	六六一六六一。

分别相当于《周易》的“节”、“益”、“履”(或“讼”)、“困”、“剥”、“比”、“损”、“丰”、“未济”、“夬”、“震”。

周代青铜器上的数字易卦比商代晚期增加很多。商代晚期青铜器上只见3个数字组成的易卦(单卦),但西周时期,除单卦外,还有6个数字组成的易卦(重卦),而且数量较多。此时应已形成单卦和重卦的固定形式,与流传的《周易》基本相同。可见,西周早期时,筮法已经较普遍使用。数字易卦均在保存较好的青铜器上,铭文的首部、中间、尾部均有,有的铭文只有数字易卦。其用途需要进一步的考证,或属于族徽;或铸造青铜器之前,先筮而后卜,将其结果铸在青铜器上。

3. 陶器

(1) 陶器

1977年在陕西淳化县城东南的石桥镇北出土1件西周时期的陶罐,罐上刻有数字易卦11组,其年代为西周晚期^①。

一一一一一一,
六一一五一一,
一六一一一一,
一一一六八八,
一一六一一一,
一一六一九五,
一八一六一一,

^① 姚生民:《淳化县发现西周易卦符号文字陶罐》,《文博》1990年第3期;李学勤:《周易溯源》,巴蜀书社,2006年,225页。

八一—八一六，
六八五六—八，
一九八一—一，
一一六八八一。

可分别释为《周易》的“乾”、“夬”、“大有”、“否”、“小畜”、“小畜”、“睽”、“困”、“解”、“小畜”、“益”。

(2) 陶拍

2001 年在陕西长安县黄良乡西仁村西北西周遗址中发现陶拍 4 件。其中 2 件上刻有 6 个数字组成的易卦^①。

六一六一六一，
一六一六一六，
八八六八一八，
八一六六六六
一一六一一一，
一一一六一一。

可分别释为《周易》的“既济”、“未济”、“师”、“比”、“小畜”、“履”。

(3) 陶纺轮

陕西长安县张家坡西周遗址中出土 1 件陶纺轮，其中刻有“六六五六六八”^②。可释为《周易》的“豫”。

4. 骨器

骨器上所见易卦仅见于陕西长安县张家坡遗址出土的 2 件骨镞上，其上刻有“五一□”、“一六一”^③。可分别释为《周易》的“乾”（或“巽”）、“离”。

二、商周时期关于数字易卦的诸问题

(一) 易与重卦的出现

1. 先秦文献中的易书

《尚书》、《春秋》、《周礼》、《仪礼》、《史记》等古代文献中可见先秦时期与“易”相关的

① 曹玮：《陶拍上的数位卦研究》，《文物》2002 年第 11 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沔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 年，89 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沔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 年，92 页，图 60-13、15。

记载。其中《周礼·春官·太卜》载有专门掌管卜筮的官员,并记载“易”有“连山”、“归藏”、“周易”三种。《周礼·春官·筮人》记载了以九筮判断吉凶:“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帝王世纪》也记载了三易有关的内容:“夏曰连山,商曰归藏,周曰周易。”连山、归藏、周易只有周易流传下来,其余两种均失传。

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台15号墓出土了战国时期秦国的“归藏”竹简^①,该竹简与文献中记载的“归藏”关系尚不清楚,需进一步研究。但可以推测至少在战国时期应存在“归藏”。此外,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②和马王堆帛书^③、阜阳汉简^④等都记载了“周易”相关的内容。这些材料与流传下来的周易内容基本相同。

《周易》的成书年代和作者,目前学术界争议颇多。1929年,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中^⑤,通过对《周易》一书中出现的人物的分析,论证了其成书年代当在西周早期。

2. 易卦的出现

文献中有传说单卦是伏羲氏首创的记载,如《周易·系辞传》:“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2005年,河南平粮台遗址龙山文化遗存中发现一刻符陶纺轮^⑥,因时间地点与文献记载的伏羲氏均一致,受到学术界关注。但该纺轮为采集品,仍需要进一步论证。学术界公认的单卦为商代后期遗址中开始出现的。

对重卦出现的时间,目前主要有四种观点:司马迁^⑦和班固^⑧认为是周文王创造的,将八卦演为六十四卦;王弼认为是伏羲氏所做;郑玄认为是神农氏所做;孙盛认为是夏禹做重卦^⑨。

根据前文所介绍的商代晚期的易卦材料,可见3个、4个、6个数字组成的易卦同时存在。殷墟苗圃北地M80的砺石中有6个数字组成的易卦,其年代至少为殷墟三期前段(廩、康时期),据此可否定文王创造重卦的说法。4个数字组成的易卦只见于殷墟三期,以后不见。西周早期时,3个、6个数字的易卦常见。可能是文王对易卦重新整理,形成周易中所记载的固定形式。另外,李学勤认为安阳殷墟四盘磨所出的卜骨较为特殊,可能是

① 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文物》1995年第1期。

②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③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出版社,1983年。

④ 韩自强:《阜阳汉简“周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⑤ 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燕京学报》1929年第6期;《古史辨》,第3册上编。

⑥ 张志华、梁长海、长体鸽:《河南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发现刻符陶纺轮》,《文物》2007年第3期。

⑦ 司马迁的《史记·周本纪》说:“西伯(文王)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

⑧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说:“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

⑨ 孔颖达《周易正义·序》说:“王辅嗣等以为伏羲重卦。郑玄之徒以为神农重卦,孙盛以为夏禹重卦,史迁等以为文王重卦。”

周人在当地占卜的,据此推测苗圃北地之所以屡见筮数,也可能是殷墟之外的人员所为^①。其观点值得注意。

(二) 易卦的演变过程

根据出土遗物上所见的易卦材料,可知商代晚期易卦中有“一、五、六、七、八”等数字,西周时期有“一、五、六、七、八、九”等数字,商周时期易卦中不见“二、三、四”等数字,可能与“二、三、四”的书写方式容易混淆有关^②。易卦中以“一、六”多见,可能阴数“二、四”归属“六”,阳数“三”归属为“一”。“九”字在殷墟一期卜辞和序辞中常见,如《合》10407,但在易卦中最早见于安阳殷墟的卜甲上,年代为商周之际。西周时期易卦中常见,在《周易》中,“九”代表阳爻,“六”代表阴爻。

另外,上博简中可见《周易》内容,“一”代表阳爻,“八”代表阴爻,其年代为战国时期。可能阳爻由“一”字、阴爻由“八”或“六”演变而来,形成《周易》中所见的形式。如“初九”、“初六”、“九二”、“六二”、“九三(九三)”、“六三(六三)”、“九四”、“六四”、“九五”、“六五”、“上九”、“上六”等见于上博简中。

安阳殷墟卜甲上的易卦“七七六七六六”之后有“贞吉”二字,该卦相当于《周易》的“渐”卦,《周易》“渐”卦内容中有类似的“女归吉,利贞”卦辞。可能商周之际,卦辞已经出现。上博简的《周易》中的卦辞为目前所见地下出土材料中最早最完整的卦辞。

(三) 卜法与筮法的关系及其变化

先秦时期卜法和筮法为两种不同的占卜方式,卜法主要用兽类肩胛骨和龟甲占卜,筮法主要用蓍草占卜。

商周时期考古出土遗物中可见数字易卦,可能为筮法留在遗物上的痕迹。甲骨上亦刻有数字易卦,可能为先筮后卜,历史文献也有类似的记载,如《周礼·春官·筮人》:“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

战国时期包山楚墓、新蔡葛陵楚墓、天星观一号墓、望山楚墓所出土的楚简中均记载了卜法和筮法相关的内容。有易卦的竹简,其内容均与筮法有关,而与卜法无关^③。据此可推测甲骨上所刻的易卦,应是先用筮法占卜,结果为“吉”之后,再用卜法占卜,筮法的结果也刻在甲骨上。

从出土材料和文献材料看,卜法和筮法流行的时间和用途均不同。卜法在商代最为流行,卜用甲骨并用。而筮法材料极少,可能筮法的地位远远低于卜法。西周早期,除凤雏和周公庙遗址出土卜用甲骨较多外,一些周分封的诸侯国中亦可见到卜用甲骨,但数量

① 李学勤:《周易溯源》,巴蜀书社,2006年,209页。

② 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③ 从于成龙博士论文的《楚卜筮简中贞人及卜筮具一览表》中,可见有的竹简上筮与易卦同时出现,而不见卜与易卦同时出现的现象。详见于成龙:《楚礼新证——楚简中的纪时、卜筮与祭祷》,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较少。西周中晚期,中心地区的卜用甲骨也比较少见。西周中晚期以后,用甲骨占卜的卜法几乎消失,只边远地区偶见卜用甲骨的习俗。与此相关的是,商代晚期时,甲骨、青铜器、陶范、石器、骨器、陶器等考古遗物上可见数字卦。到西周时期,数字卦相关材料更多,商代晚期时数字易卦的材料远少于西周时期。可见卜法的衰落时间恰与筮法的兴盛时间重叠,二者之间或正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西周中期卜法衰落以后,中心地区很少见到,但在其他边远地区仍可见到,而且延续的时间较长,后世文献中多有记载。如《辽史·西夏》:“卜有四:一曰勃焦,以艾灼羊胛骨。”《元史·耶律楚材传》:“帝以艾羊胛以相符合。”《四川通志》记载,松潘、懋功等地也有“灸羊膊以断吉凶”的羊骨卜。又据史书记载,我国西方民族羊骨卜多,东方民族则牛骨卜多。《后汉书·东夷传》:“杀牛以蹄占凶吉。”《魏志·东夷传》:“夫余国,……杀牛祭天以其蹄占吉凶。”纬书《五经钩沈》又说:“东夷之人,以牛骨占事。”

第六章 甲骨占卜程式的探索

以龟甲兽骨进行占卜,是古代中国长期流行的决疑手段,是一种“原始宗教信仰范畴中的前兆迷信”^①。据本文前文中的论述可知,甲骨占卜之法源于新石器时代末期,盛行于商代,自西周开始日渐衰落,到战国时期卜与筮仍是人们经常采用的解疑释惑的方法。及至西汉前期,龟卜卜法的“精微深妙”,已经“多所遗失”^②,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对《周礼·春官·卜师》所掌的“开龟之四兆”,已茫然不详其义^③。明清以来,虽屡有学者对龟卜之法进行考辨,都“不过是寻绎文献数据进行探讨卜理、卜法古制而已,至于是否切合实际,恐怕亦未敢必”^④。

1899年以来的百余年间,殷墟陆续出土有字甲骨十余万片^⑤,人们从而得以依据对甲骨及其刻辞的直接考察,并辅以民族学的相关资料,去探寻并研究中国古代甲骨卜法的奥秘,对失传已久的甲骨卜法获得了系统的认识。有关龟卜卜法的研究成果,可概略地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龟卜程序,包括两个阶段:

- (1) 卜前准备。含贡龟取龟、辨龟体色、锯削刮磨、加施钻凿;
- (2) 实施占卜。含祝祷命龟、扬火灼龟、视兆占龟、刻记卜辞^⑥。

第二,龟卜卜法,涉及两个问题:

- (1) 文献“卜用三龟”^⑦与殷墟一事多卜、成套卜辞;
- (2) 文献“卜不习吉”^⑧、“卜筮不相袭”^⑨与殷墟“习卜之制”。

在百年甲骨学研究中,随着甲骨资料的逐渐富积以及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汉以来“多所遗失”的龟卜之法的稽考已取得了丰硕成果,甲骨占卜的操作程序已重新构建,一

① 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194页。

② [汉]司马迁:《史记·龟策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3224页。

③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2000年,1947页。

④ 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194页。

⑤ 各家统计的数字不一致。据《甲骨文合集》序,中国内外收藏的有字甲骨有十五万片之多。

⑥ 1899年殷墟甲骨发现以来,已有不少学者对商代龟卜之法进行研究,其中以1929年董作宾《商代龟卜之推测》(初载于《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与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之《甲骨的整治与书刻》的研究最系统。

⑦ 《尚书·金縢》,[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96年,196页。

⑧ 《尚书·大禹谟》,[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96年,136页。

⑨ 《礼记·曲礼》,[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96年,1251页。

事多卜、卜用三龟与习卜之制在分歧与争议中不断获得新认识^①。但是,在诸如贞、卜、占三个环节的性质与内涵,尤其是其间有关兆象、兆辞的内容^②以及祝祷、诏祭与卜辞的关系等问题上仍然少有论及,需要倾力关注认真探索。

近年来,陕西“周原”周人甲骨的出土^③、殷墟商人非王卜辞的发掘^④以及战国楚人卜筮简文的面世,为古代甲骨卜法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可资比较的新资料。商人王卜辞与非王卜辞之间,尤其是商人卜辞与周人、楚人卜筮数据之间在甲骨卜法上的异同,不仅加深了我们对卜辞各部分内涵的理解,而且也使我们甲骨卜法的认识有了新的进步。

本文前文中已利用考古出土的卜用甲骨等实物材料对先秦时期卜法的部分内容进行了探讨,但有关卜法的占卜程式等内容则无法详知,故本章主要借助文献中有关卜法的记载以及出土的文字材料进行探讨。

第一节 《仪礼》中所见的占卜程式

先秦文献中对占卜之事多有记载,如《仪礼》书对卜法和筮法程序的记载尤为详细。本文即以《士丧礼》、《士冠礼》两篇为例,简单介绍先秦时期的占卜程式。

一、卜 法

《仪礼·士丧礼》记载了采用龟卜之法卜问葬日的地点(庙、西塾)、参加人员(主人、族长、宗人、卜人、占者三人、众宾等)、占卜材料(龟、楚焯、爇)、占卜过程(陈龟、为位、奠龟、示高、命龟、作龟、占卜、旅占、彻龟)等。

1. 陈龟

卜日,既朝哭,皆复外位。卜人先奠龟于西塾上,南首,有席。楚焯置于爇,在龟东。

2. 为位

族长蒞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门西,东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卜人及执爇

① 一事多卜是对同一占卜事由的反复卜问,包括反复地“正反对贞”、“同事异问”、“同事异史对贞(或同贞)”等。卜用三龟是指连续用多块龟(或骨)对同一事由进行占卜,卜辞中的一卜、二卜以至六卜的记载可能与成套甲骨相关。关于习卜,先秦典籍已有记载,但意义并不明确。今人对甲骨中“习卜”的记载,认识也不统一。有三种不同意见:(1)主张每卜用三龟(或骨)为一习;(2)认为习卜是兆象;(3)主张习读如袭,习卜是龟卜与骨卜相袭(详见《甲骨学一百年》中《殷商王朝的占卜制度》一节)。

② 前人已指出“吉”、“大吉”、“上吉”、“引吉”、“不吉”等为兆辞。

③ 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第10期;《扶风县齐家村西周甲骨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9期;陕西周原考古队、周原岐山文管所:《岐山凤雏村两次发现周初甲骨文》,《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3期。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1年安阳花园庄东地、南地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6期。

席者在塾西。闾东扉，主妇立于其内。席于闾西闕外。

3. 奠龟

宗人告事具。主人北面，免经，左拥之。涖卜即位于门东，西面。卜人抱龟燋，先奠龟，西首，燋在北。

4. 示高

宗人受卜人龟，示高。涖卜受视，反之。

5. 命龟

宗人还，少退，受命。命曰：“哀子某，来日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无有近悔。”许诺，不述命，还即席，西面坐，命龟。

6. 作龟

兴，授卜人龟，负东扉。卜人坐，作龟，兴。

7. 占卜

宗人受龟，示涖卜，涖卜受视，反之。

8. 旅占

宗人退。东面，乃旅占，卒，不释龟，告于涖卜与主人：“占曰‘某日从’。”授卜人龟，告于主妇，主妇哭。告于异爵者，使人告于众宾。

9. 彻龟

卜人彻龟，宗人告事毕，主人经，入哭，如筮宅。宾出，拜送。

10. 袭卜

若不从，卜择如初仪。

二、筮 法

《仪礼·士冠礼》记载了采用筮占之法卜择冠日的地点(庙门外)、参加人员(主人、有司、筮人、宰人、宗人等)、占卜过程(为位、陈蓍、布席、命筮、作筮、旅占、重筮、彻筮席)等。

1. 地点

士冠礼，筮于庙门。

2. 为位

主人玄冠朝服，缁带素鞶，即位于门东，西面。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东面北上。

3. 陈筮

筮与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

4. 布席

布席于门中，闕西闕外，西面。

5. 命筮

筮人执筴，抽上鞶，兼执之，进受命于主人。宰自右少退，赞命。

6. 作筮

筮人许诺，右还，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卒筮，书卦，执以示主人。主人受眡，反之。

7. 旅占

筮人还，东面旅占，卒，进告吉。

8. 重筮

若不吉，则筮远日，如初仪。

9. 彻筮席

彻筮席。宗人告事毕。

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卜法与筮法是大致相同的。《仪礼》丧、冠两篇所载，其掌管卜法与筮法的官员，如宗人、卜人、占人、筮人等，与《周礼·春官》所载掌管卜法和筮法的专门人员，如宗伯、太卜、卜师、龟人、华氏、占人、筮人等，基本上是一致的。另外，胡培翬《仪礼正义》疏：“卜日，谓卜葬日也。《士冠》及《特牲》祭皆筮日，此独用卜，重葬事，亦以变于吉也。”这可作为占卜时选用卜法还是筮法的一种解释。

第二节 《龟策列传》与先秦龟卜卜法

西汉太史公司马迁所撰《史记》之《龟策列传》到西汉末年已有录无书，流传至今者是

西汉元、成年间褚少孙所补。唐人对此《传》的评价极低,曾以“言辞最鄙陋”、“叙事烦芜”^①、“不才之甚”^②,大事贬斥。但是,我们惊讶地发现,该书篇末所辑杂占的兆体及命兆之辞,每与周原卜辞或战国简文可以互证。由于“古卜书无传”^③,此《传》所纂龟卜卜法皆采自太卜官及文学长老习事者^④,其条例重复杂沓必不可免。褚氏《龟策列传》既有其渊薮,其价值不可低估。

古代卜筮之法多散见于先秦典籍,并在《尚书》的《洪范》、《金縢》、《大诰》、《洛诰》诸篇载有为位、诏号、命龟、卜龟、占龟以及“七卜”^⑤之法,亦可与甲骨卜辞、卜筮简文相印证。

以下拟从褚氏《龟策列传》入手,对龟卜条例进行归纳与研究,然后再分别对《尚书·金縢》、战国楚简、周原卜辞、殷墟卜辞的相关资料尝试进行整理与探索,以期在古代龟卜卜法的研究中做一点有益的工作。

一、《龟策列传》龟卜条例

太史公曰:“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⑥又曰:“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⑦司马氏的这些话,是说三代、四夷的卜筮之法虽各有异同并续有损益沿革,但在数千年间一直是人们解疑释惑、预知吉凶的手段。其所以如此,除却社会与思想文化的影响之外,其中必有相对固定的方法与手段。《龟策列传》中就载有若干传统的龟卜卜法。

1. 《龟策列传》称卜用龟甲为“神龟”、“灵龟”、“玉灵”、“大宝”等,多与楚简及先秦文献相同。如《尚书·金縢》称“元龟”^⑧,《大诰》称“大宝龟”^⑨,楚简卜筮文书^⑩称“白灵”、“黄灵”、“长灵”、“大宝爰”、“小宝”等。

2. 《龟策列传》记龟卜禁忌曰“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杀龟”^⑪,与《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毋以子卜筮”^⑫是同一类内容。

3. 《龟策列传》所记龟卜程序之“衅龟”、“杀龟”、“钻龟”、“荆卜”、“占龟”与礼书所记大体一致。

① 《史记·龟策列传》索隐:“龟策传有录无书,褚先生所补。其叙事烦芜陋略,无可取。”

② [汉]司马迁:《史记·龟策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3223页。

③ [汉]司马迁:《史记·龟策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3226页。

④ [汉]司马迁:《史记·龟策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3226页。

⑤ 《尚书·洪范》,[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96年,191页。

⑥ [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99年,3318页。

⑦ [汉]司马迁:《史记·龟策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3223页。

⑧ 《尚书·金縢》,[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96年,第196页。

⑨ 《尚书·大诰》,[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96年,第198页。

⑩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编:《望山楚简》,中华书局,1995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

⑪ [汉]司马迁:《史记·龟策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3239页。

⑫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01简正贰。

4. 《龟策列传》记古代龟卜时,有卜前、卜中向甲骨祝祷、祭祀的习俗,如“祝曰:今日吉,谨以粱卵煇黄袪去玉灵之不祥”^①,其中粱是米,卵是鸡蛋^②。这些礼俗虽不见于先秦典籍,但可以视作民间习尚。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中就已经流行过类似的习俗。如他鲁人请羊卜骨吃米,纳西人在羊卜胛上撒小麦,彝族人以鸡蛋卜卦等^③。

由上可见《龟策列传》所记古代龟卜之事,虽然已与先秦礼书大有不同,但其所录所辑,应各有所自,决非褚少孙所虚构。

《龟策列传》篇末附有龟卜卜法条例共七十项,为了便于与商周甲骨、战国简策相关内容作比较研究,我们试将此七十项龟卜条例,归纳成几类,分别讨论如下。

(一) 龟卜条例的形式分类

《龟策列传》龟卜卜法条例共计七十条,由条例的录写形式分析,明显分为三类。对这三类条例,褚少孙没有总括的“名称”,而是由各条例开头的不同用语加以区分,并将同类条例予以类聚与排列。以下,我们即以条例开头的惯用语词,将其分为三类(参看附录三)。

1. “卜”类条例。卜,条例也称作“卜曰”,共 24 条。如:

第十三条:卜居官尚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横吉安;不吉,身节折,首仰足开。

第十六条:卜岁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胗,身节有强外;不疫,身正首仰足开。

2. “命曰”类条例。各条都以“命曰”开头,共 32 条。如:

第六条:命曰呈兆首仰足胗。以占病,不死。系者未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不得。行不行。来不来。击盗不相见。闻盗来不来。徙官不徙。居官久多忧。居家室不吉。岁稼不孰。民病疫。岁中毋兵。见贵人不吉。请谒不得。渔猎得少。行不遇盗。雨不雨。霁不霁。不吉。

第二十条:命曰外高内下。卜病不死,有祟。(而)市买不得。居官家室不吉。行者不行。来者不来。系者久毋伤。吉。

3. “此”类条例。各条均以指事字“此”开头,共 14 条。如:

第八条:此首俯足胗身节折。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系留有罪。望行者不来。行行。来不来。见人不见。

第十一条:此横吉上柱载正身节折内外自举。以卜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二) 龟卜条例的内容分类

这里所谓内容,是指七十项条例中所涉及的龟卜的事类,即以龟卜的方法决疑释惑的

① [汉]司马迁:《史记·龟策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3239页。

② 《史记·龟策列传》索隐:“粱,米也。卵,鸡子也。煇,灼龟木也。黄者,以黄绢裹粱卵以袪龟也。必以黄者,中之色,主土而信,故用鸡也。”

③ 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199页。

事由。可分作以下十二类：

1. 卜官。包括居官、去官、徙官；
2. 卜病。包括病瘳、病甚、病祟、病死；
3. 卜室家。包括居室家与居官家室吉不吉；
4. 卜行至。包括行或不行、来或不来；
5. 卜灾变。包括兵灾、民疫；
6. 卜年成。即卜禾稼熟不熟；
7. 卜渔猎。即卜渔猎收获如何；
8. 卜气象。包括雨不雨、霁不霁；
9. 卜求财。包括求财、买臣妾牛马得不得；
10. 卜盗。包括遇盗、候盗、击盗、盗来不来；
11. 卜系囚。包括系囚有罪无罪，罪轻重，拘系久暂，有伤无伤，是否解出；
12. 卜谒见。包括请谒贵人得不得，吉不吉。

以上，我们对《龟策列传》的龟卜条例进行了形式分类，褚少孙所辑三类七十条龟卜法，内容涵盖十二类决疑事项，其中要点概括如下。

1. 条例以“卜”、“命曰”、“此”打头的三类条款，可以分别与商、周卜辞的卜、贞、占三个环节相对应。

2. 条例所涉卜筮事项 1—4 与楚简卜筮事类相同，1—8 皆见于殷墟卜辞。

3. 卜又称“卜曰”，也见于殷墟及周原卜辞。既称“卜曰”，说明卜的过程不仅仅是指扬火灼龟获取卜兆的过程，同时也包括卜人或众占人^①对兆象及卜事的初步判断。“卜曰”类条例，如前举第十三、十六条正是包含了这样两个部分。

4. “命曰”商周卜辞称“贞”，命与贞都是“请问”的意思，是以疑虑的事项向神龟发问。但在《龟策列传》“命曰”诸条中，除上述问疑之事，还包括有“命兆”^②之辞。如上录第六条“命曰呈兆首仰足盼”即典型例证。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商周卜辞的相关成分。

5. “此”类条例的此，在商卜辞称“兹”，周卜辞称“由”，如商卜辞“兹用”（如《粹》710：大吉，兹用，不雨。《南坊》1.79：唯兹卜用）。周卜辞“由无咎”，皆卜人或占人占断卜兆或卜事的习惯用语。《龟策列传》“此”类条款应相当于商周卜辞的“占曰”之后的内容。但是以“此”打头的占断条款中，除占断事项以外，也包含对卜兆的断语，如上举第八条“此首俯、足盼、身节折”即针对卜兆所做判断，即所谓“繇辞”。由此也使我们分析认识商周卜辞的相关用语得到启发。

6. 条例中有关兆象的描述包括五个成分与一些相关内容：

(1) 身：身正、身节折；

① [汉]班固：《白虎通义·蓍龟篇》：“天子占卜九人，诸侯七人，大夫五人，士三人。”《仪礼·士冠礼》所记筮占过程有“旅占”一节，也是指众筮人对卦象的占断。

② 《史记·龟策列传》索隐，3251 页。

(2) 首(或头): 首仰、首俯、首上开、头见;

(3) 足: 足开、足胫、足发;

(4) 内外: 内外相应、有内无外、内高外下、外高内下、内外自举、内外自垂、内外自吉、内外自桥、内格外垂、内自举外自垂;

(5) 横吉: 横吉安、横吉上有仰下有柱、横吉榆仰、横吉上柱;

(6) 其他: 狐彻、狐貉、柱彻、外格、根格、载所、渔人、挺诈。

关于龟卜的兆象,郑玄已云“未闻”^①,可知“古卜书无传”。《龟策列传》以身、首、足、内外、横吉等对兆象做出种种描述,唐司马贞贬为“殆无足采”,其说是否正确,尚有待资料证明。但《龟策列传》称卜兆大者为身^②,并屡言“吉,呈兆身正”^③,亦在古籍和卜辞中,可得确证。《诗·氓》“体无咎言”,周卜辞“由有正”之“体”、“由”皆指兆身而言,并且均以卜兆兆体(身)正为吉兆。仅此一事,也可以证明《龟策列传》的价值不可低估。

二、《尚书·金縢》的龟卜程序

在先秦典籍中,有关卜筮的记述是常见的。如《左传》所载,往往仅记筮占的卦名、繇辞及吉凶而不及占卜过程。对龟卜过程及程序做出具体描述的,以《尚书·金縢》篇最完整、最系统。

《金縢》是《尚书·周书》的重要篇章,记武王克商之后身染病疾,周公作册书告神,请以自身代武王死,并以龟卜为武王祈福。事毕,将祝告之辞与龟卜获吉之事书于册,藏于金縢之匮。后武王崩,周公摄政,为流言所谤,成王开匮启册以弭谤言,史官叙其事而作此篇,名为《金縢》^④。

在此,我们将以此篇为例,试将其所记龟卜过程分作几个环节,依次进行录引并做出简单说明(以下所录为各环节的主要部分,全文参见附录四)。

1. 叙其时与其事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为功。”

这一节记武王克商的第二年身染病疾,不能参与政事。太公、召公说王病当敬卜吉凶,周公认为不可以武王病疾使先王忧心,于是请求以自身代武王死。

2. 为位诏号

“为三坛同墠,为坛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

①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郑注,1947页。

② [汉]司马迁:《史记·龟策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3250页。

③ 参见附录三《龟策列传》龟卜条例“卜”类之13、14条。

④ 参见《尚书·金縢》开篇处孔安国传与孔颖达疏。[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96年,187页。

这一节记周公在郊外除地为坛,植苍璧,执桓珪以为贄,并诏告三王。

3. 祝祷命龟

“史乃册,祝曰:‘惟尔元孙某,遭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无坠天之降宝命,我先王亦永有依归。今我即命于元龟……’”

这一节记史官奉祝告之策,太祝祝祷说,元孙武王遇疾,尔三王有慈爱子孙之责,请代为请命于天,旦(周公)愿以已代武王之身。……。不可坠失上天所降大命,使我先王永远有所依归为宗庙之主,故命于大龟兆示吉凶。

4. 卜龟旅占

“乃卜三龟,一习吉。”

这一节记连续灼灼三龟,又因袭灼灼一龟(或骨),众卜人皆判断获得吉兆^①。

5. 占卜

“启籥见书,乃并是吉。公曰:‘体,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终是图……’”

这一节记周公开启太卜三兆卜法之书,也肯定三龟一习都是吉兆。周公占断说,兆体所示,武王的病并无大碍。我小子(周公自称)新受命于三王,武王也长终天年。

6. 应验

“王翼日乃瘳。”

这一节记卜之次日,武王的病就痊愈了。

通过以上录引以及参照《传》、《疏》所做的说明,由叙其时其事、为位诏号、祝祷命龟、卜龟旅占、占卜、应验六节,构成灵龟占卜的全过程。由此六节,我们可以与殷周卜辞及文籍所见相关内容互参互证,可以使我们对古代卜法的认识更为系统。

1. 上述第1项、第2项、第5项、第6项可与殷墟卜辞的前辞、命辞、占辞、验辞相对应;

2. 上述第3项、第4项、第5项可与《龟策列传》的“命曰”类、“卜”(卜曰)类、“此”类相对应。

3. 第3项祝祷命龟,与殷卜辞命辞部分相比,殷卜辞只包含了问卜稽疑的事由(如:受年与否、雨或不雨、啓或不啓),这里还包含了命龟呈兆(今我即命于元龟)的内容,这与《龟策列传》“命曰”类的内容相同。另外,这一节又包含祝祷的成分,这一点又可与周原

^① [清] 胡培塿:《仪礼正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21页;[清] 陈立:《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7年,332页。

卜辞命辞的诏祭册告部分相印证(详后文)。

4. 第4项卜龟旅占,“卜用三龟,一习吉”,相关的内容在殷卜辞、楚卜筮简都有类似记录。学界对此争议很多^①。三龟指多数,有关资料说明这种卜用多龟,或三、或五、或七、或九都是奇数。其卜人或占人也应是以三、五、七、九组成的,即所谓“旅占”^②。如此,才可能有“三占从二”的卜筮规则。

5. 第5项占卜,是指对众卜人旅占结果的最终判断。《金縢》中这一环节由周公承当,殷卜辞则由王(王卜辞)、子(非王卜辞)承当。云“并是吉”是周公对旅占的总括。“公曰体”,体下似有缺字,应是与《氓》诗“体无咎言”一类的话,是对卜兆总的断语。“王其罔害”,是对占卜事项“王有疾”而言。所以这一部分包含了对卜兆与卜事两个方面的判断。这为我们探索商周卜辞的相关内容有启示的意义。

6. 第2项为位诏号,是古代卜筮祭祷之礼的两个仪节。《周礼·小宗伯》:“凡王之会同、军礼、甸役之祷祠,肆仪为位。”孙诒让《正义》:“凡经云为位者,不在宫庙,则为坛位。”《士冠礼》云“筮于庙门外”,古代宗庙诸礼的卜筮之位,均在庙门之外。而非宗庙常礼的卜筮祭祷之礼,则在郊外设坛为位。《金縢》为王病卜筮祭祷则属后者。

《周礼·春官·小宗伯》:“若国大贞,则奉玉帛以诏号。”郑注“号,神号、币号”,是对所祀的神、所献的币(玉帛牺牲)的美称。疏:“凡卜,必就鬼神以卜,故有神号。”《金縢》之“太王、王季、文王”即神号,“璧”、“珪”即币号。因这种卜筮的目的是祈福攘灾,诏号是卜筮之前告神、礼神的举措,是为了求得神的佑助、获得吉利卜兆的重要仪节。这种诏号的仪节,在楚卜筮简文中已成为必有的环节,在周原卜辞中也有类似的数据(详后文)。

三、楚卜筮祭祷简文的卜筮程序与兆辞

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急剧变革,思想文化空前繁荣的时期。楚卜筮祭祷简文表明,维系宗法社会的种种礼乐制度正经历着激烈变化,僭越现象屡见不鲜。但是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祝祷与祭祀的相关内容。而卜筮制度本身,一方面仍然承袭了前代的传统^③,同时又有所发展。本文仅就简文所见的完全程序化的卜筮程序,以及其中关于卜筮兆象(卦象)的表述,做出初步归纳与分析。

(一) 楚卜筮简文的卜筮程序

楚卜筮简文所记的卜筮程序,已有学者进行过研究。《包山楚简》^④一书在《包山二号

① 殷卜辞有一卜、三卜、五卜记录,又有二卜、四卜、六卜的记载,相关的研究成果表明,商代的龟卜以三卜制为主,并逐渐形成规范化、制度化龟卜法(详见《甲骨学一百年》,207页)。

② 于成龙:《楚礼新证——楚简中的纪时、卜筮与祭祷》,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59—66页。

③ 李学勤:《竹简卜辞与商周甲骨》,《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83页。

④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年。

《楚墓简牍概述》有系统说明：

“卜筮简一般包括前辞、命辞、占辞、祷辞和第二次占辞等部分。”

“前辞是简文的起首部分,包括举行卜筮祭祷的时间、贞人名、卜筮用具名称和请求贞问者的姓名。”

“命辞即贞问的事由。”

“占辞是根据卜筮的结果所做的判断。占辞一般先指出长期之休咎,然后再指出近期的吉凶。”

“祷辞是为了解除近期内的忧患向鬼神祈祷,请求保佑赐福之辞以及可以解脱忧患的鬼神及办法。”

“第二次占辞是在祭祷鬼神之后,根据鬼攻的指示可认为是对鬼怪的责让所做的第二最后判断。”

《包山楚简》对战国楚人的卜筮程序的概括是古代卜法与筮法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我们从中获得很多教益。如：

1. 前辞中记卜筮的时间更为详尽,商周卜辞只有干支日,简文则年、月、日俱全。
2. 前辞中记有卜筮所用筮草与卜龟的名称这是商周卜辞所不及的^①。
3. 前辞中又记为何人卜何事,相关内容也不见于商周卜辞^②。

我们通过对楚人卜筮数据与古代文籍及商周卜辞的比较,对以下几点尤为关注：

1. 楚人卜筮简文的前辞皆有贞而无卜。这与殷墟卜辞前辞惯用的“干支卜某贞”显然不同,但与《尚书·金縢》是一致的,周原卜辞也存在类似的前辞形式^③。

2. 凡一事多卜(或筮)的,每一卜(或筮)则更换一个贞人,更换一种工具。如《包山》226—235、236—248,是在同一天(己卯)为同一人的两件事(侍王、疾病)进行的十轮龟卜(或筮占)。两事各五辞,皆三卜二筮。《包山》此两事各五次卜筮的排序是相同的,都是卜一筮一卜一筮一卜;两事各五辞所见的贞人是一致的,即盭吉、陈乙、观繆、五生、许吉;两事各五辞的卜筮工具也是相同的,即保彖(龟)、共命(草)、长灵(龟)、丞德(草)、驳灵(龟)。

3. 与《龟策列传》、《尚书·金縢》相比,此前学者对楚人卜筮程序的归纳,在命辞与占辞之间缺少卜即灼龟、揲蓍的环节。《龟策列传》卜法有“卜”类34条,《尚书·金縢》有“卜用三龟一习吉”的仪节,在楚人卜筮中这个环节也是存在的,在筮占简文中这个部分表现为数字卦象^④,在龟卜资料中相应的兆象却省略了(详后)。如：

大司马邵懿楚邦之师徒以救郢之岁,留居之月,己卯之日,盭吉以保彖为左尹
 佗贞：出入侍王,自留居之月,以庚集岁之留居之月,尽集岁躬身尚毋有咎? 占之恒

① 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东方出版社，2001年，271页。

② 李学勤：《竹简卜辞与商周甲骨》，《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82页。

③ 凤雏 H11：1。参见曹玮《周原甲骨文》，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

④ 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贞吉……

《包山》226

大司马邵懿堡楚邦之师徒以救郢之岁，留居之月，己卯之日，陈乙以共命为左尹
 旽贞：出入侍王，自留居之月，以庚集岁之留居之月，尽集岁躬身尚毋有咎？𠄎。占
 之恒贞吉……

《包山》228

如上述，这组简文三卜二筮共五辞，这里仅节录一卜一筮的相关部分以示其例。226 为龟卜，占辞以前缺记兆象。228 为筮占，占辞以前记有卦象。这里的卦象相当于龟卜灼龟所获的卜兆。说明楚卜筮简文中也应包含“卜”这个环节。

4. 《周礼·小宗伯》记“若国之大贞，则奉玉帛以诏号”是卜筮之前告神、礼神的仪节。《金縢》所记，这个仪节在命龟之前，这一点在周原卜辞也得到证明（详后）。在楚卜筮祭祷简文中，祷祭告神、礼神的环节却在第一个占辞之后，第二个占辞之前。如：

（此简“占之”以前的部分从略，见前面录文）占之恒贞吉，小有忧于宫室。以其故说之。举祷宫、行一白犬、酒食。思攻叙于宫室。五生占曰：吉。

《包山》228—229

这表明，到战国时代，祝祷诏号的仪节已移至第一占辞之后，对于周代以来的卜筮之礼已有了更革。这起码在楚地是如此的。

（二）卜筮简文中的兆辞

1. 命辞与第一占辞中的兆辞

表十 命辞与第一占辞中的兆辞

占卜事由	命辞	占辞	出处
侍王 病疾	尚毋有咎 尚毋有咎 尚毋有祟	占之恒贞吉 占之吉无咎无祟 占之恒贞吉	《包山》226 《包山》235 《包山》236
侍王 病疾 居室	尚自利顺 尚无有咎 尚宜安	占之恒贞吉 占之恒贞吉 占之无咎无祟	《天》1—01、02 《天》3—01、02 《天》15—01、02
返归	尚毋有咎	占之卦亡咎	《新》甲三 229 甲—12
集岁	尚毋有咎	占曰卦亡咎	《新》乙四 122

参照上列占辞的形式，一些残辞中的类似者可能也应归入第一占辞如：

占之君卦亡咎。

《新》甲三 48

卒岁贞，占之卦亡咎。

《新》乙四 38

占之恒贞亡咎。

《新》零 201

占之卦亡咎。

《新》甲三 218

2. 第二占辞中的兆辞

举祷子西、君夫人各戠牛，饗，延钟乐之。定占之曰：吉。 《新》甲三 200

……赛祷新母戠豕，饗之，豔吉占之曰：吉。 《包山》215

3. 习卜占辞中的兆辞

习之以大央。占之：吉。

《新》甲三 208

习之以龜灵。占之：吉。

《新》甲三 192、191-1

参照上列二占、习占辞例形式，一些残辞中的类似者可能也应归入此两类占辞。如：

占之曰：吉。

《新》甲三 71

占之：甚吉。

《新》甲三 181

新蔡简“卦亡咎”与《诗·氓》“体无咎言”意思完全一样，都是对兆体的判断。由此证明，包山、天星观、望山简第一占辞的“恒贞吉”，也是对兆体而言的。恒有常义^①，贞在这里字义为正^②，“恒贞吉”的意思，可以理解为“卜筮常法体正为吉”。

占辞虽是对卜兆、卦体的判断，也与贞辞的内容直接相关。占辞的“兆亡咎”，“恒贞吉”与贞辞“尚无有咎”、“尚自利顺”是前后呼应、密切关联的。贞辞的“无咎”、“利顺”可能都是命兆与命事的双关语，既祈请卜兆卦体要顺（利顺）、要吉（无咎），又希望卜事顺畅祯祥。第二占辞与习占之辞是第一占辞的简化，故意义也应是双关的。《龟策列传》：“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其中从、顺、吉都是针对卜兆、卦象而言的。这与楚简的利顺、无咎、吉的性质是一致的。

四、周原甲骨的卜辞结构

所谓卜辞结构，是指卜辞记录程序的各部分及相互关联。殷墟卜辞数据丰富，卜、贞、占、验四种成分及结构组合，大家都已烂熟于心。目前所知的周原卜辞，数量少，刻辞简单，数据零碎，罕有整篇完辞。因此，在考察周人卜辞的记录程序及内容时，就必须参照传世与出土文献数据的相关知识，去诠释数据，启发思路，以便从中获取有价值的认识。我们对周原卜辞的下述研究，就有赖于以上对《龟策列传》、《尚书·金縢》所获的一些研究成果。

在下面的讨论中，拟选择与卜辞结构成分相关的关键用词“贞”、“卜曰”、“卧曰”作为

① 王明钦：《湖北江陵天星观楚简的初步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89年，35页。

②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年，53页；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254页。

主要特征,并以卜辞中惯用的词语“由有正”、“由无咎”等为辅助性标志,将周原卜辞的结构分成三个部分。

(一) 贞 辞

是以贞字引领的命兆与问疑之辞。

20 世纪 70 年代发现于陕西岐山凤雏村与扶风齐家村周人甲骨^①,因总量不多,破损严重,卜辞用语又多有省略,已知的贞辞中,有的一片上面仅有一个“贞”字(《周原》H11:10)或“王贞”(《周原》H11:167)这样简单的词语。辞例较完备的只有五版,即《周原》H11 之 1、82、84、112、174,兹录文于下。其中惯用的假借字如又借为有、佑、侑,左借为佐等,录文一律用借字,不再一一说明。

癸巳,彝文武帝乙宗贞:王其诏祭成唐,鬯赞且二女,其彝血牲三、豚三。由有正。
《周原》H11:1

□□彝文武□宗贞:王其诏禘□天□典,嘏周方伯赞。白正。亡佐于受,王受有佑?
《周原》H11:82

彝文武丁宓贞:王翌日乙酉其来,再方人□武丁,豊□□盥卯。思正。不佐,王受有佑?
《周原》H11:112

贞:王其来侑大甲,嘏周方伯赞。白正,不佐于受,有佑?

《周原》H11:84

贞:王其□用。胃玄千□,胃乎来□。白不悔^②,王□?^③

《周原》H11:174

如上录《周原》H11:1、H11:82、H11:112 三辞,贞字以前的叙辞(前辞)部分,包括干支日(《周原》H11:82 的干支日已残,《周原》H11:112 略去干支日)与地点(文武帝乙宗、文武丁宓)。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干支日下没有卜字,并且在周原卜辞中尚未发现卜、贞同辞的辞例。

上录卜辞贞字以后的部分,我认为全都属于命辞。这个部分又包含了以下几个成分:

1. 诏号。是在命兆、命事之前的告神、礼神的仪节,即《小宗伯》“若国大贞,则奉玉帛以诏号”。上录卜辞的“诏祭成唐”、“诏禘□天”、“来侑大甲”、“鬯赞且二女,其彝血牲

^① 陕西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 年第 10 期;《扶风县齐家村西周甲骨发掘简报》,《文物》1981 年第 9 期;陕西西周原考古队、周原岐山文管所:《岐山凤雏村两次发现周初甲骨文》,《考古与文物》1982 年第 3 期。

^② 曹玮将此字释为“女”(见《周原甲骨文》5 页),王宇信为妥(见《西周甲骨探论》97 页)。古女、母、每常通作,母、每为双声叠韵。我们认为此字应读为悔。

^③ 此五辞的释文是杨莉同学与我在葛英会先生的辅导下完成的,其中释诏、释赞、释正、释佐是我们理解这些卜辞的几个关键词语。

三、豚三”与“𠄎周方伯𠄎”^①,就是诏号礼神的记录。其中“诏”,就是诏告的意思。成唐、大甲是神号,𠄎(古代指玉帛、牺牲)𠄎、𠄎、豚等是币号。

2. 命兆。即命兆之辞。上录卜辞的“由有正”^②(或“由正”),我们认为即命兆之辞,此与《龟策列传》“命曰呈兆”是同例语,其“呈兆身正”与上录卜辞的“由有正”的语义是相同的,都属于命辞中命兆的成分。即希望神龟呈现正直的吉兆。

《周原》H11:174 的“由不悔”我们认为也是命兆之辞,是与“由有正”同类的卜法用语。悔可以读为晦,指兆色(即兆气)而言。《洪范》有“七卜”^③讲卜、筮的方法,其中“五卜”讲龟卜卜兆爆裂发出的兆气。《春官·占人》讲占龟时不仅占兆体,还要占兆色。郑注说色指兆气,还说色有善恶^④。“由不悔”是命龟要发出善气,不要发出恶气、晦气。

3. 命事。即决疑的事由。上录卜辞的“不佐于受”、“王受有佑”,我们认为即命事之辞。义为不佐助商王受,能不能得到神的佑助^⑤。

(二) 卜 辞

周原卜辞有以“卜曰”引领的成分,即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卜辞。

周原卜辞有“王卜”(《周原》H11:38)、“己酉𠄎”(《周原》H11:128)、“乙卯𠄎”(《周原》H11:127)等辞例,不仅不知道“𠄎”是否为卜字的繁体,同时也因为例辞不完整,所以对认识与卜相关的卜辞成分毫无帮助。含有“卜曰”而且辞例较完备的只有三例,兹录文于下:

唯衣(殷)鸡(箕)子来降,其执(𠄎),𠄎(暨)史在旃尔卜曰:南宮𠄎其乍。

《周原》H31:2

□乎宝卜曰……

《周原》H11:52

以上两辞的前辞部分都未见记卜的时间,但都记有卜人,前者为史,后者为宝。《周原》H31:2又记有卜筮地点“在旃尔”,并兼有叙事“殷箕子来降”。特别引起我们关注的是两辞皆言“卜曰”,而不是“卜贞”,所以“卜曰”之后的词语似不能看作是问疑之辞(即命辞)。

《周原》H31:2辞末有“其乍”二字,“乍”也是周原甲骨习见的用语。如:

□,其乍。

《周原》H11:103

乍,夭大。

《周原》H11:24

① 这里的𠄎,王宇信先生释征伐,陈全方先生释册命,李学勤先生释册告(参见曹玮《周原甲骨文》前言的综述)。

② 由,卜辞作𠄎,李学勤释为思。正或释为正长之正。或释足,义为牺牲丰足,也有人认为是牺牲头足完全(参见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50—51页的综述)。

③ 《尚书·洪范》:“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

④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2000年,1960页。

⑤ 此从徐锡台释,见《周原卜辞十篇选释及断代》,《古文字研究》第六辑,401页。

大乍,其于九賛。

《周原》H11:59+118

其有大乍,其……

《周原》H11:12

“其乍”与“乍”、“大乍”、“其有大乍”是同义语,只是表达语意的程度略有不同。“其乍”这个惯用语词出现在“卜曰”之后,目前只有《周原》H31:2一例。其他数例是否属于“卜曰”的内容,尚不能论断,暂附于此。这个“乍”,我认为应读为“祚”。《说文》:“祚,福也。”可引申为赐福,又可解释为帝祚,即大宝之位。周原甲骨之“乍”极可能与祈福文王(或武王)灭商践祚有关。“其乍”、“其有大乍”,与下述“由亡咎、由亡眚”语义相近,不过是一正一反,有祚既无咎、无眚。

八月辛卯卜曰:其瘳取隻,其五十人,往。由亡咎。《周原》H31:3

小告于天,由亡咎。

《周原》H11:96

祠自蒿于壺,由亡眚。

《周原》H11:20

辛未王其逐虚蒙,由亡眚。

《周原》H11:113

“由亡咎”是周原卜辞的一个惯用术语。这个术语可能有双重意义,既指兆体亡咎,也指所卜之事亡咎。“亡咎”也称“亡眚”,都是无灾的意思。《说文》:“咎,灾也。”《易·讼》“人三百户无眚”,《经典释文》引马融云:“眚,灾也。”

由上录《周原》H31:3,可知“由亡咎”这个惯用语系于“卜曰”之后,所以“由亡咎”、“由亡眚”可能是以“卜曰”引领的卜辞成分的惯用术语。这个推测有待更多资料加以验证。

另外,“卜曰”之辞的“由亡咎”、“由亡眚”与“命”辞中“由有正”、“由不悔”相呼应,都是针对兆象而言的专用术语。楚卜筮简文屡称“卦亡咎”即此。

据上可知龟卜过程的卜,不应仅仅理解为扬火、灼龟以取得卜兆的过程,还应包括卜人(或占人)对每卜所获卜兆以及占卜事由的初步判断。卜又作“卜曰”,在辞例上也说明了这一点。

(三) 占 辞

周卜辞占称“𠄎曰”^①,是以“𠄎曰”引领的一种卜辞成分。

旨^②曰:其□。𠄎曰:已。

《周原》H11:5

隧弑,由亡咎。𠄎曰,母(节录)

《周原》H31:4

《周原》H31:4“𠄎曰”之前为“由亡咎”,如上所论,“由亡咎”可能是“卜曰”成分的惯用术语,由此大致可以推定此“𠄎曰”之前应是“卜曰”的部分。《周原》H11:5后有“𠄎

^① 王宇信:《邢台南小汪西周甲骨出土的意义》,《史学月刊》1999年第1期;裘锡圭:《从殷墟卜辞的“王占曰”说到上古汉语的宵谈对转》,《中国语文》,2002年第1期。

^② 曹玮将此字释为“旨”。见《周原甲骨文》,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5页。

曰”，则前面的“旨曰”不可能是占辞。我们推测似是“卜曰”之辞，旨与上录《周原》H11：52“口乎宝卜曰”的宝，应是卜人或占人。以“卧曰”引领的还有两例：

卧曰：已。

《周原》H11：76

卧曰，并，由克事。

《周原》H11：6

《周原》H11：76的卧辞与上引《周原》H11：5相同，皆为“已”。另外《周原》H11：141有“弼已”，龟版已残，它的上面可能为“卧曰”，只是推测而已。已与弼已是正反相对的占断之辞。此占辞已字意义的取向不明。由于周原卜辞“卧曰”之辞过于简略，相关几例的内容皆不能明晰。

五、殷墟卜辞的结构分析

卜、贞、占、验是殷卜辞对占卜过程的完整记录。“卜”字之前以干支记时（如：甲子卜）；“贞”字之前为贞人名（如：宾贞），有时贞人名省略不记；“贞”字之后为问疑的事由（如：今夕雨？）；“占”字之后是占断结果，王卜辞一般为“王占”，非王卜辞一般是“子占”；验辞是占断之后的应验情况（如：之夕允雨）。

对殷人所记的这类卜辞，学界习惯把“干支卜某贞”的部分称作前辞（或叙辞），“贞”以后的部分称作命辞，“占”以后的部分称作占辞，而把应验的情况称作验辞。

所谓前辞或叙辞，是指记录占卜过程之前的叙事之辞，是对占卜事项的总括，而与具体的占卜过程无关。

如果对卜辞前辞这样的理解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以下两个问题则值得关注。

1. 前辞有多种形式，其意义是否完全一致；
2. 命辞与占辞之间有无龟卜的“卜辞”。

以上两个问题关系到卜辞整体结构与各部分内容的理解，兹分别加以讨论。

（一）关于殷卜辞的前辞

殷卜辞的前辞形式不是单一的，具有多样性特征。这里选择代表性辞例录文于下：

癸酉卜古贞：旬亡咎？

《甲》2122

壬子卜贞：王其田，亡戕（灾）？

《粹》961

癸卯贞：旬亡咎？

《粹》1454

甲申卜曰：贞彘往……

《录》572

戊午卜：帚石嘉。

《乙》5405

以上五例中，第一辞是前辞的完备者，第二辞略去贞人名，第三辞略去卜字，我们将其归为一类，即均以“贞”字引出下面的问疑之辞，我们在辞的末尾均加问号。第五辞的干支卜，第四辞的干支卜曰（“卜曰贞”之“贞”不属前辞部分，详后），前辞部分都有卜无贞，

均以“卜”或“卜曰”引出下面卜人对卜兆或卜事的初步判断,即真正的“卜辞”部分(详后)。在前辞中以“卜曰”开头的辞例(如《录》572)与“卜贞”开头的辞例(如《粹》961)是有区别的。这可以从以下的辞例中得到验证。

丙午卜,在商贞。	《合》36501
丁卯王卜,在朱贞。	《合》36743
丙子卜,王在夹卜。	《合》24239
丁卯卜,王在沚卜。	《文》557

以上四例学术界认为都属于前辞部分。但是,尽管四例都以“干支卜”开头,但随后地名之下前两例为贞,后两例为卜,说明前辞中贞与卜(如上录《粹》1454的“干支贞”、《乙》5405的“干支卜”)的意义是不一样的,由贞字引领的是问疑之辞,由“卜”字(或“卜曰”)引领的是卜人对卜兆与卜事的判断。只有在卜、贞同在(即干支卜某贞或干支卜贞)的情况下,“卜”字才是对卜事的总括,即所谓叙辞,此外的“卜”或“卜曰”则应指卜人灼龟时对卜兆、卜事的分析与判断。

(二) 关于殷卜辞“卜”的环节

命龟、卜龟、占龟作为龟卜卜法的一般程序与主要环节,是大家公认的^①,但在殷卜辞的记录规范中,往往命龟的部分与占龟的部分相连而缺少卜龟的部分,但这个部分作为龟卜的中心环节,是必不可少的。

1. 先贞后卜

庚辰贞:其耋生于妣庚、妣丙?在祖乙宗卜。	《拾》1.10
丁未贞:衷今夕酺御?在父丁宗卜。	《掇续》64
癸丑卜行贞:今夕亡咎?在𠄎卜。	《佚》271

以上先完整地记录了命辞,然后记录在某地卜,命龟与卜龟的顺序十分明白。

壬午卜癸贞。卜:祟,在兹入有不若。	《存》1.1648
丁丑卜大贞。卜:有祟其于王。	《人》1469

以上两辞命龟部分已经略去,而卜龟部分则有完整记录。先贞后卜的顺序仍然十分明白。

丁丑卜癸贞:勿𧇑岁?卜:有祟𧇑。	《明》279
------------------	--------

这是一例命龟之辞与卜龟之辞都完具的辞例,于我们上述对前辞的分析,及先贞后卜的顺序的判断都是有力佐证。

^① 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194—203页。

2. 卜龟之辞针对命龟之辞

戊辰卜：王曰贞其告、其陟，在䷗卜。

《文》709

甲申卜曰：贞彘往……

《录》572

上录两辞“卜”、“卜曰”之后有“贞”与“王曰贞”。我认为不应把这里的“贞”、“王曰贞”归入前辞，而应看作卜人在灼龟取兆时复述命龟的事项，故两辞“贞”的内容都列于卜（或卜曰）之后，其属于卜龟的内容是可以肯定的，这可由以下两点予以说明：其一，“卜曰”是卜人说的话，这与“干支卜贞曰”（如：《甲》2498 己未卜贞曰）是完全不同的。“贞曰”以后的部分是命龟之辞，“卜曰”以后的部分是卜龟之辞。其二，卜龟之辞除对兆象的说明以外，主要是针对命辞中问疑事由所做的初步判断。上录两辞“卜”或“卜曰”之后“贞”的内容似乎应做这样的理解。其三，《文》709 之“在䷗卜”，也说明“王曰贞”是“戊辰卜”的内容。

3. 占龟之辞针对卜龟之辞

壬戌卜，宾贞。王占卜曰：子昌其唯丁媯，其唯不其嘉。

《库》1535

丙申王服占光卜曰：不吉，有祟，兹……。

《遗》620

上录卜辞的“占卜曰”、“占光卜曰”，其中“光”是卜人的名字，所谓“占卜”都是占人（王）针对卜人卜龟的初步判断做出的终结断语。《金縢》“卜用三龟”，其中三是指多数。古人一事多卜，往往连续用多个龟版、多种筮策进行卜筮，每次卜筮又有多人对卜兆、卦象进行判断。这个过程《仪礼》中称作“旅占”，是卜龟或揲蓍的过程。《洪范》所说“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是占卜的主人从多次占卜与多数人的判断中，得出占卜的最终结果。这个过程就是占龟，其结论称为占辞。上录两辞“占卜曰”就是占龟的记录。

六、小 结

古代卜筮之法多散见于《尚书》、《三礼》、《春秋》等先秦典籍，以及《史记·龟策列传》、《白虎通义》等汉代文献。

本文从褚孙所补的《史记·龟策列传》入手，对其龟卜条例进行归纳与研究，然后又分别对《尚书·金縢》、战国楚简、周原卜辞、殷墟卜辞的相关资料尝试进行整理与探索。

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1. 《史记·龟策列传》所记卜法的程序、名称、占卜习俗和占卜内容等，与商周甲骨、楚卜筮简、《尚书·金縢》等虽略有区别，但基本规则大体相同。这说明《史记·龟策列传》记载的内容应有所根据。

2. 从古籍与出土材料记载的情况来看,商、西周、东周时期的龟卜卜法,随时代的不同而略有变化,但整体内容基本一致。

3. 楚人卜筮简前辞皆有贞而无卜,这与殷墟卜辞前辞惯用的“干支卜某贞”显然不同,但与周原卜辞及《尚书·金縢》都是一致的。殷墟卜辞在卜、贞同在的情况下,“卜”字是对卜事的总括,而与具体的占卜过程无关。周卜辞的“卜”或“卜曰”是指卜人灼龟与对卜兆、卜事的分析与判断。

4. 龟卜过程的命龟、卜龟、占龟三个主要环节均包含卜兆与卜事两个部分。即命龟一节含命兆、命事两项内容;卜龟一节既有对兆辞,又有对卜事的初步判断;占龟一节则是就众人关于兆象、卜事两个方面的初步判断做出的终结断语。

5. 楚卜筮简文记录卜筮的环节,只有筮占简在命辞与占辞之间记有数字卦象,而龟卜简的相应位置则缺记对龟卜兆象的描述。但无论是筮占还是龟卜,虽在这个环节存在记卦象而不记兆象的差别,但就同一事由的命辞与占辞则完整一致。说明在楚简中,筮占的命兆之辞与占兆之辞也可以视为龟卜的命兆之辞与占兆之辞。

第七章 结 语

本文对先秦时期卜用甲骨的考古学文化背景进行了系统梳理,在这个时空框架下,考察了卜用甲骨的整治方式、钻凿形态以及行款走向等问题,进而对先秦时期卜法的起源、内容及衰落等进行了研究。兹将主要收获条述如下。

1. 卜用甲骨的类别与时地考察

目前所知的考古材料表明,新石器时代至夏代只有卜骨,没有卜甲。卜骨的出现顺序应为羊肩胛骨→猪肩胛骨→牛肩胛骨。

仰韶文化晚期已经用兽类肩胛骨进行占卜,但出土数量极少,仅见羊肩胛骨一种。

出土所见龙山文化早期的卜骨数量亦极少,龙山文化晚期卜骨数量有所增加,占卜习俗开始流行。从总的情况看,龙山时期牛、猪、羊肩胛骨兼用,仍以羊肩胛骨为多。从出土卜骨材料的时空分布来看,卜骨取材也不一致:北部内蒙古和山西地区以猪肩胛骨为主;西部陕西和甘肃地区以羊肩胛骨为主;东部山东地区以牛肩胛骨为主,且出现年代最晚。中部河南和冀南地区则兼用牛、猪、羊的肩胛骨,靠近西部的王湾三期类型羊肩胛骨多见,靠近北部的后岗二期类型猪肩胛骨多见,靠近东部的造律台类型牛肩胛骨为主。

到夏代,即二里头文化时期,卜用甲骨地域分布更广,出土遗址较多,数量也大为增加。与龙山时期相比,夏代各文化之间互相交流更频繁,卜用牛、猪、羊肩胛骨诸文化都常见。

与夏代相比,商代早期占卜习俗更加流行。除卜骨外,还出现了卜甲。目前所知,卜甲最早在郑州南关外遗址中发现。商代卜骨和卜甲兼用,中心地区使用更为普遍。现已发现的商代卜用牛肩胛骨,数量远远超过夏代,已经代替猪、羊肩胛骨占据首位。卜用龟甲以腹甲为主,背甲仅为腹甲三十分之一。

西周早期的卜用甲骨逐渐减少,年代属西周晚期以后的已很少见。西周卜用甲骨中牛肩胛骨仍然占绝大多数,其他兽类肩胛骨很少见。卜甲仍以腹甲为主,背甲极少。与商代相比卜甲也减少了很多。

2. 整治方式

(1) 卜骨

先秦时期卜骨的整治方式大致可分为7型(A—G型)。新石器时代至夏代卜骨的整

治方式较简略,夏代晚期卜骨开始初步修治,商周时期卜用甲骨的整治方式逐渐程式化。商代早期卜骨的一些整治方式,如切去骨脊、掏挖骨反面骨臼下部等,可能受北方地区如朱开沟文化、神木文化、游邀类型等文化的影响。切去臼角的整治方式最早见于中商时期,商代晚期普遍流行,在西周时期与殷遗民有关的遗址中也可见到。

先秦时期中心地区主要以牛肩胛骨为例,整治方式的演变过程总结描述如下:

A 型 I 式(新石器时代)→A 型 II 式(夏代早期)→C 型、B 型 I 式(夏代晚期)→B 型 II 式(商代二里岗下层)→D 型(商代二里岗上层)→E 型(商代中期)→F 型(商代晚期)→G 型(西周时期)。

(2) 卜甲

商代早期,均为腹甲,未见背甲。商代中期,腹甲、背甲均用,台西类型的背甲多为完整的,曹演庄类型的多切成两半。商代晚期和西周时期,腹甲、背甲均用,背甲均切成两半,其中商代晚期以背甲中线为界锯开,而西周时期以齿缝作为边缘。另外,殷墟一期有的修整较多,形成近似鞋底状。

商周时期甲桥的整治方式最为典型,商代早期时只保留甲桥内侧,露出竖行齿缝,商代中期至西周时期除个体较小的龟甲外,均保留甲桥内外侧。商代中期甲桥和甲腹之间呈锐角,商代晚期时甲桥和甲腹之间呈直角或钝角,西周时期与商代中期类似。

商周时期一些甲骨上有小钻孔,商代中晚期多见于甲桥中间,西周时期多见于甲桥前后端。甲腹的中间、背甲上(鞋底形)、卜骨的扇部中间偏下和骨面也偶然可见。

此外,西周早期甲首掏挖后留下半圆形的前端,留有宽约 0.5 厘米的边棱,其下削磨平整,留下的腹甲较厚,有的甲首前端中间有一方形或圆形的浅穴,与商代有别。

以中心地区的龟甲为例,整治方式的演变过程可总结如下:

腹甲: A 型(商代早期)→B 型(商代中、晚期)→C 型(商代晚期)→D 型(西周时期)。

背甲: A 型 I 式(商代中期)→B 型 I 式(商代中、晚期)→B 型 II 式、C 型(商代晚期)→B 型 III 式(西周早期)→A 型 II 式(西周中晚期)。

3. 钻凿灼形态

(1) 卜骨

新石器时代直接施灼,无钻无凿,灼痕数量不多。羊的肩胛骨很薄,灼痕都较小,且甚轻微;牛、猪肩胛骨比较厚,灼痕较大而深,不甚规则,较深重的灼痕,则透过背面,唯不甚明显,灼痕的数目及排列没有一定规律。龙山时期比较晚的卜骨灼痕分布较多而密集,一般有 10—20 个,最多者达 54 个。新石器时代卜骨的圆形灼痕,多位于骨正面中部略凹处较薄的部位,少数位于骨反面。龙山晚期晚段开始出现同一卜骨正反两面施灼的方式,夏代逐渐广泛使用,商周时期则成为定制。但许多卜骨,尤其猪、羊肩胛骨,仍然只在反面或正面施灼。

夏代大部分直接施灼,无钻无凿。灼点多见于肩胛骨的正面和反面,有固定的位置,正面位于骨中间偏下较薄处;反面位于骨中间较薄处偏上。有的猪、羊和鹿的肩胛骨,或只在正面较薄的部位施灼,或只在反面较薄的部位施灼。此外,龙山晚期晚段或夏代早期早段在反面骨脊上开始出现施灼的现象,夏代早期诸考古文化普遍使用,可能有些地区沿用至夏代晚期。但骨脊上施灼仍然不是主流,多数卜骨仅在正反两面有灼痕。

夏代晚期部分卜骨已经开始出现先钻后灼的现象。钻坑为不规则圆形圜底,形态较为原始,钻坑内施灼,反面留有明显的兆纹。在二里头类型、东下冯类型、牛角岗类型、游邀类型、岳石文化、先商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等诸文化均有发现。夏县东下冯遗址和巩县稍柴遗址出土的牛肩胛骨中的钻坑,可能年代最早,均属二里头文化三期。

商代二里岗下层时期也不见规整的钻坑,规整的圆钻出现于二里岗上层,为圜形底,坑内施灼,钻坑分布密集,可能受夏代晚期许多地区已经出现的先钻后灼的影响,但其整治方式更为进步,即在骨反面上部先刻出凹槽,再在槽中钻出圆坑。

到中商时,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钻凿灼形态,早商至中商早段的圆形圜底钻,分为两支,各自演变如下:(1)圆形圜底,坑内施灼(早商至中商早段)→圆形圜底,坑内或旁施灼(中商)→长圆形钻(凿的原始形态),圜底,旁施灼(中商)→弧角长方凿,圆或半圆钻坑,坑内施灼(中商);(2)圆形圜底,坑内施灼(早商至中商早段)→圆形平底,坑内施灼(中商)→圆形平底,坑内有猫眼状槽,槽旁施灼(中商)。

晚商时,卜骨大部分为弧形(枣核形)凿,凿旁施灼,有的凿旁有圆钻,位于凿的斜上方,坑内施灼;少数沿用中商的圆形平底,坑内有猫眼状槽,槽旁施灼,此种只见于殷墟一期至二期。

西周早期,钻坑为圆形,平底,坑内一侧有猫眼状槽,槽旁施灼。

西周中晚期,钻坑为圆形,平底,坑内一侧有猫眼状槽,槽旁施灼,开始出现三联钻。

(2) 卜甲

商代早期开始出现卜甲,二里岗下层时直接施灼;二里岗上层时,钻坑为圆形,圜底,坑内施灼;中商时,大部分为弧角长方形凿,圆形或半圆形钻,钻坑内施灼,少数圆钻,圆形,平底,坑内一侧有猫眼状槽,槽旁施灼;殷墟时,弧形(枣核形)凿,圆形或半圆形钻位于凿的斜上方,钻坑内施灼;先周时,方凿圆钻,凿长于钻;西周时期,均方钻方凿,早期时,凿长于钻,中晚期时,凿略长或等长于钻,先周西周时均在钻内施灼。

4. 钻凿灼排列

(1) 卜骨

新石器时代至商代早期,灼痕排列似无规律;中商时,同一骨版上钻凿多靠近两侧缘,灼位于钻或凿的内侧,左右对称;殷墟时,多数切去骨白,排列非常规律,同板卜骨的钻凿一律朝向同一方向,即朝向切去白角(颈侧缘)的方向,这样能推测左右两块肩胛骨成组,其排列左右对称;西周时,钻凿灼排列与中商类似,但更加严密。

(2) 卜甲

二里岗下层时,直接施灼,排列似无规律;二里岗上层时,有些卜甲以千里路和齿缝为界,分为几个部分,施钻灼;中商时,以千里路为界,两侧各有两或三竖列。其中最外一列钻多在凿的内侧,另一列或两列钻多在凿的外侧。殷墟时,以千里路为界,两侧各有两或三竖列。左侧凿在左边,钻在右边,右侧凿在右边,钻在左边,左右对称。周代,与殷墟大同小异,但左右甲桥内侧钻在槽的外侧,与甲腹钻凿排列相反。

5. 卜兆形状

(1) 卜骨

新石器至商代早期,兆纹无固定形状;中商时,真正出现控制好的兆纹,兆身与兆枝夹角近 90 度,同一骨板上,兆枝均向内;殷墟时,兆枝位于兆身斜上方,夹角为锐角,同一骨板上,兆枝均朝向臼角方向,左右两块肩胛骨成组,其排列左右对称;西周时,兆身与兆枝夹角近 90 度,同一骨板上,兆枝均向内。

(2) 卜甲

商代早期,兆纹无固定形状;中商时,真正出现控制好的兆纹,兆身与兆枝夹角近 90 度,同一卜甲上,以千里路为界,卜甲正面最外一列兆枝多朝向千里路,而另一列或两列兆枝多背向千里路;殷墟时,兆枝位于兆身斜上方,夹角为锐角,同一卜甲上,以千里路为界,兆枝均朝向千里路方向,其排列左右对称;西周时,兆身与兆枝夹角近 90 度,同一卜甲上,以千里路为界,兆枝均朝向千里路方向,其排列左右对称。

6. 殷商西周甲骨刻辞的行款

(1) 卜骨

通过对卜骨材料的系统梳理,兹分部位总结殷墟一至五期卜骨刻辞行款走向的演变规律。商代晚期较为典型的刻辞行款走向主要有:柄部一段或两段刻辞以骨中间为界下行而向外;靠近胸侧缘的多段刻辞均下行而向外;靠近颈侧缘和骨中间上端主要为两种,“下行而向胸侧缘”,“下行而向颈侧缘”,但其行款走向的方式相同,即迎卜兆;扇部多见长条刻辞,单列或复列下行。

西周时期的卜骨刻辞,远少于殷商时期。与殷商卜骨相比,最大的变化在于卜骨放置位置的变化。殷商时期,以骨臼向上为正,而西周时期除了较早阶段以骨臼向上为正作为过渡形态外,最为典型的是以骨臼向下为正和以骨臼左(或右)横置为正。其行款走向,根据卜骨的放置位置,均下行而左,与殷商时期左右对称不同。

(2) 卜甲

刻辞在卜甲上的布局,应该有较固定的位置,不同部位的行款走向也有各自的规律。按照甲首、甲腹、甲尾、甲桥等部位来分析卜甲刻辞的行款走向。商代晚期刻辞多数在甲腹,基本为下行而外,刻辞与兆枝位于兆身的同侧,迎向兆身。甲腹最外的卜兆兆身外侧

和甲桥内侧基本为下行而向外;左右上甲腹上段多为下行而内;左右下甲腹,多为长条刻辞。甲首的内板多数见于下行而向外,左右舌板多为下行而向内和单列下行。甲尾靠近千里路多为下行而向外,靠近边缘多为下行而向内和单列下行。甲桥内侧多为下行而向外,外侧多为下行而向内,也多见单列下行。

殷墟甲骨文一期偏早阶段,其整治方式、钻凿灼形态仍可见到中商时期的特征,行款走向也多受此影响,种类较多,如《花东》一书中卜甲刻辞的行款走向较为特殊,报告分为17种。以下几种现象在殷墟一期较为常见,不见于以后各期。如有的刻辞字体较大,围绕多个卜兆,所占面积较多。字数较多,多下行而向外,或布满甲首和甲腹上段,或布满上甲腹、下甲腹,或布满甲腹下段和甲尾。在个体较小龟甲上,常见从甲首至甲尾单列下行的长条刻辞;个体较大的龟甲上,常见单行或多行横向排列的长条刻辞。有些单列下行的长条刻辞,下端沿甲首或甲尾齿缝方向下行而向内。同板刻辞,字体不同。在同板腹甲上出现部分刻辞字体较小,部分刻辞字体较大的现象。

西周时期的卜甲刻辞,多为残碎小块,完整卜甲极少,需先正确定位才能进行行款走向的研究。与殷商卜甲相比,最大的变化在于卜甲放置方向的变化。先周时期的卜甲与殷商时期相同,以甲首向上为正,刻辞行款走向以千里路为界,下行而向外。西周早期时,已经出现西周时期较为典型的卜甲特征。西周时期卜甲的行款走向,甲腹刻辞以甲首向左(或右)横向放置为正,一律下行而左,均守兆;甲尾和甲桥多以甲首向上为正,单条刻辞多见,单列下行。

7. 刻辞的布局

(1) 卜骨

商代晚期卜骨刻辞的布局一般分在柄部、扇部、靠近两侧缘。靠近胸侧缘的刻辞较多,几段刻辞的布局一般自下而上,而每段刻辞的行款走向,左右肩胛骨均下行而向外。商代晚期卜骨的整治方式,以“左右两件肩胛骨对称,同板肩胛骨钻凿灼的排列朝向白角”最为典型。根据龟甲的现象推测其刻辞也应是左右两件肩胛骨对贞排列。

殷墟一期偏早或非王卜辞的卜骨,仍然沿用商代中期典型特征的排列。即“同板骨面以骨面中轴线为界,钻或灼点位于凿的内侧,左右对称”。正面刻辞应受该钻凿灼排列的影响,靠近胸侧缘和靠近颈侧缘的刻辞可能是左右对贞。殷墟一期因靠近颈侧缘部位刻辞较少见,该现象不明显。在非王卜辞的有些卜骨上,可以见到该现象,殷墟四期较为常见。

(2) 卜甲

商代晚期刻辞的布局,以千里路为界,基本左右对贞,与钻凿灼的排列大致相同。学者们通常说商代晚期的甲骨“迎卜兆”,西周时期的甲骨“守卜兆”。单条刻辞布局因受龟甲大小和具体所要占卜事情内容的影响,占卜所用钻凿数目的多少不同。钻凿数目的多少,又会影响到单条刻辞所占骨板面积的大小以及行款走向。

商代晚期刻辞很多,内容繁多,形式也复杂。刻辞的行款走向、布局较丰富。甲腹的

刻辞中,单条刻辞有几种布局,如以千里路为界,分为左右两块;以千里路和齿缝为界分为上下左右四块;一段刻辞围绕一行或一列的几个卜兆;一条刻辞围绕一个卜兆。

殷墟甲骨文一期前段一些卜甲反面的钻凿形态,仍然沿用商代中期典型特征的排列。此时期卜甲的刻辞也有类似的现象,如李达良《龟板文例研究》的第十式(《丙》图38)、十一式(《丙》图90)刻辞排列,这两个卜甲应是过渡形态。

西周时期的刻辞排列与殷墟时期的刻辞有较大区别,即殷墟刻辞均以甲首向上为正,迎卜兆;西周刻辞则以甲首左(或右)向横置为正,以千里路为上,腹甲左右两侧的刻辞均自右往左纵行。西周时期这种刻辞的横向布置的方式,很可能与文献中的“示高”有关。

8. 卜骨的起源

仰韶时期出土卜骨的三处遗址,因时间过早而不能与当地后来的占卜习俗相衔接。龙山早期的卜骨,仅见于内蒙古阿善文化寨子塔遗址,中原地区和西北地区均不见。到龙山晚期时,北方地区的老虎山文化、游邀类型等仍出土卜骨较多,且老虎山文化早期的遗存中显示出延续使用内蒙古阿善文化的占卜传统。可见,在北方地区,卜骨这一占卜习俗从龙山早期出现后,一直沿用到龙山晚期。

在龙山晚期,中原地区和西北地区的卜骨才开始广泛流行,可能与中原龙山文化开始向外扩张有关。卜骨在这种背景下,出土数量大为增加,如中原地区的后岗二期类型、王湾三期类型等均出土大量卜骨。西北地区此时卜骨的出土数量约占新石器卜骨的一半,以齐家文化卜骨数量最多,其次为客省庄二期文化。

9. 卜甲的起源

商代早期出土的卜甲主要在南关外遗址发现,其中南关外期(大致相当于商代早期或先商阶段)仅发现一件,二里岗下层一期未发现卜甲,二里岗下层二期发现10件卜甲,二里岗上层一期发现37件卜甲。其中南关外期所出的这一件卜甲(标本C5T85④:123),为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占卜过的龟甲,但性质仍有待商量。

二里岗上层时期,卜甲分布范围扩大,除郑州二里岗文化外,大辛庄类型和东下冯类型亦发现卜甲,均为腹甲。商代中期时卜甲数量大大增加,开始使用背甲,商代晚期、西周时期广泛使用。

另外,商周时期在湖北、重庆和四川地区的诸文化类型中也有发现。从卜甲的钻凿灼形态等方面来看,该地区卜甲最早在商代二里岗上层时期出现,晚商时期较为流行。而北方地区的诸文化类型,未见卜甲,仍继续延用卜骨。卜甲的这种地域分布,很可能与地理环境和文化习俗有关。

10. 卜法的衰落与筮法的兴盛

从考古出土遗物和文献材料看,卜法和筮法流行的时间和用途均不同。卜法在商代

最为流行,卜骨与卜甲并用。而筮法材料极少,可能筮法的地位远远低于卜法。西周早期,除凤雏和周公庙遗址出土卜用甲骨较多外,一些周分封的诸侯国中亦可见到卜用甲骨,但数量较少。西周中晚期,中心地区的卜用甲骨也比较少见。西周中晚期以后,用甲骨占卜的卜法几乎消失,只在边远地区偶见卜用甲骨的遗存。与此相关的是,商代晚期时,考古出土遗物上可见数字组成的易卦。到西周时期,数字易卦相关材料更多,远超过商代晚期。可见卜法的衰落时间恰与筮法的兴盛时间重叠,二者之间或正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11. 商周甲骨占卜程式的探索

通过考察《仪礼》、《龟策列传》以及地下出土的文字材料,对先秦时期占卜的程式进行了探讨。可知《龟策列传》所记卜法的程序、名称、占卜习俗和占卜内容等,与商周甲骨、楚卜筮简、《尚书·金縢》等虽略有区别,但基本规则大体相同。这说明《史记·龟策列传》记载的内容应有所根据。

受考古工作不平衡性的影响,不同时期、不同地区考古工作多少不一,考古工作水平高低不一,使得各地区出土甲骨多少不同;此外,甲骨材料发表情况参差不齐,有的只有文字描述,有的虽有甲骨图版,但图象模糊,有的甚至未发表。这些情况对各地区出土甲骨比例统计的准确性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本人虽对多处遗址出土的甲骨进行过整理或参观,但更多材料无法见到实物,只能利用发表的文字或图版进行研究,无法详知甲骨未发表的其他信息。另受个人水平和时间的限制,有些材料可能遗漏,有些问题未能进一步展开讨论。凡此种种,有待今后补充和修正。

对于目前甲骨考古工作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本文试从甲骨的考古发掘、实物整理及出版发表等方面为以后的考古工作提供一点建议。

(1) 考古发掘

在考古发掘中,要弄清楚甲骨出土的遗迹单位及层位关系,甲骨的出土状况以及周围共出的器物,甲骨本身的相关使用和埋藏痕迹等,并将这些甲骨出土背景的信息提供给读者,以方便读者对甲骨的研究。

(2) 实物整理

实物整理中,甲骨的定位与缀合是最为重要的环节。根据甲骨的出土单位、层位关系及其本身每个部位的特点来对甲骨进行定位与缀合,甲骨正反面的卜兆、文字(内容、文例)、刻画线、钻凿灼,以及甲骨的厚度、颜色等,都可以作为定位与缀合的依据。

(3) 出版发表

用甲骨实物进行研究是最为理想的,但迄今为止大多数学者都没有这样的条件,只能依靠甲骨著录进行研究。因此甲骨资料发表形式的好坏至关重要,影响到学者对甲骨的研究水平。如考古报告或简报中,有的只有文字而无图版,有的虽有图版,但多模糊不清;

甲骨著录中,多提供文字的拓本,而甲骨本身的信息则提供较少。近年出版的《花东》一书的编纂体例,可谓目前所见甲骨著录中较为完善合理的,与以往的著录相比,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甲骨信息。

目前对甲骨的研究除了文字内容外,已经涉及用甲骨实物(如整治方式、钻凿灼形态等特征)来研究考古学文化、占卜习俗等内容。因此,除了采用拓本、摹本、影本与释文互补互校的手段将文字内容发表外,还需要对甲骨的出土单位及层位关系、共出物,以及发掘整理的过程等进行详细介绍,并绘制甲骨出土的分层平、剖面图;对甲骨本身的特征,尤其是整治方式和钻凿灼形态,提供详细的文字记录,并附线图、照片等。另外,对于一些较为碎小的甲骨,利用虚拟整版图的形式发表,标明其在整版甲骨上的位置。这样的发表方式,将会大大拓宽甲骨学的研究领域,使甲骨的研究水平上升到一个新高度,而这也正是我们这些甲骨研究者所希冀的。

参考文献

(一) 主要历史文献及工具书

- [汉]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
- [汉]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92年。
- [汉] 许慎撰、[清] 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 [清] 胡培翬:《仪礼正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
- [清] 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2000年。
- [清]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
- [清] 朱彬:《礼记训纂》,中华书局,1998年。
- [清] 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8年。
- [清] 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中华书局,1998年。
- [清]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1998年。
- [清] 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中华书局,1998年。
- [清] 陈立:《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
-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
- 黄晖撰:《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
- 丁福保编纂:《说文解字诂林》,中华书局,1988年。
-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诂林》,中华书局,1996年。
- [日] 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汲古书院,1977年。
- 姚孝遂主编:《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中华书局,1989年。
- 姚孝遂主编:《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中华书局,1988年。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甲骨文编》,中华书局,1982年。
-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8年。
- 何琳仪:《战国文字字典》,中华书局,1998年。

(二) 论著、论文

A

- 安志敏:
《一九五二年秋季郑州二里岗发掘记》,《考古学报》第8册,1954年。

B

- 巴尔姆格伦:

《半山及马厂随葬陶器》，中国古生物志丁种第3号1册，1934年。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北京考古四十年》，燕山出版社，1990年。

[日] 贝塚茂树：

《龟卜和筮》，《东方学报》（京都），第14册，1947年；

《贝塚茂树著作集》第3卷，（日本）中央公论社，1977年。

秉志：

《河南安阳之龟壳》，《安阳发掘报告》第3期，1931年；又收入《甲骨文献集成》（第十七册）。

C

曹定云：

《殷墟发现的“易卦”卜甲与“文王演周易”》，《殷商考古论丛》，（台北）艺文印书馆，1996年。

曹玮：

《周原甲骨文》，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

《周原新出西周甲骨文研究》，《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4期。

畅文斋、顾铁符：

《山西洪赵县坊堆村出土的卜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7期。

常玉芝：

《晚期龟腹甲卜辞的契刻规律及意义》，《考古》1987年第10期。

陈梦家：

《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

陈全方：

《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甲骨文概论》，《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1982年；

《周原与周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陈全方、侯志义、陈敏：

《西周甲文注》，学林出版社，2003年。

陈伟：

《包山楚简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

《湖北荆门包山卜筮楚简所见神祇系统与享祭制度》，《考古》1999年第4期；

《望山楚简所见的卜筮与祷祠——与包山楚简相对照》，《江汉考古》1997年第2期。

陈旭：

《夏商考古》，文物出版社，2001年。

程平山：

《鄂西地区西周春秋文化分区及早期楚文化探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学位论文，1998年；

《圻春毛家咀和新屋湾西周遗存性质略析》，《江汉考古》2004年第4期。

崔波：

《甲骨占卜源流探索》，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

D

大会秘书组：

《吉林大学古文字学术讨论会纪要》,《古文字研究》(第一辑),1979年。

董作宾:

《董作宾先生全集》,(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

《骨白刻辞再考》,《中央研究院院刊》(一),1954年;

《骨文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本第1分,1936年;

《商代龟卜之推测》,《安阳发掘报告》第一册,1929年;

《殷代文例分“常例”“特例”二种说》,《中国文字》第6册,1962年。

F

方殷:

《随州西花园与庙台子遗址》,《江汉考古》1980年第2期。

G

[日]冈村秀典:

《商代的动物牺牲》,《考古学集刊——纪念殷墟发掘七十周年论文专集》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高明:

《略论周原甲骨文的族属》,《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5期;

《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郜向平:

《商系墓葬研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耿德兴:

《浅谈“甲骨”钻凿磨灼的主要用意和用途》,《殷都学刊》1999年增刊。

顾颉刚:

《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燕京学报》1929年第6期;又收入《古史辨》,第3册上编。

顾永新:

《“诗经”与周代占卜》,《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第3期。

管燮初:

《商周甲骨与青铜器上的卦爻辨识》,《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中华书局,1981年。

郭沫若:

《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考古》1972年第2期;

《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科学出版社,1983年;

《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78—1983年;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

郭若愚:

《殷契拾掇》,上海出版社,1951年。

郭振录:

《试论甲骨刻辞中的“卜”及其相关问题》,《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3年。

H

韩建业:

《老虎山文化的扩张与对外影响》,《中原文物》2007年第1期。

韩自强:

《阜阳汉简“周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何琳仪:

《包山竹简选释》,《江汉考古》1993年第3期。

胡光炜:

《胡小石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甲骨文例》,余永梁手书石印本二卷一册,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考古学丛书之一,1928年。

胡厚宣:

《关于殷代卜龟之来源》,《史学丛刊》1944年第1期;

《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甲骨文合集释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黄道华:

《枝江赫家洼遗址出土西周卜骨》,《江汉考古》1992年第3期。

黄蕴平:

《内蒙古朱开沟遗址兽骨的鉴定和研究》,《考古学报》1996年第4期。

[日]荒木日吕字: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卜骨及其社会意义》,《夏商文明研究——97山东桓台中国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

L

雷兴山、郑文兰、王鑫:

《北京琉璃河遗址新出卜骨浅识》,《中国文物报》1997年3月30日。

李伯谦:

《先商文化探索》,《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李达良:

《龟板文例研究》,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中文系,1972年。

李殿魁:

《从出土考古资料及书面资料试探易之起源及真象》(一),《中国文字》第十七期,1993年。

[韩]李亨求:

《渤海沿岸古代文化与韩国古代文化之关系》,《环渤海考古国际讨论会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90年;

《渤海沿岸早期无字卜骨之研究——兼论古代东北亚诸民族之卜骨研究》(上、中、下),《故宫季刊》第十六卷第一至三期,1981—1982年。

李济:

《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李连:

《百草沟发现无文卜骨》,《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7期。

李零:

《中国方术考》(修订本),东方出版社,2001年;

《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2000年。

李学勤:

- 《试论余杭南湖良渚文化黑陶的刻划符号》,《浙江学刊》1992年第4期;
《谈安阳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1期;
《西周甲骨的几点研究》,《文物》1981年第9期;
《周文王时期卜骨与商周文化关系》,《人文杂志》1988年第2期;
《周易溯源》,巴蜀书社,2006年;
《竹简卜辞与商周甲骨》,《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

李学勤、唐云明:

- 《河北藁城台西甲骨的初步考察》,《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3期。

李学勤、王宇信:

- 《周原卜辞选释》,《古文字研究》第四辑,中华书局,1980年。

李桢:

- 《早周骨甲所刻易卦筮符综说》,《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续编》,1995年。

连劭名:

- 《出入占考》,《周易研究》1998年第1期。
《读周原出土的甲骨刻辞》,《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辑,中华书局,1986年;
《望山楚简中的习卜》,《江汉论坛》1986年第11期。

林生:

- 《记彝、羌、纳西族的羊骨卜》,《考古》1963年第3期;
《云南永胜县彝族〈他鲁人〉“羊骨卜”的调查和研究》,《考古》1964年第4期。

刘焕明:

- 《商代甲骨占卜探讨》,《文物春秋》1992年第3期。

刘绪:

- 《西周早期考古学文化与周初分封》,《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考古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刘绪、雷兴山:

- 《浍北花园庄遗址与河亶甲居相》,《文物世界》1999年第4期。

刘一曼:

- 《安阳殷墟甲骨出土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97年第5期;
《论殷墟甲骨的埋葬状况及相关问题》,《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刘玉建:

- 《中国古代龟卜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刘渊林:

- 《卜骨的政治技术演进过程之探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6本第1分,1974年;
《卜用甲骨上政治技术的痕迹之研究》,(台湾)“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印行,1984年。

刘源:

- 《试论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的行款》,《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1期。

柳曾符:

《释“习卜”》,《考古》1981年第2期。

罗二虎:

《成都地区卜甲的初步研究》,《考古》1988年第12期。

罗西章、王均显:

《周原扶风地区出土西周甲骨的初步认识》,《文物》1987年第2期。

M

马承源: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马如森:

《殷墟甲骨文引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P

庞恢靖:

《周原甲骨文》,《文博》1993年第6期。

彭锦华:

《沙市周梁玉桥甲骨的初步研究》,《考古》1986年第4期。

彭裕商:

《殷代卜法初探》,《夏商文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

[韩]朴载福:

《“龟策列传”与先秦龟卜法》,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5月;

《商周时期出土文物中所见的易卦》,《江原人文论丛》第17辑,2007年6月(韩文)。

Q

裘锡圭:

《从殷墟卜辞的“王占曰”说到上古汉语的宵谈对转》,《中国语文》2002年第1期;

《关于殷墟卜辞的命辞是否问句的考察》,《中国语文》1988年第1期。

屈万里:

《易卦源于龟卜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四种《庆祝董作宾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1961年6月。

R

饶宗颐:

《哈佛大学所藏良渚黑陶上的符号试释》,《浙江学刊》1990年6期;

《殷代易卦及有关占卜诸问题》,《文史》第二十辑,1983年;

《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香港大学出版社,1959年。

任式楠:

《我国新石器时代聚落的形成与发展》,《考古》2000年第7期。

容肇祖:

《占卜的源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1928年;又收入《古史辨》第三册,中华书局,1982年。

S

沈启无、朱耘巷:

《卜法通考》,《国立华北编译馆丛刊》,金华印书馆,1942年。

沈之瑜:

《甲骨文讲疏》,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石璋如:

《骨卜与龟卜的探源——黑陶与白陶的关系》,《大陆杂志》第8卷,1954年第9期;《先秦史研究论集》(上),《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一辑第二册,(台北)大陆杂志社,1960年。

寿田:

《太原光社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与遭遇》,《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期。

宋大川:

《近年来北京考古新成果》,《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五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

宋镇豪:

《百年甲骨学论著目》,语言出版社,1999年;

《论古代甲骨占卜的“三卜”制》,《殷墟博物院院刊》创刊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夏商社会生活史》(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殷代习卜和有关占卜制度的研究》,《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4期;

《再论殷商王朝甲骨占卜制度》,《中国历史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1期。

孙亚冰、宋镇豪:

《济南市大辛庄遗址新出甲骨卜辞探析》,《考古》2004年第2期。

T

唐际根:

《中商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9年第4期。

唐兰:

《在甲骨金文中所见的一种已经遗失的中国古代文字》,《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陶宗冶:

《河北张家口市考古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6期。

田昌五:

《周原出土甲骨中反映的商周关系》,《文物》1989年第10期。

W

汪宁生:

《彝族和纳西族的羊骨卜——再论古代甲骨占卜习俗》,《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王尔俊:

《山东济阳刘台出土的陶文等商代铭刻》,《考古》1989年第6期。

王凤竹:

《三峡地区“朝天嘴B区类型”遗存分析》,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0年4月。

王刚:

《林西县大井古铜矿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年第1期。

王宏:

《论周梁玉桥文化》,《江汉考古》1996年第3期。

王华:

《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整治技术研究》,山东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6年。

王明钦:

《湖北江陵天星观楚简的初步研究》,北京大学考古系硕士学位论文,1989年。

王善才:

《香炉石——我国早期巴文化遗址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

王宇信、杨升南:

《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王宇信:

《甲骨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西周甲骨探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邢台南小汪西周甲骨出土的意义》,《史学月刊》1999年第1期;

《周原甲骨卜辞行款的再认识和邢台西周卜辞的行款走向》,《华夏考古》1995年第2期;

《周原甲骨刻辞行款的初步分析》,《人文杂志》1988年第3期。

魏坚、崔璇:

《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的发展与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乌恩岳斯图:

《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科学出版社,2007年。

吴俊德:

《殷墟第三、四期甲骨断代研究》,(台北)艺文印书馆,1999年。

吴郁芳:

《“包山楚简”卜辞简牍释读》,《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2期。

X

萧良琼:

《周原卜辞和殷墟卜辞之异同初探》,《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肖楠:

《安阳殷墟发现“易卦”卜甲》,《考古》1989年第7期。

谢端琚:

《中国原始卜骨》,《文物天地》1993年第6期;

《论中国史前卜骨》,《史前研究——西安半坡博物馆成立四十周年纪念论集(1958—1998)》,三秦出版社,1998年。

徐葆:

《殷墟卜辞中的商代筮法制度——兼释甲骨文爻、学、教诸字》,《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

徐大立:

《蚌埠双墩新石器遗址陶器刻划初论》,《文物研究》总第五辑,1989年9月。

徐基:

《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的初步研究》,《文物》1995年第6期。

徐天进:

《周公庙遗址考古调查的缘起及其学术意义》,《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二十一期,2004年6月。

徐锡台:

《周原卜辞十篇选释及断代》,《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中华书局,1981年;

《周原出土甲骨的字型与孔型》,《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

《周原甲骨初论》,《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1982年;

《西周甲骨文综述》,三秦出版社,1987年。

徐中舒:

《数占法与“周易”的八卦》,《古文字研究》第十辑,中华书局,1983年。

许进雄:

《卜骨上的钻凿形态》,(台北)艺文印书馆,1973年;

《甲骨上钻凿形态的研究》,(台北)艺文印书馆,1979年;

《钻凿研究略述》,《屈万里先生七秩荣庆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

Y

严文明:

《龙山时代和龙山文化》,《文物》1981年第6期;

《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

严一萍:

《甲骨学》,(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

闫志、朴载福:

《出土所见上古时期的计数工具——从上宅文化谈起》,《北京平谷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杨莉:

《凤雏 H11 之 1、82、84、112 四版卜辞通释与周原卜辞的族属问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5月。

姚生民:

《淳化县发现西周易卦符号文字陶罐》,《文博》1990年第3期。

叶祥奎:

《陕西长安沣西西周墓地出土的龟甲》,《考古》1990年第6期。

伊丽莎白·施密德著、李天元译:

《动物骨骼图谱》,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92年。

于成龙:

《楚礼新证——楚简中的纪时、卜筮与祭祷》,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于秀卿、贾双喜、徐自强:

《甲骨的钻凿形态与分期断代研究》,《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中华书局,1981年。

余扶危、叶万松:

《河南孟津小潘沟遗址河南龙山文化陶器的分期》,《考古》1982年第2期。

Z

张秉权:

《卜龟腹甲的序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上册,1956年;

《甲骨文的发现与骨卜习惯的考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7本下册,1967年6月;

《甲骨文与甲骨学》,“国立”编译馆,1988年;

《殷墟卜龟之卜兆及其有关问题》,《中央研究院院刊》第一辑,1954年。

张昌平:

《论湖北襄樊地区两周甲骨》,《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5期。

张光裕:

《中国文字起源的省思》,《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

张国硕:

《论商代甲骨卜用后的处置》,《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张江凯、魏峻:

《新石器时代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年。

张绪球:

《石家河文化的陶塑品》,《江汉考古》1991年第3期。

张政烺:

《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殷墟甲骨文中所见的一种筮卦》,《文史》第二十四辑,1985年。

张志华、梁长海、长体鸽:

《河南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发现刻符陶纺轮》,《文物》2007年第3期。

赵容俊:

《殷商甲骨卜辞所见之巫术》,文津出版社,2003年。

赵霞光:

《安阳市西郊的殷代文化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2期。

赵振华:

《洛阳两周卜用甲骨的初步考察》,《考古》1985年第4期。

郑若葵:

《安阳苗圃北地新发现的殷代刻数石器及相关问题》,《文物》1986年第2期。

郑中华:

《论石家河文化的刻划符号》,《江汉考古》2000年4期。

周尔泰:

《成都市方池街古文化遗址初探》,《四川文物》2003年第1期。

邹衡:

《论汤都郑亳及其前后的迁徙》,《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朱歧祥:

《周原甲骨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97年。

(三) 田野考古资料

A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含山县文物管理所:

《安徽含山大城墩遗址第四次发掘报告》,《考古》1989年第2期。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4期。

安徽省展览博物馆:

《安徽含山县孙家岗商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77年第3期。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

《1995—1996年安阳刘家庄殷代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7年第2期。

B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

《关中漆水下游先周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6期;

《陕西武功郑家坡先周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7期。

北京大学、河北省文化局邯郸考古发掘队:

《1957年邯郸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10期。

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华县报告编写组:

《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

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固原博物馆:

《隆德页河子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社,1997年。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宝鸡市考古工作队:

《陕西麟游县史家塬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2004年第4期;

《陕西麟游县蔡家河遗址商代遗存发掘报告》,《华夏考古》2000年第1期。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大象出版社,2007年。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郑州市考古研究所:

《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1999年试掘简报》,《华夏考古》2000年第4期。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河南新密曲梁遗址1988年春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3年第1期;

《洛阳王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陕西彬县、淳化等县商时期遗址调查》,《考古》2001年第9期。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

《河北临城县补要村遗址南区发掘简报》,待刊。

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考古实习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陕西绥德薛家渠遗址的试掘》,《文物》1988年第6期;

- 《陕西礼泉朱马嘴商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5期;
- 《陕西耀县北村遗址1984年发掘报告》,《考古学研究》(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 《陕西扶风县益家堡遗址1986年度发掘报告》,《考古学研究》(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 《1995年琉璃河周代居址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6期。
-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丘地区文管会:
- 《河南夏邑清凉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研究》(四),科学出版社,2000年。
-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信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 《河南固始平寨古城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0年第3期。
-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烟台市博物馆:
- 《胶东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
-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三峡考古队、忠县文物保护管理所:
- 《忠县瓦渣地遗址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
-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周组、安徽省文物工作队:
- 《安徽省霍邱、六安、寿县考古调查试掘报告》,《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社,1997年。
-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西实习组、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
- 《翼城曲沃考古勘察记》,《考古学研究》(一),文物出版社,1992年。
- 北京市文管处:
- 《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考古》1976年第4期。
-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昌平区文化委员会:
- 《昌平张营——燕山南麓地区早期青铜器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平谷县文物管理所上宅考古队:
- 《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8期。
-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 《镇江营与塔照》,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C

蔡凤书:

- 《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的调查》,《考古》1973年第5期。
- 长江水利委员会:
- 《宜昌路家河:长江三峡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年。
-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 《成都金沙遗址I区“梅苑”东北部地点发掘一期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2)》,科学出版社,2004年;
- 《成都十二桥遗址新一村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2),科学出版社,2004年。
- 重庆市博物馆、复旦大学文博系:
- 《万州麻柳沱遗址考古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卷),科学出版社,2006年。
- 重庆市博物馆、万州区文管所、复旦大学文博系:
- 《万州麻柳沱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

D

德州地区文化局文物组、济阳县图书馆:

《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85年第12期。

德州地区文物工作队:

《山东禹城县邢寨汪遗址的调查与试掘》,《考古》1983年第11期。

东下冯考古队:

《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东区、中区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2期。

E

鄂博三峡考古队第三组:

《宜昌县朱家台遗址试掘》,《江汉考古》1989年第2期。

F

扶风县博物馆、高西省:

《陕西扶风县益家堡商代遗址的调查》,《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5期。

福建省考古队、重庆万州区文保所:

《万州涪溪口遗址第三期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卷),科学出版社,2006年。

G

甘南藏族自治州博物馆:

《甘肃卓尼茈儿遗址》,《考古》1994年第1期。

甘肃省博物馆:

《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一九八〇年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存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

甘肃省博物馆考古队:

《甘肃灵台桥村齐家文化遗址试掘报告》,《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北方考古研究室:

《民乐东灰山考古——四坝文化墓地的提示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

《甘肃民乐县东灰山遗址发掘纪要》,《考古》1995年第12期。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永昌三角城与哈马墩沙井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秭归何家大沟遗址的发掘》,《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三卷),科学出版社,2006年。

郭宝钧、林寿晋:

《一九五二年秋季洛阳东郊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9册,1955年。

郭宝钧:

《一九五〇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五册,1951年。

国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

《晋中考古》,文物出版社,1999年。

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

《兖州西吴寺》,文物出版社,1990年。

邯郸地区文物保管所、永年县文物保管所:

《河北省永年县何庄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2年第4期。

H

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

《河北藁城台西村的商代遗址》,《考古》1973年第5期。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

《河北邯郸涧沟村古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4期;

《河北永年县台口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2年第12期。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

《磁县下潘汪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台西考古队:

《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1979年第6期。

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河北唐山市大城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

《邢台曹演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沧州地区文物管理所:

《河北省任邱市哑叭庄遗址发掘报告》,《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邯郸市文物管理处、峰峰矿区文物管理所:

《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北羊台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2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文化学院:

《武安赵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2年第3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邢台市文物管理处:

《河北邢台市葛家庄遗址1999年发掘简报》,《考古》2005年第2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邢台市文物管理处:

《邢台南小汪周代遗址西周遗存的发掘》,《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藁城北龙宫商代遗址的调查》,《文物》1985年第10期;

《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

《河北邢台市葛家庄遗址北区1998年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11期。

河北省邢台市文物管理处:

《邢台粮库遗址》,科学出版社,2005年。

河南省安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河南汤阴白营龙山文化遗址》,《考古》1980年第3期;

《汤阴白营河南龙山文化村落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河南省博物馆:

《郑州南关外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

- 《河南孟县涧溪遗址》,《考古》1961年第1期;
《河南渑池县鹿寺商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9期;
《河南新乡潞王坟商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
《河南偃师灰嘴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59年第12期;
《河南郑州上街商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66年第1期;
《郑州二里岗》,科学出版社,1959年;
《郑州牛砦龙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

- 《一九五五年秋安阳小屯殷墟的发掘》,《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
《郑州洛达庙商代遗址试掘报告》,《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
《郑州旭畚王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河南新蔡平夜君成墓的发掘》,《文物》2002年第8期。
《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密市炎黄历史文化研究会:

- 《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学文博学院考古系、南开大学历史系博物馆学专业:

- 《1995年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 《郑州南顺城街青铜器窖藏坑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8年第3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驻马店市文物工作队、西平县文物管理所:

- 《河南西平县上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4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第六次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1期。
《河南荥阳市薛村遗址2005年度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7年第3期;
《河南禹州市瓦店龙山文化遗址1997年的发掘》,《考古》2000年第2期;
《河南巩县稍柴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3年第2期;
《河南密县黄寨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3年第3期;
《河南偃师灰嘴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0年第1期;
《河南荥阳竖河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0集,地质出版社,1996年;
《辉县孟庄》,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
《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
《信阳孙砦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9年第2期;
《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
《1992年度郑州商城宫殿区发掘收获》,《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1985—199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禹州瓦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4年;

- 《郑州黄委会青年公寓考古发掘报告》,《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1985—199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 《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全三册),文物出版社,2001年;
- 《郑州电力学校考古发掘报告》,《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1985—199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 《郑州黄委会青年公寓考古发掘报告》,《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1985—199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 《郑州洛达庙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9年第4期;
- 《郑州小双桥遗址的调查与试掘》,《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1985—199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 《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
- 河南文物工作队第二队孙旗屯清理小组:
- 《洛阳涧西孙旗屯古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9期。
-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
- 《浙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
-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浉池县文化馆:
- 《浉池县郑窑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年第2期;
- 《浉池仰韶遗址1980—1981年发掘报告》,《史前研究》1985年第3期。
-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郾城县许慎纪念馆:
- 《郾城郝家台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
-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 《禹县瓦店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
- 《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第3期;
- 《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
- 菏泽地区文物工作队:
- 《山东曹县莘冢集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80年第5期。
- 湖北荆州地区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
- 《湖北江陵梅槐桥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9期。
- 湖北省博物馆:
- 《汉阳东城垓纱帽山遗址调查》,《江汉考古》1987年第3期;
- 《湖北当阳季家湖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资料丛刊》1987年第10期。
-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
- 《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等:
- 《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
-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
- 《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

湖北省清江隔河岩考古队:

《湖北清江香炉石遗址的报告》,《文物》1995年第9期。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江陵望山沙塚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

《望山楚简》,中华书局,1995年;

《九店楚简》,中华书局,1995年。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博物馆:

《湖北襄樊真武山周代遗址》,《考古学集刊》第九集,1995年。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宜城县博物馆:

《湖北宜城县肖家岭遗址的发掘》,《文物》1999年第1期。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巴东杨家棚汉代遗址发掘简报》,《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二卷),科学出版社,2005年;

《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

《宜都城背溪》,文物出版社,2001年。

湖南省博物馆:

《安乡划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4期。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自治州文物管理处:

《湘西永顺不二门发掘报告》,《湖南考古》,2002年。

湖南省岳阳文物工作队:

《画客车牯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第三集,1986年。

黄河水库考古队甘肃分队:

《临夏大何庄、秦魏家两处齐家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3期。

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河南分队:

《河南陕县七里铺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

J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湖北秭归石门嘴遗址发掘》,《考古学报》2004年第4期。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忻州地区文物管理处忻州考古队:

《忻州游邀考古》,科学出版社,2004年。

江苏省文物工作队:

《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徐州高皇庙遗址清理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

解希恭:

《光社遗址调查试掘简报》,《文物》1962年第4、5期。

晋中考古队:

《山西娄烦、离石、柳林三县考古调查》,《文物》1989年第4期。

荆州地区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

《湖北江陵荆南寺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8期。

荆州地区博物馆:

《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文物》1995年第1期。

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

《湖北沙市周梁玉桥遗址1987年的发掘》,《考古》2004年第9期。

L

李济:

《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

辽宁省博物馆、朝阳市博物馆:

《建平水泉遗址发掘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86年第2期。

辽宁省博物馆、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赤峰县文化馆:

《内蒙古赤峰县四分地东山咀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5期。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

《辽宁林西县大井古铜矿1976年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7),文物出版社,1983年。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文化局:

《牛河梁遗址》,学苑出版社,2004年。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辽宁凌源安杖子古城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6年第2期;

《辽宁牛梁河第二地点一号冢21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8期;

《辽宁牛梁河第五地点一号冢中心大墓(M1)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8期;

《辽宁义县向阳岭青铜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十三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

辽宁省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工作队:

《宁城县南山根的石椁墓》,《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琉璃河考古队:

《北京琉璃河遗址发掘又获重大收获》,《中国文物报》1997年1月12日;

《琉璃河遗址1996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6期。

刘莉、阎毓民、秦小丽:

《陕西临潼康家龙山文化遗址1990年发掘动物遗存》,《华夏考古》2001年第1期。

刘谦:

《锦州山河营子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6年第10期。

刘耀(尹达):

《河南濬县大赉店史前遗址——田野考古报告第一册》,1936年。

刘士莪:

《老牛坡》,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卢建国、巩启明、尚友德:

《陕西耀县北村商代遗址调查记》,《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1期。

吕智荣:

《朱开沟古文化遗存与李家庄文化》,《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6期。

洛阳博物馆:

《河南临汝煤山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75年第5期。

《孟津小潘沟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78年第4期。

洛阳地区文物保护管理处:

《河南伊川马廻营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1期。

洛阳地区文物处:

《伊川白元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1975—1979年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的发掘》,《考古》1983年第5期。

M

马得志、周永珍、张运鹏:

《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9册,1955年。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

《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出版社,1983年。

N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

《敖汉旗范杖子古墓群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年第3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

《内蒙古黑城考古发掘纪要》,《文物》1987年第7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岱海考古(一)——老虎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

《内蒙古朱开沟遗址》,《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

《内蒙古准格尔旗二里半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1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准格尔旗永兴店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博物馆:

《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

内乡县综合博物馆:

《河南内乡县部分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1期。

南京博物院:

《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2期;

《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

《江苏铜山丘湾古遗址的发掘》,《考古》1973年第2期;

《江苏新沂县三里墩古文化遗址第二次发掘简介》,《考古》1960年第7期。

S

沙市市博物馆:

(2) 偃师灰嘴遗址^①:发现7件卜骨,骨面有灼痕。其中牛肩胛骨1件,猪、羊的肩胛骨各2件,2件种属不明。标本T3:28,为牛的肩胛骨,骨脊未加削制,残存有灼痕。标本T2:22,为猪左肩胛骨^②,已残,只留柄部,骨面上有灼痕2个。

(3) 洛阳东干沟遗址^③:发现10余块卜骨,均残缺。骨料有牛、猪、羊和鹿的肩胛骨。卜骨大多有灼无钻,先钻后灼的只有2块牛肩胛骨,钻坑圆形。灼的部位,大多在骨面较薄的地方,个别也有灼在反面的。标本T514^④:5,为牛肩胛骨,已残,有灼有钻,无凿,残留3个钻坑。标本H560:4,为羊右肩胛骨,已残,只有柄部,有灼痕,无钻无凿。

(4) 巩县稍柴遗址^④:发现8件卜骨。一期未发现卜骨。二期发现2件卜骨,均为牛肩胛骨。标本H16:10,已残,残长21厘米,仅有灼痕5个。三期发现6件卜骨,其中羊肩胛骨有2件,牛肩胛骨有4件,皆残。标本T4^②:14,为牛右肩胛骨,骨下部已残,残长19厘米,先钻后灼,残留灼痕17个。标本T5^②:81,为羊左肩胛骨,骨下部已残,稍加整治,骨正面仅有灼痕6个。

(5) 登封王城岗遗址^⑤:发现15件卜骨。一期未发现卜骨。二期发现5件卜骨,分别用牛和羊的肩胛骨,已残,骨面上均带灼痕。其中标本WT8H33:29,为牛肩胛骨,已残,报告提供的图版不清,应该有几个灼痕^⑥。三期发现6件卜骨,骨料为猪和羊的肩胛骨,已残,骨面有灼痕。标本WT15^③:6,为猪右肩胛骨,已残,骨中间和前角缺失,长14.7厘米,骨面上有5个圆形灼痕。四期发现4件卜骨,分别为羊和猪的肩胛骨灼制,已残。标本WT8^④:61,为猪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骨正面残留有8个灼痕。标本WT197H525:4,为羊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图版为反面,看不到灼痕,推测正面有灼痕,未去骨脊^⑦。标本W5T0144H47:6,为羊肩胛骨,已残,残长6厘米。黑褐色,有2个烧灼痕。

(6) 伊川白元遗址^⑧:发现2件卜骨。其中标本T11^③:16,为牛右肩胛骨。灼痕密集,清晰无规律,中间残。长33.2厘米,最宽处19.3厘米。属于二里头文化二期。另外1件为羊肩胛骨,有灼痕,属于二里头文化一期。

(7) 郑州上街遗址^⑨:多为残片,保存较大者2件。标本H11:3,为牛肩胛骨,未经整

①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偃师灰嘴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59年第12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偃师灰嘴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0年第1期。

② 《文物》和《华夏考古》中的两个报告均收录标本T2:22。从两个报告所提供的图和文字描述看,应是同一个卜骨。《华夏考古》以为羊肩胛骨,有错误,从其卜骨特征来看,应是猪左肩胛骨。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报告——1955~1960年洛阳涧滨考古发掘资料》,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80,81页,图版四四。

④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巩县稍柴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3年第2期。

⑤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125、143、149页,图版四一、四六、五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大象出版社,2007年,252页,图版七一。

⑥ 报告说“牛肩胛骨,面上共约有15个圆形灼痕。长28.8厘米”。报告的文字描述与图版不一致,完整牛肩胛骨大概长度在30—40厘米之间,图版所示残长不可能有近30厘米的长度。

⑦ 报告说“标本WT8^④:61,为羊肩胛骨。标本WT197H525:4,为猪肩胛骨”,可笔者仔细观察图版,应该相反,前者为猪肩胛骨,后者为羊肩胛骨。

⑧ 洛阳地区文物处:《伊川白元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

⑨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郑州上街商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66年第1期。

治,骨面仅有灼痕。标本 T1:28,为猪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未经整治,骨面仅有灼痕。

(8) 郑州洛达庙遗址^①:发现 7 件卜骨,用牛、猪、羊的肩胛骨制成,均有灼痕,无钻凿。标本 C8HQB70:3,为牛右肩胛骨,已残,只留颈侧缘一段,残长 22.2 厘米,残宽 7.5 厘米。经过整治,表面光滑发亮,前端及一侧沿有刃,骨脊削平,露出松质骨,留有灼痕 2 个。标本 T14:3,为猪左肩胛骨,已残,前、后角和骨中间缺失,残留灼痕 4 个,灼痕较大。标本 T26:7、11,为羊肩胛骨,其中 1 个为羊右肩胛骨,比较完整,骨中间稍有缺失,有烧灼痕迹。标本 C8HQB69:17,为羊右肩胛骨^②,比较完整,骨中间残缺,长 15.7 厘米。留有灼痕 10 个。另外还有 2 件残缺较甚的卜骨,如标本 H70:4、标本 H70:5,均为猪肩胛骨。

(9) 郑州大师姑遗址^③:发现 2 件卜骨。标本 H53:3,为牛肩胛骨,褐色,上下和右端均残,残长 7.8 厘米,宽 4 厘米。骨脊保留原状。骨正面有灼点,无钻无凿,反面灼痕不明显。标本 F1 垫土:8,为牛肩胛骨,浅褐色,已残,扁平状,残长 8 厘米,宽 4 厘米,一面平整,另一面粗糙。灼点在光滑一面,无钻无凿,反面灼痕不清晰。H53 属于该遗址的第三段,相对年代应为二里头文化三期偏晚。

(10) 陕县七里铺遗址^④:发现 24 件卜骨,其中牛肩胛骨有 4 件,猪肩胛骨有 9 件,羊肩胛骨有 11 件。羊、猪的肩胛骨完全保持原状,牛的肩胛骨经过整治,去其骨白,刮其两侧,削平骨面的脊条,可能属于商代早期。除所发现的 1 块牛肩胛骨,左下角有 1 个圆钻和直接灼于骨面外,其余的只有灼而不见钻凿以及兆圻裂纹。

(11) 陕县西崖村遗址^⑤:发现 2 件卜骨,均为牛肩胛骨。标本 T2H4:77,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后角一段,残长 14 厘米,骨正面有灼痕 7 个。标本 T2H4:78,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和骨脊一部分,残长 14 厘米,骨正面有灼痕 2 个,反面骨脊上有灼痕 3 个。2 件可能是同版卜骨。

(12) 荥阳西史村遗址^⑥:该遗址第二期遗存发现 1 件卜骨(标本 T9:12),为牛右肩胛骨,比较完整,后角缺失,骨反面上部刻出凹槽,槽中施钻和灼,骨白、骨脊保留原状,骨正面中间下端也应该有灼痕。该遗址第二期的时代应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间。

(13) 荥阳竖河遗址^⑦:发现 1 件卜骨(H86:8),为牛右肩胛骨,骨中间和下部已残,

① 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洛达庙商代遗址试掘报告》,《文物参考资料》1957 年第 10 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洛达庙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9 年第 4 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 年考古发掘报告》(全三册),文物出版社,2001 年,109 页,图七〇;《郑州黄委会青年公寓考古发掘报告》,《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1985—199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年,207 页,图十九。

② 报告以为是猪的肩胛骨,可笔者仔细观察线图,发现背面的骨脊和卜骨整体形状表现出羊右肩胛骨的特征,故推测为羊右肩胛骨。

③ 郑州市文物研究所:《郑州大师姑(2002—2003)》,科学出版社,2004 年,96 页,图六二。

④ 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河南分队:《河南陕县七里铺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60 年第 1 期。

⑤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陕县西崖村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89 年第 1 期。

⑥ 郑州市博物馆:《河南荥阳西史村遗址试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5),文物出版社,1981 年 12 月。

⑦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荥阳竖河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 10 集,地质出版社,1996 年,33 页,图三十二。

残长 11.9 厘米,骨正面上留有灼痕 17 个。该卜骨属于该遗址二里头文化三期 4 段。

(14) 密县新砦遗址^①:发现卜骨较多,均有灼痕,有的较大,可能是牛肩胛骨,有的较小,可能是鹿或羊的肩胛骨。标本 H7:15,为牛左肩胛骨,已残,骨下部缺失,残长 30.4 厘米,宽 18.9 厘米,骨正面有灼痕 9 个。标本 H3:24,为左羊肩胛骨,已残,前角缺失,长 13.5 厘米,骨正面有灼痕 2 个。

(15) 密县黄寨遗址^②:该遗址第二期早段文化遗存中发现 1 件卜骨(H1:12),为牛肩胛骨,已残,残长 23.6 厘米,宽 6 厘米。骨面上有圆形灼痕 5 个,其中 1 个保存完整,另 4 个残。属于二里头文化二期。

(16) 新密曲梁遗址^③:发现 2 件卜骨,系用动物肩胛骨制成,骨料稍加修整,保留骨脊,只有灼,无钻无凿。标本 H4020:104,应为猪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骨正面留有灼痕 7 个。

(17) 渑池郑窑遗址^④:发现 41 件卜骨,一期发现 3 件卜骨,均为猪肩胛骨,骨面上有灼痕。标本 J5:3,为猪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骨面上残留灼痕 7 个,其中方形灼痕 1 个。二期发现 13 件卜骨,均为动物肩胛骨,有灼痕。标本 H20:26,为牛右肩胛骨,一侧有锯痕,下残,骨脊上有 8 个圆形灼痕。标本 T11^⑤:8,为猪右肩胛骨,已残,残留灼痕 3 个。三期发现 25 件卜骨,猪肩胛骨经灼而成,未修整骨面。标本 J4:19,为猪右肩胛骨,已残,前后角缺失,骨正面有圆形灼痕 6 个。有“口”、“门”、“||”刻符各 1 个。标本 J4:27,为羊右肩胛骨,已残,中间缺失,有灼痕。标本 J:13,为猪右肩胛骨,已残,骨中间和前角缺失,骨正面残留灼痕 7 个。

(18) 渑池鹿寺遗址^⑤:出土数量较多,但多是碎片。较为完整的 4 件中,有牛肩胛骨 1 件和羊肩胛骨 3 件。似都未经整治,骨面有灼痕。标本 H12:9,为牛左肩胛骨,已残,灼痕较多。标本 T2:56,为羊左肩胛骨,基本完整,灼痕较少。

2. 东下冯类型

(1) 夏县东下冯遗址^⑥:该遗址的文化遗存分为六期,Ⅰ至Ⅳ期为东下冯类型文化遗存,共发现 106 件卜骨,以猪肩胛骨为主,还有牛羊肩胛骨;Ⅴ、Ⅵ期为商代二里岗期遗存。Ⅰ期:发现 2 件卜骨,均为猪肩胛骨。皆残,未经整治,有灼痕,无钻无凿。标本 H607:4,为猪右肩胛骨,已残,只有柄部,残长 12 厘米。Ⅱ期:发现 8 件卜骨,均为猪肩胛骨。皆残,未经整治,有灼,无钻无凿。标本 H601:25,为猪右肩胛骨,已残,残存灼痕 2 个;标本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密县新砦遗址的试掘》,《考古》1981 年第 5 期。

②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密县黄寨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3 年第 3 期。

③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新密曲梁遗址 1988 年春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3 年第 1 期。

④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渑池县文化馆:《渑池县郑窑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 年第 2 期。

⑤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渑池县鹿寺商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4 年第 9 期。

⑥ 东下冯考古队:《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东区、中区发掘简报》,《考古》1980 年第 2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 年,28、49、99、146 页,图版四、十五、三八、六三。

H605:1,为猪右肩胛骨,已残,骨正面现存灼痕7个。Ⅲ期:发现39件卜骨,多属残片,用料以猪肩胛骨最多,有20件。其次有羊肩胛骨10件,牛肩胛骨9件。凡用猪、羊肩胛骨者均未经整治,只有灼痕,无钻无凿。用牛肩胛骨者多经过整治,均有灼有钻无凿。标本J501:1,为牛右肩胛骨,已残,只留颈部一段,残留灼痕和钻痕10余个。标本H603:5,为猪右肩胛骨,已残,柄部和骨面的下部缺失,有灼痕3个。标本H9:47,羊左肩胛骨,基本完整,中间稍有残破,两面皆有灼痕,残留灼痕8个。标本H9:42,为羊左肩胛骨,已残,只留后角一段,灼痕分布密集,残留灼痕11个。Ⅳ期:发现57件卜骨,多为残片,猪肩胛骨最多,计有40片。另有少数牛羊和个别鹿的肩胛骨。猪羊肩胛骨多未经整治,有灼,无钻无凿。牛肩胛骨均经过整治,有灼有钻,无凿。标本M523:1之1、2,均为牛肩胛骨,已残,骨料整治平整,两面均有灼和钻,灼痕较多,钻坑较少,1的正面留有灼痕15个以上,2的反面留有灼痕26个以上。标本H101:22,为猪右肩胛骨,基本完整,中间稍有残破,有灼痕6个。标本T4421:3C:16,为猪右肩胛骨,几乎完整,骨中间和脊侧缘的一部分稍有缺失,有灼痕数个。标本T4451:3C:56,为猪左肩胛骨,比较完整,后角和脊侧缘一段缺失,残留灼痕5个。

夏县东下冯遗址Ⅰ、Ⅱ期发现较少,只有10件卜骨,均为猪肩胛骨,未经整治,仅有灼痕,无钻无凿。Ⅲ、Ⅳ期发现大大增加,共发现96件卜骨,有牛、猪、羊、鹿肩胛骨。其中猪肩胛骨最多,有60件。该地区出现牛、羊肩胛骨,数量较多,各有10多件。猪、羊肩胛骨均未经整治,只有灼痕,无钻无凿;牛肩胛骨多经过整治,两面均有灼有钻,无凿,灼痕较多,钻坑较少。

(2) 永济东马铺头遗址^①:发现12件卜骨,均为羊肩胛骨,骨臼、骨脊未除,仅3件有火灼痕迹,但无钻无凿。

(3) 垣曲商城遗址^②:该遗址二里头晚期遗存中发现卜骨几件,用料有牛、猪、羊肩胛骨。整治方式较简单,多只将反面的骨脊削平^③,少数在正面削去骨面。少数有钻坑,坑均钻在反面,较浅,缓圆底。大多为无钻直灼,有的直接灼于正面,有的正反两面均有灼痕。报告依照整治、钻灼的不同方法,分为3类。第一类,反面的骨脊被削平,少量有钻坑有灼与较多无钻只灼。标本H303:18,为猪左肩胛骨,右侧下半部残,残长15.2厘米,残宽4.8厘米。骨臼下部有3个较大钻坑,坑径0.8—1厘米,深0.2—0.7厘米,坑底缓圆,先钻后灼,下半部有直接灼痕8个,透到正面出现褐色斑点。标本H250:20,肩胛骨仅余一侧,残长5.8厘米,残宽3厘米。有钻坑2个,坑不圆,浅窝,坑径0.8厘米,深0.1厘米。先钻后灼,钻坑下有直接灼痕10个,透到正面成褐色斑点。第二类,反面的骨脊被削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晋南二里头文化遗址的调查与试掘》,《考古》1980年第3期。

②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县博物馆:《垣曲商城:1985—1986年度勘察报告》(一),科学出版社,1996年,153页,图九八,图版五三。

③ 从报告提供的图版观察,该遗址削平骨脊的均为猪肩胛骨,牛肩胛骨仅有正面无法了解。有两种解释:第一,该遗址可能最早出现削平骨脊的现象;第二,该类卜骨均属于二里头下层。目前所知,削平骨脊的现象,最早出现于郑州二里头上层。笔者暂认为后者更合理。

平,无钻,两面均有直接灼痕。标本 H303:5,牛左肩胛骨,仅留前角部分,残长 12.4 厘米,残宽 6.8 厘米。反面有灼痕 1 个,正面有灼痕 14 个,排列无序,灼痕黑色,外围有白色圆圈。第三类,削平反面的骨脊并削去正面右侧部分的骨面,无钻,正面有灼痕。标本 H161:8,肩胛骨,残长 16.6 厘米,宽 4.7 厘米,正面有灼痕 3 个。

(4) 垣曲古城南关遗址^①:发现 1 件卜骨(F8 下:17),为猪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 9.6 厘米,残留灼痕 5 个,一个较大而深,4 个较小,属于二里头文化晚期(三、四期)。

(5) 垣曲丰村遗址^②:发现 1 件卜骨(H301:4),为猪右肩胛骨^③,比较完整,前角缺失,长 13.5 厘米,残宽 7.2 厘米。未经修整,保留骨脊,两面都有灼点,骨正面中间下端较薄之处有灼痕 7 个,反面靠近颈部有灼痕 3 个,未见钻痕。

(6) 翼城感军遗址^④:发现 1 件卜骨(T1:5:3),为羊右肩胛骨,已残,骨中间和后角缺失,未经整治,留有灼痕 2 个,无钻无凿。

(7) 翼城苇沟—北寿城遗址^⑤:发现 7 件卜骨,为猪、羊的肩胛骨^⑥,均残,未经修整,仅有灼痕。标本 苇 DⅢ:45,为猪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骨正面残留灼痕 1 个。标本 苇 DⅢ:46,为猪右肩胛骨,已残,胸侧缘中间一段,骨正面有灼痕 8 个。标本 苇 DⅢ:47,为羊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骨正面残留灼痕 1 个,骨反面骨脊上也有灼痕 3 个。

(8) 襄汾大柴遗址^⑦:采集 1 件卜骨,应为猪右肩胛骨,已残,只有标本,骨正面有经灼钻的孔。

3. 牛角岗类型

杞县段岗遗址^⑧:发现 1 件卜骨(90ⅡT19②:2),为羊肩胛骨,已残,有灼痕,残存圆形钻坑 2 个。

4. 下王岗类型

浙川下王岗遗址^⑨:发现 5 件卜骨。一期发现 4 件卜骨,均残,系羊和鹿的肩胛骨,带

①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88—1989 年山西垣曲古城南关商代城址发掘简报》,《文物》1997 年第 10 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垣曲丰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集刊》第 5 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56 页,图三〇。

③ 报告以为是羊肩胛骨,可笔者仔细观察线图,发现背面的骨脊和卜骨整体形状表现出猪右肩胛骨的特征。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晋南二里头文化遗址的调查与试掘》,《考古》1980 年第 3 期。

⑤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西实习组、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翼城曲沃考古勘察记》,《考古学研究》(一),文物出版社,1992 年,206 页,图五七。

⑥ 报告说“卜骨共 7 件,均为猪肩胛骨”,可笔者仔细观察报告提供的线图,苇 DⅢ:47,应该为羊左肩胛骨,该卜骨的骨脊明显看出羊肩胛骨的特征,7 件卜骨中应该还有羊肩胛骨。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襄汾县大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7 年第 7 期。

⑧ 郑州大学文博学院、开封市文物工作队:《豫东杞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 年,230 页,图一五三。

⑨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浙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 年,285、306 页,图版一〇〇、一〇九。

有灼痕。其中标本 H248:12, 为羊右肩胛骨, 已残, 只留柄部, 骨正面有灼痕 4 个以上。标本 H248:34, 为鹿右肩胛骨, 比较完整, 骨中间缺失, 骨正面留有几个灼痕。三期发现 1 件卜骨(H245:2), 为猪左肩胛骨, 已残, 前角缺失, 骨面上有烧灼的痕迹。

(二) 游 邀 类 型

(1) 忻州游邀遗址^①: 发现 31 件卜骨, 其中少数卜骨可能属于龙山晚期, 大部分卜骨属于夏代。有牛、猪、羊的肩胛骨, 其中牛 5, 猪 21, 羊 5 件。整治方式比较简单, 猪和羊的肩胛骨基本未经整治, 只是在骨臼对侧的宽端磨出单面的刃部; 牛肩胛骨则将带骨脊的一面, 从骨臼下边切开一段, 把两边及骨脊全部削平, 可能已经进入商代^②。大部分卜骨只灼而无钻, 只有 1 件牛肩胛骨有圆窝形钻坑, 钻坑的底面为钝圆形。施灼部位均在肩胛骨的骨面最薄处, 这个部位有时虽不见灼痕, 但根据腐蚀斑驳的痕迹也可推测其为施灼的部位。其中标本 H523:3, 为牛右肩胛骨, 已残, 只留骨中间和后角部分, 残长 29 厘米, 残宽 15 厘米, 骨脊削平, 骨正面施灼, 反面兆痕清晰, 残留灼痕 17 个。标本 H591:2, 为牛右肩胛骨, 已残, 只留柄部, 残长 25.5 厘米, 骨脊被削平, 并刻出凹槽, 槽中施钻, 钻坑呈圆窝形, 钻坑径约 1.2—2 厘米。标本 H2:41, 为羊左肩胛骨, 基本完整, 前角和骨臼部分稍有缺失, 长约 18 厘米。周缘稍经削磨, 骨面有两钻坑, 上面的 1 个钻坑内有灼痕。

(2) 娄烦河家庄遗址^③: 发现 1 件卜骨(H4:1), 为猪右肩胛骨^④, 骨下部已残, 残长 11.8 厘米, 未经整治, 留有灼痕 1 个。

(三) 新 华 文 化

神木新华遗址^⑤: 共发现 45 件卜骨, 骨料主要是牛、羊、猪、鹿等动物的肩胛骨。其中以牛、羊的肩胛骨最多, 分别占发现总数的 40%、22%; 其次为猪的肩胛骨, 占 6.7%; 鹿的肩胛骨最少, 占 2.2%。大部分的卜骨未经整治, 保留完整的骨臼、骨脊、臼角, 个别肩胛骨经过粗略加工, 将骨脊削平或扇面前缘略加磨制。所有卜骨只灼不钻, 肩胛骨正反面都有施灼现象, 其中以反面施灼较多, 其次为两面同时施灼, 再次为正面施灼。另外, 在骨脊上也有施灼的现象。灼痕呈焦黑色或黄褐色, 灼痕一般较浅, 个别较深, 灼痕直径在 1—1.5 厘米之间。灼痕多分布于以骨脊为中轴线的扇面两侧, 排列较有规律。标本 96H18^③:5, 为牛左肩胛骨, 已残, 只留前角和颈侧缘一块。未经整治, 只灼不钻, 灼痕位于骨正反面。正面有 1 个圆形灼痕, 直径 1.3 厘米, 焦黑色兆痕清晰并透过反面; 反面骨

① 忻州考古队:《山西忻州市游邀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 年第 4 期;《忻州游邀考古》,科学出版社,2004 年,138 页,图一一二。

② 该文化目前尚未发现商代相关遗存,若该卜骨为商代以前遗物,则该卜骨所表现的类似商代的整治特征,可能较早见于该地区,但不排除该地区存在商代遗存的可能性。

③ 国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晋中考古》,文物出版社,1999 年,51 页,图三六。

④ 报告以为是羊肩胛骨,可笔者仔细观察线图,表现出猪右肩胛骨的特征。

⑤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神木新华》,科学出版社,2005 年,233—237 页,图一四一、一四八、一四九、二四〇、二四一,图版四九~五三。

脊左侧有圆形灼痕3个,直径约1.4厘米。烧灼有力,兆痕清晰。标本96H15②:5,为牛肩胛骨,仅残存扇部一块。未经整治,只灼不钻,骨正面有圆形灼痕9个,直径0.5—1.5厘米,兆痕清晰。标本99H15:7,为牛肩胛骨,已残,仅余扇部一块。骨脊经削平后磨光,一侧暴露出骨松质。只灼不钻,灼痕位于骨正反面,正面上端和边缘有圆形灼痕3个,直径大约0.7厘米。反面骨脊两侧有圆形灼痕2个,较深,左侧1个已穿透,直径分别为1.3、1.5厘米。标本96H15②:2,为牛右肩胛骨,已残,扇部稍有缺失。未加整治,只灼不钻。灼痕位于骨正面及骨脊。骨脊一侧有圆形灼痕6个,直径约1—2厘米,痕距约1.5厘米;正面中部有两排灼痕,残损严重,仅存圆形灼痕5个,兆痕清晰,直径0.7厘米,间距不等。标本96H15②:1,为牛左肩胛骨,已残,扇部大部分缺失。未加整治,只灼不钻,兆痕位于骨正面及骨脊。反面骨脊有圆形灼痕5个,直径约1.2厘米,痕间距约1.5厘米,兆痕清晰。正面有圆形灼痕6个,直径约1厘米。标本96H18③:4,为牛右肩胛骨,已残,只留前角一块。曾作过骨铲使用。骨面暴露出粗疏骨松质,扇面前缘经过打磨,形成刃部。灼痕位于骨正反面,正面有圆形灼痕1个,直径约1.2厘米,兆痕模糊;反面骨脊有圆形灼痕4个,兆痕清晰,直径约1.4厘米。标本96H18③:7,为猪右肩胛骨^①,已残,扇部两侧和骨脊一部分缺失。未经整治,只灼不钻。灼痕位于骨正面及骨脊。反面骨脊两侧扇部各有圆形灼痕3个,直径0.9厘米,兆痕清晰。标本99H51:1,为猪右肩胛骨^②,基本完整。骨脊稍加整治,留有砍痕痕迹。只灼不钻,骨正面有2纵列11个灼痕,左列7个,右列4个,直径1厘米左右,间距1—1.5厘米。兆痕清晰。标本96H18②:1,为羊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未加整治,只灼不钻,灼痕位于骨正面及骨脊,反面骨脊两侧扇部有圆形灼痕4个,直径1.0厘米,兆痕清晰。标本99F22:3,为羊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未加整治,只灼不钻,骨反面骨脊左侧有圆形灼痕3个,直径约0.7—1.4厘米。间距1厘米,兆痕清晰。

(四) 朱开沟文化

伊克昭盟朱开沟遗址^③:居住遗址中共发现卜骨约60件。骨料主要是牛和鹿的肩胛骨,还有少数猪、羊及熊的肩胛骨。报告未仔细分期,应该包含龙山晚期后段至商代的卜骨,如报告所说的“多数卜骨经过整治,最常见的是将骨脊(肩胛岗)和后缘修平”,应该属于商代,“部分将臼角(肩胛骨结节)亦去掉”,应属于商代晚期,“少数直接使用未经整治的骨料”,应属于龙山晚期至夏代。“发现的卜骨多数有灼有钻”属于夏代晚期至商代,“部分只有灼无钻”属于龙山晚期至夏代,“未发现有凿者”均早于商代晚期。简报中说

① 报告以为是羊肩胛骨,可笔者仔细观察线图和图版,发现背面的骨脊和卜骨整体形状表现出猪右肩胛骨的特征。

② 报告以为是鹿肩胛骨,可笔者仔细观察线图和图版,发现背面的骨脊和卜骨整体形状表现出猪右肩胛骨的特征。

③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朱开沟遗址》,《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黄蕴平:《内蒙古朱开沟遗址兽骨的鉴定和研究》,《考古学报》1996年第4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博物馆:《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2000年,123、124、280、281、418、419页,图版三六、九〇。

“在夏代中期遗存中发现卜骨,开始经加工整治,亦只灼不钻。夏代晚期遗址中也发现卜骨,多采用经整治过的动物肩胛骨,有灼有钻”。黄蕴平的文章中已指出朱开沟遗址出土的卜骨中,大部分属于夏代(该遗址的第二段至第四段),而龙山时期(第一段)和商代(第五段)发现的卜骨很少。其中标本 H2022:1^①,为牛右肩胛骨,基本完整,长 43 厘米,稍微修整^②,只有灼无钻,灼痕较浅,正面有灼痕 19 个,反面有 5 个。标本 T229④:2,为牛右肩胛骨,骨中间和下端稍有缺失,残长 30 厘米。稍微修整,在正、反面及骨脊均有灼痕,无钻。灼痕呈圆窝状,大而深,兆纹清晰。正面残留灼痕 7 个,反面 12 个,骨脊处 1 个。标本 QH76:1,为鹿左肩胛骨,已残,残长约 11 厘米。将骨料从中剖开,把剖开面磨平并施钻,钻坑排列较密集,直径 0.6—0.7 厘米,深 0.4—0.5 厘米,平底,周壁规整。多数钻坑都有灼痕。

黄蕴平文章中提供的图和文字描述指出,朱开沟卜骨大部分属于第二段至第四段,从其特征来看第四段的最多。其中标本 T247③,为牛右肩胛骨,已残,骨脊和后缘修理平整,露出松质骨。骨反面施钻,钻痕大而浅平,底有裂纹,未灼。标本 T240③,应为牛肩胛骨,已残,只留残片,骨片的一端保留平齐的锯切痕,骨片厚 4 毫米,骨反面残留钻灼痕 4 个。标本 H5004:5,为猪左肩胛骨,骨下部已残,骨正面留有灼痕 2 个,反面有钻痕 1 个。标本 T105②:2,为鹿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脊侧缘略施修整。骨正面留有钻灼痕 3 个,大而深。标本 H5001:7,为鹿右肩胛骨,比较完整,经过整治,骨反面削平,使整个肩胛骨变成一个平板,并修理磨光,骨反面施钻灼,此种形制卜骨已经进入商代。标本 H1076:7,为鹿右肩胛骨,已残,只留前角一段,骨脊被修平露出松质骨。骨反面残留有密集的钻灼痕 26 个,正面可见兆纹。标本 T404③:2,为鹿左肩胛骨,骨柄部残断,只留扇部,反面靠近胸侧缘部分被修去,露出松质骨,骨脊略加修整。骨的正反面皆有钻灼痕,比较密集,骨正面中间下端有钻灼痕 17 个,反面上部有钻灼痕 19 个。标本 H2024:1,为熊右肩胛骨,已残,卜骨的正、反面残留有钻痕。

(五) 岳石文化

(1) 章丘城子崖遗址^③:请参看龙山时期山东龙山文化城子崖遗址卜骨的描述。

(2) 泗水尹家城遗址^④:发现 3 件卜骨,系用牛、鹿的肩胛骨加以整治而成,皆残,有灼有钻,无凿。标本 T232⑦:39,为牛肩胛骨,已残,边缘有刮削痕迹,残存钻痕 3 个,直径 1.2 厘米。标本 T237⑦:42,已残,原报告无标本描述。

① 报告文字描述和图版的号码不一致,按附表五(朱开沟遗址部分卜骨登记表),图版的号码应该是正确,即标本 H2022:1,标本 T229④:2。附表五认为标本 H2022:1,为骆驼右侧肩胛骨,可笔者仔细观察图版,应该为牛右肩胛骨,卜骨的文字描述已经改成为牛肩胛骨,这样朱开沟遗址的卜骨中没有用骆驼的肩胛骨。

② 报告说“标本 T229④:2,使用未加整治的牛肩胛骨”,“标本 H2022:1,将肩胛岗去掉并修治平整”。但经笔者仔细观察,前者骨脊应该是人工加修整的,后者肩胛岗也只是略加修整。即两件卜骨均刮削骨脊一部分,稍微修整。

③ 李济总编:《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真之黑陶文化遗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 年,85—89 页,图版伍拾叁。

④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研室:《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 年,197 页,图版七八。

(3) 桓台县史家遗址^①:发现2件卜骨,均为猪肩胛骨^②,皆残,不见任何修整痕迹,残断处仍留有灼痕,大部分兆纹已失,有人工刻划的文字或符号。标本96HSF1H:232,已残,只留柄部,残长11厘米,最宽3.2厘米。两面均刻有文字,一面为“Λ”、“λ”,可隶释为“犬”、“卜”;另一面有“𠂔”、“𠂔”、“X”三字,未曾隶释。刻划较深,笔画直拙而清晰。标本96HSF1H:226,已残,只留柄部,残长5.5厘米,宽3厘米。一面有明显的人工刻划痕迹,但笔画比较杂乱,中间1字为“𠂔”,可隶释为“牵”,即“幸”字。

(4) 牟平照格庄遗址^③:发现12件卜骨,有猪、羊、鹿的肩胛骨,其中鹿6,羊4,猪2件。有钻和灼痕。其中标本H3:7,为羊左肩胛骨,基本完整,骨中间稍有缺失,长18.4厘米。标本H37:14,为羊左肩胛骨,已残,骨中间和前角缺失,钻和灼痕明显。标本T5⑤:15,为鹿左肩胛骨,比较完整,骨下部和前后角稍有缺失,残长约22厘米,有6个钻坑,分两行排列,似为“三联钻”。

(5) 烟台芝水遗址^④:发现2件卜骨,均为猪肩胛骨,有灼无钻。标本G1①:29,为猪左肩胛骨,比较完整,前角缺失,宽端经过修整,一面有灼痕。

(6) 夏邑清凉山遗址^⑤:发现3件卜骨,均为牛肩胛骨,均属第一期,皆残,未见完整者。标本H33:2,已残,只留骨中间一块,有灼有钻,反面有兆纹。多为圆钻,有的地方为两面钻,钻直径约为1厘米左右,残留灼痕5个。标本T5⑧:32,应为牛右肩胛骨,已残,只留后角一段,有圆钻,钻坑排列密,钻直径约为1.6厘米左右。

(7) 民权李岗遗址^⑥:发现1件卜骨(TG1⑤:19),为猪肩胛骨,已残,有灼有钻,骨面残留灼痕4个。应属于岳石文化早期晚段。

(六) 先 商 文 化

(1) 邢台粮库遗址^⑦:发现2件卜骨,均为牛肩胛骨,皆残。标本ⅢH21:3,为牛肩胛骨,残存扇部一块,残长18厘米。骨正反面均有钻坑,钻坑内施灼,都留有明显的兆纹。标本ⅢH21:4,为牛肩胛骨,残存扇部一块,残长18.3厘米,其形制与ⅢH21:3完全一样。

(2) 永年何庄遗址^⑧:发现2件卜骨,均已残。标本T9②:37,为猪肩胛骨,已残,只留

① 淄博市文物局、淄博市博物馆、桓台县文物管理所:《山东桓台县史家遗址岳石文化木构架祭祀器物坑的发掘》,《考古》1997年第11期。

② 报告认为该遗址的卜骨“均为羊肩胛骨”。虽然卜骨已残,只留柄部一段,但笔者仔细观察,发现骨脊和骨臼的形状表现出猪肩胛骨的特点,而且卜骨比较厚,应该为猪肩胛骨。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牟平照格庄遗址》,《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

④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烟台市博物馆:《胶东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122页,图二〇。

⑤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丘地区文管会:《河南夏邑清凉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研究》(四),科学出版社,2000年,496页,图三二。

⑥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豫东商丘地区考古调查简报》,《华夏考古》2005年第2期。

⑦ 河北省邢台市文物管理处:《邢台粮库遗址》,科学出版社,2005年,64页,图六四,图版二。

⑧ 邯郸地区文物保管所、永年县文物保管所:《河北省永年县何庄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2年第4期。

柄部,残长 16.2 厘米,骨正面留有灼痕 4 个,无钻无凿。

(3) 邯郸北羊台遗址^①:发现 7 件卜骨,均残。标本 H2:7,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 31.6 厘米。骨正面残存 2 个烧灼成黑色的不规则孔,无钻凿现象。标本 H1:8,应为牛左肩胛骨^②,已残,只留柄部,残长 16.4 厘米。骨正面有 6 个烧灼的黑色印痕,亦无钻凿现象。

(4) 磁县下七垣遗址^③:该遗址第四层发现 3 件卜骨,全为动物肩胛骨,骨料未加整治,只有灼痕。其中标本 T13^④:1051,为羊左肩胛骨,已残,颈侧缘和前角缺失,残留灼痕 4 个,灼痕较大。该遗址第四层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

(5) 新乡潞王坟遗址^⑤:该遗址上层发现 3 件卜骨,下层发现 1 件卜骨。其中标本 T2:25(下层出土),为猪右肩胛骨,比较完整,骨中间和前角稍有缺失,骨臼和骨脊保存完好,卜骨一面有灼痕。标本 T4:8(上层出土),羊右肩胛骨,已残,骨中间和前角缺失,骨臼尚在,骨正面有灼痕。

(6) 新乡李大召遗址^⑥:发现 2 件卜骨,用动物肩胛骨制成。标本 II T2506H299:149,为猪左肩胛骨,已残,骨中间和前角缺失,长 15.1 厘米。浅黄色骨质,上有数个圆形和椭圆形钻和灼痕。标本 VI T0411H12:72,应为羊右肩胛骨,已残,靠近脊侧缘部分和前角缺失,残长 12.0 厘米。灰色骨质,骨面上仅有灼痕 4 个。

(7) 杞县鹿台岗遗址^⑦:发现 3 件卜骨,均为牛肩胛骨。标本 H39:83,已残,两边的胸、颈侧缘几乎缺失。有灼痕,有钻,残存灼(或钻)痕 16 个,圆钻坑直径多在 1—2 厘米之间。标本 H35:33,已残,有灼有钻,无凿,残存灼(或钻)痕 5 个。标本 H9:33,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前角、后角和骨臼稍有缺失。有灼有钻,无凿,钻坑直径约 1—1.5 厘米,骨反面残存灼痕 18 个。

(七) 斗鸡台文化

仅在寿县斗鸡台遗址^⑦ T1^⑤层中发现 30 多件卜骨,有牛、羊、鹿的肩胛骨,以羊肩胛骨最多,皆未经整治,有灼痕而无钻无凿。

①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邯郸市文物管理处、峰峰矿区文物管理所:《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北羊台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1 年第 2 期。

② 原报告认为是猪肩胛骨,经笔者观察,该标本残块比较大,应为牛左肩胛骨,尤其是线图的骨脊为牛肩胛骨的典型“刀形”特征,而猪肩胛骨整体形状为“三角形”,且从骨正面看不到骨脊部分。

③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下七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 年第 2 期。

④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新乡潞王坟商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 年第 1 期。

⑤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韩国河、赵海洲:《新乡李大召——仰韶文化至汉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6 年,224 页,图一五三。

⑥ 郑州大学文博学院、开封市文物工作队:《豫东杞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 年,99、106、112 页,图五四、五九,图版四。

⑦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周组、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省霍邱、六安、寿县考古调查试掘报告》,《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社,1997 年,288、289 页。

(八) 夏家店下层文化

(1) 赤峰药王庙遗址^①:发现 1 件卜骨(F2:10),为猪左肩胛骨,骨下部已残,有灼有钻,骨反面残留灼痕 4 个,骨正面有兆纹。

(2) 赤峰夏家店遗址^②:发现 1 件卜骨(H2:1),已残,用动物肩胛骨制成,骨一面先钻后灼,另一面有卜兆。

(3) 赤峰蜘蛛山遗址^③:发现 2 件卜骨。标本 T1②D:7,用动物的肋骨,一面先钻后灼,反面有卜兆。另采集的 2 件,是猪羊肩胛骨,有钻有灼。

(4) 赤峰东山咀遗址^④:发现 2 件卜骨,皆为残片,未经修整。一面钻有圆穴,并经过烧灼,另一面有裂痕,即兆纹。标本 H1:9,已残,残长 9 厘米,骨反面残留钻灼痕 15 个。

(5) 敖汉旗范仗子墓地^⑤:该墓地 B 区发现卜骨,但报告没提供图版和详细的文字描述。

(6) 建平水泉遗址^⑥:该遗址下层遗存发现卜骨,用料为牛、猪、羊等动物的肩胛骨。标本 T21⑤:15,为羊左肩胛骨,骨下部已残,先钻后灼,钻坑小而不透,直径 0.4—0.9 厘米,骨面上留有 36 个,较密集^⑦。该遗址下层遗存的年代范围为距今约 4 200—3 400 年左右。

(7) 延吉百草沟遗址^⑧:发现 1 件卜骨,为羊左肩胛骨,比较完整。略加修整,骨脊被削去,骨臼保存原状,无钻无凿,只有灼,骨反面有 48 个,正面兆纹不明显。灼痕大小不一,直径 0.5—1.2 厘米。

(8) 唐山大城山遗址^⑨:该遗址发现了 4 件卜骨,其中 3 件为牛肩胛骨,1 件为鹿肩胛骨。骨面有灼无钻,灼痕多在卜骨的反面,一般比较密集而不规则。骨臼、骨脊均削去,打磨光滑;粗制的有将骨脊削去一半,骨面稍加刮治。此类可能已经进入商代。

(9) 蔚县庄窠遗址^⑩:该遗址第二阶段发现一些卜骨,卜骨采用整治的动物肩胛骨,一般只施灼。个别卜骨上有挖成的不很规则的“钻坑”。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 年第 1 期;《内蒙古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61 年第 2 期。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 年第 1 期;《内蒙古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61 年第 2 期。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蜘蛛山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9 年第 2 期。

④ 辽宁省博物馆、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赤峰县文化馆:《内蒙古赤峰县四分地东山咀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 年第 5 期。

⑤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敖汉旗范仗子古墓群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 年第 3 期。

⑥ 辽宁省博物馆、朝阳市博物馆:《建平水泉遗址发掘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86 年第 2 期。

⑦ 报告标本 T21⑤:15(图版叁~7),可报告图版叁没有 7,只有报告提供的图版肆~8 为卜骨。可能报告者编辑中有错误。笔者只按照图版肆~8 来描述。

⑧ 李连:《百草沟发现无文卜骨》,《文物参考资料》,1957 年第 7 期。

⑨ 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北省唐山市大城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 年第 3 期。

⑩ 张家口考古队:《蔚县夏商时期考古的主要收获》,《考古与文物》1984 年第 1 期。

(九) 齐 家 文 化

新石器时代齐家文化中的卜骨以往论证已较清楚,此不赘述。

(十) 四 坝 文 化

仅在民乐东灰山遗址^①发现4件卜骨,为猪、羊的肩胛骨。标本022,为猪右肩胛骨^②,已残,骨中间和前角缺失,长约14.5厘米,骨脊稍经削磨,骨面留有圆形灼痕1个。标本87MX:032,为猪左肩胛骨^③,基本完整,长17.8厘米,扇面边缘经过削磨,骨正面有灼痕。标本0125,为羊右肩胛骨,骨下部已残,骨脊稍经削磨,骨正面留有圆形灼痕1个。

三、商 代

(一) 商 代 早 期

1. 二里岗文化

(1) 郑州南关外遗址^④:该遗址的下层发现11件甲骨^⑤,皆碎块。质料有牛、猪肩胛骨和龟甲,其中以牛肩胛骨较多,计九块。一般略加整治,也有未经整治的,其卜法多直接灼于骨面。其中标本C5T97^④:40,为牛右肩胛骨,已残,一端带有骨白,残长13厘米。为直接灼制,且灼前曾对灼面进行修整。标本T95:146,为牛左肩胛骨,骨中间和下部已残,骨面留有灼痕。该遗址的下层(南关外期)应早于郑州商代二里岗期下层,其时代应为商代早期或先商文化。

该遗址的中层发现69件甲骨,均残。分牛、猪、羊的肩胛骨和龟甲等四种,其中以牛肩胛骨最多,龟甲极少。猪、羊和部分牛的肩胛骨皆略加整治,用火直接灼于骨面。少量牛肩胛骨和龟甲是钻后再灼的。该层相当于郑州二里岗期下层。

该遗址的上层发现55件甲骨,皆残。卜骨53件,卜甲2件。卜骨中牛肩胛骨有44

①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甘肃民乐县东灰山遗址发掘纪要》,《考古》1995年第12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北方考古研究室:《民乐东灰山考古——四坝文化墓地的提示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25、171页,图版五、五六。

② 报告说“系羊肩胛骨制成”,可笔者仔细观察图版,发现骨整体和骨脊呈显出猪肩胛骨的特征,可以推断此片卜骨应为猪右肩胛骨。

③ 报告说“系羊肩胛骨制成”,然报告图版所示,骨整体和骨脊呈显出猪肩胛骨的特征,因此这片卜骨应为猪左肩胛骨。

④ 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136页,图八五,图版二七;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南关外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

⑤ 报告没有对该遗址出土的甲骨仔细分类,不知各质料的数量,也无法区分卜骨和卜甲。商周时期均有卜骨和卜甲,但有一些地区或遗址仍然只出卜骨。本文为了分别只出卜骨的遗存,卜骨和卜甲共出的,均说共出土甲骨多少件,只出卜甲者,直接在附录二卜甲上说明。

件,分直接灼和钻后再灼两种。猪肩胛骨3件和羊肩胛骨6件,皆是直接灼于骨面的。该层应属于郑州商代二里岗期上层^①。

(2) 郑州商城遗址^②:发现共200多件甲骨。研究者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陶器主要特征的演变规律,一般将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遗存区分为“商代二里岗下层一期、二期”和“商代二里岗上层一期、二期”前后4个小期。商代二里岗下层一期遗址发现卜骨,多残片。其中能看出骨料品种的以羊肩胛骨的数量为多,并有一些猪、牛肩胛骨。一般是保留肩胛骨的骨白部分,并把肩胛骨板一面用火直接灼制而成。其中标本C7H15:45,为牛右肩胛骨,已残,残长18厘米。经过修整,骨脊削去,残留骨脊的根部,骨反面直接施灼,留有灼痕15个。标本C7H15:11,为猪右肩胛骨^③,基本完整,个体较小,长11厘米,骨面有灼痕14个。标本C1H9:26,为猪右肩胛骨,比较完整,只缺前角一段,长19.2厘米,顶宽3.7厘米。经过修整,骨脊削去,有灼无钻,骨面上有灼痕4个。标本C1H14:50,猪右肩胛骨,骨下部已残,残长14厘米。经过修整,骨脊削去,骨反面直接灼制,留有灼痕14个。标本C1H9:24,为羊右肩胛骨,比较完整,只缺骨中间下端,长16.5厘米,宽10厘米。略加修整,骨脊部分稍有削去,有灼无钻。

商代二里岗下层二期遗址发现106件甲骨,卜骨96件,卜甲10件。出土数量相当多,但多破碎成块,完整者很少。其中牛肩胛骨有56件,一般都是去掉骨脊,略加修整,即在骨面上直接用火灼制出灼点,有些灼点似排列有序。猪肩胛骨有9件,羊肩胛骨有31件,其中有的经过把骨脊棱削去修整后才烧灼,也有的未经修整直接烧灼。标本C5H19:4,为牛左肩胛骨,基本完整,长60厘米,宽22.6厘米。骨正面中间下端有灼痕50多个,这些灼痕圆点呈左右成行与上下成行状构成一片近方形灼点区。标本C5T21^②:39,为牛肩胛骨,只留扇部,残长13.8厘米,残宽13.5厘米。骨正面灼痕密集,留有39个,似乎排列有序。骨反面也刮削平整,磨制光滑,其上也隐约可见数处灼痕。标本C5H40:20,为牛肩胛骨,只留扇部,残长21厘米,最宽处21厘米。骨反面的骨脊棱被削去,正面有成排圆的灼痕20个。标本C9.1H105:21,为牛右肩胛骨,已残,仅剩柄部一段,残长15厘米。在削去骨脊的一面,残存有一排3个较大的灼痕。标本C5H13:20,为牛肩胛骨,已残,残长21.7厘米。牛肩胛骨的骨白部分也经过修整,反面骨脊也被削去,并在骨面上有灼痕32个,从灼点看似纵横排列有序。标本C9.1H106:10,牛左肩胛骨,只留颈侧缘下部一段,残长13.4厘米。反面骨脊被削去,在两面上皆残有灼痕,正面有5个,反面有6个。

标本C9.1H105:15,为猪左肩胛骨,几乎完整,只缺颈侧缘一段,长20.7厘米。保留骨脊,骨正面中间下部有灼痕13个,反面有灼痕3个,灼痕排列不甚规整。标本C7H11:

^① 该遗址的上、中层在《郑州商城》一书中,与郑州商城遗址一起描述,无法分二者,本文只好在郑州商代遗址中一起描述。郑州商城的两百多件卜骨中统计有南关外遗址的中上层的124件卜骨。

^② 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174、175、367、681、834、835、836页,图一一〇、一一一、二二四、四六七、四六八、五六〇,图版三七、一四八、二三七、二三八。

^③ 报告说“为羊肩胛骨卜骨”,可笔者详细观察图一一〇~2,发现骨整体形状呈出猪肩胛骨的特征,可以推断该片卜骨应为猪右肩胛骨。

14,为猪肩胛骨^①,几乎完整,长14厘米,在削去骨脊的一面,直接灼7个点。标本C9.1H106:13,为猪右肩胛骨,比较完整,骨中间稍有缺失,长16.9厘米,宽11厘米。骨脊削去,仅留脊根,在两面均用火灼制出密集的灼痕,颈侧缘中间钻有1个小孔。

商代二里岗上层一期遗址111件甲骨,多残片。卜骨74件,卜甲37件。卜骨主要用牛、猪、羊、鹿的肩胛骨制成,经过修整。牛肩胛骨多是先钻出圆坑,然后再在圆坑内进行火灼,而对于猪、羊、鹿的肩胛骨,除有极少数的钻后再灼外,仍多是用火直接在骨面上灼制的。其中标本C15T14②:15,为牛左肩胛骨,表面呈铜锈绿色。已残,只留柄部,残长12.8厘米。骨反面削刮修整,上部刻出凹槽,槽中先钻后灼,钻灼圆坑密集,似排列有序。标本C5H20:36,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19.3厘米、骨白宽7.6厘米。骨面经过细致修整,上部刻出凹槽,槽中先钻后灼,但其中也有个别是未钻而直接在骨面上灼制的灼点,残留灼痕26个。标本C5.3H311:6,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11.1厘米。经过修整,上部刻出凹槽,槽中先钻后灼,残留灼痕32个,其中骨的一侧棱上还有数道锯痕。标本C9.1H142:39,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颈侧缘一段,残长10.5厘米,残宽8.7厘米。经过修整,先钻后灼,残留灼痕46个,分布很密集,骨正面也有许多清晰的兆纹。标本C9H1:5,为牛肩胛骨,已残,只留后角一段,残长13.5厘米。在骨正面上有数排整齐的直接灼点。C5H20:11,为牛肩胛骨,已残,只留后角一段,残长11厘米,残宽16厘米。骨正面直接灼制,残留灼痕12个。标本C5.1H112:17,为牛右肩胛骨,骨中间和柄部已残,在削去骨脊棱的一面上,分布着数十个灼点。标本C9.1T108①:84,为猪左肩胛骨,基本完整,长17厘米。去掉骨脊,保留脊根,在骨反面靠近柄部较厚的地方有3个圆钻,坑内施灼,而在其他部分则是直接灼制。标本C5.3H317:61,为猪左肩胛骨,比较完整,只前角稍有缺失,长17.2厘米。骨正面靠近柄部有2个钻后再灼的灼点,并已将骨灼透。标本C5.1H112:16,为猪右肩胛骨,骨下部已残,残长14.3厘米。去掉骨脊,保留脊根,先钻后灼,骨反面残留灼痕11个。标本C5.3H317:2,为羊右肩胛骨,骨中间和前角稍有缺失,长19.5厘米。在骨正面直接灼制有灼点9个。

此外,还在郑州回民中学遗存^②、省中医学院东里路家属院^③、郑州黄委会青年公寓^④等地共发现3件,每遗址各1件。标本91H32:11,为牛肩胛骨,已残,只留扇部一块,残长15厘米,残宽9厘米。骨正反两面均有灼痕。该卜骨属于二里岗下层文化。标本F2:2,为牛肩胛骨,已残,只留扇部,残长23.7厘米,宽18.2厘米。钻灼痕都比较清晰,钻坑排列也似有一定规律。标本H64:1,为羊肩胛骨,已残,未经加工,有灼痕12个,无钻凿痕

① 报告提供的两件以为是羊肩胛骨,但笔者仔细观察两件肩胛骨的整体特征,应为猪肩胛骨。如这样,羊肩胛骨31件中应该还有猪肩胛骨。

②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1992年度郑州商城宫殿区发掘收获》,《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1985—199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114页,图十八。

③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1992年度郑州商城宫殿区发掘收获》,《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1985—199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131页,图三三。

④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黄委会青年公寓考古发掘报告》,《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1985—199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213页,图二五。

迹。该卜骨属于二里岗下层。

(3) 郑州旭畚王村遗址^①:共发现 20 件甲骨,皆残,其中含有中、晚商时期的甲骨。其卜法有仅在骨面直接灼的,骨料以牛和猪肩胛骨(标本 T28:30)最多;有先钻后灼的,骨料以牛肩胛骨(标本 T29:55)为最多;有先钻或凿后灼的,骨料以牛肩胛骨(标本 T28:29)为主,龟甲次之,此类应属于中商;有钻凿后再灼的,骨料以龟甲(标本 H81:1)最多,此类应属于晚商^②,钻凿排列以千里路为界左右对称。

(4) 郑州大河村遗址^③:发现 1 件卜骨(H13:4),为牛肩胛骨,已残,残长 25 厘米,残宽 7.8 厘米,厚 3.4 厘米。边沿略经加工,残存灼痕三行 18 个。

(5) 郑州大师姑遗址^④:发现 2 件卜骨。标本 H40:1,浅褐色,扁平状,残长 16.6 厘米,残宽 8.8 厘米,厚 0.5 厘米。经过修整,有灼有钻,骨反面残有灼痕 16 个。标本 T6②b:1,浅褐色,已残,残长 13.5 厘米,残宽 5 厘米。有灼有钻,骨反面残有灼痕 40 个。2 件卜骨应为二里岗上层一期^⑤。

(6) 郑州铭功路东遗址^⑥:发现 3 件卜骨。该遗址第一期文化遗存中发现 1 件卜骨(H3:115),为牛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兼施钻灼,骨反面残存圆钻坑 4 个。第二期遗存中发现 2 件卜骨,有钻有灼。标本 H1:62,为牛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 17 厘米。稍经削制,骨反面残留圆钻坑 15 个,坑内施灼。T1④:6,为牛肩胛骨,残存 1 块,残长 11.5 厘米。骨面残留钻坑 3 个。应均为二里岗上层^⑦。

(7) 郑州木材公司遗址^⑧:共发现 52 件甲骨。二里岗下层遗存中发现 8 件卜骨^⑨,其质料有牛、鹿肩胛骨两种。标本 T3④:10 付 2,为牛肩胛骨,仅存柄部,残长 12 厘米。骨臼切去一半,有钻、灼痕。标本 T3④:4 付 1,亦为牛肩胛骨,残长 22 厘米,残宽 2.7 厘米。两面相对灼,钻成行。标本 T3④:6,为鹿肩胛骨,较完整,长 18.5 厘米。未经加工修整,仅有灼痕。二里岗上层遗存中发现 44 件,均残,其中有牛、猪、鹿肩胛骨和龟甲等。仅见灼或灼、钻,不见凿,多数在使用前略加修整。骨臼锯去或切去一半,与前部扇面形成一平面。或将反面的骨脊切去。标本 T1④:20,为牛肩胛骨,只留柄部,有钻、灼痕。灼痕呈不规则的圆形,较浅;钻痕呈规则的圆形,圜底。直径 0.6 厘米,深 0.5 厘米。标本 T1④:45,为牛肩胛骨,两侧残,呈长条形,长 36.5 厘米。仅见灼痕。标本 T1③:1,应为牛肩胛

① 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旭畚王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8 年第 3 期。

② 从目前所知的卜用甲骨材料来看,商代早、中期郑州地区还未见有钻凿灼的甲骨。

③ 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 年第 3 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上、下),科学出版社,2001 年,573 页,图三四二。

④ 郑州市文物研究所:《郑州大师姑(2002—2003)》,科学出版社,2004 年,312、332 页,图二二六、二三八。

⑤ 原报告认为 H40 属于该遗址的第一期,相对年代应为二里岗下层偏早阶段;T6②b 属于该遗址的第三期,相对年代应为二里岗上层一期。

⑥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铭功路东商代遗址》,《考古》2002 年第 9 期。

⑦ 原报告将 H3:115 定位二里岗下层。

⑧ 郑州市大河村遗址保管所:《郑州市木材公司商代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0 年第 4 期。

⑨ 报告提供的 2 件牛肩胛骨,其特征与中商卜骨类似。该遗址二里岗下层的卜骨中应有中商时期的卜骨,这些卜骨很可能是挖掘时混进去的。

骨,已残,呈不规整形,有钻、灼痕。灼痕小而浅,钻痕大而深,尖底,直径1.3厘米,深0.7厘米。标本T1④:22,已残,长14厘米,未经加工修整,只有灼痕3个。

(8) 偃师商城遗址①:发现的卜骨较多,可公布的只有以下3件卜骨,用牛、猪和羊的肩胛骨制成。标本96H179:1,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27.6厘米。骨白保留原状,骨脊被削去,骨反面有圆钻和灼痕,钻坑较小,分布密集,正面可看到兆纹。标本91H9:5,为猪右肩胛骨②,比较完整,骨扇部稍有缺失。未经整治,骨反面有钻灼痕5个,无凿。标本83T1 城墙夯土:007,为羊肩胛骨,已残,残长4.4厘米,骨面尚存灼痕4个。

(9) 荥阳西史村遗址③:发现1件卜骨(T6:15),为牛左肩胛骨,基本完整,骨中间稍有缺失,反面加工平整,有很多发黑的灼痕。正面加工光滑,有反面灼透的痕迹。应属二里岗文化上层④。

(10) 荥阳薛村遗址⑤:发现3件卜骨,均为猪肩胛骨。在骨正面的较薄部分施灼,灼点都为圆形或椭圆形,绝大部分灼点都在反面留下了对应的印痕,但几乎没有兆纹。标本ⅡT1216H58:20,长18.1厘米,宽11.1厘米。经过修整,削去骨脊,施灼部分残裂。标本ⅡT1216H58:13,长15厘米,宽9.5厘米。除反面有部分残缺外,施灼面保存完好,共有13个灼点,但反面只有4个印痕。2个灼痕上裂开有兆纹。标本ⅡT1216H58:23,灼面上有2个灼点破裂穿透,其余保存完好。灼点排列密集,且大部分灼点在反面留下了印痕,有2个灼点发现有裂纹。

(11) 巩县稍柴遗址⑥:发现11件卜骨,皆残,分二型。A型有8件,先钻后灼。标本H26:7,为牛肩胛骨,已残,经过整治,切去骨脊,先钻后灼,钻坑大小不一,刻有“\”符号。B型有3件,羊肩胛骨制成,仅有灼痕。标本T5①:16,羊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骨正面残留灼痕2个。

(12) 洛阳涧西孙旗屯遗址⑦:发现1件卜骨,为猪肩胛骨,有灼痕。与郑州商代早期卜骨相似。

(13) 登封王城岗遗址⑧:发现10件甲骨,卜骨9件,卜甲1件。其中牛肩胛骨7件,羊肩胛骨1件,不明种属者1件,骨面上皆有先钻后灼痕迹。其中标本WT8③:4,牛肩胛骨,已残,只留骨白部分一段,残长5.2厘米,宽5.6厘米。骨反面上有钻后再灼痕迹9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偃师商城的初步勘探和发掘》,《考古》1984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偃师商城第Ⅱ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11期;《河南偃师商城Ⅳ区1996年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2期。

② 报告以为是羊的肩胛骨,可笔者仔细观察线图,发现背面的骨脊和卜骨整体形状表现出猪右肩胛骨的特征。

③ 郑州市博物馆:《河南荥阳西史村遗址试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5),文物出版社,1981年。

④ 报告认为此卜骨属于该遗址的第一期(二里头文化),可笔者仔细观察图版,该卜骨的整治与钻凿形态特征,应该属于该遗址的第四期(二里岗文化上层)。

⑤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荥阳市薛村遗址2005年度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7年第3期。

⑥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巩县稍柴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3年第2期。

⑦ 河南文物工作队第二队孙旗屯清理小组:《洛阳涧西孙旗屯古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9期。

⑧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169页,图版五九;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大象出版社,2007年,304、305页,彩版二八。

个。标本 W5T0644H13:2, 牛右肩胛骨, 黄褐色, 已残, 残长 22.8 厘米。有烧灼痕数个。标本 W5T0444⑥:12, 牛肩胛骨, 黄褐色, 已残, 残长 10.8 厘米。先钻后灼, 留有烧灼痕 9 个。标本 85WT265④:10—1、2, 牛肩胛骨, 褐色, 已残, 残长 14.5 厘米。留有烧灼痕数个。标本 W5T0644H13:15—1、2, 为羊右肩胛骨, 褐色, 骨下部已残, 残长 11.8 厘米。烧灼痕清晰。

(14) 内乡黄龙庙岗遗址①:发现 1 件卜骨, 已残, 有钻无凿。

(15) 柘城孟庄遗址②:发现共 19 件甲骨, 其中卜骨 12 件, 卜甲 7 件。卜骨中, 牛肩胛骨 7 件, 兽类长骨 2 件, 鹿、猪、羊的肩胛骨各 1 件。鹿肩胛骨未经整治即使用。猪和羊的肩胛骨只切掉骨脊, 但未被切平。牛肩胛骨于骨白下边切开一段, 把两边及骨脊全部削平。H30:8 例外, 切去白角, 并将骨白、骨脊及两边全部切平, 这类卜骨多见于商代晚期。先钻后灼, 钻灼痕多见于骨反面, 正反面都有的仅个别见到(如 T2:1:3)。灼痕均在钻坑上, 疏密不等, 排列无规律, 钻坑径大的 1.3 厘米, 小的 0.4 厘米, 一般是 0.8 厘米左右。钻坑底面形状, 计有尖圆、平圆和纯圆等差别。绝大多数钻是用钻钻成的, 少数钻则用刀一类工具挖成。另外猪、羊的肩胛骨和牛肩胛骨及龟甲较薄之处还有直接灼的现象③。

2. 琉璃阁类型

(1) 辉县琉璃阁遗址④:发现 20 件卜骨, 其中牛肩胛骨 17 件, 猪肩胛骨 3 件。整治方法简单, 稍加刮磨, 骨脊削去一部分仍留骨根。钻灼方式有不钻而灼、钻而后灼、钻而未灼、挖而后灼者四种。不钻而灼多施于骨板较薄处, 钻而后灼的多在较厚的骨板上, 排列无规律。钻坑的形状, 钻口部分是很规则的圆形, 纵剖面成圆柱形(平底)、圆锥形(尖圆底)和半球形(圆底)三种形状, 以尖圆底为最多。

标本 H1:1, 为牛右肩胛骨, 已残, 残存柄部和颈侧缘一部分, 残长 23 厘米, 残宽 2.5 厘米。骨白刮去一半, 骨反面全部刮平。大部分是钻而后灼, 薄的部分多半是未钻而灼。钻坑多为尖圆形, 仅柄部有两个圆柱体的平底钻坑。标本 H1:91, 牛左肩胛骨, 已残, 只留前角一块。骨脊完全削去, 骨面刮削磨光, 骨的正反两面有钻灼痕共 50 个, 其中钻而灼的 6 个, 其余都是不钻而灼的。标本 H1:4, 为牛右肩胛骨, 已残, 只留柄部。骨白未去, 骨反面挖成一深槽, 骨脊完全削去, 骨面平滑上光。不钻而灼的, 骨反面有灼痕 20 个, 灼痕之间的距离较规则。标本 H1:100, 为牛左肩胛骨, 已残, 只留扇部一块, 骨脊刮削一部仍留脊根, 骨面上光, 骨反面挖而后灼。标本 H1:101, 为猪右肩胛骨, 比较完整, 骨中间和前角稍有缺失。未加修整, 骨正面有灼痕 6 个, 其中 1 个较大, 其余 5 个很小, 最小的直径 0.2

① 内乡县综合博物馆:《河南内乡县部分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92 年第 1 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商丘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柘城孟庄商代遗址》,《考古学报》1982 年第 1 期。

③ 报告认为该遗址的年代相当于郑州商代二里岗下层。从卜用甲骨的特征来看, 大多数相当于郑州二里岗上层, 少数切去白角的相当于殷墟时期。

④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 科学出版社, 1956 年, 第 13—15 页, 图版捌。

厘米。灼痕浅而无规则,反面无兆纹。

该遗址所出卜骨大部分均属于商代早期,但从其形制看,仍存在时间的早晚差异。如保持自然形状的骨臼时代较早,骨臼切去一半的较晚,此类应属于中商;骨脊保持天然形状的最早,刮削一部仍留脊根的其次,全部削去的最晚(二里岗上层);直接施灼的较早,钻而后灼的较晚。由上所述可知,该遗址的17件牛肩胛骨中H1:4、42、100,较早;H1:1,为最晚;其余两者居中。3件猪肩胛骨中H1:13、101,较早;H1:80,较晚。

(2) 辉县褚邱区遗址^①:该遗址灰坑1发现18件卜骨,已残,均为动物肩胛骨制成,提供的图版中2件为猪肩胛骨,1件为鹿肩胛骨。均未经过修整,只有灼痕,无钻无凿。

(3) 辉县孟庄遗址^②:发现5件卜骨^③,皆残。标本ⅧT89H48:1、2,二者应为牛肩胛骨,均残,残长为14.6厘米和15.9厘米,残宽为2.8厘米和3.8厘米。一面有圆形钻坑,并有灼痕。标本XXT26H54:3,为牛肩胛骨,已残,只留扇部一块,残长18厘米,残宽15.8厘米。骨正反面均有圆钻坑,分布密集,少数钻坑内有灼痕。标本ⅧT69H65:1,为牛肩胛骨,已残,只留扇部一块,残长18.9厘米,残宽19厘米。骨正反面均有圆钻坑,每个坑都是先钻后灼,分布较密集。XⅢT149H36:5,为羊肩胛骨,已残,只留一半,残存灼痕2个。

3. 台西类型

(1) 藁城台西遗址^④:该遗址早期居址(大体相当于二里岗上层,或者稍早)发现卜骨,无法详细说明,下面与晚期甲骨一起描述。相关的内容请看中商时期该遗址的描述。早期卜骨都只先钻后灼。其中标本T1:71,为猪肩胛骨,骨臼、骨脊均未加工,正面有两个钻坑,未见灼痕。

(2) 磁县下潘汪遗址^⑤:发现1件卜骨(T9r:3),系牛肩胛骨制成,有钻无凿,灼痕明显。

4. 大辛庄类型

(1) 济南大辛庄遗址^⑥:该遗址共发现984件甲骨,其中卜骨297件,卜甲687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125页,图版玖玖。

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辉县孟庄》,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278页,图一九五。

③ 笔者仔细观察报告提供的图版,发现报告殷墟文化遗存出土的两件卜骨(标本XXT26H54:3和ⅧT69H65:1)均显示出郑州二里岗上层文化卜骨的特征。因此本文将两件卜骨归属于商代早期。

④ 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藁城台西村的商代遗址》,《考古》1973年第5期;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台西考古队:《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1979年第6期;李学勤、唐云明:《河北藁城台西甲骨的初步考察》,《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3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⑤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下潘汪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⑥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23页;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勘查纪要》,《文物》1959年第11期;《济南大辛庄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4期;蔡凤书:《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的调查》,《考古》1973年第5期;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博物馆:《1984年秋济南大辛庄遗址试掘述要》,《文物》1995年第6期;徐基:《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的初步研究》,《文物》1995年第6期;王华:《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攻治技术研究》,山东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6年。主要参看后两篇文章提供的资料,他们已经将该遗址的甲骨详细论证,本文在其基础上略作调整。

件^①。卜骨主要为牛肩胛骨,还有少数的猪、羊、鹿肩胛骨,另有动物的头盖骨4件。该遗址延续时间长,年代相当于郑州二里岗上层至殷墟文化三、四期。各报告没仔细提供每一时期甲骨的描述和数量,本文无法统计各阶段的数量。该遗址的分期意见不一,其中徐基把1984年大辛庄所出土的甲骨分为五期;王华将2003年和1984年出土的甲骨分作四期,即早商时期、中商时期、晚商早期、晚商晚期。本文主要依据两文对甲骨特征的分析,分为早、中、晚商三期作简单描述。

目前所知,诸报告与文章皆未提出早商时期的卜甲,卜骨则仅在该遗址商文化第一期遗存中发现1件。笔者仔细分析他们提供的材料后认为:其中几件与郑州二里岗上层所出卜甲的特征相同(请看附录三卜甲商代早期济南大辛庄遗址的论述),其年代也应大致相当于商代早期后段。王华文章中所说的中圆钻(AⅡ式)中一部分应该属于商代早期^②。当然,这种推测要等待正式报告发布之后作进一步论证。标本84DXZ2J2:1,应为羊右肩胛骨,未去骨臼、臼角,骨臼下端切削不整齐,骨脊也仅作粗加工。骨面有圆底小圆钻,分布密集,排列无规律,大小不一,直径多在0.5厘米以下。其年代相当于二里岗上层一期。

(2) 泗水尹家城遗址^③:发现9件甲骨,其中8件为卜骨,1件为卜甲。卜骨中牛肩胛骨7件,鹿肩胛骨1件,均经过程度不同的整治,有灼有钻,无凿。标本H47:3,为牛肩胛骨,残存一侧,残长24.8厘米,残宽9.8厘米,厚0.15—0.6厘米。骨体扁薄,正反两面整治平齐,并加以粗磨。两面均有钻、灼痕迹。正面残存钻坑16个,反面41个,似有一定的排列规则。标本H142:5,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有柄部,残长14.5厘米。去骨臼一半,先将骨反面加以刮削和粗磨,然后施以钻、灼,钻内有灼痕。残存钻坑45个,坑深而密集,但分布无规律,此类应属于中商。标本T192⑥:17,牛肩胛骨,已残,只有颈部一段,残长8.1厘米。加工较精细,整治方法有锯(锯掉关节窝面部分)、刮削和磨制,骨反面施以钻、灼。钻坑布局规整,成组成行排列,现存7排、11组、30个钻坑,除1组只存1个坑情况不详和1组为“二联钻”之外,其余9组全为“三联钻”。从整治与钻凿特点来看,我们认为这类应该属于西周中期,不排除考古挖掘过程中被混淆。标本T228⑥:79,为麋鹿的肩胛骨,比较完整,骨中间和颈侧缘稍有缺失,长22.3厘米。先将骨脊削平,周边稍加整修,然后施以钻、灼,而中部较薄的部分则直接灼之,近40处钻、灼痕迹密布于反面的一侧,大体成直行排列,似有一定规律。

① 总数应该还多,目前所知道的甲骨数量,如,1935、1952、1953年共发现4件甲骨,卜骨2件(均为牛肩胛骨),卜甲2件,腹甲、背甲各1件(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第23页);1955年发现85件甲骨,其中卜骨56件,卜甲29件(《文物》1959年第11期);1958年发现10件甲骨,其中卜骨9件,卜甲1件(《考古》1959年第4期);1958—1963年发现9件甲骨,其中卜骨7件,卜甲2件(《考古》1973年第5期);1984年发现391件甲骨,其中卜骨80件,卜甲311件(《文物》1995年第6期);2003年发现485件甲骨,其中卜骨143件,卜甲342件(王华《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整治技术研究》)。本文采用以上几种材料来统计甲骨数量。

② 王华文章中说:“圆底中圆钻是大辛庄卜骨中最为常见的钻凿形式,共出土了32件,第二期21件,其中属于早段17件,晚段4件,第三期13件,第四期2件。由此,我们看出圆底中圆钻最为流行的时期是大辛庄甲骨的第二期,又以第二期早段最多。另外,第三期数量也相对较多。”我们这里也能猜测应该有比第二期早段更早的该类卜骨,或第二期的一部分卜骨应属于商代早期,即相当于郑州二里岗上层一期。

③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研室:《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252页,图版九九。

(3) 梁山青堌堆遗址^①:发现 2 件卜骨,均为牛肩胛骨,皆残,骨反面有圆钻和灼痕。

5. 东下冯类型

(1) 夏县东下冯遗址^②:该遗址的 V、VI 期为商代二里岗期遗存。V 期:发现 39 件卜骨,多残,骨料以猪肩胛骨为多,计 22 片,另有牛肩胛骨 9 片,羊肩胛骨 8 片。骨料整治和卜法与第 IV 期相同,即凡猪羊肩胛骨皆未经整治,有灼,无钻无凿。牛肩胛骨均经过整治,有钻有灼,无凿。标本 T4452:3B:32,为牛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有前角一段,两面均有钻有灼。钻、灼分布密集,骨正面残留 37 个。标本 T1021:3:54,为猪右肩胛骨,比较完整,骨下面稍有缺失,残留灼痕 10 个以上。标本 T1011:3:34,羊左肩胛骨,基本完整,中间稍有残破,有灼痕 10 个以上。

VI 期:发现 30 件卜骨,多残片,骨料以牛肩胛骨占多数,计 23 片,猪肩胛骨只有 5 片。用牛肩胛骨者均经过整治,两面有钻有灼,无凿。用猪肩胛骨者有的经过整治,有的未经整治,均有钻有灼,无凿。标本 H35:5、78,均为牛肩胛骨,残存颈部一段。经过整治,整治方法是由颈部切开削平,然后在削平的一面进行钻、灼,前 1 件残存钻坑 4 个,后 1 件残存钻坑 30 余个。钻坑多数为圜底,少数为平底,坑内多数有灼痕。灼的反面均有清晰的兆纹。标本 H35:33,为猪左肩胛骨,比较完整,骨中部残缺。经过整治,即只将骨脊削去,两面皆有灼痕,现残存灼痕 10 余处。

(2) 垣曲商城遗址^③:该遗址发现卜骨和卜甲(仅有 1 件)。二里岗下层时期比二里头时期为多,有牛、猪、羊肩胛骨。整治均在反面进行,第一种是保留骨白,将骨白下部切开一圆形或近方形凹槽,连同骨脊及整个骨面一并削去,形成凹槽,露出粗糙不平的骨内壁。第二种是未将骨面完全削去,肩部或肩胛骨一侧保留一部分原骨面。有钻有灼,钻多位于反面凹槽的骨内壁上或未削去的骨面上,少数位于正面。多数先钻后灼,但也有一部分只钻无灼,还有少数无钻直接施灼的。报告依照整治、钻灼方法的不同分为三类:第一类,采用第一种或第二种方法整治,在反面施钻,部分先钻后灼,部分只钻无灼。标本 H121:9,为牛左肩胛骨只留柄部,残长 18 厘米,残宽 54.4 厘米。凹槽上部宽 4 厘米,钻坑均在槽内,共保留 22 个,排列无序。上半部的坑较大,窝较浅,坑径 1 厘米,深约 0.3 厘米,坑底缓圆,坑内施灼。下半部的坑较小,坑径 0.6 厘米,深 0.2 厘米,底缓圆。标本 T3561:4B:2,为牛肩胛骨,仅余一小块,残长 67 厘米,残宽 3.4 厘米,凹槽内布满钻坑共 22 个,坑大小不等,坑径 0.5—1.0 厘米,深 0.6 厘米尖圆底,先钻后灼。H121:10,牛右肩胛骨,残长 13 厘米,残宽 3.3 厘米,槽上部宽 2.5 厘米,未将骨面全削去,肩胛骨一侧似保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发掘队:《山东梁山青堌堆发掘简报》,《考古》1962 年第 1 期。

② 东下冯考古队:《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东区、中区发掘简报》,《考古》1980 年第 2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 年,185、207 页,图版八三、九五。

③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县博物馆:《垣曲商城:1985—1986 年度勘察报告》(一),科学出版社,1996 年,204、205、241—243 页,图一三三、一五七,图版七三、八八、八九。

留原骨面,凹槽内保留钻坑2个,骨面上保留1个。坑大小不等,坑径0.6—1.2厘米,深0.3—0.9厘米,坑底尖圆,先钻后灼。第二类,采用第二种方法整治,正背两面均施钻,反面先钻后灼,正面钻坑部分经灼,部分无灼。标本H235:34,应为牛肩胛骨,仅余下半部分,残长11厘米,残宽67厘米。反面钻坑位于凹槽内,共7个,坑径大者1厘米,小者0.6—0.8厘米,深0.3厘米,尖圆底,先钻后灼。正面钻坑位于骨面中部,遗留5个,坑较小,坑径0.5,深0.3厘米,先钻后灼。第三类,采用第一种方法整治,无钻,在反面直灼。标本H342:2,为羊肩胛骨,残长11.6,残宽4厘米,反面有灼痕5个,透到正面成褐色斑点。

二里岗上层时期发现12件甲骨,其中1件为卜甲。卜骨多以牛肩胛骨制成,少数为羊、猪肩胛骨。多数卜骨经过整治,均在反面进行,方法有三种,两种方法与二里岗下层相同,第三种是只对骨脊进行整治削平。先钻后灼,多钻在反面的凹槽内或骨面上,正反面还有直接灼痕。报告依照整治、钻灼的方法不同分为四类:第一类,采用一、二种整治法,在反面凹槽内或骨面上钻坑,多数先钻后灼,少数只钻不灼,还有很少未钻直接灼。标本H131:8,为左牛肩胛骨,仅留柄部,残长13厘米,残宽7.5厘米。槽顶端宽4.5厘米,凹槽内遗留5个钻坑,坑径0.9厘米,深0.3厘米,底缓圆,先钻后灼。标本T1:3B:1,为牛左肩胛骨,仅留柄部,残长11.5厘米,残宽7.8厘米。凹槽顶端宽5.5厘米,槽内布满圆钻坑,共18个,排列无序,大小不等,大者坑径1.2厘米,小者0.5—0.8厘米,底尖圆,深0.5—0.7厘米。钻后有8个坑加灼,其余只钻未灼,灼痕透到正面呈褐色斑点。还有H105:37、T2757:4D:1、H105:1、H105:42,应均为牛肩胛骨。第二类,采用第三种整治法,于反面钻坑,先钻后灼。标本H251:17,应为羊(或鹿)肩胛骨,仅留柄部,残长11.5厘米,残宽7厘米。将骨臼削平后在反面钻坑,最上面1个大坑,其下13个坑较小。坑距密,坑径大者1.2厘米,一般0.6厘米,深0.5—0.8厘米,缓圆底,先钻后灼。标本H105:35,为兽类肩胛骨,仅余一小块,残长8.3厘米,残宽3.2厘米。于反面钻坑,上面1个较大,下面3个较小,坑径0.7—1厘米,深0.7厘米,坑底缓圆。第三类,采用第三种整治法,在正面钻坑而后灼,少数未钻直接灼。标本H3:1,为羊肩胛骨,仅留柄部,残长9.5厘米,残宽4厘米。正面有钻坑3个,坑径0.5—1.0厘米,深0.5厘米,尖圆底,先钻后灼。标本H105:66,应为牛肩胛骨,仅余一小块,残长9.5厘米,残宽5.5厘米。正面有2个钻坑,坑形不规则,坑径1.2厘米,深0.6厘米。先钻后灼,钻坑旁有两直接灼痕,无钻。第四类,未经整治,未钻,直接在反面灼。标本T6:4B:1,为猪右肩胛骨,只留柄部,残长12厘米,残宽4.5厘米。反面有直接灼痕4个。

(3) 垣曲古城南关遗址^①:发现2件卜骨。标本H482:1,应为牛肩胛骨,已残,残长6厘米,宽2.6厘米,只施钻,骨反面残留钻痕9个。标本H375:2,应为羊右肩胛骨,已残,

^①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88—1989年山西垣曲古城南关商代城址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10期。

只留颈侧缘一段,切去骨白,骨脊削平,先钻后灼,残留钻、灼痕 5 个。均属于二里岗文化上层。

(4) 太原光社遗址^①:该遗址采集到 12 件卜骨,其中 8 件卜骨,均为牛肩胛骨,具有较晚的特点,应属于商代早期^②。

6. 北村类型

(1) 西安老牛坡遗址^③:发现 3 件卜骨。该遗址老牛坡类型远古文化遗存中发现 1 件卜骨(86XLⅢ1H16:5),系采用兽类肩胛骨修治而成,已残,残长 9.5 厘米,可见圆形钻坑 3 个^④。该遗址商代文化一期遗存中发现 2 件卜骨,均残。标本 85XLⅡ2T5^⑤:11,为羊肩胛骨,已残,残长 8 厘米,可见圆形钻坑 1 个。

(2) 蓝田怀珍坊遗址^⑥:发现 17 件卜骨,均为残片,均不能复原为整骨。骨料多为牛、羊的肩胛骨。有钻有灼而无凿,多为单钻,钻坑圆窝形,剖面呈椭圆形的最多。钻坑一般比较密集,排列无序。该遗址的年代应和郑州二里岗期基本同时。

(3) 耀县北村遗址^⑦:发现 10 件卜骨。为牛、羊、鹿的肩胛骨。3 件肩胛骨(应为牛肩胛骨)经过加工修整,有圆钻无凿,钻坑径 1 厘米,深 0.5 厘米,有灼痕。其余或加工,或未加工修整,均无钻凿,仅有灼痕。耀县北村商代遗址和二里岗期基本同时。

(4) 华县南沙村遗址^⑧:该遗址上层共发现 13 件卜骨,皆残,用牛、羊的肩胛骨制成,以牛肩胛骨为主。先钻后灼的多见,直接施灼的少见。标本 H2:7,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有圆钻,有灼痕,分布密集。标本 H10:40,应为羊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有灼无钻。南沙村上层文化特征和二里岗上层相同。

7. 盘龙城类型

(1) 王家嘴、杨家湾盘龙城遗址^⑧:该遗址第五期文化遗存中发现 2 件卜骨。标本 PWZT82H7:13,应为牛肩胛骨,置于铜罍内,已残,只留骨中间一段,残长 14 厘米,残宽 5 厘米,厚 0.1—0.6 厘米。经过整治,表面光滑,削去骨脊,骨反面留有钻灼痕 14 个,圆窝大小不一,最大径 1 厘米,最小径 0.5 厘米。其年代应相当于郑州二里岗上层。标本 PYWM11:55,为牛肩胛骨,卜骨残长 21.5 厘米、下宽 16.4 厘米。经过修治,反面有圆形

① 寿田:《太原光社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与遭遇》,《文物参考资料》1957 年第 1 期;解希恭:《光社遗址调查试掘简报》,《文物》1962 年第 4、5 期。

② 请参看龙山时期老虎山文化太原光社遗址卜骨的描述。

③ 刘士莪:《老牛坡》,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44、65 页,图二三、四四。

④ 报告认为其年代与陕西龙山文化末期相当,但卜骨有圆形钻坑,据此特征,我们认为其属于商代早期。

⑤ 西安半坡博物馆、蓝田县文化馆:《陕西蓝田怀珍坊商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 年第 3 期。

⑥ 卢建国、巩启明、尚友德:《陕西耀县北村商代遗址调查记》,《考古与文物》1984 年第 1 期。

⑦ 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华县报告编写组:《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80 年第 3 期。

⑧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 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 年,135、296 页,图 83、216。

未透钻坑 20 个,竖式排列,共三行,其中外侧 10 个钻坑,中行 6 个,内侧 4 个,钻坑直径 0.4—0.5 厘米。

(二) 商代中期

1. 白家庄类型

(1) 郑州小双桥遗址^①:发现 3 件卜骨。标本 90ZSX 采:150,应为牛肩胛骨^②,残存一块,形状不规则,残长 10.2 厘米,残宽 5.9 厘米。正面有钻痕,反面钻灼痕迹更明显。标本 VG3:21,为猪右肩胛骨^③,黄褐色,已残,骨中间和前角缺失,长 14.6 厘米,宽 7.6 厘米。经过修整,整治较粗糙,仅在骨反面骨脊两侧有灼痕 2 处,其中一处灼痕已脱落。

(2) 郑州南顺城街青铜器窖藏坑^④:发现 2 件卜骨。标本 H1 下:10,已残,残存一块,残长 7 厘米,残宽 4.6 厘米。红褐色,骨面上留有圆钻坑 8 个,其中 1 个已穿透反面,坑内均有明显的灼痕。

(3) 焦作府城遗址^⑤:该遗址白家庄期文化遗存中发现 4 件卜骨,其中牛肩胛骨 3 件,羊肩胛骨 1 件。其制法均为先钻后灼,钻坑呈圆形。标本 I T2416H23:2,为牛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一块。经过修整,骨反面圆形钻坑密集,其中一坑穿透,在正面穿透坑的两侧刻有二道平行线。标本 I T2416^④:1,为牛右肩胛骨,已残,只留骨中间一块。经过修整,圆坑较小,分布密集。标本 II T0215H9:3,为牛肩胛骨,仅留一块,圆坑较大,分布较疏。标本 I T2415H49:14,应为羊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一块,未经修整,有钻灼,圆坑大,且稀疏。

2. 曹演庄类型

(1) 邢台曹演庄遗址^⑥:该遗址上下层均有甲骨,有牛、猪、羊(鹿)的肩胛骨和龟甲。绝大多数是残片。据上下两层统计结果,上层卜甲多,下层卜骨多,猪肩胛骨只见于下层。牛肩胛骨削平骨脊,骨白削去一半,多数有钻灼而无凿,亦有少数钻凿灼兼施的。另外,在 T179 还发现 1 块牛的头盖骨,里面钻有二坑,并有灼痕。猪、羊(鹿)的肩胛骨均未经整

①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小双桥遗址的调查与试掘》,《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1985—199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年,248 页,图九;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学文博学院考古系、南开大学历史系博物馆学专业:《1995 年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6 年第 3 期。

② 报告说“系用羊的肩胛骨修整加工而成”。该卜骨只残留扇部下端,能看到骨脊部分。报告说其“残长 10.2 厘米,残宽 5.9 厘米”,但羊肩胛骨不可能那么大。从整治方面,其骨脊已被削平,据此可推断这片卜骨应为牛肩胛骨。

③ 报告说“系用羊肩胛骨修整加工而成”,然据报告图版所示,骨整体和骨脊呈显出猪肩胛骨的特征,可以推断这片卜骨应为猪右肩胛骨。

④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南顺城街青铜器窖藏坑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8 年第 3 期。

⑤ 袁广阔、秦小丽、杨贵金:《河南焦作市府城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0 年第 2 期;袁广阔、秦小丽:《河南焦作府城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0 年第 4 期。

⑥ 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邢台曹演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8 年第 4 期。

治,骨臼和骨脊保留原状,有钻灼而无凿。

(2) 安阳洹北商城遗址^①:发现共 168 件甲骨,其中卜骨 125 件,卜甲 43 件。年代上,该遗址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接近二里岗上层二期(即白家庄期)而略晚,晚期略早于大司空一期,时间上与大司空一期相衔接。大司空一期相当于武丁早期,因此,洹北花园庄晚期应相当于盘庚、小辛、小乙阶段。

卜骨一般为牛肩胛骨,极少见羊肩胛骨。卜骨不锯臼角,大都保留整个臼端,少数则锯掉另一半,然后挖成台级状,骨脊削平。大多整治不规整,厚重,特别是骨壁两边较厚,这也导致钻坑深浅不一。钻坑底或圆或平。钻、凿大小不一,排列也无规律。钻、凿、灼一般施于反面,极少数卜骨则正面、反面兼施。依据钻、凿、灼的不同,本文将其分为四型^②。

A 型:115 片。均有圆形钻坑,大都在钻坑内或旁边有灼痕,无凿。标本 T1④:21,为牛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 17 厘米,最宽处 8.5 厘米。骨臼被切去一半,反面现存钻坑 15 个,坑径较大,最大有 1.4 厘米。灼大都施于圆钻内,也有施于圆钻旁的,排列上似乎左右对贞。标本 T11③:8,应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胸侧缘一段,残长 15 厘米,残宽 5.4 厘米。现存圆钻 14 个,钻坑径大小不一,深浅不一,其底部有平底和圆底两种。钻坑自左上到右下斜形排列,似乎为两长排中间夹一短排。标本 H5:23,应为羊右肩胛骨,下端已残,残长 14 厘米。骨臼被切去一半,反面外缘也略加修整,留有圆形钻坑 5 个,坑径约 1.2 厘米,坑旁均有灼痕。上述类型还有 T1④:88、T1④:83、H5:22、H12:39 等。

B 型:3 片。形制较为特殊,同一片卜骨上有的钻、凿、灼兼施,有的只有钻、灼。标本 T1H4:2,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 28.5 厘米,残宽 20.5 厘米。靠近右边一列皆有凿,钻较扁比凿缝略短,且一律在凿的左边。最底下 1 个为圆钻,内有枣核形凿,长度略短于圆钻直径,凿的位置偏右,约分圆钻三分之一。靠左边一列皆为圆钻,有灼无凿,灼痕应在圆钻的右侧,与靠近右边一列左右对贞。标本 T12③:16,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 20 厘米,宽 8 厘米。大部分只有钻、灼,少数则钻、凿、灼兼施,灼痕的方向不一致,没有左右对贞。

C 型:2 片。标本 T1H4:1,为牛肩胛骨,已残,只留扇部,残长 14.7 厘米。正反两面均施钻、凿,有的钻凿灼兼施,有的只有钻凿,有的只钻灼,下部有 1 个圆坑。凿皆为枣核形,相较于 B 型和 D 型凿较窄。扁圆钻近方形,两面钻凿都有钻的方向相对的情况。标本 WWT1JA:11,为牛右肩胛骨,已残。骨臼被切去一半后,又挖成台级状,已锯臼角。有凿无钻,有灼痕,凿皆为枣核形,大部分灼在凿的一面,左右对贞。

D 型:5 片。标本 T14③:8,应为牛左肩胛骨,已残,残长 15.5 厘米,残宽 7 厘米。钻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花园庄遗址 1997 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 年第 10 期;《1998 年—1999 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 15 集,文物出版社,2004 年,333、334 页,图 25,图版 10、11;《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的勘察与试掘》,《考古》2003 年第 5 期。

② 本文采用 1998—1999 年发掘报告所分的四型,但认为报告 D 型特征略早于 C 型,故将 D、C 型改为 C、D 型。1997 年发掘报告的 16 件卜骨,均属于 A 型;2000—2002 年发掘报告的 2 件卜骨,1 件属于 A 型,1 件属于 C 型。

凿灼兼施,枣核形凿较宽,钻凿基本上纵向排列,扁圆形钻均在左边,即均向无肩胛骨结节(或胸侧缘)方向^①。

通过对上述卜骨钻凿灼形态的分析,可以看出,A型卜骨与二里岗上层标本C15T14^②:15、C5H20:36^③两卜骨的钻凿灼形态大致相同,可能代表了中商时期最早的形态,即有钻无凿形态。B型卜骨上的钻凿灼形态部分与A型卜骨相同,但开始出现“钻在凿的一侧的形式”,故B型卜骨应从A型卜骨发展而来。C型卜骨钻凿灼形态为“钻在凿的一侧的形式”,同一卜骨上钻凿左右对称排列。D型卜骨钻凿灼形态与C型相同,但钻凿灼的排列都朝向同一个方向,与殷墟卜骨的钻凿排列一致,就是说左右两肩胛骨钻凿灼排列相对。由此可见,洹北商城卜骨从早到晚的演变序列应为A型→B型→C型→D型。

(3) 新乡李大召遗址^④:该遗址商代遗存中发现15件甲骨,其中卜骨9件,卜甲6件^⑤。卜骨由动物的肩胛骨制作而成,皆有圆钻和灼痕。其中标本ⅡT2405H298:30,应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13厘米,留有圆形烧灼痕10个。标本ⅢT2502H334:7,应为牛肩胛骨,残长18.2厘米,残宽10厘米。经过磨光,均施圆钻,并有烧灼痕。标本ⅢT2502H334:33,应为牛肩胛骨,已残,只留胸侧缘一块,残长11.3厘米,残宽4.9厘米,残存圆钻、灼痕6个。标本ⅢT2601H310:4,应为牛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扇部,残长19.8厘米,宽15.4厘米,骨面上残存圆形或椭圆形钻灼痕5个。

(4) 邢台东先贤遗址^⑥:发现12件甲骨,其中卜骨11件,卜甲1件。该遗址第一期遗存中发现6件卜骨,均残。皆为牛肩胛骨,经过整治,一般施钻,有的兼施钻凿和灼。标本H9:1,为牛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7.6厘米,宽6.4厘米。骨臼切去一半,未去臼角。骨反面有圆钻而灼、钻凿灼兼施两种。有圆形圆底钻坑5个,边有灼痕;还有梭形凿槽圆形钻1个,一横一纵相连形成一个略大的“丁”字形坑。标本H33:4,应为牛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扇部,残长15厘米,残宽12厘米。骨正反面均有钻凿灼,有的圆钻而灼,有的钻凿灼兼施。前两者的形制和洹北商城B型相似,其余和洹北商城A型相似。标本H34:1,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一段,残长9厘米,残宽5.5厘米,骨反面残留圆钻坑4个。标本H33:10,应为牛肩胛骨,已残,残长10.4厘米,骨反面残留圆钻坑8个,较深。标本H31:2,应为牛肩胛骨,已残,残长9.5厘米,残存圆形钻坑7个。标本H33:3,应为牛肩胛骨,已残,残长10.5厘米,残存圆形钻坑17个。

① 报告仅公布1件标本,因标本仅残留颈侧缘一段,故钻凿的排列有两种可能性:或与B、C型同样,同一骨板上左右对贞;或同一骨板上均朝向同一方向。若为后者,则与殷墟典型卜骨的均向肩胛骨结节(或削去臼角)方向相反。

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834—836页,图版二三七~1,2。

③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韩国河、赵海洲:《新乡李大召——仰韶文化至汉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6年,303页,图二〇八。

④ 报告以为这类甲骨属于晚商时期文化,该遗址晚商时期文化分为一、二两期,所出甲骨的单位均属于第一期。可笔者仔细观察线图,发现该类甲骨一律显示出中商甲骨的特征。因而,本文将之归属于中商时期来描述。

⑤ 邢台东先贤考古队:《邢台东先贤商代遗址发掘报告》,《古代文明》(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393、414页,图一九、二〇、三五;《河北邢台市东先贤遗址1998年的发掘》,《考古》2003年第11期。

第二期遗存中发现 6 件甲骨,其中卜骨 5 件,卜甲 1 件。经过整治,一般施圆钻,有的兼施钻凿和灼。标本 T16⑩:6,为牛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 9.5 厘米,钻凿兼施,有的坑边缘有灼痕,形制和洹北商城 B 型相似,其余和洹北商城 A 型相似。标本 T2④:3,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 8 厘米,圆形钻坑,有的坑边缘有灼痕。标本 H48:6,已残,残长 14.5 厘米,残留圆形钻坑 9 个,有的坑边缘有灼痕。此类还有标本 H48:5、T2④:2。

(5) 邢台葛家庄遗址^①:共发现 8 件卜骨。该遗址第二期文化遗存中发现 4 件卜骨^②,均用牛的肩胛骨制成,有钻有灼,无凿。标本 H22:10,牛左肩胛骨,已残,只有扇部一半,残长 21 厘米,残宽 13.5 厘米。骨正、反面均施钻、灼,骨正面中间下部有 19 个,反面留有 23 个。骨面较薄,钻坑较浅,坑直径 0.5—0.8 厘米,灼点反面多有兆纹。标本 H22:3,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扇部一段,残长 13 厘米,残宽 7.5 厘米。骨正、背两面均施钻、灼,正面仅存 1 个,反面 34 个。钻坑直径 0.4—0.7 厘米。H11:14,为牛右肩胛骨,已残,只留后角一块,残长 18 厘米。残存有圆形钻坑 11 个,窝内见灼痕。H33:1,为牛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 12 厘米。骨臼经过修整,残存钻坑 17 个,窝内均施灼。据陶器的风格而言,接近郑州小双桥遗址;从卜骨的特征而言,具有郑州二里岗上层文化晚段的特点,应该属于中商较早阶段。

该遗址第三期文化遗存中发现 4 件卜骨,均为牛肩胛骨。标本 H10:1,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 9.5 厘米。骨臼下部切割痕迹明显而较深,未去臼角。残存 18 个钻坑,坑径 1 厘米左右,钻坑较深,钻坑内均有灼痕,无凿。标本 T1701②:1,为牛肩胛骨,已残,残长 10 厘米,残宽 2.4 厘米。残存 8 个圆形钻坑,其中 2 个略大,坑内均施灼。以上两个标本的形制与洹北商城 A 型卜骨相似。标本 H4:4,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扇部,残长 18 厘米,宽 13.5 厘米。正反两面均施钻凿灼,钻坑径 0.7—1.2 厘米,钻旁有灼痕,凿呈梭形。其形制同于洹北商城 B 型卜骨。标本 H11:1,为牛左肩胛骨,扇部已缺残,残长 31 厘米,残宽 15 厘米。骨臼挖成台级状,已锯臼角。钻坑为圆形,直径多在 1 厘米左右,凿皆呈梭形。有的钻凿灼兼施,有的只钻凿,有的只钻灼,钻凿排列基本相对。其形制同于洹北商城 C 型卜骨。

(6) 邢台粮库遗址^③:该遗址商代遗存中发现 23 件卜骨^④,只有卜骨,不见卜甲。卜

①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邢台市葛家庄遗址北区 1998 年发掘简报》,《考古》2000 年第 11 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邢台市文物管理处:《河北邢台市葛家庄遗址 1999 年发掘简报》,《考古》2005 年第 2 期。

② 两个发掘报告分期不一致,1998 年报告分三期六段,1999 年报告则分四期,本文按甲骨的特征,暂时把商代遗址分为四期:第一期文化遗存属先商文化;第二期属中商文化早期;第三期属中商文化晚期;第四期属殷墟文化早期。

③ 河北省邢台市文物管理处:《邢台粮库遗址》,科学出版社,2005 年,133、216、219 页,图一二〇、一八七,图版一五。

④ 报告出土的卜骨将保存的状况分为 A、B 两型,又据钻凿灼的不同方式分为三、四式。商代甲骨分为中商和晚商时期,笔者仔细观察报告提供的材料,除了 AaIV 式(标本 II H35:5,属于晚商早期)之外,均为中商时期的卜骨,报告认为属于中商时期者,归属为中商早期,属于晚商时期者,归属为中商晚期。

骨均用牛肩胛骨制成。早期标本ⅡH30:1,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一块,残长7.5厘米。骨臼完整不切半,臼角也不切,稍有修整。骨臼以下开出一平面,其上留有圆形钻坑,排列无序,只有钻灼。标本ⅢT49④:1,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一块,残长6.8厘米。骨臼以下开出一平面,钻凿灼兼施,但是凿只是象征性的一个补充性工序,在钻坑内只有一道印痕而已。标本ⅠH84:2,为牛肩胛骨,已残,只留扇部,残长11厘米。骨板经过修整,骨正反面均有圆形钻坑,并有灼痕。另外,还有数件破损严重者,均为钻灼兼施,不见凿痕。如标本ⅢH15:3,残长8.3厘米;标本ⅢH15:4,残长7.7厘米,灼痕偏于钻坑一侧。

晚期标本ⅠT79③:3,为牛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9.2厘米。骨臼被切去一半,经过修整,骨臼以下修出一平面。平面上留有圆形钻坑,钻坑排列基本有序,并留有灼痕,反面出现明显兆纹。ⅠH112:7,只留柄部,残长17厘米,灼痕不在钻坑内,而是灼在钻坑边缘。ⅠH4:10,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9.5厘米。经过修整,无钻无凿,只留有灼痕,骨正面显示明确的兆纹。标本ⅢT41④:9,残存骨面一块,残长13.2厘米。只钻灼而无凿,骨正反面都有钻坑,部分钻坑内留有灼痕,反面兆纹清晰可见。其形制均与洹北商城A型类似。标本ⅢT8③:3,残存骨面一块,残长14.3厘米。骨正反面钻灼兼施,部分施凿,反面有明显的兆纹。标本ⅠH68:5,残存扇部一块,残长9厘米。经过修整,钻凿灼兼施,排列规整有序。二者形制和洹北商城B型相同。属于该时期的标本还有ⅢT8③:1、ⅠT77②:1。

(7) 武安赵窑遗址^①:发现7件甲骨,其中卜骨2件,卜甲5件。卜骨,均为牛肩胛骨。标本T11②:19,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不锯臼角,骨脊刮平,胛骨面挖成台级状。圆钻无凿,现存钻坑5个,大都在钻坑旁边有灼痕,似乎左右对贞。其形制同于洹北商城A型卜骨。

(8) 临城补要村遗址^②:共发现34件甲骨,其中卜骨27件,卜甲7件。卜骨以牛肩胛骨为主,兼有少数猪、鹿的肩胛骨。标本NT0603H168:01,为牛左肩胛骨,仅存柄部,残长23.8厘米,残宽8.7厘米。经过修磨,未去臼角,切去骨臼一半,骨反面残存钻坑24个,圆形平底,坑径1.2厘米,深0.9厘米,分布密集,排列有序。钻坑一侧均有灼痕,左边的灼痕均在钻坑的右侧,右边的灼痕均在钻坑的左侧,中间的灼痕有的左侧,有的右侧,似乎左右对称。标本07LBST09G1:02,牛右肩胛骨,仅存柄部,残长13.8厘米,残宽5.7厘米。切去臼角,削去骨臼一半。骨反面残留钻坑7个,圆形平底,坑径0.9厘米,深0.6厘米,其中1个钻坑内有“猫眼状”凿槽。钻坑一侧均有灼痕,似乎左右对称。标本07LBST08H113:12,应为鹿左肩胛骨,比较完整,长约28.8厘米,残宽12.9厘米。骨臼切去一半,骨脊被削去,刮平磨光,骨正面扇部中间有灼痕3个。

①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文化学院:《武安赵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2年第3期。

②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河北临城县补要村遗址南区发掘简报》,待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北临城县补要村遗址北区发掘简报》,待刊。

该遗址甲骨大多数和洹北商城甲骨相似,极少数甲骨已经开始出现殷墟甲骨的特点。其年代上限可以追溯到中商二、三期。具有中商特征的甲骨延续使用时间较长,因此该遗址的甲骨下限应相当于殷墟二期^①。

3. 台西类型

(1) 藁城台西遗址^②:共发现 505 件甲骨。该遗址早晚两期居址发现 494 件甲骨,其中卜骨 403 片,卜甲 91 片。另外,第一、二期墓葬中出土卜骨 11 片。年代上,早期居址和二里岗上层大体相当,或者更早;晚期居址则介于殷墟文化早期第一、二组之间,卜甲全部出自晚期居址。至于墓葬的年代,第一期相当于二里岗上层或者稍晚,第二期相当于邢台曹演庄下层或者殷墟文化早期。从年代顺序上,藁城台西遗址遗存排列应当为:早期居址、一期墓葬、二期墓葬、晚期居址。

卜骨除一块用牛的下颌骨,两块用猪的肩胛骨外,绝大多数使用牛肩胛骨制成。该遗址的卜骨特征,均见于洹北商城的 A、B、C 型。

标本 H32:1 和 T8:19,为牛右左肩胛骨,基本完整,不锯臼角,骨脊刮平,胛骨面挖成台级状。从骨臼处开始施圆钻,向两侧呈人字形排开。圆钻无凿。其形制同于洹北商城 A 型卜骨。这件卜骨与原报告中认为是早期居址出土的 T1:71 相同,都未去臼角,只有圆钻。标本 T4:28,为牛肩胛骨,已残,从残存迹象上看整治方式应与上述 1 件相同。但这件残骨在同板上圆钻和钻凿组合并存,其形制与洹北商城 B 型卜骨相似。标本 T8:14 和 F2:34,为牛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钻凿皆有,且钻的方向两两相对,与洹北商城 C 型卜骨一致。该遗址没有洹北商城的 D 型卜骨。从上述数件卜骨的出土单位来看,H32、F2 都属于晚期居址堆积,可见藁城台西晚期阶段卜骨的形制和洹北商城一样,在中商阶段出现了新的钻凿灼形态。

在墓葬中出土的 11 件卜骨,均用牛肩胛骨制成,其中最大的 1 件(M14:9),长 49.5 厘米,据鉴定,为圣水牛(*Bubalus mepnis* Topheles Hop-wood)的肩胛骨。最小的(M56:6),长 33 厘米,系黄牛(*Bos exguus ma tsumoto*)的肩胛骨。从公布的图版来看,标本 M14:9、10 和 M56:5、6 的整治与钻灼方式,皆同于洹北商城 A 型卜骨。值得注意的是这 11 件卜骨中,除 M12、61 各有 1 片残骨外,其他 9 件分别出自 M14、56、103 三座墓中,每一墓 3 件。置放位置都在二层台上,上下叠压在一起,而且骨臼朝一个方向。因疑当时可能是用绳捆扎在一起的。

该遗址还有利用卜骨改制的 2 件工具,标本 T3:80,为骨铲,系用牛肩胛骨改制而成,

① 报告认为出土甲骨的单位均属殷墟一、二期。殷墟一、二期在冀南、山东地区仍沿用中商甲骨特征的占卜方式,本文中商时期甲骨中一部分可能属于该类的甲骨。但不能排除将卜用过的甲骨保存一段时间后废弃的可能。

② 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藁城台西村的商代遗址》,《考古》1973 年第 5 期;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台西考古队:《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1979 年第 6 期;李学勤、唐云明:《河北藁城台西甲骨的初步考察》,《考古与文物》1982 年第 3 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 年,87、88 页,图版五五、五六、六三、一〇〇、一〇一。

长方形,长13.6厘米。刃中部凹入,器身中部有1个穿孔,骨面留有圆钻坑4个。标本T12:23,为骨刀,用牛肩胛骨制成的卜骨改制,已残,偏刃,长8.4厘米,骨面残留圆钻坑4个。

(2) 藁城北龙宫遗址^①:发现2件甲骨,卜骨1件,卜甲1件。卜骨标本藁北C:16,为牛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白角未切,骨白挖成台级状,骨反面均有钻凿灼。

4. 大辛庄类型

(1) 济南大辛庄遗址^②:本文将王华文章中的中圆钻(AⅡ)卜骨暂归属中商早段。标本03DXZT2001 夯土三:9,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一块,骨白保留完整,骨白侧面稍加锯切,钻坑密集,直径1厘米左右,深0.38—0.4厘米,灼痕较小。标本03DXZT2303H709:5,为牛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骨白切去一半,切割整齐。骨扇被精心加工,较厚的部位被削去一层,钻坑位于蜂窝状骨质上,密集而无规律,大小相差不大,近缘的位置稍大而深,中间的稍小。标本03DXZT1403H690⑥:1,已残,残存胸侧缘一块,浅圆底中圆钻,口大低小,直径0.9—0.95厘米,深0.2—0.24厘米。标本DXZT2102H548:1、2、3,为牛左肩胛骨,比较完整,后角缺失,骨白切去一半,然后挖成台级状,骨脊削平。骨正反面均有钻灼,反面钻坑多位于骨面上部,密集而规律,近缘的位置稍大而深,中间较薄之处稍小;骨正面中间下部较薄之处也有钻坑,有圆钻3个,挖成枣核形而后烧灼的20个以上。

王华文章中的大圆钻(AⅢ式)、圆钻包撮长凿型(B型)、长凿型(C型),皆少见,大部分应该属于中商晚段。这类卜骨,也均见于洹北商城的A、B、C型。

大圆钻(AⅢ式):标本03DXZT0101H627:1,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骨白被锯去近三分之一,骨白锯割整齐,骨面修整平整。钻坑基本呈竖行排列,大小略有差别,直径1.19—1.35厘米,深0.28—0.45厘米,口底基本同径,底部平整。上述类型还有标本03DXZT1302M78:03、03DXZT2303⑤C:1等。其形制与洹北商城A型卜骨相似。

圆钻包撮长凿型(B型):又分三式,I式(浅大圆钻,线状刻极浅),此形制常和大圆钻(AⅢ)式共存于同一版上。属于该式的卜骨有标本03DXZT2002⑤C:4、03DXZT2101⑤D:4。Ⅱ式(线状刻较深,圆钻也较深),有标本03DXZT1409M93:01,与长凿型(C型)并存同一版上。Ⅲ式(圆钻旁附长凿),仅有标本03DXZT1409M93:01,和BⅡ式(线状刻较深,圆钻也较深)共存于同一版上。其形制和洹北商城B型卜骨大同小异。

长凿型,其旁有灼痕(C型),仅有标本03DXZT2002⑤B:20,为牛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骨白切去一半。骨白切割十分整齐。凿长1.1—1.3厘米,未见有钻,旁边有一灼

①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北龙宫商代遗址的调查》,《文物》1985年第10期。

②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博物馆:《1984年秋济南大辛庄遗址试掘述要》,《文物》1995年第6期;徐基:《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的初步研究》,《文物》1995年第6期;王华:《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整治技术研究》,山东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6年。

痕,灼痕均在内侧,左右对称。其形制与洹北商城 C 型卜骨相同。

济南大辛庄遗址的甲骨,从形制来讲大部分属于中商阶段,少数分别属于早商和晚商。

(2) 桓台唐山遗址^①:发现 27 件甲骨,其中卜骨 20 件,卜甲 7 件。卜骨以牛肩胛骨为主。多数保留完整的骨臼,少数骨臼被切去一半或三分之一。多数钻凿灼兼施,也有只钻灼的,大致和洹北商城 A、B、C 相似。标本 H122④:6,为牛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骨臼保留原状,削去骨脊。骨反面残留钻坑 10 个,圆形圈底,坑径 0.9—1.1 厘米。坑内一侧有“猫眼状”凿槽,其排列似乎左右对称。和洹北商城 A 型相似。H122④:6,为牛肩胛骨,仅存扇部一块。骨正反面有圆钻坑,正面残留 6 个圆钻坑和 1 个圆钻方形凿;反面残留钻坑 8 个。坑径 0.8—1.1 厘米,坑内一侧有“猫眼状”凿槽。和洹北商城 B 型类似。标本 H122③:2,为牛右肩胛骨,仅存柄部,个体较大,骨臼长 8 厘米,宽 6.8 厘米,可能属于圣水牛类。骨反面残存钻凿 5 个,钻为半圆形,凿为弧形,排列左右对称。和洹北商城 C 型类似。

该遗址的甲骨大致与大辛庄遗址相同,具有稍为落后的形态。另外,一些甲骨具有殷墟甲骨的特点,应已经进入商代晚期。

5. 小神类型

(1) 长治小神遗址^②:发现 13 件,均为牛肩胛骨,多为残片。经过整治,骨反面有钻灼,无凿。标本 H2:45,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 14 厘米,残宽 4.5 厘米。切去骨臼三分之一,剩下部分保持原状,再将两边及骨脊削平、修整。钻坑圆浅,有大有小,有些钻坑烧成黑色,正面可见兆纹。标本 H2:46,为牛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 15 厘米,残宽 6 厘米。同前者的整治方法相同,但钻坑较密较深,坑径 1—1.4 厘米。标本 H105:10,已残,残长 17 厘米,残宽 5 厘米,骨反面残存钻坑 15 个。

(2) 汾阳杏花村遗址^③:该遗址六期发现卜骨,均用牛肩胛骨,经锯或削、磨加工。粗糙面钻坑密布,少数针坑由于不够薄,再经凿挖。坑内都有灼痕,对应的正面有清晰的兆纹。见标本 014 和 021。

6. 大城墩类型

(1) 大城墩遗址^④:该遗址第四期发现 2 件卜骨,均残。标本 T18(13):12,用牛大腿

① 宋艳波、燕生东:《鲁北地区商代晚期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三十五期,2007 年 12 月。这一批材料尚未正式公布,笔者曾与燕生东、闫志赴山东济南、淄博和桓台地区,亲自参与整理。

②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晋东南工作站:《长治小常乡小神遗址》,《考古学报》1996 年第 1 期。

③ 国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晋中考古》,文物出版社,1999 年,168、170 页,图 132—3、4。

④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含山县文物管理所:《安徽含山大城墩遗址第四次发掘报告》,《考古》1989 年第 2 期。

骨劈成两半,把内壁修治平整,残长 9.8 厘米,宽 7.4—9.1 厘米。先钻后灼,反面没有裂纹。

(2) 含山孙家岗遗址^①:发现 1 件卜骨,为牛肩胛骨,已残,残长 12.1 厘米,宽 6.5 厘米。经过整治,有明显的细小的刮削痕迹。钻凿灼兼施,骨反面残留钻坑 7 个,坑底为钝圆形,都保留有明显的灼痕。7 个钻坑有 4 个残缺不全。在两个完整钻坑的一侧留有凿槽,钻坑的反面有很细的裂纹。其形制和涇北商城 B 型相似。

7. 潘庙类型

仅在铜山丘湾遗址^②:发现 2 件甲骨,卜骨 1 件,卜甲 1 件。卜骨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一段。骨料经过整治,骨白削去一半,骨脊削平。均有钻凿灼痕,个别的只有钻、灼痕。

8. 北村类型

(1) 西安老牛坡遗址^③:发现 41 件卜骨。该遗址商代文化二期遗存中发现 13 件卜骨,均已残。除个别卜骨不加整治而直接进行占卜外,其余多经过整治。保存骨白原状,只是把骨脊削平,或者将骨白切去一半,再将肩胛骨的两侧厚边和中脊削平后使用。在骨面上直接施灼的少,多数是钻而后灼。钻坑呈圆形,坑径大小不等,排列无序,疏密不一。灼点多呈黑色,在反面留有焦黄色的斑点或裂痕。以钻坑为主,施凿者仅 1 件。据原报告所见卜骨的整治方法,分为五式。

B I 式,2 件。未经整治,保留骨白和骨脊,直接在骨面钻坑施灼。标本 85XL II 2T1^③:8,为羊肩胛骨,已残,残长 11.5 厘米,可见圆形钻坑 1 个。标本 88XL I 2H6:2,为羊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 9 厘米,骨面可见圆形钻坑 2 个。

B II 式,3 件。保留骨白,先在骨白基部竖切一半,再将肩胛骨骨面削平,使骨白基部与骨面相交成直角,呈半月状。标本 85XL II 2T8^③:7,为牛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 17 厘米。骨反面可见圆形钻坑 3 个,圆底,钻坑反面有竖行裂纹。标本 85XL II 1G1H2:96,牛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 8 厘米。骨反面可见圆形钻坑 7 个,坑径 1.1 厘米。

B III 式,3 件。先将骨白横切一半,保留白角,削平骨面,使所余骨白与骨板成一平面,再施钻灼。标本 85XL II 2T6^③:20,牛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 11 厘米。骨反面可见圆形钻坑 10 个,圆底,在坑内施灼,灼点呈黑色,反面有黄色斑点。标本 85XL II 1G1H2:95,为牛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 15 厘米。骨反面可见钻坑 7 个,圆底有灼痕。坑径大小不一,最大坑径 1.2 厘米,最小坑径 0.8 厘米。

① 安徽省展览博物馆:《安徽含山县孙家岗商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77 年第 3 期。

② 南京博物院:《江苏铜山丘湾古遗址的发掘》,《考古》1973 年第 2 期。

③ 刘士莪:《老牛坡》,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100—103、158—161 页,图七四~七七、一二四~一二六,彩版一二,图版六一、八七~八九。

BIV式,2件。两面均有钻坑。标本88XL I 2H18:103,应为牛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扇部,残长25厘米,残宽16厘米。骨反面残存圆形钻坑19个;正面可见圆形钻坑3个。坑径大小不一,大者0.6厘米,小者0.2厘米。标本85XL II 1G1H2:97,为牛肩胛骨,已残,残长10厘米,残宽8厘米。骨反面可见钻坑6个,正面可见钻坑1个,在钻坑内施灼。

另有均为失去骨白的卜骨残片(原报告的BV式)5件。标本88XL I 2H18:10,为牛右肩胛骨,已残,残长10厘米,宽6厘米。骨反面可见圆形钻坑10个,坑径较少,多为尖底。标本88XL I 2H6:7,为牛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扇部,残长21厘米,残宽15厘米。骨反面可见圆形钻坑65个,坑径大小不一,大者0.9厘米,小者0.2厘米。排列无序,在坑内施灼,反面有黄色斑点。标本88XL I 2H6:6,为牛肩胛骨,已残,残长10厘米,可见圆形钻坑5个。标本85XL I 3G2②:32,可见钻坑8个。

该遗址商代文化二期遗存中所出的卜骨,其形制和洹北商城A型类似,均带有较早的特征。

该遗址商代文化三期遗存中发现28件卜骨,均不完整。能辨认出属于牛肩胛骨的有8片,属于羊或猪的肩胛骨有9片。其整治方法如同前期。原报告分为8式。

CI式,4件。系用兽类肩胛骨制成,未经整治,直接施灼或先钻后灼。标本86XL III 1H4:5,为猪右肩胛骨^①,基本完整,长10.5厘米。无钻坑,直接施灼,可见圆形灼点1个。标本87XL III 2H2:7,应为猪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6.2厘米,可见圆形钻坑3个。标本86XL III 1H8:29,为羊左肩胛骨,几乎完整,后角和骨中间稍有缺失,长12厘米。无钻坑,直接施灼,可见圆形灼点4个。标本86XL III 1H5:41,为羊左肩胛骨,已残一半,残长22厘米。

CII式,3件。保留骨白,仅将骨脊削去,然后钻灼。标本86XL III 1H8:26,为猪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10.8厘米。可见圆形钻坑1个,平底,在钻坑内施灼。标本86XL III 1H6:9,为猪左肩胛骨,比较完整,前角缺失,长18.5厘米。骨正面可见圆形圜底钻坑4个,钻坑很浅,在坑内施灼,灼点呈黑色。

CIII式,3件。保留骨白,仅将骨脊和边沿厚壁同时削平,然后钻坑施灼。标本86XL III 1H14:1,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12.5厘米。骨反面可见圆形钻坑13个,坑径大小不一,深浅有别,在坑内施灼。标本86XL III 1H5:44,为猪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18厘米。骨反面可见圆形钻坑5个,在坑内施灼。

CIV式,5件。先将肩胛骨的骨白横切一部分,再削去骨脊和骨面坚硬的表皮,在松质骨上钻坑施灼。标本86XL III 1H5:72,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一半,残长21厘米。骨反面可见圆形钻坑10个,在坑内施灼,灼点呈黑色。标本86XL III 1H9:3,为牛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可见圆形钻坑5个。标本85XL II 2T6②:13,为羊右肩胛骨,已残,只

① 报告认为是羊右肩胛骨,经笔者观察报告提供的线图和图版,该标本均表现出猪右肩胛骨的特征。

留柄部,残长 11 厘米。未见钻凿,在骨反面直接施灼,可见圆形灼点 2 个。

CⅤ式,4 件。其整治方法同于 CⅣ式卜骨,但保留着骨面表皮质。标本 86XLⅢ1H5:10,为牛右肩胛骨,已残,残长 11 厘米。骨面可见圆形钻坑 8 个,在坑内施灼。标本 86XLⅡ:08,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 15 厘米,宽 7.5 厘米。骨反面可见圆形钻坑 16 个,在坑内施灼。标本 87XLⅢ2H2:1,为牛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一半,残长 11.4 厘米,残宽 6.1 厘米。骨反面可见圆形钻坑 6 个,钻坑内施灼,反面透有黑痕。标本 87XLⅢ2H2:6,为牛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 13.5 厘米。骨反面可见圆形钻坑 12 个,在坑内施灼。

CⅥ式,1 件。标本 86XLⅢ1H5:27,为牛肩胛骨,仅存残片,残长 9.6 厘米。骨正反面有钻坑,在坑内施灼。骨反面可见圆形钻坑 6 个,正面可见圆形钻坑 2 个。

CⅦ式,1 件。标本 85XLⅡ2T12③:3,为羊肩胛骨,已残,残长 9 厘米。保留骨臼,切去骨脊,将骨面削治平整,然后凿梭状坑,在坑内施灼。骨反面残存钻坑 1 个。

另有为不带骨臼的卜骨残片(原报告的 CⅧ式)8 件。标本 87XLⅢ2H7:3,残长 13.6 厘米,可见圆形钻坑 18 个。标本 86XLⅢ1H5:43,残存侧缘一块,残长 14.6 厘米,可见圆形钻坑 14 个。标本 86XLⅢ1H11:4,残存侧缘一块,残长 12 厘米。可见圆形钻坑 15 个,在坑内施灼,反面兆痕清晰可见。标本 86XLⅢ1H9:11,残长 11 厘米,骨反面可见圆形钻坑 18 个。标本 86XLⅢ1H8:22,残存骨扇部一块,由于骨面较薄,一面钻灼后,在另一面显露出清晰的痕迹。

该遗址商代文化三期遗存中所出的卜骨,其形制和二期卜骨大同小异,即和洹北商城 A 型类似,但均带有较早的特征。其年代上限应该为郑州二里岗上层一、二期之间,延续时间较为长,下限相当于殷墟文化一、二期。

(2) 耀县北村遗址①:发现 43 件卜骨,多为牛肩胛骨,有极少量的羊肩胛骨。经过整治,先将骨脊和骨臼削平,肩胛骨两侧较厚处亦经刮削,之后再施钻灼,钻坑均为圆形,大小不等,大者约 1.3 厘米,小者约 0.4 厘米,钻坑剖面呈半球形,深浅不同,有的钻相互叠压。部分钻内可见灼痕,有的正面有兆纹。报告提供的线图中除标本 IH16:18 为羊肩胛骨外,均为牛肩胛骨。出土卜骨的单位均属于该遗址商文化第二期,约相当于二里岗文化上层或稍晚。

(3) 礼泉朱马嘴遗址②:该遗址分三期,均发现卜骨。第一期遗存所含卜骨,一般均切去骨臼,修脊,均有钻坑,无凿,部分有灼痕及兆纹。标本 T2⑥:8,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骨臼切一半,骨反面留有钻和灼痕 7 个。第二期遗存中卜骨较少,修治情况同前期,均仅有圆形钻坑,无凿。第三期遗存也发现卜骨。标本 H1:1,为牛肩胛骨,已残,骨

① 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耀县北村遗址 1984 年发掘报告》,《考古学研究》(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年,330 页,图三九、四〇。

② 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礼泉朱马嘴商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0 年第 5 期。

反面留有钻坑 8 个^①。

(三) 商代晚期

1. 殷墟类型

殷墟的甲骨,过去不少学者曾作过多方面深入的研究,本文只简单描述卜法相关的内容。殷墟类型的甲骨主要为殷墟遗址出土,少数出土于河南境内的其他遗址。以下先介绍殷墟地区的卜用甲骨:

(1) 安阳大司空遗址^②:共发现 162 件甲骨,其中卜骨 100 件,卜甲 62 件。1953 年发现 62 件甲骨,其中卜骨 15 件,卜甲 47 件(2 件有字),卜骨均为牛肩胛骨;1958—1961 年发现 99 件甲骨,其中卜骨 84 件(2 件有字),卜甲 15 件;1986 年发现 1 件卜骨(M22:3)。该遗址发现 2 片带字的卜骨。标本 SH314^③:3(原号 59ASH114^③:3),为牛左肩胛骨,残存柄部,整治较粗糙,未切臼角。正面靠骨臼左下侧有“辛贞在衣”四字,字体具有武丁时期宾组卜辞的特点,地层和共存的陶器年代也较早。另 1 件刻有“文贞”二字,字体纤细,显系习刻。

(2) 安阳后冈遗址^③:共发现 7 件甲骨,其中卜骨 3 件(1 件有字),卜甲 4 件。除 1971 年出土的 1 件卜骨(出于 M48)上有“口又”两个字外,皆无字。标本 91M12:05,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一半,残长 10 厘米,切去臼角,残留凿、灼痕 3 个,凿槽为弧形,烧灼在凿槽内侧旁,左右对称。此墓的时代可定为殷墟二期。标本 91M7:02,应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扇部,残长 26 厘米,残宽 20 厘米。前角被削成缺口,骨正面有两行 5 个凿和灼痕,凿槽为长方形,灼痕均在凿槽的左侧。

(3) 安阳苗圃北地遗址^④:共发现 895 件甲骨,其中卜骨 747 件,卜甲 148 件。1958—1961 年发现 439 件甲骨,其中卜骨 343 件(1 件有字),卜甲 96 件(1 件有字);1962—1964 年发现 2 件卜骨(均有字);1974 年发现 1 件卜甲(有字);1980—1982 年发现 2 件甲骨,卜骨和卜甲各有 1 件;1982—1984 年发现 450 余件甲骨,其中卜骨 400 件,卜甲 50 余件;1985 年发现 1 件卜骨(有字)。

① 报告认为朱马嘴一期的年代,相当于郑州二里岗上层;第二期约相当殷墟文化第一期,下限或可略晚一些;第三期的年代相当殷墟文化第二期或略晚。但笔者认为第一期时卜骨切去骨臼这一特征,应是中商时期的特征。

② 马得志、周永珍、张运鹏:《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 9 册,1955 年,71 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 年,199—202 页,附表十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58—1959 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 年第 2 期;《1984—1988 年安阳大司空村北地殷代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4 年第 4 期。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71 年安阳后冈发掘简报》,《考古》1972 年第 3 期;《1991 年安阳后冈殷墓的发掘》,《考古》1993 年第 10 期。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 年,199—202 页,附表九;《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 年,152、160 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0—1982 年安阳苗圃北地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6 年第 2 期;《1982—1984 年安阳苗圃北地殷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91 年第 1 期。

卜骨大多为牛肩胛骨,别的兽骨很少,能辨出的只有3块鹿肩胛骨。另外,还有人髌骨6件(均在84H19内出土,系骨盆部),盆骨1件。经过整治,大多钻凿灼兼施,有少数碎片只有凿灼而无钻,少数碎片只有钻灼而无凿。其中标本84H19:1,应为牛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扇部,残长22.4厘米。骨正反面均施钻凿灼,凿为弧形或尖头直腹形,钻为圆形,排列有规律,和洹北商城C型相似。84T1④:22,应为牛肩胛骨,已残,残长11.5厘米,骨反面有圆钻和灼痕,无凿,和洹北商城A型相似。标本84H19:10,为人髌骨的盆部,已残,残长9.5厘米,骨上钻凿灼兼施,凿为长方形,钻为圆形。

该遗址早、晚期遗存中出土的甲骨,在数量上呈现出早期多晚期少的趋势。这种现象,暗示该遗址的占卜风尚早期(尤其是一期阶段)盛于晚期^①。从报告提供的图来看,1984年出土的甲骨均属于早期,特征与洹北商城甲骨相似,但比洹北商城稍有规整,应为洹北商城甲骨向殷墟甲骨演变的过渡形态。

此外,《殷墟发掘报告》中所提供的标本也多数是该遗址的,早晚期的甲骨均有,但报告未对甲骨进行仔细分期。从卜骨的特点来看,标本PNT22④:9、PNT221⑥:22,和洹北商城A型相似;标本KH6:8、PNT220④:16、PNⅡT4③:2、PNⅡT4③:3,和洹北商城B型相似;标本SH414③:8、PNH217:26、VDT5⑨:36,和洹北商城C型相似;标本PNⅠH24:2,和小屯南地相似,具有较晚的特征。

(4) 安阳小屯遗址:据刘一曼的文章^②,该地考古发掘所出的刻辞甲骨,1928—1937年为28575片,1955年至1997年为5669片^③。再加上20世纪以来私人盗掘出土的10多万片,小屯共出刻辞甲骨约15万5千多片。无字甲骨之数则难以统计,估计比有字甲骨之数量更大。本文将以公布的资料简单描述如下。

小屯东南(1955年)发现10件卜骨(1件有字),皆残^④。以牛肩胛骨为主,也有猪肩胛骨和马肩胛骨(有字)。骨一面有凿灼,另一面可见兆纹。

小屯西地(1971年)发现21件卜骨(10件有字),均为牛肩胛骨。卜骨都经过整治,反面的骨脊被削平,白角被切去。骨正反面只有凿和灼痕,无钻。这21件卜骨重叠堆放在一起,井然有序,骨白大多向东,只有3件向北。叠压的情况大致分为三组:西南一组3件,东南一组6件,北面一组12件。三、六、十二,以三为它们的公约数。郭沫若认为与文献“卜用三龟”或“卜用三骨”^⑤的记载相吻合。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2—1984年安阳苗圃北地殷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91年第1期。

② 刘一曼:《安阳殷墟甲骨出土地及相关问题》,《考古》1997年第5期。

③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一九五五年秋安阳小屯殷墟的发掘》,《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郭沫若:《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考古》1972年第2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3年安阳小屯南地发掘报告》,《考古》1975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考古所安阳队资料。

④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一九五五年秋安阳小屯殷墟的发掘》,《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

⑤ 郭沫若:《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考古》1972年第2期。郭沫若引用《尚书·金縢》:“乃卜三龟,一习吉。”《论衡·知实篇》及《死伪篇》皆云:“乃卜三龟,三龟皆吉。”

小屯南地(1973年)发现10335件甲骨。其中带字甲骨5335件,卜骨5260件,卜甲75件;无字甲骨约5000多件^①。《小屯南地甲骨》一书中公布了1973年出土的甲骨材料,这批甲骨的时代从武丁至帝乙、帝辛,多数属于武丁、康丁、武乙时期。该书专门研究了这批甲骨的钻凿形态,将甲骨上的凿分为六型,各时期流行的类型不同。

本文只将《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报告》所提供的较大且能看出反面钻凿形态的无字卜骨,简单描述如下。标本H26:7,为牛肩胛骨,已残,骨反面残留圆钻3个,直径1.2—1.3厘米,深0.8—0.9厘米。其中1个圆钻内有小凿槽,其形制和洹北商城A型类似。标本H30③:1,为牛右肩胛骨,比较完整,扇部稍有缺失。未切臼角,骨反面有的钻凿灼兼施,有的只有圆钻和灼。凿为弧形,弧底,凿长1.6厘米,宽0.75厘米,深0.5厘米。圆钻的直径0.8—0.9厘米,深0.3—0.4厘米,圆钻之旁多有烧灼的痕迹。标本H46:4,为牛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未去臼角,骨反面残留钻或凿7个,旁边有灼痕。以上2件标本的形制和洹北商城B型相似。标本H40:1,为牛肩胛骨,已残,只留扇部,骨反面留有四列钻凿18个,3个钻凿灼兼施,其余只有凿和灼,无钻。凿为弧形或长方形(腹部略带弧度),凿长1.7厘米,宽1厘米,深0.6厘米,此类是用刀挖成的。钻凿的排列左右对称,其形制和洹北商城C型类似。标本H62:9,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骨臼削去一半,臼角被切去,骨反面有一列凿槽5个,凿旁有灼痕,无钻。凿为弧形,平底,其中2个中部为一窄长方形,外围一椭圆形,其制法是先用刀挖出一长方形的小凿,然后再向外刮削成弧状边缘。凿长1.7—2厘米,宽0.9—1.2厘米,深0.4厘米。标本T55⑤:44,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切去臼角,骨反面残留凿槽4个,凿为长方形,平底,凿长2.35厘米,宽0.85厘米,深0.55厘米,凿旁有灼痕,此类长方形凿殷墟一、二期开始出现。

上述情况表明,除标本H62:9和T55⑤:44具有殷墟时期的特征之外,其余标本和洹北商城卜骨类似,显示出中商卜骨的特征,由此可推测此类卜骨应属于该遗址最早阶段的卜骨。反过来说,此类无字卜骨中包含着武丁时期或更早的卜骨。此外,在《小屯南地甲骨》一书中,殷墟时期卜骨介绍已经比较充分,本文不再详细论述。

(5) 安阳花园庄遗址^②:该遗址所出遗存中共发现1657件甲骨,其中卜骨74件(有字10件),卜甲1583件(有字574件)。

1986—1987年在花园庄南地发现14件甲骨,其中卜骨11件,卜甲3件^③。卜骨大多数有凿灼而无钻,少数钻凿灼兼施。标本H27③:22,牛肩胛骨,已残,残长10厘米,宽2.6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4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9集,科学出版社,1995年,86、88页。《小屯南地甲骨》上册的数目为“发现刻辞甲骨5041片(缀合前数字),其中卜骨4959片,卜甲70片,牛肋条4片,未加工的骨料8片”。《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报告》中提到“出土无字甲骨五千多片,绝大多数属于较小的碎片,大片的很少;又在数千无字甲骨中挑出刻辞甲骨294片”。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队:《1986—1987年安阳花园庄南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2年第1期;《1991年安阳花园庄东地、南地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第一至六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队:《1986—1987年安阳花园庄南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2年第1期。

厘米。反面有4个凿,体呈长方形,平底,用刀挖成。凿长2厘米,宽1.1厘米,深0.6厘米,凿之两侧有灼痕,无钻。此灰坑属于该遗址的中期。标本H1:9,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一块,残长8.8厘米,残宽4.4厘米。骨反面有2个凿,A凿,长方形,长1.4厘米,宽0.8厘米,深0.4厘米,凿之右侧有灼痕;B凿,呈弧形,头尾较尖,凿长1.9厘米,宽0.9厘米,深0.4厘米。凿之右侧有灼痕。标本H1:6,为牛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8.8厘米,宽7厘米。臼角被切去,骨反面有3个凿,弧形。凿长1.5厘米,宽1厘米,深0.45厘米。凿之一侧有灼,无钻,排列左右对称。此灰坑属于该遗址晚期。

1991年花园庄南地又发现57件甲骨,其中卜骨35件(有字5件),卜甲22件^①。报告没提供图,但据报告可知出土刻辞卜骨1片(M99上③:1),字体类似“午组卜辞”,所出的层位和共存陶片属于殷墟文化第一期,可推测此类甲骨应属于殷墟一期。

1991年在花园庄东地发现1583件甲骨,其中卜骨25件(有字5件),卜甲1558件(有字574件:腹甲557件,背甲17件)。这些甲骨集中在第3层中部与第4层底部出土,其堆积厚达0.8米^②。据地层关系和共存陶器判断,该甲骨坑属殷墟文化第一期,依据坑中所出卜辞涉及的人物、事类,发掘者认为属武丁时期“子组”卜辞,说明在武丁时期,不但时王,而且王室达官、显贵也可以独立地进行占卜活动。

(6) 安阳薛家庄南地遗址^③:发现40件甲骨,牛肩胛骨较多,龟甲(其中有刻辞卜甲1件)次之。甲骨上钻凿灼皆有。

(7) 安阳刘家庄遗址^④:发现3件卜骨。标本96T1⑨:5,为牛肩胛骨,已残,残长15.3厘米。经整治修磨,钻凿灼兼施,钻为椭圆形,钻内左侧均有“猫眼状”凿槽,凿旁有灼痕。标本95T1J1:4,为牛肩胛骨,已残,残长11厘米,残宽4厘米。经过整治,反面残存钻坑7个,钻旁有灼痕,排列左右对称。正面刻有“数卦”符号,自上而下,分为两组,均竖刻,内容是:上组“一一六六一五”,下组为“六八八六六”。上组外侧刻有“九七七”。标本95T1J1:5,为羊肩胛骨,几乎完整,长13.2厘米,有钻凿灼痕迹。

此外,在安阳殷墟西区墓葬^⑤、四盘磨^⑥、孝民村、北辛庄、小屯西地、张家坟、梅园庄、水渠工地、白家坟^⑦等地均发现甲骨。

以下介绍殷墟以外的卜用甲骨: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队:《1991年安阳花园庄东地、南地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6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队:《1991年安阳花园庄东地、南地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6期。

③ 赵霞光:《安阳市西郊的殷代文化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2期;周到、刘东亚:《1957年秋安阳高楼庄殷代遗址发掘》,《考古》1963年第4期。

④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1995—1996年安阳刘家庄殷代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7年第2期。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⑥ 郭宝钧:《一九五〇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五册,55、56页。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附表。

(8) 郑州人民公园遗址^①:共发现 7 件甲骨。商代人民公园一期发现 6 件甲骨,卜骨(仅见牛肩胛骨)2 件,卜甲 4 件。牛肩胛骨,皆残,骨臼、骨脊经过修整,先钻后灼。标本 C7T37^①:4,为牛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 17.2 厘米。骨臼削去一部分,骨脊棱刮削修整,在骨反面先钻出圆坑,再灼制,无凿。留有钻灼痕 29 个,分布密集。标本 C7T105^②:2,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 16.3 厘米。骨臼削去一半,削去臼角,骨脊棱刮削修整,在钻的内侧均有灼痕,共 11 个,应为左右对贞,并在两侧边缘处有数处锯痕。

商代人民公园二期保存较好的卜骨仅有 1 件(C7H1:6),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 13.1 厘米。把骨脊棱刮削修整,先钻后灼,钻灼痕密集,大小不同,残留灼痕 23 个。

(9) 郑州陈庄遗址^②:该遗址商代文化上层遗存中发现 30 余件甲骨,多属残片。其中卜骨 27 件,卜甲 3 件,卜骨以牛肩胛骨为主,猪肩胛骨有 1 件。整治方式,有的骨臼保持原状,只将骨脊的根部和两边侧缘较厚的部分切去(应属于二里岗上层),猪的肩胛骨,只将骨脊切去,不像牛肩胛骨整治的那样平整。有的将骨反面的骨臼下部切开一半,把骨脊和两边全部削平。钻凿灼方式,有的钻凿灼兼施,有的先钻后灼,有的先凿后灼。钻坑多在削去骨脊的一面,但也有正反两面都有的。钻坑的底部可分尖圜底和平圜底两种,坑深不等。

(10) 孟县涧溪遗址^③:发现 7 件甲骨,其中卜骨 4 件,卜甲 3 件。卜骨均为牛肩胛骨,有凿和灼,有的经过剖制。

(11) 登封王城岗遗址^④:发现 5 件甲骨,其中 3 件为卜骨,2 件为卜甲。标本 WT263^⑤:6,应为猪肩胛骨^⑥,已残,残长 9.5 厘米。在削去骨脊的面上,有两个钻坑和灼痕。

(12) 商丘坞墙遗址^⑦:发现 1 件卜骨(T1^③:10),为牛肩胛骨,已残,只留骨中间一块。骨面较薄之处,无钻、有灼及枣核形凿三列 11 个,从凿的排列规律看,该卜骨应属于商代晚期。

(13) 夏邑清凉山遗址^⑧:发现 15 件甲骨,卜骨 13 件,卜甲 2 件。卜骨多系牛肩胛骨制成,也有个别为羊肩胛骨。肩胛骨均为切脊磨制后再施钻凿及灼。仅见于二、三期。第

① 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 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 年,926、948 页,图六一九、六三三,图版二七一。报告认为,商代人民公园一期与二期出土的主要陶器鬲、豆、簋的形制特征与河南安阳殷墟商代后期各小期中的同类陶器相比较,我们初步认为商代人民公园一期的陶器,大体和安阳殷墟苗圃北地和大司空村的第 I 期文化相当;而商代人民公园二期的陶器,大体和安阳殷墟苗圃北地与大司空村等地的第 II 期文化相当,都是属于安阳殷墟商代后期排列较早的陶器(《郑州商城》,951 页)。从卜用甲骨的特征来看,也大致相同。

② 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市陈庄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6 年第 2 期。

③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孟县涧溪遗址》,《考古》1961 年第 1 期。

④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 年,176 页,图版六三。

⑤ 原报告认为是牛肩胛骨,经笔者观察该标本的图版,明显看出猪右肩胛骨的形状,而且文字描述该卜骨的残长仅 9.5 厘米,复原后约 15 厘米左右,与猪的肩胛骨大小相当。

⑥ 商丘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商丘县坞墙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 年第 2 期。

⑦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丘地区文管会:《河南夏邑清凉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研究》(四),科学出版社,2000 年。

二期发现4件。标本H52:2,为牛右肩胛骨,比较完整,颈侧缘一段缺失,长32.2厘米。切去骨臼,带有半月牙形自然骨臼面,骨反面留有圆形钻坑30个,钻坑圆而深,排列无规律。钻坑上有灼痕,另一面有卜兆。第三期发现9件。标本H16:3,牛右肩胛骨,已残,残长27.2厘米。半切骨臼,骨反面留有圆而较深的钻坑,排列无规律。钻坑上有圆灼,另一面有卜兆。标本T5④:18,牛肩胛骨,仅残存中部一部分,残长13.8厘米。骨反面留有圆形钻坑和梭形凿槽,钻坑上有圆形灼痕,骨正面也有卜兆。该遗址的商文化第一期和第二期约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二期,第三期约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三期。

(14) 滏池鹿寺遗址^①:该遗址上文化层发现9件卜骨^②,已残。标本H3:5,应为牛肩胛骨,先凿出长方形凹槽,然后在槽的一侧进行施灼。

2. 曹演庄类型

(1) 邢台东先贤遗址^③:发现4件甲骨,其中卜骨3件,卜甲1件。该遗址第三期遗存中发现2件甲骨,其中卜骨1件,卜甲1件。标本H42:3,已残,残长7.3厘米,圆钻,有灼。第四期遗存中没有发现。第五期遗存中发现2件卜骨,均残。施圆钻,有灼,有的施梭形凿。标本T17④:1,已残,残长12.8厘米,残宽3.2厘米,圆形钻,钻坑边缘有灼痕。标本H60:1,应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扇部。骨正反面兼施钻凿灼,反面有三列纵向的梭形浅凿槽,坑边缘有灼痕。正面下半部有两列纵向的4个梭形凿槽,凿槽规矩工整,边缘有灼痕。其年代第三、四、五期应分别相当于殷墟文化二、三、四期。

(2) 邢台粮库遗址^④:发现1件卜骨(ⅡH35:5),牛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11.5厘米。骨臼切去一半,臼角也被切去,钻凿灼兼施,较为特殊的是用长方形凿。

(3) 磁县下七垣遗址^⑤:该遗址第三层发现13件甲骨,其中12件为卜骨,1件为卜甲。卜骨多数为牛肩胛骨,也有羊肩胛骨。骨料经过整治,骨臼削去一半,骨脊削平。多数只有凿、灼,其中有1片两面都有凿灼痕^⑥。标本H23:332,应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骨中间下部,骨正面留有兩排钻凿和灼痕10个,钻一律在凿的左边。标本H19:204,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骨臼削去一半,骨脊削平,肩胛骨结节削去。凿为枣核形,钻一律在凿的内侧靠上部,即钻凿排列对称。

该遗址第二层发现67件甲骨,其中39件为卜骨,28件为卜甲。卜骨骨料全都经过整治,钻凿灼均有的4块,仅凿灼的33块,仅钻灼的2块。3块上有孔,似为穿绳所用^⑦。

①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滏池县鹿寺商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9期。

② 报告认为该遗址上文化层属于西周,但卜骨显示出晚商时期卜骨的特点。

③ 邢台东先贤考古队:《邢台东先贤商代遗址发掘报告》,《古代文明》(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424、437页,图四三、五三;《河北邢台市东先贤遗址1998年的发掘》,《考古》2003年第11期。

④ 河北省邢台市文物管理处:《邢台粮库遗址》,科学出版社,2005年,216页,图一八七。

⑤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下七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⑥ 报告认为属于商代早期,可笔者仔细观察图版和文字描述,应该属于商代晚期。

⑦ 报告认为属于商代中期,可文字描述的内容是殷墟卜骨的特征。虽然无图,无法详细观察,从文字描述看,应该属于商代晚期。

该遗址第一层只发现 4 件卜骨,骨料全经过整治,钻凿灼均有的 2 块,只凿灼的 2 块。

3. 大辛庄类型

(1) 济南大辛庄遗址^①:该遗址的一些卜骨应该属于商代晚期。

(2) 禹城邢寨汪遗址^②:采集 10 余件甲骨。卜骨经过整治,骨脊磨平,有凿无钻,有灼。

(3) 济阳刘台子遗址^③:该遗址 M3 扰土中发现 1 件卜骨,可能是营造汉墓时所毁的周墓里的遗物^④。卜骨为牛左肩胛骨^⑤,已残,只留扇部,残长 24.8 厘米,最宽处 19.7 厘米。经刮削磨制而成。骨正面右下角削去一角。正面中间下部有 21 个长椭圆形凿,分 5 行排列,左边第二行为 5 个,其余各行皆为 4 个。每个凿的左边都有圆钻。19 个凿有灼痕。骨反面左上留有 9 个钻凿,上下两行排列,凿均在钻的左边,都已灼。右边靠边缘处有 6 个凿,凿大部分在圆钻的左边,其中第三、四、五在凿两面均有圆钻,由上而下排列,均已灼。凡已灼的在另一面都出现兆纹。在卜骨正面中间及近右边边缘处有刻划,其中有的被钻凿打破,有的从钻凿中间穿过。因刻划太浅、太细,很难辨认。

(4) 章丘宁家埠遗址^⑥:发现 3 件卜骨,皆为牛肩胛骨。有凿有灼,凿槽呈椭圆形。标本 H180:3,为牛右肩胛骨,仅留柄部,切去骨臼,骨反面残存凿槽二排 9 个,左右对称。标本 H129:1,为牛左肩胛骨,仅留柄部,骨反面残存凿槽二排 7 个,左右对称。标本 H180:4,骨反面残存凿槽二排 5 个。

(5) 桓台前埠遗址^⑦:发现 13 件甲骨,其中卜骨 6 件,卜甲 7 件。标本 H106:1,为鹿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 5.6 厘米,残宽 4.5 厘米。削去骨臼,骨反面削平,留有 1 个圆钻坑,坑内有“猫眼状”凿槽。标本 H129:1,应为鹿肩胛骨,已残,骨反面留有 5 个长方形凿槽。

(6) 阳信李屋遗址^⑧:发现 27 件甲骨,其中卜骨 22 件,卜甲 5 件。卜骨以鹿肩胛骨为最多。标本 T1407T1507H2:2,为牛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 14.7 厘米,宽 9.2 厘米。

①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博物馆:《1984 年秋济南大辛庄遗址试掘述要》,《文物》1995 年第 6 期;徐基:《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的初步研究》,《文物》1995 年第 6 期;王华:《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整治技术研究》,山东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6 年。详细情况请参看商代中期济南大辛庄遗址卜骨的描述。

② 德州地区文物工作队:《山东禹城县邢寨汪遗址的调查与试掘》,《考古》1983 年第 11 期。

③ 德州地区文化局文物组、济阳县图书馆:《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85 年第 12 期;王尔俊:《山东济阳刘台子出土的陶文等商代铭刻》,《考古》1989 年第 6 期。

④ 报告认为该遗址 M3 的年代应为西周穆王之时,属西周早期偏晚。M3 葬式较特殊,有腰坑。这样的特点为商人特有,商代晚期或西周时期商遗民有关的墓葬中常见。卜骨的整治方式与钻凿形制,具有典型的殷墟卜骨特点,该卜骨的年代,应该属于商代晚期。又因该卜骨出土于 M3 扰土中,可能非墓葬随葬品,其年代可能早于该墓的年代。

⑤ 报告认为是牛右肩胛骨,经笔者观察卜骨正面钻凿的排列均向左边,即圆钻均在梭形凿的左侧。殷墟甲骨一般削去臼角,骨正反面的钻凿排列一律朝削去臼角的方向,即右肩胛骨的钻均在凿的右侧,左肩胛骨的钻均在凿的左侧。若报告说的正确,则该卜骨钻凿的排列与殷墟卜骨相反。

⑥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青高级公路章丘工段考古发掘报告集》,齐鲁书社,1993 年,44 页,图版捌。

⑦ 宋艳波、燕生东:《鲁北地区商代晚期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三十五期,2007 年 12 月。

⑧ 宋艳波、燕生东:《鲁北地区商代晚期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三十五期,2007 年 12 月。

经过修整,骨白被削去一半,骨反面削平,削去喙突。只施凿灼,无钻,骨反面留有6个凿槽,凿为长方形,凿长1.3—1.5厘米,宽0.4—0.5厘米。方凿内侧直接施灼,除右边的1个之外,其余均在凿右侧施灼。标本 T1405M44:01,为鹿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10厘米,残宽5.3厘米。骨白削去一半,骨反面削平。只施凿灼,无钻,骨反面留有5个凿槽,凿为长方形,凿长1.2—1.4厘米,宽0.4—0.5厘米。靠近左边的在凿槽右侧施灼,靠近右边的在凿槽左侧施灼,左右对称。

(7) 潍坊姚官庄遗址^①:发现7件卜骨,均为牛肩胛骨制成,皆残。其中标本西 BT17:1,已残,只留柄部一段,有凿无钻,凿痕呈长方形。标本 0178,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经过整治,锯切臼角,有凿无钻,凿痕呈梭形,排列应左右对称。此外,有的有钻无凿。这些卜骨上都有灼痕。从钻凿形态特征来看,标本西 BT17:1的特征和洹北商城 C 型相似,标本 0178 和小屯南地卜骨相同。其年代应属于商代晚期。

4. 前掌大类型

仅在滕州前掌大遗址发现7件甲骨^②,其中卜骨6件,卜甲1件。卜骨系动物肩胛骨加工而成。标本 BT1516^③:6,应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骨中间一段,残长19.2厘米。骨反面钻凿灼兼施,残存46个,凿为弧形,钻为圆形。多数钻在凿槽的右侧,少数钻在凿槽的左侧。从卜骨的特征,尤其是钻凿灼的排列来看,此类卜骨应属于殷墟二期前段,即中商向晚商时期过渡形态的卜骨。标本 M213:3,应为牛肩胛骨,已残,残长7.5厘米,宽2.5厘米,骨反面钻凿灼兼施,仅留5个,凿为弧形,钻为圆形,朝向同一个方向。

5. 老牛坡类型

(1) 西安老牛坡遗址^③:该遗址商代文化四期遗存中发现100余件卜骨,均已残。以牛肩胛骨为主,羊、猪的肩胛骨次之,卜甲未见。除少数肩胛骨未加整治而直接施钻或灼外,一般都经过整治,再施钻灼。从所出卜骨来看,以先钻后灼者最多,不钻而灼者少,凿而后灼者仅有三例。在同一骨版上,钻坑的疏密不等,坑径大小有别,排列无规律。钻坑和施灼的位置一般是在骨反面,但也有少数在骨正反两面都钻灼。钻坑均为圆形,圆坑的底部以圆形为主,其次是尖圆底和平圆底。钻坑施灼后,多数灼点呈黑色,反面可见清晰的兆纹,但均未见刻字。

原报告根据缀合的卜骨,就其取材和整治方法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六式。

D I 式,4件。取材以猪、羊肩胛骨为主。多数保留骨白原状,未经整治而直接施灼或

①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博物馆:《山东姚官庄遗址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5),文物出版社,1981年12月,39页,图二〇九。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上、下册),文物出版社,2005年,29、462页,图二一、三二八,图版八、二〇四。

③ 刘士莪:《老牛坡》,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44、65页,图二三、四四。

钻而后灼。标本 88XL I 2H21:1, 为羊左肩胛骨, 比较完整, 骨中间稍有缺失, 长 20 厘米。骨反面可见圆形钻坑 4 个, 圜底, 坑内有灼痕, 肩部较薄的地方, 可见圆形灼点 3 个, 呈焦黑色。标本 86XL I 3T3⑤:1, 羊左肩胛骨, 只留柄部, 残长 12.4 厘米, 可见圆形钻坑 3 个。标本 88XL I 2H5:5, 为羊右肩胛骨, 只留柄部, 残长 12 厘米。可见圆形钻坑 2 个, 在坑内施灼。

D II 式, 3 件。保留肩胛骨的骨臼和臼角, 削去骨脊, 然后在骨臼根部垂直下切, 再将骨面削平; 或保留骨臼, 仅削去骨脊, 稍经整治, 即进行钻灼。标本 88XL I 2H15:20, 为羊肩胛骨, 残存一半, 残长 19.1 厘米, 臼宽 3.1 厘米。可见圆形钻坑 1 个, 坑内施灼, 骨中间较薄之处则不钻而直接施灼, 灼点可见。标本 87XL I 2T7③:6, 牛右肩胛骨, 已残, 只留柄部, 残长 14.5 厘米。骨反面可见圆形钻坑 27 个, 排列较密集, 坑径大小不一, 在坑内施灼, 灼点呈黑色, 反面斑点焦黄。标本 88XL I 2H15:21, 为牛右肩胛骨, 已残, 只留柄部, 残长 9.7 厘米, 可见圆形圜底钻坑 6 个, 不见灼痕。

D III 式, 8 件。先将骨臼横切一半, 保留臼角, 再削平骨脊和部分较厚边沿, 将骨面整平, 然后施钻灼。标本 88XL I 2H14:33, 为牛左肩胛骨, 已残, 只留柄部, 残长 22 厘米, 臼宽 7 厘米。骨反面可见圆形钻坑 31 个, 坑径大小不同, 深浅不等, 排列无规律, 在坑内施灼。标本 88XL I 2H14:11, 为牛右肩胛骨, 已残, 只留柄部, 残长 24.2 厘米, 臼宽 6 厘米。骨反面可见圆形钻坑 33 个, 坑径大小有别, 深浅不一, 大部分为圜底, 灼点呈黑色, 正面灼斑呈焦黑色。标本 87XL I 2T16③:11, 牛右肩胛骨, 已残, 只留柄部一块, 残长 13 厘米, 可见圆形钻坑 13 个。标本 87XL I 2H17:2, 已残, 只留柄部, 残长 14 厘米, 可见圆形钻坑 19 个。

D IV 式, 3 件。骨面均施凿, 整治方法同 D III 式卜骨。标本 87XL I 2T8③:1, 为牛左肩胛骨, 已残, 只留柄部一半, 残长 14.5 厘米, 臼宽 6.3 厘米。骨反面可见长方形凿 1 个, 尖底, 长 1.7 厘米, 宽 0.8 厘米。在凿旁施灼, 另有圆形钻坑 2 个, 可知这片卜骨是钻凿并施。标本 87XL I 2T16④:8, 为牛肩胛骨, 已残, 残长 11 厘米, 残宽 3.5 厘米。可见长方形凿 6 个, 尖底, 凿一侧施灼, 反面透有黄色斑点和裂纹。标本 87XL I 2T17③:7, 猪肩胛骨, 已残, 只留柄部, 残长 10 厘米, 臼宽 3.6 厘米。可见棱形凿 2 个, 长 1 厘米, 中腰宽 0.3 厘米。在坑内施灼。

D V 式, 2 件。均为两面施钻和灼的卜骨。标本 87XL I 2T7③:2, 为牛肩胛骨, 仅存肩部一块, 残长 15.6 厘米, 残宽 10 厘米。骨反面上部留有圆形钻坑 4 个, 正面下端有圆形钻坑 5 个, 均在坑内施灼。

D VI 式, 7 件。均为失去骨臼的残片。标本 88XL I 2H25:4, 为牛肩胛骨, 残长 18.6 厘米, 残宽 4 厘米。骨反面可见圆形钻坑 16 个, 坑径大小不一。标本 86XL I 3T3②:5, 为牛肩胛骨, 残长 15 厘米, 残宽 4 厘米。骨反面可见圆形钻坑 18 个, 坑径大小不同, 排列无序, 坑内灼痕呈焦黑色。标本 86XL I 3T7③:10, 牛肩胛骨。残长 12.4 厘米, 残宽 4.5 厘米。骨反面可见圆形钻坑 13 个, 坑径大小不同, 在坑内施灼。

该遗址商代文化四期遗存中所出土的卜骨,除DⅣ式长方形凿受到殷墟文化的影响外,均延续前期卜骨的特征。

该遗址商代文化五期遗存中发现4件卜骨,可分为二式。

EⅠ式,1件(87XLⅠ2T18②:1),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10厘米,臼宽5厘米。先在骨臼根部垂直下切,然后横切一半,削去骨脊,使骨面平整,最后施钻灼。残存圆形钻坑3个,在坑内有灼痕。

EⅡ式,3件。均为失去骨臼的卜骨残片。标本87XLⅠ2T18②:2,为牛肩胛骨,残长14厘米,可见圆形钻坑10个。标本85XLⅡ2T2①:1,牛肩胛骨,残长11厘米,可见圆形钻坑5个。标本86XLⅠ2T4②:6,为牛肩胛骨,残长10.3厘米,可见圆形钻坑3个。

(2) 长安羊元坊遗址①:发现10余件,均为牛肩胛骨,削去骨脊,钻出圆坑,多存留有灼痕。标本H:31,仅存一块,残长12.8厘米,残宽4.5厘米。

(3) 扶风壹(益)家堡遗址②:发现3件卜骨,均为牛胛骨,皆残。标本0661,为牛右肩胛骨,已残。骨臼的一半和骨脊两侧部分切去,骨反面有钻灼,无凿。钻为圆形,坑底部呈弧形,坑径大小、深浅不同,坑内均有灼痕。标本T23⑤:83与④B:81、82(可以缀合),为牛左肩胛骨,已残,经过修整,骨臼、骨脊被削去,未去臼角。有钻无凿,钻径大小不一,大的直径达1.4厘米,中的约1.2厘米,小的仅0.8—0.9厘米。标本G1:45,为牛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骨臼保留原状,未去臼角,有钻无凿,骨反面残存钻坑6个,圆坑直径均为1.2厘米。

(四) 其他文化

1. 先周文化

(1) 武功郑家坡遗址③:共发现2件卜骨,均为牛肩胛骨。该遗址早期遗存中发现1件卜骨(H9:10)④,为牛右肩胛骨,基本完整,其骨臼的一半和骨脊两侧部分被切去整平,臼角削三角形缺口。有钻灼,无凿,钻坑主要分布于反面靠近骨臼处,正面亦有四个钻坑,钻坑底皆呈弧形,坑径大小基本一致,坑底及壁均有灼痕,反面有兆纹。该遗址中期发现1件卜骨(H4:8),为牛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骨臼及骨脊较厚处切去,刻成凹槽,有钻灼,无凿。钻坑多为平底,个别弧底,大小基本一致,深浅不一,钻坑底及壁均有灼痕,正面有兆纹。其年代约在太王前后。

①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长安羊元坊商代遗址残灰坑的清理》,《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2期。

② 扶风县博物馆、高西省:《陕西扶风县益家堡商代遗址的调查》,《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5期;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陕西扶风县益家堡遗址1986年度发掘报告》,《考古学研究》(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376页,图二四。

③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武功郑家坡先周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7期。

④ 报告认为该遗址早期遗存的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晚期至二里岗下层,但出土的卜骨(H9:10)具有较晚的特征,比报告说的年代要晚。

(2) 武功南庙遗址^①:该遗址先周中期遗存中发现 1 件卜骨(H:14),为牛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 7.5 厘米,宽 7.5 厘米。骨反面被削去整平,可见残存钻坑 6 个,其中 3 个完整,坑径 1.3—0.9 厘米不等。坑内有灼痕。

(3) 武功文家台遗址^②:该遗址先周晚期遗存中发现 1 件卜骨(文家台:10),已残,残长 13.2 厘米。骨反面残存钻坑 2 个,坑径 1.2 厘米,坑底均有“猫眼状”凿槽,凿旁有灼痕,正面有兆纹。其年代约在文王之际。

(4) 武功岸底遗址^③:发现 1 件卜骨(H29:97),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骨白切去一半,有钻灼,无凿,反面残存钻坑 3 个,钻为圆形,底呈弧形,坑径大小基本一致,坑底有灼痕,正面有兆纹。

(5) 彬县断泾遗址^④:发现 19 件卜骨,多用牛肩胛骨,只有个别的用羊肩胛骨。经过整治,骨白切去一半,将骨脊及两侧较厚部分削去平整,也有的卜骨保留整个骨白。所有卜骨皆只钻不凿,圆坑径约 1—1.14 厘米。标本 H22:3,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扇部,残长 14 厘米,宽 16.6 厘米。骨正反面皆有圆形钻坑,正面有 7 个,反面有 9 个,灼点多在钻坑右侧。标本 G1:23,为牛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 11.8 厘米,骨反面残存圆形钻坑 6 个。标本 T202^⑤:2,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 11.6 厘米,骨白切去一半,骨反面有许多刮削痕迹,上有钻坑 7 个。

(6) 长武碾子坡遗址^⑤:共发现 284 件卜骨,绝大多数是残片,完整的只有 1 件。大部分所用骨料是牛的肩胛骨,马的肩胛骨或兽类的肢骨也有发现,但仅个别见到。卜骨的整治方法异常简单粗糙,未去骨白,削平脊根略加磨平即使用。少数的将骨白以下两侧较厚部分略加切削磨平,留有刀削痕迹,或将两侧较厚部保留,只将中间部分修磨成平槽形状。骨白完全保留天然形态,不去白角,骨脊一面的骨白切平或切去一部分的现象罕见。有圆钻和灼而无凿。圆钻往往施于骨反面,施于正面者罕见。灼的位置与上述相反,大都在骨正面,与圆钻的底部相应的部位。灼在钻坑底面的或者直接灼在骨面上的现象极为罕见。钻坑的底部基本上分为纯圆和平底两种。前者往往由于钻坑浅,所以圆钻的周壁和纯圆底无明显的分界线。平底的钻坑往往钻得比较深,钻的筒形周壁和底部有明显的分界线。钻坑无定数,也看不出有固定的排列。

在众多的卜骨中,发现有文字或符号或其他标记刻划的只有 8 片,多数刻划标记是重复的。标本 H151:85,比较完整,骨扇部稍有缺失,残长 37 厘米。骨反面有圆钻坑 33 个,钻底钝圆。骨面上有笔道很细的九条密排的一字形刻划。标本 H317:8,有 5 行一字形的

①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关中漆水下游先周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 年第 6 期。

②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关中漆水下游先周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 年第 6 期。

③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武功岸底先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3 年第 3 期。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陕西彬县断泾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9 年第 1 期。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陕西长武碾子坡先周文化遗址发掘记略》,《考古学集刊》第 6 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134 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郊·碾子坡》,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7 年,194—197 页,图一三六,彩版六,图版一二〇~一二三。

刻道。标本 H2:18 的图形很像个动物。标本 H813:19 的刻划很像是文字的连书,可惜卜骨残损无法识读。标本 H131:15,有一个“𠂔”(大)字。标本 H302:12,刻 1 个“𠂔”(周)字。

碾子坡先周文化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遗存与殷墟二期文化的年代相当,约为公元前 1200 年前后;晚期遗存,约在周王古公亶父、季历时期,与殷墟三期文化的年代相当,约为公元前 12 世纪后半期^①。

(7) 麟游蔡家河遗址^②:发现 7 件卜骨,均为牛肩胛骨。经过整治,骨白被切去一半,削去骨脊,未去白角。骨反面略加磨平,有钻灼,无凿,钻坑多为圆形,坑径多在 1.5 厘米左右,也有椭圆形,坑径多在 2 厘米左右。坑底多较平,在一侧刻有“猫眼状”凿槽,凿槽旁有灼痕。标本 T3④:5,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一半,残长 14.5 厘米,骨反面残存钻坑 10 个。T3②:8,为牛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一半,残长 10 厘米。标本 T3②:1,为牛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 10 厘米。此外还有标本 T3②:9、T3②:11、T3:①:01、H18:10。出土卜骨的单位均属于该遗址第三期(第四段),其年代约相当于商周之际。

(8) 麟游史家塬遗址^③:发现 2 件卜骨,均为牛肩胛骨,皆残。标本 H3:17,已残,残存胸侧缘一面,残长 15 厘米,骨反面残存钻坑 11 个,圆钻,钻坑大小不一。标本 H3:18,残存一块,残长 7 厘米,骨反面残存钻坑 2 个,钻坑底近平。该遗址与郑家坡早期偏晚阶段、碾子坡早期相同器类的年代特征相近,三者年代应大体同时,大致相当于殷墟文化二期偏早阶段。

(9) 淳化赵家庄遗址^④:采集 1 件卜骨(采:1),应为牛肩胛骨,已残,残存钻坑 3 个,圆形钻,无凿痕。

(10) 周原王家嘴、贺家遗址^⑤:共发现 6 件。标本 H16:24,应为牛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 8.7 厘米,残宽 5.8 厘米。骨反面残留圆钻 5 个,坑径 1.4 厘米。标本 H55:5,应为牛肩胛骨,仅存扇部,残长 15 厘米,残宽 11 厘米。正反两面均有圆钻,个别钻坑凿痕,灼痕明显。标本 H55:4,应为牛左肩胛骨,仅存柄部,残长 9 厘米,残宽 5 厘米。经过修整,切去骨白,骨反面残存圆钻 5 个,平底,有灼烧痕迹。标本 H77:1,应为牛右肩胛骨,仅存柄部,残长 10.5 厘米,残宽 6.5 厘米。骨反面留有圆钻 4 个,坑较深平底,无灼痕。标本 H7:16,应为牛肩胛骨,已残,仅存柄部一半,残长 16.5 厘米,残宽 4.4 厘米。骨反面有圆形钻坑 4 个、长方形凿槽 2 个。标本 H7:1,应为牛右肩胛骨,仅留柄部,残长 16.2 厘米,残宽 6 厘米。经过修整,切去骨白,切去白角,骨反面有长方形或不规则长方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郛州·碾子坡》,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7 年,1、279 页。

②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麟游县蔡家河遗址商代遗存发掘报告》,《华夏考古》2000 年第 1 期。

③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麟游县史家塬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2004 年第 4 期。

④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彬县、淳化等县商时期遗址调查》,《考古》2001 年第 9 期。

⑤ 周原考古队:《2001 年度周原遗址(王家嘴、贺家地点)发掘简报》,《古代文明》第 2 卷,文物出版社,2003 年,432—490 页。

形凿槽^①。

2. 李家崖文化

(1) 清涧李家崖古城址:发现2件卜骨^②,皆残,用动物肩胛骨制成。标本AT13^③:2,残存柄部,将骨白的一半连同骨脊取掉,略加修整,有圆形钻坑。标本西城墙G1^③,残存一块,略加修整,有圆钻、椭圆形凿。该遗址的时代上限约相当于殷墟二期。

(2) 绥德薛家渠遗址^③:发现几件卜骨,多用羊肩胛骨制成。标本H1:47,为羊左肩胛骨,骨脊削去,并锯掉臼角,施长方形凿,有灼无钻,凿的剖面呈V形。标本H1:49,为羊右肩胛骨,骨脊已削去,未施凿、灼。

3. 朱开沟文化

仅在伊克昭盟朱开沟遗址第五段遗存发现卜骨(参看本文夏代朱开沟文化)^④,均经过整治,有灼有钻。钻坑圆而深,底平,周壁规整,兆纹清晰。

4. 夏家店下层文化

(1) 赤峰大甸子遗址^⑤:发现4件卜骨,皆不完整,以肩胛骨为料。边缘与骨突皆有修治痕迹,钻坑皆在有骨脊一面,钻坑皆平底,是用不同宽度的钻具旋转钻成,经查并非每个钻穴都灼有卜兆。标本T5A:2,应为牛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一段。骨反面残留钻痕19个,钻穴密集,甚至互有打破,钻坑皆平底,直径0.4—0.6厘米。

(2) 宁城南山根遗址^⑥:发现7件卜骨,有两种。一种只有1件(H17:9),用动物的肩胛骨,已残,钻成圆坑,而后灼于坑中,骨反面残留钻灼迹41个,非常密集。另一种有6件,用长条形骨片,于一面先钻而后灼。其中标本T1^②:41,已残,骨一面残留钻灼迹6个。

(3) 喀喇沁旗大山前遗址^⑦:该遗址第1地点发现一些卜骨,均有钻,有的还有灼痕。

① 报告将该遗址商时期遗存分为两期5段。所出土卜骨的灰坑中,H16属于第二段(相当于殷墟第二期),H55、77属于第4段,H7属于第5段(下限不晚于商周之际)。H7出土的两件卜骨特点较特别。切去臼角的特征应是殷墟卜骨的影响,长方形凿槽较为特殊。据此能推测先周最晚阶段已经有殷墟占卜特征的甲骨,但其影响并不那么深。

② 张映文、吕智荣:《陕西清涧县李家崖古城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1期。

③ 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考古实习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商周研究室:《陕西绥德薛家渠遗址的试掘》,《文物》1988年第6期。

④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朱开沟遗址》,《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黄蕴平:《内蒙古朱开沟遗址兽骨的鉴定和研究》,《考古学报》1996年第4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博物馆:《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2000年,123、124、281、418、419页,图版三六、九〇。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8年,33页,图版三。

⑥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内蒙古喀喇沁旗大山前遗址1996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9期。

标本 96KDIH145②:1,系将动物肩胛骨打磨制成,已残,残长 11 厘米,宽 6.4 厘米。骨反面留有钻坑约 37 个,钻坑坑径 0.3—1.3 厘米不等。钻多为圆锥状凹坑,另一面可看出几道极细的兆纹。

(4) 锦州山河营子遗址①:该遗址下层发现 4 件卜骨,骨料为动物的胫骨或肩胛骨。报告分为单钻和刮单钻②,各有 2 件。单钻的长 9 厘米,最窄为 1.5 厘米,在胫骨的骨腔内部进行钻坑,坑壁直竖,坑底较平,坑径 0.8 厘米,深度为 0.2—0.3 厘米,坑的平面近椭圆形。坑上存有灼痕,卜骨的另一面有兆纹。出土于 1C:3 或 3A:3 地层中。刮平单钻 2 件,1 件系利用肩胛骨制成,正反面全部刮平,然后进行单钻。另 1 件,系利用动物的胫骨制作,将胫骨的骨腔进行刮削,使之成为平面,然后开钻。最大的长 7.5 厘米,宽 4.5 厘米,坑径 0.9 厘米。小的长 2.5 厘米,宽 2.2 厘米,最厚 0.5 厘米,最薄 0.03 厘米,出土于 5B:4 及 5B:3 地层中。

(5) 蔚县庄窠遗址③:该遗址第三、四阶段发现一些卜骨。第三阶段卜骨除用动物肩胛骨外,还用动物肢骨制成的骨片,都有钻、灼。第四阶段卜骨均整治,有钻、灼。钻坑圆而深,窝底平,排列整齐。兆痕清晰。第三阶段年代相当早商时期较早阶段,第四阶段年代应与郑州二里岗上层文化的年代相当。

(6) 昌平张营遗址④:该遗址发现 3 件卜骨,其中 1 件为鹿肩胛骨,其余种属不明。标本 F1:9,为鹿肩胛骨,仅留扇部一块,残长 9.7 厘米,残宽 9.4 厘米,反面有灼坑。标本 F6:20,已残,仅余一小片,残长 4.9 厘米,残宽 2.9 厘米,表面有 2 个半圆形钻坑。标本 H13:24,用肩胛骨残块,残长 9.2 厘米,残宽 3.3 厘米,厚 0.5 厘米,左凹槽内灼坑。该遗址夏商文化遗存,可分为 3 个阶段。H13 属于第二组(相当于夏末商初之际)⑤,F1 和 F6 属于第三组(相当于中商一期文化)。

5. 周梁玉桥类型

沙市周梁玉桥遗址⑥:发现 11 件甲骨,卜骨 1 件,卜甲 10 件。卜骨仅发现 1 残块(T2③:52),为牛肩胛骨,残长 10.3 厘米,残宽 5.2 厘米,厚 0.6 厘米。骨脊经削平,骨的正反两面均已刮削磨光。反面残存椭圆形钻痕 3 个,钻坑横径 1.2 厘米,纵径 1 厘米,深 0.2 厘米。旁施枣核形凿,以控制兆体与兆枝的方向。凿长大于钻宽,形状为尖头,小弧肩,长 1.5 厘米,宽 0.3 厘米,深 0.35 厘米。灼痕宽大清楚。

① 刘谦:《锦州山河营子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6 年第 10 期。

② 因报告无图,本文无法详细说明,故采用报告的描述。

③ 张家口考古队:《蔚县夏商时期考古的主要收获》,《考古与文物》1984 年第 1 期。

④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昌平区文化委员会:《昌平张营——燕山南麓地区早期青铜器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 年,101 页,图 95,彩版 15。

⑤ 标本 H13:24,有圆形钻坑,坑内施灼。就其特征来看,可上溯到郑州二里岗上层,晚于报告所说的年代。

⑥ 沙市市博物馆:《湖北沙市周梁玉桥遗址试掘简报》,《文物材料丛刊》(10),文物出版社,1987 年;彭锦华:《沙市周梁玉桥甲骨的初步研究》,《考古》1986 年第 4 期。

6. 路家河文化

(1) 秭归何家大沟遗址^①:发现3件卜骨。标本H37:5,为猪右肩胛骨^②,已残,骨中间和前角缺失,长26厘米。未经修整,无钻凿,只灼。骨反面留有圆形灼痕9个。

(2) 清江香炉石遗址^③:从报告提供的材料上看,第6层只有3件卜甲,均为椭圆形钻,在钻内有凿槽;第5层有13件甲骨,其中卜甲12件,卜骨(鱼的鳃盖骨)1件,钻坑大多为椭圆形,圆形和长方形的各有2件,凿槽较深;第4层有17件,采集7件,其中卜甲5件,卜骨(鱼的鳃盖骨)19件,除2件为椭圆形钻坑外,余皆为长方形钻坑,均有凿槽。从甲骨的钻凿形态来看,椭圆形和圆形钻坑,有些同版卜骨上共存,有较早的特征,即圆钻内有凿槽,和洹北商城A型卜甲类似,均为洹北商城和殷墟卜骨之间的过渡形态;长方形钻坑则有较晚的特征,和西周中期卜甲相似。本文将报告说的圆钻和椭圆形钻归为中、晚商时期;长方形钻则归为西周时期^④。

中、晚商时期,该遗址共发现16件甲骨,其中卜骨1件,卜甲15件。卜骨在该遗址第5层仅有1件(T9^⑤:154),为鱼的左鳃盖骨,已残,残长7.5厘米。均有钻凿灼,钻坑为椭圆形,凿槽较深,灼痕明显。

此外,王善才的《香炉石》一书中有1件卜骨^⑥,为牛右肩胛骨,基本完整,长42厘米。经过修整,反面切去骨脊,削平磨光。反面留有100多个钻坑,坑径较小,排列无规律。其特征与郑州二里岗上层的卜骨大致相同。

7. 寺洼文化

卓尼花儿遗址^⑦:发现8件卜骨,为牛、羊肩胛骨。其中牛肩胛骨1件;羊肩胛骨7件,其中3片残甚,余4片大多完整,骨面无修治痕迹,骨脊均保持原貌,一般骨正面施灼,有的骨脊、反面也施灼。灼痕少者1个,多者达85个。标本H1:63,为牛肩胛骨,已残,残长11.3厘米,反面骨脊被磨平,施灼1处。标本H1:64,为羊左肩胛骨,比较完整,骨中间和前后角稍有缺失,残长16.2厘米。正面施灼呈左右排列,左侧50处,右侧26处;反面施灼9处;骨脊一侧施灼1处,另一侧施灼4处。正面左部灼呈小圆形,右部及反面灼呈长圆形。该遗址属于寺洼文化早期。标本H1:65,为羊左肩胛骨,基本完整,骨臼下有砍痕一条,长15.6厘米。施灼左右排列,左侧12处,右侧16处,反面也有23处。正面灼呈圆

①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秭归何家大沟遗址的发掘》,《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三卷),科学出版社,2006年,124页,图二一。

② 个体较大,可能属于鹿类的肩胛骨。

③ 湖北省清江隔河岩考古队:《湖北清江香炉石遗址的报告》,《文物》1995年第9期。

④ 其年代报告认为第7层可早到夏代;第6层相当于早商时期;第5层相当于商代中晚期;第4层为商末至西周时期;第3层大体为东周时期。王风竹认为第4层应属东周时期,第5、6层则年代分别相当于郑州二里岗上层和殷墟一期前后(王风竹:《三峡地区“朝天朝天嘴B区类型”遗存分析》,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0年4月)。

⑤ 王善才:《香炉石——我国早期巴文化遗址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彩版一八。

⑥ 甘南藏族自治州博物馆:《甘肃卓尼花儿遗址》,《考古》1994年第1期。

形,反面灼呈不规则长圆形。

四、周 代

(一) 周 文 化

1. 西周早期

(1) 岐山凤雏遗址^①:该建筑遗址西厢房内 H11 及 H31 共发现 17 413 件甲骨。H11 发现 1.7 万余片甲骨,其中卜骨 300 多片,卜甲 16 700 多片。H31 发现 413 片甲骨。两坑带字甲骨共 293 片,H11 出土 283 片,H31 出土 10 片。其年代约为先周晚期至西周中期,刻字甲骨大多数属于西周早期,少数属于西周中期。根据徐锡台对这部分甲骨材料的整理,可知卜骨均为牛肩胛骨,多数钻凿灼兼施,钻坑并不圆整,有的钻坑部分被凿槽侵去。钻坑不凿者,坑底皆弧形。钻径 0.7—0.8 厘米者为深弧形。钻径 1.1—1.2 厘米者为浅弧形。个别的为平底^②。圆形圜底钻为先周晚期常见,平底钻为西周早、中期的典型特征,故该遗址卜骨大部分应属先周晚期,少数可能为西周早、中期^③。与卜骨年代不同的是,该遗址所出土的卜甲,绝大多数属西周中期,带字的多为西周早期,先周晚期少见。由此可知,该遗址先周晚期时占卜以卜骨为主,到西周早期时卜甲取代卜骨,占据主导地位。

(2) 岐山贺家墓地^④:发现 9 件卜骨,皆残。经过整治,反面有钻凿及灼痕,圆形钻坑内一侧有“猫眼状”凿槽。标本 76QHM106,为牛肩胛骨,只留柄部一块,反面残留钻凿 4 个,其中 3 个完整,坑径 1.7 厘米。还有 78QHMT^⑤:10、76QHzM6:1、78QHM49:1、76QHM105:3、76QHM106:2。

(3) 岐山周公庙遗址^⑥:共发现 500 多件甲骨。2003 年底,发现 5 件(两片有字)卜甲,年代为先周末期(武王时期)。2004 年发现 500 多片(缀合以前数量为 760 余片,99 片有字),绝大多数为卜甲,也有少数卜骨,均为牛肩胛骨。标本 T9^⑦:4,为牛肩胛骨,已残,留有柄部,残长 20 厘米,残宽 7.4 厘米。经过修整,将骨脊一面连同骨臼部分削平,骨臼被切去一半,柄部稍挖成凹形。骨反面留有两列 12 个圆钻,平底,坑内靠近边缘均有“猫

① 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发掘简报》与《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 年第 10 期;陕西周原考古队、周原岐山文管所:《岐山凤雏村两次发现周初甲骨文》,《考古与文物》1982 年第 3 期;曹玮:《周原甲骨文》,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 年,1—11 页。

② 徐锡台:《周原出土甲骨的字型与孔型》,《考古与文物》1980 年第 2 期。

③ 目前公布的卜骨材料中分不出属于西周中期的卜骨。有可能与先周时期卜骨数量最多,到西周早期其数量下降,比例不高有关。据该遗址有西周中期的卜甲,可推测应该有少数的卜骨属于西周中期,可能报告编者未注意。

④ 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贺家村西周墓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8),文物出版社,1983 年 12 月。

⑤ 周原考古队:《2003 年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调查报告》,《古代文明》(第 5 卷),文物出版社,2006 年,151—186 页;徐天进:《周公庙遗址考古调查的缘起及其学术意义》,《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二十一期,2004 年 6 月;边江、冯国:《周公庙遗址出土甲骨发现文字近 500 字》,新华网,2005 年 02 月 16 日 09:06。这一批材料尚未正式公布,笔者曾在陕西周公庙亲自参与整理。

眼状”凿槽,左右对贞。

(4) 扶风齐家遗址^①:发现1件卜骨(H124:8),为牛肩胛骨,已残,残长13.4厘米。经过修整,残存圆钻5个,钻坑底近平,底外侧一边凿出细槽。

(5) 长安张家坡遗址^②:共发现42件甲骨,其中卜骨32件,卜甲10件。卜骨均为牛肩胛骨制成,整治方式是将骨臼的一半连同骨脊及两侧较厚的部分切去,再加以磨平。也有将两侧较厚的部分保留,只将中间的部分修磨成平槽的。臼角部分往往只削除一角,也有不加切除的。钻凿的方法有下列几种:有的兼施钻凿灼,圆形钻坑,坑为平底,坑内靠近外侧有“猫眼状”凿槽。有的为圆钻方凿,靠近外侧施方凿,内侧均有圆形钻,坑为尖底。个别骨面较薄的,则未施钻凿,直接灼于骨面上。钻凿皆为左右对称。标本T109^④:6,为牛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将骨臼的一半连同骨脊及两侧较厚的部分切去,切去臼角。骨反面留有钻凿6个,钻坑为圆形,平底,在钻坑的底部,靠近外侧有“猫眼状”凿槽,左右对称。标本H422:17,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一块,切去骨臼一半,臼角也削除一角。残存钻凿5个,为圆钻方凿,靠近外侧施方凿,内侧均有圆形钻,坑为尖底,左右对称。标本T313^②:3,可能用兽类的肢骨做成,制作较粗。骨反面残存圆形钻坑2个,正面相当于钻坑的部位,刻有“一一六一——”,即《周易》的“小畜”卦。标本T4^⑤,为牛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一块,残长13厘米,宽6.5厘米。骨反面靠一边有圆形钻坑3个,其中1个已残,坑径约1.5厘米,深约0.9厘米,坑壁垂直,平底。靠一边有“猫眼状”凿槽,与骨长同方向,极细,不及0.1厘米宽。灼痕不显,正面均有卜兆。在卜兆附近有刻划极细的文字两行:“五——六八一”、“六八一——六一”,即《周易》的“无妄”和“同人”。标本97H11:1,为牛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10厘米,宽6.6厘米。经过修整,骨反面残留钻坑9个,圆形钻底刻有“猫眼状”凿槽。

张家坡遗址的文化层比较单纯而厚,主要包含着西周早晚两个时期的堆积,大致年代范围为文王时期至西周末年^③。两个时期的遗物有明显的区别。报告对出土的甲骨没有分期,提供的图版也极少,无法详细说明。上述的标本,均为西周早期之物。

(6) 武功赵家来遗址^④:发现1件卜骨(T107^③:1),应为牛肩胛骨,已残,残长7.3厘米,残宽3.9厘米。骨面上残存圆形钻坑4个,钻径1.5厘米。坑内一侧有“猫眼状”凿槽。

① 周原考古队:《1999年度周原遗址I A1区及IV A1区发掘简报》,《古代文明》(第2卷),2003年,496页,图十三。

②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张家坡西周遗址的重要发现》,《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3期;《陕西长安沔西张家坡西周遗址的发掘》,《考古》1964年第9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沔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111页,图七〇,图版陆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工作队:《1997年沔西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0年第2期。

③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沔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9—14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武功发掘报告——沔西庄与赵家来遗址》,文物出版社,1988年,147页,图版七二。

(7) 邠县下孟遗址^①:该遗址周代遗存中共发现 10 件卜骨,皆残。第二层发现 1 件,为牛肩胛骨制成,削平面有钻灼。第三层发现 9 件,均为牛肩胛骨,卜法大致相同,有圆钻和灼痕。

(8) 洛阳北窑遗址^②:发现 35 件甲骨,其中卜骨 11 件,卜甲 24 件。卜骨均为牛肩胛骨,皆经过修整。标本 T33H11:1,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 21 厘米,残宽 6.6 厘米。骨臼切去一半,臼角稍有切除,骨脊及胸侧缘较厚的部分被削去,正反面修磨光滑。反面残留钻坑 16 个,钻坑为圆形,坑径 1.3 厘米,坑壁垂直,平底,当是用金属钻子钻成。钻坑因骨面的厚薄不等而深浅不一,深的 0.6 厘米,浅的 0.1 厘米,使坑底壁的厚度都不超过 2 毫米。深坑上口略椭圆。“猫眼状”凿槽在坑底靠外一侧,控制兆枝朝向中间方向。槽两端顶坑壁,宽 2.2—1.2 毫米,横截呈“V”形的槽底几乎划透正面,灼痕位于坑底中心,呈焦黄色,圆形或椭圆形,径 0.6—0.7 厘米,个别灼痕透过正面。标本 T3H90:2,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 22.8 厘米,残宽 9 厘米。整治方式与钻凿形态同 T33H11:1,但比较粗糙,骨面上有明显的刀削痕,臼角的切除也失之简略,且不干净。残留钻坑 22 个,坑内的凿槽多靠外侧,灼痕位于坑底中心,正面的卜兆左右对称。标本 T32H5:1,为牛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臼角被切去,反面残留钻坑 4 个,钻坑较大,坑径约 1.5 厘米。甲骨多数是属于第一期(约当西周初至成、康王时期),属于第二期(约当昭、穆王时期)的数量很少。

(9) 洪洞坊堆村遗址^③:发现 2 件卜骨。其中 1 件卜骨,骨臼削去约三分之一,靠近白处有钻坑 16 个,不规则地排成三至四行;在中下部靠左又有钻坑五个,纵列一行。在坑底正中或稍偏,有“猫眼状”凿槽,凿槽旁有灼痕,但不明显。卜骨正面相当钻坑处有许多小兆,共有八个字。李学勤据伴出的铜器、陶器等遗物判断,明确指出应为西周初期之物^④。

(10) 天马一曲村遗址^⑤:发现 4 件卜骨。标本Ⅲ T335(4B):26,为牛肩胛骨,残存一角。表面甚光,骨反面存钻坑 2 个,圆钻平底。底部偏骨边一侧凿一窄槽,此槽分坑底为大小两部分,灼痕位于槽侧较大部分。骨正面有卜兆。钻坑直径 1.3 厘米。标本 J7T32(6C):84,牛右肩胛骨,黄褐色,下端与左边残失。骨角削去,骨臼存留一半,骨脊削平修光,有钻凿灼,现存钻坑 8 个。依凿槽走向似为纵向 3 排。圆钻,大小相同,直径 1.2 厘米,坑底较平,底与卜骨正面厚度为 1—1.5 毫米。坑底都凿有纤细的纵向凹槽,断面呈“V”形,槽口宽 1.5—2 毫米。槽底几乎与正面凿穿,薄的仅有半毫米。所凿凹槽分布规律,都偏离坑底正中,即将坑底分为大小两部分,其中左边两排坑的凹槽偏向左侧,右边一

① 陕西省考古所泾水队:《陕西邠县下孟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0 年第 1 期。

②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1975—1979 年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的发掘》,《考古》1983 年第 5 期;赵振华:《洛阳两周卜用甲骨的初步考察》,《考古》1985 年第 4 期。

③ 畅文斋、顾铁符:《山西洪赵县坊堆村出土的卜骨》,《文物参考资料》1956 年第 7 期。

④ 李学勤:《谈安阳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文物参考资料》,1956 年第 11 期。

⑤ 邹衡主编:《天马一曲村(1980—1989)》,科学出版社,2000 年,95、131、138、209 页,图六九、一一六、二七六,图版叁玖。

排的偏向右侧。灼痕位于坑底凹槽旁面积较大的一侧,呈圆形。相应的对面有兆纹,部分坑口被烧焦,故多数坑口都程度不同地呈黑色。标本 J7T42(6A):11,牛左肩胛骨。浅黄色。下端与右边残失,残长 10.4 厘米。骨脊削平修光,骨臼亦切去一半。存有钻坑 6 个,似为纵向 3 排,钻坑交错分布,大小相当,直径 1.3 厘米。坑底较平,与卜骨正面厚度为 1.5 毫米。坑底凿有纤细的凹槽,其形状、位置与标本 J7T32(6C):84 卜骨相类。左边一排的凹槽偏左,中间和右边两排的凹槽偏右。灼痕位于坑底凹槽旁面积较大的一侧,呈圆形。卜骨正面相对位置处有卜兆。标本 J7T125:8,黄色,残存一小块,为牛肩胛骨。骨反面修光,刮削痕明显。钻凿灼皆施,残存钻坑 4 个,直径 1.4 厘米,底较平。底距对面(骨正面)厚 0.15 厘米左右。坑底偏离正中(偏左)凿一条纤细的纵向凹槽,将坑底分为宽窄两部分,断面呈“V”形,槽口宽 0.2 厘米,槽底距对面约 0.05 厘米,几乎凿穿。灼痕位于凹槽旁较宽部分。卜骨残长 7.4 厘米。

(11) 房山琉璃河遗址^①:发现数十件甲骨,其中有多件卜骨。标本 G11H33:1,为牛肩胛骨,仅存柄部,残长 7.2 厘米,宽 7 厘米。骨臼和白角被切去,骨反面留有钻坑 6 个,钻坑甚圆,坑底较平,偏向一侧刻有细槽,直径 1.4 厘米^②。

(12) 邢台南小汪遗址^③:发现 1 件刻辞卜骨(H75),系牛肩胛骨制成,仅存柄部一块,残长 8.7 厘米,残宽 3.1 厘米。修磨光滑平整,反面残留圆钻 10 个,钻坑底部三分之一处有“猫眼状”凿槽,凿旁有灼痕。正面有两组刻辞,一组完整有十个字,另一组已残缺,仅存 1 个“其”字。

(13) 滕州前掌大遗址^④:发现 4 件卜骨。标本 T306^⑤:4,为牛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 16.2 厘米。把根部劈开并稍加磨制,切去白角。骨反面先凿后灼,仅存 5 个凿槽,应为左右对称。

2. 西周中晚期

(1) 扶风齐家遗址^⑤:共发现 75 件甲骨,卜骨 59 片,卜甲 16 片。1979—1980 年,发现西周甲骨 62 片。其中卜骨 46 片(有刻辞的 6 片),卜甲 16 片(有刻辞的 1 片)。2002—2003 年,H90 出土西周卜骨 13 片。卜骨均为牛肩胛骨,经过削磨整形修治,白角多不切除,骨臼削去近半或不切削。卜骨上的钻呈圆形,直壁平底,坑底均有“猫眼状”凿槽。钻坑内的凿槽均不在坑底正中,而是靠近卜骨边缘一侧,灼痕则在内侧,使正面的兆枝相向。

①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北京市文物研究所:《1995 年琉璃河周代居址发掘简报》,《文物》1996 年第 6 期。

② 标本 G11H33:1,报告提供的线图和图版之间有错误。线图(图二〇~2)切去白角,骨背面残存钻坑 6 个;图版,未去白角,骨背面残存钻坑 4 个,本文据线图描述。

③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邢台市文物管理处:《邢台南小汪周代遗址西周遗存的发掘》,《文物春秋》1992 年增刊;王宇信:《邢台南小汪西周甲骨出土的意义》,《史学月刊》1999 年第 1 期。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上、下册),文物出版社,2005 年,45 页,图三五,图版一二。

⑤ 陕西西周原考古队:《扶风县齐家村西周甲骨发掘简报》,《文物》1981 年第 9 期;罗西章、王均显:《周原扶风地区出土西周甲骨的初步认识》,《文物》1987 年第 2 期;曹玮:《周原新出西周甲骨文研究》,《考古与文物》2003 年第 4 期。

其中标本 NH1③:1,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21厘米,残宽9厘米。反面经过削磨整形修治,骨白切去一半,距白沿1.5厘米处向扇部方向掏挖呈凹形,使骨的柄部和扇部的厚度相当,骨脊削平,有锉磨的痕迹。反面残留圆钻14个,钻坑的坑壁较直,平底,钻径1.4厘米,坑底一侧有“猫眼状”凿槽,凿槽旁有灼痕,均在内侧,左右对称。正面临近骨白处竖刻卜辞两列8个字。标本采集:94,为牛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11厘米,残宽7厘米。反面骨脊全被削平,残存圆钻6个,直壁平底,坑底有小刻槽,正面有卜辞几处,均守兆。标本 02ZQ II A3H90:79(有字)为牛的肩胛骨,已残。卜骨反面经过刮削加工,然后施钻,钻坑直径约1.5厘米,坑深浅不同,约在0.44—0.64厘米之间,卜骨残存有4个钻坑,钻底部较平,每钻底部有与骨白垂直的凿痕一道,不见灼痕。在与三钻相对的正面,有37字刻辞自右向左分为6行。H90的年代下限不会晚于西周中期晚段。

(2) 岐山贺家墓地①:采集1件卜骨,为牛左肩胛骨,反面有钻坑三排(三联钻),21个,坑较小,钻径0.6厘米。该卜骨应属于西周中期。

(3) 洛阳郑铁一段宿舍楼工地②:发现13件卜骨,均为牛肩胛骨,经过整治,有钻凿灼。标本 H1:1,为牛右肩胛骨,基本完整,长32.5厘米,宽17.2厘米。骨白切去一半,白角切除,骨脊及较厚的一条骨边削薄一半。骨反面有钻凿30个,主要分布在骨的左右边缘。钻坑深圆,底平,坑壁垂直,深坑上口略呈椭圆。坑径1.3厘米,坑最深0.7厘米(柄部),最浅0.2厘米(扇部),坑底壁厚0.1厘米。“猫眼状”凿槽于坑底靠外的一侧,两端顶坑壁,宽0.2厘米左右,深约0.1厘米,横截面呈“V”形,灼痕正圆,位于坑底中央,黄褐色,径0.3—0.6厘米,兆枝向内。标本 H1:5,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13.3厘米,宽6.2厘米。白角切口约呈直角。骨边缘残留钻凿7个,左2右5纵列,坑径1.2厘米,较深的坑上口径稍大,为1.5厘米,纵槽宽0.2厘米左右。灼痕黑色,径0.5厘米左右,兆枝向内。标本 H1:10,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18.6厘米,残宽8.3厘米。修削平整,白角切口呈直角。残留钻凿11个,坑径1.3厘米左右,钻坑深的,上口呈椭圆形,坑最深0.8厘米,最浅0.2厘米,凿槽一般宽0.2厘米,个别窄的宽0.1厘米。坑底中央的灼痕圆形,浅褐色,径0.4—0.6厘米。在中间纵列钻坑下边3厘米处,有3个大小相同、左右并列的半球形凹穴,径0.4厘米,深0.2厘米,间距0.2厘米。其上有一长0.3厘米、宽0.6厘米的长条形炭黑色灼痕,将3个凹穴的周围灼黑。在凹穴的正面,有1个“十”字形的兆坑,兆坑纵横交叉处对应的是中间凹穴。在右边纵列钻坑下边2厘米处,亦有3个左右并列的半球形凹穴,间距稍大。标本 H1:11,为牛左肩胛骨,残存胸侧缘一块,残长14.9厘米,残宽8.3厘米。修治较粗糙,刮削痕迹明显。骨边缘残留钻凿5个,径1.3厘米,深0.5—0.8厘米,坑底壁厚0.1厘米。骨中部有6个半球形凹穴,分上下二横列,一列3个,对应整齐,二列间距约2厘米。上列凹穴径0.3厘米,深0.1—0.15厘

① 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贺家村西周墓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8),文物出版社,1983年12月。

②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1975—1979年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的发掘》,《考古》1983年第5期;赵振华:《1984年洛阳出土卜骨的特征与时代》,《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4期。

米。坑中心距 0.75 厘米。个别凹穴上有炭黑色的灼痕。其年代应属于西周中期,即相当于穆王或稍晚于穆王时期。

(4) 房山镇江营遗址^①:发现 1 件卜骨(FZT0226⑥:1),为牛肩胛骨。整体打磨光滑,在反面近骨臼处可看到两个圆钻,钻内一侧有 1 个“猫眼状”凿槽。卜骨正面有纵向两行米粒大小的数字,刻痕细而浅。右列“六六六六七七”,为临卦;左列“七六八六五八”,为蒙卦。

(5) 昌平白浮木椁墓^②:在 2、3 号墓中发现 100 多件甲骨,皆残。其中 M2 发现数十片卜甲;M3 在槨室右侧中部发现约百片卜甲,在椁室左侧中部发现大量卜骨。卜骨经初步鉴定有牛、羊的肩胛骨。反面有钻凿及灼痕,卜骨上尚未发现刻字。关于这三座墓的年代,专家认为它们属于同一时代,应定在西周中期^③。

(6) 济南王府遗址^④:发现 4 件卜骨,用牛、羊的肩胛骨制成^⑤。经过切割修整,形状规矩。一般骨反面施钻灼,仅一例两面均有。钻坑多为三联圆坑,个别为二联圆坑。有 2 件卜骨发现有钻透的单孔,处于中部或边缘。标本 H172:18,为牛左肩胛骨,仅存后角一段,残长 9.3 厘米,残宽 7 厘米。正反面均有钻坑,多三联坑,坑径 0.4—0.5 厘米。均有灼痕,兆纹较清晰。标本 H118:2,牛肩胛骨,已残,残长 9.2 厘米,残宽 4.8 厘米。骨反面仅有 1 个长方形浅钻坑,钻长 1.1 厘米,宽 0.5 厘米,深 0.1 厘米。标本 H152:15,为羊右肩胛骨,基本完整,长 15 厘米,宽 9.6 厘米。骨反面保留修整后的切割痕,前、后角分别被削成缺口。骨反面有钻坑,三联钻者 17 组,另有 2 个透钻单孔。其中 2 组三联坑有明显灼痕。标本 H130:17,为羊左肩胛骨,仅存前角一段,残长 7.8 厘米,残宽 6 厘米。骨反面残留 10 排钻坑,除窄端边缘有 1 个单孔外,均为三联坑,钻径 0.3—0.4 厘米。坑位排列紧密、整齐,未见灼痕。其年代当为西周中晚期。

(7) 章丘城子崖遗址^⑥:前后发掘两次共得卜骨 16 片,其中上层的 3、5(图版 9、5)、6 均经刮治,皆为三联钻,施灼。

(8) 泗水尹家城遗址^⑦:发现 2 件卜骨,均为牛肩胛骨,皆为三联钻。标本 T192⑥:17,牛肩胛骨,已残,只有颈部一段,残长 8.1 厘米。加工较精细,整治方法有锯(锯掉关节窝面部分)、刮削和磨制,骨反面施以钻、灼。钻坑布局规整,成组成行排列,现存 7 排、11 组、30 个钻坑,除 1 组只存 1 个坑情况不详和 1 组为“二联钻”之外,其余 9 组全为“三联

①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镇江营与塔照》,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年,388 页;《北京文博》1997 年第 4 期(只见图)。

② 北京市文管处:《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考古》1976 年第 4 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燕山出版社,1990 年,49 页。

③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燕山出版社,1990 年,49 页。

④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高速公路考古报集》(1997),科学出版社,2000 年,182、183 页,图五二,图版三五。

⑤ 报告认为四件卜骨皆为牛肩胛骨,但经笔者仔细观察图,认为两件为牛肩胛骨,另外两件是羊肩胛骨。

⑥ 李济总编:《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 年,85—89 页,图版伍拾叁。

⑦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研室:《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 年,252、278 页,图版九九、一〇七。

钻”。标本 H171:5, 为牛肩胛骨, 已残, 残长 12.2 厘米, 残宽 7.2 厘米, 厚 0.2—0.5 厘米。边缘平齐, 厚薄均匀。反面有灼有钻, 无凿。钻坑较细, 直径 4 厘米, 现存 7 排 13 组钻坑, 除去靠近残破边缘的 3 组不详之外, 其余 10 组均为“三联钻”。另外, 在右下角和左上侧各穿 1 个圆孔。

(9) 徐州高皇庙遗址^①: 该遗址中层遗存中发现 8 件甲骨, 应皆为卜骨^②。卜骨均为牛肩胛骨, 经过修整, 有的削去骨白成半月形。钻均是 3 个一组横行组成的小圆坑, 即“三联钻”。报告以为其时代为殷商时期, 此类“三联钻”应属于西周中期。

(10) 新沂三里墩遗址^③: 该遗址上层遗存中发现 1 件卜骨, 钻灼及修整的痕迹非常清楚^④。

(11) 固始平寨古城遗址^⑤: 发现 4 件卜骨, 该遗址的商文化遗存 2 件^⑥, 西周时期遗存 2 件。标本 T1⑭:38, 利用动物头盖骨为骨料, 施以长方形凿。凿长约 1 厘米, 宽 0.7 厘米, 深 0.2 厘米。标本 T1⑭:37, 利用鹿角根部施长方形凿。凿残长 1.7 厘米, 宽 1.0 厘米, 深 0.1 厘米。标本 H15:2, 为羊右肩胛骨, 下部已残, 有灼痕。H11:1, 系在动物头骨上施以方形凿而成, 已残, 留有方凿 2 个。

(12) 浙川下王岗遗址^⑦: 发现 6 件甲骨, 皆残。其中卜骨 1 件, 卜甲 5 件。卜骨 (T20①:15), 为猪的肩胛骨, 残存柄部一块, 骨面有半个圆形钻坑。

3. 东周

登封王城岗遗址^⑧: 发现 1 件卜骨 (W5T0644⑤:7), 为羊或鹿肩胛骨, 黄褐色, 已残, 只留柄部, 残长 14 厘米。有钻灼痕数个。从卜骨的特征, 尤其是先钻出圆坑, 再灼制的特点来看, 可能属于商代。

(二) 其他文化

1. 魏营子文化

仅在义县向阳岭遗址第三期遗存中发现 2 件卜骨, 均为牛肩胛骨^⑨。标本 H43:2, 应

①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徐州高皇庙遗址清理报告》,《考古学报》1958 年第 4 期。

② 报告提供的图版中有 2 件卜骨和 2 件卜甲, 经笔者仔细观察图版捌 1、2、3 均为卜骨, 3 也看不出龟甲的形状, 因此推测该遗址所出的甲骨均为卜骨。

③ 南京博物院:《江苏新沂县三里墩古文化遗址第二次发掘简介》,《考古》1960 年第 7 期。

④ 因报告线图不清晰, 文字描述也过于简单, 本文无法详细说明。

⑤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信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固始平寨古城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0 年第 3 期。

⑥ 目前所知, 这类特征的卜骨, 西周以前不见, 应该属于西周时期, 与该遗址的西周时期卜骨同一个类型。

⑦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浙川下王岗》, 文物出版社, 1989 年, 331 页。

⑧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 大象出版社, 2007 年, 412 页, 图四三四, 图版一四三。

⑨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义县向阳岭青铜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十三集,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0 年, 66 页, 图 24; 乌恩岳斯图:《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研究——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 科学出版社, 2007 年, 101 页, 图四六。

为牛左肩胛骨,已残,残存前角一块,残长15厘米,残宽8厘米。骨脊被削平,只有钻灼,无凿,正面有兆纹。标本H150:1,已残,残长8.7厘米,残宽1.6厘米。经过修整,只有钻,无灼无凿,圆钻坑较密集。其年代属于西周早期。

2. 夏家店上层文化

(1) 赤峰夏家店遗址^①:发现5件卜骨,系用动物肩胛骨制成,未经修治,一面有灼痕。其中标本H5:8,为猪右肩胛骨,已残,未经修整,骨脊未加工,有灼无钻^②。

(2) 林西大井古铜矿遗址^③:发现1件卜骨,为羊右肩胛骨,基本完整,骨中间残缺,长15.5厘米,下端宽8厘米。骨面上留有钻坑2个,根据钻坑痕迹残缺地方尚存有钻坑7个。

(3) 宁城南山根石椁墓^④:发现1件卜骨(M101:104),应为牛肩胛骨,已残,残长6厘米,有钻无灼^⑤,残留钻迹46个。这座石椁墓的年代应为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

3. 十二台营子文化

仅在凌源安杖子古城址发现2件卜骨^⑥。标本F9:3,为猪左肩胛骨,比较完整,扇部稍有缺失,残长15厘米。经过修整,骨臼切去一半,骨脊被削去,骨反面有清晰的圆钻13个。

4. 毛家咀类型

(1) 圪春毛家咀遗址^⑦:发现几件甲骨,有卜骨和卜甲。它们比较集中地出在Ⅱ9/3及其附近的几个探方中。卜骨和卜甲上都有钻凿灼,凿为枣核形,钻为不规则的半圆形。报告认为该遗址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时期,但报告提供的卜骨(牛肩胛骨)特征与晚商卜骨相似,与商人有密切关系。

(2) 汉阳东城垓纱帽山遗址^⑧:发现数件卜用甲骨,多数为卜甲,少数为卜骨。报告没有详细描述。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内蒙古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61年第2期。

② 该遗址出土的5件卜骨,均未经修整,只骨一面施灼,此类特征在较早的卜骨中常见。商周时期夏家店下层的卜骨均有钻坑。报告公布的时间较早,该类卜骨很可能是夏家店下层较早的遗址之物。

③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辽宁林西县大井古铜矿1976年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7),文物出版社,1983年,144页,图二二;王刚:《林西县大井古铜矿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年第1期。

④ 辽宁省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工作队:《宁城县南山根的石椁墓》,《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⑤ 报告说“有钻无灼”,笔者认为应该是先钻而后灼。

⑥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凌源安杖子古城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6年第2期。

⑦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发掘队:《湖北圪春毛家咀西周木构建筑》,《考古》1962年第1期。

⑧ 湖北省博物馆:《汉阳东城垓纱帽山遗址调查》,《江汉考古》1987年第3期。

5. 早期楚文化

(1) 枣阳毛狗洞遗址^①:采集 1 件卜骨(ZN 采:41),为牛左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 10 厘米,残宽 8 厘米。骨白被切去,反面骨脊及较厚处削去,刻成平整的凹槽,在里面凿凸字形的方钻,较整齐。

(2) 枝江赫家洼遗址^②:发现 1 件卜骨,为牛右肩胛骨,已残,只留柄部,残长 16 厘米,残宽 10 厘米。经过修整,削去骨白,未去白角。有钻无凿,钻坑圆形平底,有的坑内刻有“猫眼状”凿槽。钻坑除直径 0.3 厘米、0.4 厘米各一坑外,其余钻径皆为 0.5 厘米。钻坑上下双联,长 0.6—1.3 厘米。其甲骨特征应属西周晚期。

(3) 襄樊真武山遗址^③:共发现 18 件甲骨,主要出于 H81 中,多残碎。以双联钻为特征,双钻之间经修齐,钻坑平整,双联钻成鞋底形,排列较整齐。未发现有占卜过的灼、兆纹痕迹。卜骨,均残。切去骨白,削去骨脊而修成板状,骨中部经挖削,四周留边。钻坑均较密集。标本 H81:11,仅存一块,残长 4.7 厘米。标本 H81:12,应为牛右肩胛骨,仅存柄部,残长 8 厘米,宽 8.4 厘米,切去白角。标本 H81:13,应为牛左肩胛骨,仅存柄部,残长 12.2 厘米,残宽 4.4 厘米。其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

(4) 宜城肖家岭遗址^④:发现 2 件甲骨,卜骨和卜甲各 1 件。卜骨(H16②:2),为牛肩胛骨,已残,残长 8 厘米,残宽 10.8 厘米。经过修整,反面施双联钻,钻壁平直,无灼、兆纹痕迹。钻底刻竖槽只见于几处骨片较厚处。右下还有一较浅圆钻,应是未完成的双联钻之一。其年代应为春秋时期。

6. 麻柳沱文化

(1) 清江香炉石遗址^⑤:该遗址第 4 层发现 17 件,另外在地面采集 7 件,其特点与第 4 层所出的基本相同,大致可归入此层中。其中卜骨 19 件,卜甲 5 件。卜骨均用鱼的鳃盖骨而制成,均有钻凿灼,钻坑为长方形,皆有凿槽,烧灼痕迹明显,有的可见兆纹。标本 T10④,为左鳃盖骨,较完整,长 6.5 厘米,宽 4 厘米。残存钻坑 12 个,均为长方形,12 个坑的灼痕全部透过正面,兆纹可见。T10④:222,为鳃盖骨,已残,残长 7.5 厘米,宽 6.5 厘米。残存钻坑 11 个,为长方形,保存完整的钻坑仅有 1 个,其余全部损坏。

(2) 宜昌朱家台遗址^⑥:发现 2 件卜骨,均为鱼的鳃盖骨,保留有最外层骨皮,然后施钻灼。标本 T1③:14,为鲤科鱼类的鳃盖骨,比较完整,呈不规则四边形,头侧缘长约 8.5

① 襄樊市博物馆:《湖北枣阳毛狗洞遗址调查》,《江汉考古》1988 年第 3 期。

② 黄道华:《枝江赫家洼遗址出土西周卜骨》,《江汉考古》1992 年第 3 期。

③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博物馆:《湖北襄樊真武山周代遗址》,《考古学集刊》第九集,1995 年,158 页,图十七。

④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宜城县博物馆:《湖北宜城县肖家岭遗址的发掘》,《文物》1999 年第 1 期。

⑤ 湖北省清江隔河岩考古队:《湖北清江香炉石遗址的报告》,《文物》1995 年第 9 期。

⑥ 鄂博三峡考古队第三组:《宜昌县朱家台遗址试掘》,《江汉考古》1989 年第 2 期。

厘米,脊侧缘长 5.2 厘米,尾侧缘长约 5.7 厘米,腹侧缘长约 3.0 厘米。在鳃盖骨内面靠近腹侧缘处刻有两排长方形的钻坑,上排有 3 个,下排有 5 个。钻坑两长边较陡直;两短边向内倾斜。坑呈口大底小的方斗形,口长 7.8—9.2 厘米,口宽 7.0—7.8 厘米,底长 5.5—6.6 厘米。卜骨上的钻坑可能是用铜刻刀来完成的^①。

(3) 秭归石门嘴遗址^②:共发现 21 件甲骨,其中卜骨 15 件,卜甲 6 件。卜骨所用均为鱼的鳃盖骨,皆从内侧施钻。除个别为圆钻和方钻外,余皆长方形钻坑。坑底常见凿槽和烧灼痕迹,有的可见反面兆纹。其年代应当在西周晚期偏晚至春秋早期偏晚之间。

(4) 万州麻柳沱遗址^③:发现较多的卜甲和 1 件卜骨。卜骨(T126^⑤:09),为左鱼鳃盖骨,已残,骨内侧施钻,无凿,无灼,无兆。鱼鳃骨厚 0.3 厘米,钻坑径 1.8 厘米。经鉴定,属中华鲟类。属于东周时期。

7. 十二桥文化

仅在成都方池街遗址发现 9 件甲骨,其中卜骨 1 件,卜甲 8 件^④。卜骨系用动物肩胛骨制成,已残,残长 5 厘米,残宽 3.5 厘米,其一边的边缘已被磨平,是否确为卜骨,有待进一步观察^⑤。

8. 沙井文化

仅在永昌三角城与哈马墩遗址发现 4 件卜骨,均系羊肩胛骨^⑥。肩胛骨经过修治,占卜方式有三种,即只灼、有钻有灼、钻凿灼兼施。标本 T4^③:4,为大羊左肩胛骨,较完整,前角已缺失,修治光滑,留有 4 个钻坑、灼痕,反面裂出兆纹。T1^②:2,为幼羊左肩胛骨,扇部稍微缺失,骨面留有 3 个钻坑,排成三角,相当规则。标本 F2:2 和 H4:3,前者系大羊右肩胛骨,后者为小羊肩胛骨,两者扇部均有残损,都只有 1 个钻坑。

① 报告认为该遗址第三层(出土卜骨)的年代定为春秋早、中期,又提出此类卜骨可能属于西周时期。

②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秭归石门嘴遗址发掘》,《考古学报》2004 年第 4 期。

③ 福建省考古队、重庆万州区文保所:《万州涪溪口遗址第三期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 卷),科学出版社,2006 年,514 页,图十五。

④ 周尔泰:《成都市方池街古文化遗址初探》,《四川文物》2003 年第 1 期。

⑤ 报告认为该件为卜骨,但目前四川成都地区除该件外,还没有发现卜骨,该件只经过修整,均无钻凿灼,可能不是卜用过的卜骨。

⑥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三角城与哈马墩沙井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90 年第 2 期。

附录二 考古所见先秦时期的卜甲

一、商 代

(一) 商 代 早 期

1. 二里岗文化

(1) 郑州南关外遗址^①:该遗址的下层(南关外期)发现1件卜甲(标本C5T85^④:123)^②,为腹甲,已残,只留甲腹部分,直接灼制,腹甲反面留有灼痕9个。

(2) 郑州商城遗址^③:商代二里岗下层二期发现10件卜甲,均残。甲桥只保留中间竖行齿缝内侧部分,龟甲均稍加修整,在龟甲的反面灼点。标本C9.1H167:7(南关外),为腹甲,已残,甲首和左甲尾缺失^④,残长14.5厘米,中宽8.5厘米。在龟甲的反面直接灼制,灼点似纵横排列有序,留有灼痕34个。标本C5H13:1(南关外),为腹甲,上下各残去一部分,残长8.7厘米,中宽7厘米,它在1件小龟甲的正面灼出3个灼点。标本C5H51:1(南关外),为背甲,已残,残长10.4厘米。龟甲正面有自然纹,反面的骨脊被削去,并在边沿处钻有一圆坑,但甲上无灼痕,可能不是占卜过的龟甲。标本C5H33乙:6—2(南关外),为腹甲,比较完整,只缺左甲尾,长9.5厘米,中横宽6.3厘米,是1件较小的龟甲,在腹甲正面的中部,似有用火灼制而成的棕褐色双目、鼻、口的人面形纹。该龟甲可能被作为玩具或祭祀用品而灼制人面纹,而非占卜用的龟甲。标本C9.1H150:6(南关外),为腹甲,比较完整,残缺较少,腹甲正面上分布有近20个灼点。

商代二里岗上层一期发现37件卜甲,完整者较少。甲桥只保留中间竖行齿缝内侧部分,卜甲稍加修整,在腹甲的反面先钻出圆坑,然后在圆坑内火灼,其钻灼的排列多是成组分布。标本C5H39:7(南关外),为腹甲,甲首和甲腹的一半已残缺,残长9.5厘米,中宽

① 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南关外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136、681、682、836页,图八五、四六八、五六一,图版二七、一四八、一四九、二三九。

② 《郑州南关外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为T95:123;《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为C5T85^④:123。按报告提供的图版,两件卜甲是同一件,本文以《郑州商城》一书为准。

③ 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681、682页,图四六八,图版一四八、一四九。

④ 以腹甲的正面和背甲的外面,即没施钻或凿的一面为正,描述龟甲的各部位。

8.5 厘米。在腹甲的反面残留钻坑 31 个,多数钻坑内都有火灼痕迹。钻径一般为 0.5—0.8 厘米。标本 C5.3H310:3(南关外),为腹甲,甲尾和甲腹的一半已残缺,残长 9.0 厘米,中宽 8.1 厘米。在腹甲的反面分布有灼点 18 个,每个灼点上都有钻痕。钻灼以千里路为界,左边有 9 个,右边有 9 个,可能已经出现正反对贞。标本 C5H20:49(南关外),为腹甲,基本完整,长 20 厘米,中宽 10 厘米。腹甲的反面削平,钻后再灼,钻灼分三处共有 15 个。其中腹甲反面的右上甲尾(C1),有钻灼 1 个;左上甲尾(C3),有钻灼 4 个;左下甲腹上段(B7),有钻灼 10 个,占卜者把腹甲的各部位有意分成几部分,施钻灼。标本 C9.1H142:47(南关外),为腹甲,大部残损,残长 21.5 厘米,中宽 14.5 厘米。钻后再灼,在残存的腹甲反面上,留有钻灼 39 个以上,似排列有序。

二里岗下层施灼于正面或反面,到二里岗上层均施灼于腹甲反面,而且先钻后灼。卜甲在二里岗下层出土数量少,个体也小;二里岗上层出土数量较多,个体也较大。二里岗上层卜法有新的发展,钻坑排列以千里路或齿缝为界,左右、上下对称。

(3) 郑州木材公司遗址^①:该遗址二里岗上层遗存中发现 1 件卜甲(标本 T1④:33),为腹甲,已残,有钻、灼痕。

(4) 登封王城岗遗址^②:该遗址二里岗上层发现 1 件卜甲(标本 WT10③:20),为腹甲,已残,残长 4.3 厘米,宽 3.7 厘米。腹甲的反面有先钻后灼的痕迹 6 个。

(5) 柘城孟庄遗址^③:发现 7 件卜甲,腹甲 6 件,背甲 1 件。卜甲整治比较粗糙,仅在边沿部分用刀削后便使用,卜甲的反面先钻后灼。灼多为圆灼,但也有灼不圆的。该遗址的年代相当于郑州商代二里岗上层时期^④。

2. 大辛庄类型

(1) 济南大辛庄遗址^⑤:该遗址共发现 687 件卜甲,多为腹甲,极少见背甲。大辛庄遗址用于占卜的龟甲最大的个体长 14.5 厘米,宽 9 厘米;最小的个体长仅 11.2 厘米,宽 6.7 厘米。大多数个体长度在 13 厘米,宽度在 8 厘米。整体上看,大辛庄遗址占卜所用乌龟的个体较小^⑥。诸报告与文章皆没有提出早商时期的卜甲,笔者认为,以下几件卜甲应该

① 郑州市大河村遗址保管所:《郑州市木材公司商代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0 年第 4 期。

②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 年,169 页,图版五九。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商丘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柘城孟庄商代遗址》,《考古学报》1982 年第 1 期。

④ 报告认为该遗址的年代相当于郑州商代二里岗下层。从卜甲上先钻后灼的特征来看,大多数相当于郑州二里岗上层。

⑤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 年,23 页;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勘查纪要》,《文物》1959 年第 11 期;《济南大辛庄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59 年第 4 期;蔡凤书:《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的调查》,《考古》1973 年第 5 期;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博物馆:《1984 年秋济南大辛庄遗址试掘述要》,《文物》1995 年第 6 期;徐基:《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的初步研究》,《文物》1995 年第 6 期;王华:《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攻治技术研究》,山东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6 年。主要参看后两篇文章提供的资料,他们已经把该遗址的甲骨详细论证,本文只是择其重点描述。

⑥ 王华:《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攻治技术研究》,山东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6 年,21 页。

属于该时期^①：标本 03DXZT0102H603:5, 为腹甲, 比较完整, 左甲桥稍有缺失, 长 12.8 厘米, 宽 8.58 厘米。甲桥与甲腹之间呈锐角, 甲腹中间靠近千里路处有一个小孔, 似为穿系所用。腹甲反面共有小圆钻 25 个, 呈圜底, 直径 0.4—0.6 厘米, 深 0.07—0.29 厘米, 成组分布。其中腹甲反面的左上甲尾(C3), 有钻灼 1 个, 左下甲腹下段(B8), 有钻灼 2 个, 右下甲腹下段(B4), 有钻灼 3 个, 可能以千里路左右对称; 右下甲腹(B3、B4), 有钻灼 3 个, 右上甲腹(B1、B2), 有钻灼 4 个; 左上甲腹(B5、B6), 有钻灼 5 个, 左下甲腹(B7、B8), 有钻灼 6 个。可以看出占卜者有意以千里路和齿缝为界, 将各部位分成几部分, 施钻灼进行占卜。标本 03DXZT1503M63:016, 为腹甲, 已残, 残长 5.97 厘米。甲桥有明显的锯割痕迹, 残存小圆钻 4 个, 圜底, 直径 0.54 厘米, 深 0.17 厘米。标本 03DXZT1503H592:4, 为腹甲, 已残, 只留甲尾和甲腹一部分, 残长 6.58 厘米, 宽 9.01 厘米, 按比例复原此龟的长度在 14.5 厘米左右, 宽 9 厘米上下。残存小圆钻 6 个, 应为各 3 个一组分布, 圜底, 直径 0.6 厘米, 深 0.15—0.26 厘米, 有灼痕。

(2) 泗水尹家城遗址^②: 发现 1 件卜甲(T222⑥:36), 为龟腹甲, 已残, 只有甲首部分。腹甲的反面经过刮削和粗磨, 有灼有钻, 无凿, 现存 14 个钻坑, 排列无一定规律, 钻坑有大小之别, 直径在 0.6—0.9 厘米之间。施灼的反面均有圆形灼焦痕迹, 有的还有短直线状卜兆裂纹。

3. 东下冯类型

仅在垣曲商城遗址二里岗上层中发现 1 件卜甲(T2857:4A:10)^③, 为腹甲。仅留甲腹一块, 龟反面钻坑 11 个, 坑较大且深, 坑径 1 厘米, 深 0.5 厘米, 底略平, 仅有 1 坑钻透, 钻后均灼。

(二) 商代中期

1. 曹演庄类型

(1) 邢台曹演庄遗址^④: 该遗址上下层均有卜甲, 多数已残。有腹、背甲, 边缘稍加修

① 王华的论文中将卜甲上的钻凿形态分为四型, 即圆钻型、单独的长凿型、长凿旁附圆凿型、圆凿包摄长凿型。圆钻型又分小圆钻型和中圆钻型, 他认为小圆钻型都属于大辛庄甲骨第二期早段(中商文化一、二期), 可笔者认为这类卜甲与郑州二里岗上层所出土的卜甲相同, 其年代也应该同步或稍微晚。中圆钻型与圆凿包摄长凿型应属于中商时期, 前者形制和洹北商城 A 型类似, 然其特征带有原始形态; 后者与洹北商城 A 型和 B 型相似, 可能是过渡形态, 其排列也和洹北商城 B 型大致相同, 带有原始形态。长凿旁附圆凿型和单独的长凿型则中商洹北商城 B 型和殷墟甲骨中常见。较薄之处只施单独的长凿型, 直接烧灼。以钻凿的排列, 可分早晚。一般以千里路为界两边各有二、三竖列。中商时期卜甲则其中最外一列钻多在凿的内侧, 而内侧两列钻多在凿的外侧; 晚商卜甲则左边二、三竖列的钻均在凿的右侧, 右边的钻均在凿的左侧, 以千里路为对贞。此外, 王华文所说的“圆凿”, 本文改为“圆钻”, 即“长凿旁附圆凿型”改为“长凿旁附圆钻型”; “圆凿包摄长凿型”改为“圆钻内有猫眼状凿槽型”。

②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研室:《泗水尹家城》, 文物出版社, 1990 年, 253 页, 图版九九。

③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县博物馆:《垣曲商城:1985—1986 年度勘察报告》(一), 科学出版社, 1996 年, 243 页, 图一五七, 图版八九。

④ 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邢台曹演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8 年第 4 期。

整。少数几片只有凿、灼或只灼以外,其余大部分钻凿灼兼施。

(2) 安阳洹北商城遗址^①:发现共 43 件卜甲,以腹甲为主,极少数是背甲。甲桥经过修整,甲桥与甲腹之间多呈锐角,极少数呈直角或钝角,较多的甲桥上有钻坑。由于刮磨较少,卜甲较厚,因此钻凿较深,有的甚至未加修整而直接钻凿。根据钻凿灼的形式,将龟腹甲分为 A、B 两型^②,其中 B 型又可分为二式。

A 型:2 片。均有钻灼,且圆钻内有一道凿槽。标本 T12F1 垫土:3,为腹甲,已残,只留甲尾和右甲腹一部分,残长 7.8 厘米,残宽 6.5 厘米。反面刮磨平整,甲桥与甲腹间呈直角。卜甲中部饰以圆钻,圆底,圆钻直径 0.8—1.4 厘米。圆钻中部有“猫眼状”凿槽,个别圆钻上施灼。

B I 式:3 片。个体较大,均有钻凿灼,千里路两侧各有三竖列。其中最外一列兆枝多向千里路,而内两列兆枝多向外。标本 T2^③:29,为腹甲,甲尾和甲腹一部分已残缺,残长 15.4 厘米,宽 15.8 厘米。甲桥与甲腹之间呈锐角,刮磨平滑。均有钻凿灼,以千里路为界两边各有三竖列。其中最外一列钻多在凿的内侧,而内两列钻多在凿的外侧。

B II 式:34 片。大部分个体较小,均有钻凿灼,千里路两侧各有二竖列。二竖列间兆枝基本相对,个别例外。标本 T4^④:46,为腹甲,比较完整,甲尾缺失,残长 11.2 厘米,宽 11 厘米。整治规整,较厚,甲桥与甲腹间呈锐角。反面的钻凿较深,排列有序,左舌板和内板各有 1 个;左上甲腹和右上甲腹各有 5 个;左下甲腹和右下甲腹各有 6 个,互相对贞。标本 T2^③:1,为腹甲,基本完整,长 17.3 厘米,宽 9.8 厘米。甲桥与甲腹间呈钝角。反面的钻凿较深,个别无灼。钻凿排列有序,右舌板有 1 个,左舌板残缺不明;左上甲腹和右下甲腹各有 5 个;右上甲腹有 4 个,左下甲腹有 6 个;左右甲尾各有 1 个。标本 T4^④:39^⑤,为腹甲,只留有左上腹甲一段,残长 8.4 厘米,残宽 5.5 厘米。甲桥与甲腹间呈锐角,残留有钻凿 6 个,甲桥上有一个钻坑。

郑州南关外遗址二里岗上层所出卜甲,有圆钻和灼痕,没有凿,如标本 C5H39:7、C5H310:3 和 C9.1H142:47 三片卜甲残片^④。从这一点来看,A 型卜甲是从早商变化而来的,洹北商城 A 型卜甲可能早于 B 型。

(3) 新乡李大召遗址^⑤:该遗址商代遗存中发现卜甲 6 件,均不完整。标本 II T2405H298:16,为腹甲,已残,只留左下甲腹和甲桥一块,每组钻凿由不规则圆坑和梭形凿组成,兼施钻凿灼。标本 II T2405H298:15,为腹甲,已残,只留甲首一块,残存钻凿 6 个,有灼痕。标本 II T2405H298:7,为腹甲,已残,只留甲首一部分,残存钻凿 2 个。标本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8 年—1999 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5),文物出版社,2004 年,334、335 页,图 26,图版 12、13、14、15、16、17。

② 本文采用报告所分的两型,但根据时间先后关系略作调整,即报告 A 型本文改为 B 型,B 型改为 A 型。

③ 报告文字描述部分的卜骨编号与线图的编号(T4^④:29)不一致,本文只采用文字描述的编号。

④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 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 年,836 页,图版二 三九~1、2、3。

⑤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 韩国河、赵海洲:《新乡李大召——仰韶文化至汉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6 年,303 页,图二〇七、二〇八。

Ⅱ T2405H298:37,为背甲,已残,残存圆钻2个。腹甲均和洹北商城B型相似,背甲和洹北商城A型类似,但两者均带有较早的形态特征,其年代应该属于中商时期前段。

(4) 邢台东先贤遗址^①:该遗址第二期遗存中发现1件卜甲(H8:3),为腹甲。已残,只留甲腹一部分,残长6.3厘米,残宽4.3厘米。腹甲反面兼施钻凿灼,在每个竖向梭形凿槽旁有圆形或方形钻,钻坑内有灼痕。

(5) 武安赵窑遗址^②:发现5件卜甲。均有钻、凿、灼痕。标本T9②:7,为腹甲,已残,只留左上甲腹一段。均有钻凿灼,现存5个,成二竖列。钻的形状为近圆形,凿则呈枣核形。凿与钻的相对位置是靠近千里路的2个凿槽在钻坑的右侧,靠近甲桥的3个凿槽,2个在钻坑的左侧,中间的1个在钻坑的右侧。其形制同于洹北商城BⅡ式卜甲。

(6) 磁县下七垣遗址^③:该遗址第三层发现1件卜甲(T21③:1087),为龟腹甲,个体较小。经过整治,刮磨较少,有的部位未加修整,因此卜甲较厚,钻、凿较深。钻凿灼迹具有,一共12个,千里路两侧各有二竖列。二竖列间兆枝基本相对,即靠近千里路的钻在凿的外侧,靠近甲桥和边缘的钻在凿的内侧^④。

(7) 临城补要村遗址^⑤:发现7件卜甲,其中腹甲3件,背甲4件。个体皆较小,经过修整,均有钻凿灼。标本07LBST8H71:1,为腹甲,保留甲首和上甲腹,残长10.9厘米,残宽8.9厘米。略加修整,腹甲反面钻凿灼兼施,千里路两侧各有二竖列,其中边缘的一列钻在外,凿在内,而靠近千里路的钻在内,凿在外,二竖列间基本相对;正面的兆枝,也以千里路为界,二竖列间基本相对。和洹北商城BⅡ式相同。标本ST10H70:02,为右背甲,比较完整,长18.6厘米,宽7.4厘米。以中脊齿缝为界切去,未经加工。大多数在背甲反面只有钻灼,少数均有钻凿灼。凿为弧形,钻为半圆形。灼痕多向里面,与腹甲相同,左右对称。

2. 台西类型

(1) 藁城台西遗址^⑥:该遗址晚期居址发现91件卜甲,其中背甲59片,腹甲32片,早期没有发现。该遗址卜甲基本出于T4、T13的地层,但报告未标示出究竟出于哪一层,仅说明都是晚期居址。就甲骨的整治方式和钻凿形态而言,藁城台西晚期遗存与洹北商城大同小异。卜甲经过整治,腹甲较厚,甲桥与甲腹之间多呈锐角,均有钻凿灼,钻坑一般用

① 邢台东先贤考古队:《邢台东先贤商代遗址发掘报告》,《古代文明》(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414页,图三五;《河北邢台市东先贤遗址1998年的发掘》,《考古》2003年第11期。

②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文化学院:《武安赵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2年第3期。

③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下七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④ 报告以为属于商代早期,可笔者仔细观察图版,发现其显示出中商卜甲的典型特征,应该属于商代中期。

⑤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河北临城县补要村遗址南区发掘简报》,待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北临城县补要村遗址北区发掘简报》,待刊。

⑥ 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藁城台西村的商代遗址》,《考古》1973年第5期;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台西考古队:《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1979年第6期;李学勤、唐云明:《河北藁城台西甲骨的初步考察》,《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3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

刀具挖成,多数近圆形,也有呈方形的,形状既不规则,底部也凹凸不平。凿的位置无定,有的在坑的左侧,有的位于右侧,个别的凿痕竖在钻坑之内,甚至在两钻坑之间。形状以枣核形为主,也有成长方形的。

从公布的图版来看,标本 F2:39、T13:131、F2:39,均为腹甲,个体较大,相当于洹北商城 B I 式。均有钻凿灼,千里路两侧各有三竖列。靠近千里路钻基本都在凿的外侧,而靠近甲桥的钻多在凿的内侧,中间一列与靠近千里路者相同。

标本 T13:97、T13:134、T13:92、T4:29、T13:178,均为腹甲,大部分个体较小,相当于洹北商城 B II 式。均有钻凿灼,千里路两侧各有二竖列。二竖列间兆枝基本相对,个别例外。其中标本 T13:97,比较完整,反面的钻凿较深,排列有序,左上甲腹有 4 个,右上甲腹有 3 个,内板应有 1 个;左下甲腹和右下甲腹各有 4 个;左右甲尾各有 2 个,互相对贞。

标本 T4:13、T13:174、F6:59、F6:44,均为背甲,几乎保持整体的形状,未见锯成两半的,均有钻凿灼,其排列两侧基本上是对称的。

(2) 藁城北龙宫遗址^①:发现 1 件卜甲(藁北 C:17),为背甲,残存一块,正面经过打磨,钻凿灼兼施。

3. 大辛庄类型

(1) 济南大辛庄遗址^②:上一节所引王华文章中提出的“中圆钻型”和“圆钻包摄长凿型”都属于该时期比较早的形态,“长凿旁附圆钻型”和“单独的长凿型”则中商洹北商城 B 型和殷墟甲骨中常见,也属中商较晚的形态。较薄之处只施单独的长凿型,直接烧灼,两者没有年代的区分。这两类主要以钻凿的排列来分早晚关系。一般中商时期卜甲以千里路为界,两边各有二、三竖列,其中最外一列钻多在凿的内侧,而内侧两列钻多在凿的外侧。

标本 84T75^③:6,为腹甲,已残,只留右下甲腹和甲桥一段。甲桥锯割,呈钝角。腹甲反面残存圆钻 6 个,低平,直径 1 厘米左右。其形制和洹北商城 A 型类似,但带有原始形态,也就是说,该类卜甲的形制应是二里岗上层与洹北商城 A 型的过渡形态。标本 84Ⅲ6T86^③:4,为腹甲,已残,只留甲首和甲腹上端,残存圆钻 8 个,圆钻内有凿槽。其形制和洹北商城 A 型相同。

标本 03DXZT2402M61:01,为腹甲,比较完整,甲首和右上甲腹上段稍有缺失,残长 10.99 厘米,宽 8.98 厘米。甲桥完全锯去,长凿位于圆钻的内侧,靠近甲桥的个体长凿向外。长凿长度相差较大,在 1.12—1.62 厘米之间,成组对称分布。其中腹甲反面的左上甲尾(C3)和右下甲腹下段(B4),各有 1 个;右上甲尾(C1)和左下甲腹下段(B8),各有 2

①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北龙宫商代遗址的调查》,《文物》1985 年第 10 期。

②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博物馆:《1984 年秋济南大辛庄遗址试掘述要》,《文物》1995 年第 6 期;徐基:《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的初步研究》,《文物》1995 年第 6 期;王华:《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整治技术研究》,山东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6 年。

个;左下甲腹上段(B7)和右下甲腹上段(B3),各有2个;右上甲腹(B1、B2),有4个,左上甲腹(B5、B6)已残,残存3个。标本03DXZT2401F55:11,为腹甲,比较完整,甲首已残缺,长13.5厘米,宽6.72厘米。在该遗址属于中等大小的乌龟,腹甲较薄,钻凿都极浅,形制多样。长凿或在圆钻内,或位于圆钻一侧,均呈线状,长度1.28—1.47厘米。分布稀疏,似成组。标本03DXZT2401H612:1,为腹甲,已残,腹甲较薄,甲桥残留较高,圆钻较浅且不规整,有的甚至为直接烧灼,圆钻内的凿槽长度0.97—1.27厘米。该类卜甲的形制应为洹北商城A型和B型之过渡形态,其排列也和洹北商城B型大致相同,带有原始形态,数量也不多。

此外,徐基文章中提供线图的标本84IV11H23:10、Ⅲ6H148:3、Ⅲ6H76:20、Ⅲ6T77③:1、Ⅲ6H17:24、Ⅲ6H77:2、Ⅲ6H17:23、Ⅲ6H17:13、Ⅲ6H76:3、Ⅲ6H76:9,与王华文章中提供线图C型(长凿旁附圆凿型)、D型(单独的长凿型)的标本03DXZT0101⑤B:9(CⅠ式:微曲肩平圆头),T2403M86:4(CⅡ式:直肩平圆头),T0402G61:2(CⅢ:直肩方头);T2001夯土:2(DⅠ:曲肩尖头),84DXZ6T77H148:3、T76④:10(DⅡ:微曲肩平圆头),03DXZT2302H537:1(DⅢ:直肩方头)等材料,虽然钻凿形态各式各样,但钻凿的排列一律和洹北商城B型大致相同,带有中商卜甲的特点。其年代两位学者认为是中商晚段至殷墟三四期,但笔者认为其年代需要重新调整,这类卜甲中相当一部分应该归入中商晚期或稍微晚一些,这个看法要待正式报告公布后,再加论证。

(2) 桓台唐山遗址①:发现7件卜甲,其中腹甲1件,背甲6件。至少代表了3个个体,大部分个体较小,均有钻凿灼。标本H122③,为腹甲,已残,仅留甲首,残长5.8厘米,残宽8.3厘米。经过修整,较厚,腹甲反面钻凿较深,残存钻凿5个,以千里路为界,两侧各有二竖列,应左右相对。凿槽为长方形,长1.4—1.8厘米,宽0.3厘米。钻坑为半圆形,直径0.8—1.19厘米。标本H122④,为背甲,已残,仅留右背甲一块,残长16厘米,残宽6.5厘米。略加修整,背甲反面留有凿槽4个,其中2个均有钻凿灼,2个仅有凿槽。凿槽为弧形或长方形,长1.1厘米;钻坑为半圆形,直径0.7厘米。

4. 潘庙类型

仅在铜山丘湾遗址发现1件卜甲②,为腹甲,个体较小,甲尾已残。甲桥经过修整,甲桥与甲腹之间呈锐角。均有钻凿灼痕,千里路两侧各有二竖列。钻凿排列有序,内板和左舌板各有1个;左上甲腹和右上甲腹各有4个,上面两行均向外,下面两行均向千里路;下甲腹稍有残缺,左下甲腹应有5个,右下甲腹有6个;甲尾则已残缺,不明,应左右对贞。其形制与洹北商城BⅡ式相同。

① 宋艳波、燕生东:《鲁北地区商代晚期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三十五期,2007年12月。

② 南京博物院:《江苏铜山丘湾古遗址的发掘》,《考古》1973年第2期。

(三) 商代晚期

1. 殷墟类型

以下先介绍殷墟地区的卜甲：

(1) 安阳大司空村遗址^①：共发现 62 件卜甲。1953 年发现 47 件(2 片有字)，均为龟腹甲；1958—1961 年发现 15 件。

(2) 安阳后冈遗址^②：共发现 4 件卜甲。标本 91M7：9，为腹甲，已残，残留甲腹，残长 9.8 厘米，残宽 5.7 厘米。腹甲反面留有 3 行 18 个凿和灼痕，凿槽为长方形，灼痕以千里路为界，左边的在凿槽的右侧，右边的在凿槽的左侧，左右对称。

(3) 安阳苗圃北地遗址^③：共发现 148 件卜甲。1958—1961 年发现 96 件(1 件有字)，1974 年发现 1 件(有字)，1980—1982 年发现 1 件，1982—1984 年发现 50 余件。多为龟腹甲，少数为龟背甲，钻凿灼兼施。其中标本 84H16：4，为腹甲，基本完整，长 22.2 厘米，宽 14.2 厘米。边缘均经整治磨平，钻凿灼兼施，腹甲反面共见 60 多组(其中 5 组残缺)，千里路两侧各有 3 竖列。其中最外一列兆枝多向千里路，而内两列兆枝多向外。其形制和洹北商城 BI 式相同。标本 84H16：6，为腹甲，个体较小，甲尾已残缺，钻凿灼兼施，千里路两侧各有 2 竖列。2 竖列间兆枝基本相对，个别例外。其形制和洹北商城 BII 式相同。

此外，《殷墟发掘报告》中所提供的标本也多数是该遗址的，早晚期的甲骨均有，但报告未对甲骨进行仔细分期。从卜甲的特点来看，标本 PNH217：5、PNIVH5：2、PNT215^④：5，和洹北商城 BI 式相似；标本 PNH25：34，和洹北商城 BII 式相似；标本 PNT234^④：6、PNT130^⑥：5，皆为背甲，钻凿形态和排列均有较早的特点，与腹甲相同。

(4) 安阳小屯南地遗址^④：报告所分凿的形态中 I 式，即头尾尖，腹较直，有的头部还有针尖状凸出；这种形式的凿多见于卜甲上。标本 T54^⑤B：15，为腹甲，甲尾已缺失，残长 11 厘米，宽 8.8 厘米。腹甲反面钻凿灼兼施，凿为弧形，凿长 1.4—1.7 厘米，宽 0.4—0.5 厘米，深 0.35—0.45 厘米。凿旁有半圆或半椭圆的钻，钻内有烧灼的痕迹。这种形式的凿，其制法是先用车子开槽，再用刀修整。钻凿的排列几乎以千里路为界左右对称，不太规律，但左下甲腹靠近千里路的两个钻凿相反，留有中商甲骨的特征，此卜甲应属于武丁前期。

① 马得志、周永珍、张运鹏：《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 9 册，1955 年，71 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 年，199—202 页，附表十八。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71 年安阳后冈发掘简报》，《考古》1972 年第 3 期；《1991 年安阳后冈殷墓的发掘》，《考古》1993 年第 10 期。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 年，199—202 页，附表九；《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 年，152、160 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0—1982 年安阳苗圃北地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6 年第 2 期；《1982—1984 年安阳苗圃北地殷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91 年第 1 期。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3 年小屯南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 9 集，科学出版社，1995 年，86—88 页。

(5) 安阳花园庄南地遗址^①:发现3件卜甲,均为腹甲,钻凿灼兼施。标本 H22^①:7,已残,残长6.5厘米,残宽8.9厘米。腹甲反面有6个凿,其中2个完整。A 凿,头方形、尾弧形,凿之左侧有一指甲形钻,凿之右侧有方钻,钻内有灼。凿长1.7厘米,宽0.5厘米,深0.45厘米。B 凿,头尾弧形,两侧有指甲形钻,钻内有灼。凿长1.8厘米,宽0.5厘米,深0.45厘米。钻凿排列不甚规律,具有较早的特征。标本 H27^③:23,已残,残长2.8厘米,残宽5.5厘米。腹甲反面残留4个凿,皆残。凿的左侧均有钻坑,方形平底,内有灼痕。凿残长1.1厘米,宽0.9厘米,深0.4厘米。钻凿排列皆朝千里路,以千里路为界左右对称。上述出土卜甲的两个灰坑均属于该遗址中期。

(6) 安阳花园庄东地遗址^②:发现1558件卜甲,其中无字卜甲984件,有字卜甲574件(腹甲557件,背甲17件)。关于龟的种属,大多数属于花龟,少数属于乌龟。在卜甲中有上百版上发现小圆孔。

《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一书中,对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整治方式和钻凿形态进行了专门研究。本文稍加补充说明,力求更加完善。第一,报告虽然对钻凿形态进行了细致分类,但没有注意不同位置上钻凿形态的差别,实际上,花园庄东地甲骨卜甲腹部的钻凿形态非常规整,只有甲首和甲尾上的钻凿变化较多,而这可能和甲首、甲尾相对狭窄有关。第二,对甲骨整治方式和钻凿形态进行了较细致的分类,却没有注意到,不同的形式在时间上可能存在差别。从卜甲形态上看,甲桥保留较多(甲桥较宽)、甲桥肩部与腹甲夹角尖锐,都是较早的特点,具有这些特点的卜甲包括了报告对甲桥所作分类中的A型和C型中的C1、C2、C3式,具有这种甲桥的卜甲可能占到卜甲总数的60%。综合来看,花园庄东地卜甲的年代应比小屯南地师组卜甲的时代略早一些,而与YH127坑时代较早的那部分卜甲年代相当^③。

(7) 安阳王裕口南地遗址^④:发现1件卜甲(H1:2),为腹甲,仅剩甲首和甲腹上端,残长6.3厘米。腹甲反面有长方形凿和圆形钻,在甲首的两个钻凿向外,甲腹的两个钻凿向内(千里路)。钻内施灼,正面可见兆纹。

以下介绍殷墟以外的卜甲:

(8) 郑州人民公园遗址^⑤:发现4件卜甲,皆残。都是在龟甲上钻出圆坑和凿出椭圆形槽后才进行灼制的。标本 C7H111:46,为腹甲,已残,只留右上甲腹一块,最长处6厘米。在腹甲的反面有五处钻、凿、灼痕,排列有序,钻的位置靠近千里路的向外,靠近甲桥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队:《1986—1987年安阳花园庄南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2年第1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队:《1991年安阳花园庄东地、南地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第一至六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③ 报告推断花东甲骨的时代为武丁早期,但目前学者还有不同的看法,如陈剑认为属武丁晚期,朱凤瀚认为属武丁早期至中期偏早。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王裕口南地殷代遗址的发掘》,《考古》2004年第5期。

⑤ 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926页,图六一九,图版二七一。

的向内,互相对贞。在甲桥钻有一穿透小孔。标本 C7H111:35,为腹甲,已残,只留右甲尾一块,残长 6.5 厘米。在腹甲的反面残存有钻、凿、灼痕七处,排列有序。标本 C7H109:2,比较完整,甲尾缺失,残长 11.0 厘米。在腹甲的反面留有钻、凿、灼痕 16 处,排列有序,靠近千里路的向外(个别的 2 个向内,也有序),靠近甲桥的向内,互相对贞。标本 C7H111:34,为腹甲,残为数片,在腹甲的反面上可见密布的钻、凿、灼痕,排列有序。

(9) 郑州陈庄遗址^①:该遗址商代文化上层遗存中发现 3 件卜甲。标本 T1:33,为腹甲,已残,仅在边沿上切开,未细加整治。先在腹甲反面凿成近方形坑窝后再灼。

(10) 郑州铭功路东遗址^②:发现 2 件卜甲,均已残。标本 H2:14,为背甲,残存两块,钻凿灼兼施,残存钻凿 6 个,圆钻枣核形凿,排列有序,6 个钻凿向同一方向。标本 T1②:5,为腹甲,残存一块,残长 7.8 厘米。钻凿灼兼施,圆钻枣核形凿,残留三列 14 个钻凿。归属于郑州商城的人民公园期。

(11) 郑州旭畚王村遗址^③:发现几件卜甲,皆残。标本 H81:1,为腹甲,已残,只留下甲腹和甲尾,个体较小。钻凿灼兼施,以千里路为界左右各两行,左右对称。

(12) 孟县涧溪遗址^④:发现 3 件卜甲,皆残,均有灼痕。

(13) 杞县段岗遗址^⑤:发现 1 件卜甲(90 I T18②:35),为龟腹甲,已残。黄褐色,有灼痕,钻凿兼施,每组钻凿由一圆形钻坑和一梭形凿槽组成。

(14) 登封王城岗遗址^⑥:发现 2 件卜甲,皆残。标本 WT199H629:1,为腹甲,甲腹下部和甲尾已缺失,残长 7.2 厘米,残宽 8.5 厘米。腹甲的反面有四行长条形凿槽及灼痕,以千里路为界,左右对贞。标本 WT199H629:3,已残,残长 7.6 厘米,残宽 4.5 厘米。有两行自上而下的凿槽和圆形灼痕,其中有一个灼痕已灼透成孔。

(15) 夏邑清凉山遗址^⑦:发现 2 件卜甲,二、三期各 1 件。标本 F5:7,为背甲,已残,有圆钻、灼,另一面有卜兆。该遗址的商文化第一期和第二期约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二期,第三期约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三期。

2. 曹演庄类型

(1) 邢台东先贤遗址^⑧:该遗址第三期遗存中仅发现 1 件卜甲(H16:1),为腹甲^⑨,已

① 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市陈庄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6 年第 2 期。

②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铭功路东商代遗址》,《考古》2002 年第 9 期。

③ 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旭畚王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8 年第 3 期。

④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孟县涧溪遗址》,《考古》1961 年第 1 期。

⑤ 郑州大学文博学院、开封市文物工作队:《豫东杞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 年,240 页,图一五六。

⑥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 年,176 页,图九六,图版六三。

⑦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丘地区文管会:《河南夏邑清凉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研究》(四),科学出版社,2000 年。

⑧ 邢台东先贤考古队:《邢台东先贤商代遗址发掘报告》,《古代文明》(第 1 卷),文物出版社,2002 年,424 页,图四三;《河北邢台市东先贤遗址 1998 年的发掘》,《考古》2003 年第 11 期。

⑨ 原报告认为用龟背甲制成,经笔者观察报告提供的线图,具有右甲腹的特点。背甲齿缝之间的距离较窄,应有两条以上,而 H16:1,只有一条齿缝,而且留有甲桥部分。

残,只留右甲腹一部分,残长6.9厘米,残宽4.5厘米。腹甲反面施梭形凿和方形钻,残留两行7个,排列左右对称。其年代相当于殷墟一、二期。

(2) 邢台葛家庄遗址^①:发现1件卜甲(H49:5),为腹甲,已残一半,长13.3厘米,宽8厘米。钻凿灼兼施,钻坑为圆形,窝内施灼,凿呈枣核形。大部分钻凿以千里路为界对称,只在左上甲腹靠近千里路的两个钻凿相反。

(3) 磁县下七垣遗址^②:该遗址第二层发现28件卜甲,全是龟腹甲,钻凿灼均有的13件,只有凿灼的12件,只有钻灼的3件。其中标本H72:1028,个体较小,钻凿灼均有,大部分钻凿以千里路为界对称,只左下甲腹上段的钻凿相反,这是保留中商卜甲特征的结果,该卜甲应属于商代晚期前段^③。

(4) 临城补要村遗址^④:该遗址所出土的卜甲中,少数具有殷墟卜甲的特点。标本07LBST05H110:11,为腹甲,仅存下甲腹和甲尾,残长8.1厘米,残宽8.2厘米。略加修整,腹甲反面钻凿灼兼施,钻凿排列以千里路为界,左右各两列,钻均在凿的内侧;正面的兆枝也均向千里路,左右对称。

3. 大辛庄类型

(1) 济南大辛庄遗址^⑤:标本03DXZT2302⑤B:1,为腹甲,带有刻辞,比较完整,甲首、左甲桥和甲腹一部分缺失,残长18厘米,残宽10.7厘米。经过整治,刮削痕迹明显,右下甲桥内侧(D7)上部中间有一小穿孔。钻凿灼均有,圆钻,枣核形凿,排列规律。大部分钻凿以千里路为界对称,只有个别的钻凿相反,这是保留中商卜甲特征的结果,该卜甲应属于商代晚期前段,即相当于武丁前期^⑥。

(2) 桓台前埠遗址^⑦:发现7件卜甲,其中腹甲6件,背甲1件。至少代表了2个个体。标本J2④:1,为腹甲,已残,只留甲腹中间,残长4.8厘米,残宽3.7厘米。腹甲反面留有5个钻凿,凿为长方形,长2.0厘米,宽0.2—0.3厘米;钻为半圆形,直径0.9—1.01厘米。其排列最下边1个钻凿朝向内,其余均朝向外,与中商卜甲的排列相似。标本

①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邢台市文物管理处:《河北邢台市葛家庄遗址1999年发掘简报》,《考古》2005年第2期。

②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下七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③ 报告认为属于商代中期,但报告提供的图版表现出商代中期至晚期过渡形态的特征,应该属于商代晚期前段。

④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河北临城县补要村遗址南区发掘简报》,待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北临城县补要村遗址北区发掘简报》,待刊。

⑤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博物馆:《1984年秋济南大辛庄遗址试掘述要》,《文物》1995年第6期;徐基:《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的初步研究》,《文物》1995年第6期;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考古所:《济南市大辛庄遗址出土商代甲骨文》,《考古》2003年第6期;孙亚冰、宋镇豪:《济南市大辛庄遗址新出甲骨卜辞探析》,《考古》2004年第2期;王华:《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攻治技术研究》,山东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6年。

⑥ 其年代目前意见不一,报告认为应介于殷墟二、三期之间(《考古》2004年第2期);孙亚冰、宋镇豪认为接近于殷墟三四期。

⑦ 宋艳波、燕生东:《鲁北地区商代晚期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三十五期,2007年12月。

H129:2,为腹甲,已残,残长5厘米,残宽4.2厘米。钻凿灼兼施,反面留有3个钻凿,凿为弧形,钻为半圆形。

(3) 阳信李屋遗址^①:发现5件卜甲。标本H7:1,为腹甲,仅存甲尾。钻凿灼兼施,腹甲反面留有5个,其排列以千里路为界,均朝向千里路,左右对称。标本H1③:1,为腹甲,已残,仅存右上甲腹,反面留有3个钻凿,凿槽呈长方形,长1.2—1.3厘米,宽0.4—0.5厘米;钻坑为半圆形,较浅。上边1个钻凿向外,下边2个钻凿向内。

4. 前掌大类型

仅在滕州前掌大遗址发现1件卜甲(H14:2)^②,为腹甲,已残,仅留甲腹一块,残长6.2厘米。腹甲反面钻凿灼兼施,凿为弧形,钻为圆形,以千里路为界,钻凿均向千里路,左右对称。

(四) 其他文化

1. 毛家咀类型

仅在汉阳东城垓纱帽山遗址^③发现数件卜甲。标本采:89,为腹甲,已残,经过整治,壳面光滑,在腹甲反面分二行圆钻,规律而整齐。钻凿灼兼施,钻为圆形圆底,坑径约2.5厘米,圆钻坑内有“猫眼状”凿槽。

2. 周梁玉桥类型

(1) 沙市周梁玉桥遗址^④:该遗址H1下层发现10件卜甲,其中腹甲7件,背甲3件;另外有些碎片过于破碎,无法缀合。腹甲保留甲桥,背甲对剖两半。钻坑成圆形,大小不一,坑底有“猫眼状”凿槽,灼痕可见。钻坑的排列,腹甲上大致以千里路为中心成对称关系,对贞关系比较明显。标本H1下:16,为腹甲,基本完整,长20厘米,宽13.1厘米,厚0.4—0.5厘米。均有钻凿灼,千里路两侧各有三竖列,左右对称,密集规整。有圆钻痕53个,钻坑径0.9—1.3厘米,深度0.1—0.2厘米。凿槽每个都在圆钻内的正中或外边,与千里路平行,钻坑内有两个灼点。标本H1下:17,为腹甲,基本完整,长12.5厘米,宽7.4厘米。均有钻凿灼,千里路两侧各有二竖列,左右对称。有圆钻痕7个,钻坑内有一凿槽偏向甲桥方向,很明显。即位于千里路左侧的凿槽,其位置偏向钻坑的左边,位于千里路

① 宋艳波、燕生东:《鲁北地区商代晚期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三十五期,2007年12月。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上、下册),文物出版社,2005年,29、462页,图二一、三二八,图版八、二〇四。

③ 湖北省博物馆:《汉阳东城垓纱帽山遗址调查》,《江汉考古》1987年第3期。

④ 沙市市博物馆:《湖北沙市周梁玉桥遗址试掘简报》,《文物材料丛刊》(10),文物出版社,1987年;彭锦华:《沙市周梁玉桥甲骨的初步研究》,《考古》1986年第4期。

右侧的凿槽,其位置偏向钻坑的右边,以控制兆枝的方向朝向千里路。标本 H1 下:19,为背甲,比较完整,上部稍有缺失,残长 18.9 厘米,宽 8.4 厘米。经过修整,反面残存圆钻痕 30 个,钻坑径 0.9—1.6 厘米。位于圆钻中部偏右的条形凿槽均与中脊线平行,这样所形成的兆纹多数朝向中脊线。钻凿的大小、形状与腹甲基本相同。灼痕及兆纹的形状也都类同腹甲,但一个钻坑内烧灼两次的情况比腹甲要少,正面兆枝也以单向的居多。其形制与洹北商城 A 型卜甲相似。

(2) 江陵荆南寺遗址^①:发现 1 件卜甲(H3:6),为腹甲,比较完整,个体较小。腹甲反面有钻坑 28 个,以千里路为界,两侧各两排,排列密集,似乎左右对称。钻坑为椭圆形,钻坑径 1—1.4 厘米,宽 0.9—1 厘米。其形制与洹北商城 A 型卜甲相似。

3. 路家河文化

(1) 宜昌路家河遗址^②:该遗址第二期文化遗存中发现 3 件卜甲,均为腹甲。皆有圆形钻坑,烧灼痕迹明显,部分坑的反面可见兆纹。标本 T5⑤:22,为右甲尾,下端稍有残缺,残长 7.6 厘米,残宽 6 厘米。腹甲反面有圆形钻坑 15 个,其中 7 个灼痕透过正面。排列密集,兆纹清晰。此外,还有标本 T1③:2;标本 82①:15,残长 3.5 厘米,残宽 2.4 厘米。

报告把出土卜甲的单位都归属于该遗址第二期后段第三年代组,相当于殷墟时期早段。从卜甲的特征来看,这类圆形钻坑的卜甲,郑州二里岗开始出现,到洹北商城时已经消失,即这类卜甲的特征具有郑州二里岗上层一期至洹北商城 A 型之间过渡形态的特征。该卜甲钻坑部分密集,带有较晚的特征。本文暂时归属于中商早期的白家庄期。但由于地域关系,其使用时间可能延续到殷墟一期。

(2) 秭归大梁尾遗址^③:发现 3 件卜甲,均残。其中腹甲 2 件,背甲 1 件。标本 H3:1,为腹甲,仅存甲首和右上甲腹,呈米黄色,个体较小。腹甲反面留有钻坑 15 个,直径 0.6—1.1 厘米,坑内有“猫眼状”凿槽。标本 T21③:3,为背甲,仅存一块,呈米黄色,表面光滑,反面残存钻坑 3 个,其中一个已穿透。

(3) 清江香炉石遗址^④:共发现 15 件卜甲,皆残。该遗址第 6 层发现 3 件卜甲,均为腹甲,皆残。在腹甲反面均有钻凿灼,皆为椭圆形或圆形钻坑,坑内有凿槽,并见施灼的痕迹。标本 T26⑥:8,比较完整,右下甲腹和甲尾残缺,残长 11 厘米,宽 8.5 厘米。腹甲反面有椭圆形钻坑 10 个,左右上甲腹各有 3 个,右下甲腹有 4 个,坑内有凿槽。有 7 个灼点,灼痕透过正面,部分可见兆纹。标本 T26⑥:27,已残,残存左下甲腹一块,残长 3.6 厘米,残宽 4 厘米。腹甲反面残留椭圆形或圆形钻坑 10 个,较密集,有 4 个灼点灼痕透过正

① 荆州地区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江陵荆南寺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89 年第 8 期。

② 长江水利委员会:《宜昌路家河:长江三峡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 年,85 页,图六三,图版二六。

③ 宜昌博物馆:《秭归大梁尾遗址发掘简报》,《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一卷),科学出版社,2003 年,575 页,图一三,图版一四。

④ 湖北省清江隔河岩考古队:《湖北清江香炉石遗址的报告》,《文物》1995 年第 9 期。

面,部分兆纹清晰。标本 T16⑥:21,已残,残存左下甲腹一部分,残长 1.8 厘米,残宽 2.5 厘米。腹甲反面残留圆形和椭圆形的钻坑 6 个,可见灼痕。

第 5 层发现 12 件卜甲,均为腹甲,皆残。均有钻凿灼,钻坑大多为椭圆形,少数则圆形。一般凿槽较深,有少数已凿穿。烧灼痕迹明显,有部分可见兆纹。标本 T25⑤:52,已残,残存甲首(右舌板),残长 3.5 厘米,残宽 2.4 厘米。均有钻凿灼,残留钻坑 4 个,坑为椭圆形 2 个,圆形 2 个。标本 T25⑤:53,已残,残长 4.5 厘米,残宽 2.4 厘米。均有钻凿灼,残留钻坑 10 个,钻坑为椭圆形,坑内留有 5 个灼点,灼痕透过正面,兆纹清晰。

(4) 巴东杨家棚遗址^①:发现 7 件卜甲,皆残。标本 T8③:1,为腹甲,已残,正面光洁,反面有钻坑。标本 T8③:1—1,已残,残长 4.4 厘米,厚 0.6 厘米。反面残留钻坑 13 个,正面有“十”字形兆纹。

(5) 忠县瓦渣地遗址^②:发现 1 件卜甲(T311⑩:2),为腹甲上部,是将龟的腹甲从甲桥处拦腰切割成两半。腹甲反面有圆钻 8 个,以千里路为界,左侧有 3 个,右侧有 5 个,钻坑径 0.5 厘米,正面有兆纹。其年代应相当于商代早期^③。

4. 十二桥文化

(1) 成都抚琴小区遗址^④:发现 2 件卜甲,均为圆钻。标本 86CFT3④:41,为腹甲,已残,残长 12.5 厘米,残宽 12.4 厘米,厚 0.25—0.8 厘米。反面略经整治,正面则未加工修整,保留鳞片,反面仅右边甲薄侧有 3 个圆钻,下面 2 个似为一组,钻坑径 0.75—1 厘米,坑深 0.1—0.2 厘米。坑底呈窝底形,坑内有灼痕。标本 86CFT3④:50,为腹甲,已残,残长 15 厘米,残宽 13.4 厘米,厚 0.3—0.5 厘米。保留有甲桥。反面留有 43 个钻坑,坑形不正圆,坑径大的为 1 厘米,小的为 0.6 厘米,坑深 0.2—0.3 厘米。坑底有窝底形和平底形两种。有的钻坑外围还可见一圈刀刻的圆圈痕,由此推测这种坑的挖凿程序可能是:先用工具刻出 1 个圆圈以确定坑的位置和范围,然后再挖凿治钻坑。钻坑分布较密集,坑的间距从相互重叠至 1.3 厘米不等。坑内的灼痕清晰,圆形,色黑。

(2) 将军衙门成都军区第三招待所工地^⑤:发现 2 件卜甲。标本 86Cjj 采:1,为腹甲,仅留甲首和甲腹上部,残长 7.7 厘米,宽 8.2 厘米,厚 0.3—0.5 厘米。反面稍加整治,外面除边缘外都经修整削平,加工精致,修治规整,两侧还保留甲桥。反面共有 36 个钻坑,坑较少,基本上正圆,坑壁陡,底平,直径 0.6—0.7 厘米,深 0.3—0.6 厘米。坑内大部分未灼,仅靠近甲桥附近的几排少数钻坑内有灼痕。值得注意的是,其排列以千里路为界,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巴东杨家棚汉代遗址发掘简报》,《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二卷),科学出版社,2005 年,291 页,图一一。报告认为该卜甲属于六朝时期,但从其卜甲的特征来看,应属该遗址商周文化层。

②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三峡考古队、忠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忠县瓦渣地遗址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 卷),科学出版社,2003 年,669 页,图版二三。

③ 报告归属于青铜时代(第二期)遗存,相当于西周时期。经笔者观察图版,该卜甲显示出早商卜甲的特点,与郑州二里岗上层一期南关外的卜甲相似,应属于商代。

④ 罗二虎:《成都地区卜甲的初步研究》,《考古》1988 年第 12 期。

⑤ 罗二虎:《成都地区卜甲的初步研究》,《考古》1988 年第 12 期。

左右对称,各有18个,与郑州二里岗上层大致相同。标本86Cjj采:4,为腹甲,仅留甲首和甲腹上部,残长6.2厘米,宽6.2厘米,厚0.35—0.6厘米。整治方式与标本86Cjj采:1大体相同。反面留有29个钻坑,应为成组排列。钻坑径0.6—0.8厘米,深0.2—0.5厘米。坑底有灼痕,灼过的坑反面相对应处大部分有焦黄的灼痕,少数的还有兆纹。

(3) 成都方池街遗址^①:发现8件卜甲,其中龟甲7件,鳖甲1件。分为有钻有灼、有灼无钻两种。钻坑径0.8—1.1厘米。坑壁直而底平,灼痕多呈圆形,钻坑有圆形(属于商代)和方形(属于周代)两种,排列无规律。其中1件长5—5.2厘米,上有灼痕达40多个,有的仅有10余个,宽2—9厘米不等。

(4) 成都十二桥遗址^②:共发现5件卜甲,均为腹甲。该遗址第8层发现1件卜甲(T102⑧:47),为腹甲残块,反面未见削治痕迹,残存12个钻坑,圆形平底,直径0.8—0.9厘米,坑深0.3—0.4厘米,坑内有灼痕。该遗址第7层发现4件卜甲,均为腹甲。标本T303⑦:16,比较完整,甲首残,残长19.2厘米,复原宽18厘米。有明显的锯、削、刮、磨等加工痕迹。锯掉了甲桥,腹甲反面和周边经过削治,正面经过刮磨。反面有圆形钻坑,坑底平,坑内有灼痕,许多已灼透,正面显出焦黄色。钻坑明显分成7组,每组坑数量不等,左右甲尾的两组数量少,分别为6、6(或7)个,最多的一组在中部,为25个,有两组位于残断处,数量不清。圆坑直径一般在0.7—1.1厘米,以0.8厘米左右居多,坑深0.2—0.6厘米,以0.4厘米左右者居多,圆坑基本未穿。标本T303⑦:67,仅存右甲尾,残长9.6厘米,残宽5.4厘米。反面留有钻坑2个,坑已穿。标本T303⑦:27,仅存甲首,残长9.3厘米,残宽5.8厘米,个体较小。反面残断处残存圆钻坑2个,有灼痕。T303⑦:23,残存腹甲一块,残长9厘米,残宽8.6厘米,个体较大。未见整治痕迹,直接施灼,灼痕较大,能看出有11个,小者直径1.5厘米,大者直径2.4厘米。

二、周 代

(一) 周 文 化

1. 西周早期

(1) 岐山凤雏遗址^③:H11的灰坑内出土卜甲16700多片,均为龟腹甲;H31没分卜

① 周尔泰:《成都市方池街古文化遗址初探》,《四川文物》2003年第1期。

②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十二桥遗址新一村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2)》,科学出版社,2004年,181、189页,图一〇、一八。报告认为第8层的年代约相当于西周晚期;第7层的年代约相当于春秋早期。但从卜甲的特征来看,均为圆形钻坑,平底,具有商代中期的特征,本文暂归属商代中晚期。但也不排除该类圆形钻坑延续时间较长,可能使用到西周中期。

③ 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发掘简报》与《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第10期;陕西周原考古队、周原岐山文管所:《岐山凤雏村两次发现周初甲骨文》,《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3期;曹玮:《周原甲骨文》,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1—11页。

骨和卜甲,无法知道数量。卜甲绝大多数为腹甲,钻凿灼兼施。方钻大者长0.9—1.8厘米,宽比长短1—3毫米;最小者长0.9厘米,宽0.7厘米。凿槽偏于钻坑的一边,并与钻坑等长,少数长于钻坑^①。《周原甲骨文》一书中带字的卜甲,除齐家遗址出土的卜甲外,凿槽均长于钻坑。标本H11:1,为腹甲,仅存甲腹一块,残长2厘米,残宽1.7厘米。反面残存钻凿2个,钻为半圆形,凿为长方形。标本H11:6,为卜甲,仅存甲腹一块,残长1.9厘米,残宽2.9厘米。反面残存钻凿4个,钻为方形平底,凿为长方形,凿槽长于钻坑。徐锡台文章提供的7件,均为方钻方凿,凿槽皆与钻坑等长,如标本014、015、017、018、020、032。

根据徐锡台提供的材料看,多数卜甲凿槽偏于钻坑的一边,并与钻坑等长,该特征应为西周中期的特征,少数长于钻坑,该特征为先周晚期至西周早期的特征。《周原甲骨文》一书中岐山凤雏遗址出土的带字卜甲,除齐家遗址出土的卜甲外,凿槽均长于钻坑,可知应属于先周晚期至西周早期。“圆钻方凿”者较少,为文王时期,“方钻方凿”者多见,属于西周早期。综上所述,该遗址所出土的卜甲,绝大多数属西周中期,少数属先周和西周早期。

(2) 岐山周公庙遗址^②:发现500余件卜甲。2003年底,发现5件(两片有字)卜甲,其年代约为商周之际(武王时期);2004年发现500多件(99片有字)卜甲,绝大多数为腹甲,其年代约西周早期(成王时期)。标本03C10④:1,为背甲的右侧下部,残长19.6厘米,最宽处11.6厘米。反面经锯削和锉磨处理,钻凿灼兼施,残存钻凿17个,分布情况为:反面第3右肋甲(D3)1个(残),第4右肋甲(D4)6个(残),第5右肋甲(D5)4个,第6右肋甲(D6)3个(残2),第7右肋甲(D7)3个(残2)。钻多呈方形或长方形,长、宽为0.8—0.9厘米。以龟脊为中心,在钻之外侧有长方形凿,凿宽于钻,宽1.4—1.5厘米,断面呈楔形,凿底部深于钻底。在部分钻内可见灼痕,正面有兆纹和卜辞两条17字。标本03C10④:2,为背甲的右侧上部少半,残长9厘米,最宽处9.8厘米。反面经锯削和锉磨处理,在颈甲(A)上施一圆钻,直径1厘米,深0.6厘米。第1右肋甲(D1)上有1个钻凿,最初加工成椭圆形,圜底,长径2.3厘米,宽1.2厘米,外侧施凿,长1.5厘米。第2右肋甲(D2)上残存钻凿2个,方钻内均有灼痕,正面可见兆纹和卜辞两条39字。标本04H1①c:40,为腹甲,仅留甲尾,残长10.2厘米,残宽13.8厘米。反面经过削平,较厚,方钻方凿,方钻转角多圆折,凿槽均长于钻坑。钻凿左右下甲尾各有1个,上部两行左右各三排6个,每一行3个,以千里路为界对称。左下甲尾(C4)有多余的凿槽1个,可能为先做凿槽,后做钻坑的例子。标本04H1(17):89+0229,为腹甲,仅存右甲尾,残长8.4厘米,残

① 徐锡台:《周原出土甲骨的字型与孔型》,《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

② 周原考古队:《2003年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调查报告》,《古代文明》(第5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151—186页;徐天进:《周公庙遗址考古调查的缘起及其学术意义》,《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二十一期,2004年6月;边江、冯国:《周公庙遗址出土甲骨发现文字近500字》,新华网,2005年02月16日。这一批材料尚未正式公布,笔者曾在陕西周公庙亲自参与整理。

宽6厘米。反面留有钻凿5个,其中左上甲尾(C3)有2个,左下甲腹下段(B8)有3个(皆残),凿槽均长于钻坑,正面可见兆纹和卜辞36字。标本04H1:0112,为腹甲,皆残甲腹一块,残长6.5厘米,残宽11.1厘米。方钻方凿,方钻转角多圆折,凿槽均长于钻坑。反面钻凿以千里路为界,各三排,方钻均在方凿的内侧,左右对称。标本04H1(16):424,为腹甲,仅存右下甲桥,残长3.3厘米,残宽9厘米。反面2个钻凿完整,钻在凿的外侧;4个皆残留凿的一半,但能推测钻均在凿的内侧。正面可见兆纹、刻画线和卜辞24字。

(3) 长安张家坡遗址^①:发现10件卜甲,其中5片是龟的腹甲,另5片是鳖的腹甲。腹甲反面经过修磨,兼施方钻方凿,方钻平底而浅,方钻的外侧均有钻凿,成为一条细沟。钻凿排列很整齐,以千里路为界,左右对贞。另外,还有1件直接灼于骨面的。标本T141:④C:12,为腹甲,残存甲首和左右上甲腹的一部分,残留钻凿10个,方钻方凿。

(4) 洛阳泰山庙遗址^②:发现1件卜甲,为龟腹甲,仅存甲首和上甲腹。甲首甲骨掏挖,腹甲反面钻凿灼兼施,为方钻方凿,排列以千里路为界,左右对称。甲首中间有圆钻坑一个。原报告认为该遗址为殷遗址,但从卜甲的钻凿形态特征看,应属于西周。

(5) 洛阳北窑遗址^③:发现24件卜甲,其中腹甲22件,背甲2件。标本T3H83:14+T3H90:3+T3H83:8,为腹甲,不同坑的三块缀合而成,保留甲尾和左甲桥,残长23.5厘米,残宽15.2厘米。甲尾部分,削磨平整,厚薄一致,方钻转角方折。钻凿于千里路左右对称,排列规律而松散。左甲尾部分,与背甲相连处是锯开的,锯痕光平,锯开后形成的桥上下角尖切去,边缘削平,内面磨光。甲桥上纵列两行钻凿,各5个,自上而下除第二横列的兆枝是一致指向千里路外,余皆两两相对。钻坑为1.2×0.9厘米见方,方钻浅平,转角多圆折,深1毫米左右。在甲桥上下两端边缘钻有一小圆形透孔,坑径2毫米。标本T3H83:16,为腹甲,仅存甲桥一段,残长7.3厘米,残宽5.2厘米。反面残存钻凿2个,还有一道已凿好的凿槽,这槽旁边无钻,由此可推测大概在龟甲上是先作凿槽,再作钻坑的。标本T28⑤:1,为腹甲,仅留甲首,残长7.4厘米,残宽9.5厘米。甲首经掏挖,留下“Λ”形的前边,其下削磨平整。折断处残留钻凿4个,左右对贞。反面右上甲腹的上端有一个半球形的凹穴,径0.9厘米,深0.4厘米。标本T25H238:1,为腹甲,仅留甲首,残长6.3厘米,宽8.6厘米。甲首掏挖后留下半圆形的前边,甲首前边中间有一长方形浅穴,长1.0厘米,宽0.8厘米,深0.3厘米,上口略大,平底,比一般的方钻小而深。反面残存钻凿4个。标本T22③:1,为腹甲,仅存甲尾和下甲腹下段,残长8.5厘米,残宽10厘米。经过整治,反面残存钻凿15个,方钻转角多圆折,钻坑大的长1.7厘米,宽1.3厘米,小的长1.1厘米,宽0.8厘米。排列以千里路为界左右对贞,兆枝向内。标本T3H83:4,为腹甲,

①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张家坡西周遗址的重要发现》,《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3期;《陕西长安沣西张家坡西周遗址的发掘》,《考古》1964年第9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111页,图七〇,图版陆叁。

② 郭宝钧、林寿晋:《一九五二年秋季洛阳东郊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9册,1955年。

③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1975—1979年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的发掘》,《考古》1983年第5期;赵振华:《洛阳两周卜用甲骨的初步考察》,《考古》1985年第4期。

仅存右甲尾,残长7.7厘米,残宽6.5厘米。反面未经削治,上有钻凿1个,钻坑长1.8厘米,宽1.3厘米,深0.7厘米,兆枝向内,是卜甲中钻坑最大最深的一例。标本T3H94:1,为腹甲,仅存甲腹一块,残长8.8厘米,残宽5.2厘米。反面残存钻凿22个,钻坑大小一致,保持在 1.3×1.3 厘米见方。方钻很浅,深不足1毫米,转角圆折,平底。排列较密集和有规律,灼痕位于钻坑中心,呈圆形或椭圆形,径0.5厘米左右。

标本T3H83:11为左背甲,已残,只留背甲的上段,残长14.5厘米,残宽10.6厘米。反面残留横列二排的钻凿5个,方钻深约1毫米,方凿长于方钻,横断面呈“V”形,较深。钻坑长0.9—1.1厘米,宽度不明。灼痕呈焦黑状圆点,径0.5厘米。标本T3H83:12,为右背甲,已残,只留背甲的上段,残长8厘米,残宽8厘米。反面残留钻凿1个。此两块是同一背甲沿中脊锯开对剖为二的。甲首及中脊骨质较厚均依背甲的弧面削薄,使之比肋骨稍厚而已,正面亦经刮过,外缘与甲桥相连处锯痕平直^①。标本LL采:2,为背甲,仅存上部,残长10.8厘米,残宽9.2厘米。修治粗糙,仅在反面骨质较厚处略施刮削。未从中脊锯开,当是整体使用的。见有钻凿2个。

(6) 安阳殷墟遗址^②:发现1件“易卦”卜甲,为腹甲,比较完整,甲尾缺失,残长22.5厘米,宽21.6厘米。甲首经过掏挖,留有宽厚的边缘,甲桥基本保留,前后尖突部分被切锯,甲桥与甲腹相连部分呈锐角,转角十分明显。凿均为长方形,钻呈圆形或椭圆形,转角一般近圆、个别近方,灼的面积比较大,也很规整。反面共有钻凿93个。其排列,内板3个,上边1个钻在凿左侧,下边2个钻在凿的外侧,方向相反;左、右舌板各2个,钻在凿的内侧,均朝向里边;左右甲腹各三排60个,钻在凿的内侧,均朝向千里路,左右对贞;左右甲桥内侧一排各有8个,钻在凿的外侧,左右甲桥外侧一排各有5个,钻在凿的内侧,甲桥内、外侧排列,左右相对。甲腹中部的钻凿,凿长一般为1.4—1.5厘米,宽0.5厘米,深0.4厘米,钻横宽0.7—0.9厘米。钻凿的大小因位置不同而存在差异,甲首和甲尾的钻凿和甲腹相比,略大而深。其特征呈现出从殷墟至西周卜甲的过渡形态。其年代应为商周之际,很可能属西周早期前段。

(7) 登封王城岗遗址^③:发现3件卜甲,标本WT26H58:2、10、11,背甲的反面有钻凿痕^④。

(8) 房山琉璃河燕都遗址^⑤:发现数十件卜甲,均为腹甲,其中3件上刻有文字。标本G11H108^①:5,为甲腹残片,残长3.3厘米,残宽1.8厘米。反面残留方钻方凿5个,灼

① 报告认为这两块背甲上的兆枝各自向外(边缘),与腹甲的向内,恰好相反。如确实这样也许是新出现的特殊现象,但两块背甲上的钻凿几乎残缺,无法判断。据笔者目前所知的卜甲材料来看,尚未见类似的钻凿排列。笔者按常见的西周时期背甲的钻凿排列,认为以齿缝为界,在一块肋版内应当有横列两排6个钻凿,其兆枝均向内(中脊)。

② 肖楠:《安阳殷墟发现“易卦”卜甲》,《考古》1989年第1期。

③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183页,图版六六。

④ 因报告图版不清晰,文字描述也过于简单,本文无法详细说明。

⑤ 琉璃河考古队:《琉璃河遗址1996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6期;《北京琉璃河遗址发掘又获重大收获》,《中国文物报》1997年1月12日;雷兴山、郑文兰、王鑫:《北京琉璃河遗址新出土骨浅识》,《中国文物报》1997年3月30日。

痕明显,正面刻有“其彳□□”四字。标本 G11H108③:10,为右甲尾残片,残长 4.2 厘米,残宽 3.9 厘米。反面残留方钻方凿 2 个,灼痕明显,正面刻有“用贞”二字。标本 G11H108①:4,为甲首部分,残长 7.1 厘米,残宽 10.4 厘米。反面经过掏挖修整,留有宽约 0.5 厘米的边棱,边棱正中,即甲首正中凿一小坑,边棱以内残留方钻方凿 7 个,灼痕明显,正面刻有“成周”二字。从龟甲形状及个体大小来看,这 3 片甲骨至少分属两个个体。

2. 西周中晚期

(1) 扶风齐家遗址①:发现 16 件卜甲,有刻辞的 1 片。标本 H3②:1,为腹甲,较完整,仅缺甲桥和甲尾,残长 19.5 厘米,残宽 11.1 厘米。甲首反面经过掏挖,形成半圆形的前边,残留钻凿 47 个,基本呈方钻方凿,方钻在方凿的内侧,以千里路为界,左右对称,钻坑内均有灼痕。正面的兆枝均向千里路,有卜辞六行 23 字,均守兆,横向纵行。标本 M47:1,为腹甲,比较完整,仅缺甲尾,残长约 22 厘米,宽 22.5 厘米。甲首略经掏挖,留下半圆形前边。左右甲桥保留较多,经过削割,甲桥的前后两端各有小圆穿孔,腹甲反面有方钻方凿 50 多个位于千里路两侧,基本对称,排列比较整齐。甲首前边内中间有一小方形浅穴。方钻内有灼痕,正面的兆枝均向千里路。左右下甲桥内侧的钻凿 4 个,方向与甲腹的钻凿相反,正面的兆枝也背向千里路。标本 M47:2,为腹甲,比较完整,仅缺甲尾,残长 17 厘米,宽 17 厘米。甲首未经掏挖,没有前边,反面骨脊只略微削平,甲桥经切削加工,没有小圆穿孔。甲首前边中间有一长方形浅穴。残存方钻方凿 40 多个,与 M47:1 大致相同。此外,还有 T1H3:2、H3:4、采:5。

(2) 扶风李家遗址②:发现 1 件卜甲(H97:9),为腹甲,仅存右甲尾一块,残长 3.8 厘米,残宽 3 厘米。略加修整,腹甲反面残存钻凿 5 个,钻为方形,钻坑内左侧有“猫眼状”凿槽。右上边还有小钻孔 4 个,可能腹甲断开,用绳子缀合。H97 的年代属西周晚期。

(3) 长安张家坡墓地③:发现 9 件卜甲,均为腹甲,分别出于 M2、M196 和 M204 三座墓中,其中 5 件出于 M2 中。卜甲都经过整治,腹甲反面均有方钻方凿,有灼痕,正面有兆纹。标本 M2:35:3,比较完整,甲尾和右上甲腹残缺,复原长约 25 厘米,宽 15 厘米,被染成绿色。腹甲反面有方钻方凿十行,以千里路为界左右各五行,左右甲腹六条钻凿数较多,现存每行都在 10 个左右。方钻按千里路分左在右侧,右在左侧,只有甲桥最外边的一行相反。标本 M2:35:5,右下甲腹和右甲尾残缺,长 25 厘米,部分被染成绿色。腹甲反面有方钻方凿八行,每行钻凿数不等,最多的一行有 10 个。其形制前同。标本 M2:35:4,比较完整,甲首残缺,复原长约 25 厘米,部分染成绿色。腹甲反面中部以下有四行方钻方

① 陕西西周原考古队:《扶风县齐家村西周甲骨发掘简报》,《文物》1981 年第 9 期;罗西章、王均显:《周原扶风地区出土西周甲骨的初步认识》,《文物》1987 年第 2 期。

② 周原考古队:《2003 年秋周原遗址(Ⅳ B2 区与Ⅳ B3 区)的发掘》,《古代文明》(第 3 卷),文物出版社,2004 年。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年,317 页,图版 189—19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沔西队:《1987、1991 年陕西长安张家坡的发掘》,《考古》1994 年第 10 期。

凿,中间两行有7个,外侧两行各有1个钻凿。标本 M2:35:1,右下甲腹和内板残缺,长25厘米。腹甲反面仅存两行方钻方凿,中间一行有8个,外侧一行只有1个。标本 M2:35:2,右下甲腹和右甲尾残缺,长25.5厘米,部分染成绿色。腹甲反面右半下部有一行3个方钻方凿。标本 M196:6和标本 M204:028,皆出于两座相邻的较大的竖穴墓中,墓都被盗,卜甲也皆为残片,而形制与 M2 的卜甲相同。标本 H1:1,为腹甲,已残,只留甲尾,残长6厘米,残宽5.5厘米,钻凿灼兼施,腹甲反面残存钻凿11个。

其年代,除 M204 属于该遗址第四期(相当于夷厉共和时期)外,M2 和 M196 被盗,缺少可资判断年代的陶器或铜器,年代不明。从卜甲的特点来看,应属于西周中晚期。

此外,该墓地发现8件龟的背甲,虽然经过整治,反面的中脊削平,两侧经锯磨,但都无钻凿,也未施灼。本文未将其归入卜用甲骨。

(4) 洛阳西干沟遗址^①:在 H815 中出土2件卜甲,皆残。有灼,有方钻方凿,方凿的长度,比方钻稍微长或一样大,其中1块上有钻坑1个。此外,在 T846^⑤中尚发现1块已经经过整治而尚未使用的龟腹甲。其年代应属于西周中期。

(5) 昌平白浮木椁墓^②:在2、3号墓中发现100多件卜甲,皆残。其中 M2 在人骨的左上方发现数十片残碎卜甲,既有腹甲,也有背甲。契刻文字两小片,有“贞”、“不止”刻辞。甲片均经过修磨,有方钻方凿。M3 在椁室右侧中部出龟背、腹甲,从残片看数量比 M2 多,约在百片以上。卜甲的反面都经过整治,有方钻方凿,钻凿排列十分整齐,并有灼痕。其中一片刻“其祀”二字;一片刻“其尚上下韦馭”。此外,还有一片上刻“史告”等字样。

(6) 浙川下王岗遗址^③:发现5件卜甲,皆残。标本 T4^①:10,为腹甲,在腹甲反面磨平后,挖数行方形平底浅钻,并在底面的一端又挖一浅凿,钻凿排列有序。标本 T14^①:9,有圆形钻,有的钻底有“猫眼状”凿槽,钻凿排列整齐。从卜甲的特征来看,和沙市周梁玉桥遗址的卜甲相似,标本 T4^①:10 具有西周中晚期卜甲的特点;标本 T14^①:9 具有中商至殷墟早期卜甲的特点。

3. 东周时期

洛阳东周王城遗址^④:发现5件卜甲,皆残,其中腹甲2件,背甲3件。标本 LCT1H9:1,为腹甲,残存一块,残长3.7厘米,残宽2.5厘米。经过修磨,反面残留方形钻凿11个,密集而规整。钻坑间的界格呈“井”字形,间距2毫米,横列较纵列更为整齐。钻坑横宽与纵长都在5—6毫米之间,基本为正方形。坑壁垂直向下,最深3.5毫米,最浅1毫米,平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报告——1955~1960年洛阳涧滨考古发掘资料》,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99页,图版四八。

② 北京市文管处:《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考古》1976年第4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燕山出版社,1990年,49页。

③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浙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331页。

④ 赵振华:《洛阳两周卜用甲骨的初步考察》,《考古》1985年第4期。

底。底壁厚度均小于1毫米,置光下呈透亮的方坑。凿槽在坑底,紧贴坑底内壁,宽度和深度均在0.5毫米左右。横断面呈“V”形。多数灼痕不明显,兆枝的方向一致,当是向内的。标本 LCT1H9:2,为腹甲,残存一块,残长6.3厘米,残宽4.1厘米。略加修整,残留方形钻凿13个,横列成四排,下二排很整齐。钻坑深浅不一,最深7.5毫米,最浅2毫米。深坑壁向内斜收,口大底小呈头形。灼痕多不明显,兆枝向内。标本 LCT1H9:3,为背甲,残存一块,残长5.4厘米,残宽3.7厘米。横截面呈弯曲体状,外缘较薄似刃。两面都很光滑,锯痕平直。残留方形钻坑6个,大坑7毫米见方,小坑5毫米见方,坑壁垂直。兆枝均向内。标本 LCT1H9:4,为背甲,残存一块,残长4.5厘米,残宽4.4厘米。正面拱起,反面平整,残留钻坑4个,余如 LCT1H9:3。

(二) 其他文化

1. 早期楚文化

(1) 襄樊真武山遗址^①:共发现18件甲骨,其中包含卜甲,分为腹甲和背甲,未公布数量。背甲在反面经挖修整,周边挫磨平整,正面则未经加工。标本 T1③:2,为腹甲,已残,只留左下甲腹,残长5.7厘米。甲桥有保留,钻坑较大,窝中部均有竖槽,一处钻为横向分布。标本 H81:6,为背甲,基本完整,长16.1厘米,宽10.6厘米。背甲反面以千里路为界,两侧各有10排钻坑,排列有一定规律,一般以二、三、四个为一组,骨厚处则钻深,有的钻坑有不明显的竖槽。另在右上角有方钻1个。标本 H45:2,为背甲,比较完整,残长16厘米,经过修整,但未施钻灼。

(2) 宜城肖家岭遗址^②:发现1件卜甲(H22④:3),为腹甲,右甲腹一块,甲桥残断,残长6厘米,残宽4.2厘米。正面经烧烤,反面经挖削。反面施双联钻,无灼、兆纹痕迹。双钻相连处经修治,钻壁平直,甲厚处则施钻较深,钻坑中部有小竖刻槽。

(3) 信阳孙砦遗址^③:共发现9件卜甲,反面多经修整,并有钻、灼痕迹。标本 H3:92,为腹甲,比较完整,甲尾已残缺,残长13厘米,宽11厘米。腹甲反面施钻灼,钻为双联钻,以千里路为界,左右两侧各有五行钻灼痕迹,正面可见兆纹。标本 H3:14,比较完整,甲尾已残缺,残长11厘米,宽9厘米。甲桥经过修整。左右上甲腹共有13个钻灼痕,除左上甲腹下端的横向排列整齐外,其他皆无规律,且右上甲腹的钻灼痕呈横长圆形。左右下甲腹钻灼痕的排列亦不整齐,也有呈“凸”形的。此外,标本 H4:6,为背甲,较完整^④。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博物馆:《湖北襄樊真武山周代遗址》,《考古学集刊》第九集,1995年,158页,图十七。

②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宜城县博物馆:《湖北宜城县肖家岭遗址的发掘》,《文物》1999年第1期。

③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孙砦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9年第2期。

④ 报告提供的四件图版中,H4:6,为背甲,H7:18,为腹甲,均较完整,但图版均正面,且报告没有文字描述,无法探讨,本文只说明如背甲施钻灼,背甲用整块,未切一半等。

2. 麻柳沱文化

(1) 沙市周梁玉桥遗址^①:发现2件卜甲,均为腹甲。每片上只残留1个钻坑,方钻内有“猫眼状”凿槽,钻凿灼兼施。标本 T2③:6,为右上甲腹,残长5厘米,残宽4.4厘米,靠近右甲桥处有刀削痕迹。甲板上保存1个完整的长方形钻坑,坑长1.4厘米,宽1厘米,深0.12厘米;凿槽长0.8厘米,宽0.15厘米,深0.12厘米;烧灼点呈不规则的圆形,最大直径为0.9厘米;正面“卜”字形兆纹清晰可见。标本 T2③:7,为左甲腹,残长4.9厘米,残宽2.8厘米。其上的1个钻坑已残缺,应比前1件卜甲的钻坑大,残长0.8厘米,宽1.7厘米,深0.15厘米;凿槽长1.4厘米,残宽0.12厘米,深0.13厘米;烧灼点也已残缺,仅见凿右侧烧焦的小黑点。其年代应属于西周中期。

(2) 江陵梅槐桥遗址^②:发现1件卜甲(T3⑤:50),为腹甲,仅存腹甲上段,残长7.7厘米,宽8.7厘米。腹甲反面以千里路为对称轴,对钻长方形钻,连成1个大长方形钻,平底,钻长5.6厘米,窄边1.2厘米。再于近两条窄边之处各竖刻一刀与二边平行。该遗址卜甲的形制虽然较特别,但从其特征来看应属西周晚期^③。

(3) 清江香炉石遗址^④:该遗址第4层发现卜甲5件,腹甲4件,背甲1件,皆残。均有钻凿灼,钻坑为长方形,皆有凿槽,烧灼痕迹明显,有的可见兆纹。标本 T10④:224,残存左甲尾,残长4厘米,残宽9.5厘米,残留钻坑14个,为长方形钻,灼痕不明显。标本 T8④:52,残存背甲一块^⑤,残长6厘米,残宽3厘米。均有钻凿灼,残留钻坑16个,均为长方形钻,坑内可见5个灼点,灼痕未能透过正面。

(4) 秭归鲢鱼山遗址^⑥:发现数件卜甲,腹甲反面有方钻,钻的排列较整齐,灼痕不显。

(5) 秭归石门嘴遗址^⑦:发现6件卜甲,均为腹甲。除个别的圆钻和方钻外,其余均长方形钻坑,坑内有凿槽和灼痕,正面可见兆纹。报告认为其种属为文化地平龟(Terrapene Culturalia)。

(6) 永顺不二门遗址^⑧:发现5件卜甲,其中腹甲3件,背甲2件。卜甲反面的粗糙面上凿出方形钻坑,再沿方坑的对角线刻槽,有的有较明显的黑色烧灼痕迹,正面可见兆纹。标本 T2⑤:3,为腹甲,残长12.6厘米。标本 T2③:1,为背甲,残长4厘米。标本 T6③:6,

① 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湖北沙市周梁玉桥遗址1987年的发掘》,《考古》2004年第9期。

② 湖北荆州地区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江陵梅槐桥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9期。

③ 报告认为属于商代晚期,但目前所知,西周中期以前,未见方钻内有“猫眼状”凿槽的例子。西周中、晚期普遍流行方钻内“猫眼状”凿槽的形制,该卜甲应是方钻内“猫眼状凿槽”的一个变形,其年代也应当与西周晚期相当。

④ 湖北省清江隔河岩考古队:《湖北清江香炉石遗址的报告》,《文物》1995年第9期。

⑤ 报告认为 T8④:52,为腹甲,经笔者仔细观察线图和图版,两个齿缝之间的距离很窄,具有背甲的特点。

⑥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组:《长江西陵峡考古调查与试掘》,《考古》1961年第5期。

⑦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秭归石门嘴遗址发掘》,《考古学报》2004年第4期。

⑧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自治州文物管理处:《湘西永顺不二门发掘报告》,《湖南考古(2002)》,117页,图24。

为腹甲,残长4.1厘米。标本00T②:6,为背甲,残长6.3厘米。标本采集:4,为腹甲,方坑内有黑灼点,残长8.7厘米。

(7) 巫山双堰塘遗址①:发现4件卜甲,均为腹甲,皆残。标本T439⑤A:27—1,已残,残长4.8厘米,残宽3.7厘米,腹甲反面残存方钻2个,钻内有凿槽。标本T439⑤A:27—2,已残,残长4.9厘米,残宽3.4厘米,反面残存圆钻或圆角方钻共7个,钻内有一条形凿槽。标本T477⑤A:27,已残,残长3.1厘米,残宽2.5厘米,反面残存圆角方钻共5个。标本T429⑤A:19,已残,残长3.5厘米,残宽3.5厘米,反面残存方钻4个,钻内有一条形凿槽。应属于西周中、晚期。

(8) 万州麻柳沱遗址②:发现较多的卜甲,均为腹甲。反面施长方钻或圆钻,钻坑周围有明显的加工修整痕迹。钻坑内都有一条形凿槽,个别坑已凿挖透空。有的有灼痕,并留有较黑泛黄的灼斑,正面均有兆纹。标本A区T2④A:23,已残,仅存右甲尾。腹甲反面留有钻凿7个,钻坑为长方形和圆形,平底,坑周围有削痕。圆坑径约1.5厘米,长方坑长1.8厘米,宽1.4厘米,深约0.5厘米。坑内都有一条形凿槽,有的有灼痕,并留有焦黑斑迹。标本A区T2③:14,已残,仅存左甲首和左上甲腹,反面残存长方和圆形钻坑4个,钻坑内均有一条形凿槽。标本H6:38,已残,仅存右甲尾和右下甲腹,残长13.1厘米,残宽10.2厘米。腹甲反面残留钻坑11个,钻坑大小不一,一般钻长2.6厘米,钻宽1.3厘米。长方形钻坑内均有一条形凿槽。属干东周时期(战国中晚期)。

3. 十二桥文化

(1) 成都青羊宫遗址③:该遗址第6层发现17片卜甲。青羊宫遗址第6层的年代为西周晚期或稍早④。

(2) 成都指挥街遗址⑤:发现几件卜甲。标本86CZT⑥:167,为腹甲,已残,残长8.2厘米,宽5.9厘米,厚0.4—1.1厘米,仅见3个残钻坑。根据现有卜甲观察,坑的制作程序可能是,先钻一个较大的、呈窝状的圆坑,然后再在圆坑中部凿一长方形坑。根据残坑推测,外圆坑直径约2.3厘米,内长方坑的长边约1.1—1.3厘米,宽边长度不详,坑深约0.65厘米。施灼情况不详。标本86CZT2⑥:48,为腹甲,仅存甲尾,残长12.3厘米,残宽19.4厘米,厚0.3—0.8厘米,个体较大。两面都经刮削整治,修整较为精致。反面现存33个钻坑,为长方形,较浅。坑大小不一;大的有的长1.6厘米,宽0.8厘米,有的长2厘米,宽0.6厘米;小的有的仅长0.9厘米,宽0.6厘米。坑底中部都有一条凿槽。槽的走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巫山双堰塘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卷),科学出版社,2006年,119页,图二九。

② 重庆市博物馆、万州区文管所、复旦大学文博系:《万州麻柳沱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555、556页,图一八;重庆市博物馆、复旦大学文博系:《万州麻柳沱遗址考古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卷),科学出版社,2006年,514页,图十五。

③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青羊宫遗址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6年第2期。

④ 罗二虎:《成都地区卜甲的初步研究》,《考古》1988年第12期。

⑤ 罗二虎:《成都地区卜甲的初步研究》,《考古》1988年第12期。

向基本上都与坑的长边相垂直,但也有个别的与长边平行。槽的长度有的与坑的宽度相当,有的则仅坑宽度的一半左右,与长边平行的槽则长于坑的宽度。均有灼痕,大而清晰,正面可见兆纹。标本 86CZT1⑤:36,已残,仅见两个钻坑,坑特大,大的长 2 厘米,宽 1 厘米,小的也长 1.7 厘米,宽 1 厘米,均有凿槽、灼痕。

(3) 成都方池街遗址^①:该遗址出土的卜甲中具有方形钻的应属周代。

(4) 成都岷山饭店遗址^②:发现 1 件卜甲。标本 86CMFT1⑥:62,已残,残长 5.8 厘米,宽 4.6 厘米。反面现存 5 个长方形钻坑,其中 2 个略呈梯形。坑的长边 1.3—1.7 厘米,宽边 0.6—1 厘米。其中 2 个钻坑内有凿槽,均有灼痕。

① 周尔泰:《成都市方池街古文化遗址初探》,《四川文物》2003 年第 1 期。

② 罗二虎:《成都地区卜甲的初步研究》,《考古》1988 年第 12 期。

附录三 《史记·龟策列传》

一、“卜”类条例

1. 卜先以造灼钻，钻中已，又灼龟首，各三；又复灼所钻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各三。即以造三周龟，祝曰：“假之玉灵夫子。夫子玉灵，荆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于天，下行于渊，诸灵数籀，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贞。某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发乡我身长大，首足收人皆上偶。不得，发乡我身挫折，中外不相应，首足灭去。”

2. 灵龟卜祝曰：“假之灵龟，五巫五灵，不如神龟之灵，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贞，某欲求某物。即得也，头见足发，内外相应；即不得也，头仰足胗，内外自垂。可得占。”

3. 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开，内外交骇，身节折；不死，首仰足胗。”卜病者崇曰：“今病有祟无呈，无祟有呈。兆有中祟有内，外祟有外。”

4. 卜系者出不出。不出，横吉安；若出，足开首仰有外。

5. 卜求财物，其所当得。得，首仰足开，内外相应；即不得，呈兆首仰足胗。

6. 卜有卖若买臣妾马牛。得之，首仰足开，内外相应；不得，首仰足胗，呈兆若横吉安。

7. 卜击盗聚若干人，在某所，今某将卒若干人，往击之。当胜，首仰足开身正，内自桥，外下；不胜，足胗首仰，身首内下外高。

8. 卜求当行不行。行，首足开；不行，足胗首仰，若横吉安，安不行。

9. 卜往击盗，当见不见。见，首仰足胗有外；不见，足开首仰。

10. 卜往候盗，见不见。见，首仰足胗，胗胜有外；不见，足开首仰。

11. 卜闻盗来不来。来，外高内下，足胗首仰；不来，足开首仰，若横吉安，期之自次。

12. 卜迁徙去官不去。去，足开有胗外首仰；不去，自去，即足胗，呈兆若横吉安。

13. 卜居官尚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横吉安；不吉，身节折，首仰足开。

14. 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横吉安；不吉，身节折，首仰足开。

15. 卜岁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开，内外自桥外自垂；不孰，足胗首仰有外。

16. 卜岁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胗，身节有强外；不疫，身正首仰足开。

17. 卜岁中有兵无兵。无兵，呈兆若横吉安；有兵，首仰足开，身作外强情。

18. 卜见贵人吉不吉。吉，足开首仰，身正，内自桥；不吉，首仰，身节折，足胗有外，若无渔。

19. 卜请谒于人得不得。得，首仰足开，内自桥；不得，首仰足胛有外。
20. 卜追亡人当得不得。得，首仰足胛，内外相应；不得，首仰足开，若横吉安。
21. 卜渔猎得不得。得，首仰足开，内外相应；不得，足胛首仰，若横吉安。
22. 卜行遇盗不遇。遇，首仰足开，身节折，外高内下；不遇，呈兆。
23.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内下；不雨，首仰足开，若横吉安。
24. 卜天雨霁不霁。霁，呈兆足开首仰；不霁，横吉。

二、“命曰”类条例

1. 命曰横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日瘳，不死。系者重罪不出，轻罪环出；过一日不出，久毋伤也。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一日环得；过一日不得。（不得）行者不行。来者环至；过食时不至，不来。击盗不行，行不遇；闻盗不来。徙官不徙。居官家室皆吉。岁稼不孰。民疾疫无疾。岁中无兵。见人行，不行不喜。请谒人不行不得。追亡人渔猎不得。行不遇盗。雨不雨。霁不霁。

2.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系者出。行者行。来者来。市买得。追亡人得，过一日不得。问行者不到。

3. 命曰柱彻。卜病不死。系者出。行者行。来者来。（而）市买不得。忧者毋忧。追亡人不得。

4. 命曰首仰足胛有内无外。占病，病甚不死。系者解。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不得。行者闻言不行。来者不来。闻盗不来。闻言不至。徙官闻言不徙。居官有忧。居家多灾。岁稼中孰。民疾疫多病。岁中有兵，闻言不开。见贵人吉。请谒不行，行不得善言。追亡人不得。渔猎不得。行不遇盗。雨不雨甚。霁不霁。故其莫字皆为首备。问之曰，备者仰也，故定以为仰。此私记也。

5. 命曰首仰足胛有内无外。占病，病甚不死。系者不出。求财买臣妾不得。行者不行。来者不来。击盗不见。闻盗来，内自惊，不来。徙官不徙。居官家室吉。岁稼不孰。民疾疫有病甚。岁中无兵。见贵人吉。请谒追亡人不得。亡财物，财物不出得。渔猎不得。行不遇盗。雨不雨。霁不霁。凶。

6. 命曰呈兆首仰足胛。以占病，不死。系者未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不得。行不行。来不来。击盗不相见。闻盗来不来。徙官不徙。居官久多忧。居家室不吉。岁稼不孰。民病疫。岁中毋兵。见贵人不吉。请谒不得。渔猎得少。行不遇盗。雨不雨。霁不霁。不吉。

7. 命曰呈兆首仰足开。以占病，病笃死。系囚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不得。行者行。来者来。击盗不见盗。闻盗来不来。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岁稼不孰。民疾疫有而少。岁中毋兵。见贵人不吉。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行遇盗。雨不雨。霁小吉。

8. 命曰首仰足胛。以占病，不死。系者久，毋伤也。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不得。行者

不行。击盗不行。来者来。闻盗来。徙官闻言不徙。居家室不吉。岁稼不孰。民疾疫少。岁中毋兵。见贵人得见。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行遇盗。雨不雨。霁不霁。吉。

9. 命曰首仰足开有内。以占病者，死。系者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不得。行者行。来者来。击盗行不见盗。闻盗来不来。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岁孰。民疾疫有而少。岁中毋兵。见贵人不吉。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行不遇盗。雨霁。霁小吉，不霁吉。

10. 命曰横吉内外自桥。以占病，卜日毋瘳死。系者毋罪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得。行者行。来者来。击盗合交等。闻盗来来。徙官徙。居家室吉。岁孰。民疫无疾。岁中无兵。见贵人请谒追亡人渔猎得。行遇盗。雨霁，雨霁大吉。

11. 命曰横吉内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系不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追亡人渔猎不得。行者不来。击盗不相见。闻盗不来。徙官徙。居官有忧。居家室见贵人请谒不吉。岁稼不孰。民疾疫。岁中无兵。行不遇盗。雨不雨。霁不霁。不吉。

12. 命曰渔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系者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击盗请谒追亡人渔猎得。行者行来。闻盗来不来。徙官不徙。居家室吉。岁稼不孰。民疾疫。岁中毋兵。见贵人吉。行不遇盗。雨不雨。霁不霁。吉。

13. 命曰首仰足胛内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系者不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追亡人渔猎得。行不行。来者来。击盗胜。徙官不徙。居官有忧，无伤也。居家室多忧病。岁大孰。民疾疫。岁中有兵不至。见贵人请谒不吉。行遇盗。雨不雨。霁不霁。吉。

14. 命曰横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系者不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追亡人渔猎不得。行不行。来不来。击盗不行，行不见。闻盗来不来。徙官不徙。居家室见贵人吉。岁大孰。民疾疫。岁中毋兵。行不遇盗。雨不雨。霁不霁。大吉。

15. 命曰横吉榆仰。以占病，不死。系者不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至不得。行不行。来不来。击盗不行，行不见。闻盗来不来。徙官不徙。居官家室见贵人吉。岁孰。岁中有疾疫，毋兵。请谒追亡人不得。渔猎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盗。雨霁不霁。小吉。

16. 命曰横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环有瘳无死。系者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行来不来。击盗不合。闻盗来来。徙官居官吉，不久。居家室不吉。岁不孰。民毋疾疫。岁中毋兵。见贵人吉。行不遇盗。雨不雨。霁。小吉。

17. 命曰载所。以占病，环有瘳无死。系者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请谒追亡人渔猎得。行者行。来者来。击盗相见不相合。闻盗来来。徙官徙。居家室忧。见贵人吉。岁孰。民毋疾疫。岁中毋兵。行不遇盗。雨不雨。霁霁。吉。

18.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系久毋伤。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行不行。来不来。击盗盗行不合。闻盗不来。徙官不徙。居家室吉。岁稼中。民疾疫无死。见贵人不得见。行不遇盗。雨不雨。大吉。

19. 命曰首仰足胛外高内下。卜有忧，无伤也。行者不来。病久死。求财物不得。

见贵人者吉。

20. 命曰外高内下。卜病不死，有祟。(而)市买不得。居官家室不吉。行者不行。来者不来。系者久毋伤。吉。

21. 命曰头见足发有内外相应。以占病者，起。系者出。行者行。来者来。求财物得。吉。

22. 命曰呈兆首仰足开。以占病，病甚死。系者出，有忧。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行(行)不行。来不来。击盗不合。闻盗来来。徙官居官家室不吉。岁恶。民疾疫无死。岁中毋兵。见贵人不吉。行不遇盗。雨不雨。霁。不吉。

23. 命曰呈兆首仰足开外高内下。以占病，不死，有外祟。系者出，有忧。求财物买臣妾马牛，相见不会。行行。来闻言不来。击盗胜。闻盗来不来。徙官居官家室见贵人不吉。岁中。民疾疫有兵。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闻盗遇盗。雨不雨。霁。凶。

24. 命曰首仰足胠身折内外相应。以占病，病甚不死。系者久不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渔猎不得。行不行。来不来。击盗有用胜。闻盗来来。徙官不徙。居官家室不吉。岁不孰。民疾疫。岁中。有兵不至。见贵人喜。请谒追亡人不得。遇盗凶。

25. 命曰内格外垂。行者不行。来者不来。病者死。系者不出。求财物不得。见人不见。大吉。

26. 命曰横吉内外相应自桥榆仰上柱(上柱足)足胠。以占病，病甚不死。系久，不抵罪。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行不行。来不来。居官家室见贵人吉。徙官不徙。岁不大孰。民疾疫有兵。有兵不会。行遇盗。闻言不见。雨不雨。霁霁。大吉。

27. 命曰头仰足胠内外自垂。卜忧病者甚，不死。居官不得居。行者行。来者不来。求财物不得。求人不得。吉。

28. 命曰横吉下有柱。卜来者来。卜日即不至，未来。卜病者过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财物不得。系者出。

29. 命曰横吉内外自举。以占病者，久不死。系者久不出。求财物得而少。行者不行。来者不来。见贵人见。吉。

30. 命曰内高外下疾轻足发。求财物不得。行者行。病者有瘳。系者不出。来者来。见贵人不见。吉。

31. 命曰外格。求财物不得。行者不行。来者不来。系者不出。不吉。病者死。求财物不得。见贵人见。吉。

32. 命曰内自举外来正足发。(行)者行。来者来。求财物得。病者久不死。系者不出。见贵人见。吉。

三、“此”类条例

1. 此横吉上柱外内(内)自举足胠。以卜有求得。病不死。系者毋伤，未出。行不

行。来不来。见人不见。百事尽吉。

2. 此横吉上柱外内自举柱足以作。以卜有求得。病死环起。系留毋伤,环出。行不行。来不来。见人不见。百事吉。可以举兵。

3. 此挺诈有外。以卜有求不得。病不死,数起。系祸罪。闻言毋伤。行不行。来不来。

4. 此挺诈有内。以卜有求不得。病不死,数起。系留祸罪无伤出。行不行。来者不来。见人不见。

5. 此挺诈内外自举。以卜有求得。病不死。系毋罪。行行。来来。田贾市渔猎尽喜。

6. 此狐貉。以卜有求不得。病死,难起。系留毋罪难出。可居宅。可娶妇嫁女。行不行。来不来。见人不见。有忧不忧。

7. 此狐彻。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系留有抵罪。行不行。来不来。见人不见。言语定。百事尽不吉。

8. 此首俯足胗身节折。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系留有罪。望行者不来。行行。来不来。见人不见。

9. 此挺内外自垂。以卜有求不晦。病不死,难起。系留毋罪,难出。行不行。来不来。见人不见。不吉。

10. 此横吉榆仰首俯。以卜有求难得。病难起,不死。系难出,毋伤也。可居家室,以娶妇嫁女。

11. 此横吉上柱载正身节折内外自举。以卜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12. 此横吉上柱足胗内自举外自垂。以卜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13. (为人病)首俯足诈有外无内。病者占龟未已,急死。卜轻失大,一日不死。

14. 首仰足胗。以卜有求不得。以系有罪。人言语恐之毋伤。行不行。见人不见。

附录四 《尚书·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为功。

为三坛同埴。为坛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史乃册，祝曰：“惟尔元孙某，遭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呜呼！无坠天之降宝命，我先王亦永有依归。今我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珪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珪。”

乃卜三龟，一习吉。

启籥见书，乃并是吉。公曰：“体，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终是图。兹攸俟，能念予一人。”公归，乃纳册于金縢之匮中。王翼日乃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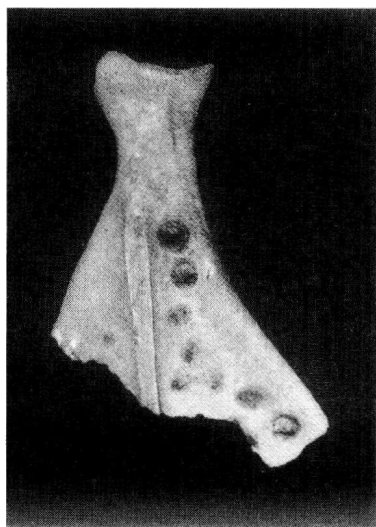
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鸛鸣”。王亦未敢诮公。

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与大夫尽弁，以启金縢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二公及王乃问诸史与百执事，对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执书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劳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国家礼亦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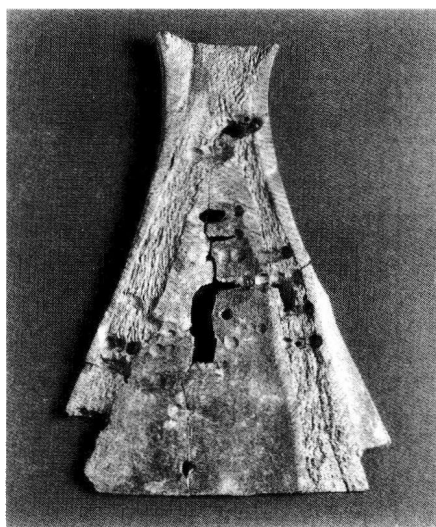
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熟。

附录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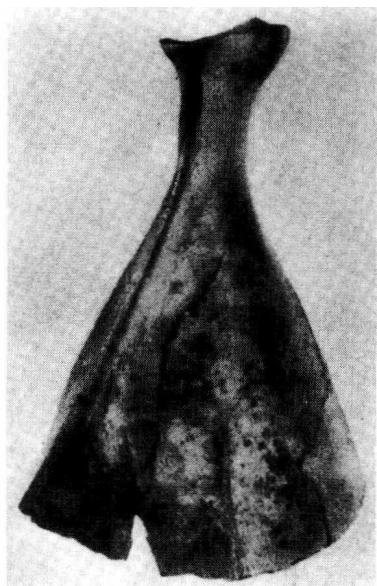
图版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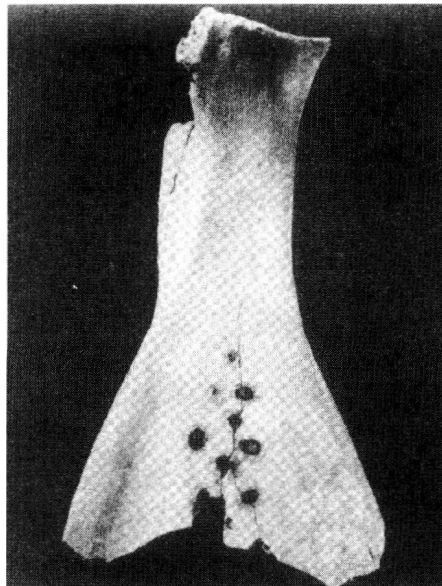
1. 商代二里岗上层一期
(C5. 1H112: 16)



2. 济南王府遗址
(H152: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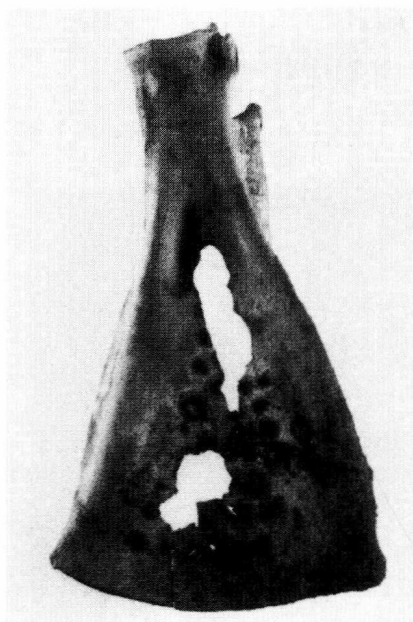


3. 富河沟门遗址(H3: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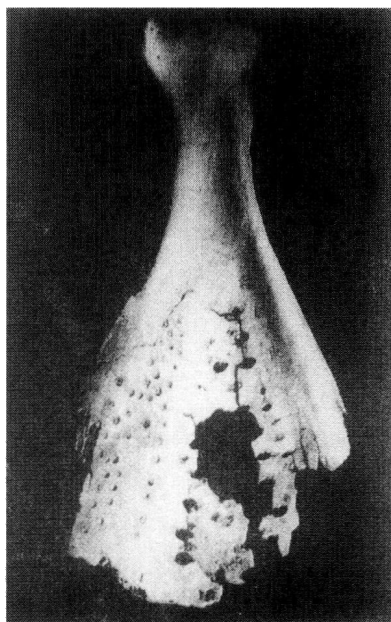


4. 张家口贾家营遗址(H2: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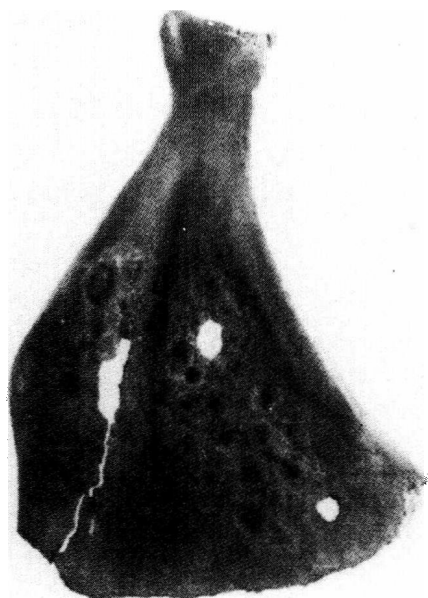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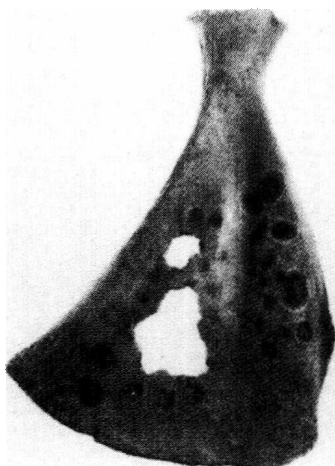
图版二



1. 偃师二里头遗址(IVT31③: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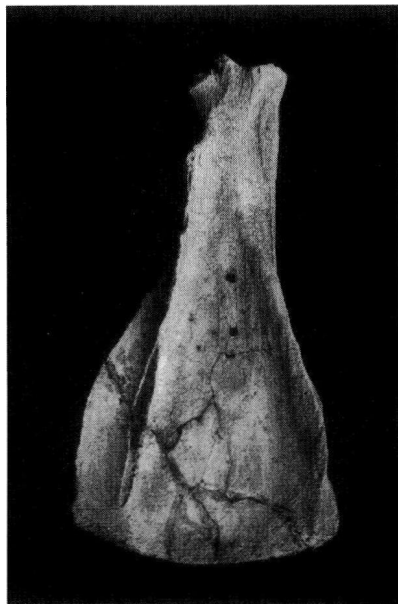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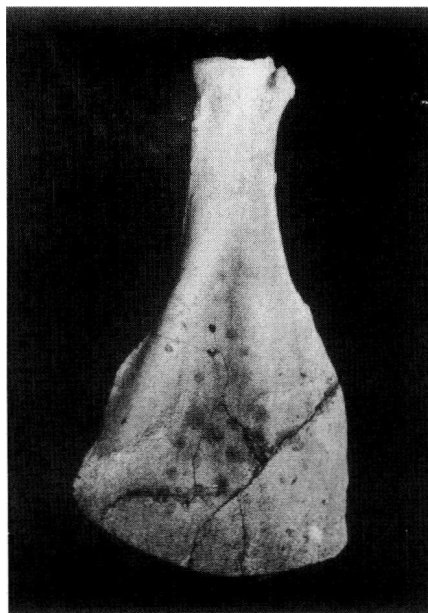


3. 卓尼茺儿遗址(H1: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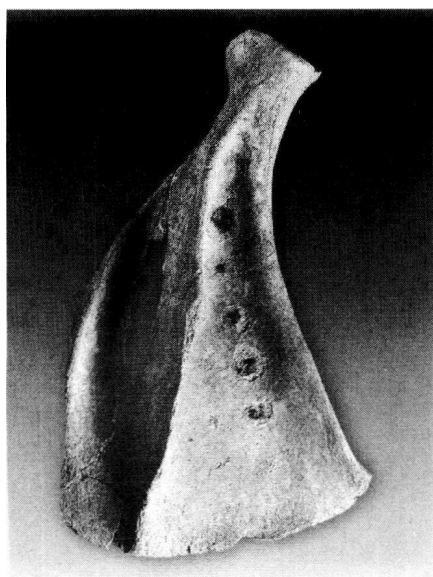


2. 偃师二里头遗址(IVT15④B:3、IVH57: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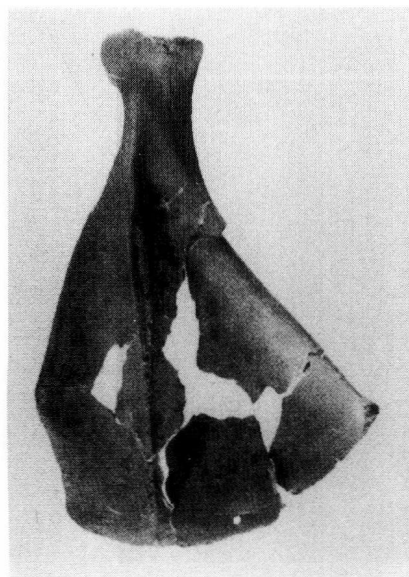
图版三



1. 伊克昭盟朱开沟遗址(H2022:1)正反面



2. 神木新华遗址
(99H5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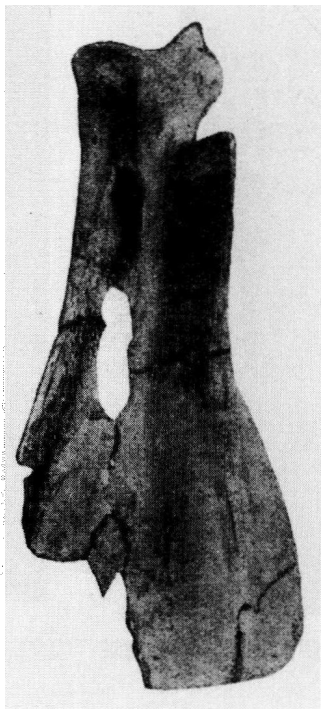


3. 商代二里岗下层二期
(C9.1H106: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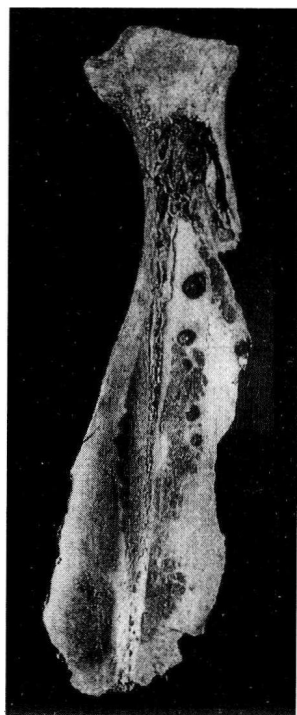
图版四



1. 荥阳西史村遗址
(T9:12)



2. 郑州二里岗遗址
(H10:4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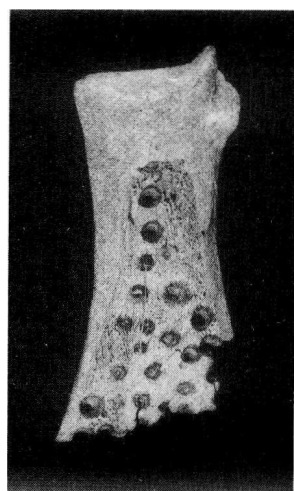
3. 垣曲商城遗址
(H105:1)



4. 忻州游邀遗址
(H59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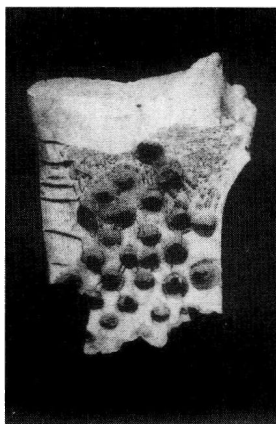


5. 垣曲商城遗址
(H12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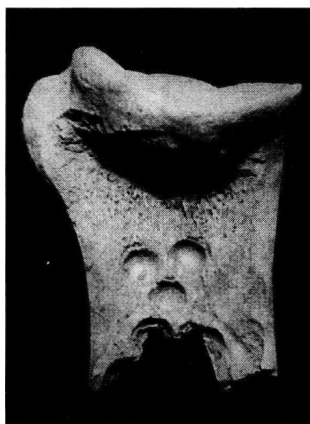


6. 商代二里岗下层二期
(C5H20: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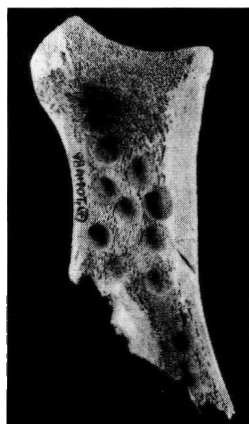
图版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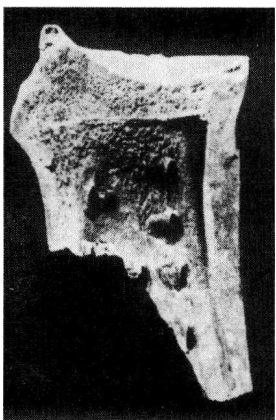
1. 二里岗上层一期
(C5.3H311:6)



2. 西安老牛坡遗址
(88XL I 2H15:21)



3. 安阳洹北商城遗址
(T1④:21)



4. 藁城台西遗址
(T8: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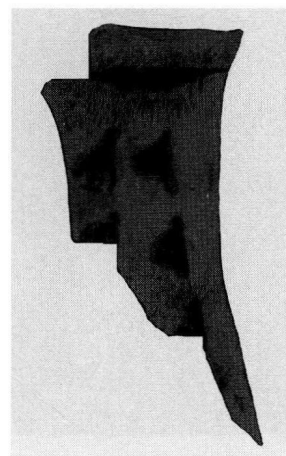
5. 阳信李屋遗址
(T1407T1507H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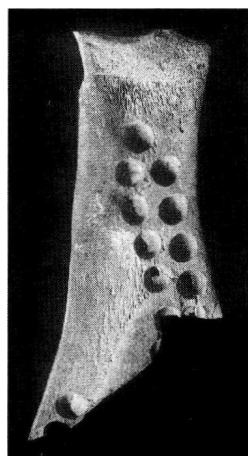
6. 《甲编》3591



7. 《甲编》28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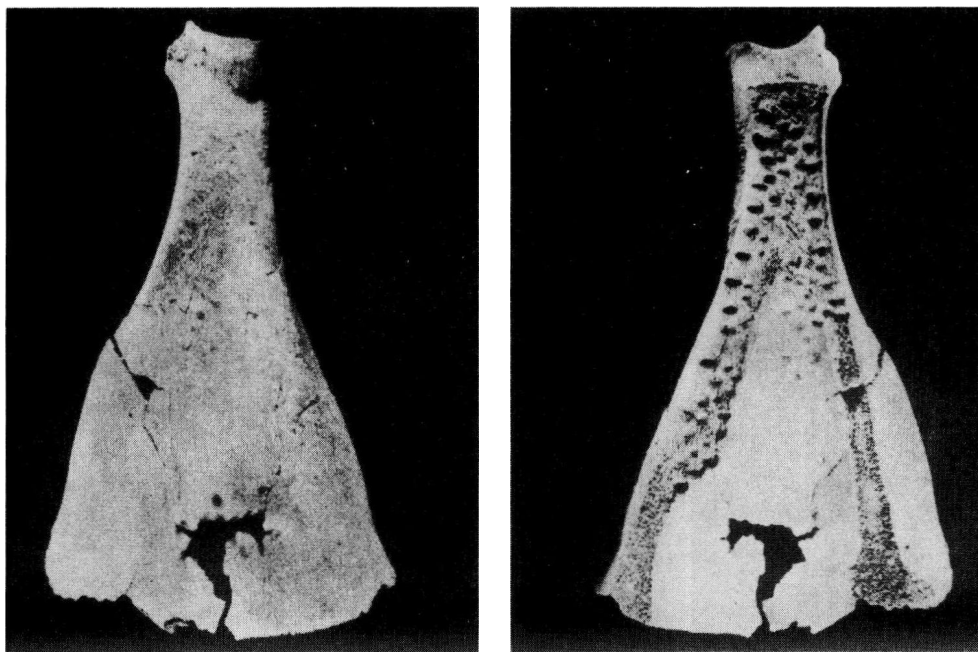


8. 《甲编》28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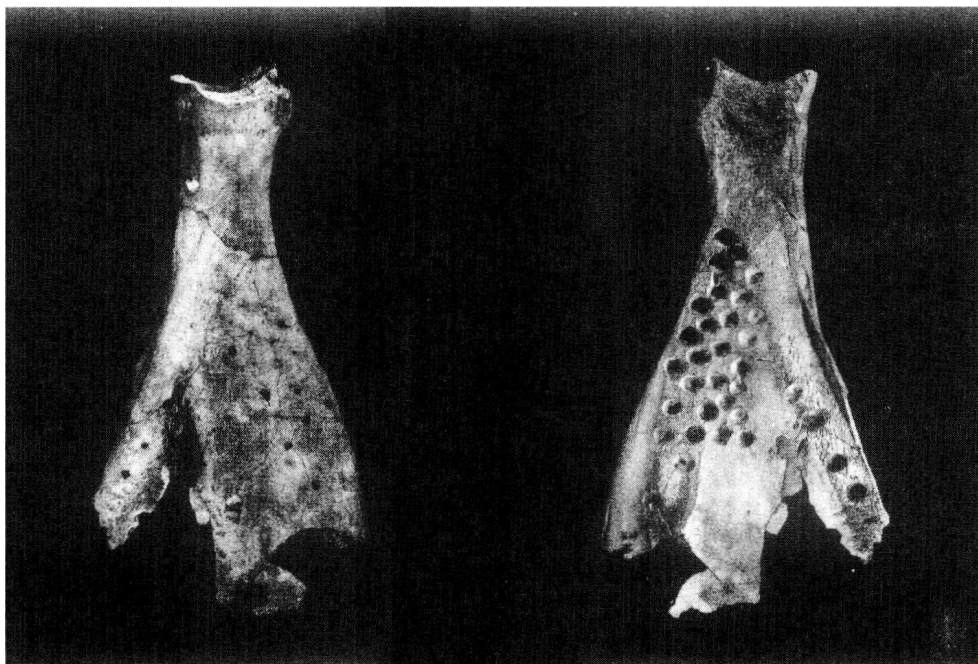


9. 《周原》FQ1
(原号 79FQNH1:1)

图版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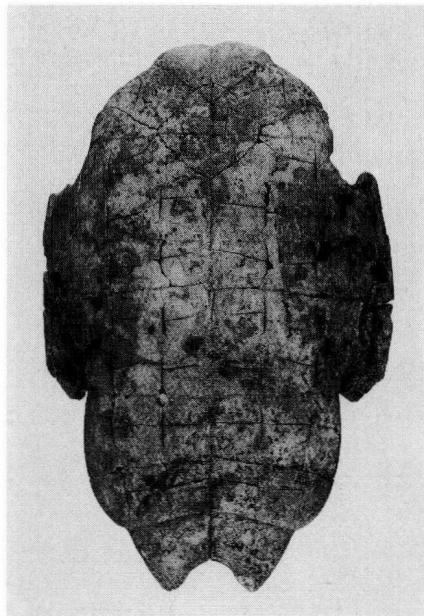


1. 藁城台西遗址(T8:19)正反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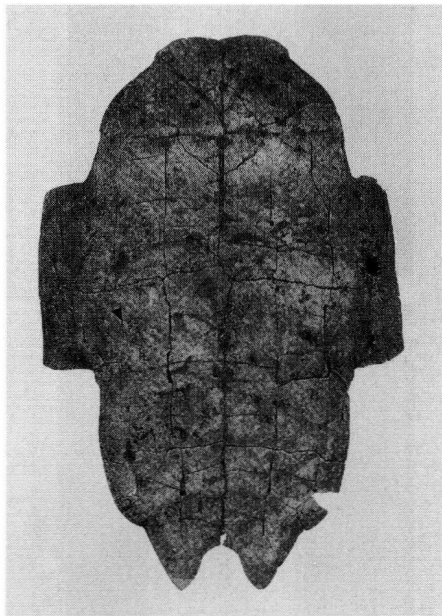


2. 长武碾子坡遗址(H151:85)正反面

图版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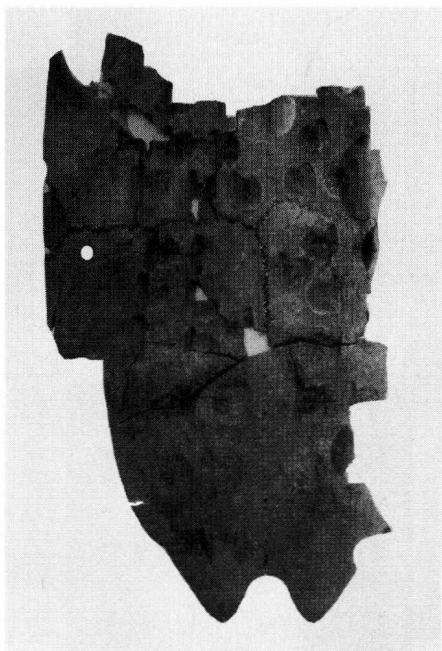
1. 《花东》182(H3:557)



2. 《花东》499(H3:15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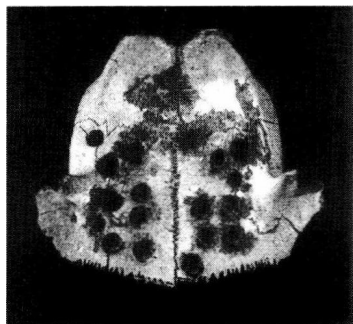


3. 《花东》205(H3:6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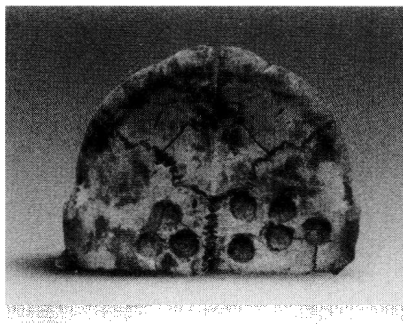


4. 济南大辛庄遗址
(03DXZT2302⑤B: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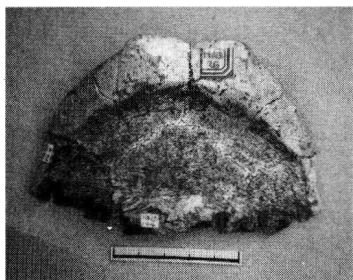
图版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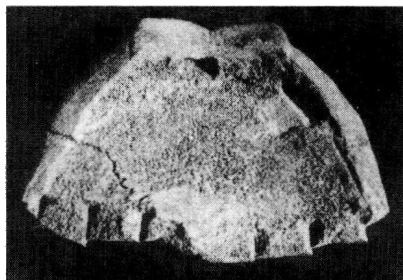
1. 郑州二里岗上层一期(C5.3H3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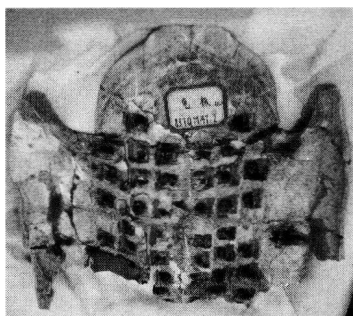
2. 忠县瓦渣地遗址(T311⑩:2)



3. 周公庙遗址(H1⑩:36 + H1⑩:1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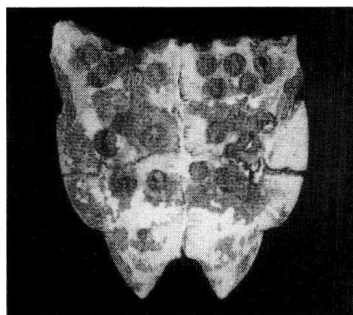
4. 房山琉璃河燕都遗址(G11H108①: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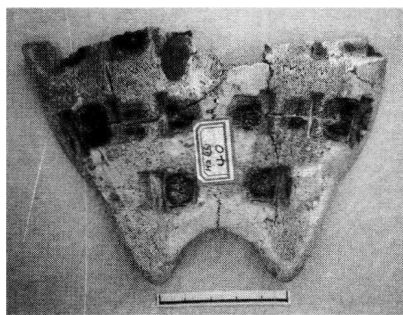
5. 扶风齐家村遗址(M47:2)



6. 洛阳泰山庙遗址的腹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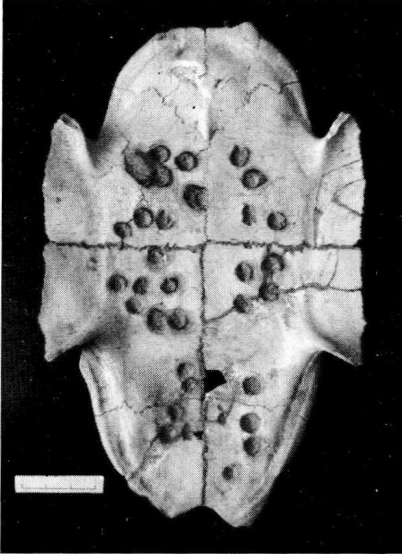


7. 郑州二里岗上层一期(C5H3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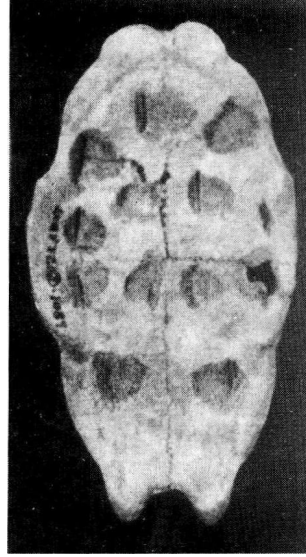


8. 周公庙遗址(H2①c: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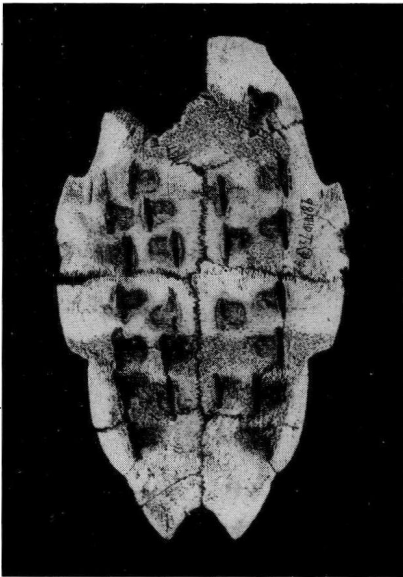
图版九



1. 郑州耀包城工程工地
(2006H6)



2. 磁县下七垣遗址
(T21③:10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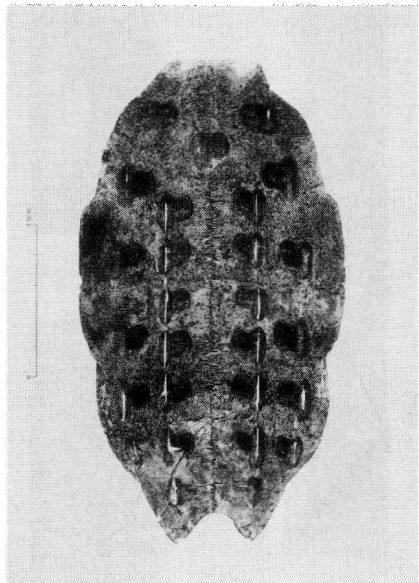


3. 安阳洹北商城遗址(T2③: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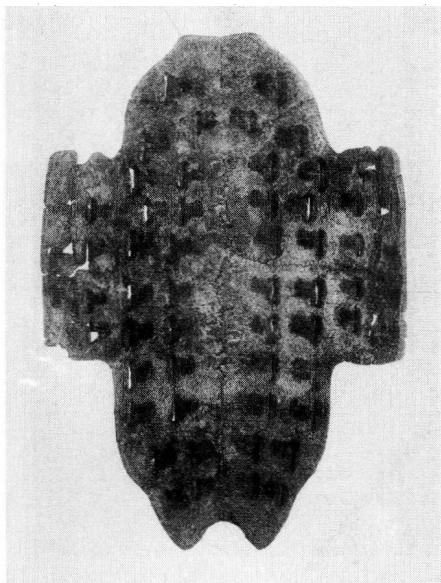


4. 安阳洹北商城遗址(T2③: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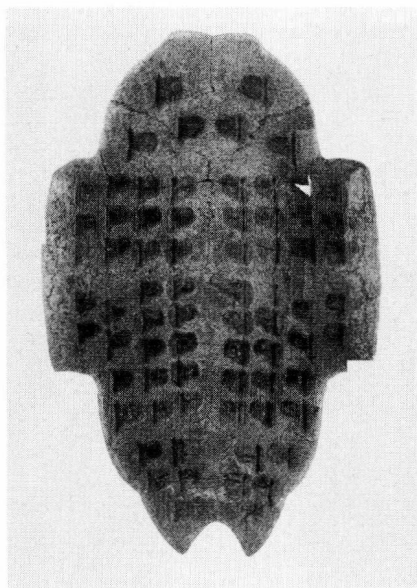
图版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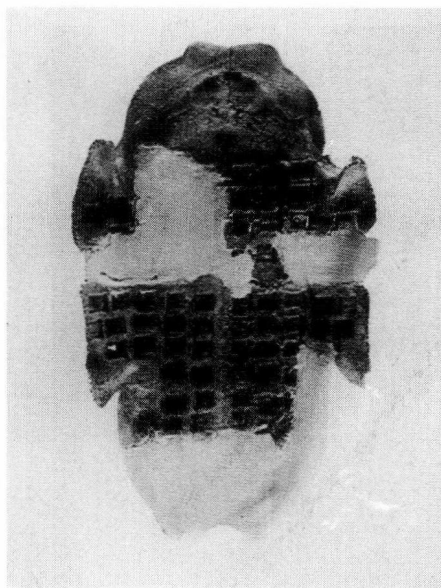
1. 《花东》20(H3:63)



2. 《花东》138(H3:4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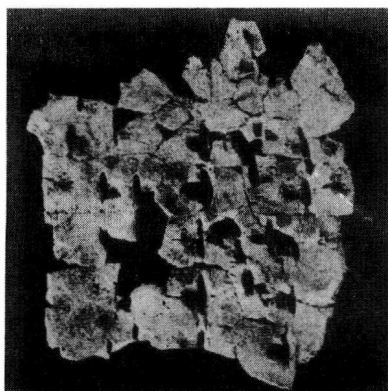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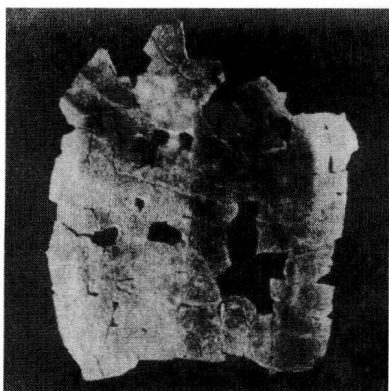


3. 《花东》94(H3:3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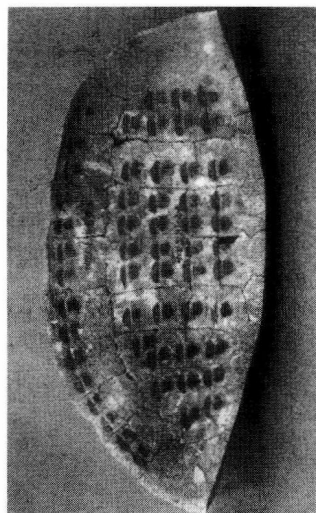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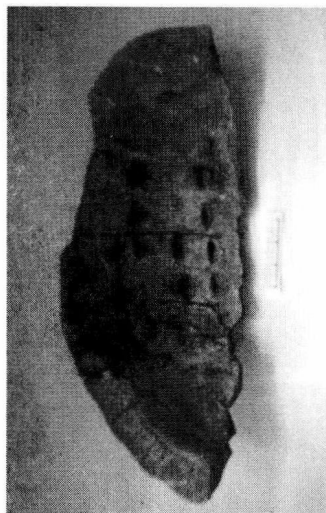


4. 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M2:35:3)

图版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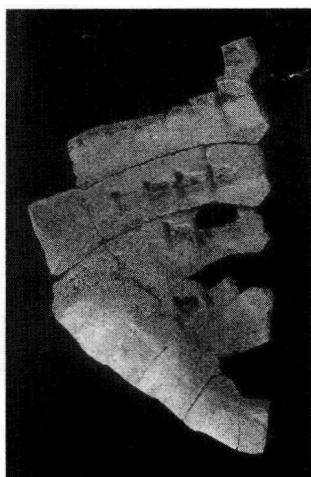
1. 藁城台西遗址(T4:13)



2. 临城补要村遗址(H70:02)

3. 桓台唐山遗址(H122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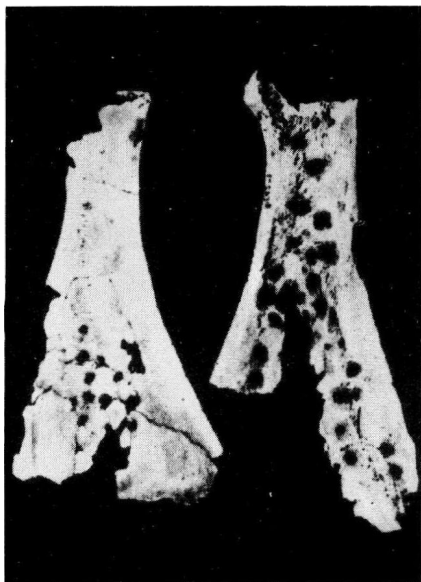
4. 《花东》(H3: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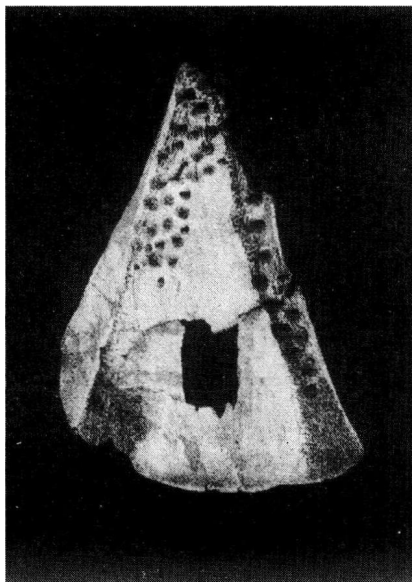
5. 岐山周公庙遗址(03C10④:1,2)

6. 《乙编》66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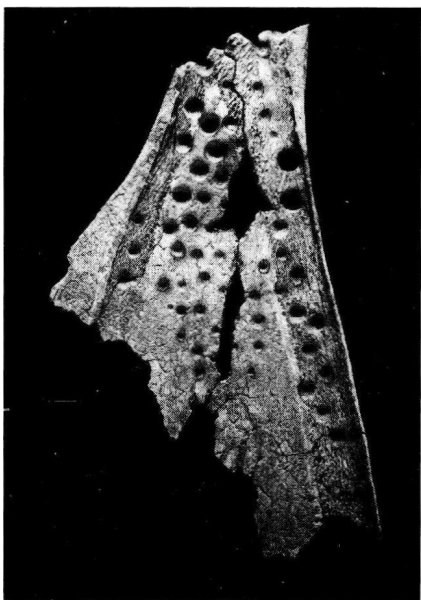
图版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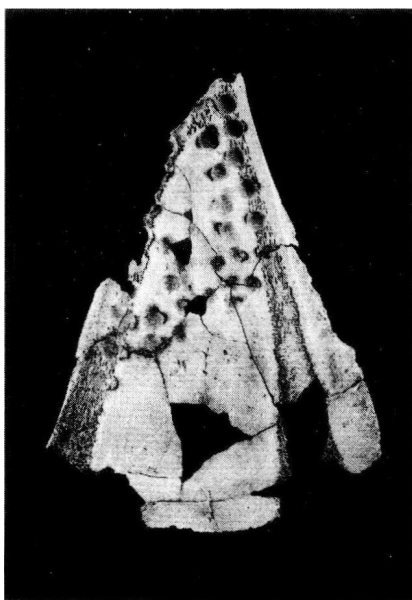
1. 夏县东下冯遗址
(M523:1之1,2)



2. 商代二里岗上层一期
(C5.1H12:17)



3. 西安老牛坡遗址
(88XL I 2H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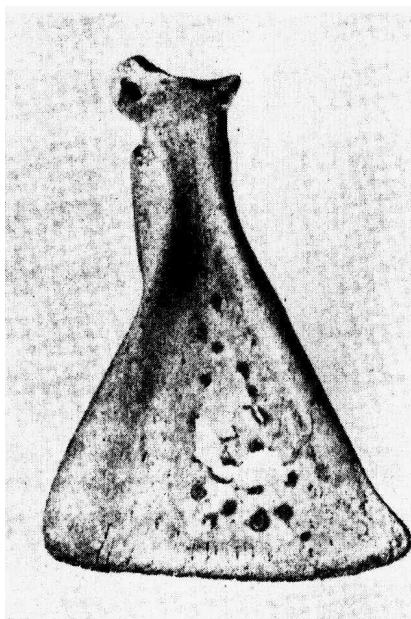


4. 安阳洹北商城遗址
(T1④:83)

图版十三



1. 武山傅家门遗址(T132F1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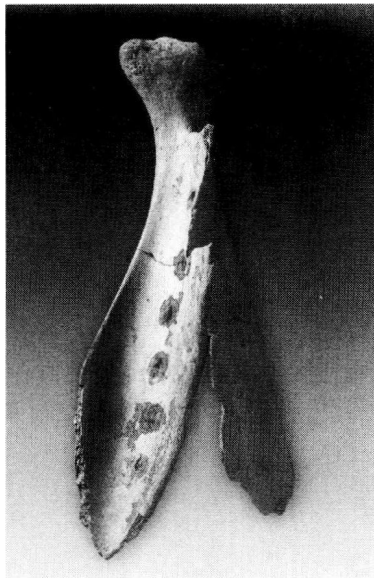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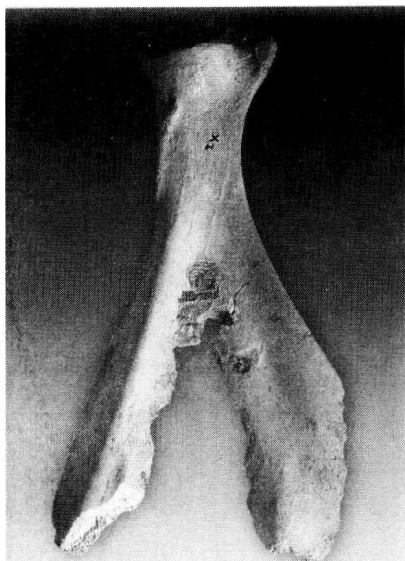


2. 长安客省庄遗址(T13:2A: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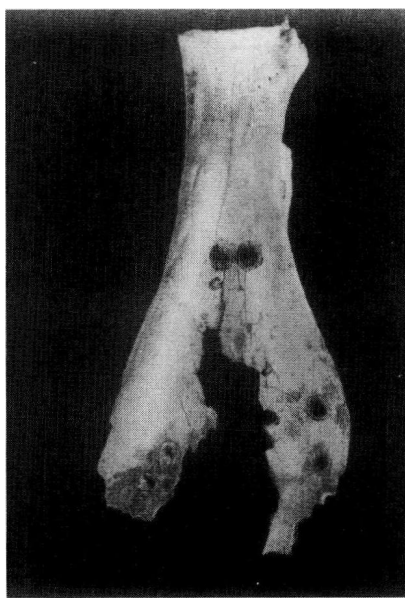


3. 禹州瓦店遗址(VT1H17:3)正反面

图版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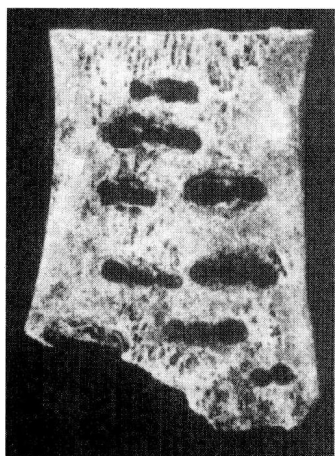


1. 神木新华遗址(96H15:2)正反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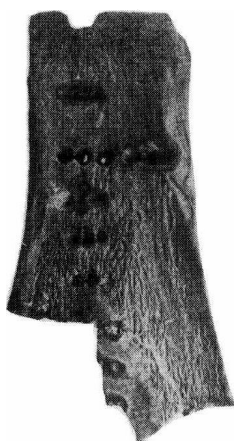


2. 伊克昭盟朱开沟遗址(标本 T229④:2)正反面

图版十五



1. 泗水尹家城遗址
(T192⑥:17)



2. 徐州高皇庙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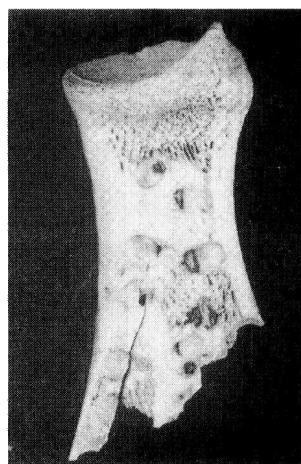
3. 阳信李屋遗址
(T1405M44: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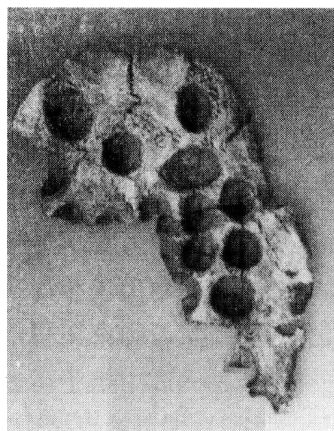
4. 安阳苗圃北地遗址(84H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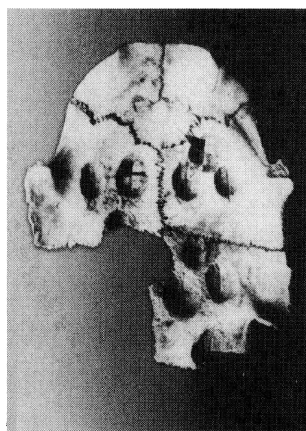
5. 临城补要村遗址(T09C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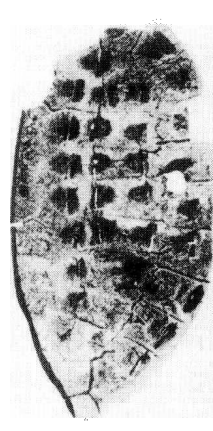
6. 长治小神遗址(H2:45)



7. 大梁尾遗址
(H3:1)



8. 清江香炉石遗址
(T26⑥:8)



9. 安阳苗圃北地遗址
(PNT234④:6)

后 记

本书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听取了诸位师长的意见修改而成的,部分章节的内容进行了更动与补充。

2004年9月,本人进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并于该学期前往陕西周公庙遗址参加考古发掘实习以及甲骨的整理工作。在整理过程中,除了对甲骨上的文字进行临摹外,我通过对甲骨各部位的特征以及钻凿灼形态的细致观察,对这些残碎甲骨进行了定位、联缀与行款走向的研究,并得到了葛英会、刘绪两位老师的肯定。他们认为这项研究很有意义,以往的研究较少且不完善,于是决定让我在博士论文中尝试这方面的研究。此后,我又多次去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湖北、四川、内蒙古、辽宁、吉林等地区进行调研,对这些地区博物馆和考古所所藏的甲骨实物进行了观摩。这些实地调研工作,对我后期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的裨益,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仅靠书面资料而脱离甲骨实物的不足。

论文从写作到出版,得到许多老师和同学的帮助。

首先特别感谢李伯谦先生,不仅参加了我的开题报告和论文答辩,还在论文答辩时提出将该书列入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丛书的出版计划,使得该书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得以顺利出版。

其次感谢我的两位恩师,这篇论文是在葛英会教授、刘绪教授的直接指导下完成的。我于2001年考入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因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学习上有诸多不便。承蒙葛英会老师垂爱,悉心训导,追随其学习古文字学。生活上,老师和师母亦如父母,经常照顾我家三口的生活,甚为难忘。2004年,我在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继续深造。而此时葛老师已到退休之年,因此刘绪老师接收我继续攻读博士研究生。正是老师的精心栽培,使我在夏商周考古学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两位先生待人接物谦和热情,求问治学严谨踏实,令我终生受益。

高诚之、张地山、元南田三位先生,其高风亮节,让人肃然起敬,容止不轻,特别是高先生以八十三岁高龄亲自为本书题写书名。在此谨祝先生身体健康,寿比南山。考古文博学院的高崇文、赵辉、王迅、徐天进、孙华、张弛、雷兴山等诸位老师,在学习和论文写作过程中帮助甚多,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曹定云、唐际根等先生亦在论文的完成中给予诸多指教。郑后洙教授、崔钟圭所长和柴溪研书会的诸位,在我经济困难之时,慷慨施以援手,给我鼓励和勇气。考古文博学院与尽性书院的诸位同学,在学习和生活方面给了我许多帮

助。张敏同学除在中文写作方面对我予以帮助外,对于论文中的一些问题也与我进行了讨论,使我的写作思路更为清晰。在此对诸位谨表真诚的谢意。

感谢我的爱人。在我清贫求学、前路未卜的时候相遇,得其怜爱,不离不弃,与我携手同行。感谢岳母和姨姐,在我无法照顾家人之时,悉心照顾我的妻子和儿子。

最后,将本书献给我的父母双亲。年逾古稀之父母老人家,甘耐寒苦。江山变动,心志不衰企盼不孝的儿子成龙成才,每思念至此,都不禁泣涕潸然。

此外,感谢吴长青先生等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同仁,正是他们的辛勤工作,使得论文得以顺利出版。

· 攸好 朴载福

2010年8月22日于韩国翰音书斋

本书引用书目简称

- 《明》 明义士：《殷墟卜辞》，1917 年。
- 《拾》 叶玉森：《铁云藏龟拾遗》，1925 年。
- 《佚》 商承祚：《殷契佚存》，1933 年。
- 《库》 [美] 方法敛：《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935 年。
- 《粹》 郭沫若：《殷墟粹编》，1937 年。
- 《文》 孙海波：《甲骨文录》，1937 年。
- 《遗》 金祖同：《殷契遗珠》，1939 年。
- 《甲》 董作宾：《小屯·殷墟文字甲编》，1948 年。
- 《乙》 董作宾：《小屯·殷墟文字乙编》，1949 年。
- 《摭续》 李亚农：《殷契摭佚续编》，1950 年。
- 《存》 胡厚宣：《甲骨续存》，1955 年。
- 《外》 董作宾：《殷墟文字外篇》，1956 年。
- 《丙》 张秉权：《殷墟文字丙编》，1957—1972 年。
- 《释》 屈万里：《殷墟文字甲编考释》，1961 年。
- 《合》 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1978—1983 年。
- 《补》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甲骨文合集补编》，1999 年。
- 《屯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1980 年。
- 《花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2003 年。
- 《周原》 曹玮：《周原甲骨文》，2002 年。
- 《天》 王明钦：《湖北江陵天星观楚简的初步研究》，1989 年。
- 《包山》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1991 年。
- 《新》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2003 年。



Aurora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Publication Series , No.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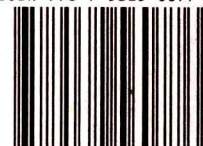
Research on Methods of Divination in the Pre-Qin Period

Piao Zaifu



上架建议: 考古 / 历史

ISBN 978-7-5325-6077-6



9 787532 560776 >

定价: 108.00元

易文网: www.ewen.cc